

中美苏三国演义

王俊彦 著



时事出版社

引 子

词曰：

变幻风云天下事，
独喜三国竞争，
全球冷战转头空；
美中依旧在，
苏联影无踪。
纵横捭阖巧谈判，
堪赞奇谋大勇，
一壶美酒喜相逢；
三家多少事，
常令鬼神惊。

一首小诗吟罢，引出一部当代惊心动魄的新三国演义来——

我们这部书说的中、美、苏三国关系的故事，要从1949年10月1日起。

这一天，是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取得辉煌胜利的一天，是世代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封建主义压迫的炎黄子孙，挺直腰杆，

当家做主，扬眉吐气的一天；也是中国、美国、苏联三个具有国际影响的大国，正式鼎足而立，展开错综复杂、纵横捭阖斗争之日！

这一天，随着喷薄欲出的红日把天安门广场的城楼镀上一层炫目的金光，经几十年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的领袖人物及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代表，意气风发的新中国工人、农民、市民、学校师生、机关工作人员、城防部队，早就激情满怀地打着各色抒发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豪情壮志的标语，手擎鲜艳的五星红旗，从四面八方赶往天安广场，纵声高呼：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10月1日下午3时整，毛泽东身穿特意为他参加开国大典缝制的黄色将校呢中山服，偕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张澜、李济深、高岗等国家领导人，迈着充满胜利豪情的轻快而有力的步伐，健步登上雄伟的天安门城楼。

刹那间，天安门广场爆发出排山倒海、经久不息的欢呼声，30万人的目光一齐投向主席台，投向伟大领袖毛泽东，以响彻云霄的掌声和欢呼声来表达对新中国缔造者的感谢敬仰之情，他们发自肺腑地纵情高歌：

东方红，
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幸福，
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这是发自亿万中国人民肺腑的心声，四亿五千万炎黄子孙都知道他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的一个农民家庭，早年即参加革命活动，1921年参加创立中国共产党；其后协助孙中山改组中国国民党，推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毅然领导秋收起义，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粉碎国民党

反动派的四次反革命“围剿”；由于王明右倾机会主义排挤毛泽东对军队的领导。致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遭受重大损失，不得不开始两万五千里长征；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英明地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为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日本投降后，毛泽东以非凡的气概领导解放战争，终于打败蒋介石，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怎能不纵情歌唱：

高楼万丈平地起，
盘龙卧虎高山顶，
边区的太阳红又红，
咱们的领袖毛泽东。

这时，毛泽东肩负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的重托，健步走到麦克风前，响亮地向全世界人民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今天成立了！”

这豪情满怀的宣言顿时激起千顷波涛，参加国庆大典的30万群众一齐欢呼起来。这欢呼声惊天动地，雷声隆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传到长城内外，飞至大山南北，回荡在白山黑水之间，传遍960万平方公里的城市村庄，使全中国人民的心一齐欢呼起来。

中国人民的最强音越过崇山峻岭，飞越大川江河，传到宽阔的红场，飞进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克里姆林宫的浅灰色大楼，进入一座二层小楼，秘书向斯大林报告了这一特大喜讯。斯大林这位奇世伟人1879年12月21日生于格鲁吉亚古老的小城哥里镇，青年时期即投身革命，1917年协助列宁领导十月革命，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逝世后，斯大林领导苏联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倡导、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指挥苏联红军为打败德意日法西斯做出了巨大贡献，使苏联成为可以与美国并驾齐驱的超级大国。

在几十年的艰苦斗争中，斯大林深感仅靠苏联一国难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分庭抗礼，颇有身单势孤之感，新中国的成立使他感到欣喜异常，毛泽东和新中国政府制定的“一边倒”对外政策，使他感到世界力量对比发生了对苏联极为有利的变化，他在同帝国主义的较量中，已有了有力的伙伴和助手，肩头的重担顿感减轻了不少，不禁大声喟叹：有我和毛泽东联手，还怕对付不了杜鲁门！

正在这时，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夹着公文包进来报告，新中国的外交部长周恩来致函苏联驻北京总领事齐赫文斯基，提议有必要在中苏两国之间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

这正是斯大林正在考虑的大事，斯大林很喜欢葛罗米柯这位“天才神童外交家”，对他报告的消息极感兴趣，忙问苏联能否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

葛罗米柯忙说，为了支持毛泽东，苏联有必要成为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

斯大林指示葛罗米柯马上向北京发去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电报，再通过外交途径履行正常的外交手续。

葛罗米柯欣然领命而行，马上回到外交部，亲自口授承认新中国的外交贺电，通过电波快速传到北京。

这样，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重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之后不久，周恩来就把从莫斯科拍来的世界上第一份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外交贺电，送到了毛泽东的手中。

毛泽东顿感这份电报的价值重于泰山，连说到底是苏联老大哥，在关键时刻雪中送炭，称赞在新中国刚刚正式诞生亟需得到国际承认之时，仅仅过了两小时，斯大林就首先向新中国伸出友谊之手，这使毛泽东倍感温暖，极受鼓舞，大大地增强了毛泽东的自豪感和自信力。

10月2日，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代表苏联政府致电中国政府外交部长周恩来，表示苏联基于力求与中国人民建立真正友好关系的一贯愿望，苏联政府决定建立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与此同时，葛罗米柯又召见国民党中华民国驻莫斯科临时代办，向他正式宣称：

“由于中国发生的事件，使中国国内军事、政治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变化，从而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且组成了中央人民政府……苏联政府认为与广州政府的外交关系已经断绝，并已决定自广州召回其外交代表。”

毛泽东大喜，并同周恩来等人商定，中国决定不经过谈判，就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10月3日，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复照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欢迎苏联立即同中国建立中苏两国的外交关系和互派大使，指出中苏两国人民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并在困难中有过相互支持。中苏两国人民建立外交关系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将进入一个新阶段。

在斯大林和苏联的带动下，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民主德国等东欧国家纷纷与新中国建交，就使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的广阔领土为中心，把欧洲和亚洲连在一起，形成不可小视的集团力量，这怎能不使斯大林和毛泽东欢欣鼓舞，喜上眉梢？

有了毛泽东和新中国，斯大林再不觉得形只影单，不再是孤家寡人；有了斯大林和苏联，毛泽东觉得有了依靠，腰板挺得更直、更硬了。

新中国的成立，毛泽东宣布中国执行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使美国总统杜鲁门感到恼火。

杜鲁门是美国政坛上的暴发户。杜鲁门1884年5月8日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一个名叫拉玛的小镇，父亲是个牲口贩子，因为家境贫苦和视力太差，高中毕业后就去当清洁工、邮递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军，因作战勇敢由少尉升为少校军官，1919年退役后回到独立城经营服饰用品商店，不久就负债累累，穷困潦倒，不得已投靠密苏里州黑社会头子、民主党头面人物彭德格斯特，从此时来运转，依仗金钱和打手当选为杰克逊县法官、参议员，因而被讥讽为“从彭德格斯特袖子里掏出来的参议员”。其后，他又投靠民主党实力人物罗伯特·权尼根，担任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1944年罗斯福第四次竞选总统时，当时的副总统华莱士和国务卿贝尔纳斯都想当副总统，两人相争互不让步，使民主党面临分裂的危险，罗斯福不得不搞折衷，让才能平庸、党派色彩不浓厚的杜鲁门担任了副总统。也是事有凑巧，才华横溢的罗斯福1945年4月12日晚突然因脑溢血病逝，杜鲁门侥幸以副总统身份入主白宫。

杜鲁门不熟悉外交事务，对复杂的国际问题感到十分棘手，对突然挑起

美国总统重担颇有压抑之感，不得不依靠有丰富国际经验的反共专家杜勒斯、艾奇逊、范登堡等智囊人物，他一上台就发表强硬的对苏言论，称：

“俄国人很快就会停止不前，届时美国将担负起领导世界沿着应走的道路前进的责任。”

杜鲁门这个“结束对苏联单方面退让政策”的讲话一发表，美国报界立即掀起一股与苏联决裂、解散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建立全球性反苏集团的喧嚣。

杜鲁门任职正逢美国发战争财成为世界头号强国之际，他下令向广岛和长崎扔下两个原子弹加速了日本投降，在 1948 年的总统选举中又取得意外胜利——战胜强劲对手杜威，连选连任总统。一连串的胜利更使他头脑发热，刚愎自用。

令杜鲁门气恼的是，他花费巨大力气支持的蒋介石却不给他争气，被中国共产党打得落花流水，失掉了半壁江山。美国以调停为名暗中帮助蒋介石也无济于事，他不能眼睁睁把中国的大好河山丢给中国共产党和斯大林。为对付斯大林，只得开始认真研究对付中国共产党的方策。

杜鲁门把马歇尔请来，与夫人一起热情招待。

马歇尔是与麦克阿瑟齐名的美国五星上将，1939 年至 1945 年任美国陆军参谋长，其后以美国总统特使身份来华“调处”国共关系。由于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遭到失败，1947 年 11 月奉召回国，出任杜鲁门的国务卿。他提出马歇尔计划，以“复兴欧洲”为名，为美国控制欧洲立下汗马功劳。在杜鲁门眼里，马歇尔是个既懂军事又擅长政治的难得人才，定有对付中国共产党的灵丹妙药，便摸着下巴询问道：“马歇尔将军，你在中国多次与毛泽东打交道，他也是个乡巴佬？”

杜鲁门此言一出，当即遭到他夫人伊丽莎白·华莱士的嘲讽：“你永远是个乡巴佬，什么时候说话才高雅一点儿呢？你只有在弹钢琴时才不那么粗俗！”

原来，杜鲁门夫人受过高等教育，人长得漂亮，学识也比杜鲁门渊博。杜鲁门 35 岁时才得此佳妻。婚后她帮助杜鲁门学习音乐，使杜鲁门小时从母亲那里学会的弹钢琴本领得到超常发挥。她常让杜鲁门为白宫的客人弹奏钢琴助兴。据说杜鲁门的一半点子来自他的夫人，因此对夫人言听计从。杜鲁门也以惧内为荣，但其夫人对外从不越雷池一步。伊丽莎白·华莱士活到 99 岁，是美国最长寿的第一夫人。

年近 70 岁的马歇尔对此习以为常，滔滔不绝他讲起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谈起他一到延安，就有耳目一新之感：一座座由青松和红布搭起的牌楼矗立在延安机场入口处，中美国旗迎风招展，横匾上高悬着中、英文标语“欢迎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三将军”格外引人注目，“国共合作万岁”、“中美合作万岁”的大幅标语更使马歇尔感到心里暖洋洋。毛泽东亲自率领一万多人举行盛大欢迎仪式，热烈情景使人终生难忘。

杜鲁门又迫不及待地插嘴问道：“毛泽东是不是个乡巴佬？”

马歇尔见杜鲁门夫人又要训斥她的丈夫，就抢先讲起他第一次看见毛泽东时的观感；只见这位传奇人物头戴解放帽，身穿布军衣，头发特别长，那秀气的样子简直像个标致女子！马歇尔不禁暗自纳闷，这个外表柔弱的人，怎么能具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杜鲁门说，正好可以向这个柔弱的人传播美国思想，为美利坚合众国所

用。但马歇尔摇着满头银发，讲起毛泽东意志坚强，胸有韬略，难为所动，相比之下，还是周恩来最有人情味。接着又讲起美国调停国共和谈失败，周恩来 1946 年 11 月 19 日离开南京返回延安时，马歇尔抱病到机场送行，神情沮丧地对周恩来说：“这 11 个月来，我老了许多！”

周恩来善解人意，大度地安慰马歇尔说：“不管怎么说，您在完成使命中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我们共产党人是不会忘记您的，让我们做个朋友吧！”

杜鲁门听了冷笑连声，指责马歇尔莫要长中国人和苏联人的志气，灭美国人的威风，美国号称世界第一强国，还斗不过贫穷不堪的苏联和中国？

杜鲁门这样牛气，不是毫无根据的。

美国凭借远在美洲的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几乎听不到枪炮声，不但没有遭受这场人类战争史上空前规模的大战的破坏，反而大发战争财，受到大批军事定货的刺激，美国经济呈现一片繁荣景象，使美国在战后初期，以其无与伦比的经济、军事实力，在全世界处于绝对优势地位。

杜鲁门凭借手中掌握的全世界大约 50% 的财富，根本不把苏联和中国放在眼里。

据杜鲁门掌握的情报，苏联在卫国战争中大伤元气，损失惨重：2000 万军民丧生，到处田园荒芜，一片废墟，乌克兰发生大规模饥荒，人们缺吃少穿，美国新闻报刊更加予以恶意宣传，添油加醋称竟有活人相食，饿殍遍野的惨状。

在杜鲁门眼里，一穷二白的中国更是贫穷无比，仅四亿五千万人的吃饭问题就绝难解决，离开美国的大批美元，中国人就无法生存下去，只有向他杜鲁门屈膝投降。

但在斯大林和毛泽东眼里，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国解放战争胜利的苏联和中国，却是充满无限生机，他们领导中苏人民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同美国展开错综复杂的斗争，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东西对阵，激烈争锋。

时光荏苒，后来形势巨变，中苏交恶，中美关系解冻，直至苏联解体，冷战结束，极世界变为多极世界，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历史的主流。

战后形势真可谓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纷坛变化，奥妙无穷。

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新中国处变不惊，如红日东升，以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卓尔不群，独立于世。新中国在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运筹帷幄、精心指挥与领导下，推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贯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推动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自由、和平进步的潮流滚滚向前。

这样，中国、美国、苏联三个大国，在二次大战后新的国际形势下，纵横捭阖，斗智斗勇，构成了一部惊心动魄的新三国演义。

中美苏三国演义

第一回

时光荏苒 热战方罢冷战渐兴

日居月 诸阵营划分美苏争雄

要讲美国、苏联间的错综复杂关系，就首先要从战后冷战讲起。

何谓冷战？它是从何时何地诞生的呢？

冷战一词最早出现在 1946 年初，美国资产阶级政论家赫伯特·斯沃普为美国参议员伯纳德·巴鲁克起草了一篇演说稿，称“美国正处在冷战方酣之中”，首先使用了冷战一词。后来，斯大林、丘吉尔、杜鲁门、李普曼等人反复使用，冷战一词开始广泛流行，普遍使用。

顾名思义，冷战是与热战即真刀实枪的战争相对而言的，指帝国主义者把他们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除了直接武装进攻以外的一切敌对活动，总称为冷战。

最早向杜鲁门政府提出冷战政策建议的人，是美国驻苏联大使馆参赞乔治·凯南。此人出身于贫寒之家，靠个人刻苦学习进入美国外交界。他长期不得志，为讨好美国当局，曾对苏联政局写过许多捕风捉影的报告，例如仅仅根据斯大林一个多月未在莫斯科公开露面，便武断地作出斯大林的权威受到巨大挑战甚至有可能被赶下台的结论。

美国国务卿贝恩纳斯尖锐地批评凯南一派胡言，这使凯南遭到沉重打击，他终日郁闷不乐，加上又得了流行性感冒，鼻塞不通，牙齿疼痛，精神萎靡不振，唉声叹气地在莫斯科莫克瓦雅大街美驻苏大使馆的床上辗转反侧，不几天，人就瘦了几圈。他灰心丧气地埋怨说：

“在漫长的 18 个月里，我除了扯着人们的袖子，试图使华盛顿理解外，没做任何事情。我觉得对华盛顿官方提建议来说，实际上就像对石头说话。”

凯南在百无聊赖中随手打开收音机，斯大林 1946 年 2 月 9 日的讲话马上引起了他的密切注意，使他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斯大林以他特有的权威语气，肯定地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没有过时，因为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不平衡，会造成极大的混乱，这将使资本主义世界分裂成两个敌对阵营，甚至彼此发生矛盾打起仗来。只要资本主义还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苏联人民不能忘记 30 年代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教训，对此要有所准备，必须发展基础工业，削减消费品的生产，苏联必须准备在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做出牺牲。

斯大林以毋庸置疑的语气宣称，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不会有和平，无论苏联国内的和平，还是国外的和平，都不会有的！

凯南认为斯大林的这个讲话至关重要，集中地反映了苏联的对美政策，就从床上一骨碌爬了起来，抓起笔刷刷地写下他对苏联的看法：

总之，我们面对着这样一支政治力量，它狂热地为之献身的信仰认为：同美国不可能达成一项长远的妥协安排；若要使苏维埃国家获得安全，就应该，也必须扰乱美国社会的和谐，摧毁美国的传统生活方式，破坏美国的国际权威。这支政治力量拥有无上的权力，可以支配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之一的全部人力，支配世界上最

富有的国土的全部资源。

凯南写到这里，身体虚弱到了极点，只得躺到床上休息一会儿，又起身取出一瓶法国白兰地，咕嘟咕嘟大口喝了半瓶，借着酒力又奋笔直书：

与它同生俱来的是寸良深蒂固的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强劲思潮。除此之外，它还有一套精心设计的、覆盖面极广的机构在其他国家施加它的影响。这套机构有惊人的灵活性和多样性，由一些具有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地下工作的经验与技巧的人员管理着。最后，这支政治力量看来在做出基本反应时完全无视现实。它不是像美国一样，把人类社会的客观事实作为经常检验和改正世界观的标准，而是把它当作一个大口袋，可以从中武断地、任意地选择个别事物，抓来支持一个事先形成的观念。

乔治·凯南善于揣摩杜鲁门等人的心理，擅长投其所好，煞费苦心他说出美国统治集团日思夜想“默默不断增长的不安”和应采取的重要行动：

苏联的政权是不通情理的，但对武力的逻辑却是高度敏感的，好像一辆开足发条的玩具汽车，只有遇到无法对抗的力量才会停下来。美国必须以实力遏制苏联。

恰在这时，美国国务院指示美驻苏使馆上报对苏联的看法，凯南作为美驻苏大使馆临时代办，马上把秘书和两个武官叫来，在病床上像清教徒说教一般，把他写下的提纲划分为五个部分，口授了一份 8000 字的“长篇电报”，由他签字发往华盛顿。

凯南这个“长篇电报”得到美国国务院的高度重视，成为美国推行冷战政策的理论依据，凯南这个“长篇电报”便成了美国外交史上影响最大的电报。

凯南的“长篇电报”之所以引起轰动，是因为它反映出战后世界格局的最典型特点：美苏两国的国家实力因战争胜利而迅猛增强，国际地位已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从而确立了美苏在世界上的两极地位。

美国大发战争财，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超级大国，在经济方面，占有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的 2/3，外贸出口额的 1/3，黄金储备的 3/4，拥有全世界 84% 的民用飞机，占有全世界开采的煤和石油的 62%，冶炼的钢的 61%，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不无嫉妒他说：

“美国现在正处于拿破仑战争结束时英国的地位。拿破仑发动的战争结束时，英国掌握了全世界的财富的 30%，而如今，美国则掌握了全世界财富的大约 50%。”

在军事方面，美国拥有装备精良的 179 万大军，在各大洲的 50 多个国家驻有美国军队。

在政治方面，美国拥有自建国以来就有的天生优越感，以集西方文明之大成和国际警察自居，特别是“反共主义”逐步抬头，认为美国必须担负起对抗苏联、保卫西方的重任。

与美国相比，苏联虽在二次大战中损失惨重，但打败德意日法西斯的砥柱中流作用，使苏联成为横垮欧亚大陆的军事强国，拥有 287 万大军，苏军控制了东欧、朝鲜和中国东北等广大地区，又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拥有安理会的否决权，被称为欧亚大陆的头号政治、军事强国，更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领，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另一超级大国，事实上是战后世界格局中另外一极的中心。

正因为如此，凯南的“长篇电报”受到美国统治阶级的重视，杜鲁门等极其欣赏凯南的杰作，将其作为美国冷战政策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根据，凯南自己也从此飞黄腾达起来，他得意洋洋说：

“如果我以前在写报告方面所做的努力，并没有引起杜鲁门总统和国务

院的强烈反应，没有引出最轻微的丁当声，那么，使我感到惊奇的是，这份电报则震动了他们。我已出了名，现在我说的活有了份量。”

杜鲁门又命克利福德根据乔治·凯南的“长篇电报”，为他准备一个美国对苏联实行强硬政策的讲话稿。

克利福德是来自弗吉尼亚州的苏格兰人后裔，在凯南报考美国外交官时，他曾帮助凯南顺利过关，当时两人失意潦倒，结成患难之交。

克利福德酒量极大，接受杜鲁门指示后买来几大瓶酒，和助手乔治·埃尔西边喝酒，边根据凯南的反苏理论撰写文章，终于把一份沉甸甸的美苏关系报告送进白宫。

杜鲁门对这份 100 页的长篇报告看得津津有味，尤其对下面这段话拍案叫绝：

“我们应当准备和英国及其他西方国家一起建立我们自己的世界，并把苏联的势力范围看作一个独特的实体，虽然并非注定要发生冲突，但我们同这个实体之间没有共同目标。”

杜鲁门大声读道：“军事力量的语言是强权政治的信徒们懂得的唯一语言，美国必须准备发动原子战争和生物战争，并创立一种全球主义，旨在支持和帮助在任何情况下受到苏联威胁或危害的所有民主国家。”

杜鲁门看完克利福德的长篇报告，东方已将破晓，他越想越觉得这个全球性反共政策文件非比寻常，其核心是美国以强大军事力量抑制苏联，在全世界范围内全面支持各国的反苏斗争，一旦泄露出去将使美国处境困难，他顾阵阵倦意袭上心头，拿起电话问他的亲信：

“克利福德，这报告的副本有几份？”

“10 份。”

“我要余下的 9 份，立即拿到我这儿来！”

克利福德不敢怠慢，立刻把 9 份文件送进白宫，杜鲁门视为无价之宝，仔细锁进保险柜，以审慎的口吻解释说，必须把它们锁起来，严加保密，否则，任何与俄国人的争斗都可能以失败告终，他摸着尖下巴强调说：

“如果这个文件泄露出去，会掀掉白宫的屋顶，也掀掉克里姆林宫的屋顶！”

杜鲁门把凯南、克利福德的反苏报告仔细收起，反复研究，准备据此提出他称霸世界的“杜鲁门主义”。

杜鲁门狡诈异常，他一时还不敢贸然发表公开反苏的“杜鲁门主义”，便想请一个大名鼎鼎而又有平民身份的人放出试探气球，根据各国的反应，再选择适当时机抛出他的“杜鲁门主义”。于是，他选定了丘吉尔。

丘吉尔在二次大战中担任英国首相，与斯大林、罗斯福一起被称为反法西斯三巨魁，他大战胜德意日法西斯立下赫赫大功，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威望。

丘吉尔在英国大选中大意失荆州，失去了英国首相的宝座，此时正以平民身份在美国游历。杜鲁门把丘吉尔请进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将发表冷战讲话的意图一说，丘吉尔早就以反苏反共为己任，已早有此意，并确定了演说的总方针，又见杜鲁门如此厚待他这个平民布衣之士，就满口答应，愿发表震惊世界的演说。

杜鲁门大喜，亲自陪同丘吉尔乘火车前往他的故乡密苏里州富尔顿。一路之上，两人谈笑风生，玩牌取乐，好不快活。

两人来到密苏里州的富尔顿城，杜鲁门陪丘吉尔住进富尔顿最豪华的饭店，盛情招待。

杜鲁门深知丘吉尔一生离不开醇酒和美女及雪茄，便把美女找来由他挑选，但却找不到一杯美酒，颇使举世闻名的“酒仙”感到不快。

你道这却为何？原来，富尔顿是个禁酒城市，当然无酒可买，

杜鲁门急忙下令用美国空军飞机从附近城市空运来美酒，命美女将酒杯递到丘吉尔手中，这才使丘吉尔恢复了生龙活虎的常态。

为照顾好丘吉尔，杜鲁门特意把丘吉尔的孙子请进白宫，询问他祖父还有什么嗜好，丘吉尔的孙子向杜鲁门透露了这样的秘密：

“我爷爷有抽雪茄的癖好，据说是触景生情形成的，据称是爷爷在瞥见古巴女人撩起裙子，在大腿内侧卷烟叶制造雪前的情况后，才开始抽雪茄的。”

于是，杜鲁门投其所好，特意派人从世界各地购买最好的雪茄，供丘吉尔享用。

1946年3月5日，杜鲁门亲自陪同丘吉尔来到威斯敏斯特学院演讲厅。诺大的演讲厅里人头攒动，座无虚席，杜鲁门眉开眼笑吹捧丘吉尔说：

“丘吉尔先生是当今世界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今天光临威斯敏斯特学院，打算谈谈和平的要害问题，有些建设性的话要向全世界讲。”

杜鲁门说着，首先抡起两个大巴掌鼓起拿来，在他带动下，演讲厅里立即响起海涛般的掌声。

丘吉尔见堂堂美国总统杜鲁门竟然这样热情对待他这个“普通”的英国人，便满面笑容摘下礼帽，眉飞色舞，开怀畅谈。他有滋有味地抽着美制雪茄，一双大眼睛望杜鲁门一眼，投杜鲁门所好，充分运用他渊博的知识、出众的记忆力和超人的感染力，发表题为《和平砥柱》的富尔顿演说称：

“从波罗的海海岸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一重铁幕降下，横断欧洲大陆。铁幕后是中欧和东欧古老国家的首都——华沙、柏林、布拉格、地拉那、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索非亚，它们及其周围的人口全都落入苏联势力范围之内……从属于莫斯科的控制。”

丘吉尔望一眼随侍身边的漂亮而聪颖的女秘书，越说越有劲儿，希望握有原子弹秘密的美国与英国组成“英语民族的友好联盟”，共同对付苏联，又找杜鲁门最感兴趣的问题发表“至理名言”说：

“最令他们（苏联）赞赏的莫过于力量，最令他们鄙视的莫过于军事软弱。”

丘吉尔诬称苏联是世界各国人民安全和自由的主要威胁，因此各国应当团结起来，在英美的领导下，用武力去消除苏联的威胁。

丘吉尔露骨地提出建立美英世界霸权的思想，他以在二战中建立的功勋为资本，以极富煽动性的言辞大肆鼓吹说：

“如果英语民族联邦和美国合在一起，并在海洋、天空、科学和工业领域中进行世界范围的合作，则在力量对比关系上将存在不可动摇的优势。”

杜鲁门知道丘吉尔的“铁幕”一词，乃系拾纳粹战犯戈培尔的牙慧，他为反苏反共，不避嫌疑，大胆搬用，将其演说名之曰《和平砥柱》，在美国的报刊电台大肆宣传，立即在全世界产生强烈反响，人们都将丘吉尔的富尔顿演说视为实际上的“冷战宣言书”。

丘吉尔的富尔顿演说引起苏联人民的强烈愤怒，斯大林义愤填膺地指

出：

“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丘吉尔及其美国朋友竟迷恋上希特勒的种族主义。丘吉尔先生实质上是站在战争贩子的立场上掀起反苏恶浪，但是丘吉尔先生不是孤立的。他不仅在英国，而且在美国都有他自己的朋友。”

斯大林深挖丘吉尔挑起冷战的根源，指出丘吉尔是希特勒的不肖学生：

“希特勒就是从宣扬种族理论开始挑起战争的，他断言只有德语民族才是最优秀的人种。丘吉尔先生也是从种族理论开始来挑动战争的，企图证明只有英语民族才是最优秀的民族，才能负责主宰全世界的命运……事实上，丘吉尔先生及其英美朋友们是向非英语民族提出了一个最后通牒：乖乖地承认我们的霸权，则一切都好，否则就是战争……显然，丘吉尔的方针就是战争的方针，就是号召发动反苏战争。”

1947年4月5日，斯大林召见美驻苏大使史密斯将军，指责美国和英国结成反苏同盟，警告美国不要轻举妄动。

杜鲁门感到正面与苏联分庭抗礼的时机尚不成熟，忙把头缩了回去，向苏联摇起橄榄枝，邀请斯大林访美，商谈改善美苏关系大计；斯大林冷笑声，托词身体欠安予以回绝。

杜鲁门耐心地精心选择提出“杜鲁门主义”的时机，终于等来了英国驻美国外交官登门求助的最佳时机。

原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多数国家经济面临破产的边缘，许多城市在大火中化为灰烬，成群的瘦弱儿童流浪街头，瘟疫流行，人们怨声载道。当时丘吉尔以形象的语言描述欧洲现状道：“欧洲现在成了一座瓦砾堆，一个藏尸所，一个滋生瘟疫和仇恨的温床。”

1947年2月21日，英国驻美国大使英弗查佩尔勋爵派他的私人秘书，紧急会见美国副国务卿艾奇逊，急切地要求安排英国大使紧急会见国务卿马歇尔，递交一份“蓝皮书”。

艾奇逊知道这是英国政府发来的正式重要函件的代称，马上以代国务卿身份会见英弗查佩尔，告诉他国务卿马歇尔已赴普林斯顿大学参加该校200周年校庆活动，他现在代理国务卿，请英国大使向他送交“蓝皮书”的正式文件和副本。

英国驻美大使向艾奇逊提出请美国代替英国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要求说，希腊和土耳其经济形势极端恶化，游击队活动加剧，经济崩溃已迫在眉睫，“苏联正准备予以接管”；英国经济也极端困难，英国对希腊和土耳其的援助将在六个星期后结束，英国已无能力提供大量援助，英国政府衷心希望美国能挑起它在希腊和土耳其的担子。

杜鲁门认为这是美国推行“杜鲁门主义”的天赐良机，他指示以最快速度办理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国内手续，他命艾奇逊说服美国国会领袖说：

“在过去的18个月中，苏联对伊朗以及希腊北部施加巨大压力，使三大洲都将遭到苏联的渗透，就像一个坏苹果使整桶苹果烂掉一样，希腊的变质会感染伊朗及其以东的所有国家。它还会通过小亚细亚和埃及把传染病带给非洲；通过早已受到共产党威胁的意大利和法国带到欧洲。苏联正在以最小的代价进行着历史上最大的赌博，它不需要盘盘皆赢，甚至赢一两次就可获得巨大的收益。只有美国才有能力去粉碎这个把戏。这就是英国撤离地中海给美国造成的有利机会。”

对副国务卿艾奇逊的说明，参议员阿瑟·范登堡等人不太理解，找出种

种借口予以阻挠，杜鲁门便让艾奇逊会见范登堡等议员，讲明这是美国称霸欧洲和世界的重要部署，范登堡也顺水推舟，向杜鲁门提出“范登堡修正案”。

“总统先生，如果你能向国会和美国人民讲一讲这件事，我就支持你，而且我相信大多数议员也都会这样做。”

美国议员大都赞成范登堡的意见，杜鲁门使艾奇逊等人紧张地准备了一个星期，按他的指示搞出了个总统咨文，然后在1947年3月12日把全体内阁成员和议员集合到美国众议院会议厅，听他发表干涉全球事物的总统咨文，对社会主义国家肆意攻击：

在当前世界历史关头，几乎每一个国家都面临着两种生活方式的抉择……一种生活方式建立在多数人的意

志的基础上，其特点是自由体制、代议制政府、自由选举、保证个人自由、言论和宗教自由以及不受政治压迫的自由。第二种生活方式以少数人把意志强加于多数人为基础，依靠恐怖和压迫、受控制的新闻和广播、指定的选举和取消个人自由。

杜鲁门宣布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4亿美元的经济援助，这就是美国实行全球干涉的“杜鲁门主义”的开始。

杜鲁门为与苏联争霸世界，为说服国会调拨巨款，发明了一个“间接侵略”的概念，硬说任何国家内部局势的发展，都可能与美国的“安全”有关，只要美国认为谁危害美国的利益，不论此事有无苏联插手，都与苏联“威胁”有关，都与“两种生活方式的选择”密不可分，美国都要以反对“间接侵略”为名进行干涉。

杜鲁门以不可一世的世界霸主姿态，讲述对抗苏联的“杜鲁门主义”的核心内容说：

我认为，美国的政策必须支持那些人民，他们正在抵抗武装起来的少数人，或是外来压力企图加于他们的奴役。

我认为，我们必须援助自由人民，以自己的方式来规划自己的命运。

我认为，我们提供的帮助首先应该是经济和财政援助，这是达到经济稳定和有序的政治进程所必须的。

“为把美国全国人吓得要死”，杜鲁门故做惊人之语，大肆玩弄蛊惑人心的手腕：

“我们走上的是一条严重的道路。如果不是因为不这样做后果将更为严重的话，我是不会建议这样做的……全世界自由的人民指望着我们支持他们，维护他们的自由。如果我们领导不力，我们就可能危及世界和平——而肯定会危及我们自己国家的利益。”

最后，杜鲁门煞有介事公然宣布：“这就是美国对共产主义暴君扩张浪潮的回答！”

美国参众两院议员见杜鲁门吸收了凯南“长篇电报”和丘吉尔富尔顿演说的精华，把美苏之争归结为两种制度、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生活方式之争，并且作为美国的国际战略提出，使已经开始的“冷战”更理论化、纲领化了，又讲得那么道貌岸然，冠冕堂皇，便纷纷起立鼓掌，为杜鲁门欢呼，表示全力支持。

“杜鲁门主义”触发了美国全国性的外交政策的激烈辩论。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司主任凯南化名为×先生，在美国《外交季刊》夏季号，发表了题为《苏联行为的根源》，对“杜鲁门主义”从理论上予以发挥，更强调了“杜

鲁门主义”的重要性，不少人把“杜鲁门主义”称为“世界范围的门罗主义”，标志着美国外交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促使杜鲁门主持制定了白宫 NSC68 号系列文件，描绘出美国冷战时期整个全球战略的蓝图，狂妄地公然宣称：

“本纲要的成功全赖美国政府和人民以及全体自由国家的人民认识到，冷战实际上是一场关系到自由世界存亡的真正的战争。”

1947 年，美国资产阶级评论家李普曼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名叫《冷战》，一时成为畅销书，冷战一词更广泛流传。

至此，美苏之间持续几十年的冷战时期开始了。

第二回

财大气粗 推行复兴计划妄图称霸欧洲

剑拔弩张 炫耀军事实力爆发柏林危机

话说美国总统杜鲁门为推行美国称霸全球的世界战略，为落实渗透着他的野心与追求的“杜鲁门主义”，立即行动起来。

所谓“杜鲁门主义”，是指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总统在国会发表的一篇重要演说，诡称美国将对受共产党威胁的希腊政府和在苏联压力下的土耳其政府提供各种援助。

其后不久，又以政治、经济、军事方式，在欧洲积极推行马歇尔计划，以图控制欧洲，整垮苏联，称霸全世界。

二次大战后，美国和苏联的战略重点都在欧洲，随着冷战之风逐渐强劲，美苏在欧洲的争夺逐步升级。

杜鲁门登上美国总统宝座后，发现英国、法国急剧衰落，发了战争财的美国跃居世界第一强国。他认为美国不再需要苏联红军来帮它打败德日帝国主义，而苏联则需要得到美国的援助来进行战后重建，加之他对苏联向无好感，上任的第一天便告诉国务卿贝恩纳斯：

“对俄国人的态度不可太软，要顶住！”

杜鲁门认为罗斯福为美国制定的通过大国合作主宰世界的对外战略已经过时，便把接待应美国邀请来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的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当作转入冷战的第一个重要契机。

杜鲁门身穿双排纽扣的西装，打着白圆点领结，一开口就出言不逊：“阁下，我很遗憾地得悉雅尔塔协定没有执行！”

莫洛托夫对这样的开场白惊诧不已，应付道：“我也很遗憾！”

杜鲁门一摸尖下巴，毫不客气地提出要求说：“为了解决问题，应使波兰所有的民主分子联合组成民族团结政府！”

杜鲁门为何强硬地提出波兰问题？原来在1945年2月举行的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对欧洲战略要地波兰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对罗斯福说：

“在过去30年中，德国两次取道东欧走廊侵略俄国，因此俄国的利益在于有一个坚强有力的波兰，能用它自己的力量关闭这个走廊的大门。”

罗斯福明白斯大林要把波兰置于苏联的控制之下，感到俄国人既“专横又贪婪”，决定对苏联采取强硬态度，但未来得及行动就患脑溢血逝世。

莫洛托夫对杜鲁门的蛮横态度感到不快，再次表示异议，用外交语言打圆场说：“苏联人愿意合作，惟这件事有关苏联的声誉，我们深信一切困难都能克服。”

杜鲁门盛气凌人回答说：“本总统同意这一点，否则就不会进行这次谈话了，争论的问题在于苏联是否愿意执行雅尔塔协定，现在要做的就是斯大林元帅应守信用，执行这个协定！”

莫洛托夫见杜鲁门像一个固执的农场主那样寸步不让，感到事情难办。他为打破僵局，把话题转到对日战争上来，杜鲁门却粗暴地打断他的话，下逐客令道：

“就这样吧，莫洛托夫先生。如你能把我的看法转告斯大林元帅，我将不胜感谢。”

此时，莫洛托夫满面怒容抗议说：“我这一辈子还没有人这么对我说话。”

杜鲁门厉声回答说：“执行协议吧，执行了协议，就不会有人这样对你

说话了。”

杜鲁门与莫洛托夫不欢而散。美苏又在 1945 年 4 月的联合国成立大会上发生公开冲突：莫洛托夫为防止美英等国联合起来对付苏联，正式提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拥有否决权，也就是实行“大国一致原则”，只要一国不同意，安理会便不能采取行动。美国想打着联合国的旗号称霸世界，坚决反对苏联的意见。双方为此争论激烈，几乎使会议中断。

后来，美、英、法三国觉得也可以用否决权维护自己的利益，才同意否决权制度。苏联又把否决权扩大到议事日程上，也就是安理会讨论任何议案都要五大国全部同意，又掀起轩然大波，美、英坚决反对，联合国再次陷入僵局。斯大林接到莫洛托夫的报告，轻松地一笑说这是小事一桩，联合国会议才得以顺利进行。美苏又在安理会主席，波兰和阿根廷参加联合国等问题上几乎闹翻，从而将二战盟友友谊的破裂昭告天下。

要实现“杜鲁门主义”，就首先要控制战略重点所在地欧洲。当时的欧洲陷于战后的混乱和饥寒交迫之中，西欧国家为免于经济崩溃和在苏联影响下发生革命，纷纷向世界头号强国求援，杜鲁门便召集幕僚专门商讨控制欧洲问题。

已升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办公室主任的乔治·凯南又活跃起来，他向杜鲁门献策道：

“西欧对美国至关重要，须以经济援助复兴其工农商业，以避免发生革命，进而有效地遏制苏联，并使欧洲政治和经济符合美国需要。”

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对此极为欣赏，1947 年 6 月 5 日到哈佛大学接受名誉学位时，发表与苏联进行对抗的演说，表示要援助欧洲国家“反对饥饿、贫困、绝望和混乱”，要给欧洲降下“黄金雨”。

马歇尔根据他与杜鲁门的暗中策划，以救世主姿态表示对欧洲国家遇到的困难不能视而不见，他以悲天悯人之态说：

“西欧国家贫困下去，对美国经济的消极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美国必须尽其所能协助恢复正常的世界经济的运行，否则，就不会有政治的稳定和有保证的和平。我们的政策将不针对任何国家或任何意识形态，而仅针对贫穷、饥饿、苦难和混乱。我认为，这种援助不应当是危机来了再给予援助的零星措施。今后美国的援助应从根本上治愈疾病，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马歇尔故意弄得含混不清的讲话，几乎引起所有欧洲国家的强烈兴趣。西欧国家认为这是雪中送炭，可解燃眉之急，连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也看中了美国人手中的大量美元，都想借助美元，加速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步伐，认为那岂不是好事一桩？

英国外交大臣贝文见苏联和东欧国家也要分食“马歇尔计划的盘中餐”，心中不悦，便跑到华盛顿去见马歇尔，反对美国向苏联提供大批贷款。

马歇尔手捻白须哈哈大笑，告诉贝文不要杞人忧天，他对此早有万全之策，他对贝文如此这般秘授妙计，贝文这才欢天喜地而去。

1947 年 6 月 27 日，莫洛托夫、贝文、皮杜尔在巴黎举行三国外长会议，讨论如何接受马歇尔的援助计划。

莫洛托夫认为美国人的计划含混不清，在三国外长会议上向英法外长询问：在马歇尔朦胧模糊的建议后面，实际上隐藏的的是些什么东西？美国给欧洲国家的经济援助的性质和条件是什么？援助的规模能有多大？

贝文连连摇头：“我只知道马歇尔讲话中的内容，详情我也不太了解。”皮杜尔也是一问三不知，推说不知详情。

莫洛托夫见贝文和皮杜尔不肯透露有关马歇尔计划的任何内情，只得另想办法。

莫洛托夫私下拜会贝文，大讲两人的友好关系，贝文才透露说，马歇尔计划并未明确规定哪些国家是受援国，哪些国家是出资国，大概根据“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则行事。那么，苏联也要分担复兴全欧洲的责任，否则就要有交换条件，以物质利益换取苏联放弃“政治扩张”。

这一下给莫洛托夫兜头泼来一盆凉水，他的心顿时凉了半截。

贝文又告诉莫洛托夫，英、法两国同意美国人提出的苛刻条件，实行统一的经济复兴计划，受援国要按美国的要求进行经济分工，定期公布本国的经济情报。

莫洛托夫愕然变色说：“这分明是干涉苏联内政嘛，我们决不同意！实行这一计划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美国贷款将不会服务于欧洲经济复兴事业，而将服务于一些欧洲国家为了渴望称霸的大国的利益，用来反对另外一些欧洲国家的活动。”

莫洛托夫打长途电话请示斯大林，请速做指示。

斯大林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要求受援国把大部分美援用于购买美国的出口货物，恰巧与他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相吻合，这正好说明美国正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不得不通过马歇尔计划，向欧洲国家倾销商品以转嫁危机，奴役欧洲，苏联当然不应该助美国一臂之力。苏联更反对把德国包括在欧洲复兴计划之中。

这样，英法苏三国外长会议一开始就剑拔弩张，观点对立，莫洛托夫把马歇尔计划斥之为“杜鲁门主义”加美元，妄图独霸欧洲市场以挽救美国，使之渡过可怕的经济危机。

贝文根据马歇尔秘授之计谋，故意拱莫洛托夫的火，讲明苏联必须放弃“政治扩张”，执行经美国批准的欧洲统一复兴计划。莫洛托夫不断同莫斯科通电话，根据斯大林的指示，拍案而起厉声发出警告：

“马歇尔计划会破坏欧洲各国的国家主权，使法西斯德国死灰复燃，企图让美国控制欧洲。尤其不祥的是使欧洲分裂成两个相互对立的集团，在欧洲国家间制造新的困难。”

莫洛托夫带领 89 位外交官和经济专家，愤怒地拂袖退出英美苏巴黎外长会议，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也宣布不再参加讨论马歇尔计划的会议。

莫洛托夫后来回击美国和西方国家对此事的恶意攻击，阐明苏联退出马歇尔计划的原因说：

“西方有人说，苏联外交上的一大错误，是没有接受马歇尔计划，但我们的做法恰恰是对的，这是我们的唯一出路。当初，我同意，而且向中央提出建议，应当参加；不仅苏联参加，捷克、波兰也应参加，但很快就看出这不对头，他们拉我们参加入伙，但要我们做他们的附庸，我们照此办理，就可能仰人鼻息而最终一无所得，而仰人鼻息是肯定的，尤其可能使捷克、波兰陷入困境。”

这件事使斯大林、莫洛托夫受到强烈刺激，使他们丢掉了对美国的幻想，认真地考虑动用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力量同美国和西方世界分庭抗礼。

从巴黎返回莫斯科的第四天，莫洛托夫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宣布建立共

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该情报局由苏联、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及南斯拉夫、法国、意大利等9国共产党组成，10月5日在波兰正式成立，日丹诺夫在情报局第一次会议上，谴责马歇尔计划是“在经济上奴役欧洲各国的计划”。成立情报局既是斯大林控制东欧国家和西欧共产党的有效工具，又是对杜鲁门推行马歇尔计划的有力回答。

为与马歇尔计划相对抗，苏联宣布实行一个建设东欧的“莫洛托夫计划”，先后同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签订了双边贸易协定。

这样，欧洲在政治、经济、军事上进一步分裂：经济上出现两大对立集团——以美国为首的“欧洲经济共同体”，以苏联为首的“经济互助委员会”；在政治和军事上出现了相互对抗的两大对立组织——美国领导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苏联指挥的“华沙条约组织”，冷战格局正式固定下来。

其后，美苏两国为争夺世界霸权，凭借手中掌握的两大阵营的综合力量，争斗日趋尖锐，冷战逐步升级。

在欧洲，很快爆发了柏林危机，柏林上空战云密布，二战后世界首次处在战争边缘。

原来在雅尔塔会议上，决定苏、美、英、法四大国分别占领德国领土，首都柏林由四国共管。罗斯福企图推行与西方国家合作称霸世界的战略，斯大林也一针见血地道出战后必将与美国分手的看法：

“由于有共同敌人法西斯，保持我们三大国的团结尚不算难事，可战争胜利结束后，盟国之间必有利害冲突，那时能否保持友好亲善，不使联盟破裂，却难预料。”

杜鲁门为与苏联争霸欧洲，抢先迈出在德国问题上与苏联争斗的第一步，突然停止从美国占领德国的地区向苏联提供一切战争赔偿物资，又将美英占领区合并。1948年2至6月，美国纠集英、法、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举行伦敦会议，决定在西方占领的德国地区颁布法律，宣布进行币制改革，用新德国马克代替第三帝国马克，从经济上与苏联占领区割裂开来。

斯大林见此情况，命令苏联驻德国军队总司令索洛科夫斯基发表抗议声明，谴责美、英、法三国推行“捕鸟猎犬行动”，谴责美、英、法三国推行“肢解德国的政策”。斯大林下令在苏占区进行币制改革，把旧货币改为东马克，作为整个柏林的唯一流通货币，并建立了东柏林市政府。

对此，美国当局极为不满，要求取消东马克，苏联政府决定采取更强硬措施，1948年6月24日下令对柏林全面封锁，切断了柏林与西方占领德国区的铁路线，随后又切断了通往柏林的所有水路交通。

杜鲁门得到这个报告大吃一惊，当即召开会议研究对策。

陆军部长罗亚尔愁眉不展地报告说，西柏林与外界的联系只剩下三条“空中走廊”，而西柏林约有250万人，要保证这些人的吃饭穿衣都是极困难的问题，维持基本生活每天需要4000吨物资，使西柏林正常运转每天起码要有8000吨物资。这使西柏林陷入极大的困难和恐慌之中，驻西德的美、英、法官兵坐困围城，德国人更怨声载道，惶惶不可终日。

美国面临空前严重的压力，究竟如何对付苏联的挑战，美国政府内部发生激烈争论：有些人主张坚决顶住苏联的压力，更多的人担心与苏联发生正面冲突，招致令人恐惧的苏联红军的打击，而西柏林所需巨额物资的压力也非同小可，主张美国还是及早从西柏林撤出为妙。

杜鲁门沉不住气了，让美国陆军部长罗亚尔征求美国驻德军队总司令卢修斯·克莱将军的意见。

克莱将军的总司令部也吵作一团，克莱认为坚守柏林具有重大意义，必须设法顶住苏联人，他手下大将却连连摇摇头，认为美军不是苏军的对手，还是三十六计退为上，他们不同意克莱的意见，就闭目静坐，联合起来向克莱施加压力。

克莱将军接到杜鲁门和罗亚尔的询问电，认为不仅不能撤退驻西柏林的美军，而且军官家属也不能撤，认为撤退军官家属会引起军心大乱，人心浮动，后果不堪设想，便向华盛顿回电称：

“撤退美军家属会引起一种歇斯底里气氛，接着德国人就会涌向共产主义一边去寻求安全。”

杜鲁门急召克莱回国商讨对策。克莱带他的政治顾问罗伯特·墨菲赶回华盛顿，出席美国决策会议。杜鲁门主张与苏联对着干，但心里发虚，担心风险太大，忧心忡忡说：“我想实施武装护送运输，把物资强行运进西柏林，不知会发生什么危险？”

克莱根据他与罗伯特·墨菲的分析回答说：“我们应该通知苏联当局，我们将在某一特定日期开进一支武装护运队，配备有工程器材，以克服苏联代表似乎无法解决的技术困难。在我看来，这样一支护运队遇到武力干预，继而发展成为战争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艾奇逊主张采取空运方式，认为陆路运输的办法行不通。他说：“空运的选择是正确的，它明白无误地表明了美国坚持权利的毫不动摇的意向，同时给予俄国人在‘要么不加干涉，要么发动一场空中袭击’两者间进行选择的机会，而后者可能会给他们带来一种毁灭性的反应。”

墨菲坚持自己的意见，反对进行空运说：“采取空运的方式是放弃我们在柏林辛辛苦苦挣得的权利！”

“这种说法是愚蠢的”，艾奇逊拍案而起，“这不啻是说，听到一个武装匪盗的命令而举起手来，是放弃你辛苦挣来的权利！是投降！”

杜鲁门挥手制止文武大员的激烈争论，冲着克莱询问采取陆路运输到底有没有危险。克莱回答说：“苏联会设置障碍，接着就会用军队来阻止武装护送！”

马歇尔认为这无疑会引起战争，他忧心忡忡说：“要是我们手头没有什么牌好打出去，那我们就等于在玩火！”

众人觉得此事非同小可，一时都苦无良策，克莱突然两手用力一拍，献上一计：“我们可联合英、法两国，用大量飞机进行空运。天空是无法封锁的，除非俄国人决定发动战争，一般不会攻击美国的飞机！”

众人齐声叫好，杜鲁门拍案而起，挥手决定：“此计可行！”

空军参谋长范登堡连连摇头说：“如将美国大量飞机集中用于柏林空运，万一发生敌对行动，可能全部被毁，我们的损失就太大了！”

杜鲁门思考再三，认为空运比陆运风险小一点，决定实施大规模空运，又调兵遣将，既准备同苏联人打，又力争谈判解决。

杜鲁门一声令下，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空运开始了：数百架C—47、C—54型运输机，载着粮食、煤炭、布正和其他生活必需品，日夜不停地飞往柏林上空，来往不停，川流不息。

斯大林对美国采取大规模空运非常恼火，却又没有足以制服美国的良

策。 1948年9月的一天，斯大林终于想出给美国沉重打击的两条计谋：一是宣布要在美国空运航线上进行空军演习，二是放出德国共产党要在西柏林搞暴动的消息。

杜鲁门接到美国副国务卿洛维特的报告大吃一惊，认为美苏围绕柏林的局势空前严重，战争一触即发，急找文武大员商议计策。

美国官员认为苏军还没有摆出与美国大打的态势，就一面向欧洲增派可投掷原子弹的美国轰炸机，一面向苏联表示愿意谈判解决柏林危机；没有解决问题前，照旧向柏林实施大规模空运。

在紧急关头，杜勒斯命国际新闻社的欧洲总经理金斯伯里·史密斯向苏联外交部发去一封电报，请斯大林回答四个问题。

斯大林借此机会，向美国发出微妙的信号。

史密斯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苏联政府是否考虑同美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任何一方都无意向对方发动战争？斯大林顺水推舟回答：“苏联政府准备考虑发表这样一项声明。”

史密斯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苏联是否愿意同美国一起采取逐步裁军的措施来贯彻这一声明？斯大林简短地回答：“当然。”

史密斯提出的第三个问题是，斯大林是否愿意就发表声明问题同杜鲁门磋商？斯大林巧妙地答称：“我并不反对举行这样一次会见。”

史密斯提出的第四个问题是，如果在举行一次外长会议讨论整个德国问题之前，美、英、法同意不建立一个分立的西德国家，苏联愿意撤销对柏林的交通限制吗？斯大林提出条件说：“只要盟国接受苏联对这个问题所提出的条件，并撤销对苏占区交通的反限制，苏联愿意这样做。”

杜鲁门认为这个插曲是莫斯科发出的一个小心谨慎的信号：莫斯科愿意解除封锁，但是要有代价。便让国务卿艾奇逊于1949年2月2日举行新闻发布会，贬低斯大林的倡议，但向苏联发出信号：如果苏联想进行认真的谈判，就应当利用私下渠道。

2月25日，美苏驻联合国代表杰塞普和马立克在安理会见面了。杰塞普有意和马立克搭话，询问斯大林答史密斯问时没提德国币制改革，是否含有重要意义。

一个月后，马立克请杰塞普到他的办公室，寒暄之后神秘地告诉他的美国同事说：“斯大林不提币制改革并非出于偶然，币制问题是重要的，但是它可以在外长会议上讨论。”

杰塞普眼珠一转又提出新问题说：“这是否意味着要在解除封锁之后呢？”

马立克故做令人高深莫测之态说：“过去并没有人要我问这个问题。”

杰塞普见马立克网开一面，立即紧追不舍：“那么，你现在为什么不就去问一问呢？”

马立克笑而不答，向莫斯科做了汇报。不到一个星期后的3月21日，马立克接到斯大林的指示，约见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杰塞普告诉他：

“莫斯科的答复来了，说是如果能够确定外长会议的日期，封锁就可以在外长会议举行之前解除。”

杰塞普得到这个回答如获至宝，兴冲冲就要告辞而去，马立克却伸手相拦道：

“请留步，现在轮到我提问题了——你们会把西德政府的筹建工作，推

迟到外长会议以后进行吗？”

杰塞普根据美国总统和国务卿的指示回答说：“我们希望继续进行筹备工作，但是，既然筹备工作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筹备工作就不是顶重要的了。”

经过艰难的谈判，美、英、法与苏联终于在 1949 年 5 月 4 日达成协议，同时解除对对方的封锁，柏林危机遂告结束。

然而，冷战之风越刮越紧，美英法先在柏林的西方占领区成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苏联则在苏占区宣告建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国土地上从此出现了两个国家。

为打击苏联，争当世界霸主，美国对德国、日本由打击限制转为扶植拉拢，一方面与西方国家签定《北大西洋公约》，另方面悍然与日本签订片面和约，把日本拉入帝国主义阵营。到 50 年代初，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正式形成。

与此同时，苏联和东欧国家建立“欧洲九国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发表《关于国际形势的宣言》，明确指出世界已分裂为两大对立阵营；为警惕美国扶植的德国法西斯力量再起，苏联与东欧国家签订了一系列双边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经济上成立“经济互助委员会”；特别是新中国的诞生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使欧亚社会主义国家连成一片，出现了两大阵营对峙的新格局。到 1955 年成立“华沙条约组织”，社会主义阵营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结为一体，成为与帝国主义阵营对抗的强大阵营。

两大阵营的对抗一度演化成著名的朝鲜战争，朝鲜停战后，两大阵营的对抗仍贯穿于整个 50 年代，演化发展出许多惊心动魄的国际斗争，这正是：

热战方罢冷战兴，列国百姓难安宁。

阵营划分明界限，美苏相斗争为雄。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旁敲侧击 美利坚试探新中国

用心险恶 杜鲁门毒施挑拨计

话说毛泽东、周恩来对战后初期形势清醒地分析之后，新中国一成立就向全世界庄重地宣告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这就是“我国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之内”，要“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毛泽东以世界最强音宣称：

“新中国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对于驻在旧中国的各国使节，我们把他们当作普通侨民对待，不当作外交代表对待。”

杜鲁门看到国务卿艾奇逊送来的新中国外交公告暴跳如雷，大骂斯大林不止，认为斯大林是实际上的罪魁祸首，他杜鲁门必要报此奇耻大辱，把苏联和中国一起收拾，统统消灭，方解他的心头之恨。

艾奇逊和前任国务卿马歇尔看杜鲁门如此大动肝火，也急得抓耳挠腮。这两个颇有威望和外交手腕的国务卿，都被视为美国的骄子，但却都败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手下：马歇尔调出国共战争失利，丢失了中国大陆；艾奇逊冒险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但却被毛泽东几篇文章批得体无完肤，在全世界丢尽了脸面。因此，这两个鼎鼎有名的美国国务卿，在暴跳如雷的杜鲁门面前，都有一种难以名状的苦涩滋味在心头，一时在斯大林、毛泽东、周恩来面前，也束手无策。

艾奇逊、马歇尔毕竟是久经沙场的外交老将，他俩对苏联和中国知之较多，尤其对斯大林、毛泽东做过一番深入研究，认为从中苏两国的历史渊源，从毛泽东、斯大林的经历和作风分析，绝非铁板一块，便向杜鲁门建议在苏中苏间挑拨离间、兴风作浪。杜鲁门恍然大悟，便吩咐艾奇逊依计而行。

于是，艾奇逊组织一班智囊绞尽脑汁，起草了一份美国对亚洲政策的讲话稿。艾奇逊如获至宝，便发表讲话，先以世界金元帝国的雄厚实力对中国百般恐吓，然后又摆出中国人“老朋友”的姿态，甜言蜜语拉拢说：

“不论发生什么事情，中国人只能在亚洲以及亚洲以外，给他们自身和他们的朋友带来严重的困难，中国不是应该从苏联，而是应该从美国得到贷款援助，美国人是愿意通商的，但中国必须不抱敌意，要一如我们的祖先过去所为。”

毛泽东、周恩来看了艾奇逊这篇奇文，明白美国人意在挑拨中苏关系，而斯大林对中国能否坚定地同苏联一边倒心存疑虑，中国必须毫不含糊地表明立场，毛泽东便让周恩来义正辞严地驳斥艾奇逊的奇谈怪论说：

“对美国的所谓援助，中国有自身的经验，这就是几百万人的死亡，就是民族自由和权利的丧失。美国对新中国内外政策的恫吓早已过时了，亚洲人民自己的事情，应当由亚洲人民自己来处理。无论在什么时候，也不应当由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帝国主义者例如艾奇逊之流，来加以干涉。”

杜鲁门被驳得哑口无言，感到绝望了，但艾奇逊、马歇尔仍不死心，马歇尔搔着满头银发，劝杜鲁门不要过份悲观，从他在中国当特使调处国共矛盾期间与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触来看，毛泽东、周恩来是堂堂正正的有民族气节的中国人，不可能久居他人之下，事情完全有转机的可能。

于是，马歇尔便谈起，日本投降后，毛泽东、周恩来欲来华盛顿谈判中美关系问题，不巧写给美国驻华军队总司令魏德迈的信，阴差阳错落在美国

驻华大使赫尔利手中，此事便被反共专家赫尔利阻挠，其后美军陆战队在烟台、秦皇岛、青岛强行登陆挑衅，遭到八路军迎头痛击，美国军舰只好撤出中国大陆，从而失去了与中共拉关系的机会。现在中共已占领大半个中国，为对付苏联，美国也需要和中共政权再拉一拉关系，但机会瞬间即逝，很难再现，杜鲁门为此绞尽脑汁，一时无计可施。

不久，机会终于来到。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向国务院发来报告：1948年11月1日，中共占领了东三省的最后一个人中心城市沈阳，当日成立了沈阳市特别军事管制委员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领导人陈云任军管会主任，伍修权和陶铸为副主任，同时任命朱其文为沈阳市市长，美国驻沈阳总领事瓦尔德向美国当局请示处置方策。

杜鲁门询问国务院对此事的态度，代理国务卿艾奇逊说，中共政权对美国外交使团的态度现在还不明朗，应当把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当作在中共解放区保留美国领事馆的一种尝试。

杜鲁门认为美国国务院的意见有道理，认为应该摸清新中国的底，便让国务院给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回电，正式批准美国驻沈阳总领事瓦尔德为保护美国公民和美国的商业利益，设法以非正式和私人交往的形式，与中共地方当局建立起有效的工作关系，扩大美国对中共政权的影响，不便中共政权落入苏联人的控制之中。

瓦尔德接到司徒雷登转发的美国国务院的指示电感到很头痛，知道这是个极难干的差事，有很大风险，但又想到他被国务院选中，即将成为第一个与中共政权打交道的美国外交官，又感到十分荣耀，便高高兴兴做种种准备。

11月3日，瓦尔德接到沈阳市政府送来的朱其文就任市长的通知，瓦尔德觉得是个好兆头，急忙起草了一封热情洋溢的贺信，“期望并确信能与(朱)先生建立亲密关系”，瓦尔德让秘书恭恭敬敬抄好，派参赞助理罗卡格送往沈阳市政府。

第二天，瓦尔德就收到了沈阳市市长朱其文的复函，邀请他次日下午两点到市政府会晤。瓦尔德激动得彻夜难眠，反复构想与朱市长拉关系的方案。11月5日下午2点，瓦尔德准时赶到沈阳市政府，见英、法驻沈阳总领事和苏联驻沈阳商务代办早已到达，久候多时。

不一会儿，朱其文市长面带笑容向他们介绍沈阳新政府对外国机构的保护措施，宣布将派兵保护领事馆和重要外国人的住宅。瓦尔德对中国派兵保护领事馆视为变相监视，提出异议，朱市长对此毫不理睬。最后，朱市长请苏联驻沈阳商务代办留下另有要事相谈，瓦尔德为此深感失望，但使他心情好转的是朱其文三天后到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回访，还特意参观了美国新闻处设置的图书馆。

瓦尔德是个老资格外交官，他见年轻的朱其文中了他的圈套，更别有用心地向朱其文介绍美国工业和科技方面的书籍，诱劝朱其文利用美国先进技术重建东北，还诡称美国对中国完全没有领土野心，只希望能在商业和科技方面重新回到东北来。

朱其文不懂美国外交官诱敌深入的卑鄙伎俩，一厢情愿表态说：“美国人是受欢迎的，很愿意看到美国商人在平等的基础上恢复在东北的贸易活动。”

这使瓦尔德喜出望外，又得寸进尺提出能否与美国通信问题，年轻的朱市长当即回答：只要美国船只能够到达大连港，就可以把信寄到解放区。

沈阳军管会主任陈云得知朱其文轻率向美国驻沈阳总领事表态，就严厉批评道，“关于外交工作已经再三重申过了，务必小心谨慎，一问三不知，你怎么随便说！美、英、法三国领事留在沈阳的目的，主要是试探我们与苏联的关系。你不想一想，你的答复不正是他们所需要的吗？”

沈阳军管会副主任陶铸进一步指出这样做的危害说：“太幼稚！美、英、法外交人员都是些职业帝国主义分子，对他们决不能像对待一般人的态度一样。一个负责干部，连这一点警惕性都没有吗？”

沈阳军管会正副主任陈云、伍修权、陶铸知道毛主席和党中央特别强调外交无小事，要多请示汇报，就马上将此情况汇报中央，诚恳地做了自我批评。

这时，杜鲁门在总统竞选中战胜杜威连选连任，虽对蒋介石支持杜威、拆他的台极感不快，但仍答应援助蒋介石，并允许宋美龄访美。毛泽东对此颇为不满，他看了周恩来送来的陈云等人的检讨电报，站在西柏坡一户农家的石磨旁，借题批评杜鲁门说：

“这个朱其文，完全丧失立场嘛！他们（美国人）不承认我们，为什么还要呆在我们的地盘上不走？”

周恩来屈时抱在胸前，讲出他考虑已久的对付美国等西方帝国主义外交官的切实可行的措施：“现在是战争时期，我们可以通过军事管制的办法，限制他们的活动，时间一长他们就呆不下去了。”

毛泽东对杜鲁门的蛮横无理态度愤愤不平，完全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将手中的电报一挥，迅速果断地做出决定：“不承认他们的领事地位，让他们在那里完全无事可做，最后自己走掉的好。你就来起草一个电报吧！”

周恩来全局在胸，文思泉涌，情文并茂的中共中央对东北局的指示电很快经毛泽东挥毫签发，从西柏坡发往沈阳，明确规定通过军事管制的方式，达到封锁和孤立美国外交官的目的，不给他们自由活动的余地。

陈云接到中央的指示电，立即与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东北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林彪交换意见，林彪对美、英、法使馆的电台最感兴趣，提出要立即收缴下来，切断西方使馆与其国内的电讯联系，使他们处于被动地位。陈云对此极为赞成，便命军管会参谋军官于11月15日上午10时，把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严厉通令送到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

瓦尔德一看要他在36小时内缴出电台，等于挖掉他的耳目，顿时帝国主义外交官的脾气大发，盛气凌人地写了一封措词强硬的信件，派人送往沈阳军管会，气势汹汹地施加压力称：“该项电台之存在及使用，系由中国国民政府承认与批准者……而敝总领事馆之存在则须依赖此项电台之继续使用，故希望贵会即予批准此项电台及使用为盼。”

三天后，沈阳军管会副主任伍修权会见瓦尔德。瓦尔德见是一位中等身材、颇有知识分子气息的中年军官，以为软弱可欺，就振振有辞声称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是美国外交领事馆，享有外交豁免权，有权使用电台，且经国民党政府批准使用，收缴电台违背国际公法等等。

伍修权是我军富有外交经验的高级将官之一，他既有中国将军的威严，又有知识分子的潇洒风度，他以充足的理由讲明美国不承认中共政权，一切都无从谈起后，斩钉截铁告诉美国外交官说：“在军事管制期间，恐怕没有转圜的余地。不论先生的电台有何重要作用，在军事管制期间，一律不得使用。当然，先生所有收发报机及其零件，本会将妥为保管，望先生能够遵行。”

瓦尔德听了，嘴角一撇，编造理由反驳说：“我们认为这样做有损于本总领事馆的存在。在目前情况下，没有电台，我们将无法与国务院和大使馆取得联系，这将使我们难以行使保护美国侨民利益的正常使命。”

伍修权从军事管制的特殊条件提出意见说：“继续使用你们的电台将是违抗军管会命令的行为，我相信先生能够了解它的严重性。至于先生与美国方面的联系，我想重要电报可用明码电报，转经军管会批准后发出。”

瓦尔德连碰几个钉子，心中不悦，把脸一拉，双手一摊，搬出堂堂世界头号强国政府的威严，施加威胁道：“请您了解，鬼台是美国政府财产，未经国务院准许，我们是无权交出的。既然电台停止使用，那么，是否可以由军管会派人就地查封，等我们向国务院通报之后，获得批准后再做处理？”

这就是说，中国政府的决定须经美国当局批准才能实施，伍修权当即拒绝说：“这是不可能的，所有电台必须交出！”

双方唇枪舌剑，激烈争论，没有结果。中共东北局领导人认为此事非同小可，便发电向中共中央请示处置办法。周恩来接电立即与毛泽东商量对策，毛泽东深知这是美国当局在试探中共政权对美国态度，便说：

“美国人不过是逼我们进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强取罢了，怕它什么？发个声明，我们和美国又没有外交关系，国民党给它什么权利关我们屁事！”

他站起身若有所思告诉周恩来：“声明态度严厉些，让他们知道，那里是解放区，不是国统区，他们不遵守我解放区政府和军管会的命令，我们有权禁止他们的出入自由，直到将他们驱逐出境！”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向东北局领导人发出明确指示：

旧美国领事馆根据从国民党政府所取得的一切权利，我们不能承认。我人民政府对现在沈阳之旧领事馆人员，只当外侨看待，保护其居住安全，如旧领事馆人员有任何不遵守我人民解放军军管会所宣布的法令的行为，军管会有权进行人身及室内检查，禁止旧领事馆人员行动自由，直到驱逐出境。因此，我军管会有权命令旧领事馆交出电台由我们保管封存，待将来双方建立外交关系或旧领事馆人员自沈阳回国时，当予发还。现旧领事馆人员既拒绝接受此命令，我军管会即应派公安机关人员进入美领事馆室内，自行接受，并由双方点数，签字封存。

沈阳军管会领导 11 月 19 日上午刚收到中共中央的指示电，正在研究落实措施，使有苏联驻沈阳商务代办登门拜访，陈云让伍修权出面接待。苏联商务代办刚一落座，就称赞沈阳军管会对美国人态度坚决，不仅要求尽快没收美、英、法三国驻沈阳总领事馆的电台，而且强调要设法赶他们走，并建议不仅要禁止他们自由出入，还可以切断他们的供电、电话，使他们失去呆下去的条件。

伍修权对苏联商务代办不用“希望”而用“要求”，感到不快，又对苏联人对此事如此热心和反应如此之快感到奇怪。

原来，抗日战争胜利后，随着冷战加剧，美苏在我国东北的争夺日趋加剧。杜鲁门见苏联借对日宣战之机已占领东北，就催促苏联尽早撤兵。美国帮助蒋介石向东北大举运兵，迅速在沈阳建立了美国总领事馆，作为美国势力重返东北的桥头堡。斯大林则把东北看成是苏联的势力范围，不允许美国再在长春、哈尔滨等地建立领事馆，因而对中国没收美、英、法三国总领事馆的电台大力予以支持。

在苏联大力支持下，沈阳市军管会 1948 年 11 月 20 日上午派大批解放

军乘两辆军用卡车，风驰电掣般开到沈阳市五纬路与三经路拐角外的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瓦尔德连忙从二楼厝跑下来询问这是干什么，一位英姿飒爽的军官当着他的面，宣读了军管会命令：

“因先生等蔑视会之，今后除经市政府准许外，特禁止旧领事馆全部人员与外界自由来往，并交出全部电台，这是你们故意违抗军管会的必然结果！”

瓦尔德在苏联和伊朗等国有20年外交官经历，与举世皆知难斗的苏联官员长期打交道，从来没有占过下风，没想到今天栽在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手里，他气得头皮上青筋暴起，两眼直冒火星，但长期的外交官生涯告诉他，此时已毫无作为，只得硬着头皮，乖乖交出无线电收发报机。

杜鲁门接到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关于瓦尔德被迫交出电台并请示去留方策的电报，气得大发雷霆，扬言要对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狠狠报复，但与中共政权没有外交关系，就干生气无处下口，国务卿艾奇逊请杜鲁门暂息雷霆之怒，召集外交智囊认真研究美国对中共政权的方策，杜鲁门摸着尖下巴考虑半天也无计可施，艾奇逊认为要在中国东北抗衡苏联，就要让瓦尔德在沈阳再坚持下去，特别要加强情报工作，获取中国和苏联对美政策的核心情报。

瓦尔德接到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派专人前来转达的美国最高当局的指示，立刻调动潜伏特务伯彦苍、吴人俊、佐佐木，加紧括动搜集情报。

美国总统杜鲁门想到他的指挥棒在全世界大都吃得开，唯独在中国不灵，他好生气恼，不由暗想，毛泽东在西柏坡的山沟里，此时此刻到底对中苏、中美关系作何设想呢？

这时，在河北平山西柏坡，毛泽东与周恩来等人也多次讨论已事实上形成的中美苏三国关系问题，他们主张要尽可能地和所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既然打算与美国在不久的将来建立外交关系，他们也就不想将美国人全赶出中国大陆，只是考虑到苏联的强烈要求，才在东北采取挤走美国人的方针，但这并不等于准备在关内其他地区也这样做。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一个讲话中明白宣告：

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

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

就在这时，毛泽东接到东北局破获伯彦苍、吴人俊、佐佐木三个美国潜伏特务的详细报告，缴获的收发报机与封存的美驻沈阳总领事馆的电台型号完全相同，毛泽东愤愤不平地拍案而起，对周恩来说：“看样子，美国的阴谋还不小呢！这些帝国主义，狗改不了吃屎！”

美国间谍事件给中共中央制定对外政策带来巨大冲击，毛泽东若有所思地告诉周恩来说：“不光是这些国家的外交人员，就是这些国家的记者也要小心。应该还要加上一条：我们不应允许资本主义国家的记者留在解放区发新闻。”

斯大林接到中国破获三起美国特务案件的报告，得意地露出了微笑，认为这是杜鲁门给中国人上的生动一课，指示苏联驻沈阳商务代办会见伍修

权，说明美国坚持留在东北是别有用心，不可等闲视之。

杜鲁门接到美国潜伏特务在沈阳被挖出的消息，把国务卿艾奇逊叫来训斥了一通，大骂美国在华外交官和特务是“该死的”，“混帐透顶”，把艾奇逊搞得狼狈不堪，只得向杜鲁门夫人请求援助。

艾奇逊为何求救于杜鲁门夫人呢？他听说有一次杜鲁门心血来潮，骂一名著名民主党人是“一堆臭马粪”，这位民主党人的夫人气呼呼跑进白宫，请求杜鲁门夫人帮助总统清洁他的语言，不能既像个密苏里州的村野粗人，又像个美国炮兵队里的丘八；不能不像著名政治家，而像个银行职员或者服装商店的小伙计！贝斯·杜鲁门含笑劝那个挨骂的民主党人的夫人说：“你不知道，他的腔调改了多少年才改成这个样子！”

从此，贝斯·杜鲁门常常坐在这位美国总统的身边，每当杜鲁门讲话走火吐露脏字，她就向他投去怒目而视的眼光。

杜鲁门对此并不反感，常常自豪他说：“她是唯一对我大声吆喝的人，我还没法怪罪她。”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由此对杜鲁门夫人格外尊重，有事常请她出面帮忙，两人关系越来越密切。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他便急忙借口有事，找地方拨通了杜鲁门总统夫人的电话，请她赶快出面灭火。贝斯夫人情知事态紧急，马上从楼上下来解决难题。

不一时，杜鲁门夫人身穿线条笔直的丝织长裙，戴着一串珍珠项链走了进来。她的脸上依然充满笑容，衣服从来得体而高雅，她那独特的神采，冷静的理智，真有一股不怒而威的镇慑力。杜鲁门自知失言，整理一下考究的西服，白宫的气氛马上便由暴风骤雨转为明媚的丽日春光。

杜鲁门和艾奇逊等人静下心来仔细研究新的对华政策，认为蒋介石已注定要垮台，中国出现中共政权只是早晚的事情，美国在继续支持蒋介石的同时，也可考虑以某种方式承认即将出现的新的联合政府，目的决不是支持共产党，而是通过恢复同新政权的贸易、进行某些投资，努力造成新的政府中的反对派，鼓励他们走第三条道路，以抗衡共产党，最终推翻中共政权。

杜鲁门、艾奇逊调动美国宣传机器，大肆鼓动所谓“民主开明人士”走第三条道路，毛泽东以敏锐的洞察力觉察到美国帝国主义玩弄的新阴谋，清醒地指出：

“（美国人）武装援助蒋介石打不败共产党，现在竟亲自出马，搞起这种孙悟空钻进牛魔王肚子里的卑鄙勾当来了，此种阴谋必须立即开始注意，不要使美帝阴谋在新政协及联合政府中得逞。”

却说杜鲁门在沈阳试探中共态度吃了闭门羹，又指示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设法与中共高层领导人接触，挑拨中共领导人与苏联的关系。

这是相当厉害的一着棋，因为司徒雷登在中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他的父母都是美国在中国的传教士，他生于杭州西子湖畔，1905年开始在中国传教，搞了不少慈善事业，1919年起任燕京大学校长、教务长，黄华等大批知识分子都是他的得意门生。在重庆谈判期间，他通过黄华、龚澎等人的引见，认识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在美国支持蒋介石打内战遭到惨败的情况下，美国当局任命他代替赫尔利任驻华大使，是有深远考虑的。

1949年3月10日，司徒雷登向美国国务院发电，要求留在南京同中共领导人接触，逐步建立中美新关系。国务卿艾奇逊与总统杜鲁门商量近一个月，仍举棋不定，美国统治集团为此进行了激烈争论。

51 个共和党众议员联名反对杜鲁门的对华政策，美国驻天津总领事的意见更为尖锐：

“我们目睹共产党军队占领了天津，这些军队的装备，几乎全部是从满洲国民党军队那里缴获的尚未使用过的美国武器。美国进一步援助这样一个政府的唯一后果，只会更加增强共产党的力量，这个（国民党）政府已证明是如此的颠沛无能，以致我们所给予的援助，大部分已转入共产党的手里。我们反对共产主义的世界性政策，不应该强使我们去支持一个已经失掉本国人民支持的、悲惨无能的和腐败的政府。”

杜鲁门所在的美国民主党也有几十名议员反对杜鲁门支援国民党政权，这使杜鲁门政府狼狈不堪，只得抛出反映美国援助蒋介石真相的白皮书来反击，杜鲁门让他的亲信编造的辩护理由说：美国在中国援助国民党反对共产党，是以反对苏联侵略为目的的；如果台湾落入中共手里，就等于苏联在太平洋取得一个军事基地，从而对美国的安全形成威胁。

对这个荒唐的借口，国务卿艾奇逊也感到可笑，他根据自己掌握的情报说：“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现实，毛泽东并不是真正的傀儡和应声虫，他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政权的，不是苏联军队扶植起来的代理人。”

美国统治集团基于对苏联政策的考虑，决定在中国采取两面政策，一面继续向国民党政府提供援助，公然在 1949 年 3 月 19 日出动 B—29 重型轰炸机，在葫芦岛附近炸毁宣布起义的国民党海军巡洋舰“重庆号”，直接帮助国民党打内战；一面于 4 月 6 日复电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授权他寻找机会同中共领导人会晤，但又特别指令他说话要留有余地，注意保密。

司徒雷登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的雄伟气势搞得垂头丧气，接到美国政府的这道指令，他又有了精气神儿，他认为自己有在中国生活 60 年的独特经历，有在抗日战争时期因反对日本侵略中国而坐过日本监狱的政治资本，有黄华等得意门生，与中共领导人有过不平凡的接触，因此，他一定能在中美关系上有所作为，在青史上留下他的美名。他自负他说：“我享有对全体中国人民都友好的美国的自由派人士的名声，我没有明显地偏向任何集团或思想流派，包括共产党在内，他们中的几位领导人我是相当熟悉的。”

杜鲁门、艾奇逊的这步棋可谓和毛泽东、周恩来的考虑不谋而合。中共领导人见司徒雷登没有随国民党政府迁往广东，也想借此探索建立中美新关系的可能性，便把这一任务交给了司徒雷登的学生黄华。

毛泽东认为同美方接触是个重要外交活动，有必要同斯大林打个招呼，就让周恩来与苏联驻北平总领事馆负责人科瓦廖夫通气。1949 年 4 月 15 日，周恩来在北平会见科瓦廖夫，客气地询问说：“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希望中共和美国商人建立纯业务的关系，我们值得去进行这样的接触吗？”

科瓦廖夫多年在中长铁路和苏联驻北平总领事馆工作，对中共领导人的工作作风已相当了解，经验告诉他，周恩来的话，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这实际上是毛泽东在非常微妙的中美苏三角关系问题上通过周恩来之口投石问路，科瓦廖夫从苏联在中国的情报系统得到的信息判断，司徒雷登很可能已和中共方面开始进行联系，他判断周恩来提出的问题是先斩后奏，面露不悦之色，但已接到斯大林关于不要过多干涉的指示，不好再横加干预，就微微一笑，大度他说：“这是你们的内政”，但又对此很不放心，便玩弄圆滑手段以提问方式表明苏方的担心说：

“你们中央领导怎样看待美国要挽救蒋介石、肢解中国的企图？如何处理与美国接触和准备给蒋介石最后的打击这两者的关系？在和蒋介石作战的情况下，会从美国商人那里得到什么？”

周恩来机敏过人，对科瓦廖夫的用心一清二楚，他极有风度地把两手一摊，将话题转移，王顾左右而言他。

科瓦廖夫认为此事非同小可，马上向莫斯科做了汇报，斯大林宽宏大量地赞同中国同西方国家进行某些交往，在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称：“中国的民主政府不应当拒绝与包括美国在内的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正式关系，如果这些国家正式放弃对蒋介石政府的军事、经济和政治上的支持。”

1949年4月24日南京解放后，中央正式指派黄华即赴南京就任南京军管会外事处长，着手接管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和处理南京外事问题。司徒雷登5月6日派他的私人秘书傅泾波会见黄华。两位老同学见面寒暄既毕，傅泾波便告诉黄华说，司徒雷登已逐渐了解到过去支持国民党是错误的，美国现已停止援助蒋介石，司徒雷登又获国务卿艾奇逊同意留在南京与中共进行外交接触，傅泾波特别补充说：

“司徒大使已表露1946年美国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美商约可以修改，这是司徒大使表示谦让的第一个台阶，希望给予足够的重视。”

黄华只表示，空言无补于实际，需要美国做些有益于中国人民的实事。黄华马上将与傅泾波的会谈结果上报中共中央，特别请示能否与司徒雷登见面。

毛泽东仔细审阅黄华的请示报告，然后于5月10日回电指示说：黄华可以与司徒雷登见面，以侦察美国政府的意向为目的，见面时多听司徒雷登讲话，少说自己的意见。

毛泽东还说黄华在对美大使表态中讲的一句话：“空言无补于实际，需要首先做些有益于中国人民的实事”，有毛病，应该表示：任何外国不得干涉中国内政，过去美国用帮助国民党打内战的方法干涉中国内政，此项政策必须停止。如果美国政府愿意考虑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的话，美国政府就应当停止一切援助国民党的行动，并断绝和国民党反动体系力量的联系，而不是笼统地要求美国做些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

1949年5月13日，黄华专程到司徒雷登官舍拜访，首先执弟子之礼向老师问安，司徒雷登看黄华、傅泾波两位学生都已成为出类拔萃的人材，感到是对他的莫大安慰。

寒暄既毕，司徒雷登以学者外交家的风度转入正题，表示美国愿意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特别强调美国已停止援助蒋介石，不再参与中国内战。为表示美国诚意，司徒雷登还建议在上海解放后，把美国存在上海原定援助蒋介石政府的粮食、棉花等物资移交中共，以支持中共恢复生产。

黄华暗想，解放上海后这些物资当然要转入人民之手，美国人不过送个顺水人情罢了，便又提出新的要求试探美国的态度：“大使先生，美国既已表示不干涉中国内政，就应将在青岛等地的美国舰只和陆战队撤走。”

对此，司徒雷登当即表示同意转告有关方面。他报告美国当局之后，杜鲁门即指示驻华美军总司令从青岛调走了美军舰只。

这时，司徒雷登与黄华接触的消息在南京广泛传播，成为各国驻南京外交官的热门话题，美国人还有意散布黄华带有周恩来亲笔信的消息，以提高美国人的身价。为防止美国外交官混淆视听，黄华主动召集留驻南京的各国

外交官员，严肃地宣布了中共与外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则，并讲明了对留驻南京的各国外交人员的具体政策，即只把他们作为外国侨民对待。

1949年6月6日，黄华再次会晤司徒雷登，讲明中美建立新关系有先决条件，那就是美国首先要中断和国民党政府的关系。

司徒雷登听了，半天不发一言。经过一番考虑后辩解说：美国驻华大使留在南京不去广州就说明了对国民党的态度。目前，国共两党各占中国一部分地区，按国际法行事，美国尚不能断绝同旧政府的关系。过去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今天更宜慎重从事，不能表明拥护或反对一方。等待产生了为中国人民所拥护的民主政府，而这个政府也证明它愿意并有力量担负其国际义务时，美国才能予以承认。希望本此精神探索双方建立新关系的线索。

黄华把司徒雷登的意见上报中共中央，周恩来认为这是司徒雷登委婉地提出了美国承认新中国的三个条件：占领中国全部领土、得到人民支持和担负国际义务。这表明杜鲁门政府要价甚高，暂且不去理它。

司徒雷登等了两天不见黄华传回反馈的信息，自然明白症结所在，就在6月8日派他的秘书傅泾波到南京军管会拜访黄华，小心翼翼他说明司徒雷登认为美国目前对与新中国的关系难以做出正式表示，他需要回国去做努力，他想了解中共最高层人士的意见，能否向周恩来转达这一要求？

黄华表示可以转达，傅泾波又进而说明，司徒雷登遵照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来电指示，回国述职前打算赴北平与周恩来会见一次，想获知中共领导人意见。

黄华对此要求感到意外，谨慎地表示美国如不断绝同国民党政权的关系，中共领导人恐怕不会同意司徒雷登去北平，再说交通尚未恢复。傅泾波见黄华婉拒司徒雷登前往北平，仍请黄华转达美方的请求。

黄华将此事急电北平，毛泽东、周恩来认为让司徒雷登以非官方人士身份来北平利大于弊，遂让燕京大学校长陆志伟写信邀请司徒雷登访问燕京大学，并说与中共领导人会晤一事也有可能。司徒雷登得到这一消息极为高兴，认为他的北平之行必将产生爆炸性新闻。正在准备北上之际，美国统治集团发生激烈争吵，艾奇逊等认为司徒雷登北上上是向中共“屈服朝圣”，并借瓦尔德事件大做文章，要司徒雷登发表支持中国的所谓“民主开明人士”以及挑拨中共与苏联关系的谈话。

毛泽东敏锐地抓住美国方面的态度变化，告诉周恩来迅速做出明确反应：“既然美国政府公开宣布了其在沈阳总领事馆人员被软禁的事情，司徒雷登之流又极力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我们不妨也让他们见见阳光。通知新华社拟一个消息，让人民知道美国人在我们这里想干什么。”

于是，新华社宣布在沈阳破获美国间谍案，其幕后指使人为美军联络团与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人员。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正式批准禁止美国新闻处在中国活动，批准对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的瓦尔德等人进行公开审判。同一天，《人民日报》还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论人民民主专政》，提出了对外“一边倒”的政策，宣称“中国人民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宣布现在只有拜苏联为先生，倒向苏联一边。艾奇逊则在7月1日发电指示司徒雷登，“不得在任何情况下访问北平”。

新中国成立后，瓦尔德看见中国人就生气，他设法解雇中国雇员顾玉衡，双方发生争执时，瓦尔德竟挥拳打人，又将顾玉衡踢下楼梯摔伤。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怒不可遏，命令将瓦尔德等5人拘捕，还特别做出批示：对于帝

国主义分子，“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又在11月1日进行公开审判。

杜鲁门觉得此事丢尽美国人的脸面，叫嚷要派飞机和武装部队突袭沈阳，劫回被捕的美国驻沈阳总领事瓦尔德，挽回美国的面子。好在美国军方领导人头脑比杜鲁门冷静，认为在中共大军控制下的沈阳搞此事比登天还难，不仅救不了瓦尔德等人，还会使美国落人更狼狈的处境，杜鲁门好不容易才咽下这口气。这正是：

三国初次摆战场，纵横捭阖试锋芒。

中苏联手斗美帝，奥妙无穷著华章。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第四回

光明磊落斯大林坦然道歉 未雨绸缪毛泽东首访苏联

随着中国解放战争胜利的捷报频传，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感到有许多心里话要向对方讲，二战后中苏联合起来抵抗美国侵略政策的大计需要协商，两人都想尽快见面畅谈。

杜鲁门则对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会见感到老大不安，知道这一会见必将导致中国和苏联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关系更为密切，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二对一的比例对美国极为不利，但他并不过分紧张。

杜鲁门深知斯大林、毛泽东都是个性极强的共产党领袖，几十年来，两人的关系错综复杂，互有介蒂，杜鲁门认为这两人谁都不甘心长期居于对方统领之下，说不定哪一天就会兄弟阋墙吵翻天。

多少年来，毛泽东多次受斯大林的气，吃斯大林的苦头，对斯大林有一股怒气在心头，总想找一个机会当面锣、对面鼓，痛痛快快地把憋在心里几十年的话来个竹筒倒豆子，一股脑全都倒出来，然后共同携手与杜鲁门斗，于是便想起了双方的复杂关系。

斯大林热情支持中国革命，但他未深入了解中国革命实际，有时候耳根子软，误听谗言，因此多次上国民党政府、蒋介石和王明的当，使毛泽东备受打击排挤，屡遭诬陷，雄才难展。

斯大林是在 1927 年中国大革命失败而遭受苏共党内反对派攻击时，知道中共有个毛泽东的。斯大林利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事例驳斥论敌，称赞毛泽东的文章观点明确，气势磅礴，生动感人，但后来他听信王明等人的意见，对毛泽东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创造性革命理论不理解，不支持，反而支持王明等人批判毛泽东，甚至给予纪律处分，使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

可是，在中共召开遵义会议的关键时刻，斯大林回顾中国革命历史，又审时度势，通过共产国际派王稼祥同志回国，召开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甩掉王明，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奠定了基础。

抗日战争中，斯大林向国民党提供大批武器和物资，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华，仅用马列主义援助中国共产党。抗战胜利、二战结束后，斯大林从美苏争霸和苏联的战略利益出发，把对中国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和国民党身上，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要把东北的行政权交给国民党。斯大林竟向美国保证，“战争结束后，中国应由蒋介石主席领导”。为此，他向中共施加压力，压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中共部队撤出沈阳，甚至威胁说：“如果不撤，就要用坦克赶你们走！”斯大林还压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为此专门发电延安称，中国不能再打内战，要再打内战，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

毛泽东看了斯大林的来电，生气地把电报往桌子上一摔说：“我就不信，人民为了翻身搞斗争，民族就会灭亡！”毛泽东以中国人的自豪感抒发堂堂正气说：“蒋先生总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我不信邪，偏要出两个太阳给他看看！”

话虽如此，毛泽东仍顾全大局，以非凡的气魄到重庆谈判，以必胜信心迎接蒋介石的猖狂挑衅，并将其打败。直到苏联担心美国势力会随着国民党军队重返东北，苏联才改变了积极协助国民

党接受东北的态度，对蒋介石派军队进入东北进行阻挠和拖延，不允许国民党海军开入大连、营口、葫芦岛，不准其空军向东北运输国民党军队，只准其经陆路进入东北，而默许中共军队迅速占领营口等地，为中国革命力量在东北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斯大林为控制中国东北的经济命脉，使东北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向国民党政府提出进行经济合作的要求。杜鲁门为与苏联争夺东北，推动蒋介石采取讨价还价拖延谈判的策略。斯大林针锋相对，一面从东北大量拆迁工厂设备，一面让中共占领苏军撤走的一些重要地区对美国 and 蒋介石集团进行报复，接着又迅速从东北全部撤军，给中共创造了占领东北一些大中城市及交通要道的极好时机，毛泽东当机立断，指导中国革命军队占领了四平、佳木斯、长春、齐齐哈尔、哈尔滨，加快了革命军队和根据地建设的步伐。

美国支持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苏联一度对中共失去张家口、淮阴、淮安非常着急，对美蒋散布的八路军在陕北受挫、贺龙和江青被捕的谣言信以为真，斯大林急忙打电报给中共中央，要派飞机专门接毛泽东等主要负责同志去苏联躲避一时。幸亏斯大林派来的医生阿洛夫赶快去电向斯大林说明事实真相，才使美国捏造的谣言得到澄清，但斯大林对中国革命前途的悲观看法依然如故，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唉声叹气说：“这场战争即使再打 10 年、15 年，也不会有结果的！”

为使斯大林及时了解中国解放战争的进展状况，1947 年 10 月上旬，毛泽东在陕北佳县神家堡写信给斯大林，指出中国解放战争有了很大转折，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以后也注意向苏联通报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终于扭转了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战争前途的悲观看法。1948 年 2 月，斯大林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可贵勇气对南斯拉夫领导人说：

“战后，我们请中国同志到莫斯科讨论中国的局势。我们直率地对他们讲，我们认为中国没有发展起义的前景，中国同志应当寻求同蒋介石暂时妥协，他们应当参加蒋介石政府，解散他们的军队。中国同志在莫斯科这里同意了这种看法，但回到中国以后，行动又是一样。他们控制并组织自己的军队，就像我们看到的；他们在打蒋介石的军队。根据中国现在的情况，我们承认是我们错了。”

蒋介石眼见将要被毛泽东打败，万般无奈就想通过斯大林向毛泽东施加压力。他在一个阴雨绵绵的下午，亲自屈驾拜访苏联驻华大使罗申，以恳切的语气说：

“请大使先生转告斯大林元帅，我准备接受大元帅的建议，希望能亲自出访苏联，与大元帅会晤，以谋求他对中国政府的谅解和支持。”

斯大林有耳朵根子软的毛病，他又上了蒋介石的当，马上派飞机前往乌鲁木齐接蒋介石，并让罗申几次去催蒋介石动身，但蒋介石迟迟不出来接见罗申。最后，才由秘书向罗申兜头泼了一大盆凉水：“请大使先生原谅，总统这几天身体不佳，不会见任何客人。”

罗申这才知道受骗上当，便上门去找蒋经国兴师问罪，谁知又扑了个空，说蒋经国去上海了；罗申乘飞机追到上海，得到的回答是蒋经国根本没来上海，只得硬着头皮向斯大林如实汇报。斯大林情知是杜鲁门对蒋介石拉拢所致，只好命令苏联专机返回莫斯科。

蒋介石在国内战争中一败涂地时，又想到了斯大林，1949 年 1 月 1 日向苏联发出备忘录，请斯大林调停国共冲突，再次玩弄和谈阴谋。

斯大林想到多次上蒋介石的当，就将蒋介石的备忘录转给中共中央，还把苏联的复文草案告诉毛泽东，征求中共中央的意见，讲明苏联一是赞成国共停止内战，进行和谈；二是反对美国充当调停角色，而想由苏联出面调停。

毛泽东看了苏联的电报，脸上露出嘲讽的神情，知道斯大林耳朵根子软的老毛病又犯了，便明确告诉斯大林：中共倾向于要南京政府无条件投降，因为中国革命已胜利在握，不必再用迂回战术，推延取胜时间。

斯大林接到毛泽东的复电后心里酸溜溜的，感到很不是滋味，对中共是否已胜利在握，他仍然心存疑虑，但毛泽东既已拒绝他出面调停，他也只好表示同意。

为解开心中的疑团，斯大林派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外贸部长米高扬乘飞机经大连转赴石家庄，换乘汽车来到西柏坡。斯大林嘱咐米高扬只带耳朵去，多听少说。

米高扬身穿圆领皮大衣，头戴圆筒皮帽子，神采焕发，昂首阔步，十分威风。他在毛泽东介绍情况讲到共青团工作时，不由得指手划脚，被毛泽东不高兴地点了回去。米高扬不服气，就在宴会上提出和毛泽东比赛喝酒，不等毛泽东表态是否同意，先自豪饮起来。毛泽东不善饮酒，喝儿口就呛得咳嗽不止，米高扬自以为得计，开怀大笑。

毛泽东微微一笑，让服务员端来两盘辣椒，顺手拿起两个，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米高扬看毛泽东吃得那么香甜，情不自禁馋痛大发，拿起一只辣椒，二话不说咬了一大口，立刻辣得哇哇大叫，涕泪横流。

米高扬在西柏坡住了几天，经过实际观察，深入了解，真正感到毛泽东：胸有韬略，本领超群，蒋介石斗不过，杜鲁门也不是对手！从此再不敢指手划脚，高谈阔论，他特别客气地请毛泽东谈谈新中国的外交政策。

毛泽东点燃一支香烟，慢悠悠吸上两口，形象地讲起了打扫干净了房子再请客的比喻，幽默他说，我们的屋子本来就够脏的，因为被帝国主义分子的铁蹄践踏过，而某些不客气、不讲礼貌的客人又有意地带些脏东西进来，那就不好办了。至于帝国主义分子，他们抱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一方面想进来抓几把，同时也是为了把水搅混。混水便于摸鱼，我们不喜欢这样的人进来。

米高扬知道斯大林最关心新中国对美国的态度，一心想把新中国控制在苏联手里，就小心翼翼地提出这方面的问题。毛泽东抽口香烟，轻轻吐出，望着圈圈烟雾，豪情满怀说：

“我们的解放战争正在胜利声中向前发展，到目前为止，尚未遇到帝国主义的严重干涉和阻拦。小的冲突是有过好几次的，例如天津城外某地、山东青岛附近都发生过冲突。那都是他们出来试探的，一遇到我方的抵制和打击，就龟缩回去了，接着就逃之夭夭，索性撤走了。”

说到这里，毛泽东脸上露出自豪的笑容，米高扬刚想张口询问美国干涉中国革命的可能性，毛泽东早知其意，将手一挥侃侃而谈：

“到现在为止的经验是：美军并不想直接卷入中国内战，只是间接干预，把军火、军用物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剩余物资）大量供应给蒋军，指望这些饭桶发挥作用。其他帝国主义目前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各自苟且偷安，保全自身，谁也不愿，实际上没有能力来冒险。”

毛泽东越说越精神抖擞，米高扬也越听越解气，双眼流露出钦佩的目光，只听毛泽东慷慨激昂宣称：

“帝国主义同我们国家之间是有几笔大账要算的。第一是他们在我国的一切特权必须全部彻底废除。第二是他们欠我国的一切债务和款项必须偿还。第三是帝国主义的武装部队、警察等必须撤离中国。至于侨民居留问题，则按一般外侨居留办法和国际惯例来处理。帝国主义分子历来是看不起中国人的，对他们也得教训教训，使他们的头脑清醒过来。”

米高扬刚来西柏坡时神气十足，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架子。这时他对毛泽东完全折服了，回到莫斯科对毛泽东夸不绝口，向斯大林称赞毛泽东有远大的眼光，坚定的方向，高明的策略，是很了不起的领袖人物。

斯大林听了脸上现出微笑，对毛泽东和中国革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但想到毛泽东很快就要发起渡江战役，又担心解放军没有取得渡江胜利的绝对把握，同时，认为解放军一过长江，就会引起美国出兵，因而想劝毛泽东适可而止。

斯大林决心向毛泽东提出忠告，但又想到自己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几次出错过主意，又犹豫起来，就提笔起草一封体现这一忠告的长篇电文。

在这封长电中，斯大林特别提醒渡江后注意可能出现的帝国主义干涉。斯大林寻词择句曲意表达他的忠告称：

虽然解放军战绩辉煌，但无论如何不能认为反对蒋介石的运动已经结束。英美法害怕人民解放军越过中国接壤国家的边界线，进而在这些国家以及蒋介石占据的岛屿造成革命的形势。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可能采取各种措施（从封锁到同中国发生武装冲突）来保住岛屿和亚洲，而且英美军队在南下的解放军主力部队后方登陆的危险性尤其增大了。

斯大林还向毛泽东提出三条建议：第一，不要着急，要认真做好解放军向前推进到与邻国边界线的准备；第二，从南下的解放军主力部队中选出两个好的军团投放到港口地区，充实当地力量，防备敌军行动；第三，暂时不要缩减解放军部队。

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同志仔细讨论斯大林的长篇电报，根据斯大林的建 议，做好了准备针对帝国主义干涉的军事部署。

毛泽东静夜深思，他觉得斯大林有些话没有明讲，却从电文的字里行间，从斯大林最近在中苏关系上的几个重大举措中体现出来。他发现斯大林并没有全心全意支持中国革命，或明或暗采取多种方式维护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最有力的证明是苏联驻华大使罗申是唯一随李宗仁代总统迁往广州的外交使节。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等西方使节却留在南京，岂非咄咄怪事！这证明斯大林还在设法与国民党政府进行“真正的合作”，这是共产党对共产党的态度吗？

这时，苏联等国的一些好心朋友，纷纷会见毛泽东，劝他不要惹起美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划江而治，稳妥可靠，中国古语说“穷寇勿追，此为用兵之法”，学学西楚霸王亦未尝不可，项羽才是顶天立地的英雄！

这些好心人的劝告激起毛泽东胸中汹涌的波澜，一首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气势磅礴诗篇在心中涌泻：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对此事的真伪众说纷坛，但毛泽东1957年4月1日的谈话。证明确有此事：

直到 1949 年，我们眼看就要过长江的时候，还有人阻止，据说千万不能过长江，过了就会引起美国出兵，中国就可能出现“南北朝”。我们没有听他的。我们过了长江，美国并没有出兵，中国也没有出现“南北朝”。如果听了他的话，中国倒真可能出现“南北朝”。

毛泽东感到需要和斯大林当面谈谈中国革命胜利后的重大问题，自己一时离不开，就委托刘少奇于 1949 年 7 月访苏。

刘少奇以东方文明古国特有的含蓄、深沉、儒雅风度拜会斯大林，希望斯大林同志多做指示。

刘少奇此语一出，长期在对外交往中唯我独尊、以老子党自居的斯大林坐不住了，急忙挥挥手，笑着否认说：

“刘少奇同志，我什么时候‘指示’啦？我们是兄弟党，不是上下级，我怎么能‘指示’呢？正因为是兄弟党，互相关心，对于中国兄弟的一些事情，我们有时谈点看法，提点意见，供你们参考。对不对，不一定。你们可千万不能当成什么‘指示’，当成什么必须执行的东西，那可就不得了啰，不得了啰！”

刘少奇见斯大林脸上现出外高加索山区人的谦逊诚挚神情，更增加了对斯大林的尊敬之情，当即予以改正，斯大林手举烟斗哈哈大笑，双方充满兄弟般的战友深情。

斯大林虽表示亲热，但却希望中国革命按照苏联模式运行，他热情洋溢他说：“新中国政府一成立，苏联立即承认。1945 年签订的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因为那时是与国民党打交道，不能不如此。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即可来莫斯科，待毛泽东到莫斯科后再解决这个问题。”

斯大林讲明中苏友好是针对美国战争狂人的，解释苏联在旅顺驻兵是为了抵制美蒋武装力量的，既保护苏联，同时也保护中国革命的利益。

在一次相互谈论中国革命历史时，斯大林突然问刘少奇：“我们妨害过你们没有？”

刘少奇见斯大林脸上露出愧疚的神色，忙客气他说：“没有。”

斯大林心情沉重地摇摇头说：“不，妨害了，妨害了。我们对中国不大了解，有时好心也办坏事。”

刘少奇没想到斯大林作为苏联最高领袖，竟如此光明磊落地承认错误，感到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更值得中国革命党人尊敬，便客气他讲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孤立了美国和蒋介石，使我们后来能够推翻国民党统治，打倒蒋介石。斯大林高兴地笑了，俄顷又收起笑容，内疚地致歉道：

“中国同志总是客气的，讲礼貌的。老实说，我们觉得我们是妨碍过你们的。你们有意见，不过不肯说出来就是了。当然，你们应该注意我们讲话的正确与否，因为我们常常是不够了解你们事情的实质，可能讲错话。不过，如果我们讲错了，你们还是说出来好，我们会注意到的。”

由于中苏相互尊重，在许多问题上都形成共识，双方态度友好，气氛热烈。在一次宴会上，正在苏联养病的江青以潇洒的风度，热情而得体的语言向斯大林敬酒：“斯大林同志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幸福！”

斯大林见此话出自年轻、漂亮、潇洒的毛泽东夫人之口，更觉非比寻常，他由此触景生情，讲起革命中心东移问题：

“西欧人由于骄傲，在马克思、恩格斯死后，他们就落后了，革命中心由西方移到了苏联，现在又将移到中国。”

斯大林的话使中国同志大吃一惊，那时，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自然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新中国尚未正式成立，怎么会享此殊荣？刘少奇正不知如何回答，斯大林又讲起他发此宏论的原因：

“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一般理论方面，也许我们苏联人比你们知道得早一些，多一些，但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应用于实际中去，则你们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刘少奇正要谦让，斯大林将手一挥，以更加热情奔放的语言说：

“今天，你们称我们为老大哥，但愿弟弟能赶上和超过老大哥。这不仅是我们大家的愿望，而且也合乎事物发展的规律，后来者居上嘛！现在，请大家举杯，为弟弟超过老大哥干杯！”

刘少奇慌忙站起，连连摇手，不肯接受。斯大林把酒杯举到刘少奇面前，诚恳地解释说：“世界革命中心东移，你们的历史责任加重了，这是我们衷心的愿望！”

刘少奇谦逊地抱拳致谢，婉拒说：“老大哥还是老大哥，小弟弟还是小弟弟！我们永远向兄长学习！”

任凭莫洛托夫、布尔加宁、赫鲁晓夫等人相劝，刘少奇就是不肯接受，遂构成中苏关系史上极为独特的篇章，这正是：

苏联别墅喜气生，突然认错令人惊。

勉励兄弟超大哥，世上罕见友谊情。

中苏关系的迅速发展冲破了美国等帝国主义的干扰、破坏，促使中国解放战争以势不可挡之势向前发展，新中国于1949年10月1日宣告成立。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时，充满了经过多年浴血奋战，终于取得胜利的斗豪情，但对新中国是否有人迅速承认，心中没有把握：新中国既已明确宣布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一心想鲸吞中国的杜鲁门和帝国主义国家肯定不会承认新生的共和国；受压迫的弱小国家虽抱同情态度，但受到西方国家种种干扰，难于很快承认；斯大林对新中国心存疑虑，何时宣布承认也殊难预料。

毛泽东忧心忡忡他说，我们建国以后，如果外国三天不承认，就有问题了。

10月1日，斯大林特别关注北京举行开国大典的盛况，他收听着天安门城楼上的实况广播，感到新中国的诞生改变了世界力量对比，他与杜鲁门斗法有了强大的后盾。他豪情满怀，一挥特制的著名烟斗，吩咐马林科夫和葛罗米柯：

“向北京发电：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热烈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苏联基于力求与中国人民建立真正友好关系的一贯愿望，决定中苏之

间建立外交关系，并且互派大使。”

在宣布新中国成立两小时之后，毛泽东就接到从莫斯科拍来的世界上第一封承认中国的外交电文，并获知苏联政府当日宣布断绝同国民党“广州政府”的外交关系，从广州召回苏联的外交代表，他高兴得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毛泽东回到丰泽园，已是深夜，但却毫无倦容。他对苏联和东欧兄弟国家如此之快地承认新中国，充满感激之情。特别是斯大林首先伸出同志和友谊之手，他倍感温暖，深受鼓舞，大大增强了他的自豪感和自信心，便亲自打电话，把周恩来、刘少奇等人请来，商量他适时访苏问题。周恩来，刘少

奇等人欣然赞同，认为可借此参加斯大林 70 寿辰的庆贺活动。于是便向莫斯科发电，提出毛泽东将出访苏联，诚恳地征求苏联领导人的意见。

斯大林早就多次邀请毛泽东访问苏联，但今天接到毛泽东热情洋溢的来电，性格多疑的老毛病又犯了。

他慢慢地点燃了烟斗，对毛泽东的种种疑虑随着一团团白烟袅袅升腾。他想起自己为中国革命殚精竭虑，还无意中整了毛泽东几次，没料到事实证明是毛泽东对而自己错了，毛泽东个性极强，在好多问题上不买自己的帐，一见面，会不会给自己闹个下不来台的下场呢。

斯大林正在犹豫不决，但当马林科夫进来请示如何给毛泽东回电时，斯大林迅即做出决定：欢迎毛泽东到莫斯科来。

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于 1949 年 12 月 6 日离开北京，开始举世瞩目的访苏活动。美国当局知道毛泽东和斯大林一旦联手，将形成中苏联合对抗美国的严重局面，给美国称霸世界带来严重障碍，指示美国特务机构设法破坏。

美蒋特务机构经过精心策划，制定了颠覆毛泽东专列的罪恶计划，把破坏重点定在天津，务必在毛泽东的专列通过天津时，用炸弹炸毁列车，阻止毛泽东访苏。

保证毛泽东安全访苏，立即成为中国公安部门的首要任务，周恩来命罗瑞卿、李克农全力以赴，不许有任何差错。罗瑞卿、李克农调动部队和基于民兵在铁路沿线严密布防，百米一哨，哨哨相望，不允许有任何差错闪失。

毛泽东的专列通过天津时，百倍警惕的公安人员突然发现铁路上有一颗手榴弹，马上清理，迅即报告毛泽东及亲自担任护送任务的罗瑞卿。

毛泽东认为美蒋特务破坏他的莫斯科之行是中美苏三国斗争中必有之“戏”，他见险不惊，泰然自若地继续读书，与随行人员谈笑风生，只吩咐集中公安力量尽速破案：“公安部，在我回国之前，镇压这个反革命。”

这一险情使毛泽东的专列顿时紧张起来，罗瑞卿急忙指示检查车上的保卫措施，然后亲自下车调查处理这一案件，不久就把设置炸弹的美蒋特务挖了出来，给了杜鲁门和蒋介石一记响亮的耳光。

斯大林心想既然请毛泽东进门，就得好好招待，他先派苏联外交部副部长拉夫伦捷夫带外交部和赤塔州官员到中苏边境第一站奥特波尔恭候毛泽东大驾光临，在车站前广场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检阅威武雄壮的苏联仪仗队。毛泽东的专列到达新西比尔斯克时，斯大林又命人打电话询问毛泽东身体情况如何，途中需要什么帮助。斯大林特别精心安排毛泽东的专列在 12 月 16 日中午 12 点开进莫斯科北站。刹时间，伊万大帝钟楼上的古老大钟洪亮地敲响，莫洛托夫、布尔加宁率领苏联官员举行盛大欢迎仪式，钟声、车声、欢呼声响成一片。斯大林体贴毛泽东旅途劳顿，指示尽量减少欢迎程序，将毛泽东安排在斯大林的别墅休息。

这一切，使毛泽东感到格外温暖，但他心里仍感到不安，他深知斯大林虽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但生性主观而多疑，至今仍怀疑中国共产党走“南斯拉夫道路”，担心自己成为“第二个铁托”。现在与日夜想念的斯大林马上就要见面了，怎样才能打消斯大林的怀疑和顾虑，搞好中苏两大国、两大党的关系呢？

毛泽东正在考虑会见斯大林时的种种方案，苏联警卫人员来请客人前往克里姆林宫，毛泽东即带翻译师哲欣然应邀前往。

斯大林对会见毛泽东更谨慎小心，早率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大队人马，

在金碧辉煌的克里姆林宫办公室久候多时。斯大林特意打破常规，赶到办公室门口迎接毛泽东，大远就迎上前来，伸出双手，与毛泽东的手紧紧相握。

这两位顶天立地的伟人初次见面，久久握手，互相打量。

毛泽东见 70 岁的斯大林身穿威风凛凛的苏军元帅服，头发、胡子修剪得整齐漂亮，笑容满面，容光焕发，先自充满几分敬意。

斯大林见 56 岁的毛泽东身穿毛料中山装，足蹬方口布棉鞋，身材魁梧，态度潇洒，文质彬彬，神采奕奕，心中暗自赞叹此人果然不凡，情不自禁地首先热情地问了声“您好！”毛泽东也热情问候“你好！”

“我们欢迎您的到来！”

“谢谢斯大林同志！”

斯大林盯着毛泽东那红润的面容，高声赞叹道：“好，好啊，你很年轻嘛，很健康嘛……”

毛泽东也热情奔放地回敬道：“斯大林同志也很健康呀！”

斯大林以主人身份请大家入座，双眼再次打量心目中的传奇人物，由衷地赞叹：“伟大，真伟大！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你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们真诚地祝你健康！”

毛泽东没想到一见面就受到这样热情而崇高的评价，就像遇到久别重逢的兄长，情不自禁地倾吐衷肠：

“不，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反对我的人厉害咧，有些事是非不明，至到现在还不明——”

此言一出，举座皆惊，斯大林心中不悦，暗想，我在中国革命问题是出过一些错主意，但我是好心呀，何况前不久刘少奇来访时，我不是当面道歉了吗？再说，今天一见你，我就讲了许多让你高兴的话，你怎么还如此让我难堪呢？”斯大林毕竟是本领超群的政治家，马上以娴熟的外交手腕，一挥右手的烟斗，扭转沉闷气氛说：

“不不不！既往不咎嘛！胜利分清的是非，胜利就是一切！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

毛泽东的牢骚话使中苏两国领导人精神顿时紧张起来，斯大林的政治家方略又刹时打破了片刻的沉寂、凝重气氛，在场的人都对斯大林更敬畏几分。只听斯大林高瞻远瞩地分析中国革命胜利的世界影响说：

“中国革命的胜利，将会改变世界的天平，国际革命力量的砝码加重了。我们真心诚意地祝贺你们的胜利，希望你们进一步取得更多更大的胜利。”

斯大林的话似春风拂去毛泽东心中的不快，诚恳地发出肺腑之言：“我代表中国人民衷心地感谢苏联人民，长期以来给予我们的支持和帮助，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朋友的！”

斯大林格外客气地笑问东方来客：“毛泽东先生，我们这次应该做些什么事情？你有什么想法和愿望？”

毛泽东对不称他“同志”而称“先生”略感诧异，但初见面不好发问，就以特有方式回答说：“这次来是要完成某项事情的，应该搞出个什么事情的，它必须是既好看，又好吃！”

毛泽东的话把苏联人抛到五里雾中，纷纷向师哲投去探询的目光，师哲便按自己的理解解释：“好看就是形式好看，冠冕堂皇；好吃就是说内容有味，实实在在。”

斯大林没有笑，他深思片刻感到不好再问，也就暂且不提。毛泽东提出

让周恩来来到莫斯科参加会谈，斯大林亦未表态赞成。

在12月21日的斯大林70寿辰庆典上，毛泽东发表书面祝词，称赞“斯大林同志是世界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也是中国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但斯大林却误信苏联驻华总顾问科瓦廖夫的造谣污蔑，挑拨离间，对毛泽东态度变冷。

美国当局为抵制毛泽东和斯大林握手的影响，串通英国散布“毛泽东被斯大林软禁起来了”的消息，毛泽东又对科瓦廖夫大发雷霆，这才引起斯大林反躬自问，斯大林发觉上了科瓦廖夫的造谣报告的当，就将科瓦廖夫的报告交给毛泽东，以示信任和友好。毛泽东感到斯大林虽然固执，但还是讲理的，就于1950年1月2日接见塔斯社记者，说明中苏关系的现状，使美英的谣言不攻自破。斯大林也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请周恩来来到莫斯科谈判签署中苏友好条约问题。

在谈判中，斯大林对美国进入中国东北极为敏感，特意提出不允许第三国公民进入中国东北和在东北、新疆地区居留。毛泽东知道这是斯大林仍在怀疑中共领导亲美，对斯大林这个意见有点儿反感，神情转趋严肃，顿使会谈气氛变得紧张起来。周恩来以娴熟的外交家风度代毛泽东反问道：

“第三国公民的涵义是什么？东北住有很多朝鲜族的居民，他们算不算第三国公民？更不用说外来的蒙古人了。”

斯大林参加过多少次外交谈判，还是头次遇到周恩来这样的外交大师，也很少这样被针锋相对反驳提问，自知理亏，一时慌乱尴尬，划了三根火柴也点不着烟斗。

毛泽东见周恩来讲出了自己要讲的维护中国主权的意见，手腕远比自己高明，心中大喜，又见斯大林如此狼狈，于心不忍，就取出火柴，划燃了递给斯大林，幽默地劝道：

“斯大林同志，新中国和旧中国根本不同了！美帝国主义在东北，是被我们打跑了！那些靠侵略中国吃饭的所谓‘公民’，不用说，早溜走了，不存在什么居留问题。”

斯大林由此领略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厉害，每当大国沙文主义主张露头时，只要毛泽东、周恩来轻轻一击，他就不得不有所收敛。

毛泽东访苏引起世界性反响，杜鲁门感到中苏联盟是对美国世界霸权的严重挑战，就指使他的国务卿艾奇逊于1950年1月12日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了题为《美国的亚洲政策》的演讲，把自己打扮成中国人民的“朋友”，蓄意挑拨离间说：

“苏联正在对中国北部地区实行合并，这种在外蒙所实行了的办法，在满洲亦几乎实行了。我相信苏联的代理人会从内蒙和新疆向莫斯科做很好的报告。这就是现在的情形，苏联想使有中国众多居民的广大地区和中国脱离而与苏联合并。苏联企图占据中国北部的四个区域，对于与亚洲有关的强国美国来说是重要的事实，对于美国来说不能等闲视之。”

艾奇逊的演讲首先引起斯大林的警惕和不安，他派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专门会见毛泽东，提出苏中蒙三国都发表官方声明，驳斥艾奇逊的无耻谰言。

毛泽东亲自起草文章，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的名义发表谈话，揭露艾奇逊造的一连串谣言，尖锐地指出：

“这件事表示了美国帝国主义制度在精神方面堕落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艾奇逊的通篇讲演都是以谣言掩盖美国侵略政策的实际。”

毛泽东起草的谈话引用了美国前驻沈阳总领事瓦尔德对记者的谈话，指出除掉行使共管铁路的权利以外，并未看见苏联有监督满洲的任何迹象，更未看到苏联吞并东北的迹象，指出这是瓦尔德赏给艾奇逊一记清脆的耳光。还幽默地指出：

“人们可以看见，在西半球的土地上发生了有趣的故事。一个说：满洲与苏联合并。一个说：并未看见。这两个人不是别人，都是美国国务院的有名官员。”

毛泽东起草的胡乔木讲话，刹时间传遍全世界，各国报刊纷纷转载，称赞它尖锐、泼辣，“用事实驳斥谎言，入木三分”，使艾奇逊原形毕露，狼狈不堪。毛泽东对此欣喜异常。

但是，毛泽东绝未想到，斯大林得知中国未以毛泽东名义发表声明非常不满，专门邀请毛泽东、周恩来来到克里姆林宫，指责中国没有遵守斯大林所说的发表中苏蒙官方声明的诺言，声称这种做法“乱了步伐，给敌人留了可钻的空子”。

毛泽东认为中国有权采取具有自己特点的斗争方式，对斯大林的指责恼怒异常。斯大林见惹怒了毛泽东，就屈尊俯就，把毛泽东、周恩来请到自己的专车上亲自送回住地，但毛泽东认为这是事关国家主权、民族尊严的原则问题，对斯大林毫不客气，不仅拒绝了斯大林邀他跳舞的请求，还收回了邀请斯大林到中国代表团做客的邀请。

通过这件事，斯大林才认识到自己对中国文化和毛泽东都不太了解，开始更尊重中国文化，尊重毛泽东。

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举世瞩目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于1950年2月14日在克里姆林宫隆重签署，在随后举行的庆祝酒会上，周恩来风度翩翩致祝酒词说：

“我们两国所签署的条约和协定，将使中苏两国关系更加紧密，将使中国人民不会感到自己孤立，而且将有利于中国的生产建设和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有利于世界和平。中苏友谊要世代传下去，感谢苏联的无私援助，中国要向老大哥学习。”

在热烈的掌声中，斯大林精神焕发，起立致词说，今天的这个场面热烈非凡，洋溢着友谊和团结精神，预示着欣欣向荣的未来，中苏友好兄弟情谊要保持下去，周恩来都说过了，也代表了我的心意。

斯大林、周恩来的话道出了中苏八亿人民的心声，毛泽东豪情满怀，举杯敬祝斯大林身体健康，祝愿中苏友好万岁！斯大林也频频举杯，祝福毛泽东、周恩来身体健康，宴会至深夜才尽欢而散，后人诗赞曰：

中苏条约力无穷，兄弟友谊笑谈中。

联盟惊破美帝胆，主席访苏第一功。

中苏顺利缔结友好互助条约出乎美国当局的意外，击中了美帝国主义的要害，国务卿艾奇逊在华盛顿对此发表恶毒评论，对新中国终于走上与苏联结盟的道路表示遗憾和不满。美国总统杜鲁门气急败坏，指示要在毛泽东回国时进行破坏。

在台北近郊的草山别墅里，美国中央情报局上校布莱德气势汹汹，对国民党保密局特务头子毛人凤下令说：

“毛泽东从莫斯科回国是刺杀他的最好时机，朝鲜战争就要爆发，毛泽东此时访苏对美国、对台湾、对朝鲜战争都不利，美国战略情报局希望看到

你们的成功！”

毛人凤点头哈腰向布莱德报告，刺杀计划将在北京和东北同时进行：“按行动计划执行，赴大陆人员准时到达目的地。东北地下技术纵队采取两套作战方针，从两翼尾追堵截毛泽东的专列，除破坏长春14号铁路桥外，在哈尔滨车站要埋下定时炸弹。炸了毛泽东的专列，就是第二个皇姑屯事件，反共复国斗争就会出现新局面。”

布莱德满意地点点头，迫不及待地提醒说：“快命令你的万能台展开活动吧！”

毛人凤向报务员口授命令称：“立即电告计兆祥，通知××国驻苏办事处协助侦察毛泽东在苏联回国的时间、路线。命令计兆祥从即日起，每天三次报告指挥情况，进一步加强空中联络。为此，除嘉奖计兆祥2000美元外，由国军中尉台长晋升为上校台长。”

毛人凤发完指令，向布莱德吹嘘说：“共产党绝难料到，在他们党政要员集中的心脏地带的‘南池子’，竟是我潜伏台指挥的天下！”

布莱德也顺水推舟给毛人凤打气说：“这我相信，仅就技术装备方面而言，共产党还不是你们的对手！”

出乎美蒋当局的预料，在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兼军委情报部长李克农亲自指挥下，公安部防空台等城市侦测人员克服技术设备落后的种种困难，冒着刺骨的寒风日夜奋战，终于判断敌台就在北京南池子普渡寺东夹道胡同南口的大院内，马上向李克农做了汇报。

李克农鼻梁上架着一副闪闪发光的老式水晶眼镜，很快召集有关干部研究作战方案，他以响亮的皖南口音宣布：

“对（台湾）保密局北平潜伏台的侦察工作，按毛主席批示的限期即将提前完成任务。敌台台长就是因为发了战略情报而由一个小小的中尉很快升到上校的计兆祥。”

李克农一声令下，公安人员冲进南池子九道湾43号，从床上抓起计兆祥和他的妻子钱秀莲，搜出了整流器，却没有搜出电台。侦察人员见天花板上倒贴着一张手绘的色彩绚丽的《牡丹图》，便登上板凳，用手一推《牡丹图》，露出一个大窟窿，从里面搜出美制SS—1—E型25瓦电台、手枪和写在《古文观止》上的密码本，又从床底下搜出的情报底稿中发现了潜伏在东北的敌特的活动线索，李克农马上命令公安部派得力干部赴东北和当地公安人员消灭美蒋技术纵队。

当天晚上，公安人员抓获了空投的美蒋特派员张太平、于冠群。我公安人员突击审讯，得到详细口供后就化装成张大平、于冠群，来哈尔滨松花江饭店2楼2号高级客房，与国民党东北技术纵队司令马耐（代号205）接头，假传布莱德和毛人凤命令，宣布提升马耐为国民党东三省救国总司令。

马耐不知是计，吹嘘道，“这次中共主席访苏，共党防守极严，沿途及车站军警岗哨林立，还有便衣、地方干部都参加巡逻。我们给共产党布了个迷魂阵，让他走时安然无恙，回来时粉身碎骨！”

公安人员从马耐口中诱出国民党东北技术纵队在满洲里、哈尔滨、长春三地谋杀毛泽东的方案和参加人员名单后，将马耐及其匪帮一网打尽，给了美蒋以沉重打击。这正是：

中苏握手喜相逢，领袖深交两情浓。

条约胜似春雷震，中国崛起赛蛟龙。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敲山震虎 杜鲁门发动侵朝战争

瞒天过海 毛泽东派出大军东征

话说毛泽东访苏并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大大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中、美、苏三国之间展开了更惊心动魄而饶有兴味的斗争。

杜鲁门、艾奇逊对中苏联盟又气又恨，为与斯大林争夺新中国，借机挑拨中苏关系，绞尽脑汁也无计可施，还是艾奇逊鬼主意多，突然柑掌而笑：“咱们给毛泽东来个敲山震虎如何？”

杜鲁门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忙向国务卿问计，艾奇逊有些汉学功底，不紧不慢说：“敲山震虎就是巧妙制造攻击的声势，使隐蔽的对方惊恐害怕，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艾奇逊见杜鲁门仍不解其意，就在杜鲁门耳边如此这般一说，杜鲁门听罢哈哈大笑，吩咐艾奇逊依计而行。

艾奇逊马上指示美国前驻北平总领事柯乐柏，大摇大摆来到成立不久的中国外交部，声称要递交美国官方一封信件。

开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急召外交部办公厅主任、部长助理王炳南面商对策。王炳南见周恩来身穿深灰色呢制中山装，足登方口市鞋，浓眉如雁翎高耸，双目似慧星四射，不由心中敬仰万分。他向周恩来谈到美国依仗手中的美元和枪炮兵舰，对新中国大耍帝国主义霸道威风，不承认新中国，却让一批外交官在沈阳、北京、南京、上海、武汉等地赖着不走，周恩来指示王炳南待之以礼，但不许他们以外交官身份活动。

王炳南出面会见柯乐柏，询问有何公干，柯乐柏趾高气扬说：“我们在大陆的美国外交官，至少还有 800 多人，我们仍愿以外交官身份，与你们接触。”

果不出周恩来所料，王炳南按周外长指示奉告：“我们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你只能作为美国侨民的身份出现！”

柯乐柏对此已有思想准备，遵照国务卿艾奇逊的指示放出试探气球：“你们不考虑美国承认问题？”

王炳南见一切真如周恩来所料，便根据与周恩来商订之策，堂堂正正回答道：“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互利原则，同包括美国在内的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我国的美国，至今仍不以平等态度对待中国，只要贵国一天不改变敌视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你们在中国以合法地位！”

柯乐柏故意将两只大手一摊，做出无可奈何之状，按着艾奇逊指示，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从公文包中掏出一份文件，恭恭敬敬双手递上：“国务卿艾奇逊令我特来送上书信一封，请收下！”

王炳南对此手早已料到，毅然挥手制止，肃然发问：“请问你以什么身份呈送文件？”

柯乐柏笑脸相迎：“当然是总领事。”

王炳南毅然摆手拒绝：“对不起，不能接受！”

柯乐柏自讨没趣，悻悻而归，不几天又遵照国务院指令，为中国政府宣布收回北京的美国兵营地产，到外交部兴师问罪：

“中国政府收回美国兵营地产，侵犯了美国久已存在的权利。这种权利 1901 年就已获得，1943 年的中美条约又加以重申。对此，美国感到遗憾，

我们将撤回在中国的美国官方官员！”

王炳南义正辞严驳斥说：“我们早已指出，新中国已经没有美国的官方人员。至于所谓的美国‘官方人员’，中国人民只能把他们当作美国侨民对待；愿去者不留，对申请离境者迅速给予离境许可，提供一切方便。”

柯乐柏又在侨民问题上大做文章：“好，我们将撤退美国侨民！”

王炳南笑送“瘟神”：“贵国在撤侨问题上如有困难，请尽管提出！”

杜鲁门以撤侨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他狂妄地认为中国这个烂摊子共产党收拾不了，斯大林也解决不了六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非求天下第一富国美国施舍不可，毛泽东不向头号强国美利坚屈膝求饶，别无他路可走！

出乎杜鲁门、艾奇逊的预料，毛泽东、周恩来稳坐钓鱼台，岿然不为所动，杜鲁门也觉无趣，只得装模作样撤走几个外交官，大批美国外交官却赖着不走，但美国政府却元中生有，恶意宣传新中国阻止美国撤退侨民。

周恩来成竹在胸，指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于1950年2月5日，揭露美国政府无中生有、倒打一耙的阴险手法称：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诬蔑中国留难美侨撤退，纯属捏造；中国政府不但不会阻止任何前美国官方人员和他们的家属离开中国，相反，根据沈阳和迪化（今乌鲁木齐）发生的前美国领事从事间谍活动的经验，中国愿意所有美国官方人员能够更快地离开中国！”

艾奇逊被驳得体无完肤，但他仍不下令撤侨，又心生一计向新中国频频摇动橄榄枝，从经济上拉拢利诱说：

“中国不是应该从苏联，而是应该从美国得到贷款援助，美国人是愿意和中国通商的，但中国必须不抱敌意。”

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既不害怕美帝国主义的威胁，更不相信其鬼话。周恩来堂堂正正发表谈话驳斥艾奇逊的奇谈怪论称：

“对美国的所谓援助，中国有亲身经验，这就是几百万人的死亡，就是民族自由权利的丧失。美国对新中国的恫吓早已过时了，亚洲人民自己的事情，应当由亚洲人民自己来处理，无论在什么时候，也不应当由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帝国主义者例如艾奇逊之流，来加以干涉！”

杜鲁门见毛泽东和斯大林关系越来越密切，对他软硬不吃，便气急败坏地于1950年4月从中国撤出美国侨民，加紧武装李承晚和蒋介石的军队，并派杜勒斯以美国总统顾问的身份于6月15日到东京，与驻日美军司令麦克阿瑟策划发动朝鲜战争问题。杜勒斯6月17日视察朝鲜三八线，在战壕里审查了李承晚的“北伐”

作战计划，最后经杜鲁门批准，以世界霸主身份悍然干涉朝鲜内战，很快以对抗苏联为借口升级为全面的干预。

杜鲁门当即命令美国驻远东三军部队火速开往朝鲜，协同李承晚军队作战，还利用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为抗议国民党代表继续窃据中国在联合国席位而退出安理会之机，操纵安理会紧急会议通过决议，宣布北朝鲜破坏和平，要求北朝鲜停止军事行动并将部队撤回原地。

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广播演说，不可一世地宣布三项决定：一是派兵入侵朝鲜，二是派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阻止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三是支持法国在印度支那恢复殖民统治的战争，从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印度支那形成一个针对新中国的三路向心迂回战略部署，企图把新中国这个未满周岁的婴儿扼杀在摇篮之中，有诗单道杜鲁门之疯狂凶态：

杜酋天生黑心肠，三管齐下太猖狂。

狼奔豕突势如蜂，魔爪伸向鸭绿江。

面对险恶的军事形势，毛泽东在1950年8月上旬连续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朝鲜战争形势，预做迎战准备。毛泽东深思熟虑，仔细分析说：

“朝鲜战争有短打、长打、大打、原子弹打等几种可能。美国若打原子弹，我们没有，只好让他们打，这是我们不能决定的，但我们不怕，我们还是打手榴弹。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

毛泽东提出一定要在8月底做好一切准备工作，提醒全党：“不要事到临头来不及哟！”

这时，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在安理会提出一个和平提案，要求停止朝鲜境内的敌对行动，同时自朝鲜撤退外国军队。

周恩来与毛泽东研究中国对苏联这一提案的态度，毛泽东果断地将大手一挥说：

“这个提案好，我们要表态支持；不过，杜鲁门是不会接受的。朝鲜人民军打到了洛东江，如果一停火，外国军队一撤出，那不是把朝鲜交给金日成了吗？杜鲁门怎么会同意呢？可是，僵持下去，对朝鲜人民军不利，我看他们速战速决的时机已经失去了。恩来同志，你认为怎样？”

周恩来双手抱在胸前，深入分析说：“美国为了维持它在西方世界的威信，一定会在朝鲜孤注一掷，目前正在加紧调兵遣将，战争的规模在不断扩大。我们必须密切注意战局的发展变化，做好战局恶化的准备。”

毛泽东点头表示赞同，又抽口烟，喝口茶，从战略角度侃侃而谈：

“对待战争侵略者，一是不怕，二是敢打；我们要在战略上蔑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真理在我们一边，在人民一边，真正大打起来，战争的结局决不会是美帝国主义好战分子的一厢情愿。这个美帝的手伸得太长了，别个国家的内战，他非要远渡重洋来干涉，硬是想充当世界宪兵的角色。全世界那么多国家，人民要革命，民族要解放，这是一个潮流，它美国怎么管得过来？”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人民日报》8月7日发表题为《拥护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提议》的社论，向全世界宣告：

“我们中国人民愿与全世界一切正直的政府和正直的人士联合一致，共同支持苏联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提议，并使联合国及其安全理事会从美国侵略者的魔掌下获得自由，使它恢复其原来的和平保卫者的光荣地位。”

周恩来致电安理会当月主席马立克和联合国秘书长赖伊，要求邀请中朝参加安理会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要求安理会立即采取措施，迅速制止美军违反国际法与人类道德常规的暴行。

杜鲁门得意忘形，不顾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严重警告，命令美国第七舰队开赴台湾，任命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司令官，又于1950年9月15日指挥7万大军实施仁川登陆，疯狂北犯攻占汉城，叫嚣要越过三八线，把侵略战争的战火燃烧到鸭绿江边。

金日成派代表到北京紧急求援，毛泽东、周恩来迅速研究朝鲜战争形势，一面向斯大林通报情况，一面先按中国传统作法“退避三舍”以观形势发展。

斯大林很快复电，坚决支持中国政府谴责美国侵略的严正立场。

美李军队在朝鲜的猖狂进犯，逼迫毛泽东做出是否出兵的严峻决定。不出兵吧，唇亡齿寒说不过去；出兵吧，刚刚诞生的共和国要和世界头号军事

强国较量，胜负难卜。毛泽东闭门谢客，思考三昼夜，又和政治局同志仔细商量。1950年10月1日，南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后，终于和周恩来等人商量决定冒险出兵。10月2日，毛泽东密电斯大林称：

“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

接着，毛泽东讲到他对出兵朝鲜的具体考虑和对苏联提供武器的要求：

“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决定于10月15日开始出动，在朝鲜的适当地区同敌人作战。第一个时期只打防御战，歼灭小股敌人，然后配合朝鲜同志举行反攻，歼灭美国侵略军。”

斯大林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左右为难，便邀请周恩来到莫斯科仔细商谈。

毛泽东、周恩来感到有必要在周恩来赴苏前，把中国的严正态度转告杜鲁门，便选择与中美都有外交关系的印度担任这一工作。周恩来在10月3日深夜会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郑重相托：

“美军如越过三八线，我们要管。前天收到大使阁下转来尼赫鲁总理的来函。尼赫鲁总理所提的问题中，有一个是比较紧急的，那就是朝鲜问题。美国军队企图超越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请将此点报告贵国政府总理，请他转告杜鲁门总统。”

杜鲁门从新德里、伦敦得到中国的警告，他担心中、苏投入朝鲜战争，影响他竞选下一届总统，便想就此问题征求麦克阿瑟的意见。他知道麦克阿瑟桀傲不驯，决定屈驾前往离东京不太远的威克岛，会见麦克阿瑟。在麦克阿瑟表示同意后，他于10月15日乘“独立号”总统专机来到威克岛。

麦克阿瑟狂妄地向杜鲁门保证美国在朝鲜战争中赢定了，中国共产党不会发动进攻。杜鲁门仍不放心，又召开有关朝鲜局势的研讨会，杜鲁门单刀直入提出问题说：“现在的问题是要认真地估计一下当前的战局，根据现在战场的进展，俄国和中国到底有无可能直接介入？”

麦克阿瑟大包大揽说，中国没有空军，美国空军会炸倒中国人，中苏都不会直接参加朝鲜战争。他保证两个月就能结束朝鲜战争，然后把美国军队撤出朝鲜。杜鲁门对此感到满意，但仍强调注意中苏参战迹象。

在此前后，中苏围绕参加朝鲜战争问题一直在进行紧张的幕后协商。

毛泽东连续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派遣志愿军赴朝作战问题，两种意见争论激烈。不等会议结束，毛泽东就派周恩来于10月8日飞抵莫斯科，转飞黑海边休养所，与斯大林进行协商。

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的意见，讲明根据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以不向朝鲜出兵为好。

斯大林强调苏联已宣布从朝鲜撤军，再出兵朝鲜有困难，因为这等于苏联与美国直接交战，因而应让金日成把有生力量撤往东北，将老弱病残和伤员撤到苏联境内。

周恩来从黑海之滨一返回莫斯科，就接到毛泽东拍来的电报，讲明周恩来走后中共中央政治局继续开会，政治局多数同志主张出兵，还讲了中国出兵的兵力部署、调动及战略、战术计划。

周恩来看罢大吃一惊，这与他刚才对斯大林所讲情况大相径庭。他一言不发，陷入深思之中。他旋即以娴熟的外交艺术，再次会见斯大林，通报了

中共中央的新决定。斯大林欣喜异常，立即与周恩来商谈苏联的军火供应和苏联出动空军配合中国军队作战问题。双方商定，苏联提供武器，中国出动军队，苏军负责空中掩护，还商定在奥特波尔交接武器装备。

周恩来迅即赶回北京，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做了访苏情况汇报，加速了出兵朝鲜的准备，但10月10日，苏联方面通过苏驻华使馆的渠道告知周恩来：原商定苏联方面出动空军部队配合中国军队入朝作战之事，由于苏联方面没有做好准备，所以苏联空军暂不能出动。

斯大林这样出尔反尔，骨子里是对中国仍持怀疑态度，认为解放军虽打败了蒋介石，但装备太差，不一定能打败美国王牌军。一旦中国打了败仗，就有导致苏军与美军直接对抗的危险，甚至会引来第三次世界大战，因而在关键时刻，出于民族利己主义，他犹豫了，动摇了，托词没准备好。

周恩来接到苏联驻华使馆的通报，立即赶到丰泽园汇报。毛泽东一听，脸色当时就变了，责备斯大林说：

“你看苏联方面迟不说早不说，单等我们将令一下，他才说，让我们把话说出去，无法收回……恩来，我看这事要重新考虑。”

毛泽东抽着烟在屋里来回走动，考虑了足有十多分钟，又狠狠吸了一大口，才发话说：“恐怕要再劳你去莫斯科一趟了……”

周恩来再次飞往莫斯科，偕同正在莫斯科养病的林彪，前往克里姆林宫动员斯大林执行诺言，向朝鲜派出苏联空军。

斯大林自知理亏，首先开口从彭德怀身上寻找话题说：“我们已经知道中国已下令向朝鲜出兵，任命了彭德怀同志做统帅。听说这个彭德怀作风勇猛，仗打得不错。”

周恩来由衷地称赞横刀马上的彭大将军说：是的，无论是在红军时期领导三军团，还是在解放战争的西北战场，彭德怀打得都不错，陕北吴起镇大捷后，毛泽东同志曾赋诗称赞彭德怀将军说：

山高路远沟深，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林彪对彭德怀不服气，一抹光脑袋说：“不过和美军作战，情况会有些不同。”

斯大林唯恐中国人对与美国兵打仗勇气不足，急忙打断林彪的话，鼓舞士气说：

“美军有什么了不起！林彪同志，要知道，他们是在别国的土地上进行不义之战，士气低落，你说是吗，林彪同志？”

林彪一直担心打不过美国，对出兵朝鲜持悲观态度，他叹口气说：“当然，美军师出无名，是不义之战。不过，我们部队目前装备太差啦，一个野战军仅有几十门火炮，还抵不过美军一个团的火力，而且装甲部队又极少。”

斯大林以为是林彪借此要求苏联提供军事装备，就顺水推舟答应说：

“是的，中国军队的装备有待改进，你们提出要苏联帮助你们装备40个师，我们同意，但要分步骤来。目前，我们可以立即着手先为你们装备20个师；不过，依我们的经验看，不必等装备好了再作战，应该边作战边改装，在实战中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周恩来是善于掌握火候的外交家，他怕林彪再把话题扯远，就适时把议论转入正题说：

“我们党中央感谢斯大林同志对我们的援助，毛泽东同志一再嘱咐我，

向斯大林同志表示我们衷心的感谢！但是，我们还想向您反映一下我们的困难情况，那就是我们的空军目前还刚刚组建，飞行员正在训练，还不能立刻投入战斗。因此，毛泽东同志和中央政治局决定暂缓出兵，希望能得到斯大林同志的谅解和进一步的支持。”

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吃惊地问：“怎么？你们不是已经出动了么？为什么要暂缓呢？要知道，朝鲜的情况非常紧急啊！”

斯大林自然明白中国暂缓向朝鲜出军的真正原因是自己言而无信，就阻止维辛斯基责备中国说：“关于空军的问题，我想我们还可以再设法解决。维辛斯基同志，我们应该告诉总参谋部，空军方面应该加紧对中国空军进行战前训练。”

斯大林又转脸向周恩来致歉道：“请原谅，目前苏联空军尚不能出动。飞机到了空中，很难划定个界限，如果和美国全面冲突起来，仗打大了，也会影响中国的和平建设，特别是你们还处于战后恢复阶段林彪把抗美援朝取得胜利的希望寄托在苏联出动空军上，又向斯大林提出要求说：“我看苏联空军可以穿中国志愿军的服装，以志愿军的名义作战。这样，既可以解决我军的制空权问题，又避免了美苏直接冲突。”

斯大林以为林彪存心要拉苏联下水，不耐烦地批驳林彪说：“如果有的飞行员被美方俘虏，只穿一身中国志愿军的衣服有什么用呢？”

斯大林微微一笑，又不满地地质问中国总理兼外长说：“周恩来同志，您这次来莫斯科，就是来通知我们这件事的？”

周恩来对斯大林言而无信颇为不满，以不容置疑的口气回答道：“是的，斯大林同志，没有苏联红军配合作战，我们暂不出兵。”

斯大林知道错在自己，无可奈何说：“那么好吧，我们是不是应该通知金日成，让他在东北通化建立流亡政府？”

斯大林又以老子党身份对周恩来说：“我理解中国方面的困难，应该能够充分理解。只是你们暂缓出兵到什么时候？你们看，朝鲜的事情对于我们最好的结局是：既不引起大战，同时又能有效地制止侵略。”

周恩来见事已至此，暂时很难改变，就从实际出发，解决最迫切的问题，他说：

“也许朝鲜问题在短期内得不到解决，但是我们还是要做好战争准备。希望苏联方面答应提供给我们的 20 个师的装备应尽快运到，而且我们还需要大量的运输汽车等军需物资。”

斯大林烦躁不安，面露不悦之色说：“这个问题我刚才说过，装备还是在实战中改换更好，部队可以在实战中训练，在实战中迅速掌握使用技术，发挥更先进装备的效力。”

周恩来见斯大林不肯在提供武器装备问题上明确承担责任，再多说也无益，就适可而止，起身告辞说：

“好吧，斯大林同志，我们会将您的建议向我们中央政治局报告的。”

这时，毛泽东正在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日夜深思，召集各方面人士研究对策。如果斯大林不听周恩来劝告，怕引起美苏直接对抗，不出动海空军帮助中国、朝鲜抵抗美帝国主义侵略，我们的抗美援朝将变得更加困难，这正是：

黑云压城城欲摧，朝战火急岂能推？
苏联若不派空军，勇挑重担振国威！

毛泽东得到周恩来从莫斯科打回的电报，知道事情相当复杂，便对斯大林出动苏联红军一事不抱什么希望了，他决心把事情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加之金日成又派朴一禹到北京催促中国尽快发兵，他与刘少奇、朱德、彭德怀等人商量后，毅然做出历史性决策：不管有无苏联红军支援，中国仍按原定计划抗美援朝。毛泽东掐灭最后一枝香烟，奋笔疾书致电在莫斯科的周恩来：

“与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周恩来看了毛泽东的来电，心中激情澎湃，对中共出现毛泽东这样大智大勇的人物惊叹不已，他健步奔向苏联外交部，要求再次拜会斯大林，但斯大林以为周恩来又找他软磨请苏联出动空军，便托词不见。

周恩来是何等聪明之人，对斯大林此时的尴尬处境一清二楚，他微微一笑，也不多言，只把毛泽东的来电译文请苏联外交部官员代为转呈。

斯大林怀着厌烦的神情接过毛泽东的来电，极不情愿地打开来看。粗粗一阅，竟把他吓了一跳，简直是晴天霹雳，出乎意料！他对毛泽东的魄力、勇气和胆识极为折服，对毛泽东的怀疑与误解顿时烟消云散，一股歉疚之感油然而生，他欣喜若狂传令：“快请周恩来，我马上见他，一分钟也不能等！”

对此，周恩来早已料到，已等候多时，苏方人员一声“请”字刚出，他便健步如飞来到斯大林的办公室，一进来就朗声相告：

“毛泽东和政治局刚刚拍来电报，我们中央再次做出决定，立即出兵朝鲜！”

斯大林听了翻译，伸出大手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久久不放，千言万语凝成一句话：“还是中国同志好……还是中国同志好……”

斯大林双手紧紧抱住周恩来，热泪纵横：“请您转告毛泽东同志，我感激他，朝鲜人民、苏联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都感激他，他是一位真正了不起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党是成熟的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高举国际主义旗帜的党。请你们放心，你们出兵之后，我们苏联一定尽力援助你们。”

志大才疏的杜鲁门对此全然不知，虽然不断接到麦克阿瑟北进作战的捷报，他仍对中苏参战疑神疑鬼，又再次询问他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拍着胸脯发电向杜鲁门保证：

“总统先生，（中苏参战的）可能性很小。当今是我们强大而中共屠弱的时代，倘若中共部队渡过鸭绿江，我就要使他们遭到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没有任何一个中国指挥官会冒这样的风险，把大量的兵力投入已被破坏殆尽的朝鲜半岛。”

杜鲁门见麦克阿瑟向他保证在圣诞节前结束朝鲜战争，就支持麦克阿瑟扩大侵朝战争。他做梦也未想到毛泽东气魄宏伟，使用瞒天过海之计，一次出兵 20 万！

1950 年 10 月 19 日黄昏时分，鸭绿江上浓云密布，细雨如丝，像是给中国人民志愿军渡江作战做天然屏幕，彭德怀率领 20 万大军，以化装成朝鲜人民军的侦察部队为先导，分别从丹东、长甸河口、集安，以“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的豪情壮志，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开始了举世

震惊的抗美援朝战争。

真是正义之师天公助，当志愿军以 4 个军之众神不知鬼不觉进驻长津湖附近设下一个个伏击圈时，麦克阿瑟仍被蒙在鼓里，他武断地判定：“中共军不会介入，毫无介入的征候”，还大言不惭口出狂言：“中共军即使介入，也为时已晚。”

毛泽东、彭德怀根据慎重初战的原则，很快抓到敌军的弱点，他们发现美军正面部队与侧翼部队，分别由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和麦克阿瑟指挥，缺乏协调，美、英十四国军队和南朝鲜军队缺乏协调，而南朝鲜军队装备差，指挥能力低，就决定先打弱敌，毛泽东亲自下达指示：

“现在是争取战机问题，是在几天之内完成战役部署，以便几天之后开始作战的问题，而不是先有一个时期部署防御，然后再谈攻击的问题。”

10 月 25 日，侵朝“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下令发起所谓结束朝鲜战争的最后一次战役，命令各国侵朝部队猖狂冒险向北进犯。

志愿军先在朝鲜云山、温井地区设下伏击圈，南朝鲜一个加强营进入射程时，志愿军部队利用有利地形奋勇杀出，一下将敌军一个加强营和一个炮兵中队“包了饺子”，彭德怀亲自打电话表扬首战告捷部队说：“邓岳，打得好，我向毛主席为你请功！”

接着，志愿军又乘胜追击，消灭南朝鲜军队一个团、两个营，10 月 25 日这一天后来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纪念日，这正是：

瞒天过海发救兵，义军天助鬼神惊。

避强击弱初战捷，抗美援朝称英雄。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回

假痴不癫 志愿军初战取胜

纵横捭阖 联合国中美斗法

话说毛泽东采取瞒天过海之计，利用夜晚风雨交加之机，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挥师渡江后，又采取“假痴不癫”的谋略，与美国侵略军进行第一次交锋。

1950年10月23日，毛泽东亲自制定抗美援朝第一战役的作战谋略，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讲明此次战役的作战目的称：

“我认为我们应当力争此次战役的完满胜利，力争在敌机炸扰下，仍能保持旺盛的士气，进行有力的作战。力争在敌人从美国或其他处增调兵力到朝鲜以前，多歼灭几部分敌人的兵力，使其增补赶不上损失。总之，我们应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

对歼灭对象，毛泽东也以非凡的军事才能做出明确指示：“首先歼灭伪一、伪六、伪八等师，然后再打美军、英军”，“我军第一个战役须确定以歼灭上述三个伪军师为目标，分为几个大小战斗完成之，然后再打美军、英军。”

那时，杜鲁门、麦克阿瑟狂妄自傲，认为新中国接受了蒋介石的破烂摊子，没有进行战争的能力，解放军大运动战的经验在地形狭窄的朝鲜无法运用，中国军队根本不可能入朝作战。毛泽东正是利用杜鲁门、麦克阿瑟的错误判断，利用美国侵略者的错觉，让它更轻视志愿军；志愿军则故意示弱，深藏不露，然后全力以赴，打它个措手不及，这就是假痴不癫的策略奇计。

从1950年10月25日至11月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利用美伪军疯狂冒进之机在有利地形设下伏击圈，突然发起攻击，奋战13昼夜，歼敌15000人，把“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打退到清川江以南，挫败了美国企图在感恩节（11月25日）前占领全朝鲜的狂妄企图，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从而真正打出了中国人的威风，有人专门写诗赞曰：

主席胸中百万兵，假痴不癫计高明。

猖狂美军遭痛击，蒙头转向坠雾中。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第一次战役中的巨大胜利，刹时间传遍全球。英、法、荷兰等参战国垂头丧气，纷纷要求从朝鲜撤兵。为给侵朝仆从国家打气，美国总统杜鲁门指示国务卿艾奇逊召集英、法、荷兰等国驻美大使会议，以强硬口吻提高士气说：

“我们认为，中国派志愿军参加韩战，可能有三个目的，主要是保护中国的边防安全和鸭绿江的电力设备，有把联合国军赶出朝鲜的企图，也为了在战略上钳制和削弱美国的军事力量。不过，请盟国放心，美国拥有无与伦比的陆海空军，很快要发起第二次战役，一定在圣诞节（12月25日）前结束朝鲜战争！”

英法等国都反对美国扩大侵朝战争，使美国在外交上陷于被动状态，艾奇逊刚要大发脾气，副国务卿腊斯克忙悄悄劝艾奇逊搞些外交姿态。为拉拢英、法、荷兰等国继续参加侵朝战争，艾奇逊和杜鲁门一阵密谋策划，决定利用美国控制联合国的地位大做文章。

杜鲁门指使麦克阿瑟以“联合国军”总司令的名义，于11月6日向联合国提出报告，诬蔑中国破坏世界和平。中国总理兼外长周恩来也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控诉美国侵占台湾，要求安理会制裁美国侵略者，使其撤退侵

略军队。

这样，在联合国安理会，就出现了两个重要议题：一个是美国提出的“美国侵略台湾案”；另一个是美国诬蔑“中国侵略朝鲜案”。按照联合国宪章规定，安理会在讨论有争端的问题时，应当邀请有关的当事国参加讨论。对此，美国横加阻挠，不让中国参加安理会讨论。

从中国向朝鲜派出志愿军之后，斯大林对毛泽东的怀疑完全消失，遇事都跟中国商量。苏联代表马立克奉斯大林之命，联合东欧国家主持正义，使安理会于1950年9月29日通过决议，邀请中国代表出席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这是新中国外交上的一个胜利。

蒋介石派驻联合国的代表蒋廷黻奉蒋介石之命去见美国驻联合国特派代表杜勒斯，抱怨美国本来对联合国有极大控制力，完全能够阻止中国代表前往成功湖，将大陆代表拒之于联合国门外。

杜勒斯对蒋介石派蒋廷黻死死缠住他不放十分讨厌，但又不愿明讲美国同意邀请中国代表出席联合国会议的意图，即为了对付苏联和拉拢英、法等国，美国有必要同新中国进行某种外交上的接触和试探，好摸摸中国的底，再根据情况拉拢中国，不使中国完全站在苏联一边反对美国。

杜勒斯不肯将这些考虑讲给蒋廷黻听，只是装出高深莫测的样子，不耐烦地批评蒋廷黻不懂美国对华政策的奥秘。

美国政府不想让中国顺顺当当去成功湖，狂妄地提出联合国应“召唤”中国出席联大。苏联代表马立克立刻提出反对意见说：“召唤一词完全是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对其奴仆发号施令用的字眼，根本不能用于新中国这样一个管理着几亿人民的主权国家，新中国的代表当然应该是联合国邀请来的。”

东欧国家和亚洲国家坚决支持苏联的主张，美国提案只有台湾代表和古巴（当时的古巴尚处于巴蒂斯塔反动政府控制下）支持而被否决，联合国又于11月8日重申了对中国的邀请。

杜勒斯狡诈异常，为逃避中国代表就美国霸占台湾一事对美国的控诉，又生毒计耍新花招儿，提出把中国代表的权限缩小，只局限在讨论美国提出的所谓“联合国军”司令部关于朝鲜战争的“特别报告”的范围内。

中国领导人一眼看穿了杜勒斯玩弄的鬼把戏，周恩来外长11月11日电复联合国秘书长和安理会主席，拒绝讨论美国操纵的所谓“联合国军”司令部的“特别报告”，要求将中国控诉美国侵略台湾问题同美国侵略朝鲜问题合并讨论，中国代表将同时就这两个问题发言，否则中国将不接受安理会11月8日的邀请。中国外长还严正声明，中国政府从不承认侵朝美军的所谓“联合国军司令部”，它提出的报告更是非法的，其内容是别有用心和片面的。

中国在苏联等国大力支持下，使美国的阴谋宣告破产。毛泽东、周恩来考虑到朝鲜和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很有必要派代表团到联合国讲坛阐明中国的立场并谴责美国侵略，便派出伍修权为团长、乔冠华为顾问的代表团前往美国。

1950年11月24日，伍修权率中国政府代表团乘飞机到达纽约机场，受到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驻联合国代表和联合国礼宾科长的欢迎，伍修权英姿勃勃，应邀对记者发表谈话说：

“中美两国人民间从来就存在着深厚的友谊，我愿借此机会，向爱好和平的美国人民致意。”

伍修权一到纽约成功湖，就找苏联和东欧国家代表商讨对付美国的方策，展开积极的外交活动，美国记者惊呼：“中国代表一到成功湖畔，联合国就不再是美国独霸的天下，一场外交大战在所难免！”

杜鲁门、艾奇逊知道美国代表奥斯汀不是伍修权的对手，就派鬼计多端的总统顾问杜勒斯出任美国特别代表，来与伍修权斗法。外国记者闻讯蜂拥而来，争相采访已经激烈展开的联合国里的中美苏三国之争。

杜勒斯阴险狡猾，诡计多端，他把金色夹鼻眼镜一推，决定采取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之计，趁伍修权立足不稳之机，突然提出动议，企图使邀请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大政治委员会的决议不生效。杜勒斯阴阳怪气说：“如果共产党中国的代表出席了大会，不等于在国际上承认共产党中国了吗？”

在关键时刻，埃及驻联合国代表主持公道，委婉地反对美国代表的意见，多数国家支持埃及代表的意见，才使联合国政治委员会大会通过了邀请中国代表出席会议的决议，联合国才第三次对中国发出邀请。周恩来外长马上复电说，中国代表已到纽约，随时可以参加会议。

美国代表杜勒斯阴沉着长脸暗自冷笑，告诉联合国秘书长赖伊 11 月 27 日他个人有事，不能参加，要求将联大会议由 27 日提前到 24 日召开，妄图使中国代表来不及准备而自动放弃参加会议的权力。对此，苏联代表团团长维辛斯基奉斯大林之命强烈反对，各国代表纷纷谴责杜勒斯无理取闹。杜勒斯见众怒难犯，只好长叹一声，同意中国参加 11 月 27 日的联合国大会。

1950 年 11 月 27 日是中国人扬眉吐气之日，伍修权率中国代表团冲被美国设置的重重障碍，昂首阔步进入联合国大厦，在美国的国民党高级官员、旅美华侨和华裔人士像参加重大节日一般，来到旁听席一睹新中国外交官的风采，美国和西方记者也争先恐后前来采访多年罕见的外交智斗。

中国代表团一入场，各国代表和会场听众纷纷起立张望，不约而同发出热烈的欢呼声。正在发言的苏联代表团团长维辛斯基中止发言，立即发表热情洋溢的欢迎讲话说：

“请原谅，我暂且中断我的演说，我以我们苏联代表团的名义，借此机会，向在主席的邀请下，现在正在会议桌前就座的中国合法政府的代表伍修权先生以及代表团其他成员致敬，并祝他们今天在联合国组织中开始的活动获得成功！”

苏联代表的话，道出了联合国广大会员国代表的心声，刹时间会场里响起暴风骤雨般的掌声，伍修权和中国其他代表激动地向欢迎者鞠躬致谢。

中国代表彬彬有礼、坦然自若的神情，立刻吸引了全场代表的注意，各国记者纷纷把镜头对准中国代表团，连对中国抱有偏见的美国记者，也说他“拍下了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的真面目”，称赞这是中苏在联合国携手抗美的生动写照。

对此，杜勒斯简直气歪了鼻子！他与伍修权中间只隔着一个英国代表扬格，相距不到一米，但杜勒斯强作镇静，故作不注意中国代表之态，铅灰色脸上显出僵冷木然的神情，嘴角使劲往下拉，金色夹鼻眼镜后面的昏花老眼呆视着前面，连抬头看一眼中国代表的勇气都没有。

杜勒斯为何垂头丧气？这是因为美国侵略军在第二次战役中惨遭失败，美军在朝鲜“全线溃退”的报道此时正铺天盖地而来。

原来，志愿军在取得第一次战役的胜利后，毛泽东、彭德怀断定杜鲁门、麦克阿瑟必然要猖狂反扑，继续在战役战术上以假痴不癫的策略，迷惑骄纵

不可一世的美国侵略军，制定了“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敌”的第二次战役作战方针。彭德怀命令志愿军迅速北撤，“不要向前进之敌反袭击，让敌人大胆进至我预定地区”。

麦克阿瑟骄横异常，他调动所有侦察手段搜集志愿军出国作战的情报，但却看不到志愿军大兵团的踪影。他仍错误地认为，志愿军人朝作战是象征性出兵，其目的只是为了维护中国边境的安全，控制中朝边境的缓冲地带，他认为中国没有足够的力量同美国正面抗衡。他拍着胸脯向美国总统杜鲁门保证，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离开朝鲜，他说：

“总统阁下，你不了解东方人，这是中国人的一种手法，只不过虚张声势而已，美军应继续坚持军事进攻的作战计划，发起圣诞节前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把中国人赶回鸭绿江以北，迅速占领全朝鲜已指日可待！”

杜鲁门对麦克阿瑟有一种盲目的信任，他上当受骗，最后拍板做出两项决定：第一，在没有判明中国军队出兵意图之前，不改变麦克阿瑟占领全朝鲜的计划，但要麦克阿瑟相机行事；第二，通过外交途径进行试探，以保证“中共利益”为诱饵，阻止中国进一步介入。有诗单道杜鲁门、麦克阿瑟中毛泽东、彭德怀假痴不癫之计：

大军过江讨敌顽，麦克阿瑟耍横蛮。

假痴不癫施巧计，智谋高低不一般。

话说杜鲁门、麦克阿瑟在战略战术上与毛泽东、彭德怀相比，显然不是一个水平，一味依仗世界头号军事经济强国的地位，出动空军对朝鲜北部和鸭绿江实施狂轰烂炸，美国飞机窜过之处，炸弹声不绝于耳，燃烧弹火光四起，无数朝鲜百姓惨遭屠杀，大片城乡闹市顿成瓦砾。麦克阿瑟命令美军和仆从国大军气势汹汹全力向北冒进，1950年11月21日到达“攻击开始线”，发动“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

就在此前后，美英等国内部反对麦克阿瑟轻狂冒进的人也在积极活动，英国军方首脑反对美军越过鸭绿江，英国首相艾德礼警告杜鲁门，没有任何必要为了征服整个北朝鲜这个微不足道的胜利而冒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

杜鲁门向艾德礼保证没有英国的同意，美国不越过鸭绿江作战。杜鲁门对麦克阿瑟的冒险作战计划也心中无数，便向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史密斯将军询问究竟。史密斯摆出大量情报，忧心忡忡地说：

“现在没有弄清的问题是中国人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充当苏联人的抵押品。中央情报局估计，在苏联的物质援助下，中国军队的卷入表明，苏联人会冒在朝鲜进行一场全面战争的风险。苏联人可能愿意美国与中国打一场全面战争，这意味着我们在欧洲的承诺将付之东流。”

杜鲁门对史密斯大耍滑头极为不满，一再追问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结论性意见，史密斯仍闪烁其辞：

“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要么前进，要么后退，坚持现有的政策或撤退，在政治上都会造成可怕的后果！”

杜鲁门毕竟比他的将军和谋士更胜一筹，他告诉麦克阿瑟应小心从事，最好停止在朝鲜颈部的地方，又举行记者招待会，对中国做出“和解姿态”，声称美国没有对中国采取敌对行动的意图，美国将使朝鲜冲突地区化，一旦条件允许，美国将从朝鲜撤军。

杜鲁门和美国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早有交情，便向他询问对第二次战役

的看法。沃克在第一次战役中尝过中国人民的铁拳，现在发现和中国军队一接触，中国人就退，他觉得其中有诈。两星期前，中国部队吹着军号勇猛冲击，把美军赶到清川江以南，现在中国大部部队突然销声匿迹，只有小股部队边打边撤，这使有实战经验的沃克变得小心翼翼，战战兢兢。为此，遭到麦克阿瑟的严厉申斥，一封封电报骂他胆小鬼，催他加快向鸭绿江挺进的速度。沃克向杜鲁门提出自己的怀疑意见，杜鲁门认为沃克言之有理，劝麦克阿瑟小心从事。

此事引起毛泽东、彭德怀的高度重视，决定再加大假痴不癫的力度。彭德怀指使部队再后撤几十公里，故意再多扔一些破旧武器，制造匆忙后撤的迹象，特别指示采取有力措施诱敌深入钻进口袋：

“一定不要让敌人发觉我们的意图，看出我们是引诱他们钻口袋。给敌人一种错觉，以为我们打不过他们，是撤退了，他们才好放心进至我预定地区。”

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足智多谋，一拍手又提出一个巧妙主意，借俘虏之口诱使杜鲁门、麦克阿瑟上当。

彭德怀连声叫好，很快发电北京请示毛泽东定夺，毛泽东也认为可惜俘虏牵着杜鲁门、麦克阿瑟的鼻子走，他回电对此一计谋大加称赞说：

“你们释放一批敌俘很好，应赶快放走，尔后应随时分批放走，不要请示。”

彭德怀接到北京来电，为毛泽东与他不谋而合高兴万分，决定当天就放。杜平认为这样太快，彭德怀以军事家的深谋远虑，饶有兴味地对杜平说：

“对，现在是争取时间。有个问题不知你想过没有？你们上月23日入朝时，军委和毛主席都来电说：各部派遣远出之侦察部队，均要伪装朝鲜人民军，而不要称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什么？迷惑敌人嘛！”

杜平以掌击额，恍然大悟，更明白了毛泽东、彭德怀所定假痴不癫的妙计。连声说：“高，这样释放战俘，可使敌人不断受到迷惑！”

彭德怀风趣他说：“可以告诉俘虏，我们的粮食供应困难，没有吃的，恐怕要退回中国。美国官员们不是说，志愿军人朝不过是为了拆除鸭绿江水电站的设备，‘大捞一把’吗？不是说他们的空军很厉害，把我们的后方运输和交通完全炸瘫痪了吗？我们就要适应美军这个愿望，来一个就汤下面嘛！”

骄横狂妄的麦克阿瑟果然再上毛泽东、彭德怀的假痴不癫之计，在1950年11月23日感恩节这一天，让他的前线部队享用一顿世界军事史上最丰盛的火鸡宴。从美国运来最漂亮的桌布、餐巾、瓷器、银具、鸡尾酒、夹馅橄榄、烤小公鸡加酸果酱、水果沙拉、水果蛋糕、肉馅饼、咖啡等等应有尽有。

麦克阿瑟还亲自坐着飞机到鸭绿江边察看中国部队动向，对前沿部队鼓舞士气。他说：

“小伙子们，加紧进攻，圣诞节以前结束战斗，到时候，你们就可以回家吃圣诞晚餐，就可以挽着漂亮姑娘在华盛顿漫步！”

一个美国女记者一蹦三尺高，庆幸上帝保佑她，可以抓到轰动全球的爆炸性新闻，扭动细柳腰肢飘然而至麦克阿瑟面前，启开樱桃小口提问道：

“请问麦克阿瑟将军，您是否有把握在圣诞节以前结束朝鲜战争！”

70岁的麦克阿瑟见如花似玉的女记者提出如此敏感的问题，拍着胸脯大吹特吹说：

“是的，我的左翼部队第八集团军的攻势将是不可阻挡的，任可抵抗都将是软弱而毫无希望的；我的右翼部队阿尔蒙德的第十军，有强大的海空军配合，将会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左右两翼将很快在鸭绿江边会合，那就意味着朝鲜战争的结束！”

在麦克阿瑟催促下，美第十军的一支部队窜占鸭绿江边的惠山津镇，军长阿尔蒙德等以东北为背景照像留念，麦克阿瑟将此当作把侵朝战争引向中国边境的象征，声称“这件事将作为一个出类拔萃的军事业绩载人史册”，有人单道麦克阿瑟骄横中计：

麦克阿瑟太张狂，支队挺进鸭绿江。

骄横不知诱敌计，面临被歼惨下场。

至1950年11月25日，毛泽东和彭德怀的假痴不癫之计获得巨大成功，美军及其仆从军被诱人预定打击地区，志愿军以猛虎下山之势，出其不意对敌人实施分割包围，奋战一个月，歼敌3.6万余人，彻底粉碎了美国占领北部朝鲜的企图，收复了朝鲜三八线以北的领土，麦克阿瑟这才如梦初醒，仁川登陆后的威风一扫而光。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通令嘉奖作战有功部队，情不自禁纵情欢呼：“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三十八军万岁！”从此，第三十八军被称为“万岁军”，以表扬该军取得歼敌两万两千余人的重大胜利。著名国际问题专家解力夫有诗叹曰：

麦克阿瑟，好大喜功；

执拗孤行，死伤惨重；

圣诞回家，破灭美梦！

在第二次战役中，志愿军一举收复朝鲜首都平壤，毛泽东意气风发，亲手挥毫写下《平壤解放》的新闻，向国内外送去胜利的喜讯：

〔新华社六日电〕本社记者从朝鲜前线报道：朝鲜人民军和我国人民志愿军本日解放平壤。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侵略军以及李承晚匪军残部，向平壤以南溃退。朝鲜人民军和人民志愿军的正规部队，于十二月六日下午二时进入平壤城。

中国著名诗人柳亚子得到第二次战役胜利的喜讯，豪情满怀欣然赋《浣溪沙》一首：

白鸽连翩奋武前，工农大众力无边，推翻原子更金圆。

战贩集团仇美帝，和平堡垒拥苏联，天安门上万红妍！

柳亚子和毛泽东是多年老友，经常有诗词酬还，他将此诗献给毛泽东，以祝贺他领导志愿军取得抗美援朝的巨大胜利。毛泽东诗兴大发，又接到朝鲜前线的胜利捷报，挥毫和了柳亚子诗一首，正好周恩来前来汇报朝鲜战争战况，毛泽东满面春风指着桌上龙飞凤舞的诗稿说：

“刚好朝鲜前线传来捷报，有了兴致，便和了柳亚子一首，今天给你恩来献个丑，请斧正。”周恩来接过来吟道：

颜膺齐王各命前，多年矛盾廓无边，而今一扫纪新元。

最喜诗人高唱至，正和前线捷音联，妙香山上战旗妍。

周恩来脸上显出敬服的神情，连声称赞说：“妙啊，正和前线捷音联，好！这首诗充分表达了主席对抗美援朝前线捷音频传的喜悦心情，诗中‘而今一扫纪新元’、‘妙香山上战旗妍’这些佳句，也是对前方将士的巨大鼓舞。”

在朝鲜战场胜利捷报鼓舞下，中国出席联大代表伍修权在成功湖与美国

外交官展开充满火药味的外交斗争。

1950年11月28日，安理会正式讨论中国提出的美国武装侵略台湾案，杜勒斯、奥斯汀眼看美国要处于受审判地位，急忙玩弄阴谋诡计，硬把美国炮制的“控诉侵略大韩民国案”塞进安理会议程，强使两个提案合并讨论，企图把水搅混，从中渔利。杜勒斯得意地告诉英国驻联合国代表扬格：“你们就看我导演的好戏吧！”

各国记者都知道今天联合国大会将有精彩节目上演，早把会议大厅挤得人山人海，中国代表伍修权威风凛凛走上安理会讲台，威严地指着美国代表奥斯汀的鼻子，控诉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说：

“我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命，代表全中国人民，来这里控诉美国政府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包括澎湖列岛）的非法行为！”

伍修权一炮击中要害，把美国放在了被审判者的狼狈处境，伍修权庄严重申中国对台湾问题的政策后，以超群的辩才驳斥奥斯汀关于“美国未曾侵略中国领土”的诡辩说：

“好得很，那么，美国的第七舰队和第十三航空队跑到哪里去了呢？莫非是跑到火星上去了？不是的，它们在台湾。任何诡辩撒谎和捏造，都不能改变这样一个铁一般的事实：美国武装力量侵略了我国领土台湾！”

伍修权的讲话使美国代表奥斯汀无法辩驳，大长脸青一阵，红一阵，用手支着下巴，掩饰窘态；台湾代表蒋廷黻更不敢正眼去看伍修权，一直耷拉着脑袋，用大手遮着前额，不让人看他的尴尬神色。有个美国记者偏偏凑上前去，好不容易才看清了蒋廷黻的尊荣，大声告诉同伴说：“蒋代表面部带着一种丧家犬的神色”，此言一出立刻引起哄堂大笑。

在苏联代表帮助下，新中国第一个外交使团出师大捷。美帝国主义被击痛了，不敢与新中国代表在联合国大会上交锋。杜鲁门气得暴跳如雷，但又无计可施，还是杜勒斯狡诈异常，向杜鲁门献釜底抽薪之计，操纵联合国大会和政治委员会宣布无限期休会，实际上取消了新中国利用联合国与美国较量的机会。

杜勒斯以为堵死了中国代表的路，把伍修权“凉”在成功湖畔无事可干，最后自觉无趣只好开路走人，也好出一口恶气。

中国代表团对此也感到挠头，一时苦无良策，还是顾问乔冠华足智多谋，把大背头一甩说：“这有何难，会内不行会外斗嘛！”众人一齐拍手叫好。

中国代表团在会场之外又摆战场，1950年12月16日在纽约成功湖举行记者招待会，伍修权堂堂正正发表谈话说：

“我们是为争取和平而来的，我们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了种种合理建议，但不幸的是，这也并非出乎意料之外，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美国集团的操纵下，拒绝了中国政府这个合理的和平建议。对此，我们表示坚决的反对和抗议！”

美国在朝鲜战场上连吃败仗，在联合国也被中国置于被控告者地位，处境狼狈，一怒之下剥夺了中国继续参加联合国大会的权利。

中国代表团使联合国第一次响彻新中国代表的声音，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展示了新中国的崭新形象，在世界上产生了巨大影响，这正是：

大快人心事，痛斥野心狼。

鼓舞志愿军，奋勇战疆扬。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回

赏罚严明斯大林痛斥驻朝大使 感情用事杜鲁门怒撤麦克阿瑟

话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在苏联的武器支援下，浴血奋战，取得抗美援朝两次战役的巨大胜利；中国代表团又在联合国与美国的初次外交较量中获胜，这就使得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吵做一团。

美国一些国会议员对麦克阿瑟冷嘲热讽，讥笑麦克阿瑟鼓吹的圣诞节总攻势成了总退却，攻击杜鲁门、艾奇逊“造成继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最惨重的军事败绩”，强烈要求弹劾现总统，撤换国务卿。杜鲁门和麦克阿瑟也推诿责任，互相埋怨。麦克阿瑟说，他本来可以打胜仗，只因杜鲁门干涉过多，不批准他轰炸中国东北；杜鲁门指责麦克阿瑟对形势估计错误，批评他没有政治头脑，胡乱发言，几次都想撤掉麦克阿瑟而另外任命侵朝部队司令官。这正是：

兵败朝鲜枉自豪，方知中国战策高。

你推我怨窝里吵，纸虎现形举世嘲。

然而，美国总统杜鲁门并不想从朝鲜撤军，1950年11月30日在记者招待会上口吐狂言，叫嚷要在朝鲜打下去，为此不惜使用原子弹；麦克阿瑟也提出要封锁中国海岸，轰炸中国本土，放蒋介石出笼对中国大陆进行牵制性进攻并派兵到朝鲜作战。

美国战争狂人的疯狂叫嚣吓不倒中国人民，却使美国的西方盟国惊恐万分，荷兰驻联合国代表含着眼泪询问奥斯汀：美国是否还有机会避免战争？英、法等国更害怕被美国拖进侵华战争中去。

英国当局更惊恐万分，英国下院工党100名议员签名请愿，如果英国首相艾德礼支持美国使用原子弹，他们就退出工党使英国政府垮台。艾德礼坐不住了，12月4日飞越大西洋到华盛顿商谈对策。

杜鲁门对此伤透了脑筋，让国务卿艾奇逊劝英国人说：

“我们必须记住，中国人和北朝鲜人的每一行动，都有苏联在后面支持，我们不得不把所有发生在朝鲜的事看作世界性的事件，我们不应忽视我们在全世界各地都面对着苏联这个事实。”

英美为原子弹使用问题争吵不休，最后双方总算达成协议，英国保证继续参加侵朝战争，美国保证“在没有与对方事先磋商之前，任何一方都不会使用这种武器”。

对杜鲁门声称在朝鲜战争中使用核武器，金日成也感到紧张，他赶到北京与中国领导人协商对策，特意询问毛泽东的看法。毛泽东抽口烟以鄙夷的神情说：

“这是一种恫吓，是赤裸裸的核讹诈。不要说苏联已经掌握了核武器，杜鲁门不敢冒险打一场原子战争，就是像对付日本一样，也在朝鲜使用原子弹，那杜鲁门也没有义务事先通知对方，让对方先做准备呀！说来说去，杜鲁门这种做法的实质就是威胁与恐吓。”

毛泽东站起身来又点燃一支香烟，若有所思，对金日成说：

“那么，中国共产党人会不会被杜鲁门吓住呢？不会的！今大的中国人民，已经是在先进阶级的领导下，站起来了的人民，她不会再屈服于任何外来的压力。具体到朝鲜战场嘛，既然美国敢于诉诸武力，那么中国志愿军就奉陪到底。打了一次战役、二次战役，胜利了，但还不够，还要接着打。你

敢越过三八线北进，那我为什么不能跨过三八线南进？”

金日成听罢，放心多了，又问起斯大林的态度，周恩来插话说：

“斯大林同志看到二次战役的情况通报，得知我军三所里、龙源里、松骨峰阻击战的悲惨壮烈，他流泪了，他称赞这是一支伟大的军队。”

毛泽东豪情满怀说：“这就是说中国先进阶级的军队，当她明确自己肩负的使命后，必然是一往无前的！战士们是为祖国为人民而战，靠的是一股气，一股革命的正气。我看志愿军打败美军，靠的就是这种气；美军就不行，他们钢多气少。”

杜鲁门被英、法盟国搞得心神不安，又有麦克阿瑟和美国高级官员的内部争斗，他在朝鲜战争问题上骑虎难下，进退两难，摸着尖下巴考虑再三，决定挺而走险，于1950年12月16日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然后行使总统战时权利，下令提前完成保持18个地面作战师的扩军计划，又于1951年1月6日签署增拨200亿美元国防费的法案，使美国当年军事预算高达450亿美元，将美军由250万人增至350万人，蓄意扩大侵朝战争。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连续开会讨论朝鲜战争问题，他们对形势的分析还算比较冷静：“中共部队现在十分强大，如果他们全力以赴，完全可以迫使联合国军撤出朝鲜。”

杜鲁门受制于国内反对势力，只得命令麦克阿瑟把战争限制在朝鲜境内，又通过英、法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要求中国人民志愿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备战。为此，便打着“先停火、后谈判”的幌子，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成立所谓“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让五届联大主席安迪让和印度、加拿大代表出面，要求立即停火。

杜鲁门自以为他这一手“高明”之极，得意洋洋对国务卿艾奇逊说：“朝鲜战争一开始，周恩来就主张尽快把韩战停下来，我们对其置之不理，我现在把球踢回去，周恩来就没理由拒绝了吧？”

艾奇逊对中国情况比较了解，他对杜鲁门的一相情愿之举不敢苟同，却也不敢当面反驳，果然在几天后接到中国外长周恩来1950年12月22日的声明。

杜鲁门接过周恩来的声明仔细阅读，只见周恩来尖锐地揭露美国玩弄的停火阴谋，指出现在停火，美国就可以取得喘息时间，准备再战，至少可以保持现有侵略阵地，准备再向前进犯。周恩来郑重声明，凡是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代表参加和同意而被通过的联合国一切重大决议，中国政府都认为是非法的，无效的，因而不准备与“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接触。

杜鲁门恨得咬牙切齿，气势汹汹调集兵力，准备再次大举向北进犯，毛泽东认为应适时组织第三次战役，狠狠教训杜鲁门，因而于1950年12月13日致电彭德怀密授妙计：

“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带来很大的不利。”

为保证前线作战的机动能力，毛泽东催促把斯大林答应提供的苏联汽车加速开往朝鲜前线，他亲自为彭德怀出谋划策：

“苏联第一批汽车不久可到达。损车虽多，是可以补充的。以平均每天损车30辆计，一个月损车900辆，打一年仗也不过损车一万辆左右，并且损坏之车，有些可以修好，有些可以取回若干零件，还可能缴获一部分汽车，

故汽车是完全有办法的。”

经过周密的计划和准备，彭德怀指挥中朝部队选择美国人做梦也想不到的除夕之夜——1950年12月31日，出其不意发动全面进攻，以摧枯拉朽之势突破临津江、汉滩川及在三八线上预设的敌防御阵地。

美伪军遭此突然攻击，晕头转向丢枪逃跑，丢弃汉城、仁川望风而逃。中朝两国军队奋勇追击七大七夜，向前推进80~110公里，歼敌近两万人，将敌人驱赶到三七线附近，1951年1月8日胜利结束第三次战役。苏联驻朝鲜大使拉左瓦耶夫没想到世界头号强敌逃跑得如此之快，觉得简直不可思议，产生了轻敌速胜思想。他手舞足蹈，跑到志愿军司令部向彭德怀指手划脚：

“彭司令，干得好！你要一鼓作气，把美国侵略军从朝鲜半岛赶下海去！”

彭德怀怀着厌恶的心情，听了半天不发一言。在胜利面前，作为久经沙场的统帅，他始终保持着冷静的头脑，以克制的态度奉劝对他胡乱出主意的人：

“大使阁下，敌人尚未遭到毁灭性打击，至今未大伤元气，轻敌速胜的思想是不实际的，在军事上是有害的。”

拉左瓦耶夫头脑发热，颐指气使说：“你发什么世外奇谈？可不能当大傻瓜！”

彭德怀心中怒火升腾，但他尽力克制，不发一言，拉左瓦耶夫讽刺味十足地质问道，“请问彭司令，有何高论？”

彭德怀胸有成竹，平静地回答：“我已下令停止追击，结束第三次战役！”

拉左瓦耶夫一蹦三尺高，指着彭德怀的鼻子，指名道姓训斥道：

“彭德怀呀彭德怀，哪有打了胜仗不追击敌人的道理？哪有这样的司令呢？你赶快下令继续追击。一直打到釜山，把敌人赶下大海！”

彭德怀抑制住怒火，打发对方说：“谢谢大使阁下的好意，但我作为志愿军司令员，要为几十万将士的生命负责，为中朝两国的生存安危负责，岂能视同儿戏！”

拉左瓦耶夫气急败坏，搬出尚方宝剑：“我要向斯大林同志报告，让斯大林来教训你！”

拉左瓦耶夫回到使馆，即向斯大林发去长篇报告，告彭德怀的状。他做梦也未想到，不久就接到斯大林的复电，严厉地申斥他不懂装懂瞎指挥，下令撤掉他的大使职务，调他回国听候处置。

原来，彭德怀如实向毛泽东汇报了他与拉左瓦耶夫的原则分歧，毛泽东当即把彭德怀的意见通报给斯大林。

斯大林此前曾接到拉左瓦耶夫关于毛岸英在朝鲜牺牲的报告，他由此想到儿子雅科夫被德军俘虏，一直没有音讯，一时无法自我克制，昏倒在地，清醒后走到办公桌前，双手扶着桌子边坐了下来。斯大林又想起毛岸英在二战期间曾向他写信要求上前线，经他批准，作为坦克手参加了解放波兰、捷克的战斗，并受到他的接见，他还亲手送毛岸英一支小手枪以示鼓励。后来，为促使中苏友好，斯大林把毛岸英送回毛泽东身边；毛泽东为抗美援朝可以舍弃一切，又把毛岸英送到朝鲜前线。

毛岸英牺牲后，斯大林更对毛泽东折服，后悔自己不该怀疑毛泽东是麦琪琳式的（假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该无端把他当成第二个铁托。朝鲜战争爆发后，自己言而无信不出动苏联空军，毛泽东以大无畏气概毅然决定中国

独自出兵，彭德怀又是按照毛泽东的指示领导抗美援朝战争的，毛泽东的胆识和指挥艺术当今世界罕有其匹，连我都不敢和他一争高低，你拉左瓦耶夫打过几次仗，竟这样不知天高地厚，在彭德怀面前指手划脚，大放厥辞，丢人现眼！

斯大林是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既有雄才大略，又能面对现实，他当即果断地给毛泽东复电，热情洋溢地称赞毛泽东以那样劣势的装备，打败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是当代天才的军事家。明确表明，彭德怀的意见是对的，还提到已严厉批评拉左瓦耶夫，不准他再乱发言，准备把他调回苏联，不让他再在朝鲜给彭德怀捣乱了。有诗称赞斯大林、毛泽东胆识超群，彼此信任：

雄才大略非等闲，是非分明辨愚贤。

面对强敌多运筹，中苏领袖挽狂澜。

杜鲁门被打痛了，决心再次发动大规模反扑，但在兵力未调动好之前，又玩弄外交欺骗伎俩，操纵联合国政治委员会于1951年1月11日通过了“联合国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的报告，先安排停火，再建立统一的朝鲜政府和撤退外国军队，最后由英、美、苏、中四国代表讨论远东问题，解决台湾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中国认真研究了这一问题，1951年1月17日建议在中国举行由中、美、苏、英、法、印度、埃及参加的七国会议，美国对此置之不理，杜鲁门命令麦克阿瑟完成战役部署后，于1月25日发动全面反攻，开始进行第四次战役。经过艰苦的抗击，到4月21日，我志愿军共歼敌七万八千余人，取得第四次战役的巨大胜利。

麦克阿瑟万万没想到，没等第四次战役结束，他便被杜鲁门粗暴地赶下台去。

4月11日，麦克阿瑟正在他的东京官邸，以“日本的太上皇”资格用丰盛的午宴招待客人，无意中从商业无线电广播中得知杜鲁门宣布解除他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远东驻军总司令等四项职务，顿时震惊得目瞪口呆，但他毕竟是久经考验的老将军，马上以爽朗的笑声坦然处之，宴会后接到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里德雷的通电才知此事属实，大骂杜鲁门是“野蛮的杂种”！

杜鲁门与麦克阿瑟之争是围绕朝鲜战争的中美苏三国复杂斗争的曲折反映，更是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对美国全球战略重点争论的必然结果，当然与麦克阿瑟骄横狂妄的个人因素、美国两党政治和宪法规定的文官控制军事的传统原则等等也密切相关。

麦克阿瑟反对杜鲁门、艾奇逊等的欧洲第一战略，鼓吹亚洲第一，认为欧洲是一个垂死的体系，拥有几十亿人口的太平洋沿岸地区将决定今后一万年的历史进程。他把日本看作美国的附庸，将中国当成日本的殖民地，视台湾为“不沉的航空母舰和潜艇供应舰”。他把朝鲜战争看作美国与世界共产主义的决战，他无法容忍美国在朝鲜的失败。他主张强化对中国的经济禁运，对中国沿海实施海上封锁；叫嚷要用美国空军摧毁东北以及全中国的工业中心、交通枢纽、补给基地和部队集结地；要求接受台湾国民党军队入朝作战；他强烈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声称要对中苏使用原子弹。

麦克阿瑟得到美国军政各界大批人士的支持。国防部长马歇尔、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里德雷、共和党领袖罗伯特·塔夫脱、美国“反共十字军运动”代表人物麦卡锡、反共议员尼克松等等，都曾是麦克阿瑟的支持者。他

背后又有以美国中西部为基地的芝加哥财团、西部加利福尼亚财团做后盾，因而敢于 1950 年 7 月 30 日跑到台湾去与蒋介石会谈，鼓吹美蒋军事合作，鼓励蒋介石反攻大陆。

杜鲁门为此受到中国、苏联和世界舆论的强烈谴责，处境狼狈，当时就想撤掉麦克阿瑟，但考虑到时机尚不成熟，只得鼓吹台湾海峡“中立化”，既防止中国政府解放台湾，又约束蒋介石反攻大陆。

仁川登陆的成功使麦克阿瑟大出风头，更加骄横狂妄，大讲国务院反对他的阴谋：

“这伙亲欧洲分子就是认识不到，亚洲已被选中进行共产主义政权试验，如果整个亚洲失陷，欧洲也就没有希望了！”

中苏强烈谴责麦克阿瑟是战争疯子、“罪魁祸首和恶魔”，杜鲁门、艾奇逊处境狼狈，一再指示他不许随便发表政治性讲话，麦克阿瑟置之不理，又于 1951 年 3 月 20 日写信给众议院共和党领导人约瑟夫·马丁，表示他完全同意共和党右翼议员的看法，“除了让蒋介石开辟第二战线，没有别的取得胜利的办法”。4 月 5 日，马丁在参议院公布了麦克阿瑟的来信，再加上侵朝战争的失败，杜鲁门便在 4 月 11 日宣布把麦克阿瑟轰下台去。

杜鲁门的简慢处置惹怒了麦克阿瑟的支持者，白宫两大收到 12.5 万封电报，歇斯底里辱骂杜鲁门为“一头猪”，疯狂地叫嚷“狗狼养的杜鲁门应该弹劾”，全国上下国旗倒挂、下半旗，掀起“拳打阿里”的运动。参议员詹纳等攻击杜鲁门和艾奇逊说：

“这个国家掌握在一个由苏联的代理人领导的秘密小集团手里，我们唯一的选择是弹劾总统，上帝从艾奇逊那里救救我们吧！”

麦克阿瑟回国时受到一个凯旋英雄从未受到过的最大规模的欢迎，他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的攻击杜鲁门的告别词使许多右翼人士涕泪横流：“老战士从来不死，他们只是渐渐消失对麦克阿瑟的攻击，杜鲁门摸着尖下巴，苦笑着对艾奇逊说：“这只不过是一派胡言乱语。”

国务卿艾奇逊也受到右翼人士的尖锐攻击，在一次听证会上，内布拉斯加州靠经营殡葬业发财的参议员肯尼思·惠里指着艾奇逊的鼻子，咒骂艾奇逊是苏联的代理人，故意整垮麦克阿瑟。

艾奇逊跳起来尖声叫喊：“不许你用肮脏的手指在我面前摇晃！”

惠里吼叫着冲上来：“我就是这样做！”

艾奇逊的好朋友洛维特见两人要大打出手，急忙把两人拉开，亲自送艾奇逊回家，路上特意买了一瓶玫瑰酒送给他消气压火，还写了一首可笑的诗，送给脾气越来越大的国务卿艾奇逊：

一瓶玫瑰酒，染红你的鼻子，减轻你的痛苦，活跃你的生活。

艾奇逊疲乏虚弱，喘口气，有气无力他说：“我甚至怀疑自己失去了发怒的能力，这是一种令人心寒的想法。因此，我开始口念令人毛发竖起的诅咒，激发怒气。令我感到高兴的是，我觉得血升到了后脖子上，我的耳朵也发热了。”

艾奇逊也写了一首小诗，向好友洛维特证明自己在与苏联、中国及麦克阿瑟的奇特斗智中，还没有失去幽默感：

不会开车，不会订午餐，没有计划，没有预感。

没有头脑，没有记忆，称呼他的朋友，汤姆、迪克或亨利。

不会阅读电报，不会书写名字，至于讲话，差不多也是如此。

杜鲁门被朝鲜战场的惨败和麦克阿瑟下台引起的攻击搞得焦头烂额，急忙请以鬼主意多闻名的艾奇逊来共商对策，一见面就大骂麦克阿瑟和塔夫脱、麦卡锡不止：“这纯粹是一派胡言乱语！”

艾奇逊有气无力地慨叹：“麦克阿瑟可悲。”

见杜鲁门仍懊恼气盛，艾奇逊就挖空心思讲了这样一个故事，给他的总统解忧去烦：

古时候，有一家人，住在一个山明水秀的部队营地的边缘，可

能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吧，这家有一个漂亮的女儿，一副苗条的身材，一张俊俏的脸蛋，上门求亲的人络绎不绝，但总未找到合适的对象，有些小伙子就暗中打这个漂亮姑娘的主意。这样，母亲就担心她女儿的贞操。老太太忧虑不安，常与丈夫谈及此事。有一天，女儿哭哭啼啼他说，她怀孕了。父亲知道最坏的事情发生了，擦了擦额头宣布说：“感谢上帝，事情总算完了！”

杜鲁门听了这个故事若有所思，突然拍着自己的尖下巴，从帝国主义者立场污蔑中、苏、朝三国说：“朝鲜就是我们美国的漂亮女儿，决不能被中国和苏联霸占强奸！”

艾奇逊一连在国会作证8天，搞得他精疲力尽，只好借酒浇愁说：“我打算试一试我消费酒精的能力有多大，如果在我喝完之前，再次爆发战争，那么这场战争必须在没有我服务的情况下进行！”

话说毛泽东看到朝鲜战争不是短期内就能结束的，遂指示志愿军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指出我军必须用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

斯大林派往志愿军总部的苏联军事顾问从民族利己主义出发，对彭德怀冷言冷语说：“你们几个师换上苏联装备打一段就调换，轮换入朝的新部队又要重新换装，这不是故意换苏联的武器装备吗？”

苏联军事顾问还向斯大林告状，斯大林却高兴得拍手叫好，连声称赞说：“好，好！彭德怀真有办法！这样一轮换，既锻炼了部队，改善了装备，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又便于长期坚持，妙！真妙！”

苏联军事顾问又说苏联军事武器让中国人拿去的太多，不合算，斯大林严厉斥责苏方人员鼠目寸光，满含深情赞赏中国人民志愿军以劣势装备打败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成千上万人流血牺牲，甚至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也战死在朝鲜前线。他一挥烟斗朗声宣告：“中国的抗美援朝，站在反帝斗争的第一线，打得非常好。我们供给军火装备是应该的，不要钱！”

在苏联支持下，中朝联军从1951年4月22日至6月10日，举行第五次战役，歼敌8万余人，将敌人阻止于三八线附近，麦克阿瑟也由于连吃败仗被撤职，杜鲁门任命美国陆军副参谋长李奇微取而代之。

中美在朝鲜斗过五个回合之后，杜鲁门才如梦初醒，知道不可能从军事上战胜中朝联军，先后两次找苏方官员，请求促成美中和谈。

杜鲁门先后要国务卿艾奇逊派人向驻柏林的苏联管制委员会主席的政治顾问弗拉基米尔·西蒙诺夫和苏联驻联合国正副代表马立克、西门·查拉普金进行试探，但都毫无反应，最后让与马立克有交情的美国国务院顾问、政策委员会主席乔治·凯南直接去见马立克。

凯南开始还犹抱琵琶半遮面，马立克早知其意，但却假装不知，不予理睬，凯南只得讲出老实话：“美国准备在联合国或在任何一个委员会或以其

他任何方式与中国共产党人会面，讨论结束朝鲜战争的问题。”

马立克见凯南找上门来说出很有背景的话，知道肯定有美国白宫意图，便追问道：“是恢复朝鲜战争前状态吗？”

凯南认真地回答说：“是的，各自回到战前的位置。”

马立克马上提出，他认为最重要的条件是：“一切外国军队应该立即从朝鲜撤离。”

凯南大眼珠一转圆滑他说：“立即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的问题，是没有商量余地的，但将来可以进行从朝鲜逐步撤退外国军队的讨论。”

马立克以中国人民的朋友自居，尽可能提出中国要提出的条件说：“朝鲜问题是同整个远东问题连在一起的，美国的政策造成了一系列严重后果，它不只是朝鲜问题，还有对日和约问题、台湾问题、中国在联合国席位问题等等，都是必须解决的。”

凯南见马立克提出了中国的基本条件，微微一笑也讲明美国的关键态度：“考虑到美国在日本和远东的一般利益，出于安全的考虑，美国不能容忍朝鲜落在美国敌对力量的手中，同样不能同意整个国家落在共产党手中。”

马立克脸上露出不悦之色，正要厉声驳斥帝国主义的强盗逻辑，乔治·凯南急忙抢着打圆场说：

“在朝鲜停止军事行动的问题应作为一个单独的问题来解决，与其他更广泛的远东问题无关……关于台湾和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目前不可能谈及，包括朝鲜前途问题在内，准备以后讨论。”

马立克迅即将与凯南的会见结果上报斯大林与苏共中央。斯大林感到五次战役后，朝鲜局势将面临新局面，便将凯南和马立克的接触情况，迅速向中朝方面通报，特别讲明他的看法说：“这是美国一个重大的战略考虑，同时也表明美国对侵朝战争前途的焦急和忧虑。”

毛泽东、周恩来接到斯大林的通报，马上把金日成接到北京，共商对策。

38岁的金日成对杜鲁门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认为很可能是美国的缓兵之计。

毛泽东虽不排除缓兵之计之说，但认为中国从来不接受谈判，问题在于谈判的时机和条件。纵观战场实力，中朝占绝对优势，如能再歼灭更多敌人，谈判会更更有利。再说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是我们历来的主张，如能以“讨论逐步撤退外国军队、包括朝鲜的前途等问题”为条件，中朝不宜拒绝。

中朝两国领导人商定，为创造和谈环境，中朝部队两个月内不发动大规模反攻战役，并派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度高岗陪同金日成访苏，进一步同斯大林商谈。

斯大林热情会见金日成和高岗，急切地询问中朝部队所占地位是否有利，能不能顶住美国人的进攻，建议中朝方面运用准确的术语概念与美国代表谈判。

中苏朝三国取得一致意见后，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 1951 年 6 月 23 日在联合国新闻部举办的《和平的代价》的广播节目中，发表经斯大林亲自批准的著名演说，提出和平解决朝鲜战争的建议说：

“朝鲜的武装冲突——目前最尖锐的问题——也是能够解决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意愿。苏联认为，第一个步骤是交战双方应该谈判停火与休战，双方把军队撤离三八线。为了确保朝鲜的和平，这代价不算太高。”

毛泽东看了马立克的讲话稿，满意地点点头，批准《人民日报》6月25日发表题为《朝鲜战争一年》的社论，向世界宣告：“毫无疑问，作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个步骤，马立克的提议是公平而又合理的。”

同一天，杜鲁门在田纳西州土拉霍马发表演讲，在为美国侵朝政策辩护后，也表示同意马立克的建议，声称愿意参加和平解决朝鲜战争的谈判。

杜鲁门仍然心存疑虑，他指示美国驻苏大使寇克再次与苏联官员接触，确认无误后才电令侵朝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发表如下声明：

本人以联合国军总司令的资格，奉命与贵军谈判。因为我得知贵方可能希望举行一次停战会议，以停止朝鲜的一切敌对行为及武装行动，并愿适当保证此停战协议的实施。我在获得贵方对本文的答复以后，将派出我方代表并提出这一会议的日期，以便与贵方代表会晤。我

更提议此会议可在元山港一只丹麦伤兵船上举行。

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陆军中将李奇微为防止出现类似麦克阿瑟肆意胡为的事件，杜鲁门指示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向李奇微下达严格训令称：

“（一）在这次停战中，我们的主要军事利益在于停止在朝鲜的冲突，保证制止战斗的再起和保卫联合国部队的安全。（二）……

在考虑停战时，纵使就政治问题和领土问题达成协议毫无进展，获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为我们所能接受的停战部署，也是具有极重大意义的。

（三）你和敌方部队司令员之间的谈判，应严格限于军事问题；尤其不应进行关于解决朝鲜问题的谈判，或考虑与朝鲜无关的问题，如福摩萨（即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席位问题，这些问题必须由政府处理。”

杜鲁门仍不放心，指示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里德雷说：

“你告诉李奇微，在谈判立场上要极其谨慎小心，除非对方不接受我们的最低限度条件，否则不得让谈判破裂。”

中朝方面认为将会谈地点定在丹麦的伤兵船上不合适，因为丹麦表面中立，实际上属于西方阵营，提出改在开城，然后于7月1日通过北京和平壤电台向美方广播答复称：

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将军：你在6月30日发表的关于和平谈判的声明收到了，我们授权向你声明：我们同意为举行关于停止军事行动和建立和平的谈判而和你的代表会晤。会晤地点，我们建议在“三八”线上的开城地区。若你同意，我们的代表准备于1951年7月10日至15日和你的代表会晤。

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金日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

1951年7月10日，举世瞩目的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举行。

毛泽东纵观全局，感到虽然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五战五捷，歼敌23万余人，狠狠打击了美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把美国人打到了谈判桌上，但杜鲁门是不会老实认输的。因而适时制定了双管齐下、以打促谈的战略：“充分准备持久作战，争取以和谈结束战争”，命令部队如遇敌人大举进攻，必须大举反攻将其打败。彭德怀也传令三军：“打的坚决打，谈的耐心谈！”

在谈判中，杜鲁门命李奇微以美国海空军优势进行政治讹诈，提出将军事分界线划在中朝军队控制的三八线以北地区，妄图不战而鲸吞1.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遭到拒绝后，美方单方面终止谈判，叫嚷“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

从1951年8月开始，李奇微先后发动夏季和秋季攻势，中朝联军英勇反击，歼敌16.8万人，恰在此时，从莫斯科传来爆炸性消息，斯大林宣布苏联

原子弹爆炸成功，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杜鲁门万般无奈，只好设法请苏联出面打开僵局。

10月5日，杜鲁门、艾奇逊指派美国驻苏大使寇克前往克里姆林宫，会见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以急切的心情请求说：

“部长先生，我奉美国政府之命，请求斯大林大元帅注意朝鲜问题和苏美关系，朝鲜问题是目前最尖锐、最危险、需要立刻解决的国际问题，希望贵国帮助朝鲜谈判圆满解决。如果谈判结局不利，可能在美苏之间造成不良影响，美军司令部反对在开城讨论关于停战的问题，认为这是政治性的问题，然而共产主义集团没有表示出解决国际问题的意愿，苏联在许多国际问题上坚持不可调和的立场，这种态度使美国和其他国家惶恐不安。”

维辛斯基当即指出美国大使自相矛盾的谈话不利于国际形势的缓和，应该找中朝方面直接交换意见。

维辛斯基将此情况上报斯大林，又与中朝交换意见，然后召见寇克指出：

“朝鲜停战谈判延宕的主要原因，正是美军司令部制造的障碍所致。因此，保证停战谈判得到最好结局的办法，就是训令李奇微不要使谈判复杂化，停止制造人为的障碍。大使先生，贵国希望我们帮助使开城谈判圆满结束，可是苏联政府并不是参加谈判的一方，正相反，美国政府却是谈判的一方，因而恰恰是你们应该采取积极步骤，使谈判顺利完成。”

寇克在维辛斯基那里碰了一鼻子灰，只得悻悻打道回府，如实向杜鲁门、艾奇逊汇报，美国总统、国务卿为此伤透了脑筋，也无计可施，恰在此时，接到李奇微报回的金日成、彭德怀给美方的复信：

“目前的问题应该是立即恢复停战谈判，并在双方代表团的会议上，严格规定关于会议地区中立化及会场安全保障的协议，使过去你方的违协事件不再重犯……为此，我们建议：停战会议地区的中立范围，应该扩大成为将开城和汶山都包括在内的一个长形地区，而将会场地址移至板门店，由双方负责保护这一会场地区。”

杜鲁门、艾奇逊见中朝方面态度有所松动，赶紧指示李奇微就坡下驴。回到谈判桌上参加谈判，这正是：

外交史上出奇观，打打停停再接谈。

两手交替斗顽敌，双管齐下凯歌传。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回

破釜沉舟 以打对打战争升级
针锋相对 以谈对谈朝鲜停战

话说美国代表虽又被迫坐到朝鲜停战谈判桌旁，却又蓄意扩大战争，在发动狂轰烂炸的“绞杀战”的同时，又丧心病狂地发动了罪恶的“细菌战”。

毛泽东接到周恩来送来的美国进行细菌战的罪证材料，拍案而起，厉声谴责道：“卑鄙！无耻！杜鲁门被打得无法招架，竟然乞灵于这些害虫！”

周恩来义愤填膺，胸有成竹提出建议说：“主席，我们应该立即做出反应！”

毛泽东迅即冷静下来，做出决断说：“恩来，这件事就由你负责处理。要打好政治仗，也要打好防疫仗，绝不能让敌人阴谋得逞。我相信，全世界人民是和我们站在一起的。”

按照中苏朝商定的战略部署，先由朝中政府发表抗议美国进行细菌战的声明，再由苏联代表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议案，“号召各国参加并批准1925年签订的禁止使用细菌武器的日内瓦议定书”，杜鲁门作贼心虚，急忙命令驻联合国代表予以否决，又让艾奇逊公然抵赖说：

“我愿意坦白地、毫不含糊地声明：这些指责是完全不真实的；联合国军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进行任何形式的细菌战。”

为彻底揭露美国进行细菌战罪行真相，中国派出以李德全为团长的“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到中国东北和朝鲜实地调查，又接受苏联等十几个国家的著名法学家、科学家组成的两个调查团到现场取证，还在北京、沈阳举办美国实施细菌战的实物和图片展览，公布了25名美军被俘飞行员供述的美国关于细菌战的决策情况，并大规模开展爱国卫生防疫运动。不久便挫败了美国发动的细菌战，迫使美军与中朝方面于1952年8月就朝鲜停战草案达成了协议。

为就抗美援朝和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问题与苏联进行协商，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于1952年8月17日抵达莫斯科，斯大林见周恩来身穿呢料中山装，精神焕发，英气勃勃，不无妒意地握着周恩来的手说：

“我们有一年多未见了，我老了，快见马克思了，你还是那样年富力强，春风满面。”

周恩来诚挚他说：“我们希望斯大林同志健康长寿，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做出更大的贡献。”

斯大林热情地称赞说：“你们在朝鲜打得很不错，谈得也好，顶住了美国的巨大压力，全世界人民都称赞你们，你们在世界上的地位提高了，影响扩大了。”

周恩来向苏联同志生动地介绍了两年来反侵略战争取得的巨大胜利，抗美援朝打击了美帝的侵略气焰，打乱了美国侵略世界战争的时间表，鼓舞了世界人民争取自由独立的斗争，推迟了世界大战的爆发。接着介绍了美国阻挠战俘问题谈判的情况说：

“美方的阴谋是：企图以扣留我方十万战俘的无理要求来拖延和破坏谈判。美方借口所谓‘自愿遣返’原则，对我方被俘人员大肆屠杀，进行所谓‘甄别’，企图强迫他们充当李承晚，蒋介石的炮灰。美方的无理主张，是完全违反日内瓦国际公约的，而巨济岛等地我方被俘人员所进行的可歌可泣的英勇反抗，更揭穿了美国侵略者的欺骗宣传。因此，美方代表理屈词穷，

只能连续逃会，片面停会三天，充分表明了美方阴谋的彻底破产。”

周恩来说到这里，中苏领导人津津有味地谈起震惊世界的巨济岛“杜德事件”，会场气氛活跃异常。

原来，侵朝美军在朝鲜南端的巨济岛关押着几万名中朝战俘，美国勾结台湾和南朝鲜当局对中朝战俘以“甄别”为名，严刑拷打，强迫他们“自愿”到台湾和南朝鲜，对女战俘奸淫虐待，无恶不作。

中朝战俘对巨济岛战俘营长官弗兰特·杜德恨之人骨，便巧妙地利用倒便桶的机会，在1952年5月8日，一个人抓住杜德的手，另一个人抱住腰，两个人拖住腿，把这个骄横的肥头大耳的美国准将拉进了铁丝网，在战俘营门口挂出一块英文告示牌：

“我们生俘了战俘营长官杜德准将，绝对保证他的生命安全。待我们和他进行正当的谈判完毕之后，就安全地遣返给你们。如因严重的武装行动而造成不良后果，将由你们负完全责任。”

当时，杜鲁门已任命侵朝美军总司令李奇微代替艾森豪威尔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武装部队最高司令，他正在与新任侵朝美军司令官克拉克交待工作，李奇微像挨了一记耳光，任命美一军参谋长科尔森为新的战俘营长官，调集坦克部队进行血腥镇压。中朝谈判代表从西方记者口中获悉此一阴谋后，向美方提出严重抗议，科尔森才答应了中朝战俘的大部分要求：

“我和前战俘营长官杜德将军承认有过流血事件发生，结果使许多战俘被联合国军打死或打伤。我可以向你们提出保证，今后战俘将根据国际法准则，在本战俘营受到人道的对待。我将在我的职权范围内，尽一切可能防止再发生暴力事件和流血事件。今后如果再发生此类事件，我愿承担全部责任。”

中国官员把美国迫害中朝战俘和双方交涉的材料提交苏方观看，双方官员严厉谴责美国的滔天罪行。

周恩来向斯大林介绍美国谈判代表在朝鲜和平谈判中无耻狡辩、抵赖，常常吹口哨、打瞌睡，一遇理屈词穷就逃离会场。

斯大林气愤地一挥烟斗说：“这是耍赖！”

莫洛托夫一推金边夹鼻眼镜点头道：“世界外交史上也少见！”

周恩来神采奕奕说：“是的，我们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谈判对手。美国侵略者可谓极尽欺骗之能事，一贯进行歪曲、欺骗宣传，例如明明是美方代表在会内提出了要侵占北朝鲜一万两千平方公里土地的要求，在会外却矢口否认；明明是美机轰炸了中立区和会址区我方代表团的住所附近，美方却说炸弹是我方自己丢的；明明是美方屠杀我方被俘人员，美方却说是我方被俘人员‘自相残杀’，但是，由于我方坚决揭露的结果，美方不但没有达到任何目的，反而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了它的无耻面目。”

斯大林听得津津有味，情不自禁地赞叹：“对，对美帝国主义就是要同它进行坚决的斗争！”

斯大林听完周恩来的生动介绍，铅灰色脸上显出欣慰的神情，为中苏在围绕朝鲜战争的国际斗争中占了上风而欣喜万分，诚挚地面向周恩来说：

“中国人民在毛泽东同志和你恩来同志及党中央的领导下，派出中国人民最优秀的儿女，在彭德怀将军的统帅下，奔赴朝鲜前线，抗美援朝，并且在军事上、外交谈判中已经取得辉煌的、空前的胜利，挫败了美国的侵略企图。你们这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大无畏的精神令人钦佩和敬仰，全世界人

民、包括苏联人民将永远感谢你们，记住你们为了和平、正义事业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周恩来感谢苏联对中国的巨大帮助，斯大林又一举烟斗转入他最感兴趣的话题：“周恩来同志，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可以吗？”

众人都认为斯大林将提出最重要的问题，便将目光一齐投向周恩来，只见周恩来向斯大林亲切地一笑说：“当然可以，斯大林同志。”

斯大林爽朗他说：“我想问，美国为什么不愿和谈，尽早解决朝鲜问题呢？”

众人都曾从不同角度考虑过这个问题，却又拿不太准，都想倾听周恩来的高论，只见周恩来高屋建瓴侃侃而谈：

“我正想谈这个问题。我们党中央政治局曾经研究过这个问题，我们认为：美国的垄断资本家利用了侵略战争来增加他们的军火生产的利润。他们在1950年度获得空前巨大的224亿美元的血腥利润，也即是纯利，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每年平均利润一倍多。他们深恐朝鲜和平的实现，将严重地影响他们的扩军备战和发动战争的计划。请看，在即将举行停战谈判之前，《华尔街日报》曾引用一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说：‘假如和平突然实现，我们庞大的军火生产将没有法子可以停下来’。当时的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洛维特也公开发表谈话，担心‘朝鲜战争的结束，将松弛人民对扩军计划的支持’。美国国防动员署署长威尔生说：‘国际紧张的丝毫缓和，都是对美国经济的威胁’。杜鲁门更加露骨他说：‘假如朝鲜问题的解决延缓了我们的动员计划，那就是我们国家最不幸的事情’。人们在这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出美国侵略者一年以来坚持拖延与破坏停战谈判的根本原因。美国侵略者的另一个目的，是妄图利用谈判进行讹诈，以便在会议桌上取得他们在战场上所不能取得的东西。”

斯大林手举烟斗点头称赞说：“分析得非常正确！”

莫洛托夫是以爱挑剔和爱说“不”名闻世界的人，此时像大学教授一般对周恩来的科学分析由衷赞叹：“我完全赞同周恩来同志的估计和判断，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判断，是一位真正的无产阶级外交家的判断！”

周恩来谦逊地将手一摆，以中国人的自豪感继续分析朝鲜战争形势说：

“经过两年的军事斗争和一年的谈判斗争，朝中两国人民的力量更加强大了，美国侵略者则被更严重地削弱了，就连美国侵略者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

“对，连麦克阿瑟也不得不承认，”莫洛托夫以权威外交家身份提供佐证，“自美国开国以来，美国在全世界的声望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低落过，美国很难赢得朝鲜战争。”

斯大林感到欢欣鼓舞，询问今后的谈判方针，周恩来彬彬有礼地阐明中国的方针说：

“根据朝鲜战争和停战谈判的情况以及世界人民的愿望和呼声，我们的方针仍然是：力争和，不怕拖，随时准备打。打对我有利，和对我更有利。在谈判中该争的要据理力争，可让的或不能不让的，看准时机让，但在美国蛮横无理时不能让，虚张声势时不能让，不起作用时不能让。让步必须能够扭转局势，必须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斯大林对毛泽东、周恩来达到炉火纯青的谈判艺术由衷敬佩，称赞中国领导人把美国人的脾气摸透了，询问中国有何困难需要苏联政府帮助。

周恩来正要谈这个问题，便轻轻抿一口浓茶，炯炯有神的大眼扫视会场一周，看着斯大林喜悦而诚恳的表情，才提出要求：

“要应付美方的军事进攻和进行必要的反击，中朝军队都还有些困难，如武器装备、军需供给和掌握制空权等问题，仍需苏联方面提供大量的援助。此事徐向前参谋长曾经率团前来与苏方商谈过，并达成了协议，现在希望苏方尽快按协议执行，同时希望增加一些援助，特别是飞机。如果我们能掌握制空权，那美帝国主义就更没有办法了，失败得更惨。”

为了使苏联直接了解朝鲜战场和谈判的情况，以便协调行动和斗争方针，周恩来还提议，苏联邀请金日成和彭德怀访苏。斯大林欣然接受，完全赞成周恩来的意见，然后，一举烟斗发表经深思熟虑的意见说：

“我们认为，朝鲜战争对美国是个败血症，实际上北朝鲜和中国都没有损失领土，美国也了解朝鲜战争对他们不利，迫切需要停战。如果宣布苏军继续驻在旅顺口，他们将更伤脑筋。美国在朝鲜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在其他方面也就更难以实现自己的想法。停战谈判是一大问题，毛泽东主张忍耐、坚持是对的。我主张分三步走：我方被俘人员以 11.6 万人计算，如果敌人扣留我 30%，我们可以扣留敌人之 30% 左右作为交换，促使敌人改变态度。如不成，第二步可主张先全面停战，然后再解决双方遣俘问题。再不然，第三步可将所谓不愿遣返的战俘，双方交中立国代管，然后由当事国进行访问，陆续接回。”

周恩来对斯大林的意见颇为赞赏，含笑点头，只听斯大林话锋一转，讲到更重要的问题：“关于世界大战问题，你们和毛泽东的估计是对的，但要说明一点，美国没有本领进行世界大战，他的英法朋友更不行，人民也不愿打仗。”

斯大林越说越激动，将手一挥强调道：“我们对美国应该坚持立场，只有硬，才能解决台湾问题、朝鲜问题，公道对美国是不存在的。美国以原子弹和空袭吓人，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决定战争，还是靠陆军！”

斯大林的大无畏气概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代表团成员的士气，他们都对斯大林怀有特别敬佩之情。关于苏联援助朝鲜战争问题，斯大林说：

“周恩来同志提出的问题，我的答复是：关于军事援助，我们同意帮助中国装备 60 个师，但炮弹消耗与敌人一比九是不行的，应该是 20 比 9，必须压倒敌人。”

对中国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斯大林也表示大力支援。他笑着说：“你们运气好，革命获得成功，抗美援朝又取得胜利，所以苏联应该帮助你们。”

1952 年 9 月 1 日，金日成、彭德怀应邀到达莫斯科，斯大林热情接待并对支援朝鲜战争问题发表意见说：

“中朝人民是英勇的，你们打得很好，把美军赶到了三八线。但是。中国空军不能出击到三八线以南，因为空军参战就意味着国家参战，而中国公开参战，对和平阵营是不利的。但是，朝鲜人民军的空军应积极行动，苏联可以援助朝鲜三个空军师，可给中国和朝鲜各一个师的喷气式轰炸机，给朝鲜再增加 5 个高射炮团，2000 辆汽车。”

斯大林设盛宴招待彭德怀和金日成一行。他让彭德怀斟满一大杯白酒与他干杯。金日成知道彭德怀有胃病不宜多饮白酒，自己又不好阻拦，便向周恩来投去求援的月光。

周恩来非常了解彭德怀，相信自己的老战友完全能够处理好这一问题。只见彭德怀豪情满怀，同斯大林碰杯后一饮而尽。斯大林脸上露出喜悦的神情，极其欣赏彭德怀的豪爽性格和气度，仔细端详彭德怀大半天，好像在寻找彭大将军战胜美国佬的奥秘。

斯大林又和周恩来研究中苏联合对付美国侵略的方策，他提出新设想说：

“现在看来，美国急于找一条出路解决朝鲜停战问题。联合国已失去它应有的作用，我要给毛泽东写封信，请你带回去，我们应为新的联合准备条件，应设法促成亚洲国家区域联合，如果成功，苏联亦可参加。”

周恩来避开苏联参加亚洲区域联合问题，巧妙地回答说：“我们现在对联合国不感兴趣，现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大会甚好，可为亚洲的联合，准备群众基础。这样，可以迫使亚洲国家的某些政府赞成区域联合。”

斯大林对此感到意外，急忙劝周恩来说：“不要急，区域联合是要政府参加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大会应以和平为中心，一切围绕着为争取和平做斗争，能争取日本、印尼、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参加很重要。”

斯大林喝一口特制的混合酒，转移话题说：“我听彭德怀同志说，朝鲜战争很艰苦，志愿军有时连水都喝不上，饭也吃不饱，而且都是冷的，你们是否愿意东欧国家提供帮助？他们也可以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

周恩来笑着表示欢迎说：“哪有不愿东欧国家帮助的道理？谁向我们提供援助都欢迎！”

这时，杜鲁门为给即将到来的美国总统大选创造条件再次当选，指示侵朝美军从1952年10月4日开始发起“金化战役”。中朝部队在苏联和东欧国家声援支持下，进行全线战术反击和上甘岭战役，美军在3.7平方公里的战场上投入6万兵力，投下成千上万吨炸弹，把上甘岭山峰削去2米多。

志愿军坚守坑道殊死奋战，采取“无中生有”之计开展骚扰战，先往准备出击的方向扔个空罐头盒子，美国兵立刻朝发声的地方开枪开炮。志愿军战士又第二次扔出罐头盒子，美国兵又猛烈扫射。到了第三次，美国兵就没有反应了，志愿军突击小分队立即乘机出动，跃出坑道，转眼间就把距坑道口20米远的两个美军掩体炸上了天。当美国兵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时，志愿军小分队早已安然无恙地撤回坑道。

志愿军在上甘岭与美军激烈搏斗，反复争夺，歼敌2.5万余人，彻底粉碎了美国的“金化攻势”，上甘岭成了美军的“伤心岭”。美国军官哀叹说：“即使使用原子弹，也不能把丘岭和爸爸山（即五圣山）上的共军全部消灭”。此后，美军再也没有发动什么像样的攻势。

杜鲁门对战场上的失败很不甘心，又利用召开第七届联合国大会的机会，命国务卿艾奇逊做长篇发言，推卸发动朝鲜战争的责任，提出美、英等21国提案，迫使朝中方面接受所谓“自愿遣返”的原则，形成对朝中方面的强大压力。

经中、苏、朝紧急磋商，由苏联代表维辛斯基在联大提出解决朝鲜问题的方案，主张立即全面停火，全部战俘遣返问题交给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委员会解决。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支持苏联的主张。

正当中美意见尖锐对立之际，印度驻联合国代表梅农上美国的当，提出解决朝鲜问题的方案，主张把战俘交中立国组成的遣返委员会，在90天内根据1949年日内瓦公约和不得使用武力阻止或强迫战俘遣返的原则加以处

理； 90 天后仍未解决，则交由高级政治会议讨论处理；如其后 35 天仍未解决，则交联合国处理。

艾奇逊觉得印度方案可以利用。周恩来敏锐地识破美国的阴谋，立刻给予无情揭露。

在朝鲜问题上，打又打不赢，谈又谈不拢，美国总统杜鲁门被搞得焦头烂额。此时，美国大选已经临近，他感到自己很难连任，为保住民主党政权，他请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以民主党身份参加美国大选，但艾森豪威尔看到侵朝战争使民主党声名狼藉，便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身份参加大选，并向美国选民许下停止朝鲜战争的诺言。

1952 年 11 月，艾森豪威尔在大选中获胜，登上美国总统的宝座。

杜鲁门有意挖苦艾森豪威尔，在给他祝贺的电报中说：“如果你仍旧打算去朝鲜，‘独立号’（总统座机）将听你调遣。”

艾森豪威尔不顾杜鲁门的嘲讽，就任前于 1952 年 12 月 2 日乘一架普通运输机飞往朝鲜，听取前线指挥官的报告，到前沿观察哨所，通过望远镜观察中朝阵地情况，以美国陆军五星上将的军事经验得出结论说：

“看来，他们已找到一个保护自己万无一失，同时却能以炮火不断袭扰我方阵地的办法。他们不怕烦劳，开凿了直通山顶、大得足以容纳大炮装备的坑道。他们通过坑道推出大炮进行射击，打完就撤。显然，他们已经做了一项很费力气的工作，同样明显的是他们有充分的人力可以使用。”

私下里，艾森豪威尔对他的老部下讲出他的无可奈何的客观结论：

“鉴于敌人阵地的力量已得到加强，任何正面的攻击都将碰到巨大的困难。”

可悲的是，这位五星上将的客观结论并未使他做出明智的决定。在他入主白宫后，1953 年 2 月 2 日发表国情咨文，宣布撤销台湾“中立化”，放蒋介石出笼参加侵朝战争，并让美参谋长联席会议发布命令称：

“现行紧急指令中关于保证台湾和澎湖列岛不被用作中国国民党向中国大陆作战的基地的那部分内容现在予以撤销。”第二天，艾森豪威尔亲自同出兵朝鲜的 16 国代表会见，宣称要对中实行封锁政策，还企图对中国的沿海地区发动进攻。

美国的强硬政策吓不倒中朝人民，反倒吓坏了它的侵朝盟友，英国等欧洲国家强烈反对艾森豪威尔的做法。美国一些高级官员也指责艾森豪威尔自食其言，言而无信。

毛泽东、周恩来摸透了美国人的脾气，认为美国虽然气势汹汹，其实色厉内荏，艾森豪威尔不会一硬到底，他们指示在朝鲜指导停战谈判的乔冠华研究，可否再给美国一个台阶下，由我方主动提出复会。

乔冠华不愧为老练杰出的外交家，他提出建议说：一动不如一静，让现状拖下去，拖到美国愿意妥协并由它采取行动为止。

毛泽东、周恩来非常欣赏乔冠华的意见，毛泽东风趣他说：“‘乔老爷’果然不白坐轿，美国人很有可能再次找苏联。”

艾森豪威尔骑虎难下，忙把他的国务卿杜勒斯请来密商对策。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 1888 年生于华盛顿市的一个牧师家庭，其外祖父和姑父都曾任国务卿。他青年时期就对外交产生浓厚兴趣，曾代表美国参加过海牙会议、旧金山会议、伦敦外长会议、联合国大会、莫斯科外长会议、巴黎外长会议，具有丰富的国际斗争经验，被艾森豪威尔选中，视为左右手，

后来成为美国历史上出访列国最多的国务卿之一。

艾森豪威尔夫人杜德为杜勒斯献上威士忌酒，请他随意享用，美国总统立刻发现这两人形成强烈的反差。

杜德夫人虽 57 岁，却丰韵犹存，身穿粉红色长袍，姿容依然苗条秀美，有着一头褐色的长发，一双会微笑的蓝眼睛，适度的一笑常使她容光焕发。

国务卿杜勒斯却是个不修边幅、不拘小节的人，身上的西装染上了绿色，领带很不讲究，脚上的袜子脱落了一大截。他用粗大的食指将威士忌酒一拌就大口喝了起来。

杜德夫人知道此人虽其貌不扬，但却有他人少有的长处，那就是熟谙外交谈判艺术，疯狂反共，对总统绝对忠诚，他的讲话和发言都征求总统的同意，从不乱放炮，不随便捅漏子。

艾森豪威尔被朝鲜问题搞得心烦意乱，想让杜勒斯去找斯大林帮忙，因为斯大林 1952 年 12 月 25 日答《纽约时报》记者问时曾讲过这样的话：

“苏美之间的战争不能认为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两国在今后也能够和平共处，我愿意与艾森豪威尔总统进行会谈，苏联是关心结束朝鲜战争的，愿意在结束朝鲜战争问题上同艾森豪威尔合作。”

这时，杜勒斯身向前倾，哼哼唧唧说：“不用去求斯大林，没必要！”

艾森豪威尔有些吃惊：“你有何良策？”

杜勒斯声调平淡他说：“我‘捡’到了一把可以打开僵局的‘钥匙’。”

艾森豪威尔见杜勒斯特别强调“捡”和“钥匙”，迫不及待地问：“你捡到什么钥匙？”

“红十字会日内瓦会议决议。”

艾森豪威尔知道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1952 年 12 月中旬曾在日内瓦通过一项决议，倡议朝鲜停战前双方先交换伤病战俘，虽然已时过两个月，但仍不失为一个可资利用的机会，便命参谋长联席会议给侵朝美军总司令克拉克下达指令，让他先给金日成、彭德怀写信试试看。

于是，克拉克于 2 月 20 日给金日成、彭德怀写信，提议遣返重病重伤被俘人员。毛泽东、周恩来抓住这个重要信号，与苏联和朝鲜进行紧急磋商，准备走出关键性一步。

恰在此时，斯大林于 1953 年 3 月 5 日因脑溢血逝世，毛泽东惊愕之余，亲自挥笔撰写吊唁电和《最伟大的友谊》一文，对斯大林的巨大贡献予以充分肯定：

斯大林同志充满了对于东方被压迫人民的热情。“不要忘记东方”——这是斯大林同志在十月革命之后的伟大号召。人们都知道：斯大林同志热爱中国人民，认为中国革命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在中国革命问题上，他献出了崇高的智慧。

毛泽东深知围绕斯大林逝世将展开更为复杂的国际斗争，他派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前往莫斯科相机而动。

当时苏联情况很复杂，斯大林没有指定接班人。他逝世后，马林科夫被任命为党中央书记、部长会议主席，但马林科夫在政治上幼稚软弱，缺乏战略决策能力。赫鲁晓夫和贝利亚野心勃勃，图谋伺机夺权，因而都极力拉拢周恩来。周恩来则以大局为重，规劝苏联领导人团结起来，共同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认为斯大林逝世后，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非毛泽东

莫属，毛泽东肯定会出现在莫斯科红场上，然而在3月9日的隆重的追悼大会上，他未看到毛泽东的踪影，却看到了周恩来。艾森豪威尔吃惊的是周恩来并未置身于外宾队伍之中，而是站在苏联领导人中间，并且是享受此殊荣的唯一外国领导人。

使艾森豪威尔又吃一惊的是在炮车拉着斯大林的灵柩离开时，周恩来又与赫鲁晓夫、马林科夫、贝利亚并排走在灵柩的正后面。艾森豪威尔看到美国在朝鲜战场上的头号对手周恩来已成为世界舞台上的重要人物。他纳闷周恩来为什么会在共产主义世界享有如此巨大的权威和占据这样的重要地位，从而感到在朝鲜问题谈判中需要认真对待这位共产党要人。

周恩来抓紧参加斯大林葬礼的间隙时间，与苏联新领导人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就国际局势和中国经济建设，特别是朝鲜谈判问题充分地交换看法，又征求朝鲜领导人的意见，决定向美国发动新的和谈攻势。他先让金日成和彭德怀于1953年3月18日复信侵朝美军总司令克拉克，同意美方提出的先行交换病伤战俘的建议，而后周恩来以总理兼外交部长身份于3月20日庄严发表正式声明称：

“谈判双方应保证在停战后立即遣返其所收容的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而将其余的战俘转交中立国，以保证对他们的遣返问题的公正解决。”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对周恩来的新建议甚感吃惊，他将信将疑，最后终于承认中国的新建议有价值，指示侵朝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立即研究。

在中苏和世界爱好和平国家的强大压力下，美国谈判代表被迫回到谈判桌旁，4月11日与中朝方面签订了遣返病伤战俘的协定，但美方仍设法拖延破坏。

在美国的纵容下，李承晚1953年6月17日竟以就地“释放”战俘为名，强行扣留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2.7万余人，并公然叫嚣要“继续打下去”，“打到鸭绿江”。

李承晚的倒行逆施受到中苏和世界各国的强烈谴责，艾森豪威尔竭力推脱责任，声称此事与美国无关。毛泽东认为，需要再给艾森豪威尔一点儿颜色看，便在6月19日及时对志愿军总部做出指示：

“此时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的争吵和分歧正在扩大，我们必须在行动上要有重大表示方能配合形势，给敌方以充分压力，使类似事件不敢再度发生，并便于我方掌握主动。”

根据毛泽东、周恩来指示，志愿军决定在西线以打击李承晚为主，适当打击美军，暂不打击英军，以分化瓦解敌军，促进停战谈判。

7月13日深夜，浓云密布，伸手不见五指，志愿军突然开动一千多门大炮，铺天盖地向李承晚部队阵地猛轰，两个卡秋莎火箭师以雷霆万钧之力齐轰，李承晚部队阵地一片火海，志愿军主力乘势发起勇猛冲击。

根据擒贼擒王的计策，志愿军第203师担任歼灭伪首都师“白虎团”的任务。因为“白虎团”是李承晚亲自培养的精锐部队，武器精良，作战勇猛凶狠。为歼灭这个劲敌，志愿军派出以侦察排副排长杨育才为首的侦察班，巧妙化装成南朝鲜部队，灵活采用避、骗、打、抓等巧妙战术，直插二青洞“白虎团”团部所在地。

当时“白虎团”正在召开指挥官会议，杨育才命侦察班13人分三路突然发动攻击，当场毙伤“白虎团”军官45人，活捉19名，捣毁了敌伪团部，切断了通讯联络，使“白虎团”失去集中统一的指挥，志愿军第203师乘机

发动进攻，将“白虎团”一举歼灭，把战线向南推进了10公里。

志愿军各部队乘此大好形势发动猛烈进攻，共毙伤俘敌7.8万余人，缴获坦克45辆，汽车279辆，收复土地178平方公里，敌人的处境更加不利，不得不于1953年7月27日在板门店与中朝签订了《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及其临时补充协议。

为压美国使其制止李承晚破坏停战协议，中朝首席代表南日将军以胜利者姿态，像在正义的法庭上审判罪犯那样，质问美方首席代表哈里逊：“究竟联合国军司令部能不能控制南朝鲜政府和军队？”

哈里逊一向傲慢无理，此时再不敢吹口哨，再也不翘二郎腿，老老实实坐在那里，像接受审判的被告一样，低声回答：

“由于谈判所取得的成果，你方可以确信联合国军统帅部，包括韩国军队在内，已准备履行停战协定的各项规定。”

南日将军脸上露出胜利者的微笑，乘胜追问道：“对于已经达成的停战协定的实施，你方能保证南朝鲜政府和军队不进行阻挠和破坏吗？”

哈里逊暗骂李承晚弄得他如此丢人现眼，但也只得硬着头皮回答：“我方保证，韩国将不以任何方式阻挠停战协定条款的实施。”

南日将军仍不放心，又追问道：“如果李承晚进行破坏怎么办？”

哈里逊拍着胸脯保证道：“如果韩国进行任何破坏停战的侵略行为，联合国军将不予支持，并承认朝中方面有权采取必要行动抵抗侵略，保障停战。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联合国军仍将保持停战状态，也不向韩国提供武器弹药，包括物资装备在内。”

南日将军还把哈里逊所作的保证以声明的形式公诸于世，昭告天下，可谓大快人心。

1953年7月27日，板门店成了举世瞩目的地方。上午9时左右，这个小村庄热闹起来，各式车辆相继开来，200多名记者从各地赶来采访朝鲜停战的“头号新闻”。

板门店签字大厅布置得庄重典雅，方便实用，一双双眼睛直盯着双方的签字代表南日和哈里逊，只见两人分别在本方助签人员协助下，在本方准备的9本停战协定上签字，然后由助签人员交换文件，在另9本停战协定上签字。签字后，双方也没有看对方一眼就起身退出签字大厅。

当天，18份停战协议文本分别由金日成、彭德怀、克拉克签字。

同一天，金日成和彭德怀下达停火命令，彭德怀激动地向世界宣告：“全世界人民所渴望的朝鲜停战现在已经实现了！”

克拉克则怀着复杂的心情说：“在执行我政府的训令中，我获得了一项不值得羡慕的荣誉，那就是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的痛苦。我想，我的前任麦克阿瑟与李奇微两位将军一定具有同感。”这正是：

发动战争激众怨，实现和平笑开颜。

艾克苦恼无奈何，几家发愁几家欢。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回

高瞻远瞩 日内瓦斗败杜勒斯 各个击破 搞统战分化美英法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国务卿杜勒斯对世界头号强国在三年时间里，伤亡美军数十万，耗资上百亿，却打了个美国开国以来第一个战而不胜之役，被迫与中朝签订停战协定，极为恼火。杜勒斯声称这决不是对中国“自愿拿出来的和平礼物”，必欲消灭新中国而后快。艾森豪威尔则用较文雅的语言表达美帝国主义的妄想：

“我们仅在一个战场上赢得了停战——而不是世界和平。我们现在不能放松警惕，也不能停止我们对和平（作者按：应读作“战争”）的追求。”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国务卿杜勒斯并没有从朝鲜战争中接受真正的教训，又将魔爪伸往印支三国，扩大越南战争，使国际局势更加紧张而复杂。

当时无法否认的事实是新中国如旭日东升，在朝鲜打败美国及其16国仆从军，使中国国际威望显著提高，成为世界五大强国之一。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在1954年1月25日至2月18日举行的苏美英法四国外长会议上，苏联出于减少其国际压力和改善被孤立的地位并增强社会主义阵营力量的考虑，邀请中国参加解决朝鲜和印支问题的日内瓦会议。

杜勒斯起初强烈反对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后来感到解决朝鲜和印支问题离不开中国，同时，四国外长会议，又明确规定让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不等于外交上承认它，这才勉强同意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认为，美国的做法是事实上承认中国为世界五大强国之一，是打开中国外交局面的第一个重大外交举动，决定派国务院总理兼外长周恩来率精兵强将出征日内瓦。

周恩来欣然受命，便于1954年4月1日带领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前往莫斯科，磋商中苏在日内瓦会议上联合起来与美国斗法的方针和策略。苏联领导人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莫洛托夫认为，这是斯大林逝世后中苏与美国的初次较量，他们都没有斯大林那样巩固的地位和崇高声望，很需要借重如日东升的新中国和周恩来的巨大声名和威望，因而在克里姆林宫隆重接待周恩来和张闻天。

周恩来高屋建瓴分析这次日内瓦会议的巨大意义说：“中国、苏联、朝鲜、越南能够一道出席这次国际会议，这就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是我们的一个胜利。假如我们能够很好地利用参加这次会议的机会，阐明对各项问题所持的原则立场和对若干有关问题做出解释和澄清，就是有收获。如果能解决某些问题那就有更大的收获。”

周恩来感到苏联有在国际会议上同美国斗争的经验，而中国是首次参加这样的国际会议，因而真诚希望苏联介绍经验，双方密切联系，交换意见，互通情报，统一口径，协同动作。

赫鲁晓夫欺侮马林科夫政治上软弱，不等第一把手讲话，就抢先以权威口吻说：“这虽然是一次带有政治意义的国际会议，但对它不必抱有太大的希望，也不要期望它能解决多少问题，它可能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结局是我们难以预料的。”

赫鲁晓夫又大讲帝国主义国家的日子并不好过，要争取获得政治收获。莫洛托夫介绍了苏联的外交经验。双方约定，中国代表团提前两三天到达莫斯科，听取苏方介绍国际会议上的斗争经验和应注意的问题。

周恩来从莫斯科返回北京后，加紧出征准备。在出发前的 1954 年 4 月 19 日深夜，周恩来突然接到毛泽东打来的电话，寒暄之后谦恭地问道：“明天，我就要率领代表团去日内瓦了，主席还有什么指示吗？”

毛泽东爽朗他说：“指示那倒没有，但我要为你送行。”

这使周恩来很不安，急忙劝阻道：“不，主席的心意我领了，明天上午飞机就要起飞了，现在已经是深夜了，你还没有休息，再到机场送我，岂不太劳累了？千万不要去了。”

毛泽东却有他的独特主意：“机场我可以不去，由朱德、少奇、陈云他们代劳，我想在一个仙境的地方为你送行。”

周恩来一时转不过弯，喃喃自语道：“仙境，仙境，哪里有仙境？”

毛泽东哈哈大笑。周恩来恍然大悟：“你说是瀛台？”

毛泽东这才道出真意：“对，对极了！我请你在那里宵夜，我已叫大师傅搞点小吃，放下电话，我们就去好吗？”

周恩来一股暖流涌上心头，急忙托辞谢绝。但毛泽东却对中南海的夜景兴叹不已：“多么好的夜景啊！恩来，我们快去吧！”

毛泽东盛情邀请周恩来同登瀛台的中心涵元殿楼，特意要请周恩来饮其特别爱喝的龙井茶，一同欣赏四面环水，绿柳掩映楼台亭阁的瀛台夜景，畅谈瀛台作为三神山之一的神话传说，纵论这个曾经关闭光绪皇帝的场所的今昔巨变，毛泽东豪情满怀提议：

“我没有准备酒，就到那里以茶代酒祝你一路平安，马到成功！”

周恩来深表谢意，坚持在电话里送行，毛泽东只得表示同意，周恩来慢慢把话转入正题：“主席，你对日内瓦会议问题还有什么指示？”

毛泽东无限爱惜地嘱咐：“没有什么指示。我请你到瀛台，是让你放松一下。你一直很忙、很累，为了出席日内瓦会议更是日夜操劳，到了会上斗争激烈，会更忙更累。你要注意身体，注意休息。礼记云：‘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你这个人哪，只会工作，不会休息。”

周恩来怀着感激之情点头应承道：“谢谢主席对我的关心，我一定注意劳逸结合。”

毛泽东在电话里满意地笑着出主意说：“当然啰，这次日内瓦会议对我们国家、对世界和平关系很大，你的担子很重，把会议开好，开出成果，这是头等大事，但是也一定要张弛有致，劳逸结合。”

毛泽东又在电话中庄重地授权说：“关于日内瓦会议，中央已批准你提出的方针，并且已授权你全权负责，没有大事，特殊的事，也不必请示中央，或者请示了中央也不一定批复。”

周恩来深感责任重大，一股被信任的自豪感油然而生，决心更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只听毛泽东继续说下去：

“朝鲜战争，我们是逼着鸭子上架。现在印度支那战争还在进行，我们要给予大力的支援，负担很重。当然这是为了印支人民的解放事业，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可是我们国家从鸦片战争以来，屡受外国侵略，战祸不断，经济落后，生活贫困，亟需有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休养生息。所以，我们非常希望日内瓦会议能够达成一些协议，使朝鲜的和平得以巩固，印度支那战争能够停止下来，哪怕是停它一段时间也好。”

周恩来聚精会神地听着毛泽东的发自肺腑之言：

“有人误以为我们是好战的，其实，我们最不希望再打仗而最需要的是和平，是最爱和平的。我们代表团要高举和平的旗帜，协商的旗帜，为了和平，我们可以做出必要的让步和妥协。”

周恩来心里更有了底，心悦诚服地表示说：“主席说的对，我们是要和平，不要战争，国内国际都迫切需要和平，这是中国人民的要求，也是世界人民的愿望。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也更坚定了我的信心和决心。我一定努力去做，尽可能争取达成一个和平的协议。时间不早了，主席该休息了。”

毛泽东又谆谆嘱咐说：“那就有劳你了，我等待着你们前方的好消息。我想我们代表团既要同敌人斗争、周旋，也要做好友方的工作，特别是为了取得协议，要做出一些必要的让步和牺牲时。须说服他们从大局、长远利益出发。”

周恩来频频点头答应，毛泽东深情地再次在电话中告辞说：“这你比我有经验，有办法，一定可以做好！”

1954年4月20日，周恩来带着中国人民的无限希望，率领中国代表团乘飞机离京启程。陈毅特意诵吟填写的《满江红送周总理赴日内瓦》，为中国代表团送行：

朝战方停，今又喜越南报捷。
域内事，农林恢复，更兴工业。
国营经济蒸蒸日上，私有厂商齐改辙。
不数年，风貌一番新，新中国。
板门店，谈未歇；
日年瓦，话重说。
换唇枪舌剑，议倾坛席。
不管豺狼多诡计，我方事事持原则。
看我公樽俎折强权，期赢获。

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在莫斯科停留两天，邀请苏联外交部领导介绍国际斗争经验，又与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南日、胡志明、范文同进一步协商中苏朝越的谈判方针，然后于4月24日下午3时半抵达日内瓦。

新中国第一个高规格代表团出现在欧洲名城日内瓦，立刻引起各国记者的广泛注意，都想一睹周恩来的风采。只见周恩来身着黑色中山装，外套深灰色夹大衣，头戴黑色礼帽，神采奕奕走下舷梯。他端庄的仪表、潇洒的举止，立刻引起众人的注意，成为西方记者争相报道的中心人物。

各国舆论把中国代表团到达日内瓦视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认为由于新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才会成为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

周恩来保持清醒的头脑，认为要对付势力强大、国家众多的西方阵营，必须与苏联等国紧密合作，因而特意去机场迎接苏联代表团。

那时候，在朝鲜战争中得利最大的是苏联。它没有派兵赴朝参战，仅向中国派出13个空军师担负防空任务，向中国提供了64个陆军师和22个空军师的装备，其中大部分还是有偿提供的，但却使美国处于被动的境地，并借此巩固了它在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但这时苏联处于斯大林逝世后的领导班子调整时期，为对付美国和西方阵营，特别注意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

正因为如此，莫洛托夫一见周恩来亲自到机场迎接他，便与周恩来亲切握手，热烈拥抱，有意让记者拍下中苏领导人拥抱的历史性镜头。

莫洛托夫在机场以老外交家派头发表简短讲话，针对杜勒斯死不承认新中国的态度，特别强调中国已成为世界五大国之一，其外交政策是反对战争和争取和平的。莫洛托夫有意摆出中苏联合起来与美国斗争的架势。

莫洛托夫有意与周恩来并肩而行，亲切地边走边谈，西方记者爬上机场通道的栏杆、墙角和窗口，大声地呼喊：“周恩来，周恩来！”

莫洛托夫作为世界闻名的伟大政治家和外交家，见西方记者如此对周恩来发疯般着魔呼叫，他为周恩来感到骄傲，灵机一动对周恩来说：“我们稍微走慢一点儿，站下来，略谈几句，给他们留下几个镜头。”

周恩来含笑表示同意，两人走走停停，说说笑笑，并肩步入候机厅休息室。西方记者纷纷拍下历史性镜头，认为这是中苏联合对抗美国的生动写照。

当时，美国是世界头号强国，艾森豪威尔认为斯大林逝世对美国称霸世界极为有利，企图利用新的苏联领导班子尚未完全组成的时机，向苏联提出召开以讨论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为主题的日内瓦会议，与苏联争夺势力范围，加紧对亚洲国家进行控制，但召开此会议没有中国参加不行，美英法等国与中国没有外交关系，只有通过苏联邀请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

杜勒斯久闻周恩来的大名，一到日内瓦，顾不得欣赏这座欧洲名城的秀丽风光，就迫不及待地询问：“周恩来到了吗？”

当美国官员汇报中国外交官没有丰富的外交斗争经验，而且穿着单调，都穿一色黑中山装，被瑞士人误以为是传教队而纷纷驻足脱帽致敬时，杜勒斯脸上露出轻蔑的笑容。

美国外交官还向杜勒斯讨好他说：“这样的乡巴佬，怎是堂堂美国外交官的对手！”

杜勒斯虽未见过周恩来，但却深知周恩来的厉害，如何与周恩来相斗，他早已有考虑，因此，厉声斥责道：“周恩来不是乡巴佬，更非等闲之辈——向美国外交官传达我的命令，不准任何人与中国代表握手！我不希望在日内瓦会见周恩来，除非我们的汽车相撞！”

1954年4月26日下午3时05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日内瓦国际会议，在瑞士国际联盟大厦理事会会议厅隆重开幕。

杜勒斯本来被排在4月27日发言，但却突然提出把发言推迟到次日。人们分析起码有三个原因：一是朝鲜代表南日的讲话击中美国要害，需要修改发言稿；二是对莫洛托夫任会议主席时选定葛罗米柯、中国的师哲为副手强烈不满；三是有意与周恩来在同一天发言，与周恩来争个高低胜负！

这样，4月28日杜勒斯与周恩来的发言就成了人们最感兴趣的焦点。

这一天，日内瓦冷风嗖嗖，雪花飞舞，杜勒斯把一股冷气带进热气腾腾的会场。人们不由得把注意力集中在大名鼎鼎的杜勒斯身上。

人们发现，他的面目虽不像人们传说的那样狰狞，但却脸色阴沉，傲慢，不苟言笑。怪不得人们给他送了个“雷管”的绰号。他之所以有此绰号，这固然是因为他在做癌症手术时，胃里放了一支镭管（“镭”与“雷”同音，借用），但更重要的是此人骄横阴森，是个危险人物。他虽有兴趣同中国探索缓和紧张关系及使美在押人员获释的可能途径，但他对中国竟敢同美国在朝鲜打仗怀恨在心，一心想把中国压服了再说。

只见杜勒斯以霸主姿态走上讲台，对谁都不着一眼，就死板地读他那枯燥的发言稿，玩弄贼喊捉贼的伎俩。把朝鲜战争的责任推给中国，要求中国军队撤出朝鲜，然后阴沉着脸走下讲台，而且不回美国代表团席位而走出会

场，钻进他那辆大型福特牌轿车，匆匆绝尘而去。

周恩来见此公如此缺乏外交风度，不由轻轻摇头：“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然后健步走上讲台，其庄重又潇洒的风度与杜勒斯判若两人。

美国副国务卿、代表团副团长史密斯见杜勒斯不辞而别，暗想“算我倒霉，我只能替杜勒斯挨骂了”，但出乎预料，他听到的却是周恩来那语调平和又富有哲理性的发言：

“今天，苏联、美国、英国、法兰西、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外长坐在同一张桌前，审查和解决最迫切的亚洲问题、这还是第一次。”

接着，周恩来指责杜勒斯刚才的发言不符合亚洲人民的利益，主张通过和平谈判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周恩来的讲话立即引起强烈反响。

这样，中美两国的发言便形成了尖锐的对立，中国和美国成了日内瓦会议上的主要对手，周恩来与杜勒斯便成为对立阵营的主帅。

杜勒斯感到周恩来斗争艺术高超，便让副国务卿史密斯向莫洛托夫打听与周恩来交涉的方法。史密斯是个幽默开朗的人，他对莫洛托夫说：

“我对阁下十分敬佩，都说你是很难对付的谈判者，人称“不”字先生，毫不妥协！”

莫洛托夫用手一理银灰色头发笑了起来，然后以手指着自己
的大鼻子，开玩笑说：“我算什么？周恩来才叫难以对付呢！”

史密斯认真地提出杜勒斯让问的问题说：“阁下所言很对，请问怎样同周恩来打交道？”

莫洛托夫以实相告：“周恩来为人正直，可以私下接触！”

史密斯回来向杜勒斯一汇报，杜勒斯就训斥说，美国与中国互不承认，怎能私下接触？岂不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因此他严禁美国人和中国人握手；周恩来主动与杜勒斯接触，杜勒斯却扭头逃跑。

为打开日内瓦会议僵局，周恩来与莫洛托夫商定分化西方营垒的方策。莫洛托夫先把周恩来与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请到苏联的别墅赴宴。

周恩来知道杜勒斯蛮横地指责英国不在日内瓦会议上“驳斥中共的谴责”，搞得艾登很恼火，英美之间产生了隔阂，就主动请艾登饮咖啡。艾登指着沙发上的水果说：“苏联什么水果都有，就是没有菠萝。”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莫洛托夫存心给中英间搭桥铺路说：“但是中国有，中国是一个极其富有的国家。”

艾登早就对古老的中国有神秘感，他不无遗憾他说：“是的，可惜我没有去过中国。”

莫洛托夫趁热打铁：“艾登先生应该到中国去一次。”

艾登兴致勃勃地对周恩来说：“甚愿如此。我告诉你一件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与我同伍的一个军官叫哈门，他在战争中牺牲了。上星期他的弟弟写给我一封信，要我信任周恩来先生的每一句话，他说他熟悉周恩来先生。”

接着，艾登脸呈乞求之色说：“你们两位，或者你们两位中的任何一位，可否劝劝胡志明，让法国的伤兵从越南撤走？”

周恩来说，此事应由交战双方谈判解决。

莫洛托夫劝艾登利用英美有共同语言的有利条件，做美国人的工作，让美国人不要太冲动。

艾登双手一摊苦笑说：

“有一个剧作家曾经说，英国和美国之间除了语言共同之外，别无共同之处。”

周恩来双眼炯炯有神，以有力的语言，指出问题的实质说：“美国丧失中国之后，它不甘心，因此就威胁亚洲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但是中国人民是吓不倒的，相反，美国人民却被弄得神经紧张。”

艾登固执地讲他的见解称：“美国人也有他们的看法，他们曾对蒋介石热烈支持，英国对蒋介石从来就不是很热心。美国人又认为他们在中国做了许多善意的事，我指的是支持蒋介石以外的事，如传教、救济等等，而美国人认为现在中国人是以怨报德。”

周恩来据理驳斥说：“问题的中心正是因为美国帮助蒋介石压迫和屠杀中国人，中国人怎么能对美国满意？”

艾登才华横溢又富有应变能力，巧妙地转移话题说：“实际上，英国在中国的损失要比美国大得多，但是美国人总强调在中国做过善事，中国不要以怨报德，这种心理上的感觉是在起作用的。”

周恩来微微一笑驳斥说：“但是美国人不要忘记在中国干的大量坏事，算起历史的帐来，英国并没有损失。”

坦率的谈话使中英外长相互了解了对方的观点，彼此都肃然起敬。接下去双方谈到改善中英关系和召开日内瓦会议的小型会议问题，关系有了显著改善。

在小型会议上，周恩来面对面地“将”杜勒斯的“军”说：“我们到这里来是解决问题的，不是来跟你们吵架的，不要摆出一副指责别人的架势。你的讲话没有提出具体的建议，你究竟准备怎么解决，把你的方案拿出来嘛！”

杜勒斯一下被打乱了阵脚，慌忙中提不出任何合理建议，只强调必须由联合国监督朝鲜选举；周恩来指出联合国已是朝鲜战争的交战一方，根本无此资格。杜勒斯哑口无言，又多方狡辩，但嚣张气焰被打了下去。

几个回合斗下来，杜勒斯对周恩来越来越加敬畏，自知不是这位著名外交家的对手，加之得癌症后体力渐感不支，便于1954年5月3日在日内瓦发表离去声明，为自己找台阶下说：

“我在积极地参加了第一周的日内瓦会议之后即将返回华盛顿。我是按照我在柏林会议决定召开日内瓦会议时，向皮杜尔先生、艾登先生和莫洛托夫先生所表示的意图离去的。那时，我说，我只能参加头几天的会议。美国副国务卿史密斯将军接替我的职务，继任美国代表团团长。史密斯将军在军事及外交方面的经验将使他能够权威地处理日内瓦会议所要讨论的一切问题。”

根据周恩来指示，由乔冠华、吴冷西组织、修改的《人民日报》述评《杜勒斯就要回家了》，对杜勒斯进行辛辣讽刺说：

“杜勒斯反对从朝鲜撤退美国侵略军的‘理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撤退只意味着什么5英里，而美国军队的撤退却意味着5000英里，回到朝鲜至少需要几个星期！这种‘雄辩’简直已经成了这里的新闻记者们的一种笑料了……地理上的距离既是不会改变的，美国军队也就可以永远不从朝鲜撤退吗？”

经周恩来卓越斗争艺术的争取，艾登对中国的态度有了显著转变，法国外长皮杜尔却顽固地追随美国，周恩来便与莫洛托夫、范文同、南日协商，

决定适当打击法国拉尼埃政府，在日内瓦和越南同时行动。

在美国支持下，法国拉尼埃和越南保大政府气焰嚣张，法国、南越代表皮杜尔、阮忠荣指着越南代表范文同的鼻子大骂：“你们的政府在哪里？你们不过是影子政府！”

那时越南人民军打得不顺利，武元甲忧心忡忡说：“我们损失太严重了，我们的精锐部队几乎全搭进去了！”

周恩来敏锐地感到，不打下奠边府，一切都无从谈起，便决定帮助越南拿下奠边府。

法国殖民主义者在越南军事重镇奠边府修筑有碉堡林立的集团阵地，驻有21个营和十几个连队的重兵，又有美国提供的部分现代化军事装备，因而吹捧奠边府是一艘不可摧毁的“山林中的航空母舰”。

毛泽东、周恩来命抗美援朝的主帅彭德怀亲自出马，帮助越南人民把重炮、火箭炮送上奠边府前线，又派富有攻击作战经验的陈赓、韦国清、罗贵波率领中国顾问团亲临前线，协助胡志明、武元甲指挥作战，终于取得奠边府大捷，消灭了法军主力部队，打通了中国援助越南的通道，使越南人民军得以扭转战局由劣势变为主动。胡志明亲自写诗一首向陈赓表示感谢：

香槟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疆场君莫笑，休放敌兵一人回。

奠边府战役的胜利，立即在日内瓦会议上得到生动反映：法国代表团一反过去趾高气扬的绅士派头，5月8日进入会场时，全都带上了黑纱，系着黑领带，低头鱼贯而入，一屁股坐下，连头都不敢抬，垂头丧气谁也不发一言。

外国代表团对法国代表团的明显变化大惑不解，越南代表团团长范文同见此情景，不由乐得笑出了声。

法国外长皮杜尔是个小个子，留着小平头，一有空就喝酒，走路晃晃悠悠，迷迷糊糊。中国代表团成员私下里称他为“木须肉、白菜汤先生”。因为法语里的“先生”的发音是“莫须有”，听着像“木须肉”，“主席”的法语发音是“布列切汤”，听着像“白菜汤”。

今天的皮杜尔因奠边府惨败没敢喝酒，他对以胜利者微笑的范文同怒目而视，气急败坏地指责说：

“这么严肃隆重的场合，你们笑什么？我们死了那么多人，你们还幸灾乐祸！同你们这些幽灵打交道，真是岂有此理！”

范文同法文功底颇深，早听懂了皮杜尔的蛮横指责，没等翻译，就用法文反唇相讥道：“噢，怪不得你们打败仗，原来是跟幽灵作战！”

范文同的幽默反击博得一片笑声，皮杜尔面红耳赤，狼狈不堪。

拉尼埃、皮杜尔顽固不化，追随美国破坏日内瓦会议，使关于印支问题的讨论也与朝鲜问题一样困难重重。为打开僵局，乔冠华向周恩来献策说：

“我认为应该继续打击法国拉尼埃政府，它对停战缺乏诚意，已引起法国人民的强烈不满，我们要打击主战派拉尼埃，支持主和派孟戴斯-弗朗斯。”

周恩来从善如流，正要去找莫洛托夫和范文同共商打击拉尼埃政府的方策，只听他的有力助手、代表团发言人龚澎女士欣喜地报告：“总理，莫老来了！”

“莫老”是中国代表团对莫洛托夫的尊称。他是日内瓦会议两主席之一，情报来源多，经验丰富。他非常同意中国代表团打击法国主战派的主张，中

苏又同范文同协商，终于由周恩来在 5 月 27 日提出第一个重要建议。

周恩来的发言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声音宏亮而又柔和，态度亲切而又诚恳。他提出在确定印度支那三国同时完全停火原则后，实施方法可根据印支三国的不同情况而有所不同。

中国的灵活折衷建议得到与会国家的普遍欢迎，推动日内瓦会议达成了第一个实质性协议，决定将越南问题交给南北越双方代表去讨论，外长会议继续讨论老挝、柬埔寨问题。

拉尼埃由于持僵硬立场，受到法国国内外的猛烈抨击，不得不于 1954 年 6 月 12 日倒台。法国和西方舆论尖锐地发表评论说，中国的周恩来只动了一下小手指，就把顽固追随美国的拉尼埃轰下了台。

法国主和派孟戴斯—弗朗斯应运上台执政，他地位不稳，被迫向议会和法国公众保证：若 1954 年 7 月 20 日达不成印支和平协议，就主动辞职下台。

周恩来看到这是分化美法阵营的大好时机，就赶到伯尔尼会见孟戴斯—弗朗斯。会谈中周恩来以卓越的外交艺术促使法国新总理同意和平解决印支问题。之后周恩来又建议范文同主动找孟戴斯—弗朗斯进行私下会晤，以缩小法越双方的距离。

周恩来在做英法的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后，又想去做史密斯的工作，莫洛托夫闻听此事，大吃一惊说：“这不可能，异想天开！”这正是：

智勇双全发奇兵，捷报频频报北京。

莫道西方防线固，周公威力鬼神惊。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第十回

夺敌士气 舌战群英得胜利
乘风破浪 巧施计谋奏凯歌

话说周恩来与莫洛托夫、范文同、南日协同作战，以巧妙的外交艺术使美国与英、法两国的矛盾越来越大，又将矛头指向史密斯，他兴致勃勃对莫洛托夫说：

“莫老，我想争取史密斯！”

莫洛托夫是世界著名外交家，曾随斯大林参加过许多重大国际会议，有人称赞他具有的外交经历像圣诞老人一样丰富，他的名字与苏联历史密不可分，此时却对周恩来此举大吃一惊，连连摇头说：“这不可能，简直是异想天开！”

周恩来微微一笑说：“美国代表团也不是铁板一块嘛！不能放弃做史密斯工作的机会。”

莫洛托夫拍着满头银发似有所悟说：“对，我想起来了，他对美国现行政策是有些不满。”

莫洛托夫回忆的闸门打开了，滔滔不绝他讲起，史密斯原是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当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总司令时手下的一员大将，他对美国侵朝政策有些不满，曾私下对莫洛托夫说：“美国现行对华政策是不明智的！”

周恩来大喜，浓眉大眼一闪，毅然下定决心说：“看来帝国主义真不是铁板一块，我们要在史密斯身上选择突破口！”

周恩来和莫洛托夫商定，中苏代表团都不对史密斯做过分的事，要对他以礼相待。史密斯很快发现了中苏对他的彬彬有礼举止，对周恩来的外交风度和调解纠纷的能力，极为佩服，认为周恩来远比他的顶头上司杜勒斯高明，因而在讨论周恩来提出的解决印支问题的六点方案时，突然离开讲稿即兴发挥说：

“周恩来先生的建议包含着可供讨论的内容，其中有一些是可以接受的！”

史密斯的灵活即兴发言与美国代表一贯的蛮横态度形成鲜明对照，受到与会各国的热烈欢迎，但这个讲话却遭到国务卿杜勒斯的严厉申斥，并命令他离开日内瓦由美国副代表罗伯逊出面发言，纠正史密斯的谈话。

第二天，罗伯逊登上日内瓦会议讲台，气势汹汹地批驳周恩来的发言，全部推翻了史密斯前一天的灵活表态。

周恩来立即要求发言，义正辞严质问罗伯逊说：“你们美国代表团说话算不算数？你们的团长史密斯昨天还表示，我们的发言可以考虑，今天怎么变卦了？”

罗伯逊根据国务卿杜勒斯的指示，早就想好了应付之辞，气壮如牛狡辩道：“史密斯的发言不很清楚，容易有误解，我今天的发言算数！”

为揭穿美国破坏日内瓦会议的阴谋，周恩来扫视全场一周，以不可辩驳的逻辑阐明中国的严正立场说：

“罗伯逊与史密斯的发言有显著不同。美国代表团的意图是挑起争论，使协议不能达成。对付这种挑衅并不困难，但我们宁愿致力于求得和解，以期在原则上达成协议。中国代表团16日的建议是很清楚的，不可能有任何误解。”

罗伯逊在众目睽睽之下处境尴尬，只得硬着头皮死顶：“我受美国政府

指示，拒绝中国的建议！”

为打击罗伯逊的嚣张气焰，周恩来便想揭露他在北京军调处工作期间，帮蒋介石打内战的罪行，但话到嘴边又留三分：

“罗伯逊先生，我要提醒你，你在中国时我们就认识你，我了解你。如果美国敢于挑战，我们将是能够应战的！”

罗伯逊大概觉得欠了中国人民的账，便低头不语。瑞士记者形象地评论说：从周恩来说话的架势，看起来就像中国彬彬有礼的老者，在训斥行为粗鲁的小孩或野蛮人。

杜勒斯虽不在日内瓦，但他控制着美国代表团的的活动。他发现史密斯不太听话，英、法的离心倾向加剧，西方阵营在几次会议中发言混乱，步调不一致；与此相反，中苏方面却配合默契，步调统一，特别是周恩来的影响如日中天，日内瓦会议如不及时中断，就很可能按周恩来的设想发展，因而应该当机立断，结束会议。这样，他就打电话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要求马上见面，说有非常紧急的事情商量。艾森豪威尔也对日内瓦会议的进展有可能失去美国的控制而焦躁不安，因此马上请杜勒斯进白宫商谈。

杜勒斯夹着公文包急急忙忙一走进白宫总统办公室，就对艾森豪威尔滔滔不绝讲了起来：“总统阁下，日内瓦会议的形势很不妙，周恩来、莫洛托夫发动强大的攻势，运用统一战线的手段，把我们的阵脚给搞乱了，许多人被他们的花言巧语迷惑了。法国的拉尼埃内阁又倒台了，皮杜尔在日内瓦呆不下去，主和派上台后可能在印度支那问题上让步、妥协，求得和平。这样，我们美国在亚洲的计划和行动就要受挫。因此，我考虑再三，建议总统立即指示史密斯即刻中断日内瓦会议。”

艾森豪威尔想起美国驻苏联大使波伦对杜勒斯的评价：“笨蛋，大笨蛋，最大的笨蛋杜勒斯”，艾森豪威尔回避直接表态，只感慨万千说：

“我早就说过，周恩来、莫洛托夫绝对不是等闲之辈，都是共产党里的大将、能手。在欧洲、在朝鲜战争中，我们同他们打过交道，确实是机智、勇敢、老练。”

艾森豪威尔抽着烟斗和杜勒斯研究美国的盟友英、法两国的态度，他不像杜勒斯那样狂热，委婉地拒绝杜勒斯的请示道：

“从我们美国的战略考虑，对于英、法等盟国，既要尽可能在政策上调一致，联合他们，利用他们，但又不能完全迁就他们，更不能听从他们，必要时美国可以独行其事，不过那要很好地权衡利弊，尽可能不要闹翻脸。我是赞成你中断日内瓦会议的考虑的，然而在印度支那问题上要做英法的工作，说服他们中断会议，但不宜强求，要见机行事，能马上断就马上断，否则再拖一段也行。朝鲜问题英法既然无所谓，就应该马上中断谈判。至于其他小国有这样或那样的意见无足轻重，不去管他，只要我们美国决定了，他们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都要服从。朝鲜问题的讨论无结果而中断了，也会影响印度支那问题的讨论。”

艾森豪威尔处事谨慎，他担心杜勒斯头脑狂热，一意孤行，就亲自给他的老部下史密斯写信，指示他尽一切力量使日内瓦会议尽快结束，理由是共产党人只是故意拖延时间，以符合他们的军事目的。

史密斯接到美国总统的指示，决心在6月15日的会议上结束朝鲜问题的讨论。周恩来洞察其奸，与苏联和朝鲜代表紧急磋商，提出解决朝鲜问题的合理建议，得到很多国家的赞同，但史密斯指使西方各国一齐反对，莫洛

托夫垂头丧气示意周恩来：“今天只能承认失败，但不要丢了大国风度！”

周恩来情知到了最后关头，浓眉下一双大眼射出愤怒的光芒谴责说：

“美国代表用来拒绝莫洛托夫建议的理由是站不住的，因为朝鲜停战协定只能约束朝鲜交战双方，而日内瓦会议是在新的更广大的基础上召开的，它必须有它自己的协议。”

周恩来在紧急关头妙策顿生：“我提一个两句话的协议草案！它就是：

日内瓦与会国家达成协议，它们将继续努力，以期在建立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朝鲜国家的基础上，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关于恢复适当谈判的时间和地点问题，将由有关国家另行商定。”

周恩来话音未落，一向沉着冷静的莫洛托夫大声喊道：“妙极了，只有周恩来能挽狂澜于既倒！”

苏联、朝鲜、英国、澳大利亚等国都表示赞成，史密斯急红了眼，拼命叫嚷，挥手反对。

周恩来看到史密斯的丑恶表演，手一挥，有力鞭打说：“如果连这样一个建议都被‘联合国军’有关国家所拒绝，那么，这种拒绝协商与和解的做法，将为国际会议留下一个极其不良的影响！”

各国代表纷纷表示支持中国的提案，比利时代表斯巴克冲破美国的阻挠说：“为了消除任何怀疑，我本人赞成大家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建议。”

史密斯又气又急，给斯巴克写条子要他取消刚才的表态，斯巴克置之不理。莫洛托夫像大学教授一样综合各方意见，再有力地打出去，便产生千钧之力，他做结论说：

“我们就要结束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了。我们可以用一个单方面的宣言来结束讨论；也可以用一个表示一方或另一方意见的宣言来结束讨论；还可以用一个表示我们大家意见的宣言来结束讨论。我们必须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准备发表一个表达我们大家的意见和愿望的宣言呢？我认为，这正是我们在日内瓦开会的目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愿无保留地支持刚才比利时代表赞成中国代表团的建议。”

具有绅士风度的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从莫洛托夫的发言中受到启发，毅然奋起“造反”，以会议主席身份宣布：

“据我了解，我们面前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所提出的建议。如果我的了解是正确的话，比利时代表认为这个建议表达了本会议的工作精神。如果大家同意，我可否认为，这个声明已为会议所普遍接受？”

各国代表对会议主席的结论性提议都无异议，这可急坏了史密斯。他气急败坏，狼狈不堪，匆忙从西服上衣口袋里掏出妻子刚寄来的丝手帕，擦抹满头汗水，又看看手上的罗来克斯金手表，左右为难：反对吧，没有充足理由；赞成吧，违反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的指令。最后像蚊子叫一般低声说：

“我不了解周外长建议的范围和真正的问题所在，不能在未向美国政府请示的情况下，同意中国的建议。”

会场上一阵骚动，人们对美国的无理遁词极为不满，但谁也不敢说出批评性意见，艾登圆滑地提出折衷建议说：

“本会议是以共同协议的办法来工作的，据我看，会议已无法就任何文件达成协议。我认为会议已经注意到今天会议上的发言，可以把这些发言作为会议记录的组成部分。”

莫洛托夫对艾登的折衷性意见不满意，提议把美国代表的破坏性发言记进会议记录，并向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公布。

周恩来极为欣赏“莫老”的意见，他以缓慢的语调对莫洛托夫的发言做进一步的发挥：

“我对比利时外交大臣所表现的和解精神感到很满意。会议主席要求会议注意到中国代表团所提出的并为比利时外交大臣所附议的建议，我认为也是值得提及的。然而，同时我必须指出，美国代表的立刻表示反对并进行阻挠，这就使我们大家都了解到美国代表如何阻挠日内瓦会议，并阻止达成即使是最低限度的、最具和解性的建议。我要求，我刚才所作的这一发言也作为本会议的记录的一部分。”

在美国的压力下，南朝鲜代表卞荣泰、澳大利亚代表凯西发言反对中国的建议，但苏联和比利时代表赞成中国的建议。周恩来巧妙掌握时机，再次发言说：

“对于有些代表所说的话，是否可解释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将被排斥在将来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任何谈判之外？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认为，将来就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达成协议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诸位先生都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被剥夺了它在联合国中的合法权利和应有地位。”

艾登以折服的神情望周恩来一眼，以会议主席身份提议会议不通过任何已经提出的文件作为会议的集体协议，但是，这些文件和发言一起将成为会议记录的一部分，希望使会议得以圆满成功的日子及早到来。

这场舌战历时长达五个多小时，但各国代表都仍兴味盎然，他们发现周恩来创造了奇迹，使美国二战后首次在国际上陷入尴尬境地，这大大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威望，世界舆论也对周恩来的外交才能赞不绝口，认为堪与当年诸葛亮舌战群儒相比，都将传为千古佳话：

舌战群英斗敌顽，分化瓦解力无边。

莫怪周公艺超群，只怨美帝太冥顽。

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见美国破坏日内瓦会议的诡计得逞，又命史密斯在讨论印支问题上如法炮制。莫洛托夫感到很难顶住美国和西方国家的破坏攻势，有点动摇了，开始与范文同商量善后措施。

周恩来再次力挽狂澜，他找莫洛托夫、范文同研究对策，认为充分利用美国与英法的矛盾，完全可以争取达成在印支地区实现和平的协议，使苏、越代表深受鼓舞。

莫洛托夫、范文同对周恩来极为信任，询问致胜方策，周恩来这才道出他苦苦思索出的妙计：“目前谈判的关键问题是我方是否承认有越军在高棉和寮国。应当承认过去在高棉和寮国有越南志愿军在那里作战，但有的已经撤出；如果现在还有，可以按照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的办法办理。”

莫洛托夫、范文同表示同意，三国商定分头行动：由周恩来向英法提出上述意见，范文同提出印支问题的解决方案，莫洛托夫提出关于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新方案。

周恩来首先拜访艾登，利用美英间的矛盾，与英国达成中英建立代办级半建交方式的外交关系，成为日内瓦会议的一大收获。然后提出可以从柬埔寨和老挝撤出越南志愿军问题，艾登拍手笑道：“有希望了，很有希望了！我想我们要求的也正是这样。”

中苏越按照周恩来的妙计分头行动，很快使日内瓦会议形势显著好转，

各方就在老挝、柬埔寨停止敌对行动问题达成协议并发表了新闻公报。

周恩来发现英法在解决印支问题上有重要作用，就决定支持英法对抗美国。

周恩来获悉杜勒斯特意从美国赶到欧洲，压孟戴斯—弗朗斯跟美国指挥棒转，就抢在杜勒斯之前会见法国新总理，给他一点儿甜头，让他去抵抗美国。

周恩来首先向法国总理孟戴斯—弗朗斯揭露杜勒斯破坏日内瓦会议的真面目说：

“美国已在尽力破坏日内瓦会议。现在，各国外长都回日内瓦来了，而杜勒斯不来，我们对这种态度是不能满意的。杜勒斯现在到了巴黎，却不来日内瓦，我们对此感到奇怪。美国人不遵守协议，反说别人不遵守协议。其实，世界上最不遵守协议的就是美国人。”

接着，周恩来指出法、越双方共同点较多，互作妥协就可以取得圆满解决。周恩来又会见英国外交大臣艾登，通报他在日内瓦会议期间访问印度、缅甸及与胡志明会谈情况，艾登通报了他和丘吉尔首相访美与艾森豪威尔、杜勒斯会谈的情况。

周恩来希望英国在中苏与美国之间做出公正评价。周恩来根据事态发展做出结论，英法经中苏越多方工作，有可能顶住杜勒斯施加的压力，印支的前途是光明的。

这时，印度驻联合国代表梅农匆匆会见周恩来，说他已得到可靠消息，杜勒斯把孟戴斯—弗朗斯和艾登召到巴黎，指责他们投降中苏共产阵营，逼迫他俩顶住中苏的进攻，完全听命于美国，日内瓦会议又面临危险状态，请周总理设法挽救危险的局面。

周恩来平静地回答说：“感谢你对日内瓦会议关心，但请你放心，英法不会完全屈服于美国的压力，法国可能会表现出它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政策。”

梅农这才放下心来，由衷地称赞周恩来已成为日内瓦会议的中心人物，左右着会议的前途。他双眼炯炯有神说：

“这次您回来后的地位，比您上次来时的地位更重要。您现在和两位主席都有密切的关系，上次您只是和一位主席有密切的关系。我可以告诉您，艾登对您很钦佩，他认为可以和你交谈一切问题，因此在所有的主要代表之间，您的地位最重要，因为您不仅与两位主席有接触，而且对他们都有说服力。”

周恩来谦虚他说，梅农对他的称赞太过分了，但梅农发现，日内瓦会议果真在按照周恩来揭示的方向发展。

孟戴斯—弗朗斯认为杜勒斯给日内瓦会议带来狂风暴雨，欧洲上空乌云翻滚，忧心忡忡向法驻外大使下达指示说：

“有美国人在，问题就更困难了。几个月来，美国的印度支那政策惊人地变化不定。这种情况不利于法国在日内瓦进行的谈判。因此，法国除了与共产党国家进行谈判外，还不得不与我们的海外盟友进行一场认真的谈判，以说服他们不与最后解决方案决裂。”

1954年7月13日，杜勒斯再次在巴黎爱丽舍宫会见英法外

杜勒斯一开口就指责法国态度软弱，他担心法国在共产党国家特别是周恩来的“压力和诱惑下”，离开美英关于印支问题的七点建议，做出更多的

让步。杜勒斯蛮横地声称，那时美国将不得不与最后达成的协议脱离任何关系，还说他与艾森豪威尔商量后，决定他不应再返回日内瓦。

孟戴斯—弗朗斯因为与周恩来做过两次交谈，想到有周恩来的支持，腰板就硬了起来，软中带硬顶杜勒斯说：

“我同周恩来、范文同就越南划界等问题进行了多次谈判，虽有分歧，但意见逐步接近，最有可能达成协议。法国并没有违背美国和英国规定的条件。如果杜勒斯先生也回到日内瓦，并且在那里充分支持法国，一定会对我有极大的帮助，成功失败也许在此一举！”

杜勒斯见孟戴斯—弗朗斯不买他的帐，简直气歪了鼻子，便将严厉的目光转向艾登，要他这个最忠实的盟友压孟戴斯—弗朗斯乖乖就范，没想到艾登的话更使他吃惊：

“我回到日内瓦后，立即同莫洛托夫、周恩来进行了会谈。从谈话的结果来看，我认为，起码有一半希望可以在印支问题上达成协议。我完全同意孟戴斯—弗朗斯先生的看法和意见，如果美国能同我们一起在外交上进行全面的努力，成功的把握就更大，所以美国的态度很重要。”

杜勒斯见这两个西方盟友双双造反，把脸一沉施加压力说：“即使你们的谈判协议完全符合七点协议，美国也不能保证该协议之实施。美国舆论决不会容忍数百万越南人民屈服于共产党统治！”

杜勒斯以犀利而阴险的目光直逼法国总理，声称他不愿使自己处于在公开场合说“不”的地位，孟戴斯—弗朗斯受过良好教育，文质彬彬据理反驳说：“美国拒绝出席日内瓦会议，并不能摆脱困境，何况你们既已派代表参加会议，就无论如何必须做出一个决定。杜勒斯先生猜疑法国国会离开七点建议是毫无根据的，我们就是因为要保证七点建议的实现，才急于请杜勒斯先生回到日内瓦的。”

杜勒斯被顶得哑口无言，无可奈何将态度缓和下来，请英法明天听取美国的最后答复。

杜勒斯对艾森豪威尔绝对忠诚，连夜请示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担心西方盟国离美而去，只得做出妥协，于是美英法三方互做让步，英法保证遵循七点建议，美国保证派代表继续参加日内瓦会议。

在中国国际统一战线政策感召下，英法为维护本国利益，独立自主倾向进一步发展，遇到问题争着和周恩来、莫洛托夫商量，而疏远美国代表史密斯。

杜勒斯看到美国在日内瓦会议上起不到太大作用了，无可奈何地给法国总理写信称：

“美国从4月初起就寻求与法国和英国政府密切合作，以图采取一个强硬的共同立场，然而事实证明这是不可能的。”

艾森豪威尔、杜勒斯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拼命拼凑东南亚条约组织，力图把柬埔寨、老挝也拉进去，破坏日内瓦协定的实施。

周恩来获悉这一消息，当即会见英国外交大臣艾登直接讲明利害关系说：

“今天，我想和你谈另一个问题，这就是有关所谓东南亚防御同盟的问题。自从杜勒斯与英法举行巴黎会谈之后，各方面消息很多，宣传得很厉害。是不是美国要对恢复印支和平达成协议进行破坏？现在传说要把印支三国搞进这一同盟。如果如此，那么和平就没有意思，而是为了准备新的战争。因

此，我想直接问一问阁下，因为从阁下这里可以得到第一手的消息。”

艾登承认美国正和有关国家在华盛顿对东南亚条约进行审议，但又狡辩说它是防御性的。周恩来以充分的论据对艾登进行驳斥，然后又会见法国总理孟戴斯—弗朗斯，讲明中国对此事的严正态度，对美国提出警告，最后美国才不得不有所收敛。

杜勒斯在策划东南亚防御同盟受阻后，又玩弄新阴谋，声称美国不准备在日内瓦协议上签字，周恩来急忙同印度驻联合国代表梅农商量应付措施，梅农出主意说：

“美国不参加集体机构，就无法使唤这个集体机构。如果美国违背日内瓦协定，那么参加集体机构的国家即可进行协商，并把美国叫到会议上来。如果是另外一个国家违背协议，那么美国无权参加协商；它如要求参加，集体机构还需要加以考虑。”

经各国幕后交涉，美国最后同意做些让步，避免承担破坏日内瓦会议的罪名。

经中苏朝等国协同努力，日内瓦会议 1954 年 7 月 21 日下午通过了《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美国迫于形势压力，表示同意日内瓦协议，但拒绝在这个协议上签字，仅发表声明说“注意到了”达成的协议，周恩来针锋相对指责道：

“美国这是什么意思？一个国家怎能既表示同意，又在态度上模棱两可呢？”

日内瓦会议是中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身份参加的大型国际会议。首次出击就大展雄风，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声望，成为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开端。

莫洛托夫动情地与周恩来紧紧握手，互相祝贺。莫洛托夫盯着周恩来，好像在研究周恩来怎么会表现出如此非凡的外交才能与智慧，怎么会享有这样高的威信和声望。周恩来几次想挥手告别，莫洛托夫却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不放，他与周恩来手拉着手漫步而行。很久，才热烈拥抱告别。

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与周恩来由敌对发展到结下深厚的友情。他为周恩来的外交才华、品德和温文尔雅的风度所折服，专程登

门向周恩来致谢说：

“衷心感谢周恩来总理阁下，在日内瓦会议中给予我作为会议主席的巨大帮助，周先生在会议中起了别人不能起的卓越作用。没有您的努力，印度支那问题达成和平协议那是不可想象的，说不定我们早已散会回家了。我们英国还极重视此次英中两国已建立的联系，希望今后两国抱着信心维持这一联系。”

艾登刚走，孟戴斯—弗朗斯又满面春风登门致谢，他一进门就握住周恩来的手，幽默地问：“停战协定没有按时签字，您看我是否应该辞职？”

周恩来宽厚地笑着回答：“主要的事都已办了，这点小事不算什么！”

孟戴斯—弗朗斯爽朗他说：“您和我们总统的意见一样，他今早在电话中告诉我不应该辞职。等我在法国议会里报告日内瓦会议情况的时候，我就说周恩来总理不让我辞职。我也问过莫洛托夫，他也表示，不必辞职。”

7 月 21 日下午 3 时，日内瓦会议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在国联大厦会议厅隆重举行，会议主席艾登宣读了在越南、老挝、柬埔寨停止敌对行动的三个协定。之后，周恩来笑容可掬地走上讲台，豪情满怀说：

“日内瓦会议九国代表团经过75天的工作，终于克服了最后的阻挠，就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获致了协议。我深信，我们达成的这些协议不仅将结束八年的印度支那战争，把和平带给印支人民和法国人民，而且也将进一步缓和亚洲及世界的紧张局势。毫无疑问，我们会议的成就是很大的。”

更使周恩来难忘的是美国代表团长史密斯也想与周恩来接触，他为避免公然违反杜勒斯不准与中国人握手之命令，一手端酒杯，一手拿雪茄烟，在休息室主动微笑着与中国总理打招呼说：“周恩来先生，不来杯咖啡吗？”

在翻译浦寿昌将史密斯的话译成中文后，周恩来笑着摆摆手说：“史密斯先生，不品尝一下中国的龙井？”

两人就中美关系亲切交谈，增进了相互了解。日内瓦会议结束那天，史密斯又主动笑着对周恩来说：

“会议即将结束了，能够在这里和您认识，我感到非常荣幸和高兴。你们在这次会议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们希望不管朝鲜也好，越南也好，都恢复和平。”

史密斯说罢，抓住周恩来的胳膊使劲摇晃几下，才笑眯眯地走开了。

周恩来恍然大悟，点头称赞：好聪明的史密斯，你杜勒斯不是不让美国人和中国人握手吗？我摇胳膊总可以吧。这正是：

力斗群英巧舌战，手腕高超人称赞。

化敌为友破险阻，凯歌高奏成美谈。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偷梁换柱 美国强订片面对日和约

主持正义 苏联大闹旧金山媾和会

话说缔结对日和约，是二战战后初期的重大国际事件，美、苏、中等国围绕签订什么样的对日和约，展开了复杂而微妙的斗争。

最早提出缔结对日和约的是占领日本的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1947年3月1日，麦克阿瑟突然举行他登上日本国土之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他身穿美军开领衬衫，手举特制的玉米穗烟斗，以“日本太上皇”身份宣称：

“占领日本的第一阶段是实现非军国主义化，现已完成，第二阶段的政治改革也接近终局，接下去是复兴日本经济的第三阶段。为此，日本必须重开国际贸易，而这又有待于缔结对日和约。”

其后，美国的对日政策几经变化。

战后初期，麦克阿瑟说要把日本变成“东洋的瑞士”，在日本新宪法中规定日本放弃战争，拟定了拆除日本一大半工业设备做赔偿费用的中间赔偿计划，解散了日本财阀，停发了战时政府对军需的补偿，要把日本变成一个无军备的中立国家。

后来，随着美苏关系不断恶化，美国改变了对日占领政策，杜鲁门总统等强烈主张早日对日媾和，利用日本对付苏联。

当时，日本存在着早期媾和论即单独媾和论、片面媾和论与全面媾和论的激烈争论。

以吉田茂为首的日本右翼保守势力迎合美国总统杜鲁门和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主张，鼓吹排除苏联，“仅与以美国为首的民主阵营国家”尽早缔结和约，而日本社会党和共产党则以单独媾和不能解决与苏联的战争状态为由，提出应与美苏两大集团同时媾和。

吉田茂感到头痛的是单独媾和后日本的独立地位和防卫问题。各国都会讥笑日本，既然日本实际上受美国保护，还称得上是独立国家吗？他不知道形成什么样的机制才可允许美国军队留驻，难以找到使大多数日本国民理解的办法。

为与苏联在亚洲抗衡，美国当然不会轻易撤出驻日美军，但这个要求最好由日本当局提出，美国才好向世界舆论交待。

日本当局早想结束被占领状态，便加紧拟定和约草案。日本外相芦田均1947年7月向盟军总部的民政局长惠特尼提交了缔结和约的请求书，提出日本加入联合国等9条要求。驻日盟军总部怕给人以接受战败国提出的媾和条件的印象，装模作样把请求书退给日本政府，实际上早已将其呈报给华盛顿当局。

美国政府考虑到日本当局的意见，建议远东委员会的10国成员尽快召开对日和约筹备会议，美国国务院远东局8月5日提出和约草案，规定国后、择捉等北方领土和冲绳为日本领土，由11国大使组成远东理事会和对日监视委员会，禁止日本在25年内进行军事生产等。这个草案因为遭到五角大楼的反对而被搁置起来。

随着苏联国际地位逐渐提高、新中国在东方诞生，美国认为以纯军事方式占领日本弊大于利，担心增加美国对日本的经济负担，导致日本阶级矛盾激化，掀起反美运动，便想与日本当局密谋单独签订对日和约。

为摸清美国在对日媾和问题上的态度，日本首相吉田茂派大藏大臣池田

勇人携秘书官宫泽喜一于1950年5月访美，首先找到曾任占领军第8军军长的艾克尔伯格中将探听消息，这位美国军方首脑气冲冲说：

“美国对日本所采取的过火的惩罚性政策是根本错误的。早知苏联这样飞扬跋扈，不如当初就把欧洲交给德国，把亚洲统统托付给日本，这可能比现在要好多少倍。”

池田勇人、宫泽喜一大受鼓舞，又到美国陆军部访问陆军部顾问兼国务院公使道奇。对为什么特意找道奇转达吉田茂的绝密口信，宫泽喜一后来在回忆录中说：

“池田藏相一直盘算着吉田首相托付的口信在何时、向何人转达为好。他认为此事不能轻易泄露出去，同时，他也想到，接受吉田首相口信的人会因此在美国国内提高声望。他曾与我商量过，最后决定向道奇传达，因为道奇是美国国务院的公使，又担任陆军部顾问，对之能够推心置腹的只有此人。”

池田勇人、宫泽喜一知道约瑟夫·道奇原为底特律银行董事长，1949年以盟军最高司令官的财政顾问身份来日本推行恢复日本经济的道奇路线，为制止日本战后通货膨胀起了重要作用，与池田勇人等结下深厚交情。这时，池田以日本人民运动为砝码向美国施加压力说：

“近来在日本，出自各种理由期望尽早缔结和约的呼声强烈。与此相反，在日本国会里，正在成立以日本共产党为中心，社会党人逐渐参加的要求全面媾和的在野党联盟。这些人除要求全面媾和之外，还反对向美国提供基地。”

池田勇人对道奇卖力反共大加赞扬，夸他曾促使驻日盟军总部盯上了日本共产党并对日共和进步势力采取严厉镇压措施。然后趁机提出希望排除苏联和新中国参加对日媾和会议的要求说：

“吉田内阁尽管希望有多数国家参加媾和谈判，但感情上难以忍受中国和苏联参加。不尽快实现目前可望得到的最佳媾和，别无独立之路。特别是日本参议院选举即将进行，此问题无疑将成为全体日本人关心的目标。”

池田勇人见道奇频频点头，又从攻击日本在野党角度大谈特谈道：

“日本在野党经常在国会提出，‘东京的美国占领军司令部甚至对日本政治经济的细节也进行不必要的干涉。其结果，日本实际上未享有民主主义的各种权利。虽不知麦克阿瑟本人的意图如何，但形成目前这种状况的实际原因乃在于日本政府的唯唯诺诺。必须坚决谴责日本政府的这种卑躬屈膝，一味追随占领军的态度’。我们认为，即使从这种情况考虑，也有必要尽早缔结和约。”

道奇对此不便表态，池田勇人见仍不能打动道奇，只有拿出请求美军留驻日本的真货色了，便转口说：

“我向大家转达吉田总理大臣托带的口信：‘日本政府期望抓住机会尽早缔结和约。即使缔结了和约，为保障日本及亚洲地区的安全，美国军队仍有必要留驻日本。如果美国方面不便提出这种希望，日本政府愿意研究由日方提出建议的方式。关于这一点，业已参考各种宪法学家的意见。他们的意见归纳起来是：如在和约中设一项允许美军留驻的条款，将不会产生触及宪法的问题；采取由日本方面以某种形式请求美军留驻的方式，亦不会违反日本宪法’。”

道奇是个寡言少语却工于心计的人，他对池田勇人转达的吉田重要口信

欣喜若狂，但却不形之于色，池田勇人大谈日本对美国的怀疑情绪说：

“日本人迄今仍记得，美国陆军部部长罗亚尔来日时，曾发表过从美国的战略看并不需要日本的所谓‘日本放弃论’，尤其是从其后发生的问题看，美国对台湾的态度总是不太明朗，因而日本人非常怀疑，美国是否真正打算保卫亚洲这些地区到最后时刻。加之在法属印度支那，共产党势力日益扩张。至于南朝鲜，则更难看出稳定。人们担心，一旦发生事端，美国可能会放弃该地区。”

道奇目不转睛地盯着池田勇人，静静地听他讲话，池田又搬出苏联来向美国施加压力说：

“由于种种原因，如果苏联先发制人，利用日本人的焦躁心理，提出缔结对日和约，并表示愿意归还库页岛和千岛群岛，美国将如何应付？”

池田见道奇仍不动声色，就以日本政局为“武器”再次发起“攻击”说：

“退一步说，如果现在不能缔结和约，美国必须给日本政治、经济上的更多自由，让日本建立接近于独立的体制，即实现接近于事实上的媾和。日本国民正是抱着这种期望支持吉田内阁的，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日本政局可能再次发生动荡。”

美国急于单独与日本媾和的积极性丝毫不亚于日本，但道奇知道在美国国务院与五角大楼之间对实施方法尚有争论，作为主人绝不愿意在仆从面前多讲自己内部的敏感问题，就不紧不慢地讲“纯属个人意见”道：

“从国际关系方面看，美苏关系越紧张，在远东让日本越早独立就越危险，这种意见在华盛顿已逐渐占了上风。特别是随着美苏关系的恶化，军事上或战略上的考虑自然要比外交上的考虑占更大比重。如果进一步削弱美国在日本所拥有的军事地位，对日本也不利。这当然不是说美国反对缔结和约，而是说日美对苏联的军事地位，不应该比今天软弱。”

道奇最后强调说：“一言以蔽之，本人今天能够说的，就是美国政府希望尽早缔结对日和约，并希望早日具备促其实现的条件。”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为把日本变成侵朝战争的供应基地，把几千名旧军人和铁路人员派到朝鲜帮助美军作战，加快了与日本单独媾和的步伐。

与吉田政府几经磋商，美国于11月24日发表了对日媾和七原则，包括当事国、领土、安全保障、赔偿等7个部分，规定在“联合国制定出令人满意的有关对安全保障承担实质性责任的其他规定之前”，由“日本和美国及其他国家之间继续分担其责任”，企图以日本同意的形式，使美军继续留驻。其核心是把日本纳入美国对抗苏联和中国的世界战略之中，使日本为“远东的安全保障和稳定做出贡献”。

美国国务院顾问杜勒斯为说服美国议员同意尽快缔结对日和约，1951年3月9日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秘密会议上，向美国议员们说出了美国包庇日本的真实目的。他说：

“在严峻的国际形势下，亲西方的日本对美国来说是极其有益的政治资本。日本是大陆周边的沿岸岛屿链条中的关键因素，美国一旦丧失拥有巨大潜力的日本，将会破坏整个太平洋的势力均衡。”

有的美国议员担心《波茨坦公告》规定了对日和约必须先由美、英、苏、中、法五大受降国处理的原则，美国单独签订对日和约违反国际原则，但杜勒斯、杜鲁门对此置之不理，策划了“远东委员会方式”，企图“按多数表

决”的方式排除中国和苏联行使否决权，达到美国进行片面媾和之目的。

杜鲁门派杜勒斯为特使多次来日本，就对日媾和后美军继续留驻日本取得一致意见，但双方在重整日本军备问题上发生对立。为与苏联争夺亚洲，杜勒斯要求日本建立 10 个师团 35 万人的陆上自卫队。日本认为规模太大，表示反对。杜勒斯、吉田茂请求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出面裁决，麦克阿瑟支持按日本所希望的速度重整军备，美国才干 1951 年 8 月 13 日公布了对日和约草案。

这个和约草案根据日本的强烈要求，不向日本索取战争赔偿，立即受到苏联、中国、印度、缅甸等国的强烈反对。杜勒斯振振有词地提出不向日本索取战争赔偿的法律依据是，按照远东委员会的决定，应将占领日本期间为日本国民供应食物和保证社会、经济稳定所需要的经费列为首要问题。美国已为此支付了 20 亿美元的援助，如果要求赔偿，美国拥有优先权，其他国家则拿不到多少钱，就死了要求赔偿这条心吧。

苏联和亚洲国家对此强烈表示反对，美国装模作样做出让步，允许被侵略的国家具有没收日本政府及日本人遗留在本国的财产的权利。菲律宾、印尼以不参加旧金山对日和会，表示反对，杜勒斯不得不把要日本支付最低限度的劳务赔偿列入对日和约的最终草案。

更使杜鲁门、杜勒斯感到头痛的是新中国和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都强烈要求参加旧金山和会。

早在 1950 年 12 月 4 日，中国政府就研究了美国国务院顾问杜勒斯递交给苏联驻安理会代表马立克的备忘录，授权周恩来外长发表声明，郑重指出：

“自 1931 年 9 月 18 日以来，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蹂躏我国广大领土，使我国人民生命财产，遭受重大牺牲。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英勇抗战，击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因此对日和约的准备、拟制与签订，我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参加，乃属当然之事。兹特郑重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它必须参加对日和约的准备、拟制与签订。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绝对没有资格代表中国人民，因而它没有资格参加任何有关对日和约的讨论和会议。对日和约的准备和拟制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加，无论其内容与结果如何，中央人民政府一概认为是非法的，因而也是无效的。”

新中国当时在世界上如旭日东升，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其正当要求得到苏联、英国、印度、缅甸等国的大力支持。苏联以战后强国身份发表对日和约的意见书称：

“苏联政府一贯主张迅速签订对日和约，认为和约应当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强签订的国际协定来制定，由美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苏联和英国代表共同准备条约草案，并邀请远东委员会各会员国参加。”

蒋介石得知苏联和英国等主张让新中国参加旧金山和会，犹如当头遭一闷棍痛击，忙命他的驻美大使顾维钧去见杜勒斯，讲述蒋介石对于这一问题的强烈意见称：

“蒋总统认为，我们参加对日和约的权利绝不容怀疑，只能以平等地位参加，任何含有歧视性的签约条件，均不接受，任何违犯上述严正立场而订立之对日和约，不但在法律上、道义上将丧失其力量，即在盟国共同作战的历史上也要留下不可洗涤之错误。”

杜勒斯认为蒋介石危言耸听，将金丝眼镜一推，讽刺挖苦说：“蒋总统

言重了吧？”

顾维钧顾影自怜，暗想我作为民国著名外交家，当年在国际会议上谴责日本侵略，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奔忙，备受各国外交家尊重，如今干此丢人现眼的求人之事，实在可悲，叹口气硬着头皮为蒋介石传话：

“蒋总统认为，美国在对日和约问题上责任之重，影响之大，诚有非他所忍言者——如果签署丧失真实性的对日和约，不但不能使第二次世界大战获得真正的结束，并将加速远东局势之混乱，更会种下世界未来之无穷祸患！”

杜勒斯暗骂蒋介石言过其实，虚与委蛇打发走顾维钧，便赶往白宫与美国总统杜鲁门商讨对策，两人认为苏联难于说动，只有压英国放弃支持新中国参加的主张。谈到赴英人选时，杜勒斯不发一言，杜鲁门知道杜勒斯早就不满于只当顾问，而对艾奇逊即将辞职后的国务卿职位垂涎欲滴，就趁机告诉杜勒斯，打算任命杜勒斯为国务卿，让他去干压眼英国的棘手差事。

原来，英国出于本国自身利益的考虑，已宣布承认新中国，因而在围绕中国参加旧金山和约会议问题上与美国有了分歧，主张在台湾归属中国的大前提下以台湾中立的方式解决问题，美国一口拒绝。

杜勒斯作为国务院顾问来到伦敦，对英国外务大臣摩里逊软硬兼施，与英国达成两项妥协：一是大陆和台湾的任何一方都不参加旧金山和约，二是在旧金山对日和约生效之后，由日本选择中国任何一方的政府缔结和约。

蒋介石得到美国的通知大发雷霆，指示顾维钧找杜勒斯交涉，说蒋介石非要派代表出席旧金山和会，杜勒斯只得交底说：“此次我在伦敦与英国外务大臣商议对日和约，我对英国主张邀请中共参加坚决反对，而摩里逊对美国主张你们参加签字，也反对甚力。最后，我提出折衷方案，即由若干国家与日本签订多边条约，另由日本自主决定与何方中国商定大致相同的双边和约，英国已表示同意。”

杜勒斯告诉顾维钧，美国已为你们尽了最大努力，当前也只能如此了。顾维钧听此话言之有理，不知如何向蒋介石交代，急得光头上冒出了汗珠，唉声叹气说：“这太令人失望了，贵国到底做何打算？”

杜勒斯不耐烦地训斥说：“英美虽然达成过妥协，但美国的想法是早日签订旧金山对日和约，使日本恢复主权，然后加入自由世界，共同反共。如果由于你们执意要参加旧金山会议而签不成和约，人们就会怪罪你们！”

蒋介石又怕日本不肯与他签订和约，又让顾维钧去问杜勒斯：“日本真心要同我们签订和约吗？”

杜勒斯暗中冷笑：谁会真心同蒋介石签订和约呢？眼镜片后面闪出讥讽的神色，旋即敷衍说：“日本政府大概愿意同你们签订和约，反对同中共建立关系，这虽不能完全满足你们的希望，然而十之九成当如蒋总统之意……”

出于美国预料，苏联派外交部长葛罗米柯率 31 人组成的大型代表团于 1951 年 8 月 27 日乘“伊丽莎白女王号”抵达纽约，葛罗米柯在轮船甲板上发表引人注目的声明说。

“苏联代表团前来出席旧金山会议，参加讨论非常重要的问题——对日和约。苏联政府已经声明，苏联代表团将提出自己的对日和约建议。我们希望与一切真正关心能为日本与其他国家——特别是那些遭受日本侵略受害最深的国家——的正常关系的建立奠定基础，从而为远东的巩固和平奠定基础。”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举行盛大宴会，与追随美国的国家（集团）商榷对付苏联的方策，艾奇逊极力鼓吹片面的对日和约说：

“这个对日和约是宽大的，因为有这样一个和约才能使日本对亚洲的经济复兴和政治稳定可以有所贡献。它是一个给予机会的条约，因为它使日本有机会向世界证明，日本真正希望成为自由世界国际大家庭的一个和平的成员；它是一个合乎现实的和约，因为它已把日本为了世界稳定的利益能够实际做到的事情考虑在内。”

各国代表和记者发现，苏联代表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代表频频会晤，主持正义力争全面媾和；美、英、日等国代表密室策划，力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预料将有惊心动魄的斗争出现在举世注目的旧金山和会上！

为限制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在旧金山和会上的影响，艾奇逊、杜勒斯制定了特殊的议事规则：

“出席会议的 52 国代表团，每国代表只准就美国 8 月 13 日提出的和约全文的条款发表不超过一小时的演说。如果某个国家已经结束了它的声明，它要等到所有国家全部发言之后才能再度发言。如果某国代表团向另一代表团提出问题，该代表团最多用 5 分钟时间予以答复。在发生争执时，主席通常可不经正式表决即决定会议的意见。如果需要表决的话，由简单多数票决定之。各国代表可就议事的进行提出意见，而主席有权限制这种发言的时间，并限制停会、休会或结束辩论的动议。”

旧金山和会前夕，纽约充满了火药味，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公然向与会国发出威胁：“签署和约将是对哪些国家要和平、哪些国家不要和平的一种考验”。为应付美国的挑战，苏联代表团如临大敌，“在价值 160 万美元的皇宫般的赫尔斯保罗大厦里，苏联代表整天忙个不停，打字电报机日夜不停向莫斯科发出电报，其他机器也以最高速度转动”，令人感到冷战的浓烟笼罩着旧金山和会的会场。

1951 年 9 月 4 日晚 7 时，对日媾和会议在旧金山歌剧院开幕。美、苏、英、法等 52 国代表参加，印度、缅甸拒绝与会。大会实况通过电视向美国各地播放，被称为“电视时代的序曲”。

旧金山和会由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揭幕。艾奇逊宣布对日和会开幕后，请与会代表为和平默祷，然后向各国代表介绍旧金山市长及加州州长华伦。华伦代表美国地方当局向各国代表致欢迎词。

接着，艾奇逊请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演说。只见杜鲁门身穿考究的双排纽扣的西服，彬彬有礼地发表演说称：

“我很高兴地欢迎诸君参加这个与日本签订和约的会议。美国人民能够担任这次会议的主人，甚感荣幸。”

杜鲁门大肆吹嘘美国占领日本的政策取得巨大成功，随后又吹捧、兜售美国精心炮制的对日和约称：

“我想，我们可以公平他说，这是一个好和约，它把一切参加和约的各国的主要要求和根本利益全都考虑在内了。它对战胜国和战败国都是公平的，但不仅如此，它还是一个有效用的和约。它并不含有另一次世界大战的种子，它是展望未来而不是回顾过去的和协的条约。这个和约重新确认日本是一个有主权的独立国家，它规定恢复日本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它并不限制日本取得原料。和约承认日本应给遭受日本侵略的国家以赔偿的原则，但它并不使日本人民担负起在于来年代中会摧毁它的经济的无望的赔偿负担。”

杜鲁门鼓动如簧之舌把美国炮制的片面对日和约吹得天花乱坠，并施加压力，要求各国代表在片面对日和约上签字。

在美国的压力下，一些国家的代表被迫为杜鲁门鼓掌喝彩，但苏联，波兰、捷克代表却反应冷淡，法新社记者描述现场情况如下：

“在杜鲁门总统离席后，各代表团迅速走向出口，有人好奇地注视着葛罗米柯和他的代表们，只见苏联人根本不理美国人，而与过来与他们握手的波兰人做长时间交谈。”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预料这次会议必有一场恶战，他借临时主席身份，以强硬的态度致开幕词说：

“在此地出席会议的各国政府代表团，都是应邀来缔结和签署对日和约及其所附宣言的，但该和约及宣言必须根据 1951 年 8 月 13 日的对日和约草案之条款行事，这已被称为‘定本’，在请柬上早已写得明明白白。”

各国代表都听出了艾奇逊的言外之意：只许乖乖在美国炮制的对日和约上老老实实签字，不许再有异议，因而，均对美国的霸道作法不满，但大都敢怒而不敢言。

这时，只见苏联代表团团长、副外长葛罗米柯大步走上铺着金丝绒布的讲台，义正辞严发表讲话说：

“苏联主张立即考虑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旧金山对日和会，这是最重要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不容置疑的权利来参加旧金山和会。”

这是艾奇逊最害怕的事，便利用充当临时会议主席之便，粗暴地指责葛罗米柯违犯了旧金山和会的议事规则，禁止他发言。

葛罗米柯气得胀红着脸，摇着大手提出抗议：“我们坚决反对这种裁决。苏联代表团将坚持提出这个问题，直到旧金山会议做出公正决定为止。”

艾奇逊蛮横地警告葛罗米柯，现在全体会议讨论的是通过议事规则的问题，不是任何别的问题。

葛罗米柯怒气冲冲，挥动着他的拳头，要求参加会议的 51 个国家的代表先讨论邀请新中国参加会议问题，再讨论其他问题，他郑重提出建议说：“在讨论议事规则时，一切应该参加旧金山和会的政府的代表都应该在场。”

波兰代表韦尔布罗斯基怒气冲冲走上和会讲台，对美国的专横行径提出抗议，指出美国搞的议事规则是绝对不合理的，建议成立一个规则委员会专门处理这一问题。捷克斯洛伐克女代表塞卡尼诺娃也发言支持波兰的建议。

葛罗米柯强调中国曾是“日本侵略的受害者”，独自地对日本的侵略进行了多年的抵抗”，理所当然应该参加旧金山和会。波兰代表要求表决他的提案，艾奇逊以会议主席身份阻止波兰代表发言；波兰代表拒不走下讲台，双方发生争执，争吵不休。

艾奇逊强硬裁决让英国代表杨格发言，波兰代表为照顾大局做出让步退回原席。杨格发言为美英提出的议事规则辩解，然后以多数票否决了波兰代表的提案。

葛罗米柯又大步走上讲台，戴上金丝眼镜，宣读苏联政府的声明，指出美英的议事规则没有规定成立特别军事委员会和特别经济委员会讨论对日和约的主要问题，批评美英的议事规则没有给各国代表团足够的时间发表各国的重要主张，谴责美国借征求意见之名把一些重要国家拒之门外。葛罗米柯振振有辞说：

“印度、缅甸及其他国家拒绝参加本会议一事，说明它们的意见并未被

考虑。至于苏联，它的意见和建议也未受到考虑。苏联并不强要任何人接受我们的观点，也不允许任何人强使我们接受他们的意见。”

葛罗米柯靠在讲坛倚墙上质问艾奇逊：“关于苏联的建议，你们准备在什么时候进行表决，做出决定？”

艾奇逊粗暴地回答：“这个问题在通过会议程序规则时已经解决了。”

9月5日上午的会议以选举艾奇逊为常任主席、澳大利亚代表斯宾德为副主席而结束。

9月5日下午会议一开始，美国顾问杜勒斯首先发言，为美国制订的对日和约草案辩护，英国代表扬格紧随其后兜售美国货色，葛罗米柯滔滔不绝发表针锋相对的演说称：

“美英和约草案证明了它的起草者是仍想使日本走军国主义的道路。必须承认中国在对日战争中负担最重，对胜利做出了最大的贡献，而签订和约之主要目的应该是依照《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雅尔塔协议》的规定，避免日本军国主义再起，建立一个民主与和平的日本，但美国却没有完成肃清日本军国主义的工作，和约没有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保证，对日军没有限制的条款。在这方面，与意大利相比，日本是得到特权的，因而苏联要提出修正案。”

主持会议的澳大利亚代表斯宾德看美国眼色行事，声称葛罗米柯无权提出修正案，葛罗米柯愤慨地反驳说：

“对不起，我的发言还没超过60分钟，我高兴说什么就说什么，你无权干涉！”

艾奇逊却声称，要苏联参加这个会议，只是为了要其签字，不是为了听取什么新建议。

不少亚洲国家的代表对美国采取的“过分严厉”的作法甚为不满，印尼代表苏巴若将其称为“蒸汽碾路机”式的手段，将对远东舆论产生不良影响，认为艾奇逊和他的英国伙伴最好多留些余地，借以缓和对美英作法的抨击。

葛罗米柯不屈服于美英的压力，堂堂正正提出对美英和约草案的六个修正点、八个新条款，强调日本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国东北、台湾、澎湖、东沙群岛、南沙群岛的完全主权，日本放弃对以上各领土的权利；规定对日和约生效后撤出一切外国军队和军事基地。

美英代表一唱一合，拒绝苏联的提议，不做任何改变。

捷克斯洛伐克女代表塞卡尼诺娃成为9月6日下午会议的风云人物，她指出美英制定的和会程序是非法的，因为没有新中国参加：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目前一切争取和平的人民的希望，中国曾以不可征服的决心和日军作战，近来又在朝鲜抵抗了已转入武装进攻的美国侵略军，已成为保卫远东和平的强大力量，不邀请亚洲最强大的国家参加和会是非法的，扰乱了整个国际法结构。”

捷克斯洛伐克女代表的发言使美国受到沉重打击，主持会议的艾奇逊坐不住了，敲着桌子“提醒”捷克女代表超过了发言时间，亚洲国家代表则为她的精彩发言鼓掌叫好。

艾奇逊气急败坏地敲着桌子要捷克女代表停止发言，塞卡尼诺娃威严地一摆手说：“只要片刻”，又犀利地谴责说：

“这个和约草案没有规定把台湾划归中华人民共和国，表明美国要把台湾变成对中国进行公开侵略的基地，把中国变成美国的殖民地，这是注定要

失败的！”

苏联、波兰和一些亚洲国家代表为捷克女代表的精彩演说鼓掌欢呼，美国、英国等代表鼓倒掌、吹口哨破坏，旧金山和会会场一时热闹非凡。

当时 43 岁的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葛罗米柯年富力强，风度翩翩，活动能力很强，成为旧金山和会上美国当局最头痛的人物。为向他施加压力，美国右翼势力于 9 月 7 日在葛罗米柯乘车途中制造了卡车颠覆事件，还公然放风说，流落在旧金山的白俄等暴徒仍将用同样的方法谋害葛罗米柯，但葛罗米柯毫无惧色，仍谈笑风生，活跃异常。

在 9 月 7 日的全体会议上，美国逼迫 48 国代表发言，表示愿意在旧金山对日和约上签字。日本首相吉田茂也发表“矜持而悲枪”的演说，表示愿意接受旧金山和约。

面临如此严重的形势，葛罗米柯做出最后的努力，要求会议说明打算如何处理他提出的和约修正案。

主持会议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铁青着脸提醒葛罗米柯说：“阁下，在你执意坚持你的意见的时候，你并不是提出修正案，因此，现在并没有什么修正案可供讨论。”

葛罗米柯见艾奇逊如此蛮横无理，就厉声驳斥说：“这些修正案已经作为苏联声明的一部分提出来供大家研究，苏联代表团有权要求会议进行讨论。”

艾奇逊又搬出美英炮制的议事规则压人，硬说葛罗米柯违反了议事规则，他故作让步之态说，现在唯一可以讨论的是锡兰所提出而为古巴所附议的建议：任何人如想发言，可以再给半小时。

艾奇逊和葛罗米柯唇枪舌剑辩论一通后，艾奇逊以会议主席身份主持对锡兰议案进行表决，结果以 41 票对 1 票通过，只有捷克斯洛伐克一国投反对票。

波兰代表韦尔布罗斯基走上讲台要求发言，艾奇逊冷笑说：“我知道波兰代表并不是来支持会议主席的裁决的，但我还是让你讲五分钟的话。”

韦尔布罗斯基讽刺道：“这里的会议根本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会议，我不会支持你的荒谬裁决。我愿意引述一个英国人的话。他说，仅仅宣传有讨论的自由是不够的——你必须实行它。”波兰代表的话引起全场哄堂大笑，当各国代表的笑声平息下来后，韦尔布罗斯基继续发表演讲：“如果你光是宣传有讨论的自由而不实行，便是纯粹的伪善！”

这番话又引起人们一阵大笑，波兰代表在笑声中走下讲台，美国代表处境狼狈，杜勒斯一理金丝眼镜驳斥说：

“波兰代表和其他国家的代表不但今天有时间可以讨论，而且已经讨论了 11 个月。波兰代表阁下不是像他所暗示的那样是被虚假的托辞邀请来的，邀请书上都已写明这是个签订和约草案的会议，不是提出任何新建议和修正案的会议。他们不想来，便可以不来！”

美国官员鼓动一些国家代表拼命鼓掌，支持杜勒斯的主张，葛罗米柯走上讲台反驳说：

“这个和约草案是在美国代表团的压力操纵下产生的，因而是不得人心的。苏联政府认为，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而美英草案对于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并没有提供任何保证。这个草案使得让日本走回头路，推行发动战争的旧政策更容易了。”

艾奇逊和杜勒斯强调必须在 9 月 7 日晚结束会议，以便第二天正式在对日和约上签字。苏联等国坚决反对，使会议在一片争吵声中体会。

9 月 8 日，美国胁迫 48 个国家在对日和约上签字，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三国代表拒绝签字。 1952 年 4 月 28 日和约生效。

旧金山片面媾和条约规定：日本承认朝鲜独立；日本放弃对台湾和澎湖列岛的一切权利和要求；日本放弃对南威岛及西沙群岛的一切权利和要求；日本同意将琉球群岛和小笠原群岛置于联合国托管之下，而以美国为唯一管理当局；日本“不得自愿加入集体安全协定”；“盟国可同日本缔结双边协定，在日本驻军”；盟军承认日本领土及领海的主权，实质上放弃对日本的赔偿要求。

为对付苏联和新中国，美国和日本还签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日美共同防卫协定》、《日美行政协定》，使美军“合法”地取得了在日本的作战权、建设基地权，并可以“合法”地从日本出动美军与他国作战，镇压日本国内群众。

旧金山片面媾和受到苏联、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连列席旧金山会议的美参议员麦卡伦也承认美国此举不得人心，苏联和中国在旧金山会议上赢得了极大的胜利。

1951 年 9 月 18 日，中国总理兼外长周恩来就美国等国签订旧金山对日和约发表声明，指出由于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准备、拟制和签订，中国中央人民政府认为，旧金山对日和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因而是绝对不能承认的。这正是：

蛮横强迫史无前，片面签约旧金山。

更喜苏联持正义，波兰捷克斗敌顽。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甜言蜜语 赫氏枉费心机

刀山剑树 铁托骨头最硬

话说南斯拉夫是巴尔干半岛的重要国家，战略地位极为显要。二次大战后，南斯拉夫与苏联发生激烈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美国竭力想从苏联圈内挖走南斯拉夫，新中国则积极与南斯拉夫发展友好关系，因而，美苏中在南斯拉夫的斗争既复杂曲折，又奥妙无穷。

原来，南斯拉夫位于巴尔干半岛中部和西北部，是个多民族国家，1918年12月成立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1929年改称南斯拉夫王国，1941年4月被德国、意大利法西斯占领。

南斯拉夫人引以为荣的是出了个民族英雄铁托，领导南斯拉夫人民投入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战争，才走向胜利自由之路。

约瑟普·布罗兹·铁托1892年生于克罗地亚西北部一个叫作库姆罗维茨的美丽的山村，因家境贫寒，当过农夫、饭店伙计、锁匠和士兵。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俄国俘虏，恰逢发生十月革命，铁托读到列宁的《四月提纲》等小册子和布尔什维克报纸，开始倾向社会主义，在俄国参加了南斯拉夫共产党，1920年回国，继续参加革命斗争。

德、意法西斯侵占南斯拉夫后，铁托为挽救祖国危亡，组织起游击队，他出任总司令，经常一马当先，率领部队与敌人交战，是二战中唯一在战场上负过伤的总司令。在铁托领导下，南斯拉夫人民军迅速发展到了15个军约80万人，配合苏联红军解放南斯拉夫，1945年11月出任南斯拉夫联邦总理兼国防部长。

那时，他对苏联和斯大林充满感激之情，因为他的共产主义启蒙教育和马列主义学习都是在莫斯科进行的，他多次激动他说：

“当我在每个寂静的夜里倾听莫斯科电台的广播，听到克里姆林宫的钟声，听到国际歌的激动人心的曲调时，我是多么愉快地感到这个国家的力量啊！”

铁托第一次会见斯大林是在1944年9月的一个无月之夜。铁托乘坐一架由苏联人驾驶的“达科他”式运输机，从维斯特岛英军管辖的机场起飞，前往莫斯科。

铁托此次莫斯科之行的目的，是为解放贝尔格莱德，与苏联进行作战会商，要求苏联政府提供一个坦克旅。

斯大林以异乎寻常的热情接待了铁托，把他使劲搂在怀里，以致铁托的双脚被抱离了地面。对铁托要求提供一个坦克旅一事，斯大林满口答应，当着铁托的面给在索非亚的苏联元帅托尔布欣打电话说：

“铁托在我这里。他要求我们给他一个坦克旅，你那里有坦克吗？”

斯大林放下电话，告诉铁托：“给你一个军！”

铁托简直大喜过望，更对苏联和斯大林充满真挚的敬爱和感谢之情，但在接着进行的实质性会谈中，铁托就感到不对劲了。

斯大林抽着他那只著名烟斗，像大哥哥教训小弟弟那样说：“瓦尔特（不知为什么，斯大林等人总是这样称呼铁托），你得当心，塞尔维亚的资产阶级是很强大的。”

斯大林慢条斯理说完这段话就打住了，他等着听铁托的恭维之词，但听到的却是铁托心平气和的反对见解：

“斯大林同志，我不同意你的意见。塞尔维亚的资产阶级是非常弱小的。”

斯大林皱起眉头，他从骨子里瞧不起铁托，他把铁托当成傀儡，认为他不过是个巴尔干穷山沟里的农民，不由想起铁托给他电报中的一句话：“如果你们不能帮助我们，至少不要妨碍我们”。斯大林想到此事心里就冒火，但为了显示共产主义阵营最高领袖的风度与涵养，只好压下火气，问起南斯拉夫一个资产阶级政客现况如何。

铁托厌恶他说：“他是个无赖，一个卖国贼，斯大林同志，他和德国人一起干。”

斯大林见话不投机，无话找话又问起另一个南斯拉夫政客在干什么，希望铁托能顺着自己的杆子往上爬，但得到的仍是冷冰冰的回答。斯大林满脸怒容指责说：“瓦尔特，对你来说，他们都是无赖！”

陪同接见南斯拉夫领导人的苏联其他巨头日丹诺夫、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都觉得铁托胆大包天，竟敢顶撞斯大林，这下闯了祸，都给铁托使眼色，要客人改变态度，但铁托却一点儿也不转弯：

“一点儿不错，斯大林同志，任何背叛他的祖国的人都是无赖！”

斯大林好生气恼，使劲抽起他的大烟斗，喷出一个个巨大的在空中旋转的烟圈，便不再兜圈子，直接讲出他和罗斯福、丘吉尔已经商量过的事情：

“瓦尔特，你们是否考虑过让南斯拉夫国王彼得回去的事情？让他复位是十分必要的！”

铁托没想到斯大林竟这样露骨地干涉南斯拉夫内政，事关重大原则问题，铁托拒不让步：“这绝不可能，人民会造反，因为这国王是卖国的化身，在最艰难的时刻，他扔下人民逃跑了！”

斯大林知道，两个月前，英国首相丘吉尔也向铁托提出过这个要求，但被铁托一口回绝。斯大林为了要显示铁托能按他的指挥棒转，所以也向铁托提出这个问题，没想到亦被铁托拒绝，但他仍不甘心，就耐着性子玩弄计谋说：

“瓦尔特，你不必让他永远在位。暂时把他接回去，然后在适当的时候，悄悄地给他背上捅一刀……”

铁托已得到斯大林和丘吉尔为在巴尔干半岛划分势力范围而进行过英苏会谈的情报，认为让彼得国王复位就是实现这一设想的重要一环，他怒不可遏，拍案而起，厉声拒绝：

“南斯拉夫的主权，我们要百分之百，一点儿都不给他们！”

斯大林尝到了铁托的厉害，就来软的一手，多次邀请铁托到莫斯科做客，主动和铁托结拜成兄弟，举行盛大宴会，为他们的兄弟情谊而干杯，千方百计要铁托跟着“老大哥”的指挥棒转。

1946年5月27日，斯大林再次邀请铁托访苏，先在克里姆林宫设宴招待，接着又请铁托到莫斯科近郊的别墅赴宴，特命莫洛托夫、日丹诺夫、贝利亚和布尔加宁等出席作陪。

这一晚，斯大林在喝完自制的葡萄酒和“辣椒酒”后，精神异常亢奋，亲手在留声机上选放他特别喜爱的俄罗斯民歌，听到得意处，情不自禁地跳起斯拉夫舞来，引起铁托的极大兴趣，宴会气氛格外活跃。

一曲舞罢，斯大林兴致勃勃地走到铁托的桌前，有意拉拢说：“瓦尔特，

你绝顶聪明，你我都是斯拉夫的领导人……”

铁托简直受宠若惊，慌忙站起，连连摆手，诚恳地分辩道：“斯大林同志，我怎么能和您相比，你是各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

斯大林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随即又沉下脸摇着满头银发伤感他说：“我身体不好，不会活多久了。”

铁托、莫洛托夫、贝利亚等人都说斯大林身体健壮，会长寿 185 的，斯大林摆摆手，格外动情他说：

“不，不，生理规律在起作用。你们不要欺骗我，我是知道自己的健康状况的，了解自己的体力状况的。”

铁托深感不安，又劝斯大林多多保重，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科夫等人也都围到斯大林身边祝愿斯大林身体健康，斯大林却转身望着铁托说：

“铁托应当保重，不要发生什么意外……因为我活不了多久了，而你要为欧洲活下去……丘吉尔对我说，铁托是个好人。我回答他说，‘我不知道，既然您这么说了，他必定是个好人，我将设法了解他’。”

铁托点头致谢，68 岁的斯大林若有所思，又问 55 岁的铁托：“瓦尔特，你是否健康？”

铁托恭恭敬敬回答：“谢谢，我身体健康。”

斯大林满意地点点头，以老大哥身份嘱咐小弟弟：“多保重，为了欧洲，这是必要的。”

斯大林为进一步笼络铁托，又想出新招儿，他端起一杯“辣椒酒”，向铁托一举邀请说：“瓦尔特，来，我们喝一杯‘交臂酒’。”

贝利亚一步抢到前面，麻利地端起一杯“辣椒酒”，塞到铁托手中，小声催促：“快，祝你好运！”贝利亚匆忙把铁托推到斯大林面前，斯大林伸出手，贝利亚急忙把茫然不知所措的铁托的长胳膊送到斯大林胳膊前，由贝利亚导演，斯大林和铁托喝了“交臂酒”。

斯大林、铁托各怀心事轻轻碰杯，一饮而尽，贝利亚又熟练地从两人手中接过酒杯，众人一齐热烈鼓掌，斯大林更兴致勃勃，伸出双臂与铁托紧紧拥抱。

斯大林热情地用手拍着铁托的后背，然后又抓住铁托的胳肢窝，把铁托抱起用力往上举了三次。铁托身材魁伟，足有 90 多公斤，把斯大林累得气喘吁吁，斯大林擦把汗，心满意足他说：“我还有劲！”众人一齐喝彩，称赞斯大林身体健壮，定能长寿。

铁托由此对斯大林更加敬重，斯大林仍怕不能牢牢控制铁托，就在第二天的晚宴上“杀鸡给猴看”。

斯大林把铁托和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季米特洛夫请来一同赴宴，找碴儿批评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的工作不力，又抓起一瓶葡萄酒问季米特洛夫：“这是保加利亚的葡萄酒吗？”

季米特洛夫仔细辨认后点头承认，斯大林冷笑一声故意编造整人的借口说：“不对，这是南斯拉夫的葡萄酒，是保加利亚人战时从南斯拉夫抢来的！”

对斯大林如此强辞夺理，季米特洛夫敢怒而不敢言，宴会陷入沉默之中。斯大林见他的目的已经达到，就热情洋溢地告诉铁托，将派大批苏联政治、经济、军事专家，到南斯拉夫帮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铁托将此视为老大哥的“无私援助”，表示南斯拉夫将起到社会主义阵营前哨国的作用，对付美英等西方国家的和平攻势。

从 1947 年开始，铁托越来越清楚地感觉到，苏联和南斯拉夫之间有些事情越来越不对劲儿：

“在政治方面，苏联人在南斯拉夫享有种种特权，肆意在南斯拉夫党和政府中培植亲信，建立情报网，公开宣称苏联有权了解和掌握南斯拉夫的各方面情况，对南斯拉夫完全采取老爷态度。铁托在谈到苏联人时厌恶他说：“南斯拉夫需要的是做工作的人，不需要发号施令者。发号施令，我们自己会干！”

在经济贸易方面，苏联强迫南斯拉夫接受一系列不平等条件，用“混合公司”的名义操纵南斯拉夫的经济命脉，肆无忌惮地攫取一切利润，南经济界领导人鲍里斯·基德里奇愤怒地谴责“俄国人的粗暴霸权”说：

“斯大林不是把我们当作社会主义国家对待，而是像在任何其他领域一样，让南斯拉夫落入俄国人的利益范围里，即在他们的霸权控制之下，种种迹象表明，这是经济上的剥削！”

在军事领域，苏联公开主张以苏军代替南斯拉夫军队，甚至说：“你们要军队干什么？不是有我们吗？”

铁托等人为维护祖国主权对苏联官员稍有不满意，便被苏方骂为“发疯”，诬蔑他们是美国和英国的间谍，要抓起法办，格杀勿论。

为抵制苏联的霸权控制，铁托和季米特洛夫商议搞“巴尔干联邦计划”，斯大林得知此事勃然大怒。1948 年 2 月突然要南斯拉夫、保加利亚领导人到莫斯科去谈巴尔干问题。

铁托料想此次莫斯科之行凶多吉少，就托故推辞，只派他的副手卡德尔应召赴苏。

果然，斯大林像教师爷训斥小学生那样斥责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搞巴尔干联邦，指责南斯拉夫在外交政策上不同苏联“磋商”，不听苏联调遣，训斥南斯拉夫不应支持希腊共产党的游击队，当美英的“应声虫”。

卡德尔急忙解释说铁托和南斯拉夫忠诚于社会主义阵营，斯大林咆哮着打断卡德尔的解释训斥道：

“你们的问题不是错误，而是你们正在执行一条与我们完全不同的路线，这是不能容忍的！”

第二天，斯大林命外交部长莫洛托夫通知卡德尔：南斯拉夫必须养成在外交上同苏联“磋商”的习惯，擅自行动的事再也不许发生，还责令卡德尔以政府名义签署一项务必就外交问题与苏联“磋商”的协定。

当天午夜，卡德尔被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召到他的办公室，莫洛托夫二话不说，从桌上拿起一个蓝色夹子，塞到卡德尔手里，粗暴地要卡德尔签字。

卡德尔看罢蓝色夹子里的两页纸协定，一股屈辱之感袭上心头，双眼流出愤懑的泪水，真想拂袖而去，但想到铁托相机行事的指示，见实在没有退路，只好提笔签字。

卡德尔实在不甘心这样束手就擒，眼珠一转，计上心来，故意把他的名字签在莫洛托夫应签的地方，又故意以手击额说：“对不起，我签错地方了。”

莫洛托夫明知卡德尔软磨反抗，但却抓不住把柄，只好重新准备文件，第三天监视卡德尔签字，签完字就将卡德尔赶走，竟无一人前往机场送行。

为迫使铁托就范，斯大林下令对南斯拉夫进行经济制裁。中断了苏南贸易，两国关系急剧恶化。

铁托顿时有黑云压城之感，急忙于1948年3月1日召开中央会议协商对策。大部分人主张为维护国家主权顶住苏联的强大压力，没料到亲苏分子向斯大林打了小报告。斯大林大发雷霆，对赫鲁晓夫等人说：“我只要动一动小手指，铁托就得完蛋！”

斯大林一声令下，苏联开始从南斯拉夫撤走专家和技术顾问，但却继续向南斯拉夫贸易部长基德·里奇索取情报。1948年3月20日，铁托以总理资格给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写信，讲明南斯拉夫的严正态度：

“基德·里奇部长的助理斯尔增斯奇，向你们的贸易代表列别德杰夫声明，根据南斯拉夫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决议，他无权提供任何重要的经济情报，苏联人想得到情报，应该找上面去要去。也就是说，找南共中央去要。这种说法是对的……早就告诉你们的人，苏联政府的正式代表，可以从我国的领导机关直接得到一切重要的和必要的情报。我们方面的这样一种决定，是根据下述情况做出的，即我们各部的每一个官员，曾经直接向任何希望得到情报的人，提供必要和非必要的情报，泄露了国家和经济方面的重要秘密……”

斯大林接到莫洛托夫送来的南斯拉夫来信大发雷霆，连续几189天策划报复南斯拉夫的措施，3月27日命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拉弗伦特杰夫和临时代办阿尔姆雅尼诺夫，闯进铁托的萨格勒布别墅，向铁托递交苏共中央委员会的一封信。

铁托知道这两个苏联外交官来者不善，既未同他俩握手，也未让坐，接过信件，站在写字台边草草一阅，顿觉大事不好。

原来，斯大林指责南共已背叛马列主义，硬说南人民军总政治部主任伏克曼诺维奇等4个南共重要领导人是英美间谍、“令人怀疑的马克思主义者”，还用强硬口吻发出威胁说：

“我们相信，托洛茨基的政治野心是足以使人受教益的！”

斯大林明明白白告诉铁托：托洛茨基已在1940年被暗杀于墨西哥，南斯拉夫若斗胆与苏联作对，铁托就要面临与托洛茨基同样的下场！

铁托连续召开南共领导人会议，决定不惜一切维护南斯拉夫主权，于是巧妙又理直气壮地给苏联回信称：

“无论我们每一个人是多么热爱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他绝不许因此稍稍不爱自己的同样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具体他说，热爱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数十万最进步的人类为了它而牺牲了自己！”

斯大林又几次写信给铁托施加压力，都遭到拒绝，便在1948年5月19日派特使去见铁托，要他出席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共产党及工人党情报局会议，铁托斩钉截铁拒绝说：

“不，我不去，我们是被告，我们将被传讯到被告席上，我们却不知所以然。”

苏联特使注意到斯大林的画像已被摘下，对此大吃一惊，铁托也不想解释因钉子松掉下来还未装修好的误会。

斯大林接到苏联特使的报告怒不可遏，下令把共产党及工人党情报局办事机构从贝尔格莱德搬到布加勒斯特。6月28日发表共产党及工人党情报局决议，宣布铁托和南斯拉夫背叛马克思主义，是“叛徒”、“特务”、“帝国主义的间谍”，公开号召推翻铁托政权，将南斯拉夫开除出共产党及工人党情报局。

美国对苏联和南斯拉夫关系破裂喜出望外，派总统顾问艾夫里尔·哈里曼率团访问南斯拉夫。铁托身穿手工缝制的珠灰色元帅服，“一副十足的芝加哥阔大亨派头”，满面笑容接见美国客人。

哈里曼发现铁托充满自信，外语造诣又极深，时而用地道的德语、俄语，时而用英语同哈里曼交谈，着重讲明南斯拉夫同苏联决裂的重大意义和为此必须具有的巨大勇气。

铁托谈到为应付苏联万一向南斯拉夫发动突然袭击，希望美国和国际社会予以阻止，为此需要实现南斯拉夫工业化计划和发展出口，因而希望提供经济援助。哈里曼说他对此抱同情态度，答应把铁托的要求向美国总统杜鲁门转达。

哈里曼发现铁托讲话自信而有力，偶而弹弹烟嘴，以表示他发言的重点。哈里曼请求铁托释放斯特皮纳茨大主教。铁托断然拒绝说：“请不要提斯特皮纳茨大主教，这件事我早听腻了。”

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办公室主任乔治·凯南认为，苏南关系破裂是“西方盟国的幸事”，“在苏联集团铁板一块上出现这种破裂极为重要”，“认为这是南斯拉夫民族独立和自身利益的觉醒”。建议杜鲁门谨慎从事并暗中予以支持。“因为斯大林显然决心要用政治、经济手段并在有机会的时候采取军事手段来粉碎南斯拉夫的背叛行为。美国的政策应该是挫败斯大林的计划，而又不在这一过程中惹怒他”。

美国总统杜鲁门认为哈里曼和凯南的话言之有理，就写信给美国国会，要求对南斯拉夫提供援助，他认为这“符合美国的利益”。

经美国国会批准，美国从1949年夏天开始对南斯拉夫提供经济援助，首先发放供应一座轧钢厂设备的出口许可证，又提供美国进出口银行的2000万美元贷款，帮助南斯拉夫向世界银行和联邦德国商借开发贷款，支持南斯拉夫获得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又在同年年底任命老资格外交家乔治·艾伦为美国驻南斯拉夫大使。

美国总统杜鲁门授权艾伦上任后向铁托转达美国总统的话：“美国对独立国家主权完整的支持，像适用于其他任何国家一样，完全适用于南斯拉夫。美国还将同伦敦采取一致行动，即一旦斯大林的咆哮发展成为更明显的威胁的话，就向南斯拉夫提供政治和武器援助。”

1950年夏天，南斯拉夫发生严重旱灾，粮食奇缺，出口枯竭，铁托派外交部长卡德尔10月19日访美，向国务卿艾奇逊要求提供大量贷款和赠款。

艾奇逊是美国“雾谷”（国务院）里讲话艺术水平最高的发言人，为美国新教圣公会主教的儿子，人称“身穿英国式双排纽扣西服的花花公子”，此时彬彬有礼他说：

“目前，我们在提供军事援助、对华政策等问题上都遇到国会的实际困难，我提请外交部长阁下注意，由于你们和我们都会遇到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美国不可能对南斯拉夫承担重大的财政援助计划，暂时只能以零敲碎打的办法，比如从对欧洲的援助中打些主意，帮你们度过难关。”

经国务卿艾奇逊出面安排，美国从马歇尔计划的执行机构经济合作署和美国进出口银行方面，筹集了3000多万美元购买小麦，又说服国会批准把原先拨给美国经济合作署的5000万美元转供救济南斯拉夫之用。这样七拼八凑，到1951年8月，美国向南斯拉夫提供了1.5亿美元的经济援助。

艾奇逊接见波波维奇，只见这个大使气宇昂然，仪表堂堂，面无奴颜卑

膝之相，艾奇逊佩服地夸他“不愧为跟铁托一道打游击的一员干将”。在回忆录中艾奇逊亲笔记下他的感受：

他提出南斯拉夫要求得到的军事装备的项目和数量，他又很不愿意说明南斯拉夫现有物资的存量，也不谈苏联将采取什么方式进攻南斯拉夫，更不谈双方将在什么地方作战，而这类事情都是五角大楼官员们特别关注的。我认为南斯拉夫人的沉默寡言倒是个聪明办法，他们最懂得他们需要些什么，也会很好地使用它们……美国终于在 1951 年给了南斯拉夫大约 6000 万美元的军事物资，以后几年还要多一些。这使铁托度过了他的难关。

铁托在国际交往中，远交近攻，纵横捭阖，同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在不失原则的情况下友好相处，获得 10 亿美元的军事经济援助，在苏联的巨大威胁面前站稳了脚跟。苏联骂铁托投靠帝国主义，铁托义正词严地回答：

无论如何，社会主义不是供出售的商品。我们目前有困难，需要援助，但我们决不是叛徒。没有什么了不起，地球还在转动！

1953 年 3 月 5 日斯大林逝世后，苏联缓慢地吹起一股“解冻”之风，3 个月后向南斯拉夫派出新任大使，打开了长年僵持的苏南关系。

1954 年秋，苏共中央派苏中央国际部的特别代表专程来到北京，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苏联特别代表介绍了苏联关于恢复和改善苏南关系的意见，解释苏联已经采取的行动，苏特别代表着重指出：

苏共中央认为，共产党及工人党情报局 1948 年关于南斯拉夫的决议是不公正和有错误的，继续保持与南斯拉夫的紧张关系是不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希望各兄弟国家都与南斯拉夫恢复和建立正常关系。为了与各 193

兄弟党协调一致，建议中国也采取同样的行动，相应地改善与南斯拉夫的关系。

当时的中南关系处于微妙状态。早在 1949 年 10 月 5 日，南斯拉夫就致电新中国愿意建交，但鉴于南斯拉夫已被开除出社会主义阵营，为与苏联东欧国家保持政治上的一致立场，新中国对南斯拉夫在建交要求采取了既未接受、又未拒绝而留有余地的态度。

当时中南虽未建交，但南斯拉夫对新中国采取友好态度，坚决主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多次在联合国等国际场合反对美国对中国的侵略行径，投票赞成有利于中国的提案。

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负责同志认为苏联关于改善与南斯拉夫关系的建议是合理的，决定与南建交，得到南斯拉夫的积极响应，中南很快于 1955 年 1 月 11 日建交，中国决定派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出任驻南大使。

毛泽东、周恩来命伍修权赶在赫鲁晓夫访南之前到达贝尔格莱德，向铁托递交国书。伍修权在致颂词中首先代表中国人民和国家领导人，对铁托总统和南斯拉夫人民表示敬意和美好祝愿，表示将在任期内尽全力发展中南友好关系。铁托在答词中也指出中南建交对发展和巩固中南两国关系及推进国际合作事业，都具有很大意义。

赫鲁晓夫亲自率团访问南斯拉夫是轰动世界的大事件。赫鲁晓夫为何此时屈驾访南？

原来，在赫鲁晓夫当权后，为树立他有别于斯大林的形象，1954 年 6 月 22 日即给铁托写信，承认苏联过去对南斯拉夫的态度是错误的。

铁托吃够了苏联的苦头，复信称不听空话，要看行动。赫鲁晓夫便决定亲自到南斯拉夫访问，加紧做弥合苏南关系的工作。

作为堂堂大国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在贝尔格莱德一下飞机，就向一个小国的国务活动家铁托赔礼道歉：

“我们对苏南关系中发生过的事件表示诚挚的遗憾，并决心铲除前一时期所产生的一切淤积……”

赫鲁晓夫见铁托无动于衷地站在那里不置可否，就鼓动如簧之舌，把苏南关系破裂的责任都推到贝利亚和阿巴库莫夫两个苏联秘密警察头子身上，并说明两人最近已被处死。赫鲁晓夫还以苏联最高领导人身份说：

“我们彻底研究了那时的严重罪责和侮辱南斯拉夫领导人的材料。事实是，这些材料是人民的敌人和帝国主义的可鄙代理人炮制的，他们通过欺骗，混进我们党的队伍……”

赫鲁晓夫以为他的公开认错之举肯定会使铁托感激涕零，臣服在自己脚下，没想挨够了苏联整的铁托仍不理睬。他无可奈何，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对看了一眼，只得登上汽车前往宾馆，但他还想在苏南会谈中降服铁托。

在苏南首脑会谈中，赫鲁晓夫小心翼翼，不敢开罪铁托。这不是他怕铁托，而是铁托关系到他搞非斯大林化的成败，更与他能否打倒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等苏联重要领导人密切相关。

赫鲁晓夫以他农民的自私和短见，打算与铁托搞私下交易，答应铁托和南斯拉夫可以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换取铁托成为他搞臭斯大林和打倒内政对手的同盟者和帮手。

赫鲁晓夫又认为铁托已被美国和西方“收买”，现在苏联必须用妥协办法把他赎回，赫鲁晓夫绕着大弯说：

“我们相信，资本家不会白给斯拉夫人钱，不会不讨回代价的，但是只要你们返回社会主义阵营，就可以用各种计谋，引诱美国人，掏美国人腰包里的钱。”

195

铁托不为所动，坚持要走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道路，但向赫鲁晓夫保证，他与西方打交道时，将始终坚持共产党人立场，不出卖南斯拉夫国家主权和苏联利益。

赫鲁晓夫见话不投机，心中不悦，但为拉拢第三世界国家，不敢开罪铁托，他仍设法要铁托服从苏联的权威：

“铁托同志，你知道士兵和连队的关系吧？士兵必须同连队保持一致，而不是相反，不能要求连队向士兵看齐，也不能要求整个东方集团向一国看齐。”

铁托知道赫鲁晓夫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对其说教置之不理。赫鲁晓夫无奈，只得与铁托签署了《贝尔格莱德宣言》，在策略上让铁托一步棋，使南斯拉夫取得“难以想象的胜利”。

赫鲁晓夫自以为得到铁托的支持，更加有恃无恐，便悍然在1956年2月的苏共二十大上做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起劲地搞丑化斯大林的活动。

为搞臭斯大林，赫鲁晓夫邀请铁托同年6月访苏，像迎接当代英雄一样，到处举行仪式欢迎铁托。赫鲁晓夫让十月革命的老战士克利门特·伏罗希洛夫元帅以苏联国家元首身份，老泪纵横，向铁托赔礼道歉说：

“我是一个蠢坯。我根据斯大林的指示，不得不说了那么些愚蠢的话。我羞愧不堪……请您原谅我！”

为讨好铁托，赫鲁晓夫与铁托6月20日签署了《苏南莫斯科宣言》，承认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道路，其“形式的丰富多彩有助于它自身的强大”。

3个月后，为向铁托讨教求援，赫鲁晓夫又于9月19日访南，竟在贝尔格莱德停留14天，然后又请铁托与他一起返回苏联，9月27日到克里米亚休假。

让人惊奇的是赫鲁晓夫在一个多月后，又于11月2日秘密访问南斯拉夫，拉铁托与他一起合作共事。赫鲁晓夫要求南斯拉夫回到“社会主义阵营”，强调“协调是必要的”，他警告铁托说：

“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是一致的，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不能自由行动，不能每个国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如果那样，将是工人阶级的巨大不幸！”

铁托久经风霜，怎肯轻易上当？赫鲁晓夫又借祝酒之机以售其奸：“铁托同志，让我们为牢不可破的友谊，为阵营，干杯！”

铁托当即识破赫鲁晓夫的诡计，以幽默的语言回敬道：“阵营？我是这样想象的：它仿佛用铁蒺藜围着，呆在里头一定很不舒服赫鲁晓夫被噎得说不出话来，干生气，没有办法，但暗中咬牙切齿，心想一有机会非整死铁托不可！”

美国见赫鲁晓夫那么起劲地拉拢铁托，更卖力地同苏联争夺他。杜鲁门、艾森豪威尔利用向南斯拉夫提供经济、军事援助的机会，抵制苏联的影响，控制南斯拉夫。

1954年南斯拉夫再次遭受旱灾面临饥谨威胁，铁托派他的老战友伏克曼诺维奇访美，要求提供一批小麦援助，美国却想借购此小麦的货币第纳尔在南斯拉夫搞工程投资，并对这些工程的实施进行监督。为维护国家主权，伏克曼诺维奇断然予以拒绝。

美国谈判代表罗伯特·墨菲大惑不解，恼怒地问：“你们将来吃什么？”

伏克曼诺维奇用南斯拉夫一句经典的语言回答：“我们将吃树叶——像在战时一样！”

面对苏联、美国的拉拢威胁，铁托巧妙地回答：“我们既不想当西方的仆从，也不想作东方的卫星国，我们只想保住一个独立国家的地位！”

铁托觉得与美苏相比，毛泽东的新中国才是南斯拉夫真正的朋友。1955年5月，铁托派贝柯维奇为首的南斯拉夫工会代表团，197来中国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活动，邓小平与贝柯维奇进行了亲切的会谈，对消除误解、改善中南关系具有很大作用。

贝柯维奇在“五一”节游园中发现中国一幅世界地图对南斯拉夫画法不对，将南斯拉夫划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一部分，把南斯拉夫标为美国的军事基地。贝柯维奇对此表示不满，中国接受他的意见，让有关部门把那幅地图取掉了。南斯拉夫官员对此非常满意，称赞中国才是他们真正的朋友！这正是：

维护主权任纵横，铁托如铁骨头硬。

不畏美国不惧苏，独立自主人称颂。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临危不惧 周恩来调处波匈事件 后发制人 毛泽东教训赫鲁晓夫

话说斯大林逝世，特别是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使美国和西方帝国主义欣喜万分，借机兴风作浪，令中美苏三国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

斯大林一逝世，美国情报机关认为这会是一场混乱，严重削弱苏联的力量。因为苏联新任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首先要致力于对苏联国内和东欧及中国的控制，在外交方面不会采取新的政策。于是它们建议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抓住千载难逢的机会。乱中取胜，使美国在对付社会主义阵营的斗争中占上风。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指示美国前国务卿艾奇逊、美国前驻德国占领区军事长官克莱将军，拨出专款扩建“美国之音”和“自由欧洲”两个电台，加紧向苏联和东欧国家及中国开展和平演变攻势，鼓动东德工人举行针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示威游行，怂恿东德工人把罢工扩大到整个东德。

赫鲁晓夫见东德形势危急，让马林科夫下令把苏军坦克轰隆隆开进柏林、德累斯顿、莱比锡、马格德堡和耶拿，将东德的示威罢工镇压了下去。赫鲁晓夫又玩弄诡计，把马林科夫赶下台，由他出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开始了苏联的“赫鲁晓夫时代”。

赫鲁晓夫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刚把世界头号社会主义大国的 199 政权抢到手，地位还不稳固，为取得毛泽东的支持，共同对付艾森豪威尔，便率苏联代表团于 1954 年 9 月底访华。

毛泽东和赫鲁晓夫首次以中苏首脑身份进行会谈，彼此尊重，热情而友好，赫鲁晓夫向毛泽东请教如何对付艾森豪威尔和美国人。毛泽东缓缓抬起头来，看赫鲁晓夫一眼，“用一种文静的、不受拘束的声音”说：

“国际形势总的说来对我们是有利的，首先是各国人民积极地行动起来了，抬起头来了。帝国主义的威风被煞下去了好多，不再像以前那样嚣张、盛气凌人、轻举妄动了。实际上，他们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

赫鲁晓夫感到从毛泽东身上透出一种咄咄逼人的气势，对他关于中苏共同对手艾森豪威尔的分析极为佩服，但又有些不服气，就以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乌克兰矿工的水平在毛泽东面前显示他的“领袖气质和水平”说：

“帝国主义却没有睡大觉，而是天天在蠢蠢欲动，图谋不轨，想达到他们的罪恶目的。诚然，他们的气焰的确没有以往那么嚣张，但他们确实还在活动着。”

赫鲁晓夫认为经他软硬兼施暂时把铁托拉了过去，毛泽东又同意与他一起对付艾森豪威尔，不由沾沾自喜。为了“降服”毛泽东，赫鲁晓夫决定给中国一些甜头，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在我们同中国人的会谈中，我告诉中国人，我们主要关心的是保护苏联，保护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保护中国的问题。为了保持我们自己的防卫态势，我们必须为伟大的中国人民发展其工业做出贡献。我们同意给中国人民派遣军事专家，给中国运去了大炮、机关枪和其他武器，以加强中国，从而也就是加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

总之，只要我们的物质条件允许，我们就尽量满足中国

人的要求，我们必须一致努力去对付共同的敌人。我们的敌人日本虽然已被打败，但仍是潜在的威胁，而现在，一个大得多的威胁则来自美国，它

曾在紧靠中国的朝鲜发动战争。

在中苏首脑会谈中，赫鲁晓夫为控制中国，邀请中国参加经互会，毛泽东说“没有这个必要”，予以婉拒；中国请求苏联帮助搞原子能和核武器，则被赫鲁晓夫拒绝。

毛泽东担心赫鲁晓夫不是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对手，就好心地提醒他说：

“赫鲁晓夫同志，你做事要谨慎，说话注意分寸，要有内外、亲疏、远近之分，不要被敌人抓住把柄，钻空子！”

赫鲁晓夫不把艾森豪威尔放在眼里，目空一切哈哈大笑道：“咱们也有嘴巴，也会反咬他几口的！”

毛泽东见赫鲁晓夫不是可以推心置腹谈话之人，就想早点儿结束会谈，于是，便从大局着眼，答应与苏联在对付美国等国际交往中协同步调，并十分客气地“感谢苏联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的无私援助”。

赫鲁晓夫得意洋洋但又故作谦虚之态说：“不，不能说是无私的，而应当说是有私的；援助中国实际上也是帮助我们自己，中国强大起来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

毛泽东对此话甚表赞成，慢悠悠抽口烟说：“我们应该相互支持，只是我们还很穷，想多办点事，还力不从心。总的来说，还是你们帮助我们的多一些。”

1956年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多事之秋，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更将这一年视为他政治生涯的关键性阶段。这个乘着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龙卷风爬上苏联最高地位的人，要在这个风源处发射否定斯大林的“政治原子弹”。

赫鲁晓夫知道要反斯大林，中国这一关不好过，就在1954年借参加新中国诞生五周年庆祝活动之机，来北京和毛泽东会谈，企图寻找反斯大林的后台。毛泽东客观地评价斯大林的功过是非，极力维护斯大林的权威，对赫鲁晓夫提出善意的批评，希望他谨慎从事，更提醒他丑化斯大林会在全世界引起强烈反响，在社会主义阵营制造混乱，劝他不要做亲者痛、仇者快的愚蠢之事。

赫鲁晓夫听不进去，执意我行我素，加紧炮制丑化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企图在1956年2月14日至25日召开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抛出。

赫鲁晓夫不敢在苏共二十大上一开始就大张旗鼓地攻击斯大林，认为那样在苏共广大党员中通不过，中国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党也不赞成，就在大会期间按兵不动，而千方百计地同由德高望重的朱德率领的由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和刘晓组成的中国代表团拉关系。

赫鲁晓夫安排朱德第一个致贺词，朱德代表中国共产党的900万党员和6亿中国人民向苏联共产党致以热烈的兄弟般的祝贺，发言内容热情友好，最后宣读了由毛泽东签名的中国共产党委员会致大会的贺词。朱德的讲话受到热烈欢迎，把中苏友好气氛推向高潮。

赫鲁晓夫抓住苏共二十大已经结束的机会，利用他已当选为苏共第一书记有人事安排提名权的地位，把已回到各地的苏共代表匆匆接回莫斯科，召开秘密会议，抛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骂斯大林为“暴君”、“刽子手”、“干尽了坏事”。

为拉拢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支持他反对、否定斯大林，赫鲁晓夫邀请朱德等参加苏共中央举行的座谈会，又接见中国代表团，吹捧他们反对个人迷信

具有重大意义，宣称苏共将采取措施消除个人迷信遗留的不良影响，要中国代表团表态支持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活动。朱德不愧为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与邓小平等坚持正义立场，不对此表态。

朱德率中国代表团到格鲁吉亚共和国首都第比利斯访问时，发现他的寓所突然被成千群众包围。当时，许多人担心发生不测事件，但朱德临危不惧，他像在战场上指挥作战那样从容不迫。很快中国代表团便看到格鲁吉亚人都手举斯大林同毛泽东亲切握手的油画与毛主席和斯大林的画像，因而顿时明白了这是斯大林故乡的人民对赫鲁晓夫反斯大林活动的反抗行为，便亲切地接见示威群众代表，派人参加第比利斯市纪念斯大林的集会。

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报告迅速引起全世界的巨大反响，西方记者说“这令与会者大感意外，使卫星国饱受震惊，让西方为之瞠目”，称斯大林的灵魂被赫鲁晓夫用外科手术刀斩除，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巨大困难。

赫鲁晓夫一时得意忘形，借反斯大林之机改变了他与马林科夫、布尔加宁的三套马车式权力结构，由他一人掌握大权。

赫鲁晓夫认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苏共二十大不明确表态，对他是个很大压力，便派跟他丑化斯大林最卖力气的苏联最高苏维埃副主席米高扬于1956年4月初访华，向中国施加压力。

米高扬一到北京，就大肆兜售赫鲁晓夫丑化斯大林的货色，当即被毛泽东顶了回去。之后，米高扬与中国签定了援建55个工业项目的新协定，企图以此拉中国支持赫鲁晓夫丑化斯大林，但中国坚持原则，仅回答将选择适当时机表明中国的正式立场。

不久，中国打破意味深长的沉默，于1956年4月5日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长篇文章，郑重地向世界宣告：

“世界上的一切反动派，在最近一个多月以来，兴高采烈地谈论苏联共产党关于个人迷信的自我批评。反动派以为他们抓住了一个能够用来中伤苏联和世界各国共产党的把柄了。可是，反动派毕竟是心劳日拙的。”

203

毛泽东亲自抓的这篇重头文章客观地分析了斯大林的功过，提出了产生个人迷信的原因和防范措施，对帮助各国共产党澄清思想混乱、加强团结起了很大作用，初步稳住了被赫鲁晓夫扰乱的阵脚，也提高了毛泽东和新中国的世界地位。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国务卿杜勒斯很快发现了赫鲁晓夫、毛泽东对斯大林的不同态度。杜勒斯1956年5月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外长会议上发出警告说：

“共产主义正在亚洲取得进展，中国牌子的共产主义比俄国牌子的共产主义威胁更大，因为中国控制的人口更多，在亚洲享有文化威望，而俄国无论在亚洲、在欧洲都没有这种威望。加之亚洲许多自由国家都有大批中国侨民，我担心毛泽东可能实行分而治之、各个击破的办法，因为这个地区的非共产党国家在地理上是分散的，在政治、文化和经济上是分裂的，西方决不能抛弃这些国家，因为利害关系实在太大了。”

艾森豪威尔、杜勒斯发现西方很难在亚洲以售其奸，而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却在东欧国家中引起严重的思想混乱，就决定首先在东欧国家加紧进行和平渗透，在东欧制造混乱。

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于 1956 年 6 月下令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全文发表，让“美国之音”和“自由欧洲”两个电台向东欧反复广播。为了加强宣传攻势，美国在每年 1 亿美元的反动宣传经费基础上，又追加 2500 万美元经费，使每天的广播增到 14~18 次。美国众议院还成立“匈牙利事务委员会”讨论匈牙利的“解放”问题，并邀请匈牙利小农党前首领纳吉·弗伦茨和几位军官与会，策划在匈牙利、波兰制造反革命事件，又派 600 名特务以记者身份涌入匈牙利，兴风作浪，制造事端。

赫鲁晓夫对美国和西方国家在匈牙利和波兰的捣乱行为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却派米高扬 9 月中旬再次来华，借出席中国共产党“八大”之机，压中国向苏联屈服。

米高扬在向中共八大致贺辞时，按照赫鲁晓夫的旨意，将自己凌驾于一切人之上，大搞大国沙文主义，硬说新中国取得的所有成就都是根据苏联经验取得的。

英共总书记波立特不同意米高扬的意见，认为主要是中国经验的结晶，米高扬学着赫鲁晓夫的样子对波立特大发雷霆，其粗暴态度使波立特伤心地流下了眼泪。

毛泽东、周恩来对苏联的粗暴作法看不下去，坦率地向米高扬提出批评，周恩来告诫米高扬，兄弟党之间必须有兄弟般的平等关系，而不应是父子关系，指出这是造成东欧混乱局面的重要原因。

毛泽东与米高扬会谈时明确表示中共对共产国际和苏共的作法是有意见的，并且说，我们现在就要开始讲话了，甚至还要骂人了，我们的嘴巴是封不住的，但目的是为苏共好，以便苏联能及时处理东欧的混乱局面。

赫鲁晓夫之流根本听不进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的坦率而善意的劝告，继续对东欧实施强暴压榨政策，导致匈牙利和波兰事件更趋严重。

1956 年 10 月 23 日，美英间谍特务挑拨匈牙利一些人发动武装叛乱，占领首都布达佩斯，成立反革命政府，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美国和西方驻匈机构煽风点火，直接卷入 10 月的匈牙利流血冲突。

艾森豪威尔、杜勒斯命美国驻匈公使馆向暴乱分子提供无线电发报机，用它与“自由欧洲电台”保持联系；英国驻匈武官更充当了暴乱分子的顾问。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于 10 月 27 日公开在得克萨斯州发表讲演，叫嚷要成立一个匈牙利政府，取代匈牙利现政府。美国还指使国际红十字会建立了维也纳至布达佩斯的“空中桥梁”，开放奥地利与匈牙利边境，源源不断地向暴乱分子供应武器弹药。

205

在美国和西方国家大力煽动和支援下，匈牙利和波兰事件越闹越大，赫鲁晓夫被吓破了胆，不知所措，急忙向北京发来“十万火急”的电报，请求毛泽东出面扭转东欧的复杂局面。

毛泽东、周恩来对波匈事件寝食不安，见赫鲁晓夫的指挥棒不灵了，便从共产主义运动的全局出发，为挽救匈牙利、波兰，决定派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和总书记邓小平远征莫斯科解决难题。

刘少奇、邓小平到莫斯科机场一下飞机，看到只有赫鲁晓夫一人前来欢迎，心中好生纳闷，却也不便多问。

原来赫鲁晓夫被波匈事件搞得六神无主，没有同苏共政治局其他人商量

就邀请中共代表团帮助解危，又怕中国人不帮他的忙，为摸中共代表团的虚实，他一个人偷偷驱车到机场迎接。

赫鲁晓夫像盼来了救星，以异乎寻常的热情拥抱刘少奇并将刘少奇拉到他的车上，然后轻声细语他讲述匈牙利事件：

“哎呀呀，美国人太厉害了，西方反动势力涌到奥匈边界，窥测动向，蠢蠢欲动……啊呀，真是太可怕了，太危险了！”

刘少奇、邓小平到宾馆后还没坐定，又被赫鲁晓夫拉到桌旁大讲特讲：

“匈牙利已成无政府状态，共产党员和干部被绞死，太可怕了！好在苏联驻匈家属和部分苏军已经撤出布达佩斯，撤向边境了！”

邓小平见事态紧急，果断地发表关键性意见说：“不能撤退！”

赫鲁晓夫大惑不解，睁圆双目不悦而问：“为什么？”

邓小平气贯长虹，侃侃而谈：“红军不能撤退，撤走了帝国主义就进来了。要站稳脚跟，坚守岗位！红军这么大的力量，还对付不了那么几个反动派？”

赫鲁晓夫双手一摊，垂头丧气说：“你们不了解美国人的厉害，匈牙利看来保不住了。”

邓小平义愤填膺、斩钉截铁他说：“苏军不能撤出匈牙利，不应把革命阵地拱手送给敌人。要全力支持共产党内坚定可靠的党员，协助他们掌握住政权，把党员、革命力量、积极分子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形成坚强的堡垒。要掌握军队和警察的力量，让他们守住阵地，保护政权，维持秩序，坚决保卫党和政府机关不受破坏！在这方面，苏联军队应起模范作用，这才是真正的国际主义……”

赫鲁晓夫摸到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底，便转身要走。这时，刘少奇把他挽留下来，并对他的外交政策特别是老子党态度提出严肃批评，且要求在苏共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赫鲁晓夫被迫答应了刘少奇的要求。

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坦率地指出波匈事件同苏共的大国主义有密切关系，对兄弟党指手划脚，强加于人，给美国和西方国家造成可乘之机。

邓小平诚恳地劝苏共进行自我批评，中共再补台，帮助苏共渡过难关。

赫鲁晓夫为形势所迫，只得以苏联政府的名义，于1956年10月30日发表《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承认犯了大国主义的错误，今后将采取措施予以克服。

第二天，中国政府即发表声明，支持苏联的宣言，强调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更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大国沙文主义错误必然会给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带来严重的损害。11月6日，中国政府无偿地向匈牙利赠送价值3000万卢布的物资。

艾森豪威尔见中国全力支持苏联处理波匈事件，他指示杜勒斯发表煽风点火的讲话，并下令每天向匈牙利运送800辆汽车的粮食和武器弹药，鼓励匈牙利叛乱分子继续活动。

为进一步做赫鲁晓夫的工作，毛泽东11月30日接见苏驻华大使尤金，向赫鲁晓夫赠送清朝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诗：

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

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毛泽东赠这首诗的目的是想劝赫鲁晓夫，对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平等相

待，以共同对付帝国主义。

毛泽东怕赫鲁晓夫对中国的意见不理解，同时为了加强共产主义阵营内部的团结，以对付美国和西方，他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并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

在这篇文章中，中国共产党从理论上阐明，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存在两类性质不同的社会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并应正确处理这两类矛盾。

这篇文章在全世界引起强烈反响。赫鲁晓夫想借重中国的力量抗衡艾森豪威尔，他指示苏联广播电台反复播放这篇文章，还在 1957 年元旦招待会上，故意当着美驻苏大使的面，把中国驻苏大使刘晓请到主席台就座，热情拥抱，对刘晓说：

“我读了中国发表的文章，它写得好极了，我同意里面的每句话和每个字！”

为向美国显示强硬立场，赫鲁晓夫在同中国大使刘晓谈话时还向美国发出警告说：

“现在有人想逼我们后撤，不，我们决不后撤！社会主义阵营的边界只能向前推进，决不后撤！西方敌对势力的阴谋是完全不可能得逞的！”

赫鲁晓夫还得意洋洋他说，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未能在匈牙利得手，证明美国所说的“解放”东欧只不过是一句空话……

这时，艾森豪威尔刚刚战胜竞选对手史蒂文森，再次当选为美国总统。他对赫鲁晓夫自不量力地发表这样的讲话，冷笑连声，便在 1957 年伊始对社会主义阵营发动新的进攻：他再次制造台湾海峡危机，又派遣大批武装特务进入匈牙利、波兰。匈牙利红衣大主教明曾蒂也捎口信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称：

“在匈牙利人民为自由而进行的战斗中。请你支持匈牙利人民，并且安排打开奥地利边境，以便供应物资和武器。”

艾森豪威尔命美国和西方新闻媒介大肆宣传明曾蒂的请求。怂恿英、法等国在波兰、匈牙利混水摸鱼，遂使波匈事件更加严重。

赫鲁晓夫被艾森豪威尔、杜勒斯煽风点火搞的波匈事件弄得焦头烂额，束手无策，就又向毛泽东发去十万火急的电报，请著名外交家周恩来出面解决波匈危机。

1957 年元旦，周恩来正在访问印度，毛泽东打电话告诉他：赫鲁晓夫要求你去承担东欧的紧急任务，因为在华沙和布达佩斯，苏联人说话已经失去了威信。

周恩来肩负时代的重任，于 1957 年 1 月 7 日迎着皑皑白雪抵达莫斯科，赫鲁晓夫以异乎寻常的热情欢迎周恩来，安排他住在克里姆林宫沙皇住过的宫殿内，迫不及待地提出要求：

“感谢中国同志对我们的支持，希望中国同志继续运用自己的影响，协助我们对波、匈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做些工作。”

周恩来答应尽力帮助，但认为必须解决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否则就无从谈起，他单刀直入提出问题说：

“斯大林犯了许多错误，但他并不总是犯错误。斯大林一生为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赫鲁晓夫本不愿接受这个意见，但现在有求于周恩来，只好随声附和说：“是的，斯大林同志虽然犯了严重错误，但他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美国在波匈兴风作浪的同时，也在民主德国制造事端，赫鲁晓夫被弄得草木皆兵，忙请周恩来与正在莫斯科的民主德国领导人格罗提渥举行会谈，制定粉碎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颠覆民主德国的计划。

赫鲁晓夫又把匈牙利新领导人卡达尔请到莫斯科，让周恩来为匈牙利粉碎美国的颠覆活动出谋划策，还请周恩来务必访问匈牙利。

卡达尔面临美国和西方国家施加的巨大压力，所以特别欢迎周恩来访问匈，认为周恩来只去两小时，也是对美国的沉重打击，其作用不可估量。重要的不是中国代表团访问时间的长短，而是周恩来总理访问匈这一事实本身！

当时的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受美国反动宣传的影响，对苏联很生气。周恩来预感将有重大事件发生，便当机立断，首先飞往华沙访问波兰，调解自二战以来根深蒂固的波苏矛盾。他与波兰各阶层人士广泛接触，强调反帝斗争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使波兰人民对苏联的敌对情绪逐渐缓和下来，同意坐下来与苏联协商解决日趋尖锐的波苏矛盾。

这时，匈牙利一些人在美国煽动下，推倒了 25 米高的斯大林塑像，将不少共产党人置于死地，匈牙利形势岌岌可危。

在匈牙利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周恩来于 1957 年 1 月 16 日乘一辆避弹汽车进入布达佩斯，在短短的 24 小时内，出席各种集会，发表五次讲话，与匈牙利领导人卡达尔会谈 7 个小时，强调反帝斗争的重要性，号召革命者奋起粉碎美国和西方国家的颠覆活动，英勇地捍卫社会主义政权，以协商的方式解决内部矛盾。这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匈牙利人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敌视态度。最后，中匈发表联合声明，坚决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这正是：

布达佩斯起逆风，年外勾结血洗城。

总理胆气冲霄汉，稳定局势建奇功。

1957 年 1 月 17 日中午，周恩来返回莫斯科，向赫鲁晓夫通报了中国代表团访问波匈的情况，特别分析了美国和西方国家的煽动破坏作用，然后诚恳地告诫说：

“不能有大国沙文主义，特别是各国党内部事务，要由他们自己去处理，不能搞外部压力。赫鲁晓夫同志，在波兰问题上，你们处理得不够好。波兰事件同匈牙利事件不同，在波兰事件上，你们表现了大国主义，给美国和西方国家以可乘之机……”

赫鲁晓夫见中国在帮助解决波匈事件中国际威望和地位显著提高，抱着狭隘的自私心理大生嫉妒之心，粗暴地拒绝了周恩来的善意批评。周恩来看到再谈下去无益，就在请示毛泽东后离苏访问阿富汗、锡兰、尼泊尔等国。

赫鲁晓夫鉴于在中国大力帮助下，东欧形势已经稳定，又开始攻击斯大林，还把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等人打成反党集团。

赫鲁晓夫知道毛泽东肯定有不同意见，接连派米高扬、伏罗希洛夫来华征求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态度慎重，不轻易表态，赫鲁晓夫又邀请毛泽东 1957 年 11 月到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 40 周年庆祝典礼。

在列宁山举行的群众集会上，毛泽东发表讲演盛赞十月革命的普遍意义，盛赞苏联人民的伟大成就。毛泽东气势磅礴的高亢演讲在莫斯科上空久

久回荡，引来阵阵雷鸣般的掌声。赫鲁晓夫与毛泽东热烈拥抱，感谢毛泽东帮了他的忙。

在与赫鲁晓夫的会谈中，毛泽东就斯大林问题与其激烈交锋。毛泽东采取欲擒故纵之策首先说：

“斯大林同志违反集体领导的原则，独断专行造成了严重后果，你们对斯大林滥用权力的指责是正确的，苏共二十大的决定表现了伟大和英明。”

接着，又分析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错误指导，说得赫鲁晓夫眉开眼笑。接着，毛泽东把话锋一转说：

“但是，我们对苏共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做法不同意。斯大林同志毕竟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苏联、对世界革命的贡献远大于他所犯的错误。我们认为对斯大林同志应该三七开，三分错误，七分功绩，这才符合历史实际嘛，怎么能一笔抹煞呢？”

赫鲁晓夫以为毛泽东还要对他讲称赞之辞，没想到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一下子懵了，只听毛泽东以汹涌澎湃之势继续说：

“在苏共二十大上，你们采用秘密报告的形式，事先没有跟兄弟党打招呼，这就造成了国际共运的思想混乱，给帝国主义以可乘之机，所以发生了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

赫鲁晓夫犹如挨了一记闷棍，张口结舌慌忙辩解，毛泽东将大手一挥理正辞严驳斥说：

“你们说斯大林同志是暴君，是白痴，是刽子手，这怎么讲得通呢？怎么能够相信，30年来你们不是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而是生活在历史上最残酷的暴君统治之下呢？怎么能够设想，在几十年的英勇革命斗争中付出如此巨大代价的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竟然是一个白痴呢？我们怎么能够设想，30年来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竟然是个刽子手？”

赫鲁晓夫被驳得理屈词穷，便掉转话题大谈艾森豪威尔的“大规模报复战略”，认为苏联被美国作为核威胁的重点对象，太可怕了。

在1957年11月举行的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代表会议上，毛泽东以磅礴的气势分析形势，盛赞伟大的十月革命的普遍意义，以生动形象的语言驳斥赫鲁晓夫的谬论说：

“我们不应该害怕战争。我们不应该害怕原子弹和导弹，不管爆发什么样的战争——常规战争还是热核战争——我们都将取得胜利。至于中国，如果帝国主义对我们发动战争，我们也许会损失3亿多人。那又怎么样呢？打仗嘛！能不死人吗？可是我们也会生嘛！时间将会过去，我们会比从前生出更多的孩子。”

坐在毛泽东身旁的宋庆龄被这幽默的话逗得失声大笑起来，全场的人都笑了，不约而同地对毛泽东投去敬佩的目光。

赫鲁晓夫又生嫉妒之心，他认为“毛讲的活根本没有什么可笑的地方”，甚至认为这是“亵褻的说法”，是“挑逗性的话”，“毛应该考虑一下坐在他周围的人，说话应该检点一些。更为严重的是，他说话的内容令人深感不安”。

赫鲁晓夫不敢与毛泽东公开辩论，便把朱可夫推出来当枪使。于是，赫鲁晓夫指示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发表一项声明，向艾森豪威尔发出警告：对任何胆敢进攻社会主义国家即苏联的盟国的侵略势力，苏联都将给予反击。

毛泽东明察秋毫，明确地向赫鲁晓夫提出批评说：“我认为朱可夫的那

个声明是错误的。”

赫鲁晓夫认为他也讲过类似的话，矛头都是针对艾森豪威尔的“大规模报复战略”的，毛泽东不批他而批朱可夫是“毛耍弄外交手腕”，就气势汹汹反驳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不采取朱可夫声明的立场，美国侵略势力就会一点一点地把我们消灭掉……这正是帝国主义者一心想干的事。他们想分而克之。关于这一点，杜勒斯已经讲了很多。再说，毛泽东同志，朱可夫的讲话不光是代表他个人的观点，也反映了苏联政府和苏共中央委员会的看法。我们认为没有别的选择，只能采取朱可夫讲的那个方针。”

毛泽东以宏亮的声音反驳说：“不见得，如果美国从西面进攻苏联，我看你们就不应该同他们交战，你们不应该反击——应该退却。”

赫鲁晓夫瞪大双眼问道：“什么叫‘退却’？”

毛泽东含笑把手中的香烟一点：“我指的是撤退，并且坚持1年，2年，甚至3年。”

赫鲁晓夫简直如听天方夜谭，语含讥笑口风说：“根据你的建议，我们究竟应该撤退到哪里去？我们又为什么要撤退？要知道，这样做就等于是自我失败呀！”

毛泽东看此人没有战略头脑，就以二战史为例解释道：“未必，请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吧。你们不是一路撤到斯大林格勒，然后动员力量进行反攻，并且一直推进到了柏林吗？如果你们退到乌拉尔，到那时，我们中国人就能参战了。”

毛泽东见赫鲁晓夫坚持己见，又转换话题问他：“万一美国人使用核武器，我们可不可以等一等再还击？”

赫鲁晓夫以匹夫之勇毫不犹豫回答：“不行，一秒钟也不能等，必须立即还击！”

毛泽东觉得这有点儿可笑：“你怎么能算得那样准，知道人家什么时候放原子弹？”

赫鲁晓夫硬着头皮相顶：“能知道。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遭受帝国主义进攻，我们都将迅速回击，这是我们中央委员会的集体决定。”

“这种说法不对”，毛泽东直率地提出批评，“每一个国家都是独立的，要看人家请你没有。谁的决定也不对！”

赫鲁晓夫粗鲁地大叫：“我不同意，不同意！”

毛泽东见赫鲁晓夫一触即跳，不可理喻，便找一些赫鲁晓夫感兴趣的话说，强调社会主义阵营要以苏联为头领，赫鲁晓夫才有了笑容。毛泽东从中苏共同对付美帝国主义的大局出发，主动提出可以照顾苏共二十大的观点，中国只要求搞份保留意见的备忘录，使会议顺利地通过了《莫斯科宣言》。

在接着举行的64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毛泽东豪情满怀地发表大灭艾森豪威尔和西方世界威风的著名讲话：

“我认为现在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世界上现在有两股风：东风，西风。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

在热烈的鼓掌声中，毛泽东大讲美国实际上是只纸老虎，提出15年苏联赶上美国、中国赶上英国的口号。他用极其生动的比喻，来说明社会主义阵

营要以苏联为首，但苏联必须听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见。他说：

“赫鲁晓夫这朵花比我毛泽东好看。中国有句古话，叫作红花虽好，也得绿叶扶持。我看赫鲁晓夫是需要绿叶扶持的。”

毛泽东为反对美帝国主义这个共同敌人，还苦口婆心地做哥穆尔卡等人的工作。劝他们以大局为重，原谅赫鲁晓夫搞大国霸权主义的错误。为此，他把宋代女画家管道升的《我侬词》，抄送给哥穆尔卡等人。这首词云：

两个泥菩萨，一起打碎罗。

用水一调和，再来做两个。

我身上有你，你身上有我。

毛泽东呼吁全世界共产党人加强团结的意愿，被各国共产党人愉快接受。为从理论上指导各国人民更好地进行反帝斗争，毛泽东又用辩证唯物史观观点讲述美帝国主义是个纸老虎问题：

“美帝国主义没有倒，还有原子弹，我看也是要倒的，也是纸老虎……为了同敌人做斗争，我们在一个长时间内形成了一个概念，就是说，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

神奇的辩证法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使莫斯科会议取得了巨大成功，这正是：

纸老虎论放光明，莫斯科会得恢宏。

一身是胆进波匈，化解叛乱赞周公。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一身是胆 周恩来蔑视特务暗杀
光芒四射 亚非会开出丰硕成果

万隆会议亦称第一次亚非会议，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在印度尼西亚名城万隆召开，它是在没有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参加的情况下，亚非国家自己举行的首次历史性会议。

美国不是亚非国家，没有被邀请参加这次亚非会议，它知道苏联虽然也没有参与此次盛会，但中苏当时系联盟之邦，苏联的利益由中国代表，美国不甘心被排除在外，也派出由70名“记者”组成的“美国代表团”到雅加达活动，有许多美国特工人员是突然干起“记者”这一行的，因而亚非会议期间，中苏与美国记者及受其影响者之间展开了惊心动魄的斗争。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国务卿杜勒斯对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上做出的巨大贡献和产生的深远影响印象极深，对亚非会议邀请中国参加很不满意，就下令动用美国外交和特务系统予以破坏。

亚非会议前，美国竭力贬低亚非会议的重要性，抱着极端敌视的态度，硬说亚非会议“算不得是一件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不可能达成任何协议”，干脆不召开为好。

艾森豪威尔、杜勒斯哪里知道，二战结束仅仅10年，亚非地区就出现了30多个新独立的民族国家，民族要解放，国家要独立，逐渐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但这些新独立国家，政治上仍然面临着老牌殖民主义国家的威胁与干涉，经济上存在摆脱贫困的严重问题，迫切需要相互支持，共同提高，因而印尼总统苏加诺一提出召开万隆会议的倡议，就得到广大亚非国家的普遍赞成。美国百般阻挠，中国却大力支持，积极参加。

中国深知，亚非会议是广大亚非国家在日内瓦会议鼓舞下，为摆脱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控制与压迫，为独立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最早由东南亚国家提议召开的。

原来印尼、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和锡兰五国1954年4月底至5月初召开科伦坡南亚五国总理会议，冲破美国的阻挠，倡议尽快召开亚非会议；在中国和国际舆论支持下，南亚五国总理又召开茂物会议，决定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亚非会议的指导思想，议定了亚非会议之目的是：促进亚非国家的亲善合作，互助互益，讨论有关社会、经济、文化问题，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为世界和平做贡献。

1954年12月初，缅甸总理吴努访华时，就向周恩来行合十礼询问：如果中国被邀请参加亚非会议，周恩来总理是亲自去，还是另派代表去？

周恩来很有策略地回答说，这将决定于发起国是否邀请各国总理参加。

吴努鞠躬致意说，五个科伦坡国家的总理是一定会参加的，其他国家的总理如何，还不能肯定，不过希望周总理能亲自参加。

周恩来含笑而谈：“亚非会议是由你们几位总理发起，我们支持。这一会议使向元往来的亚非国家能够会面，这样就可以增加了解，消除误会和隔阂。”

1955年1月22日，印尼驻华大使莫诺努图拜会周恩来总理，代表印尼政府正式邀请中国参加亚非会议，周恩来表示中国同意参加。

26日，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为庆祝印度共和国成立五周年举行盛大招待会，周恩来应邀出席，就举世瞩目的亚非会议问题，发表了颇引人注目的讲

话，他说：

“中印两国共同倡议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是指导中印两国关系的基本原则，而且已经成为建立和扩大和平地区、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的重要因素。为了增进亚非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与和平合作，尼赫鲁总理又同缅甸、印度尼西亚、锡兰、巴基斯坦等国的总理在茂物会议上决定召开亚非会议，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此表示热诚的欢迎和支持。中国人民在国际事物中是坚持和平政策并能够辨别是非的。”

因中国了解到印度总理尼赫鲁对召开亚非会议心存疑虑，所以周恩来总理在 1954 年 6 月访问印度时，就向尼赫鲁讲明召开亚非会议的重要作用，促使印度采取积极态度。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见亚非国家不买美国的帐，阻止召开亚非会议的阴谋破产，转而反对邀请中国参加。

艾森豪威尔先让杜勒斯玩弄釜底抽薪之计，要求美国国会通过新的援助计划，妄想以经济援助为诱饵，诱使亚非国家反对邀请中国参加，又诬蔑中国要夺取亚非会议的领导权，进而对远东安全构成威胁，因而不能邀请中国参加亚非会议。

亚非国家从中国提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睦邻友好外交活动中，认识到中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解决亚非问题不能没有中国参加，缅甸总理吴努明确表态说：“如果不邀请亚洲最大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缅甸将难于与会。”

美国见阻挠召开亚非会议和不邀请中国两条毒计都以失败告终，便决定对中国代表团特别是周恩来总理下毒手。美国又不敢自己动手，便指使台湾特务机关侦防组组长谷正文担任这一任务。

台湾特务头子谷正文命驻香港的台湾特务周斌成用 60 万港元收买了香港航空工程公司的清洁工周驹，利用工作之便偷偷把定时炸弹放进中国代表团包乘的印度航空公司飞机“克什米尔公主号”的右翼轮附近，然后慌忙由机场铁丝网下爬出，登上接应他的台湾特务的汽车匆忙逃往台湾。

为保卫周恩来和中国代表的安全，中国情报人员日夜奋战，提前两天获取了台湾特务在香港下毒手的情报。毛泽东对此非常重视，立即和周恩来商量，做了万元一失的周密安排。

4 月 11 日 12 时 15 分，“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起飞，当天下午飞到沙捞越海面上空时，突然爆炸起火，坠入海中，8 位工作人员不幸遇难，只 5 名机组人员幸免。

美国和台湾当局及特务系统都以为周恩来必定在“克什米尔公主”号上，此时早已葬身海底，去掉了美国和台湾同新中国斗争的一位天才统帅式人物，削去了毛泽东的左膀右臂，因而得意忘形，弹冠相庆，美国和台湾报纸幸灾乐祸，准备登出中国代表团在太平洋上出事的消息。

艾森豪威尔、杜勒斯、蒋介石做梦也没有想到，周恩来却应缅甸总理吴努、印度总理尼赫鲁的邀请，从昆明到仰光参加小型高级会议，平安抵达缅甸首都仰光机场，与吴努、尼赫鲁一起出现在新闻记者面前！

西方记者迅速把周恩来幸免罹难的消息，传遍五洲四海。消息传来，普天同庆，艾森豪威尔、杜勒斯、蒋介石则惊得目瞪口呆。有诗为证：

周公智勇举世钦，为斗敌顽不顾身。

吉人自有公道助，美蒋卑劣绝人伦。

当时毛泽东正巡视杭州，听到“克什米尔公主号”出事的消息，他再无心欣赏西子湖畔的人间天堂风光，下令取消所有的活动计划，一心等候周恩来的消息，直到听到周恩来安全抵达仰光的消息，脸上才有了笑容，又马上指示工作人员向周恩来发慰问电，提醒他在新加坡，雅加达和万隆，都要注意防范美国和台湾特务的破坏，指示公安机关采取万无一失的措施。

周恩来在仰光接到毛泽东的慰问电报，一股暖流传遍全身，更感到祖国、领袖、人民、战友对自己的深情厚意，当即向记者愤怒谴责美帝国主义破坏亚非会议的卑劣行径，豪情满怀地分析开好亚非会议的有利条件，增强信心，然后登上飞机，向新加坡进发。

美蒋特务机关在香港安放定时炸弹的阴谋破产，又制订了新的暗杀周恩来的计划，派出一个专门对周恩来行凶的暗杀小组，像一群疯狗一般伺机而动。

毛泽东果然料事如神，他指示中国外交部做新加坡的工作，新加坡总督麦克唐纳怀着对毛泽东、周恩来和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崇高敬意，亲自到机场迎接，采取严格的保密保安措施，又亲自把周总理送上飞机，才使美蒋特务未敢贸然下手。有诗歌诵周恩来与此次航空遇难的沈建图等人的高风亮节：

原知万隆路难行，为宣正义向刀丛。

拒虎驱狼斗美蒋，浩然正气贯长虹。

美蒋特务机关见在香港、新加坡未能得手，又派出大批特务伙同台湾驻印尼人员，组成暗杀团，下严令务必在万隆会议期间对周恩来下毒手。幸亏台湾特务机关的一个暗杀队员良心发现，把一封匿名信投进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揭露美蒋特务机关的新阴谋称：

敬启者：

请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尼大使注意，中国国民党驻椰嘉达直属支部，于3月初旬奉台湾总统府之命组织28人之敢死暗杀团，准备谋杀赴万隆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周氏。

暗杀团于3月10日在红溪党部组成，参加者皆为中

国国民党逃亡印尼的中低级军官，每人皆持美国（驻印尼）大使馆发给之无声手枪及印尼市20万盾，事成后，每人加给20万盾，打中周氏者加给40万盾，本月19日在红溪党部召开最后一次会，将决定出发日期。

有关亚洲会议地形，于本月1日至5日调查清楚，请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尼大使通知（印尼）治安当局把它一网打尽，保全周氏。

反省过来的暗杀队员×××1955年4月16日中国驻印尼大使黄镇马上与印尼外交部官员取得联系，请他们把匿名信内容报告苏加诺总统和印尼政府，严密监视美蒋特务的活动，中国代表团和驻印尼大使馆人员都紧急动员起来，全力以赴保证周恩来和代表团人员的安全。

4月16日，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冲破美国设置的艰难险阻，到达雅加达玛腰兰机场。当周恩来出现在机舱门口向欢迎者招手致意时，印尼人民把周恩来当作反帝英雄热烈欢迎，都争相一睹在美蒋特务暗杀下大难不死的中国总理的风采，情不自禁地发出一片为周恩来祝福的欢呼。

4月17日上午，周恩来一行到达花团锦簇的美丽山城万隆，受到印尼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和万隆市民的盛大欢迎，在响彻云霄的反帝口号声中，中国代表团散发了周恩来总理的书面声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抱着对于和平和友好的热烈愿望，前来参加即将在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

周恩来高举反帝旗帜，特别提到4月11日的飞机谋杀事件，矛头直指美国帝国主义：

“有些人是不喜欢我们这个会议的，他们正在力图破坏我们的会议。……大家知道，中国代表团已经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同样，印度、越南和其他国家在这次破坏事件中也遭受了沉重的损失，但是和平友好的正义事业是破坏不了的。我相信，我们的会议一定能够克服各种破坏和阻挠，并对于促进亚非国家之间的友好合作，对于维护亚非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做出有价值的贡献。”

4月18日，亚非会议在万隆独立大厦隆重开幕，这是历史上第一个没有殖民国家代表参加的多民族、多种族、不同肤色、不同语言文化的国家代表共同举行的会议，标志着亚非历史新的一页开始了！

开幕式上，300多名亚非代表齐集一堂，握手拥抱，庆祝亚非国家在反帝反殖斗争中取得的伟大胜利，气氛热烈，盛况空前，他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印尼总统致开幕词。

只见苏加诺头戴圆顶穆斯林黑帽。身穿白色西装，精神抖擞地呼吁“新亚洲和新非洲诞生吧”，他认为这是“世界史的新起点”，特别强调反殖民主义精神：

“我们大家是由比表面上使我们分裂的东西更为重要的东西联合起来的，例如，我们是由对不论以什么形式出现的殖民主义的共同厌恶联合起来的；我们是由对种族主义的共同厌恶联合起来的；我们是由维护和稳定世界和平的共同决心而联合起来的。”

苏加诺慷慨激昂地向亚非国家发出号召：“殖民主义并没有死亡，必须予以铲除！让我们记住，为了这一切，我们亚洲人和非洲人必须团结起来！”

接着，会议主席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柬埔寨代表西哈努克、锡兰代表约翰·科特拉瓦尔、埃及代表纳赛尔等，都慷慨激昂发言，严厉谴责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矛头直指美帝国主义。

艾森豪威尔、杜勒斯对亚非会议的发展趋势极为恼火，但并不惊慌，他们知道29个与会国中，接受美国援助的就有22个，只有7个国家与中国建交，不少国家对中国持怀疑、恐惧甚至敌对态度，便下令受美国影响的与会国把矛头转向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

于是，伊拉克代表法迪尔·贾马利登上讲坛做诬蔑共产主义的长篇发言，他把共产主义说成是（新式殖民主义”，把矛头直接指向苏联和中国，公然要求对苏联和中国采取所谓的“防御措施”，直到苏联、中国“在思想上解除武装”。

真是无巧不成书，当时有个西方记者手里正好拿着一份美国新闻处刚刚广播的《纽约时报》4月18日社论，他漫不经心地稍加对照，立刻发现贾马利讲的全是美国报纸上的话，例如《纽约时报》社论就鼓吹亚非会议把注意力放在反对共产主义上，而不要去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

美国的暗中干扰和破坏给亚非会议投下了阴影，贾马利的发言扰乱了会议的主旨，顿时使会议气氛紧张起来，幸亏埃塞俄比亚、日本、约旦、老挝、黎巴嫩、利比亚等国代表相继发言，表达亚非人民憎恨殖民主义的共同心声，才没使会议气氛继续恶化。

美国对此极为恼火，加紧策动一些受美国影响的国家扭转亚非会议的反帝反殖大方向。

菲律宾代表罗慕洛与贾马利同唱一个调子，开始抨击共产主义。他诬称共产主义是新形式的殖民主义，主张既反对殖民主义，也反对共产主义。有人秉承美国旨意，攻击中国搞颠覆活动，利用海外华侨的双重国籍威胁亚非国家政府，甚至有人攻击“和平共处”，要中国表明对“和平共处的诚意”。

这样，经罗慕洛等卖力煽动攻击中国，使亚非会议的气氛更趋紧张，万隆上空乌云滚滚，激烈的争论随时可能爆发，亚非会议面临崩溃与分裂的边缘。许多国家暗暗观察受攻击对象中国人的脸色，看中国人如何动作。

4月19日下午，万隆突然来了一阵热带暴风雨，雨大风狂，粗大的树枝被刮断，雷鸣电闪，令人触目惊心。美国“记者”幸灾乐祸说，这是亚非会议的凶兆，各国代表都得准备乘兴而来，败兴而去。

这时，亚非人民不约而同地把开好亚非会议的希望寄托在周恩来身上，酷爱独立自由的印尼人民冒着倾盆大雨，踏着罕见的积水，在独立大厦门前迎接周恩来总理。

不一会儿，只见挂着五星红旗的汽车随着呼啸的警车风驰电掣般开来，英姿飒爽的中国代表以反帝反殖的大无畏气概来到独立大厦门前，印尼人民和爱国华侨万头攒动，忘情地向周恩来欢呼，寄托着无限的希望。

美国驻印尼大使馆人员和70多名“记者”早早来到会议厅，占据有利位置，幸灾乐祸，瞪大眼睛要看周恩来同贾马利、罗慕洛辩论以致使亚非会议破裂的好戏。

当会议主席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宣布请中国代表发言时，会场上突然响起空前热烈的暴风雨似的掌声。

在一片掌声中，周恩来以中国外交家温文尔雅的风度走上讲台，第一句话就语破天惊：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

周恩来那亲切而宽容的话一出口，苏加诺便感到周恩来的话不同凡响，有大国风范。他认为周恩来不把矛头指向贾马利和罗慕洛，而指向罪魁祸首美国是非常高明的，认定只要有周恩来在，美国破坏亚非会议的阴谋就不可能得逞。只听周恩来以真诚的态度发言说：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

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

为击破美国对中国的围攻，照顾某些亚非国家与美国的关系，使亚非会议顺利进行下去，周恩来以巧妙的战术做灵活发言称：

“本来，对于美国一手造成的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我们很可以在这里提出如同苏联所提出的召开国际会议谋求解决的议案，请求会议加以讨论……我们也很可以提议会议讨论承认和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问题……但是，我们并没有这样做。因为这样一来，就很容易使我们的会议陷入对这些问题的争论而得不到解决。”

接着，周恩来总理针对美国的破坏和煽动，着重谈了中美关系、台湾问题和所谓中国搞颠覆活动问题，最后以巨大的号召力为反帝反殖发出强烈呼

吁：

“16亿亚非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成功。全世界愿意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能为扩大和平区域和建立集体和平有所贡献。让我们亚非国家团结起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努力吧！”

周恩来18分钟的演说，驱散了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国务卿杜勒斯多日来玩弄阴谋笼罩在亚非会议上的乌云，成功地粉碎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妄想把万隆会议拖入对立和争吵以至破裂的诡计，拨正了万隆会议的航向，使其绕过暗礁，沿着求同存异、团结反帝、民族独立、和平发展的方向，向胜利的前方迈进，这正是：

乌云翻滚浪滔天，明枪暗箭步履艰。

总理浩气挽狂飚，扫清阴霾正罗盘。

从4月20日开始，亚非会议进入实质性讨论阶段，由各国代表团团长组成的政治委员会，就反对殖民主义与和平共处问题展开更为激烈的争论。

美国“记者”见受美国影响较深的菲律宾代表罗慕洛竟公开称赞周恩来的演说“出色”并充满“和解与民主精神”，就进行更为阴险的破坏。

4月21日上午，锡兰总理科特拉瓦拉突然在他的别墅举行记者招待会，在招待会上，他说要让台湾“取得一个独立国家的地位”，呼吁“中国公开地和正式地要求亚非各国的当地共产主义团体解散”。人们以为他在会外讲讲罢了，没想到又在下午的会议上，把“无定向炸弹”投到大会上去，散布美国人的反苏论调：

“你们可以说，殖民主义这个名词大家都已经懂得，它只有一种涵义，但是我不能同意，殖民主义有许多形式，除西方的殖民主义外，还有另外一种形式的殖民主义……对于这种殖民主义，在我们开会的人中，有许多人也许心里还不大明白，我们中间有些人也许还根本上不同意把殖民主义这个词套在它头上，举个例子来说，想一想那些共产党统治下的中欧和东欧的卫星国吧……难道它们不是像亚洲和非洲的殖民地一样吗？亚非会议也应该坚决谴责苏联对中欧和东欧各国进行的殖民主义统治。”

科特拉瓦拉节外生枝的讲话破坏了亚非会议的和谐气氛，使亚非会议走到危险的十字路口。尼赫鲁对此怒气冲冲，周恩来也满腔怒火，决心在原则问题予以痛击。

周恩来向会场扫视一周，看到美国驻印尼官员和“记者”都阴险地看着自己，又感到锡兰总理科特拉瓦拉讲的不像是自己的心里话，暗想如果中国与锡兰相斗，恐怕要中美国人的好计，便马上冷静下来，不将矛头指向科特拉瓦拉，而应设法揭露他背后的阴险人物，因而只要求分发他的讲话稿，以便今后回答。

周恩来坚信中锡人民都有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侵略的经历，只要平心静气交流思想，就能揭穿美国人挑拨离间的诡计。

于是，周恩来邀请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以亚非会议主席身份，陪他去找锡兰总理科特拉瓦拉进行私下接触。

见到锡兰总理科特拉瓦拉时，周恩来恭恭敬敬问道：“请原谅，科特拉瓦拉先生，你刚才在会上的那番发言是什么意思？”

科特拉瓦拉以为他得罪了中国，周恩来肯定是前来兴师问罪的，没想到举世闻名的周恩来竟然如此和蔼可亲，态度马上缓和下来，双手一摊，辞不达意地辩解说：

“我的讲话并没有其他的用意，只是想说说心里话而已。”

周恩来当然知道那不是他的心里话，也不当面点破，只策略性地提出最关心的问题：“我想知道你明天是否将继续采取行动，向大会提出决议或动议？”

科特拉瓦拉对照中美领导人迥然不同的作法，感到跟着美国人跑有亏于亚非朋友，就说：“周恩来先生，我只是说说罢了，我将不提出什么动议或决议。”

周恩来觉得还是亚非朋友可爱，极有风度地微笑着说：“非常感谢，科特拉瓦拉先生。”

周恩来正要告辞，科特拉瓦拉抢前一步拦住，紧紧地握着中国总理的手说：“现在我们是朋友了，不是吗？”

美国驻印尼官员和“记者”不知中锡总理已化敌为友，仍借此波折大做文章，声称科特拉瓦拉愿与任何人辩论到底，大肆宣传亚非会议即将破裂！不明真相的人见亚非会议陷入僵局，简直对达成协议绝望了！

4月22日中午，山城万隆又由朗日晴空转为狂风暴雨，只见电光闪闪，雷声隆隆，各国代表身处此境，真有点胆战心惊。

美国“记者”看到会议厅屋顶有一处漏雨，滴水不断掉在中国代表团座位旁边的桌子上，便恶意宣传说这是一个凶兆，亚非会议今天要以分裂结束！

各国代表被搞得人心惶惶，便不约而同地把力挽狂澜的希望寄托在周恩来身上。

这时，只见周恩来稳步走上讲台，亚非各国代表更仔细端详中国总理。只见周恩来一身考究的中山装挺括大方，一排纽扣直扣到衣领，满头黑发一丝不乱，眉峰下一双慧眼显得格外精神，他义正辞严地驳斥美国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攻击说：

“昨天锡兰总理提到了新殖民主义，这是一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不能同意的提法……东欧国家的人民已经按自己的愿望选择了自己的国家制度，然而，提出一种新的定义或者进行辩论，都将无助于这个会议。我们觉得最好的办法是在会上相互尊重彼此的意见，而不是进行辩论。因为那样做，将不可能对此问题有共同的理解或共同的愿望。”

周恩来巧妙地在科特拉瓦拉讲话里找到一个共同点说，我们对科特拉瓦拉总理关于一切拥有殖民地附属国的国家应在10年内给它们以独立地位的意见是支持的，这是个积极主张。周恩来这种求同存异的态度，使科特拉瓦拉感动得热泪盈眶，他改变了原来的态度，遂使亚非会议战胜美国设置的又一个障碍，胜利向前推进！

美国驻印尼官员和“记者”看到万隆会议即将胜利结束，又提出台湾问题捣乱，企图借此挑起争端，使亚非会议不能如期圆满结束。

当时，台湾海峡局势颇为紧张，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

这是因为美国一直竭力孤立、封锁中国。朝鲜停战后，美国于1954年与台湾当局签订“共同防御条约”，猖狂准备反攻大陆，中国人民解放军奋起赶走了一江山岛上的国民党驻军。台湾当局慌忙向美国告急，美国准备与中国彻底摊牌，大打一场，中国也向福建沿海调集重兵，台湾海峡形势骤趋紧张。

在艾森豪威尔蠢蠢欲动时，美国陆军副参谋长李奇微以当年“联合国军”总司令的经历力陈解放军刚刚夺取大陆，又在朝鲜打

出威风，贸然同中国交手，美国很难占到便宜，富有作战经验的艾森威尔总统才未敢跟新中国“摊牌”较量。

即使如此，台湾海峡形势仍剑拔弩张，中美是战是和，一时难以猜测，战争的阴影自然也投射到万隆会议上，如何缓和台湾海峡局势一直是周恩来所慎重思考的问题。

4月23日中午，印尼总理设宴招待中国、印度、锡兰、巴基斯坦、缅甸、泰国、菲律宾等7国代表团团长，众人自然谈到台湾海峡形势是否会引起国际冲突，甚至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周恩来抓住机会宣传中国的正义主张，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提议周恩来发表一个声明，周恩来欣然同意。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随即出面召开记者招待会，周恩来以此为舞台，展开了一次有独创性的外交活动。他以艾森豪威尔为对手，发表了一个69字的奇特声明：

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

短短的69字声明似有千斤之重，通过电波从空中和海底传遍世界各地，它震动了万隆，特别震动了华盛顿。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认为这是中国发出的重要信号，必将对美国产生巨大压力，急忙召集国务卿杜勒斯等人协商对策。

艾森豪威尔、杜勒斯虽极力贬低周恩来这个69字声明，但却不得不认真研究与中国的关系问题。

4月26日，杜勒斯就在记者招待会上专门讲到这个问题，他身子前倾，无理强辩说：

“（周恩来总理4月23日的提议）是否真诚尚需拭目以待，中国共产党人或者只是玩弄宣传的把戏，但是我们打算设法把这件事弄清楚。在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当然不会改变对我们的盟国——中华民国保持诚信的方针。”

杜勒斯虽然嘴硬，但却不得不在同年7月13日通过英国向中国建议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

更重要的是周恩来这69字声明排除了美国为破坏亚非会议设置的重重障碍，为万隆精神永放光芒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正是：

美国毒箭射万隆，阻挡亚非万马腾。

中国高举反殖旗，万隆精神放光明。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卧薪尝胆 纳赛尔收回运河堪称英雄

殊途同归 中美苏反对英法僵略埃及

话说万隆会议之后，民族独立运动汹涌澎湃，中苏与美国在中东的斗争也更趋激烈，苏伊士运河战争就是这一错综复杂斗争的极其生动的反映。

苏伊士运河地扼欧、亚、非三大洲的交通要冲，实乃东西方的交通咽喉。自 1859 年法国殖民主义者利用数十万埃及民工费时 10 年凿成后，这条运河一直为英、法殖民主义者霸占。比埃及国民收入还多的运河过境费，绝大部分被英、法占有。

这样，收回运河主权就理所当然成为埃及人民多年来的深切愿望，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埃及的正义要求。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从争夺势力范围的考虑出发，也对埃及的要求表示支持。因而，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集中了各种矛盾。

纳赛尔于 1954 年出任埃及总理之后，就代表埃及人民利益，宣称要收回苏伊士运河主权，英、法殖民主义者大为不满，暗中支持以色列于 1955 年 2 月向埃及的加沙地带发动突然袭击，依仗优势装备摧毁埃及驻军司令部，使埃及军民遭到重大伤亡。

为抵抗以色列侵略，收复被侵占领土，纳赛尔派人向英、法、美接洽购买军火。

英国首相艾登以英国绅士的高雅风度接见埃及使者，声称不能破坏英国那个既不向阿拉伯人也不向以色列人供应大量武器的诺言，彬彬有礼将其拒之门外。

纳赛尔派人去见法国总理摩勒，法国早因纳赛尔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反法武装斗争而对埃及恨之人骨，摩勒暗中冷笑，声称法国同意供给埃及武器，不过，埃及必须按照法国可以接受的条件修改埃及的北非政策。

纳赛尔大骂英、法不止，转而想从美国购买武器，却不知美国早有在埃及取代英法独霸苏伊士运河的打算。

从 1953 年杜勒斯访问开罗以后，美国就企图以某种方式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事联盟制度搬到中东去，因而在 1954 年成立东南亚条约组织后，杜勒斯就向纳赛尔提出成立与西方结盟的“中东防御组织”，被纳赛尔严辞直拒绝。杜勒斯对纳赛尔怀恨在心，拉土耳其、伊拉克于 1955 年初签定防务条约，走出了建立巴格达军事条约的第一步，引起苏联和埃及的忧虑和愤怒，起而反对美国“似乎是把北约组织的楔子打进阿拉伯这棵团结之树”。

杜勒斯见纳赛尔派人联系购买美国武器，暗中冷笑连声，哼哼唧唧告诉埃及使者：如果纳赛尔想购买美国先进武器，倒也不难，但必须加入包括整个中东在内的某种集体安全的安排。

就在纳赛尔被美、英、法碰得头破血流、走投无路之时，万隆会议于 1955 年 4 月召开，纳赛尔率领埃及代表团参加会议。

在亚非会议上，纳赛尔有幸结识中国总理周恩来，深深被周恩来的崇高品德和元与伦比的外交风度折服，两人合作得很好：纳赛尔提议选举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为亚非会议主席，周恩来带头支持。两人密切配合，为亚非会议取得成功做出了重要贡献。

万隆会议期间，纳赛尔与周恩来多次深入交谈。周恩来称赞埃及和中东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将同世界其他地区的民族解放斗争汇合成一股巨大的洪流，极大地冲击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和战争政策，因而他多次表示支持埃

及收回苏伊士运河主权的正当要求。

纳赛尔把周恩来当作最可亲可信的朋友，他向周恩来尽情倾诉衷肠，提出为反击以色列侵略，请求中国援助军火。

周恩来坦率地告诉纳赛尔，新中国因刚成立不久，暂时无法满足埃及的军火要求，建议埃及向苏联购买。

岂料赫鲁晓夫野心勃勃，早就想插足中东，与美国在中东一争高低。得到埃及想购买苏联军火的消息，赫鲁晓夫真是喜出望外，当即指示苏联驻埃及大使拜会埃及总统纳赛尔，答应向埃及提供大量现代化武器，埃及可用棉花付款。

当下，苏联和埃及商定，由捷克斯洛伐克出面做 4 亿美元的“棉花换武器”的巨额贸易。以色列参谋长达扬得此消息大惊，他估计苏联可能供应埃及新式坦克 300 辆、装甲运兵车 200 辆、米格—15 战斗机 200 架、轰炸机 50 架、自行火炮 100 门，还可能供应一批军舰和大量弹药。

达扬惊慌失措，忙向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求援。杜勒斯认为“苏联终于第一次跳进了中东政治的污泥浊水，同埃及手挽手干起来了”。为应付苏联首次插手中东，杜勒斯急忙派遣要员前往开罗，“劝说”纳赛尔放弃从苏联购买武器的打算。对此，纳赛尔置之不理；杜勒斯好生气恼，调动各种力量向埃及施加压力。

为对抗美国的压力，纳赛尔提出埃及与中国建交问题，但又不想马上断绝同台湾的关系。

周恩来十分重视埃及在中东的地位和影响，决定先发展经济和文化关系，互相设立商务代表处，实现埃及宗教事务部长和中国外贸部长互访，签定中埃贸易协定和文化协定，再发展政治关系。随着埃及与以色列、美国、英国、法国关系日趋紧张，终于在 1956 年 5 月撤回埃及驻台湾“大使馆”，同中国正式建交，实现了中国发展同阿拉伯国家关系的重大突破。

杜勒斯接到蒋介石的有关中埃建交的函电，正想找机会整治纳赛尔，未料想纳赛尔主动找上门来，请求美国向埃及的阿斯旺水坝工程提供贷款。

原来，作为摆脱埃及贫困、实现社会进步的重要措施，纳赛尔提出在尼罗河上修筑一道新水坝，可使埃及有足够的水供灌溉和发电之用，让埃及国民收入增加 1/4，人们把这个巨型水力工程称作“埃及的新金字塔”计划。

这个巨型工程需要 10 亿美元投资，埃及无力投资，纳赛尔便向美、英和世界银行提出贷款请求。

杜勒斯和艾登认为“这是西方插手埃及的一个难得的机会”，都许诺提供贷款，但却提出苛刻的条件：要监督埃及财政、不许购买苏联武器、让埃及带头与以色列靖和；

纳赛尔认为美、英欺人太甚，有碍埃及民族尊严，实难接受，转而向苏联寻求借款。

杜勒斯见纳赛尔不乖乖就范，反而向美国的宿敌苏联求贷，常恼火，因为埃及的做法对菲律宾、巴基斯坦等美国当时的盟国产生了影响。这些国家对美国产生离心倾向，认为在国际上“保持中立倒可以两头讨好”。

如何对付纳赛尔，美国政府内部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出价高于苏联，另一种是停止向埃及等脚踏两只船的国家提供一切援助。

杜勒斯反对这两种作法，他认为“一个冷战高潮来到了，在这场经济竞争的游戏里，必须向俄国人摊牌”，他以特有的油头滑脑逻辑驳斥反对意见

说：

“试图出价高过俄国，只不过是使俄国人可以在全世界到处提出援助建议，以取得廉价的宣传上的胜利，而使美国的资源枯竭。停止援助同样也是缺乏远见的，因为这可能迫使穷国依靠俄国，并且意味着美国给予别国援助，其动机是为了购买友谊。”

美国政府内部激烈争论的结果，杜勒斯接受了第二种意见，他坚信苏联不可能实现它在美苏经济宣传中所做出的一切提议，因而他向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保证说：

“我的赌注押在我的这个信念上，即认为这样做，可以暴露苏联对外经济主张的虚假性，而大多数国家将会接受这样一种想法，认为有时必须以坚定来代替容忍，我们可以用美国的威信来冒风险，这将导致相应规模的反应，我指望美国的力量和手腕足以对付由此而产生的中东演变和冷战政治。”

见艾森豪威尔仍犹豫不决，杜勒斯俨然以一副教皇架式，像宣讲《登山宝训》一样说服美国总统：

“我在外交大海里航行的经验使我确信，如果我开始一个新的独立的航行，就会遇到顺风之风！”

艾森豪威尔见杜勒斯边说边翻着随身携带的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一书。发现斯大林这本书被杜勒斯翻得很旧了，书里划满了杠杠，便相信了他的有口臭的国务卿的话。

杜勒斯在 1956 年 7 月 19 日接见埃及驻美大使侯赛因时，粗暴地宣布收回美国的承诺，撤销美国对埃及的援助。侯赛因大吃一惊，请求杜勒斯不要以这种粗暴方式宣布，应给埃及一个保全面子的机会，但杜勒斯神气地抽着雪前烟，根本不予置理。

杜勒斯当即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此事、立刻引起大哗，美国报纸形象地报道说：

“等到杜勒斯和侯赛因举行 50 分钟的会谈之后，宣布美国撤销其帮助筹集阿斯旺水坝资金的提议的时候，其影响真是令人震颤。这盘棋以极其出人意料之转折而达到了高潮。”

纳赛尔面对美英等西方国家的威胁，挺直腰杆，以宏亮的声音宣告：

“这是对埃及政权的进攻，未免欺人太甚！你们去气死吧，你们永远不能对埃及发号施令。”

参加过亚非会议的纳赛尔，耳旁又响起周恩来反帝反殖的至理名言，响起亚非会议发出的要求反对殖民主义。维护和争取民族独立、保卫世界和平与促进友好合作的响亮呼声，他认为应以中国和广大亚非国家为靠山，决心做出惊世之举，就暗中召来亲信尤尼斯上校，命他调集人马随时听候调遣。

1956 年 7 月 26 日下午，25 万酷爱自由与独立的埃及人民冒着当空的烈日，在亚历山大城解放广场集会，埃及总统纳赛尔阔步登上讲台，激昂慷慨发表声震寰宇的演说称：

“苏伊士运河是由埃及人的灵魂、头颅。鲜血和尸骨筑成的，今天运河归还埃及，我们不再需要到华盛顿、伦敦、莫斯科乞求钱了。”

纳赛尔愤怒地谴责英法殖民主义者霸占苏伊士运河，剥削埃及人民，大发横财，使运河区成了埃及的“国中之国”，接着响亮地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埃及国有，并说将用运河的过境收入来支付阿斯旺水坝的造价。

纳赛尔合乎人心的决定顿时使 25 万在亚历山大城解放广场集会的埃及

人民雀跃欢呼，欢声如雷，掌声如潮。随着电波传往四方，埃及各地顿时沸腾起来，人们载歌载舞拥护纳赛尔的英明决定。这时的纳赛尔意气风发，聪明有为，嘴角上闪露着微笑。埃及人民的热烈情绪达到最高峰。

纳赛尔一声令下，尤尼斯上校率领早已准备好的几支人马冲进苏伊士运河公司办事处，宣布运河由埃及接管。

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的决定刹时间传遍全球，英、法恼怒异常，美国等国家极为震惊；中国和第三世界国家则欢欣鼓舞，大力支持。

消息传到北京，中国万众欢腾，中国人民把埃及人民的胜利看作是自己的胜利，完全支持埃及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反对殖民主义剥削压榨的斗争。周恩来总理 8 月 4 日代表中国政府郑重宣布：

“中国完全支持埃及把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埃及政府已经保证了苏伊士运河的自由通航，如果英、法对此还有所怀疑，那就应该通过协商求得解决，任何武力干涉的行动一定会遭到亚非和全世界人民的反对，是一定要失败的。”

这时候，美英法三国发表联合声明，硬把苏伊士运河的航行自由与国有化问题混淆在一起，企图以此为借口，维持它们新老殖民主义的特权，剥夺埃及对苏伊士运河的主权。对此，中国政府 8 月 14 日发表关于苏伊士运河问题的声明，严正指出：

“这种借口是完全站不住的。埃及政府早已一再声明，保证尊重苏伊士运河的航行自由，自从苏伊士运河公司国有化以来，运河的航行自由丝毫没有受到影响。这些事实有力地驳斥了所谓运河的航行自由遭到威胁的论调。”

西方国家把苏伊士运河看成他们在中东显示威力和影响的标志，他们认为如果这个标志丧失，整个殖民主义的堤坝就有被冲垮的危险。《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撰文分析说：

“（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会推动其他有可能抓住现今世界自由贸易孔道的小国也采取这样的行动。例如叙利亚和约旦就可能要求拥有中断经过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到地中海的石油管输油的权利；西班牙就可能要求拥有封闭直布罗陀海峡的权利，而巴拿马就可能考虑为什么它不能封闭巴拿马运河。这会带来数不清的灾祸。”

英国首相艾登尤为惊恐，忙与法国总理摩勒商洽，两人一拍即合，决定出兵埃及，但深感兵单力孤，就致信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要拉美国入伙，共同出兵中东。

英法两国首脑做梦也没有想到，其盟国总统对苏伊士运河冲突另有打算，不肯入伙。艾登、摩勒邀请杜勒斯赴伦敦共商对策，杜勒斯却只派副国务卿罗伯特·墨菲前往伦敦听取英法意见。后来墨菲估计中东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极大，才请杜勒斯赶快前往伦

敦。

杜勒斯在 1956 年 8 月 16 日至 23 日举行的伦敦会议上抛出了“杜勒斯计划”，强调苏伊士运河具有“国际性质”，苏伊士运河公司是一个国际机构，对其不能实行国有化，提议成立“国际苏伊士运河管理局”，拥有“治外法权”，他主张把苏伊士运河交国际共管，以达到其一箭双雕的目的：既迫使埃及交出运河主权，又排斥英法势力，由美国取而代之。

纳赛尔一眼看穿了“杜勒斯计划”貌似公允实则包藏祸心的狼子野心，

断然拒绝说：

“对苏伊士运河的国际共管，是一种新式的帝国主义，集体的帝国主义。”

杜勒斯还不死心，抛开美国一再声明只做与苏伊士问题“无利害关系的调停人”的假面具，又提出一个成立苏伊士运河使用国协会的方案，由美国等 18 个国家接收运河。

杜勒斯这个损人利己的方案既遭到英法等国的抵制，更遭到埃及的斥责，纳赛尔质问杜勒斯说：“难道在独立和不独立之间能够折衷解决吗？”

英法也看出美国居心不良，企图在中东取代英法的殖民地位，就一面在外交上对埃及软硬兼施，诱压纳赛尔就范，一面暗中调集兵力，制定了入侵埃及的“火枪手计划”。

英国首相艾登哀叹英法两个老殖民帝国实力有限，同时已看出美国有取代英法的虎狼之心，对执行“火枪手计划”没有信心。法国总理摩勒老奸巨滑，提出勾结以色列，三者联合进攻埃及。艾登欣然同意，以色列更求之不得，三方一拍即合。英法要以色列对埃及发动进攻，再由英法对以色列。埃及发出停止冲突的最后通牒，企图借以色列之手夺回苏伊士运河，而以色列却要英法大举进攻埃及，三方为此争吵不休。

为在时机成熟时独霸埃及，美国采取反对英法侵略埃及的作法，杜勒斯命美国国务院官员召见英法驻美大使，告称：

“任何对苏伊士运河的袭击都将给盟国的事业带来灾难。美国的判断是，这种袭击只有成功地推翻了纳赛尔，才会有实际的政治影响。美国毫不怀疑英国人和法国人能够用军事力量占领运河，但并不相信这样做就能推翻纳赛尔。”

美国还对英、法两国领导人发出警告说：“即使成功地占领运河，英国和法国也将会陷入像已经在北非折磨着法国的那种令人沮丧的游击战中；袭击将立即招致埃及封锁运河，破坏来自波斯湾的输油管；欧洲将会遇到严重的石油匮乏局面，运输路线将被迫进行痛苦的调整；从西半球供给石油需要美元，而英法又没有美元——最后，英法不能指望美国会在任何这类冒险中支持它们。”英法两国不甘心失败，气势汹汹地发出种种威胁，引起中国和世界人民的强烈谴责。

中国坚决支持埃及反击英法和以色列的侵略威胁，9月17日，毛泽东主席接见埃及驻华大使哈桑·拉加卜时，明确宣布中国人民支持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热情地鼓励说：

“我们一看到埃及人就觉得高兴，我们之间没有任何隔阂。埃及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全中国人民都支持埃及，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全世界人民都支持埃及。全世界最少有 80% 的人支持埃及……这次埃及巧妙地利用了帝国主义国家间、帝国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间、帝国主义国家和民族独立国家间的矛盾……纳赛尔总统的做法很聪明，他有时硬，有时软，有时用一种很和平的办法。这次和五国委员会（美国、澳大利亚、埃塞俄比亚、瑞典和伊朗组成的苏伊士运河委员会）代表的会谈，他就用很和平的声调把他们送回去了。”

毛泽东极为纳赛尔的安危担心，他周到地请埃及驻华大使转告埃及总统说：

“收回苏伊士运河是一个很好的开始。纳赛尔总统最近最好不要到没有

警戒的地方去，因为帝国主义的计划失败后，他们会采取各种手段，像暗杀等。西方国家骂纳赛尔总统是个野心家，是个希特勒，说他想统治阿拉伯世界，但是我们认为，纳赛尔总统是亚非地区的民族英雄，因此帝国主义才不喜欢他。”

当时，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对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的态度与英法不太相同，手段极为狡猾，毛泽东透彻地帮纳赛尔分析说：

“据我看，美国也同意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它不会帮助英国从埃及手里把运河夺回去，这样对美国也没有好处。美国另外有它的目的。对美国说来，运河在英、法手里和在埃及手里没有什么区别。它本来就不期望实现杜勒斯计划。美国是想借这机会把英、法从中东赶出去，以便建立它自己的势力（范围）。苏联、阿拉伯国家、印度和科伦坡国家都支持埃及，有苏联在，英国、美国、法国就不敢轻易行动。”

不久，毛泽东又充满兄弟情谊地请埃及驻华大使拉加卜转告纳赛尔说：

“中国政府 and 中国人民将尽一切可能支持埃及人民维护苏伊士运河主权的英勇斗争，我们的帮助没有任何条件。你们有什么需要，只要我们能力所及，一定帮助。我们对你们的帮助，你们能还就还，不能还就算了，我们可以给无代价的援助。当然，埃及是个有民族自尊心的国家，如果接受我们的援助还是要还，那末现在可以记帐，以后再说，或者过了100年以后再还吧。埃及现在遭受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我们也经历过这种封锁，深知埃及人民的艰苦。中国在抗美援朝时，花了不少钱，死了不少人，现在没有战争了，可以尽力帮助埃及。”

9月19日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招待埃及驻华大使拉加卜，郑重宣告：对任何侵犯埃及主权和对于埃及实行武装干涉的行动，中国人民都不能置若罔闻。

英、法帝国主义者头脑发热，不顾中苏的多次警告，竟指使以色列军队于1956年10月29日17时向埃及的西奈半岛发动大规模进攻，不几天便占领西奈半岛；英法军队从11月5日开始进攻苏伊士运河的北口重镇塞得港，埃及军民奋起抗击。

中国对英法勾结以色列发动侵略埃及的战争立即做出强烈反应，11月3日中国政府向英、法、以色列提出严重警告，坚决要求英、法、以色列立即停止对埃及的侵略，从埃及撤走侵略军。

几天之内，中国各大城市都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英、法、以色列侵略者滚出埃及”的口号声响彻云霄，使埃及人民深受鼓舞！

11月10日，“中国埃及友好协会”在北京的首都剧场隆重举行成立大会，会议通过了致埃及总统纳赛尔和埃及人民的支持电，抗议英法武装侵略埃及。周总理还亲自致电纳赛尔总统称：

“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向英勇反抗英法帝国主义和它们的工具以色列的侵略并坚决保卫自己祖国的独立和自由的埃及人民致敬，并向你们保证，我们坚定不移地同你们站在一起。”

周恩来的支援电说：“英法帝国主义梦想用腐朽的‘炮舰政策’，恢复他们对埃及的统治。美帝国主义正在纵容和利用英法的侵略，企图从中渔利，但是在今天的时代里，它们的这些阴谋是注定了要失败的。”

最后，周恩来代表中国人民表达对兄弟的埃及人民的战斗情谊说：

“中国政府 and 中国人民完全支持埃及人民的正义斗争，英法帝国主义和

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它们的侵略，从埃及领土上立即撤出它们的侵略军队。埃及的主权和领土不容许遭受任何形式的侵犯。中国政府和人民正在采取各种措施支援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的英勇斗争。中国政府决定以 2000 万瑞士法郎的现金无偿地送给埃及，以响应贵国政府最近的呼吁。我代表中国人民再一次向你和全体埃及人民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英、法勾结以色列对埃及发动侵略战争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不到两小时就在白宫召开紧急会议，与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共商对策，决定通过联合国采取行动，并发表声明，重申美国决心遵守 1950 年美、英、法三国宣言，维持中东现在的边界状况，控制武器流入中东，并在联合国内外采取行动，制止侵略。

艾森豪威尔马上向艾登和摩勒发去私函，敦促英法两国不要再对埃及行使武力，给联合国一个对苏伊士运河危机采取行动的机会。

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洛奇在联合国提出一个提案，要求以色列和埃及停止战斗，要求以色列撤退到休战协定规定的界线，还要求联合国会员国行动克制，不要进行干预。对此，英、法第一次行使否决权，否决了美国的提案。

苏联政府发表声明，坚决反对英、法和以色列的侵略战争，要求以色列和英、法撤军，也在联合国提出类似议案，亦被英、法运用否决权否决。

为捞取政治资本，1956 年 11 月 1 日，杜勒斯奉艾森豪威尔之命在联合国大会上摆出情绪激动的姿态发表讲话说：

“我怀疑，历来未必有任何代表能像我今天夜里这样，怀着如此沉重的心情在这个讲台上发表讲话……美国觉得自己不能同意（英、法、以色列）这三个国家的行动，虽然我们同它们有着密切的关系、深厚的友谊，钦佩和尊敬他们。而其中有两个国家还是我们最老的、最受信任的和最可靠的盟国。”

艾森豪威尔认为英法侵略埃及的战争若取得胜利将会破坏美国独霸中东的战略计划，而英法失败，才会跟随美国的指挥棒转，于是他便命杜勒斯在联合国以“公正”面孔提出一个堂而皇之的六点方案：

（一）有关战争的各方同意立即停火，并停止运送军队和武器进入该地区；

（二）1949 年阿以休战协定的各方，将一切武装部队撤至休战规定的界线，并停止袭击活动；

（三）一切联合国成员国不再把军事物资输入战区；

（四）在停火后，采取步骤重新开放苏伊士运河；

（五）由秘书长报告决议遵守情况；

（六）联合国大会继续举行紧急会议，直至决议得到遵守为止。

在联合国大会上，美国的提案以 64 票对 5 票获得通过，但英法两国仍软磨硬抗。

这时候，苏联虽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发表声明，坚决支持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但却迟迟不采取实际行动。

后来，看到中国坚决支援埃及反侵略，又看到美国不断向英、法施加政治、经济、军事压力，苏联态度才突然转趋积极。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 11 月 5 日向英国首相艾登、法国总理摩勒、以色列总理本一古里安分别提交措辞强硬的照会，宣称苏联对英、法、以色列侵略埃及决不能置之不理，

“决心使用武力粉碎侵略者，恢复中东的和平”，并暗示要用现代化武器攻击英、法和以色列。

苏联见英、法、以色列对其强硬照会没有屈服的表示，便决定联合美国向英、法施加强大压力，于是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向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发送一个照会，建议与美国联合一致，强行制止在埃及的战争。

美国从自己要取代英法称霸中东的战略出发，当然不希望苏联在中东扩大影响，因而艾森豪威尔认为苏联这个建议是“不可想象的”，立即寻找理由拒绝称：

“在目前情况下，（向埃及）引进新的军队将违反联合国宪章。

反对这种作法，是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联合国成员国应有的责任。”

为准确地向苏联表明美国的强硬立场，艾森豪威尔让杜勒斯专门向美国驻苏联大使波伦发出指示，让他向苏联官员强调美国将用武力反对苏联在埃及及进行任何干预的尝试，“这决不是随便说说而已”。

为缩小苏联影响、扩大美国的作用，美国抓住英法经济上的极度困难处境，揭露“苏联要在埃及以阿拉伯人的主要救世主和保护人身份出现”，迫使英法按美国的意图行事。

此时，英国首相艾登认为英国发动对埃及的战争给英国带来严重后果，“有可能使英国整个经济遭到毁灭，英国形势极其危险”。

1956年9月，英国的美元储备下降5700万美元，10月下降8400万美元，11月的石油恐慌使英国流失2.79亿美元，占伦敦美元储备总数的15%。

英国的经济困境弄得英国财政大臣麦克米伦晕头转向，他本来是英国首相艾登发动侵略埃及战争的最热心的支持者，但当艾登要求为侵略埃及的战争增加军费时，麦克米伦愁眉苦脸地连声叹气说：

“除非经济情况能有所缓和，我将不再能对女王陛下的财政部负责了。”

艾登面临骑虎难下之势，硬着头皮询问英国的经济困境怎样才能缓和，麦克米伦无可奈何说：“情况能否缓和，取决于能否停止战争。”

艾登仍在绝境中寻找出路：“怎样才能筹到一大笔军费，解决英军的燃眉之急？”

麦克米伦苦笑着说：“我们可以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取一笔美元嘛！”

艾登知道此路大概走不通，但此时只好把死马当活马医，就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提取大量美元的要求，打算用这笔美元购进英镑，以稳定英镑的价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联合国的一个专门机构，也是世界四大金融机构之一，规定在其成员国发生国际收支暂时失调问题时，可以用卖给外汇的方式对成员国提供3~5年的短期贷款，向其提供技术援助，磋商解决国际金融货币问题，帮助成员国走出困境。

艾登和麦克米伦满以为根据这一规定，可以找到一条摆脱因发动侵略埃及的战争而造成的困境之路，但却被美国一口拒绝，英国首相和外交大臣一下子惊呆了。

原来，艾森豪威尔指示美国财政部长乔治·汉弗莱，坚决拒绝英国人的要求，因而汉弗莱告诉专程来华盛顿求助的英国首相的使者麦克米伦：只有在英国答应立即在埃及停火时，才会给予财政援助。麦克米伦受到英国的最大盟国如此对待，悻悻拂袖而去。

美国见英、法仍不按其意旨办事，就又设法卡英法的石油供应。苏伊士运河事件前，欧洲所需石油的 73% 来自中东（其中一半通过苏伊士运河）；中东战争爆发后，欧洲国家只能从中东获得所需石油的 7%。由于石油短缺，英法只得实施石油配给制度，而且冬天即将到来，英法人民更加惊恐不安，反战运动风起云涌；加之美国成百万地挤兑英镑，迫使英国的黄金储备在一周之内锐减一亿英镑，直搞得英国元气大伤，政府内部矛盾迭起，人民反战示威一浪高过一浪。艾登见其首相宝座岌岌可危，联合国又通过了亚非集团要求英国武装部队立即撤退的提案，英国“最可靠的盟国”——美国也投了赞成票，艾登万般无奈，才用电话通知法国总理摩勒，英国只得同意停战。

摩勒如五雷轰顶，涕泪横流，哀求艾登让英军再坚持数小时，以便使法军占领苏伊士城，取得有利地位再从长计议停战问题。

英国首相艾登此时的殖民主义者威风早已消失殆尽，唉声叹气讲出自身难保的危险处境：“实在是万般无奈，我现在已进退维谷，在美国和苏联的压力之下，我已众叛亲离，无法再支撑下去了……”

法国总理摩勒见事已如此，只得同意宣布停战，英法侵略军狼狈撤出埃及，艾登和摩勒也因发动这场“既无必要又不切实的战争”被轰下台去，成了遭人唾骂的千古罪人。

在苏伊士运河事件中，出现了二次大战后外交史上极为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中美苏三大国站在一边反对英法侵略埃及，可谓冷战中的奇特现象，这才使纳赛尔在惨遭失败之后戏剧般取得最后胜利，成为埃及的民族英雄；也才使英法联军由节节取胜转变为丢脸的大失败。国际风云变幻莫测，实在令人惊叹！

苏联在这场战争中得利甚多。由于苏联在关键时刻以强硬态度出面干涉，加上其后对中东采取的积极态度，被埃及和阿拉伯国家视为朋友，称赞“俄国人拯救了我们”，遂使苏联以更强硬态度与美国在中东进行更激烈的争斗。

对此，毛泽东 1957 年 11 月 18 日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作为“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的例子做过如下说明：

“第五件，苏伊士运河事件。（英法）两个帝国主义进攻，打了几天，苏联人讲了几句话，就缩回去了。当然还有第二个因素，就是全世界在讲话，反对英法侵略。”

对美国在苏伊士运河事件中的态度，许多人觉得莫名其妙，世界头号帝国主义美国，怎么去反对其盟国英国、法国呢？为解开此谜，1957 年 3 月 5 日，周总理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二届三次全体会议上，做了《关于访问亚洲和欧洲十一国的报告》，周恩来深刻地分析其中的奥秘说：

“中近东紧张局势的发展过程，充分地表现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矛盾的尖锐化，特别是美国同英法的矛盾的尖锐化……在同英法争夺中近东的殖民利益的斗争中，美国对英法进行了坚决的反击。在联合国中，美国支持了亚非集团要求英法停止对埃及的武装侵略和撤退侵略军队的提案，但是，难道美国真正有爱于埃及人民，主张维护埃及的主权和独立吗？不是的……美国的目的只是为了排挤英法对以色列的控制，并且利用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冲突，继续维持中近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以便在联合国的名义下侵犯埃及的主权和扩大它自己在中近东地区的殖民势力。”

毛泽东在 1958 年 10 月 2 日接见苏联和东欧国家及蒙古军事代表团时，

风趣地解开谜底说：

“（美国）这个偷东西的贼从来没有被人逮住过，1956年在苏伊士运河（事件中），我们逮住了英国、法国。那时美国装好人，它装成爱好和平的。”

毛泽东、周恩来的分析丝丝入扣，令人信服，这正是：

收回运河举世惊，纳氏赛尔称英雄。

时事变化真绝伦，三国相争妙无穷。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乘虚而入 美国填补莫空侵略中东 借题发挥 中苏设置绞索反击干涉

话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见苏联、中国在苏伊士运河事件中坚决反对英法和以色列侵略埃及，国际地位显著提高，气得火冒三丈，急谋对策。

艾森豪威尔与国务卿杜勒斯等智囊人物关门密商，重新审察美国的内外政策，一致认为朝鲜战争使美国遭受沉重打击，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不断下降，而中国、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日益发展，欧洲经济迅速恢复，都对美国提出严重挑战。

为维护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和杜勒斯提出实行美之名曰“新面貌”的外交战略，改变了一家独干的作法，而加强与外国政府的全面合作：

在欧洲，美国加强与西欧盟国的合作，号召建立强大的西欧，加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力量，联合英、法等国对付苏联。在亚洲，先和日本签订了《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同蒋介石集团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还同英、法、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签订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又在南越扶植傀儡政权，插手老挝、柬埔寨内政，企图控制印度支那国家。在此基础上，继续推行拼凑军事集团的政策。

在军事上，认为杜鲁门的“遏制”政策使美国力量过于分散，负担过重，改而推行“大规模报复政策”，以核武器为威慑工具，把核武器作为主要打击力量，对别国进行核讹诈。

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认为二次大战后中东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汹涌澎湃，英、法等老牌殖民主义者在苏伊士运河事件中遭到惨败，力量大为削弱，再也无法维持在中东的殖民统治而不得不撤出埃及等地区，从而出现了所谓的“政治真空地带”，苏联正在设法填补这个“真空地带”，中国在中东的影响也日益扩大。

为抵制苏联和中国在中东的影响，实现美国称霸中东和世界的目标，以战胜所谓的“共产主义威胁”。1957年元旦，艾森豪威尔在白宫会见新选出的美国参众两院的美国民主党、共和党两党领袖，要求他们支持他作为美国总统提出的美国对中东政策的一篇新宣言，他郑重其事他说：

“我们是决心要维持西方在中东地区的权利的。在中东出现的真空必须在俄国人进来之前由美国来填补。”

经杜勒斯一番紧张的密谋策划，艾森豪威尔总统于1957年1月5日向国会提出一项关于中东政策的特别咨文。咨文的主要内容为美国国会授权美国总统在中东地区实行“军事援助与合作计划”，可以“对付共产主义威胁”为借口，在中东使用美国武装部队；两年内额外拨款4亿美元，向中东国家提供经济援助。

艾森豪威尔为利用这一计划控制中东，特意强调说：

“美国可以答应向其提出要求的任何中东国家提供经济援助，尽可能提供军事援助；可以使用武装部队，反对国际共产主义控制的任何国家发动的武装侵略，以巩固和保障求援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

咨文还特别提出在两年内额外拨款4亿美元，用于收买中东国家。

这就是臭名昭著的“艾森豪威尔主义”，又因系杜勒斯积极帮助抛出和推行，故亦称为“杜勒斯——艾森豪威尔主义”，亦称“填补力量真空主义”，

它最先应用在中东，后来被杜勒斯推广到全世界。

艾森豪威尔满以为他为美国想出了称霸中东和世界的计划，在国会一定会受到热烈欢迎，因而1月5日兴致勃勃地去国会山做特别咨文演说，但这个咨文却受到美国议员们的冷遇。

艾森豪威尔好生懊恼，忙让国务卿杜勒斯去说服美国议员。1957年1月7日，杜勒斯到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他对美国议员说：

“如果没有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中东就将丢失给共产党人。如果失去中东，那将是苏联共产党人所能获得的最大胜利，因为如果苏联得以进入中东地区，他们事实上就可以不必通过战争而取得西欧！”

然而，美国政界对艾森豪威尔主义仍疑虑重重，美国前总统杜鲁门认为，“艾森豪威尔主义无法与强大的苏联和中国抗衡，而且这个政策提出得太晚了。”

艾森豪威尔的竞选对手艾德莱·史蒂文森认为，艾森豪威尔主义的推行者杜勒斯既没有赫鲁晓夫的幽默，更缺乏周恩来的智慧。他说：“应该填补的第一个真空，不是中东而是美国国务院！”

艾森豪威尔讽刺杜鲁门、史蒂文森是长中国和苏联的威风而灭美国的志气，他针锋相对地吹捧他的国务卿说：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是一个杰出的具有献身精神的人，他总是善于在困难的条件下，做出非常了不起的工作成绩。”

杜勒斯被艾森豪威尔吹得心花怒放，兴冲冲来到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作证，没想到颇有势力的参议员汉弗莱、富布赖特、拉塞尔又向杜勒斯连续发动猛烈进攻。富布赖特以民主党的名义宣称：

“在现任国务卿的指导之下，我们同我们最亲密的盟国的关系已经发生了灾难性的和出人意料的破裂……”

杜鲁门和史蒂文森也指责杜勒斯要把美国拖入中东战争中去。杜勒斯仗艾森豪威尔撑腰，阴沉着脸回答美国议员们的追问称：

“眼前还没有计划要把美国军队驻扎在中东，但是，如果国会拒绝通过体现艾森豪威尔主义的决议，美国军队就极可能会在中东投入战斗；然而，如果通过这个决议，就不大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不测事件。”

经过在国会山进行9个星期的激烈争吵，艾森豪威尔主义终于被美国国会通过成为法律，这股祸水立即冲向中东，在中东掀起更激烈的争斗。

中国对艾森豪威尔主义迅速做出反应。1957年2月初，周恩来访问锡兰，在科伦坡答记者问时，揭露美国推行艾森豪威尔主义，以援助为名侵略亚非国家的实质说：

“为从事建设的国家所需要的外国援助，会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的欢迎，这种援助必须是真诚的并且不附带条件，但是为了取得特权，为了建立军事基地和为了使接受援助的国家加入军事集团而提供的援助是不会受到人民的欢迎的。”

1957年3月5日，周恩来在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所做的《关于访问亚洲和欧洲十一国的报告》对艾森豪威尔主义进行了有力的揭露：

“在我们出国访问期间，中中东一直是国际局势的焦点。紧接着英法对埃及的侵略被击退以后，美国政府就宣布了艾森豪威尔主义，公开主张由美国来填补英法殖民主义者在中中东地区遗留下来的所谓真空，使中中东局势重新趋于紧张。因此，我们有必要把这个问题特别提出来谈一下。”

接着，周恩来以犀利的语言揭露其目的和手法称：

“美国的目的只是为了夺取和代替英法在中近东的殖民地位。艾森豪威尔主义完全证实了这一点，……美国政府这次提出艾森豪威尔主义，又是用反对共产主义威胁的口号做烟幕。其实，所谓苏联或者任何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中近东形成威胁的话，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

周恩来又进一步指出，艾森豪威尔主义才是中近东形势紧张的罪魁祸首和根源：

“事实上，目前威胁着中近东各国的正是美国的艾森豪威尔主义。它集中地表现了美国政府进行扩张和侵略的惯技，那就是，以反共、反苏为借口，以制造紧张局势为手段，来达到镇压民族独立运动、排挤英法殖民利益和扩大自己殖民势力的目的。这就是美国新殖民主义的实质。”

仿佛是要给周恩来关于艾森豪威尔主义的论断提供证据，杜勒斯首先把黑手伸进约旦。

当时，22岁的约旦国王侯赛因在中东政治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他性格坚强，执政方针灵活，因而使约旦在风云变幻莫测、错综复杂的阿拉伯世界中，一直保持着独立自主和安定的局面。侯赛因因而被看作是对解决中东问题具有重大影响的关键人物之一，美国和苏联都对他刻意拉拢。

美国见侯赛因为人倔强，不对美国言听计从。为贯彻艾森豪威尔主义，就想从他身上开刀，并且很快就找到了下手的借口。

年轻的侯赛因国王勤于工作，乐于接近民众，约旦人谁都可以进宫求见国王，因而侯赛因与民众关系较好，美国很难找到插手约旦事务的借口，便派“记者”到约旦寻衅闹事，遇到一个汽车司机问道：

“侯赛因处事八面玲珑，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是个好国王吗？”

约旦汽车司机怀着崇敬之情侃侃而谈：“真主除外，他是我们的最高统帅，他保护我们，帮助我们，我们很爱戴国王。”

美国“记者”挑拨说：“不见得吧，有人说他是俄国人的走狗”

约旦汽车司机勃然变色训斥说：“你再敢对我们的国王说这种混帐话，我就揍你，非打得你七窍出血不可！”

美国“记者”吓得扭头便走，又根据美国当局的指示暗中挑拨离间，费尽心机才挑起约旦“左翼分子”与侯赛因国王的支持者之间发生了武装冲突。

杜勒斯虎视眈眈多日，将此视为在中东推行艾森豪威尔主义的一个绝好机会。他马上到白宫会见艾森豪威尔，声称侯赛因国王是美国在中东推行艾森豪威尔主义的重大障碍，侯赛因国王推行灵活外交是对艾森豪威尔主义的最重要挑战。

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立即像一只穷凶极恶的老狼扑向善良软弱的小羊，花言巧语说什么美国认为“约旦的独立和完整是极其重要的”，发表声明宣称“不准共产主义赤化约旦”，还命令美国第六舰队的舰只立即从法国的里维埃拉起航驶向东地中海，又宣布美国部队准备在几天之内空降约旦。

一时间，约旦上空战云密布，一场劫难就要来临。为保护约旦国民免于生灵涂炭，侯赛因只得再次推行灵活措施，压制受苏联支持的约旦“激进的左翼民族主义者”的活动，然后给杜勒斯灌迷魂汤说：“美国的干预立即在约旦产生了效果，约旦危机没有进一步发展，美国给中东政治加入了一种新因素，艾森豪威尔主义很快生效了。”

杜勒斯大喜，他认为美国成功地稳定约旦局势是推行艾森豪威尔主义在中东首战成功，马

上向约旦提供 3000 万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侯赛因国王对美援照收不误，对外又公然宣称约旦与艾森豪威尔主义没有关系。杜勒斯对侯赛因玩的这套把戏心里有数，暗想你侯赛因在大事上听话就行，说些自圆其说的话则不必深究。

艾森豪威尔、杜勒斯见推行艾森豪威尔主义在约旦初战告捷，马上派总统特使詹姆斯·理查兹在 1957 年三四月间访问除埃及、叙利亚外的中东大部分国家，宣称理查兹手中现有两亿美元的军事经济援助可以很快灵活使用，到 6 月底派定了 1.74 亿美元的用场，其中 1.23 亿美元用于中东国家的经济开发，5100 万美元用于军事目的。

美国在约旦得手后，又把矛头对准不服从美国支配的叙利亚政府。

艾森豪威尔派总统特使洛伊·亨德森前往土耳其，同土耳其领导人曼德列斯一起制定了代号为“斗蓬和匕首”的政变计划，企图在 1957 年 8 月发动政变推翻叙利亚政府。其阴谋被及时揭露后，美国指使土耳其把以“哈塔伊机动部队”著称的部队调到土耳其与叙利亚边境，同时命美国第六舰队驶入东地中海，不断对叙利亚采取挑衅行动，还准备对其进行武装干涉，这就使叙利亚形势严重尖锐化，出现了类似英、法、以色列三国侵略埃及前面临的恶劣形势。

中国对美国威胁叙利亚做出强硬反应，在 1957 年 9 月 15 日为保加利亚政府代表团访华举行的盛大宴会上，周恩来总理郑重宣称：

“正当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为进一步和缓国际紧张局势而努力的时候，美国统治集团却在中近东地区进行公开的军事威胁，粗暴地干涉叙利亚的内政。美国这种挑衅行动不仅严重地破坏了联合国宪章的原则，而且也严重地威胁着中近东地区和全世界的和平。这种不安的局势已经引起了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最大愤慨和严厉谴责。”

苏联则在 9 月 10 日就致函土耳其总理曼德列斯，严重警告土耳其统治集团，武装进犯叙利亚将导致极为有害的后果，苏联政府发出的严重警告说：

“当发生反叙利亚的军事行动和爆发中东战争时，毫无疑问，土耳其只会由于参与类似的侵略而遭受损害，而它在这一地区的地位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损害。”

曼德列斯作为美国在中东的代理人，继续在美国支持和纵容下进行军事威胁。对此，苏联政府特意发表声明，向土耳其政府发出严重警告称，“苏联准备用自己的武装力量，参加打击侵略和惩罚和平破坏者的行动。”

三天后，苏联再次向美国和土耳其提出警告，如果叙利亚遭到侵犯，苏联从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自身安全的利益出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援助被侵略的受害者。

当叙利亚在联合国大会上控诉美国的侵略罪行时，苏联代表坚决支持叙利亚的立场，宣称苏联决不允许在中东出现武装冲突，以免引起更大的战火。

在中国、苏联等国的强烈警告下，美国未敢对叙利亚轻举妄动，又转而制造了黎巴嫩事件。

对美国接连挑起叙利亚和黎巴嫩等事件的原因，周恩来总理 1957 年 10 月 24 日在为访华的阿富汗首相达乌德举行的宴会上，精辟地分析说：

“自从万隆会议以来，亚非各国的团结有了加强，亚非地区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运动达到了新的高涨，殖民主义者连续遭到失败，但是殖民主义

者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现在正在继续制造中近东地区的紧张局势。”

美国特意选在黎巴嫩开刀，是因为黎巴嫩总统夏蒙投靠美国，同美国签订了执行艾森豪威尔主义的协定，放弃了中立政策，却引起黎巴嫩人民大众的强烈反对，又发展为几乎遍及黎巴嫩全国的人民起义，使美英在地中海东岸重要战略地区的地位受到挑战，美英海军很快集结在黎巴嫩沿岸，1957年7月15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命令美军在黎巴嫩登陆，借口是应黎巴嫩总统夏蒙的请求而出兵。

黎巴嫩议长谢哈布坚决谴责夏蒙的卖国行为，严厉指责美国入侵黎巴嫩，他在分发给联合国会员国的信中郑重声明：

“美国军队借口保卫美国人生命、维护黎巴嫩的独立与主权而在黎巴嫩领土登陆，这一行动本身就是对黎巴嫩独立与主权的侵犯。”

第二天，中国政府就以极快的速度，发表关于反对美国武装干涉黎巴嫩的声明称：

“7月15日，美国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的根本原则，在‘保护美国侨民’和‘保卫黎巴嫩主权’的借口下，派遣武装部队在黎巴嫩登陆，对黎巴嫩内政进行武装干涉。这是美国镇压阿拉伯人民的民族独立运动和制造世界紧张局势的一个极其严重的战争冒险行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强烈地谴责和抗议美国的侵略行为。”

中国政府声明指出问题的严重性和中国的态度时称：“美国这种侵略行动，不仅是对阿拉伯各国人民的狂妄挑衅，而且严重威胁着西亚和世界和平……黎巴嫩、伊拉克和一切阿拉伯人民为争取独立和自由的斗争，决不是孤立的，六亿中国人民将同亚非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站在一起，全力支持阿拉伯人民的正义斗争。美国如果不立即从黎巴嫩撤出它的侵略部队，必将自食其果。”

苏联也于7月16日发表政府声明，指出美国武装干涉黎巴嫩的真正原因是企图在中近东国家中保留殖民体系，苏联主张在联合国范围内采取刻不容缓和坚决的措施。

赫鲁晓夫立即写信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英国首相麦克米伦、法国总统戴高乐、印度总理尼赫鲁，主张在三天内举行苏、美、英、法和印度参加的五国紧急首脑会议，讨论美英军队尽快撤出黎巴嫩和约旦问题。

赫鲁晓夫这一提议在华盛顿引起一片慌乱，美国害怕在最高级首脑会议上成为被审判对象，“几乎肯定会走向灾难之路”，美国著名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胆战心惊著文称：“艾森豪威尔先生和赫鲁晓夫此刻公开碰面将是一个可怕的场面。”

美国一个记者更形象地在《纽约时报》上写出美国发动侵略黎巴嫩战争罪有应得的尴尬局面：

“艾森豪威尔总统不得不同意出席这次糟糕而难受的会议，可以说是一次在不恰当的时间和地点就不恰当的课题举行的不恰当的会议。”

艾森豪威尔急忙使自己从慌乱中稍稍平静下来，考虑如何应付赫鲁晓夫的外交攻势，他告诉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美国并不打算急忙召开这种最高级会议，但在赫鲁晓夫一再催促和中国及世界舆论谴责之下，处境极为狼狈。

英国首相麦克米伦跳出来为他的“难兄”解围，7月22日提出召开一次联合国安理会特别会议，以便美英随时动用否决权摆脱窘境。

对此，艾森豪威尔、杜勒斯并不领情，反倒责备麦克米伦使美国陷入“为难境地”，“处于心理上的守势地位”。经麦克米伦反复解释，赫鲁晓夫又反复催逼，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经 24 小时的紧张磋商，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才拍板决定：“如果普遍要求举行这种会议的话，那就不妨召开一次吧！”

赫鲁晓夫见美国的态度有所松动，马上于 7 月 23 日提出 7 月 28 日召开五国最高首脑会议，艾森豪威尔冷笑连声，不紧不慢回答赫鲁晓夫称：“我们觉得太早了！”

为打击美帝国主义的猖狂气焰，周恩来总理 1958 年 7 月 31 日在出席柬埔寨驻华经济代表团团长杨安为庆祝中柬两国建交举行的招待会上，郑重向全世界宣告：

“现在，美英两国对黎巴嫩和约旦的武装侵略以及对伊拉克共和国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武力威胁，已经遭到了亚非和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强烈反对和正义谴责。如果美、英政府不顾世界的公正舆论，坚决不放弃它们在西亚扩大侵略的冒险计划，拒绝从黎巴嫩和约旦撤出侵略军队，并且对于苏联所倡议的旨在制止侵略、维护和平的五国首脑会议继续抱着阻挠和拖延的态度，那就充分地暴露它们是蓄意要把西亚和世界拖入一次严重的战争灾难，而这是亚非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所绝不能容许的！”

周恩来总理还给伊拉克总理卡赛姆写信，坚决反对美英武装占领黎巴嫩和约旦、武装威胁伊拉克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破坏中东与世界和平的侵略行为。

在中、苏和全世界人民强烈谴责的压力之下，美国只得同意 8 月 13 日召开联合国特别紧急会议。会上，苏联代表团提出要求美英干涉者撤出黎巴嫩和约旦的议案，美国竭力从中阻挠破坏，双方斗争激烈。周恩来在会外予以配合，8 月 17 日在印尼驻华大使维约普拉诺托为庆祝印尼独立 13 周年举行的招待会上，以特有的外交风度施加影响说：

“现在美国和英国在联大紧急特别会议上，一方面阴谋转移目标，规避从黎巴嫩和约旦撤出它们的侵略军队的问题；另一方面，又企图通过联合国替它们在中近东的侵略行为套上合法的外衣。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绝不容许这种阴谋得逞。”

恰在此时喜讯传来，伊拉克发生更沉重打击殖民主义的事件：1958 年 7 月 14 日，伊拉克的卡赛姆将军“乘着一股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混在一起的浪潮”，推翻了伊拉克的君主制，把伊拉克的费萨尔国王和他的亲西方的首相努里·赛义德在巴格达处死，戏剧性地改变了整个中东形势。

美国认为伊拉克事件“严重威胁”着它在伊拉克的石油利益，调动兵力准备对其进行武装干涉，使中东局势更为紧张。

中国在 7 月 16 日发表声明指出，“现在，由于伊拉克民族独立运动的伟大胜利动摇了殖民主义在中东的统治，恼怒而又惊慌的美国政府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发动了对黎巴嫩的武装干涉，并且企图侵入约旦、威胁伊拉克共和国。”

周恩来总理亲自写信给伊拉克总理卡赛姆，对中国和伊拉克两国已互相承认表示高兴，愿意采取实际步骤发展两国政治经济关系，反对美国武装威胁伊拉克。毛泽东主席 9 月 5 日在中国第 15 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纵谈国际形势，以幽默的语言讲美国侵略中东问题说：

“中东的撤兵问题。美英侵略军必须撤退。帝国主义现在想赖在那里不走，这对人民是不利的，可是同时也有教育人民的作用。”

9月8日，毛泽东又把台湾、黎巴嫩比作套在美帝国主义脖子上的两条绞索，以独具特色的形象语言说：

“黎巴嫩是最近套住的，也是美国自己造的一条绞索，自己套上去的，绞索的一端就丢到阿拉伯民族手里。不但如此，而且是丢到全世界大多数人民手里，大家都骂它，不同情它，大多数国家的人民、政府手里拿着这个绞索。比如中东，联合国开了会，但主要是在阿拉伯人民手里套住了，不得脱身。它现在进退两难，早退好，还是迟退好？早退，那么所为何来呢？迟退，越套越紧，可能成为死结，那怎么得了呀？”

毛泽东、周恩来还与1958年8月访华的赫鲁晓夫商谈中东形势，和世界人民一道谴责美帝国主义侵略中东。在世界舆论的压力下，美国在10月被迫同意从中东撤军，中苏和世界人民取得了反对美国侵略中东的巨大胜利，这正是：

中东堪称好地方，盛产石油真宝藏。

美国出兵套绞索，赶走干涉野心狼。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夺气攻心 毛泽东详解纸老虎论

盗亦有道 杜勒斯可谓反面教员

话说在 50 年代后期，毛泽东那赫赫有名的“纸老虎”论和“绞索论”，搞得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狼狈不堪，众叛亲离，弄得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神魂颠倒，惊慌失措。

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过人智慧和无敌气概，指出美帝国主义在中东、台湾海峡推行战争边缘政策，完全是自做绞索，把一端套在自己脖子之上，把另一端交给中东和中国人民。中东之事已经表述过了，这里专讲围绕台湾海峡危机的中美苏三国间复杂的“外交游戏”。

50 年代台湾海峡危机完全是由美国一手制造出来的：美国在发动侵略朝鲜战争的同时，派第七舰队侵占中国宝岛台湾，妄想把台湾变成推行侵略政策的“不沉的航空母舰”，1953 年又签订美蒋《军事协调谅解协定》，妄图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

而对美蒋的战争挑衅，毛泽东决定来个小小的反击，1955 年 1 月 18 日一举解放美蒋经营多年的前哨阵地一江山岛，迫使美国和蒋介石忍痛放弃护卫台湾的大门——大陈岛。

这使 67 岁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伤透了脑筋，竟在两年内三次生重病卧床不起，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 1957 年 11 月 25 日午饭过后，突然瘫倒在椅子上，话语不清，语无伦次，发疯般用拳头敲打床单。

最接近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国务卿杜勒斯觉得此事关系重大，便打电话与副总统尼克松商量：

“我们有可能遇上总统不能执行职务，而自己又意识不到的情况，我们该不该宣布他不能胜任总统职务？”

尼克松摸着尖下巴想了半天，认为还不到自己接替艾克登上总统宝座的时候，就慢悠悠地反问道：“如果我们阻止总统工作，岂不成了您舅父逼威尔逊总统辞职的翻版：妒忌和篡权？”

工于心计的尼克松一句话把杜勒斯打哑巴了，哼哼唧唧说不出一句话来。

原来，1919 年威尔逊总统生病，杜勒斯的舅父罗伯特·兰辛劝威尔逊辞去总统职务。威尔逊勃然大怒，认为兰辛身为国务卿，却野心勃勃要夺总统的权，一怒之下把兰辛驱逐出国务院。杜勒斯接受他舅父的教训不敢贸然行动。

艾森豪威尔不愿退出历史舞台，拖着重病之身，在伙同杜勒斯出兵黎巴嫩挑起中东战火的同时，鼓动蒋介石以金门、马祖为基地对中国大陆进行骚扰和破坏活动，叫嚣反攻大陆；还命令美国海军参谋长伯克于 8 月 8 日宣称，美国海军正密切注视台湾地区局势，随时准备进行像美军在黎巴嫩那样的登陆作战。

为给美国和蒋介石集团以惩罚性打击，毛泽东和国防部长彭德怀命中国人民解放军从 1958 年 8 月 23 日起，开始猛烈炮轰金门、马祖。

于是，惊天动地的炮声响彻台湾海峡上空，增兵金门的国民党运输舰遭到沉重打击，我鱼雷快艇和炮兵各显神威，首战告捷，击沉击伤台湾军舰各一艘，金门蒋军也被打得叫哭连天，有诗为证：

惩罚美蒋震长空，万炮齐发呈雄风。

教训美国勿猖狂，斗转星移世不同。

福建前线突如其来的炮声打了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一个措手不及，摸不清毛泽东开炮轰击金门的真实目的，以为中国要解放台湾和金门、马祖，艾森豪威尔急召杜勒斯协商对策。杜勒斯失去平日沉着老练的风度，前额上流着汗珠说：

“总统阁下，中共大炮轰击所造成的有形损失是轻微的，尽管伤亡不小，但我预料中共将对金门、马祖两个岛屿实行封锁，企图使守军挨饿。”

此时的艾森豪威尔更显得苍老，长脸上皱纹纵横，完全失去了往日二战名将叱咤风云的神采，他运用多米诺骨牌理论的想象力，唉声叹气预言：“如果失去金门、马祖，会导致失去台湾，威胁日本、菲律宾、泰国、越南甚至冲绳未来的安全，因而将使美国的根本利益受到严重的损失。”

美国著名学者古尔德—亚当斯在所著《强权时代》一书中，形象地描绘艾森豪威尔、杜勒斯所处的困境称：

“美国政府事实上由于两个原因而处于困境中：第一，美国和它的盟国的报纸一时群情哗然，要求美国应当明确表示它是否准备防御金门。第二，正如中国共产党和俄国人肯定知道的，自三年前的金门、马祖危机的最初阶段以来，国民党已不断地从他们有限的部队中抽人增驻这两个岛屿；因此，如果这些岛屿被占领了，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将受到与失去这些领土的意义极不相称的打击。这样，美国在试图防御台湾本身时，不可避免地将挑起沉重得多的负担。”

蒋介石惶惶不可终日，准备搬到乡下去住，他更添油加醋渲染紧张局势，向美国提出协助台湾反攻大陆的要求。

艾森豪威尔“上了蒋介石的当”，8月24日命第七舰队和在远东的美国其他海军部队采取“正常的预防性防御措施”，紧急调动6艘航空母舰、130艘作战舰只、500架飞机、8800名地面作战部队前往台湾，命美军太平洋地区部队总司令、太平洋空军司令、海军陆战队司令等赶赴台湾，与台湾军政官员协商作战问题。

为加剧台湾海峡紧张局势，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命美国军舰9月初起开始为前往金门的国民党运输船队护航，派遣美国飞机掩护台湾飞机在金门上空进行空投，直接参加了中国内战。艾森豪威尔、杜勒斯还叫嚷不放弃帮助蒋介石反攻大陆的“责任”，扬言不借挑起局部冲突和世界战争来阻挠中国人民收复金门、马祖。

为打击美国的侵略气焰，中国政府9月4日宣布中国的领海宽度为12海里，它适用于中国的一切领土，包括台湾及其周围各岛。

艾森豪威尔不敢小看中国的这一重大决定，忙召集文武大员协商对策。他气势汹汹宣称：“如果中共真的企图侵占金门和马祖，我将考虑批准对共产党中国的机场使用战术原子武器！”

杜勒斯左手一推金丝眼镜，紧跟着美国总统叫嚣说：“我认为，当我们决定把这些武器包括在我们的武库之中时，我们就已经承认使用这些武器要冒政治和心理上的风险。我们已经使我们的国防适应于在任何规模的冲突中使用这些武器。当情况危急时，如果我们由于世界舆论的反对而不使用它们，我们就必须改变美国的国防部署。”

艾森豪威尔毕竟是久经沙场磨练的名将，他不像杜勒斯那么狂热，审时度势冷静地做出判断：“如果美国使用原子武器攻击中共的机场，苏联就很

可能用核武器攻击台湾来报复，因此我不准备批准使用原子弹。”

可是，艾森豪威尔又不肯善罢干休，9月4日授权国务卿杜勒斯发表声明，与中苏在台湾海峡展开新一轮争斗，摆出世界霸主的蛮横姿态声称：

“台湾（福摩萨）和金门、马祖各岛从来没有处于中国共产党人的管辖之下……美国负有条约义务来帮助保卫台湾（福摩萨）不受武装进攻，美国国会的联合决议授权总统使用美国的武装部队来确保和保护像金门和马祖等有关阵地……美国已经做出军事部署，以便一旦总统做出决定时，能接着采取既及时又有效的行动。”

毛泽东、周恩来对杜勒斯的声明慎重对待，冷静地研究对策，及时向苏联通报了炮轰金门的情况。这可吓坏了一心要与艾森豪威尔搞缓和的赫鲁晓夫，他忙命苏联驻华使馆参赞苏达利柯夫会见中国总理周恩来，质问中国炮轰金门的真意，说要派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访华，与中国协商统一步调问题。

周恩来欢迎葛罗米柯访华，并向他介绍了中国对台湾问题的立场、策略和所采取的行动。周恩来看苏联人那副惊慌失措的样子，就以东亚大国风度做苏联老大哥的工作说：

“中国炮击金门、马祖，并不是就要用武力解放台湾，只是要惩罚国民党部队，阻止美国搞‘两个中国’；如果打出乱子，中国自己承担后果，不拖苏联下水！”

这一天，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多次协商对策，协商内容虽不得而知，但毛泽东当天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谈国际形势时，大概讲出了其中的精华部分：

“国际形势，我们历来有个观点，总是乐观的。后来总结为一个‘东风压倒西风’。美国现在在我们这里来了个‘大包干’制度，索性把金门、马祖，还有什么大担岛、二担岛、东旋岛一切包过去，我看它就舒服了。它套上了我们的绞索，美国的头颈吊在我们中国的铁的绞索上面。台湾也是个绞索，不过要隔得远一点。它要把金门这一套包括进去，那它的头更接近我们。我们哪一大踢它一脚，它走不掉，因为它被一根索子绞住了。”

接着，毛泽东用辩证逻辑分析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制造紧张局势砸自己的脚说：

“这个紧张局势，对我们并不是纯害无利，也有有利的一面。什么道理呢？因为紧张局势除了有害的一面外，还可以调动人马，调动落后阶层，调动中间派起来奋斗。怕打原子战争的，就要想一想。你看金门、马祖打这样几炮，我就没有料到现在这个世界闹得这样满城风雨，烟雾冲天。”

周恩来听了毛泽东的长篇宏论，觉得恰如迎着初升的太阳攀登东岳泰山，步步登高，更加心明眼亮，视野开阔，便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向他详细解释中国炮轰金门的奥妙政策。之后，又带他到颐年堂拜见毛泽东，一起共进晚餐。毛泽东亲自给他讲解著名的“纸老虎”和“绞索”宏论，直讲得葛罗米柯点头称是，这才离开北京回莫斯科向赫鲁晓夫汇报。

毛泽东、周恩来又经一番密商，做出绝妙部署，先由周恩来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台湾海峡地区局势的声明，矛头直指杜勒斯：

“1958年9月4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授权之下发表声明，公然威胁要在台湾海峡地区扩大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略范

围，进行战争挑衅，从而加剧了美国在这个地区造成的紧张局势，使远东和世界的和平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为此，我受权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

中国对美国发出严重警告：如果美国政府悍然不顾中国人民的再三警告和世界人民的和平愿望，继续对中国进行侵略和干涉，把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的头上，美国政府必须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

中国表示严正态度之后，又采取灵活机动策略，宣布鉴于美国已经指派大使级代表参加中美华沙谈判，又表示愿意谈判解决中美在台湾海峡地区的争端，中国政府准备恢复两国间大使级会谈。

毛泽东气势磅礴的讲话和中国政府的严正声明，立即在全世界产生强烈反响，美国公众和参议员纷纷发表反对杜勒斯好战的声明，连美国前国务卿艾奇逊也尖锐地指责美国政府在向“错误的道路上滑下去”，辛辣地讽刺说：

“看来，美国当局正在晕头转向或者满不在乎地听任自己卷入和中国的战争中去，在这场战争中，美国既没有朋友，又没有盟国。”

为摆脱困境，艾森豪威尔拖着病弱之躯与杜勒斯等人寻求对策，决定让杜勒斯以强盗诡辩逻辑辩解说：

“当然极其重要的问题是——我想这是大家理解的，虽然也许应该使大家理解得更多些——处在危险中的并不仅仅是金门和马祖这两个地方。显然，如果牵涉的仅仅是这一些地方，美国就没有理由采取行动。那里牵涉的是自由世界在西太平洋的整个地位，它也牵涉到美国的切身利益。”

慑于中国和世界舆论的压力，杜勒斯声称欢迎周恩来关于恢复中断了的华沙大使级会谈的建议，却又宣布美国军舰为国民党到金门的船只护航。

9月7日，艾森豪威尔令美国4艘军舰侵入中国金门和厦门地区领海12海里以内，公然为国民党的船队护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奉命向美国提出第一次严重警告。

美国的猖狂侵略行径激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9月7日中国约两亿群众在各地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高呼“美国军队从台湾地区滚出去”等口号，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远，世所罕见。

9月8日，毛泽东再次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讲话，对“绞索论”作进一步的阐述：

“现在我们要讲对杜勒斯、艾森豪威尔，对那些战争贩子使用绞索……台湾是老的绞索，美国已经占领几年了。它被什么人绞住了呢？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绞住了。六亿人民手里拿着一根绳子，这根绳子是钢绳，把美国的脖子套住了。谁人让它套住的呢？是它自己造的索子，自己套住的，然后把绞索的一头丢到中国大陆上，让我们抓到。”

毛泽东毫不含糊地宣告：“台湾是我们的，那是无论如何不能让步的，是内政问题。跟你（美国）的交涉是国际问题，这是两件事。你美国跟蒋介石搞在一起，这个化合物是可以分解的，比如电解铝、电解铜，用电一解，不就分离了吗？蒋介石这一边是内政问题，你那一边是外交问题，不能混为一谈。”

这时，苏联接到美国怂恿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情报，赫鲁晓夫认为中国随时都有可能遭到进攻，便在9月7日写信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警告他必须悬崖勒马，否则必将招致严重恶果。

9月19日赫鲁晓夫又以中国人“后台的身份”再次致信艾森豪威尔，警告说：

“对中国的侵略就是对苏联的侵略，美国不撤出台湾，远东就没有和平。美国的原子讹诈吓不倒苏联，也吓不倒中国。如果美国竟然对中国发动原子进攻，那么它就将立即遭到应有的同类武器的反击。”

不顾苏联和中国的严正警告，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下令加紧向台湾海峡调集重兵，计有6艘航空母舰、3艘重型巡洋舰、40艘驱逐舰、飞机200~300架、作战部队近万人，摆出一副要动武的架势。对此，中国外交部长陈毅9月20日发表声明严正宣告：

“如果美国侵略者竟然不顾中国人民的一再警告和世界人民的坚决反对，胆敢把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那么，我国团结一致的六亿人民，必将不惜牺牲，在保卫伟大祖国的神圣旗帜下，为反抗侵略而战，为维护祖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而战，为保卫远东和世界的和平而战。”

艾森豪威尔、杜勒斯虽不敢小看中国的声明，但仍决定进一步采取试探行动，就指使台湾当局9月29日出动飞机143架次，窜入中国福建、浙江、广东三省上空进行军事挑衅。中国空军奋起升空反击，蒋军在空战中发射响尾蛇导弹5枚，击落中国飞机一架。

此事非同小可，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奉命郑重宣告：中国人民解放军对于国民党空军的这种罪行，必将采取惩罚性的打击。

对此，毛泽东怒不可遏，决定提前结束对大江南北的巡视，于9月30日赶回北京，打破惯例亲自接见记者发表谈话说：

“帝国主义者如此欺侮我们，这是需要认真对付的。帝国主义的寿命不会很长了，因为他们尽做坏事，专门扶植各国反人民的反动派，霸占大量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军事基地，以原子战争威胁和平。这样，他们就迫使全世界90%以上的人正在或者将要对他们群起而攻之。”

艾森豪威尔、杜勒斯见美国在中东、台湾海峡都陷入泥潭，特别是大批军舰滞留台湾海峡，影响美国与苏联在欧洲心脏地区争霸的全球战略，不得不变换策略，玩弄“脱身之计”，杜勒斯在9月30日特意放风说：

“如果中国愿意在台湾海峡地区停火，美国可以劝说台湾军队撤出金门、马祖。”

艾森豪威尔也与杜勒斯相互配合，说金门、马祖对台湾“并不是极为重要的”。

蒋介石听了气得七窍生烟，公开指责杜勒斯9月30日的讲话“只是单方面的声明”，台湾当局“没有任何义务来遵守它”。

毛泽东、周恩来根据国际形势变化，特别是美蒋矛盾尖锐化，决定实施灵活策略，巧妙地实施“停停打打、半打半停”的新战法。为取得赫鲁晓夫的同意和配合，周恩来特意在10月5日深夜召见苏联驻华临时代办安东诺夫予以通报。

安东诺夫大惊，不明白为什么在形势变得越来越对中国有利的情况下，不穷追猛打，周恩来要他转告赫鲁晓夫：

“现在，整个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9月30日杜勒斯发表的答记者问，说明美国的态度起了变化。杜勒斯的讲话虽然没有那么

明确，但仍含糊地表明：如果中国方面实行停火，美国可以劝蒋军撤离沿海岛屿。显然，美国基本上是想执行一项从金门脱身的政策。”

周恩来见安东诺夫如坠五里雾中，就耐心地解释出现这种滑稽现象的原因，讲明新策略的奥妙之处：

“我们还是认为，最好把蒋介石继续留在金门、马祖沿海岛屿上。蒋介石继续留在金门、马祖，美国继续干涉，有极大好处。可以教育各国人民，特别是我们中国人民。美国想从金门、马祖脱身，我们不让它脱身，我们要美国从台湾撤军。这样，我们要紧张时，对金门、马祖打一下；要和缓时，松它一下。像少奇同志向你所说，在金门可以小打、中打、大打。我们可以谈谈打打，也可以打打停停。这对我们是有利的。暂时不收回这些沿海岛屿，为的是在时机成熟时我们争取一下子收回这些沿海岛屿、澎湖列岛和台湾。”

周恩来见安东诺夫仍似懂非懂，最后加以总结说：“这样，我们在美国面前又提出了一个新的使它很难处理的问题。美国本来准备劝蒋军撤走，现在就为难了，如果再劝蒋军撤走，蒋介石就会说美国要抛弃它了。美国不劝蒋军撤走，我们就达到了目的。”

于是，10月6日，中国公开发表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告台湾同胞书》，以独特的中国风格宣布对金门停止炮击7天，台湾军队可以充分地自由地输送供应品，但以没有美国护航为条件。

彭德怀的声明得到世界舆论的热烈欢迎，美国统治集团受到强烈谴责，为摆脱困境，杜勒斯10月7日在华盛顿国家机场，对中国倒打一耙说：

“中国共产党人在经过6个多星期的残酷和不停顿的炮轰之后，现在说，他们将保持一个多星期的人道主义与和平。对这个声明做出评价是不容易的。这是美国一直极力祈求的，而且如果

他们又恢复战斗，这个事态发展肯定会使中国共产党人受到全世界的谴责。”

与杜勒斯的主观愿望相反，受到谴责的不是中国而是美国，艾森豪威尔沉不住气了，忙向杜勒斯问计。

杜勒斯哈哈大笑，艾森豪威尔忙问其故，杜勒斯以歪理辩解道：“中共暂停炮击，就是我们提议的停火，来而不往非礼也，中国停火，美国也从10月8日暂停护航！”

艾森豪威尔连称好计，就命美国国务院10月8日发表声明说：

“由于中国共产党停止袭击沿海岛屿和对这些岛屿的补给工作，美国在军事上暂时没有必要进行护航。如果中国共产党恢复袭击，那么根据这个命令，美国的护航活动将马上恢复到需要的程度。”

对艾森豪威尔。杜勒斯把解放军暂停炮击和美国的“停火”混为一谈，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一致反对：蒋介石大骂“这是国际政客做的卑鄙交易”；毛泽东则命中国国防部10月13日发布命令，对金门炮击再停两周，给杜勒斯以当头棒喝：

“这是为了对付美国人的。这是民族大义，必须把中美界限分得清清楚楚。美国人想在我国的内战问题上插进一只手来，他们叫停火，令人忍俊不禁！”

中国的灵活而高明的策略很快发生作用，美国和蒋介石的矛盾有所发展，蒋介石坚持顽固态度，拒不接受和谈建议，高叫反攻大陆。

艾森豪威尔对蒋介石不听话极为恼火，担心控制不了蒋介石，忙派国务卿杜勒斯和国防部长麦克罗尔10月19日跑到台湾，要蒋介石从金门，马祖撤军，蒋介石不但予以拒绝，反而拉美国下水，要美国为台湾军队护航，杜勒斯也满口答应，还叫嚷要进一步实施美蒋条约。

毛泽东见美国人又插手护航，当即命令彭德怀下令福建前线英雄将士恢

复炮击，以惊天动地的炮声警告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

“中国人的事决不允许美国人插手，这是民族大义。美国人赖在台湾、台湾海峡是不行的，美国人干涉中国内政，是绝对不允许的！”

金门的隆隆炮声再次震动世界，毛泽东的奇妙战术打乱了美国的侵略步骤。杜勒斯哀叹其全球计划已被中国打乱，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吵作一团，美国记者这样描写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的困境：

“远东局势的这些转变产生一幅令人困惑的图景，特别是鉴于有些考虑不能在公开的讨论中提出来这个事实。这几个星期使那些负责政治和军事行动的人持续处于紧张状态之中。”

这时，美国参议员富布赖特等人要求弹劾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富布赖特理直气壮宣称：

“如果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坚持他们现在的以好战行动为基础的关于金门和马祖的外交政策，他们就应该受到弹劾！”

更使艾森豪威尔、杜勒斯感到头痛的，是几个国务院官员竟向《纽约时报》透露说，美国公众是反对国务卿杜勒斯的对金门外交政策的。

杜勒斯气急败坏他说，这是美国国务院历史上罕见的泄密和造反事件，美国副总统尼克松认为这是极丢人的事情，他幸灾乐祸挖苦说：

“我对此感到震惊，这是国务院的下属的一个别开生面的处心积虑的行动，要挖国务卿的墙角，对他的政策进行破坏活动。”

焦头烂额的艾森豪威尔急于摆脱困境，他要杜勒斯再次向中国提出停火的建议，杜勒斯唉声叹气说：“毛泽东早已说过，中美两国没有开战，无火可停！”

杜勒斯说着，把毛泽东和彭德怀的一段讲话交到艾森豪威尔手中，美国总统低头看道：

美国侵占台澎与台湾海峡，这是中美两方有关的问题，应当由两国举行谈判解决，目前正在华沙举行。美国人总是要走的，不走是不行的。早走于美国有利，因为它可以取得主动。迟走不利，因为它老是被动的。一个东太平洋国家，为什么跑到西太平洋来了呢？西太平洋是西太平洋人的西太平洋，正如东太平洋是东太平洋人的东太平洋一样。这一点是常识，美国人应当懂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之间并无战争，无所谓停火。无火而谈停火，岂非笑话？

艾森豪威尔看罢，愈觉自己病弱之躯不及毛泽东那样健康，哀叹 1958 年是他“一生中最倒霉的一年”：黎巴嫩、伊拉克、埃及、台湾海峡事件和国内矛盾闹得他顾此失彼、焦头烂额。大概是害怕行将就木吧，67 岁的艾森豪威尔竟越来越相信宿命论，认为以“8”结尾的年份都是他的倒霉之年：

1918 年：错过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飞黄腾达机会；

1928 年：在巴黎写书，有事业停顿不前之感；

1938 年：与麦克阿瑟一起在菲律宾艰苦搏斗；

1948 年：从军队退休，事业失意。

艾森豪威尔担心在下届总统大选中失败，硬着头皮支持蒋介石在台湾海峡制造紧张局势，10 月 23 日批准发表杜勒斯、蒋介石会谈公报，声称“美国承认中华民国是自由中国的以及广大中国人民所抱的希望和愿望的真正发言人”。

为再次教训艾森豪威尔和蒋介石，毛泽东根据国际形势变化再施巧计，

10月25日命国防部长彭德怀发表《再告台湾同胞书》，揭露美国孤立、托管台湾的两步阴谋，宣布在台湾当局不让美国人护航的条件下，逢双日不打金门的飞机场和料罗湾的码头、海滩和船只。

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打打停停、半停半打、边打边谈的灵活策略，把艾森豪威尔、杜勒斯搞得狼狈不堪，也使赫鲁晓夫感到恼火，因为他一心想与艾森豪威尔改善关系。他认为中国炮击金门与苏联要与美国搞好关系的部署不相协调，弄不好还可能引起苏美冲突。经毛泽东、周恩来一再解释，他对中国炮轰金门和对台对美政策仍一直有意见。

毛泽东在1958年10月接见苏联等6国访华团时，把杜勒斯比作希特勒、墨索里尼式的反面教员，毛泽东风趣他说：

“教员还是有的，有杜勒斯，这不是一个好教员吗？世界上没有杜勒斯事情不好办，有他事情就好办，所以我们经常感觉杜勒斯跟我们是同志。我们要感谢他。这个人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里，他是比较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因为他坚决执行阶级斗争的路线，相当不妥协。我这里没有讲他毫不妥协，因为他还有缺点。他相当坚决，只是坚决得还不够就是了。虽然有缺点，还是世界上最好的一个教员，只是除了共产主义者以外。当然第一个教员是马克思主义者，第二个教员才是杜勒斯。还要加上蒋介石，他还活着。”

毛泽东针对赫鲁晓夫惧怕美国的心理，让苏联官员告诉赫鲁晓夫：

“杜勒斯现在很不好办，他搞得很被动。人们责问他，为什么管到金门去呢？……全世界除了杜勒斯，都说金门是中国的岛屿，金门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所以他现在搞得很不好办事啦！我们还要继续使他难办，使他继续处于困难地位。不能轻易饶他！不要轻易让他溜掉！在这个地方大概他一时也相当难溜。”

此时，赫鲁晓夫一心想访美搞戴维营会谈，对毛泽东的话自然听不进去，但艾森豪威尔、杜鲁门却被毛泽东在台湾海峡问题上的灵活战术打得狼狈不堪，不得不于1958年12月10日宣布美国自台湾海峡地区撤出部分海空军。

鉴于赫鲁晓夫反对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论断，毛泽东在1958年12月间举行的中共八届六次会议上，再次对纸老虎论进行了阐述：

“这里我想回答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纸老虎的问题。我的回答是，既是真的，又是纸的，这是一个由真变纸的过程的问题。变即转化，真老虎转化为纸老虎，走向反面。一切事物都是如此……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

毛泽东的“纸老虎论”和“绞索论”极大地武装了反帝斗士，将反帝斗争推进到一个新阶段，这正是：

金门炮击举世惊，神奇变化妙无穷。

停停打打气若虹，巧计出自毛泽东。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罪有应得 加剧紧张局势杜勒斯氏谢世
谄谀拍马 追求美苏缓和赫鲁晓夫访美

话说赫鲁晓夫爱出风头，好大喜功，在坐稳苏共中央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的金交椅之后，见毛泽东不听他的指挥，就一心想和美国搞缓和，于是厨房辩论、戴维营精神不久便相继出现，留下一连串大丢苏联人脸面的丑闻、怪事，遭到中国领导人的严厉斥责。

赫鲁晓夫上台后野心勃勃要做出惊世之举，他力求通过美苏首脑会谈，实现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全球战略，但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未把赫鲁晓夫放在眼里，赫鲁晓夫只得主动向艾森豪威尔频送秋波，设法拉拢。

早在 1957 年 5 月 10 日，赫鲁晓夫接见美国《纽约时报》总编辑卡特勒奇时，就不顾苏联最高领导人的尊严，公开提出要求说：“我非常尊重艾森豪威尔总统，并希望能访问贵国。”艾森豪威尔听了卡特勒奇转达的口信，与国务卿杜勒斯密谋协商。杜勒斯认为赫鲁晓夫亲自找上门要求访美是件喜事，但还要煞煞赫鲁晓夫的锐气，因而对他的要求暂时不要理睬。赫鲁晓夫又不断通过各种渠道向艾森豪威尔、杜勒斯发出求访信息，提议进行美苏首脑会谈，但美国总统、国务卿却毫不理会，他不由勃然大怒，便在核武器和柏林问题上制造事端，向美国当局施加压力。

赫鲁晓夫不惜血本发展尖端武器，很快捷报频传：苏联 1957 年 8 月成功地发射世界上第一枚洲际弹道导弹，10 月间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成功运行。

这一下使赫鲁晓夫趾高气扬，尾巴翘上了天，他有意让美国记者转告艾森豪威尔：这只是苏联尖端武器奇迹的一个小小开端，其他火箭、卫星将源源不断送上太空。他嘲笑艾森豪威尔说，美国的运载火箭怕是差得很远吧？要不为什么不把美国的卫星送上天呢？你们的 B—52 重型轰炸机干脆推入炼铁炉化掉算了，B—52 飞机在苏联的多级弹道火箭面前，只不过是废铁一堆！

赫鲁晓夫又得意忘形地挖苦英国说，你们还把轰炸机当宝贝吧，跟苏联的尖端武器一比，这些东西简直不值一提，回去全砸烂当废铁卖算了！

毛泽东对苏联卫星上天感到欢欣鼓舞。在 1957 年 11 月 18 日的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他巧妙地用它来鼓舞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共产党人的志气，把这些成就作为东风压倒西风、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的重大证据。他说：

“第七件是苏联抛上了两个卫星。抛卫星的国家有多少钢？5100 万吨。不是讲美国非常厉害吗？你为什么到现在连一个山药蛋还没抛上去？你有一万万吨钢，牛皮吹得那么大呀，做出了先锋计划。先锋计划要改名了，得改成落后计划。由这七件事，我想可以得出一个概念：西方世界被抛到我们后面去了……在苏联发射人造卫星以前，社会主义国家在人心归向、人口众多方面已经对于帝国主义国家占了压倒的优势；而在苏联发射人造卫星以后，就在最重要的科学技术部门方面也占了压倒的优势。”

毛泽东豪情满怀，向世界宣告：“今年，1957 年，形势大为不同了。我们的天上是一片光明，西方的天上是一片乌云。我们很乐观，而他们呢，却是惶惶不安。两个卫星上天，使他们睡不着觉。”

苏联卫星上天使艾森豪威尔、杜勒斯狼狈不堪，但两人并不惊慌，依然对赫鲁晓夫举行美苏首脑会谈的要求置之不理。

赫鲁晓夫看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在 1958 年 11 月 10 日的莫斯科演说中宣布，他打算把东柏林的控制权转交给东德政府，由此引起了第二次柏林危机。

赫鲁晓夫见艾森豪威尔仍无软化反应，就在 11 月 14 日再次发表声明，宣布他正在就柏林的地位准备一个适当的文件，做出最重要决定。

他见艾森豪威尔仍无反应，便下狠心搞了个“最后通牒”式文件，让外交部长葛罗米柯 11 月 27 日正式递交给美、英、法和联邦德国驻苏联大使，宣称要使西柏林成为一个非武装的自由城市，由苏、美、英、法和联合国保证它的地位。赫鲁晓夫提出另签一个协定，由东德保证西柏林与外界的交往畅通。作为交换条件，西方应担保不再利用西柏林对东德进行颠覆活动；如果 6 个月后仍无进展，苏联将单独与东德签订和约。

赫鲁晓夫发出威胁说，即使美国等西方国家不同意苏联的意见，也“阻止不了我们执行苏联的计划”，因为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71 岁的杜勒斯此时已患癌症，全身剧痛，疲乏无力，勉强在他的国务院办公室里那张皮制长沙发上躺下，双脚往小桌上一搁，吃力地翻阅赫鲁晓夫的最后通牒式文件，终于从“外交游戏文件”中抓到了实质性东西：从西柏林撤出所有外国军队，6 个月内使柏林成为自由城市。

杜勒斯放下赫鲁晓夫的“最后通牒”式文件，从负责欧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利文斯顿·麦钱特手中接过一本大拍纸簿，漫不经心地在上面对空般乱写乱画。

杜勒斯没有向艾森豪威尔报告他的病情，而在剧烈的病痛中，在死亡的阴影的笼罩下，作了最后一次仆仆风尘的欧洲之行。

他与法国总统戴高乐、英国首相麦克米伦、西德总理阿登纳协商对策，他忍着痛苦听取西方盟国首脑的意见，就餐时根本不能下咽，但却装作使人觉得他在吃东西的样子，只对阿登纳说患了癌症，他强打精神发表对苏强硬讲话说：

“如果赫鲁晓夫鲁莽行事，柏林危机就有可能导致战争的爆发。美国愿意冒这个风险，因为保住西柏林，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但是，西方必须设法避免一场灾难，设法同赫鲁晓夫进行谈判。”

杜勒斯对赫鲁晓夫的性格特征进行深入研究，认为此人虽然经常咆哮如雷，但骨子里想和美国搞缓和。杜勒斯与阿登纳密商后公开宣称：“如果赫鲁晓夫使用武力关闭柏林的高速公路，美国就决心使用武力保持它的畅通！”

杜勒斯回到华盛顿，向艾森豪威尔汇报他的欧洲之行结果，两人决定采取强硬态度，“拒不投降，但愿意谈判”。赫鲁晓夫果然欺软怕硬，表示愿意和解，不再提最后通牒之事。

杜勒斯病重住院发现癌症已到晚期，1959 年 5 月 24 日死于华盛顿的沃尔特·里德陆军医院。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称赞“杜勒斯是一个值得称道的和很有意思的对手”：

“艾森豪威尔受到杜勒斯的很大影响。杜勒斯是个侵略成性的人物，他对苏联有一种天然的强烈反感，对每一件新的事物、每一件共产主义的事物、每一件社会主义的事物都有一种思想意识上的仇恨。这种仇恨一直伴随着他，直到他生命的末日。他因提出一套反对苏联的系统理论而臭名昭著。他的外交政策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公式，就是搞战争边缘，但是不越过这个边缘……我应当说，我们对杜勒斯有两重看法：一方面，我们认为他是我们意

识形态上的头号敌人；另一方面，他不止一次地证明他并不是真要战争。”

杜勒斯逝世后，赫鲁晓夫只好另找与美国领导人拉关系的途径，恰好美国 1959 年 7 月在莫斯科举办全美展览会，美国副总统尼克松来苏主持。赫鲁晓夫陪同尼克松出席开幕式，决定借此机会向尼克松好好表现一番，给美国留下深刻印象。

在参观中，一个青年技术人员建议把赫鲁晓夫与尼克松谈话的镜头拍摄下来，在展览会期间反复播放，赫鲁晓夫欣然同意。这时，在场的苏联观众纷纷围拢过来，赫鲁晓夫兴致勃勃地对尼克松说：

“美国存在多少年了？170 年。好吧，大家请看，这就是它达到的水平。我们存在只不过 42 年，而再过 7 年，我们将要达到同美国一样的发达水平！”

在场的苏联观众为赫鲁晓夫这番鼓舞人心的话热烈鼓掌，赫鲁晓夫越讲越情绪激昂：

“当我们赶上你们并超过你们的时候，我们会向你们招手的！”

赫鲁晓夫一边说着一边回身向后挥挥胖手，好像美国真的已在苏联人后面慢慢地爬行。他很为自己这番表演洋洋得意，觉得自己抓住机会借题发挥，既奚落了美国，使尼克松难堪，又大大振奋了苏联人的精神，提高了他的威信，可谓“高明之举”。

接着，尼克松陪同赫鲁晓夫参观美国典型厨房用品展览会。赫鲁晓夫拿起一个挤柠檬汁的自动器，夸夸其谈道：

“尼克松先生，你们怎么在苏联展出这种笨东西！你们吃茶需要的不过是几滴柠檬汁。我想你们的主妇使用这种小机器比我们的主妇切一块柠檬，丢在茶杯里，用调羹匙挤出汁来更费时间。当我还是小孩时，我们就常用这种方法挤柠檬。你们的这个工具，我看无论如何不是一种改进，它并不能真正节省时间和省力。事实上，你可以用手更快地挤出柠檬，展出这种笨东西是对我们智力的侮辱！”

尼克松激动地予以驳斥，两人展开激烈的辩论。赫鲁晓夫又提出新问题：“尼克松先生，你把这种美妙的器具带到莫斯科展览，但你们真的在广泛使用这种器具吗？美国主妇们的厨房里有这种东西吗？”

当尼克松说这些展品市场上还没有时，赫鲁晓夫抓住小辫子讥讽说：“啊，原来你在向我们夸耀许多你们国内还未使用的东西！你以为我们看不出来吗？你想我们会对你们带来展出的这种骗人的东西称赞一番吗？”

赫鲁晓夫认为他们“辩论的不是厨房用具问题，而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对立的制度问题”。

赫鲁晓夫对尼克松这样大动肝火是有来由的，因为美国国会刚刚通过了《关于被奴役国家的决议》，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根据这个决议发表声明，号召美国人“考虑那些受到苏联控制的国家的痛苦处境，给予被奴役国家的正当意愿以支持”。赫鲁晓夫对此非常恼火，曾发表讲话给予猛烈谴责。

第二天，赫鲁晓夫与尼克松举行正式会谈，开始时还满面春风，称赞尼克松 8 个月前在英国伦敦市政厅发表的关于和平竞赛的演说，认为它和苏联的“三和”思想有共识。赫鲁晓夫主张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社会制度必须和平共处，双方展开和平竞赛，最后社会主义赛垮资本主义，使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

不一会儿，赫鲁晓夫赶走记者，一张圆脸拉得很长，不时用拳头敲击桌子，指责《关于被奴役国家的决议》是对苏联的严重挑衅，是愚蠢得令人吃

惊的决定。他质问尼克松，美国是否准备同苏联打仗？又厉声宣告：

“在此之前，苏联政府一直以为美国国会不会通过一个发动战争的决议，但是，现在看来，虽然麦卡锡参议员死了，但他阴魂不散，因此苏联必须做好准备！”

尼克松看事态趋向严重，忙做解释诡辩说这只是表达美国的看法，并不是号召采取行动，赫鲁晓夫仍揪住不放，尼克松挠着头皮，陪笑请求说：

“在白宫，每当一个问题讨论了很久而又没有什么结果的时候，有一句话可以中断讨论，这就是艾森豪威尔总统所说的：‘这匹马我们已经打死了，换一匹吧’，现在我们是否也这样办？”

“我同意总统所说的，不要把一匹马打得太狠”，赫鲁晓夫不愿得罪艾森豪威尔，但他越说越激动，一张圆脸涨得通红，又把话题拉了回来，“但我还是不明白，你们的国会为什么要在如此重要的国事访问前夕，通过这样一个决议？”

赫鲁晓夫气得失去控制能力，一下骂出了脏话，尼克松从赫鲁晓夫的表情上已看出个大概，译员只得照实译出：

“这个决议臭不可闻，就像刚拉的马粪一样臭，再没有别的东西比这更难闻的了！”

尼克松也不是好惹的，他出生于洛杉矶附近的小村镇，知道猪粪比马粪臭，还了解赫鲁晓夫小时候放过猪，就不客气地回敬道：“恐怕主席搞错了，还有一种东西比马粪更臭，那就是猪粪！”

赫鲁晓夫听了怒火升腾，太阳穴上的青筋几乎爆裂，但他想到要搞美苏合谋争霸世界，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得罪不得，就刹时间由怒转笑道：

“这个你说对了，所以也许还是你说的对，我们现在应该换个问题来讨论，然而我必须提醒你，你在苏联访问期间，还会听到别人说起这个决议的。”

赫鲁晓夫不肯就此罢休，他总想找机会让苏联人民给尼克松上一课。

机会终于来了，赫鲁晓夫陪尼克松乘游艇在莫斯科河游览时，他热情地向游客们招手致意。游客们见是赫鲁晓夫，纷纷聚拢过来。他吩咐将游艇停下，故意向游客们发问：“你们之中哪个是被控制、被压迫的？”

苏联游客一下被问愣了，再看看赫鲁晓夫身旁的尼克松，顿时领会了他们的领导人的意图，便一齐大声回答：“没有！”

赫鲁晓夫故意问：“难道你们都是奴隶吗？”

河中游泳者异口同声回答：“涅特”（不是）。

赫鲁晓夫得意地用胳膊肘一碰尼克松的胸脯，带炫耀性他说：“副总统阁下，请看看我们的奴隶们是怎么生活的！”

赫鲁晓夫继续制造戏剧性情节：“喂，有人非说你们是被奴役、没有自由的人，这可笑吗？”

此语一出，苏联游客们立即发出一片“轰”的嘲笑声，弄得尼克松狼狈不堪，苏联记者不失时机地将这些“大快人心”的场面部拍摄了下来。

尼克松毕竟久经外交沙场，他以称赞对方来摆脱窘境：“你知道，我真佩服你，你决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进行宣传。”

赫鲁晓夫趾高气扬反驳道：“不，不，我不是搞宣传，我说的是真话，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赫鲁晓夫尝到了甜头，又在尼克松访问莫斯科附近的红星农场时，安排一个工人，来到尼克松面前，自我介绍说：“我是一个苏联普通公民，我有

问题要向副总统先生请教：美国为什么阻挠为停止原子弹试验所做的努力？为什么美国想要战争？”

尼克松明知这是赫鲁晓夫设置的陷阱和圈套，也只好硬着头皮往里钻，大声向这位苏联“公民”解释说：“这完全是误会，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不是想访问美国吗？我们都在为获得和平而努力！”

苏联“公民”又提出新问题：“为什么美国拿在外国领土上建立的军事基地来威胁我们苏联？”

尼克松觉得这些问题十分棘手，但也不得不做回答，突然灵机一动有了“绝妙好词”：“苏联不也在东德和东欧国家驻有大批军队吗？我们能说是威胁美国和西方国家吗？”

尼克松到另一家工厂参观时，又碰到自称苏联普通“公民”的人向他提出一连串质问，尼克松心里恼火，但也只得硬着头皮回答，加之提问者都以“群众”面目出现，尼克松也不便向苏联政府提出交涉，怕落个“美国领导怕见苏联群众”的名声，第二天莫斯科报纸上大量登出诸如“苏联一工人质问尼克松，尼克松在正义面前无言以对”之类的报道，搞得尼克松不胜其烦。

尼克松绞尽脑汁想出对付之策，听说苏联人特别喜欢美元，就事先准备一些，到时候送给要提问题的“苏联普通公民”，但又被赫鲁晓夫抓住把柄，说尼克松想用资本主义的臭钱收买苏联公民，搞得尼克松狼狈不堪，这正是：厨房辩论颇有名，剑拔弩张火气升。

更奇游客频质问，苦不堪言尼克松。

美国正副总统艾森豪威尔。尼克松和新任国务卿赫脱经过对赫鲁晓夫的长期考察，认为此人虽常常咆哮如雷，但骨子里想与美国搞缓和，又多次要求访美，不妨邀他美国一行。于是便命美国副国务卿罗伯特·墨菲，会见1959年夏在纽约参加苏联科技和文化展览会开幕式的苏联第一副总理弗罗尔·科兹洛夫，交给他一封艾森豪威尔致赫鲁晓夫的书信。

科兹洛夫兴冲冲赶回莫斯科，马不停蹄地驱车到莫斯科市郊赫鲁晓夫的别墅，将信递上：“我带来了艾森豪威尔总统给你的一封专函。”

赫鲁晓夫瞪大那双锐利的小眼睛观阅来信，见是美国总统邀请他到美国做一次友好访问，他不由惊喜万分。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我必须说我简直不能相信我的眼睛。我们毫无理由期待这样的邀请，无论是在当时或者其他的时候。我们的关系一直极端紧张，然而这是艾森豪威尔、美国的总统在邀请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中央委员会书记赫鲁晓夫率领政府代表团去作友好访问（艾森豪威尔只用部长会议主席的头衔称呼我，尽管他理所当然地知道我还是党的首脑）。”

赫鲁晓夫立刻把苏联其他领导人找来，晃动着那斯达汉诺夫式的肩膀，拍着便便大腹，张开厚厚的嘴唇炫耀说。

“没想到美国突然来了这份邀请，它意味着什么呢？是某种转变吗？令人难以置信。我们感到，部分的原因可能是由于美国的公众舆论越来越倾向于改善同苏联的关系。艾森豪威尔正在被迫倾听那些主张为缓和紧张局势采取具体措施的民主派人士和商界人士的呼声。我承认，我有好奇心想去看看美国……美国在我们的思想里和对世界的看法中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它是我们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最强大的敌人，是为其他国家定反苏调子的首领……难怪我们有兴趣要去亲自看看我们的头号资本主义敌人。”

赫鲁晓夫担心美国不以最高规格接待他，因为苏联国家元首是苏联最高

苏维埃主席伏罗希罗夫，他只是政府首脑。赫鲁晓夫便通过苏联驻美大使与美方交涉，艾森豪威尔考虑到赫鲁晓夫的实际最高地位，决定以最高礼仪接待，在戴维营与其进行美苏首脑会谈。

赫鲁晓夫缺乏国际知识，竟不知戴维营是何地方，担心受到歧视，急忙命驻美大使馆官员前去调查，才知道戴维营是罗斯福在二战期间修建的总统别墅。赫鲁晓夫对此惊喜、羞愧交加：惊喜的是艾森豪威尔在这么重要的地方与他进行会谈，表现出艾森豪威尔对他的尊敬态度；同时也为他和苏联外交官员的无知感到羞愧。

于是，美苏同时于1959年8月3日发表消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拟于9月访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将在秋天访苏。

这一消息立刻震动全世界，世界上尖锐对立的美苏首脑居然互访，必将对国际局势产生重大影响。戴高乐、麦克米伦、阿登纳一齐表示反对，艾森豪威尔只得亲自飞往欧洲说服盟国朋友，保证在柏林等重大国际问题上寸步不让：“请放心，我将做出一番巨大努力，以便在卸任前把苏联领导人哪怕软化一点点。”

在做了充分准备之后，赫鲁晓夫率领苏联政府代表团于1959年9月15日乘苏联银白色的图—114式巨型飞机飞往美国。途中，在飞机上，他想到即将与赫赫有名的世界头号强国总统进行会谈，心里就打小鼓。

赫鲁晓夫曾与艾森豪威尔见过两次：一次在1945年5月9日战胜希特勒法西斯的庆祝会上，由斯大林介绍与艾克相识；还有一次是在1955年的日内瓦最高级会议上。但这次情况完全不同，是赫鲁晓夫到美国与艾森豪威尔做面对面的较量，他担心斗不过艾克而丢人现眼，洵此由于激动而感到神经紧张。

赫鲁晓夫一行到达华盛顿附近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好奇地向机外一望，赫鲁晓夫见身着华丽夏装的欢迎人群就像五色缤纷的花坛，觉得华盛顿正以风和日丽的天气向他表示欢迎，便想尽快与美国人接触，但却下不了飞机，急得赫鲁晓夫额头冒出了汗珠。

原来，苏联飞机比美国飞机高得多，美国的机场备用舷梯够不到苏联飞机的机舱门，只好动用苏联飞机的备用梯子，赫鲁晓夫觉得这使他露了脸，大吹大擂说：“他们美国人竟不知道我们乘的是一架如此巨型的飞机。在他们看到这架飞机时，我们可以察觉出他们眼睛里的惊讶神情。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飞机，他们自己当然也没有这样的飞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不会有。”

赫鲁晓夫头戴杭堡帽，身着黑色西装，胸前挂着三颗金光闪闪的勋章，兴致勃勃从巨型涡轮飞机上走下来，见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早已等候在舷梯旁，忙上前与其热烈握手，开始了他对美国为期13天的访问。

艾森豪威尔对接待赫鲁晓夫颇费了一番心思。他与副总统尼克松、国务卿赫脱等人制定了先挫锐气、后物质和文化诱惑、再逼其让步的三部曲作战方案，因而对赫鲁晓夫的欢迎搞得既隆重又很有节制。

在机场的欢迎仪式上，虽然也按传统鸣放21响礼炮并演奏《星条旗永不落》和苏联国歌，机场走道也铺了排场阔气的红地毯，但总的说来气氛并不热烈：在4000人的欢迎队伍中，除苏联使馆、驻联合国机构、苏联代表团人员发出一阵掌声外，美国欢迎人员和西方外交使节没有人鼓掌，没有人向其挥手，没有人同苏联人打招呼，脸上也没有喜悦的表情；沿途仅挂苏美两国

国旗，道路两旁的建筑物未加任何装饰点染。

美国和西方国家对赫鲁晓夫访美仅做低调报道，说华盛顿给赫鲁晓夫“非常冷淡的接待”。

尽管如此，这仍是苏联最高领导人对美国的第一次正式访问，是世界上两大阵营的头子举行的首次会谈，当然成为国际上的重大事件，也自然引起各国的广泛注意。老谋深算的艾森豪威尔与咄咄逼人的赫鲁晓夫相互见面斗智，必有一场好戏要看。

对美苏首脑会谈的结果，世界舆论纷纷猜测，很快成为人们街谈巷议的中心话题，有30多个国家的近2000名记者赶到美国采访，人数之多在美國新闻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的，超过了两年前英国女王伊丽莎白访美时有1400名记者跟随采访的纪录。

各国记者纷纷赶往布莱尔大厦，只见该大厦人口处又飘扬起苏联国旗。该大厦在二战期间接待过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这次是战后首次接待苏联最高领导人。

在当天举行的美苏首脑会谈中，艾森豪威尔摆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总统和债权人的姿态，向赫鲁晓夫要帐，要苏联归还二战时期根据租借法案接受军事装备所欠美国的债务。副国务卿狄龙还粗暴地施加压力，强使苏方接受美国强加给的条件。对当时的紧张气氛，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说：

“你甚至无须去碰他（狄龙）——只要向他靠近一点，他就会发火冒烟，劈拍爆裂，唾沫飞溅，就像他体内有些东西发生了短路快要爆炸似的。”

赫鲁晓夫感到气愤，他认为苏联在跟希特勒德国斗争期间，已经以血的代价偿还了欠美国的债，但因有求于美国，他对艾森豪威尔说出的话却还是客气的：

“总统先生，就我们来说，我们并没有欠你们什么东西，然而，我们还是同意偿还债务，但是有个条件：你们得给我们30亿美元的贷款。”

在谈到和平共处问题时，狄龙故意挑衅质问：“你谈的这个和平共处指的是什么？”

赫鲁晓夫被惹怒了，厉声驳斥说：“狄龙先生，如果你不理解两种制度之间的和平共处是什么意思的话，那很遗憾。你不得不去弄懂的时刻会到来的，现在要我给你解释是毫无意义的。”

艾森豪威尔故意先让狄龙煞一下赫鲁晓夫的威风，他怕把事情弄僵，赶快出面打圆场，准备在第二天的记者招待会上再做较量。

第二天，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美国记者首先提出最令赫鲁晓夫挠头的问题：“在斯大林犯下种种罪行时，你在什么地方、干什么事情？”

赫鲁晓夫当然知道这是指责他，把“斯大林是慈爱的父亲”的口号喊得最响。这使他感到难堪，他涨红脸说这是无礼之举，拒绝回答。

美国记者又提出棘手的问题：“赫鲁晓夫先生，你曾这样说，‘我们将埋葬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赫鲁晓夫眯缝着眼稍加思索，迅即解释说：“这是指共产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要展开自由竞赛，而不是指屠杀。”

赫鲁晓夫不想再让美国记者将他的“军”，匆忙借故逃脱。艾森豪威尔见他 and 尼克松、赫脱制定的制服赫鲁晓夫这头不易驯服的北极熊的第一部曲——打掉赫鲁晓夫锐气的计策大功告成，就开始实施第二部方案——请苏联

客人在美国各地访问 10 天，用美国的物质文明从精神上俘虏赫鲁晓夫。

为此，艾森豪威尔把他的那架技术先进的波音—707 专机提供给苏联客人使用，还派善于交际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亨利·洛奇专门陪同赫鲁晓夫访问。

赫鲁晓夫把大肚子一挺向洛奇摆“谱”说：“洛奇先生，你是一名前军人，因此，你应该懂得军阶的规则。你是少将，而我是中将，因此，你是我的下级，我希望你的举止要与你下级军官的身份相称。”

“是，先生，我懂了，将军”，洛奇笑着双脚咯噔一下，举手敬礼说：“洛奇少将向您报告，将军先生！”

在美国各地访问期间，赫鲁晓夫简直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

在纽约，他和哈里曼邀集的美国大资本家打得火热，美国人带他参观帝国大厦，登上举世闻名的摩天大楼，以提供援助吊赫鲁晓夫的胃口。赫鲁晓夫垂涎欲滴，羡慕地感叹“建立苏美经济联系的条件尚未成熟，我的指望是为时过早的”，纽约给他留下的“强烈印象是一个庞大、喧闹的城市，到处都是霓虹灯广告和汽车在洛杉矶，赫鲁晓夫游览市区，觉得该市湿润温暖，到处百花盛开，与冰天雪地的莫斯科迥然不同；他参观好莱坞电影制片厂大开眼界，与跳康康舞的美国姑娘合影留念，好莱坞为他举行的宴会使他念念不忘：“餐厅里挤满了四五百人，围坐在装饰得非常华丽的桌子边，桌上的灯光柔和，好似烛光一样。这一餐味美可口，菜肴丰盛。这些人是不喝酸菜汤的。”

在旧金山、衣阿华州、匹兹堡等地，赫鲁晓夫参观机械工厂、牧奶场、小公牛饲养场和粮仓，到处与美国资本家拉关系，天天吃得满嘴流油，对美国赞不绝口：

“这一餐菜肴花样繁多，味美上口，营养丰富。美国人真会吃！他们有美味的罐头食品，更不用说还有各种各样新鲜的盆菜。我记得加斯特一家还给我们上了一道火鸡。火鸡在美国非常受重视，美国人甚至有一个特定的‘火鸡节’，到那天，人人都一定得吃烤火鸡！”

赫鲁晓夫带着惊奇的心情回到华盛顿。艾森豪威尔听了洛奇的汇报，知道赫鲁晓夫已对美国物质文明佩服得五体投地，决定继续以美国文明来引诱他的苏联“猎物”。

艾森豪威尔亲自陪赫鲁晓夫乘直升飞机纵览华盛顿。赫鲁晓夫对艾森豪威尔的直升飞机赞不绝口。

艾森豪威尔暗中冷笑，这头“北极熊”已经做了美国物质文明的俘虏，我还要让你拜倒在美国文化面前，于是又从另一方向发动进攻：“先生，您是否喜欢看电影？”

赫鲁晓夫早已久闻美国电影的大名，这次访美已大饱口福，何不再大饱一次“眼福”。于是他顺水推舟说：“只要是好电影，我当然喜欢看！”

美国总统又放钓饵道：“您比较喜欢看什么电影呢？”

不等苏联客人回答，艾森豪威尔和颜悦色地以极富诱惑力的语言说：“我个人喜欢看西部电影。我知道它们没有什么内容，也不需要动什么脑筋去欣赏，可是在这些电影里噱头总是不少，同时我喜欢马。”

赫鲁晓夫一贯爱打击他人抬高自己，此时又以攻击斯大林来讨好艾森豪威尔：

“你可知道，斯大林在世时，我们经常看西部电影。放映结束时，斯大

林总要指责那部电影的思想内容。不过，到了第二天，我们又照样去看另一部西部片，我也有看这种电影的嗜好。”

艾森豪威尔见赫鲁晓夫如此寡廉鲜耻，暗自欢喜，就继续诱敌深入：“那好，我们就看些西部的和另外一些影片，我还邀请了我们的海军军乐队来演奏，你不至于反对吧？”

赫鲁晓夫急不可待地一拍光头说：“啊，那将会是非常令人愉快的。我喜欢听音乐，我还想瞧瞧这些年轻的小伙子。”

于是，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为苏联客人放起一部部美国西部片。赫鲁晓夫看得津津有味，艾森豪威尔又讲起罗斯福讲过的这样一个故事以取笑“北极熊”：

“主人给长工一把铲子，叫他去挖一条水沟。过了一会儿，长工回来说他挖好了，于是主人给他一把斧子，叫他去砍些木柴。长工去了，砍了一捆木柴回来。然后主人叫他去拣一堆土豆，把它分成两堆：小土豆一堆，大土豆一堆。几个小时过去了，连长工的影子也没见。最后，主人找见他，发现他在仓库里早已晕过去了。主人朝他身上倒了一桶水，长工醒来，解释说，‘我不怕挖水沟，也不怕砍木柴，但我不能做这个分大土豆和小土豆的工作。我不能忍受要我来做出那些决定，决定，决定！给我一个不需要动脑筋的工作吧。’”

赫鲁晓夫听出艾森豪威尔在讽刺他，面有不悦之色，但因主人是在讲故事，他也不敢当面顶撞。

艾森豪威尔将赫鲁晓夫的尴尬神色看得清清楚楚，庆幸自己的计谋正步步取胜，又邀请赫鲁晓夫到他的农场参观。赫鲁晓夫见农场的牛饲养得非常好，便称赞这些深褐色的食用牛毛色有光泽，腿短体壮，艾森豪威尔就作为礼物赠送客人一头牛，赫鲁晓夫乐得眉开眼笑，以苏联白桦树回赠。

艾森豪威尔又把赫鲁晓夫引到田野里去，指给客人看他的地产范围，赫鲁晓夫对其农场面积之大感到惊奇，主人又指着田野里类似小麦但是略小一些的农作物说：

“这种作物我们是不收割的，我只是叫人于冬季来临前把它割去。这块田能吸引许多鸟类，当别的田地里的庄稼收割完后，松鸡、鹌鹑及其他猎鸟就都到这块田里来了。因此，我们在这里打猎可以得到极好收获。”

对于像赫鲁晓夫那样热衷于打猎的人来说，这简直不可想象，他觉得这比十月革命前沙俄时代的大地主有过之而无不及，比托尔斯泰笔下的捕猎还富有诱惑力。赫鲁晓夫看呆了，艾森豪威尔含笑拉他同上飞机回戴维营进行政治会谈，实施第三部制服赫鲁晓夫的方案，这正是：

赫氏走进美国城，眼花缭乱看不停。

惊叹首富华盛顿，几忘自己姓和名。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各怀鬼胎 美苏首脑会谈戴维营

唇枪舌剑 中苏首脑舌战颐年堂

话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连施挫其锐气及物质和文化引诱两计之后，1959年9月25日陪赫鲁晓夫从他的马里兰州农场，回到戴维营，进行美苏首脑正式会谈，使赫鲁晓夫访美达到高潮。

举世闻名的戴维营距美国首都华盛顿约100多公里，在马里兰州的一座海拔400多米的秀丽山上，原名卡托克廷山庄，1939年作为罗斯福总统的避暑山庄，取世外桃源之意，改为香格里拉，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后用他孙子的名字将别墅改为戴维营。

艾森豪威尔竭力把戴维营会谈的气氛搞得轻松随便，首先故作软弱之态，说自己已近70岁，年老体衰，再有16个月就要离职了，叹口气，以羡慕的口气说：

“我可以说不多了，而你的机会却要久远得多。如果赫鲁晓夫先生能够建设性地使用你的权力，你将可能作为一位伟大的国务活动家而留芳史册。”

这番话说得赫鲁晓夫神采飞扬，他竭力要给美国总统留下深刻印象，滔滔不绝他讲起苏联的军事和安全态势。他绘声绘色地讲苏联正在建造比美国潜艇威力更大的核潜艇，声称苏联拥有所需要的一切炸弹，并将很快拥有它所需要的全部导弹。

赫鲁晓夫因为前不久在苏联举办美国展览会期间与尼克松进行过“厨房辩论”，又让人假扮苏联“公民”给尼克松出过难题，便认为尼克松反对他访问美国，因而在与艾森豪威尔的会谈中，见有尼克松在场，就想把矛头对准他。

怎样“教训”尼克松呢？碍于外交礼节，赫鲁晓夫不便直接攻击，就灵机一动，采取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的计谋，若无其事地对艾森豪威尔说：

“美国政府中，有许多人非常希望改善同苏联的关系，但是也有一些人总是想坚持对抗立场，这些人是拙劣和愚蠢之极的。”

赫鲁晓夫眉飞色舞大讲此话，但一双小眼却紧盯着坐在一旁的尼克松不放，苏美两国参加会谈的人员都明白赫鲁晓夫的意图所在。尼克松也心知肚明，但因为赫鲁晓夫没有明确指谁，他也不便把“臭帽子”拾过来往自己头上戴，尽管尼克松十分气恼，但也无可奈何。

艾森豪威尔老奸巨滑，他不像赫鲁晓夫那样锋芒毕露，虽急于与苏联达成一项裁军协议，但他外表上却显得不急不忙。他说：

“赫鲁晓夫先生，我是一个军人，而且我一生都是一个士兵。我曾打过不止一次的仗，但我不怕难为情地告诉你，现在我非常怕战争，我愿竭尽全力使我们避免战争。首要的是，我希望和你达成一项协议。”

赫鲁晓夫用那双胖手摸着扁平的鼻子说：“总统先生，如果我们能达成协议的话，那么没有一个人会比我更感到高兴的了，但问题是怎样达成协议呢？”

赫鲁晓夫抢先提出条件：从其他国家撤走外国军队，撤除在外国领土上的军事基地。

艾森豪威尔暗笑赫鲁晓夫不知深浅，竟然提出要美国放弃在西欧的既得利益问题，便以盟国反对而予以拒绝，又针锋相对提出美苏不再继续试验核

武器，并为此建立国际监督。

赫鲁晓夫脑门上急出了汗珠，赶快掏出白手绢擦去，暗想你们美国人的算盘打得太精，因为美国当时在核武器数量、运载工具、远程轰炸机、远距离探测仪方面都超过苏联，艾森豪威尔企图把双方的核武器差距冻结起来，使苏联永远无法成为美国的平等伙伴，苏联当然不会接受。

但是使赫鲁晓夫着急的是这些理由都讲不出口。他锐利的小眼睛连眨几下，便想出个极为轻松的拒绝之词：

“总统阁下，按照外交平等的原则，总统拒绝了我的一个建议，我也得拒绝你一个建议，我们才能平等。”

艾森豪威尔以他多年的“谨慎、理智作风”，转变话题说：“赫鲁晓夫先生，请告诉我，你们是怎样决定军事开支经费的？”

赫鲁晓夫顿时紧张起来，暗想这是高级军事秘密，告诉你，我岂不成了叛徒？

艾森豪威尔见状，明白苏联人紧张的理由，就装作大方的样子说：“或许，我应该把美国的情况告诉你。”

赫鲁晓夫自然求之不得，一晃斯达汉诺夫式的肩膀说：“好啊，先讲一下你们的情况吧。”

艾森豪威尔故作神秘之态道：“事情是这样的：我的军事将领们来见我时总是说：‘总统先生，我们的某项计划需要多少多少钱，如果我们不能得到所需要的经费，我们就会要落在苏联的后面了’，我就只好照办。他们就是这样向我逼钱的，他们还不断地想多要一些，而我也总是如数拨给他们。现在你告诉我，你们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赫鲁晓夫暗骂艾森豪威尔果然奸诈狡猾，这一套我也会，便编造生动故事，津津有味地讲了起来：

“情况完全一样。我们军事部门的一些人常来说：‘赫鲁晓夫同志，瞧，美国人正在发展某某军事系统，我们也同样能发展，可是需要多少多少钱’。我告诉他们说现在没有钱，钱都已经分配完了。他们说：‘如果我们得不到所需要的钱，万一发生战争，那么

敌人将会占上风’，于是我们就继续讨论下去；我琢磨着他们提出的要求，未了，我得出的结论是军队说需要多少经费，我们都应该支持，于是，我将这个问题提交给政府，结果我们便采纳了军人们所提出的意见。”

艾森豪威尔窃笑赫鲁晓夫鹦鹉学舌，但却逢场作戏：“对，我想就是这样。我们确实应该达成一项协议，以便结束这种毫无结果和实实在在是浪费的竞争。”

赫鲁晓夫也以假对假：“这是我们梦寐以求的。为了同你们在限制军备竞赛方面达成一项协议，我们已经竭尽了一切力量。我到美国来的部分原因就是想要了解一下，我们的会晤和会谈是否有可能达成某种谅解，但问题是如何达成？在什么基础上达成？”

两人在这里又顶上了牛，便把话题转到问题最严重的柏林危机上。艾森豪威尔声称美国不反对在适当的条件下召开苏联建议的美英法苏四大国首脑会议，但如果苏联不收回关于柏林问题的最后通牒，他就永远不参加这种会议。

赫鲁晓夫欺软怕硬，解释说西柏林问题已成为一个不受欢迎的刺激物，非得早日解决不可。对此，艾森豪威尔硬着头皮顶着不后退。

美苏首脑政治会谈即将结束，但双方仍处于僵持状态，甚至连公报写些什么也无从下手。艾、赫两人都心烦意乱，年迈体衰的艾森豪威尔泄气了，看起来就像被人从河里捞上来一般，浑身湿淋淋的；体格强壮的赫鲁晓夫觉得午餐不像婚礼宴会而像是葬礼，或像在一个重病患者的床边吃饭。

这时，一心想同美国搞缓和的赫鲁晓夫态度软了下来，他撇开苏联代表团，只带译员去见艾森豪威尔说：“我决定采取公开步骤，取消我将在一定期限内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缔结和约的建议。”

艾森豪威尔得意地笑了，庆幸他终于以强硬的姿态，迫使赫鲁晓夫在柏林问题上再次做出重大让步。

赫鲁晓夫在美国的戏剧般游历即将结束，他举行记者招待会炫耀他的访美成果说：“我已增加了对世界和平的希望，我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都发现我们关于柏林问题的看法有许多共同之处，召开另一次最高级会谈的时机业已到来。”

艾森豪威尔也在记者招待会上，以胜利者姿态向世界宣告：

“美苏关系的某些方面正在解冻，戴维营会晤消除了我在此前关于召开另一次大国最高级会谈的许多障碍。”

1959年9月27日，美苏同时发表了关于赫鲁晓夫访美的联合公报，举世瞩目的公报宣称：

“双方一致认为，全面裁军问题是世界目前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两国政府将尽一切努力来使这个问题得到建设性的解决。两国首脑认为，一切没有解决的国际问题都不应当通过运用武力的办法来解决，而应当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艾森豪威尔总统将于第二年春天访问苏联。”

赫鲁晓夫自诩为“从美国凯旋归来的和平战士”，并且在莫斯科机场一下飞机就迫不及待地在黑暗中向欢迎他的人们纵情用英文高呼：“OK！”

在赫鲁晓夫事先安排下，约有10万苏联人夹道欢迎他这个搞美苏缓和的“有功之臣”，赫鲁晓夫接着驱车前往列宁体育馆，向聚集在那里的莫斯科市民倾泻心中的无限喜悦之情：

“亲爱的同志们，我们刚从华盛顿直抵莫斯科的飞机上下来！我站在这个讲台上向莫斯科人、我国所有的人民、政府和党报告，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估价当前的国际形势中，表现出聪明的政治家的才能，他显示出了勇气和顽强精神！”

赫鲁晓夫的这几句话一下子把人们讲愣了，苏联的头号公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怎么一下变成了伟大人物，再抬头看一看赫

鲁晓夫那副立下汗马功劳的神态，人们才突然醒悟过来，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赫鲁晓夫此时显得神采飞扬，滔滔不绝他讲起他在美国各地的见闻，然后特别卖力地吹捧艾森豪威尔说：

“当然，我们同美国总统不可能一下子就清除掉多年积累起来的整个冷战的碎砖破瓦……但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们，亲爱的同志们，我得到这样的印象：美国总统是真诚地希望消除冷战和改善我们两国关系的。美国总统很客气地邀请我去他的农场，带我参观了他的玉米田。当然，我不会错过看看美国总统的玉米的机会！”

莫斯科人被赫鲁晓夫风趣的话逗得笑了起来，赫鲁晓夫洋洋自得地炫耀说：

“我同美国总统的孙子们交上了朋友，我问他们是否愿意来苏联，他们异口同声说，很想去苏联看看莫斯科……我认为他最好在5月底或6月初来这里。我不怀疑，美国总统将为我们两国之间达成协议而尽他所有的努力……我们坚信，卓越的政治家风度和人类的天才终将获胜！正如普希金说过的，‘呼吁理智！打倒阴暗’！”

赫鲁晓夫越说越激动，突然走到出席欢迎大会的美国驻苏大使馆官员爱德华·弗里尔斯面前，抓起他的手，猛地高高举起狂呼：“美苏友谊万岁！”“全世界人民友谊万岁！”“戴维营精神万岁！”

赫鲁晓夫像个超级魔术师一般，刹那间把近两万人弄得为“戴维营精神万岁”狂呼不已。

这声音通过电波传遍苏联，传到华盛顿和北京。艾森豪威尔、毛泽东听了都啼笑皆非，因而对中美苏关系产生了复杂的影响，有人写诗讥笑道：

赫鲁晓夫愚又顽，戴维精神一头愿。

缓和不成笑四海，遭受斥责臭万年。

艾森豪威尔看赫鲁晓夫这样卖力地吹捧“戴维营精神”，几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把副总统尼克松、国务卿赫脱请来，商量对付赫鲁晓夫的下一步方策，尼克松摸着尖下巴摇摇头说：

“从我和赫鲁晓夫的厨房辩论的交锋看，此公对美国物质文明奉若神明，顶礼膜拜，他是乌克兰矿工之子，是真诚地想与美国搞缓和的！这对美国来说，可谓千载难逢的良机，可不能辜负了赫鲁晓夫的一番感情，不然的话，他说不定会怎么难过呢！”

赫脱、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大笑不止，都觉得赫鲁晓夫愚不可及，但对美国来说又“天真可爱”，艾森豪威尔突然拍着光秃的前额若有所思说：

“我想起来了，赫鲁晓夫单独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他是欢乐的，急于表示友好的，肯通融的，但在葛罗米柯外长和缅希科夫（苏驻美大使）陪同下出现的时候，赫鲁晓夫则判若两人，变得比较缄默和拘谨，我曾对此百思不得其解，你们看是什么原因？”

国务卿赫脱分析说：“这也难怪，美苏对立了那么多年，现在赫鲁晓夫想搞美苏缓和和青史留名，弯子转得当然有些太急，他不能不顾忌手下人是否能转过弯来……”

艾森豪威尔点点头，指示国务卿赫脱说：“你敦促驻苏大使汤姆森，多以非正式方式拜会赫鲁晓夫，像他那样健谈的人，肯定会在这样的交谈中泄露有用的情报。”

赫鲁晓夫为推行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路线，为取悦艾森豪威尔，不惜连续恶化中苏关系，如撕毁中苏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技术资料；在中印边境冲突中公然偏袒印度扩张主义者；这次与艾森豪威尔进行戴维营会谈，居然收回限西方国家在6个月内就柏林问题达成协议的最后通牒，换取美国同意召开四大国首脑会议和艾森豪威尔访苏，近来更起劲地宣传戴维营精神。

在此情况下，毛泽东对中苏关系忧心忡忡，决心找个机会好好与赫鲁晓夫谈一谈，劝他别尽干傻事。

正在这时，赫鲁晓夫不请自到。

本来，苏联已决定派苏斯洛夫率领苏联党政代表团来华参加中国国庆十周年庆祝活动，可赫鲁晓夫回到苏联喊了一通“戴维营精神万岁”之后，立

即跑到中国来贩卖他的新货色，企图使毛泽东也跟着他搞美苏缓和。

有人曾劝过赫鲁晓夫此时不要访华，但他一拍便便大腹说：

“照礼节，现在该轮到毛泽东到莫斯科来做国事访问了，然后我们才能到北京去，但是根据目前情况，我们最好还是到北京去谈。这次应该是作私人会晤，以便能找出我们同中国同志的分歧究竟有多大。”

1959年9月30日赫鲁晓夫赶到北京，神采奕奕地走下图—114座机，满面堆笑向欢迎他的毛泽东走去。

毛泽东见赫鲁晓夫满面春风大步走近，才缓缓握住赫鲁晓夫伸过来的胖手，但当体态肥胖的克里姆林宫首脑主动凑上来要与他进行同志式的拥抱时，毛泽东却没有那份热情，冷冷地躲开了，赫鲁晓夫一愣，也只好做罢。

毛泽东不想致什么欢迎词，赫鲁晓夫则主动发表早已准备好了的讲话，吹嘘他的美国之行有助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

毛泽东面无表情，冷冷站在一旁，一言不发，然后陪客人驱车前往人民大会堂参加庆祝中国国庆十周年宴会。

赫鲁晓夫以“戴维营精神”为资本，板着面孔教训中国领导人说：“美国强大得很哪，你们千万不要用武力去试验资本主义的稳固性！”

毛泽东对赫鲁晓夫不分场合讲那些无原则的话很不满意，将大手一挥，告诉他国宴上不是讲这种话的地方，赫鲁晓夫只得住口，找机会再说。

国宴结束后，中苏双方领导人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会谈。

赫鲁晓夫一下打开了话匣子，滔滔不绝他讲起他的美国之行，大吹“三无世界”，张口闭口“戴维营精神”，并说：“这次我到美国去算是亲眼看见了，他们是真富，确实是富得很呐！”

毛泽东冷笑一声，以讽刺口吻批驳说：“你去美国看一看，我们还是赞成的，我们不反对！问题是你们有些观点，什么三无世界呀，戴维营精神呀，这怎么可能呢？事实也不是这样！”

赫鲁晓夫在毛泽东面前碰了软钉子，圆脸上笑容顿失，颧骨显得更高，越显得强壮而又笨拙，但不一会儿笑容又刹时间布满全脸，大言不惭地吹捧艾森豪威尔是“美国人民绝对信任的人”，“他真诚希望和平”，“也和我们一样在为保障和平而操心”，还特别强调说：

“在我同艾森豪威尔交谈的时候，我得到这样的印象：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越来越以现实主义态度考虑现实，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重新建立国际关系。”

毛泽东真想骂赫鲁晓夫一派胡言，但碍于赫鲁晓夫是来中国参加国庆节庆祝活动的重要外宾，才把到口的话又缩了回去，轻轻抽口香烟再缓缓吐出：“你只带回这些东西？”

赫鲁晓夫面带惭愧之色，小声辩解道：“当然，它们是帝国主义，是靠侵略和掠夺……”

赫鲁晓夫眼珠一转又提起无线电台问题：“毛泽东同志，我们打算出钱给你们建立一座电台。这个电台属于谁，对我们无关紧要，我们不过是用它同我们的潜水艇保持无线电联络。我们甚至愿意把这个电台送给你们，但是希望这个电台能尽快地建立起来。苏联的舰队现正在太平洋活动，我们的主要基地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毛泽东同志，我们能不能达成某种协议，让我们的潜水艇在你的国家有个基地，以便加油、修理、短期停泊等等？”

毛泽东暗想赫鲁晓夫脸皮真厚，去年我在建立长波电台、联合舰队等问

题上曾严词拒绝，明确指出要讲政治条件，半个手指也不行，这家伙还不死心，又提出了这个问题，就将面孔一板拒绝说：

“我再说一遍，不行！我不再想听到这件事！”

赫鲁晓夫又摆老话发牢骚说：“毛泽东同志，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在互相合作和供应方面没有什么麻烦，可是我们这里——竟连这样简单的一件事情都不能达成协议！”

毛泽东仍断然维护中国主权：“不能！”

赫鲁晓夫仍不甘心，故作让步之态：“假如你愿意，中国的潜艇可以使用库尔曼斯克基地。”

毛泽东不为小利而乱大谋，毫不犹豫拒绝道：“不要！中国不想在库尔曼斯克干什么，也不希望你们在我们这里干什么。英国人和别的外国人已经在我们的国土上呆了很多年，我们再也不想让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来达到他们的目的！”

赫鲁晓夫在这里被顶回，又从释放美国侵华特务方面为艾森豪威尔效劳：“我想起一件事，希望你们考虑释放唐奈与费克吐两个美国飞行员。”

毛泽东讨厌赫鲁晓夫为艾森豪威尔做说客，一点儿也不给赫鲁晓夫面子：“不行，这个事儿不能商量！”

为讨好艾森豪威尔，赫鲁晓夫把目光转向陈毅，请陈毅向毛泽东说情，把这个大人情送给他，但陈毅的回答很干脆：

“这两个人侵入中国领空是执行间谍侦察飞行任务的，要判刑，其他5个人不是早就放了吗？”

赫鲁晓夫觉得面子丢尽，好生懊恼，就想找个话题把毛泽东收拾一顿，但讲什么话题呢？赫鲁晓夫急得额头掉下黄豆大的汗珠，突然灵机一动：中国在炮击金门问题上向美国“服软让步”，对，这是毛泽东的一个不大不小的“辫子”，就气壮如牛发动反扑：

“毛泽东同志，你们为什么在台湾海峡危机中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候，突然停下来呢？你们的整个仗不等于白打了吗？”

毛泽东暗笑赫鲁晓夫不懂复杂的政治、军事战略战术，颇有主意地回答：“我们心中有数。”

赫鲁晓夫认为这是毛泽东“理屈词穷”，就眯着小眼幸灾乐祸紧追不舍说：

“什么叫‘心中有数’？你们发动这次战斗的本来目的是拿下这些岛屿，可是你们在就要达到目的的时候停了下来。这能证明什么呢？你现在是不是想对我说，你们从来就没有打算完成你们的作战计划？”

毛泽东知道苏联人不理解中国在炮击金门问题上的灵活战术，就耐心地解释说：

“我们只是想显示一下我们的潜力。我们不希望蒋介石离我们太远了，我们想让他呆在我们够得着的地方。让他们呆在金门、马祖，我们就能以空军和岸上大炮来打他。如果我们占领了这些岛屿，我们就会失去想叫他什么时候不舒服，就什么时候不舒服的能力。”

赫鲁晓夫认为这是“奇怪的解释，典型的毛泽东式诡辩”，他不服气地想：这是一柄双刃剑：你毛泽东把蒋介石放在金门、马祖，打着是方便，但蒋介石打你不也同样方便吗？赫鲁晓夫明白自己不是毛泽东的辩论对手，就眉头一皱，突出奇兵：“毛泽东同志，我给你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毛泽东不相信赫鲁晓夫会带来什么好消息,只敷衍性地问:“嗯,是吗?”

赫鲁晓夫煞有其事:“我找到了一个解决台湾问题的办法。”

毛泽东倒真想看看这个“北极熊”能玩出什么新花样儿:“那赫鲁晓夫同志有何见教呢?”

赫鲁晓夫倒一本正经:“在某些方面,对待台湾应当像当年列宁对待远东共和国那样。”

毛泽东哭笑不得,理直气壮驳斥道:“远东共和国是列宁建立的,而且当时就控制在苏联共产党手中。赫鲁晓夫同志是否认为,台湾今天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控制之下呢?”

赫鲁晓夫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费尽脑汁派出的“奇兵”,被毛泽东轻轻一击就土崩瓦解了,他恼羞成怒指责说:

“你们炮击金门没有和我们打招呼,这符合兄弟国家相处的准则吗?”

陈毅是外交部长,此事归他所管,脾气又耿直火爆,立即驳斥说:“我通知你们了,你问葛罗米柯,我是不是通知你们了?”

作为经办人的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极其为难:否认要被陈毅揭露,承认又会受赫鲁晓夫训斥,进退维谷,支吾其词。

陈毅见葛罗米柯实际上默认,就义正辞严正告赫鲁晓夫:“炮击金门,这是我们内部的事情,那是中国的领土。我们炮击金门,你难道还要替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指责我们吗?”

赫鲁晓夫又把话题拉到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为尼赫鲁辩护说:“尼赫鲁是主张中立和反帝的,社会主义国家应当积极同他搞好团结,苏联不同意采取任何疏远或削弱尼赫鲁在国内地位的政策。”

陈毅不吃赫鲁晓夫那一套,气冲冲顶赫鲁晓夫说:“我们对民族主义者的政策是既团结又斗争,而不是采取迁就主义的态度!”

赫鲁晓夫对陈毅旁敲侧击批评他采取“迁就主义”火冒三丈,脸孔涨红叫了起来:“指责我们是迁就主义,这没有根据!”

陈毅不慌不忙给赫鲁晓夫摆证据称:“你们塔斯社5月9日的声明,就是证明。在中印边境问题上,你们采取了偏袒印度的立场!”

赫鲁晓夫用小胖手一抹扁平的鼻子,做出不值得的表情,冷笑着吹嘘起他在苏联和阿富汗的边界纠纷中如何大度让步,脸露清高大方之色说:

“我们是提醒你们注意团结尼赫鲁,你们为了那块不毛之地,跟尼赫鲁搞冲突,那里有什么?那是很不值得的!”

陈毅不满赫鲁晓夫的虚伪奸诈作风,激愤地揭穿他伪装中立、公允的假相称:

“今年8月份发生的郎久事件,是印度单方面越过有争议的麦克马洪实际控制线,向北面中国西藏境内推进,而和中国边防部队发生的一次冲突,但你们却由塔斯社发表公开声明,偏袒印度,指责中国!”

赫鲁晓夫见陈毅批驳得词顺理严,滴水不漏,心中腾腾冒火,头脑发热,开始走火跑调了:“西藏与印度毗邻,西藏本身不能对印度构成任何威胁,而中国却为西藏去同印度发生冲突!难道这是明智的吗?”

陈毅怒发冲冠,拍案而起,挥手直指赫鲁晓夫,厉声质问:“你讲这话是什么意思?你是不是让中国放弃西藏的领土主权?”

在陈毅严厉质问之下,赫鲁晓夫自知失言,但却不知悔改,反而恼羞成怒,倒打一耙:

“西藏问题你们不慎重，不该让达赖喇嘛跑走。你们，你们就不该让达赖喇嘛跑掉么！”

毛泽东被弄得啼笑皆非，苦笑道：“那么长的边境线，我们怎么能看得住他呢？”

赫鲁晓夫自以为抓住了把柄，盛气凌人大肆指责训斥说：“你们让他跑了，结果又闹了边境冲突，和中立的印度交了火，这是干什么嘛！”

赫鲁晓夫越说越带劲，转身对着含而不露的周恩来示威，周恩来严肃而又威严地批驳道：“赫鲁晓夫同志，你完全是文不对题。达赖叛逃，印度入侵，这明明是对中国的进犯，怎么能说放跑了他呢？”

“你是世界著名的大外交家”，赫鲁晓夫笑里藏刀，包藏祸心说，“怎么会不理解团结尼赫鲁的意义呢！”

周恩来以外交家风度缓缓而谈：“我们对尼赫鲁做了大量的团结工作，同他一起倡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他却利用达赖反华，挑起边界事件。面对外来的进犯，能团结嘛？”

陈毅忍不住胸中的怒火，指着赫鲁晓夫的扁平鼻子质问：“你们为什么在中印边境问题上偏袒印度，还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

赫鲁晓夫被陈毅的堂堂正气震慑住了，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最后冲着陈毅的那身元帅服胡搅蛮缠说：

“干什么？比军衔，你是元帅，我是中将，但在党内我是第一书记，是第一书记！”

陈毅不信邪，针锋相对驳斥道：“你是第一书记不错，但你对的，我们当然会听取；你不对的，我们当然不听！”

陈毅这一番痛快淋漓的驳斥，充分地表现了中国人的浩然正气，这有他的《青松》诗为证：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

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赫鲁晓夫自知理亏，又向毛泽东求助：“毛泽东同志，你派周恩来去处理波匈事件，他却在莫斯科无端教训我！”

周恩来暗想你找我挑衅是自寻其辱，不紧不慢驳斥说：

“我不是教训你，是讲应该很好地处理兄弟党的关系。你当时骂兄弟党的领导人，违反了兄弟国家、兄弟党平等共处的原则！”

“没有！”赫鲁晓夫像被揭了疮疤，挥动胖拳在沙发扶手上乱捶叫嚷：“我没有说！”

周恩来不慌不忙摆出证据，把赫鲁晓夫闹了个大红脸，忙向毛泽东挥手求救：

“你看，你看，你们全体政治局委员都在这里，你们几个人，我才几个人？这种谈判是不公正，不对等的！”

始终在一旁津津有味静听有趣辩论的毛泽东微微一笑说：

“我听了半天，你给我们扣了好些帽子：没有看住达赖呀，没有团结尼赫鲁呀，不该向金门打炮呀，大跃进也不对呀，又说我们要标榜马列主义的正统派等等。那么，我也送你一顶帽子，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赫鲁晓夫知道再辩论下去没有好下场，一拍屁股悻悻而去，晚上没有参加天安门广场的国庆节庆祝活动。10月1日头戴草帽，身穿乌克兰式衬衣，又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毛泽东实施突然袭击：

“关于生产原子弹的事，我们决定把专家撤回去！”

毛泽东认为这是迟早之事，冷冷回答：“我们可以自己试试，这对我们也是个锻炼，但我们说的话都要记住。我们需要是需要，撤回去也没有什么大关系。如果技术上能帮助一下更好，不能帮助就是你们考虑决定的事了！”毛泽东谈笑风生，好像什么事也未发生。

赫鲁晓夫拂袖扬长而去，更加紧破坏中苏关系，中美苏三国关系进入更加复杂多变的新阶段，这正是：

万里遥遥戴维营，一心缓和喜相逢。

岂知连中三环计，竹篮打水一场空。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买鬼推磨

“黑寡妇”整惨艾森豪威尔

将计就计

间谍案搅散四国首脑会

话说赫鲁晓夫第二次访华双方不欢而散，他于1959年10月4日离开北京，毛泽东虽到机场送行，但没有发表送别讲话，两人只握了一下手，谁脸上也没有笑容。

赫鲁晓夫在飞机上越想越生气，便决定在苏联濒临中国的重要港口海参崴停留，大做与美国、中国有关的文章。

在海参崴，赫鲁晓夫有意视察了金角湾海军基地的军事设施，出席了大规模群众聚会。他迈动粗短的双腿，跨着无节奏的步子走上讲台，大讲他访问美国的情况，描述怎样走红地毯、检阅仪仗队，细讲艾森豪威尔为他鸣21响礼炮时怎样注目礼等等，然后有意把话讲给毛泽东、艾森豪威尔听：

“当我在安德鲁斯机场高台上俯视下面迎接我的人们时，我充分地意识到他们不属于无产阶级，但也意识到，即使他们欢迎我访美，他们仍然是敌视苏联的。我知道与其说他们是尊重我，不如说他们是尊重自己的总统。然而，我知道，这一场面不仅是苏联代表团的伟大胜利，而且也是苏维埃政权、工人阶级、列宁、列宁的思想和教导以及苏联武装力量的伟大胜利。”

赫鲁晓夫讲话确实具有煽动性，他懂得如何博取苏联各阶层人民的拥护，他把他这次访美说成是苏联对美国的巨大胜利：

“即使像美国这样的国家——远在苏联国内战争时期就推行着反苏的反动政策，在远东对苏联进行武装干涉，并在苏联革命成功后的13年里蛮横地拒绝承认我们——最终也不得不邀请我们的代表去它的首都，并且隆重地迎接我们！”

赫鲁晓夫这番话讲出了苏联人民的心声，海参崴市民立即报以“一片欢呼声和暴风雨般的掌声”。赫鲁晓夫得意地笑了，他不由得想起在北京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人的批判，心情顿觉舒服了许多，为出他心中的恶气，赫鲁晓夫批驳毛泽东等人对他的批判说：

“有人会说，我们对美国的访问毫无结果。我的回答是既有结果，也没有结果。它确实带来了某些东西，虽然不是一开始就看得到的。可以说，我们是在开垦处女地；我们打碎了使美苏关系一直僵持的冰块。目前，剩下的工作就是要我们的外交家从我们的道路上搬除那些顽固的妨碍进一步改善关系的碎冰块。这一过程直到今天还在进行着。”

赫鲁晓夫一想到毛泽东、周恩来、陈毅同他在北京的激烈争论，他气就不打一处来，就气鼓鼓反驳被他歪曲加工过的毛泽东等人的论点称：

“然而，还有人坚持着问：‘难道你不认为一开始就接受艾森豪威尔的邀请是错误的吗？’我向他们说：‘不，如果不接受邀请，那将是不合情理的’。我们去访问，使美国人能更多地了解苏联的情况。对于那些愿意睁开眼睛的资产阶级新闻界中不抱偏见的代表们，我们也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他们看到，不管我们是否签订任何具体的协定，美苏两国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

赫鲁晓夫在这种没有毛泽东等人在场进行辩论的情况下，越说越精神抖擞：

“然而，仍有人争辩说，我这次美国旅行是一种表面装饰，我们在美国所经历的那种盛大的仪式尤其如此。可能是这样，但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中，

表面装饰有着重要的意义。这意味着美国人承认了他们过去想贬低我们、羞辱我们乃至消灭我们等等企图的失败。即使我们没有当场取得具体的收获，但是我与艾森豪威尔的会谈是道义上的巨大胜利。我仍记得当我的译员第一次告诉我，艾森豪威尔用英语称呼我为‘我的朋友’时，我是多么高兴啊！”

赫鲁晓夫觉得他已把中国领导人的论点批得体无完肤了，越发得意洋洋，更痛快淋漓地“乘胜追击”说：

“有人说：‘得了，那些话都是口头上讲讲的’，当然是口头上事情！你想要什么呢？你是否认为持有完全相反观点的两国代表一聚会、一握手，两种制度间存在着的矛盾一下子便会消失呢？那是什么样的白日梦呓啊！最重要的是，经过长时期意识形态的斗争，美国人主动地邀请我们到他们的国家去。他们休想——他们当然未曾得逞——迫使我们用基本原则和自己的尊严去作妥协。相反，我们通过访问和会谈加强了我们在世界上坚如磐石般的地位，并使我们将来为捍卫自己的地位打下了基础。”

最后，赫鲁晓夫为讨好艾森豪威尔，又卖力地高呼：“戴维营精神万岁！”

赫鲁晓夫的呼声传到华盛顿，艾森豪威尔被问到对这一口号的看法，他苦笑着说：“我根本没有使用过这个名词！”

艾森豪威尔暗笑赫鲁晓夫愚不可及，便命令“黑寡妇”继续出动，刺探赫鲁晓夫的核心军事机密。

你道“黑寡妇”是个风流女谍吧？非也，它是美国U—2高级间谍飞机的“绰号”，而U—2飞机事件则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美苏政治、军事对抗中的突出事件之一。

原来，当时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首领的苏联，仍然是美国争霸世界的头号对手，而苏联保密工作搞得较好，对美国情报机构来说，如丘吉尔所说，苏联一直是“一个神秘莫测的谜中之谜”。尤其是美国为推行“大规模报复战略”，需要确定核袭击的打击目标，就要掌握苏联尖端军事科学的核心准确情报。

为此，美国情报机构派出许多间谍，虽也报回不少宝贵情报，但远远不能满足艾森豪威尔和美国当局的需要，于是便需要使出某种绝招儿才行。

使用什么绝招儿呢？美国情报机构头目冥思苦想，终于想出派遣一种间谍飞机，秘密窜入苏联领空非法进行摄影侦察。这种飞机要飞得极高极远，使苏联的地面武器和飞机都无法击中，它必须具有强大的续航力，能够飞越辽阔的苏联领空。

美国情报机构拨出巨额资金，让美国洛克希德公司试制，该，公司不敢怠慢，很快在1955年8月试制成功一种新型高空侦察机，取名U—2（效用机二型），交给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

艾伦·杜勒斯一看就拍手叫好：此机形状特殊，颇似滑翔机，翼展24米，几乎比机身长一倍，全机呈银灰色，机身不涂任何识别标志。它为喷气推进，可装载用于飞行10多个小时的燃料，飞行高度可达2.3万米，比当时最先进的飞机的飞行高度都高出一倍多，苏联的高射炮和米格飞机都无法将其击落。U—2飞机基地设在靠近中国和苏联的日本、土耳其、联邦德国等地。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满意地点点头，俄顷，又询问U—2飞机的缺点。艾伦·杜勒斯说其弱点是构件简易脆弱，机上只能乘一名飞行员，但比起其优越性来，这两个弱点是微不足道的，没有任何危险性。

艾森豪威尔大喜，批准从1956年投入使用。在以后的4年里，U—2飞

机在苏联、中国上空畅行无阻，拍摄了苏联军事基地、工业设施、铁路和公路运输的大量照片，有效地掌握了苏联发展导弹和进行核试验的情报，五角大楼据此编制了实施“大规模报复”战略的核袭击目标清单。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频频受到艾森豪威尔的赞扬，他得意他说：

“U—2飞机收集的情报，比起任何地面派遣的特工人员来，要更快、更正确、更可靠。从某种意义上讲，其高明手段只有直接从苏联机关和实验室取得技术文件可以比拟！”

艾森豪威尔把U—2飞机视如掌上明珠，下令采取最严格的保密措施，因而U—2飞机被宣传为用于气象研究的飞机。美国飞行员则根据U—2飞机担负的特殊任务，给它起了个古怪的名字——“黑寡妇”。

苏联通过雷达系统已经发现了“黑寡妇”的动向，在苏联空军机关报《苏联航空》上刊载的文章中将其称为“黑衣女谍”，苏联几次向美国提出抗议，但美国都矢口否认，苏联飞机和高射炮部队对其无能为力，赫鲁晓夫下令苏军采取有力措施，终于在1960年5月1日前夕找到了用导弹击毁U—2飞机的有力措施，便积极准备，务求将其击落。

“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受雇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空军中尉飞行员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被选中再次执行U—2飞机的侦察任务。

鲍尔斯驾驶着360号U—2飞机，由土耳其阿达纳的因契利克空军基地飞往巴基斯坦的白沙瓦基地待命，计划从白沙瓦飞越阿富汗的兴都库什山脉，由苏联塔吉克的杜尚别附近进入苏联领空，经咸海、乌拉尔山脉东麓的车里雅宾斯克、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等地上空，再转向基洛夫、阿尔汉格尔斯克、摩尔曼斯克，进入巴伦支海，最后在挪威的博多降落，9小时飞行3800英里，其中2900英里在苏联领空内。

经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亲自批准，鲍尔斯于巴基斯坦时间1960年5月1日晨6时26分起飞，一进入苏联领空，就被严阵以待的苏联防空部队发现，报告了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马利诺夫斯基当即向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报告：

“一架美国U—2侦察飞机越过阿富汗边境，进入苏联领空，正向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飞行。”

赫鲁晓夫精神为之一振，要马利诺夫斯基用一切可能的方法把U—2飞机打下来。马利诺夫斯基回答说：“我已下达了命令，如果我们的防空部队能够睁大眼睛而不打瞌睡的话，我肯定能把它打下来！”

鲍尔斯进入苏联领空后碰到一片阴霾，他穿过层层云雾，到达咸海上空，看见遥远的下方有一架单引擎喷气式飞机正对其进行监视，他冷笑一声在其上面远远飞过，然后对苏联的丘拉坦人造卫星和宇宙飞船发射场开机拍照，又向前飞过乌拉尔山，把发现的机场、油库、基地一一标在地图上，其后飞向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又进行一番紧张的拍照。

鲍尔斯继续往前飞，在飞往基洛夫途中，突然听到一声闷雷似的巨响，原来是被苏联导弹击中，U—2飞机猛然向前撞去，发现一阵极亮的桔红色闪光射向驾驶舱，照亮了天空，U—2飞机机头迟缓地开始下垂，失去控制。

鲍尔斯大叫不好，求生的本能驱使他从旋转下坠的机体中挣扎而出，弃机跳伞，与飞机碎片、残骸一起落向地面。他降落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郊区的农田上，被当地国营农场的职工捉住，送交给苏联当局。

这时，莫斯科红场上正进行规模宏大的“五一节”军事检阅，恰逢天气晴朗，广场上空阳光灿烂，庆祝活动喜气洋洋，苏联军民一片欢腾。

赫鲁晓夫正在列宁陵墓上的检阅台上检阅红军，忽见苏联防空部队总司令比留佐夫元帅只穿普通军服而未穿受阅时的礼服，兴冲冲走到赫鲁晓夫面前轻轻报告：

“美国U—2飞机已被击落，驾驶员已被捕，正在进行审讯！”

赫鲁晓夫大喜，忙问：“怎么打下来的？”

比留佐夫小声报告：“防空部队把高射炮排列成棋盘形，使U—2飞机无法逃避我们的火力网。当敌机飞到一组炮火的射程之内时，我们发射了两颗导弹，第二颗导弹是为了以防万一的。U—2飞机当即被第一颗导弹击中！”

赫鲁晓夫听到这样令人兴奋的消息，悄悄地向比留佐夫祝贺并同其热情握手。接着，赫鲁晓夫召开苏联主要领导人会议，决定发表消息时对艾森豪威尔留下重要一手：不透露美国飞行员已被活捉而且是在苏联人手中，以便给艾森豪威尔和美国政府人士制造混乱。

艾伦·杜勒斯得到鲍尔斯和360号U—2飞机出事的报告，立即报告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美国总统大吃一惊，知道要捅大漏子，忙指示由国务院负责处理有关U—2飞机出事的全部新闻质询的答复工作。

岂知忙中必然出错，艾森豪威尔的上述指示精神还未贯彻下去，各方面就发表了相互矛盾的声明：

5月2日，美国驻土耳其阿达纳因契利克空军基地的新闻发布官发布一项新闻，宣称一架U—2非武装气象侦察飞机在土耳其凡湖地区上空失踪。

不一会儿，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却发表声明称，一架U—2飞机驾驶员因缺氧失去知觉，误入苏联领空。

美国各方面发布的消息相互矛盾，结果欲盖弥彰，纰漏百出，艾森豪威尔狼狈异常。

对此，赫鲁晓夫幸灾乐祸，欣喜异常。他5月5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讲话中，首次正式宣布有关击落U—2飞机的消息：5月1日，美国一架飞机蓄意挑衅，旨在破坏巴黎最高级会议，悍然侵入苏联领空，由他亲自下令，苏联火箭部队用导弹将入侵的飞机击落。

真如赫鲁晓夫所料，美国估计鲍尔斯已机毁身亡，就由国务院于5月6日煞有介事地发表声明，说美国“没有——决没有——有意侵犯苏联领空之事”，并说有人认为美国试图在U—2飞机飞行的真正目的上愚弄世界，这种说法是荒唐的。

美国一些参议员还倒打一耙，指责苏联居然在巴黎最高级会议前夕，击落没有武装的美国气象飞机，这是对最高级会议没有诚意的表现。

赫鲁晓夫决定在美国以为鲍尔斯已死、死无对证、可以任意对苏联造谣诬蔑并自鸣得意的时候，突然把事情真相公布于世，以取得戏剧性效果。5月7日，他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再次发表最为神气的讲话：

“同志们，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在我上次谈起这件事的时候，我故意没有提驾驶员还活着，身体很好，我们还拿到了飞机的部件。我们是故意这样做的。因为，如果我们一下子把事情都说了，美国人就会制出另一套说法。”

赫鲁晓夫尽管对美国尽情地嘲弄挖苦，却又给艾森豪威尔留有情面，有意给美国总统一个台阶下：“有可能艾森豪威尔总统并不知道这次的飞行。”

赫鲁晓夫在比留佐夫陪同下，到高尔基公园参观 U—2 飞机残骸时，他发表的谈话也只追究艾伦·杜勒斯和美国军方人士的责任，他在苏联内部这样解释原因说：

“我在谈话中尽量采用美国报刊上的提法，也就是说，杜勒斯和美国的军方人士应为 U—2 飞机事件负责，我完全不提总统。因为把责任推给美国情报机构中不负责任的人而不是总统身上，这样做是符合我们利益的。只要艾森豪威尔总统不牵连在内，我们就能继续奉行加强美苏之间关系的政策，这种关系是我访问美国并和艾森豪威尔会谈后开始的。”

U—2 飞机事件和美苏之间的激烈争斗轰动了整个世界，世界舆论为之大哗，纷纷谴责美国公然践踏国际法准则，肆意侵犯他国领空并进行非法侦察的霸道行径，连美国的西方盟友也嘲弄它掩饰的笨拙。

5 月 9 日，美国国务院为摆脱困境再次发表声明，承认 U—2 飞机可能在苏联领空做搜集情报的飞行，但为艾森豪威尔开脱责任，声称华盛顿当局“从未授权进行任何这类飞行”。

赫鲁晓夫眯着小眼频频点头，看来他与艾森豪威尔“心有灵犀一点通”，美国总统要按他的想法下台阶了，但赫鲁晓夫却没有想到，艾森豪威尔在权衡利弊之后，于 5 月 11 日在答记者问时，承认他事先知道而且批准了 U—2 飞机对苏联的情报活动。

艾森豪威尔出人意料地坚持说他“被迫”采取这种作法，因为苏联是一个“封闭的社会”，不允许任何记者或美国人留在他们的领土上，他蛮横地声称“有责任保卫美国的安全”。为此，除了采取这种侦察飞行收集情报之外，别无他法。他还以美国陆海空三军总司令的身份宣称：

“美国有权保证自己的安全，今后仍将继续进行这类飞行！”

赫鲁晓夫几乎气歪了鼻子！他认为艾森豪威尔辜负了他的一片好心，发表了一个很不明智，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愚蠢的声明，一下子把他好不容易到美国访问搞成的美苏缓和气氛搞砸了，他伤心地私下哀叹：

“U—2 事件是苏联同正在进行冷战的美帝国主义斗争中的一个转折点。一年前秋天我对美国的访问，似乎预示了美国对苏联的政策有可能转变，但现在，由于 U—2 飞机事件的发生，蜜月结束了。”这正是：

赫鲁晓夫好心伤，专程求爱蜜月尝。

刚闻缓和美滋味，却被艾克踢精光。

U—2 飞机事件给即将召开的美苏英法四国首脑会议布满了阴云。当时东西方关系较为紧张，世界舆论对此会议寄予很大希望，盼其能为世界和平做出一定贡献，但 U—2 飞机事件顿扫朗日晴空，一时乌云翻滚，恶浪滔天，四国首脑会议能否开成尚是未定之天。

戴高乐作为东道主与美苏英三国频繁交涉，他请赫鲁晓夫顾全大局出席巴黎首脑会议，赫鲁晓夫亦宣布他将赴巴黎与会，这才使美英法首脑舒了一口气，都认为赫鲁晓夫既然愿意出席会议，情况也许不致于太糟吧。

谁也没有料到，善变的赫鲁晓夫解释苏联仍参加此次最高峰会议之原因说：

“苏联原来希望在即将召开的巴黎四大国会议上达成一项协议，但 U—2 飞机事件使这个希望遭到了极大的挫折。可是，会议的日期已经决定，四大国的首脑都准备参加。全世界的公众舆论强烈支持我们按计划举行会议。我们既不愿为会议的失败承担责任，也不愿人们因对会议的失败感到失望而指

责我们。因此，苏联一方面继续谴责美国对苏联进行间谍活动，同时决定不采取主动去取消巴黎会议。”

赫鲁晓夫加紧督促制定苏联的与会方针，准备会议文件，他特别关心裁军问题，不无担心他说：“最近，出现了一大堆危险的易燃的问题，如果一个火星引起爆炸，就可能爆发一场可怕的战争。”

赫鲁晓夫抱着“救世主”的“重大责任感”，乘外形和技术性能都十分完美的伊尔—18飞机，于1960年5月14日离开莫斯科飞往巴黎。

在飞机上，赫鲁晓夫突然觉得艾森豪威尔搞的U—2飞机事件，像幽灵一样在他的脑瓜里作怪，认为艾森豪威尔好像有意给巴黎首脑会议放了一颗定时炸弹，以便在赫鲁晓夫同艾森豪威尔同坐到会议桌旁时爆炸！

赫鲁晓夫突然心血来潮，决定做出惊人之举，他在回忆录中这样生动形象地讲他是如何做出重大改变之举的：

“这些思潮在我的脑子里汹涌起伏。我越来越坚信，如果苏联若无其事地去参加会议，苏联的尊严将受到损害。我们的威信，尤其是在第三世界，将受到损失。毕竟我们是受害者。如果说谁有权提出U—2事件，那就是苏方。自然，有些国家会因这次会议的失败而谴责我们。随他们去吧！我们就是不能装得若无其事地去巴黎。”

赫鲁晓夫圆脸生辉，春风满面，把随他出席会议的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叫来，眉飞色舞说：

“我产生了一个想法，我们应当对准备在会议开始时提出的声明做根本性修改。我们要维护自己的声誉，就应当提出某种形式的抗议。我们对世界的公众舆论，特别是共产主义国家和正在为争取独立而斗争的国家的公众舆论负有义务。如果我们自己被打了一巴掌之后连个抗议表示都没有的话，那他们怎能指望我们会伸出手来帮助他们呢？因此，为了表明我们决心保卫我们的荣誉，必须修改我们在会议开始时的声明。”

赫鲁晓夫越说越激动，挥舞着一双胖拳，似对万千观众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

“我认为，唯一的办法是向美国提出一个最后通牒：他们必须为派遣间谍飞机进入苏联正式道歉，而且美国总统必须收回他所说的美国‘有权’在苏联领土上空进行侦察飞行的发言！”

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对此都表示赞成，不过葛罗米柯又有些为难他说：“这与原来文件相比，有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还应该经过党中央集体讨论呀，现在来不及了！”

赫鲁晓夫在这方面脑瓜特灵，拍掌而笑：“这有何难？你立刻拟个声明新稿，马上用电报发回莫斯科供政治局其他同志审查，再回电告诉他们的意见！”

葛罗米柯立即指示外交人员依计而行，很快得到莫斯科的同意回电。这样，赫鲁晓夫就在飞机上制造了一颗“定时炸弹”，随伊尔—18飞机呼啸而至巴黎。

赫鲁晓夫一到巴黎，就分别去拜访法国总统戴高乐、英国首相麦克米伦，振振有辞地宣读他的爆炸性声明。

戴高乐和麦克米伦一下惊呆了，都试图平息赫鲁晓夫的怒气。戴高乐以东道主身份劝说苏联客人说：“你先消消火气，但你要想想，如果坚持要艾森豪威尔做出道歉声明，四大国首脑会议将会失败。美国是一个大国，不可

能做出如你要求的那种声明。”

赫鲁晓夫说他当时的愤怒像电流一样，随时都可以放出强烈的火花，气冲冲回答说：

“苏联不是一个二等国家，按人口和领土计算，苏联比美国还大。我们更不能接受这种意见，认为像美国这样的大国可以不受惩罚地凌辱小国家，更不用说这样对待最大的国家——苏联了！”

戴高乐见说服不了赫鲁晓夫，便去见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颇带为难之色说：

“赫鲁晓夫来看过我。对于U—2飞机事件，他异常恼怒。赫鲁晓夫一点儿也不理解，总统阁下为什么要公开承认你知道这种飞行。按赫鲁晓夫的准则来看，这不是表明美国的真诚坦率，而是对苏联的蔑视无礼！”

艾森豪威尔显然非常挠头，苦笑着说：“老朋友，你说我该怎么办？”

戴高乐似早已有成竹在胸：“显然你不能道歉，但是你得拿定主意打算怎样处置这件事。我将尽力帮忙，但不能公开地有所偏袒。”

艾森豪威尔愁容满面他说：“美国显然由于U—2飞机被击落和鲍尔斯坦白而处境困难，但也决心不让赫鲁晓夫公开利用这件事来侮辱美国。我为了对美国负责，必须查明这件事对美国的威胁有多大，而我们面对的又是苏联这样一个关闭的社会，所以别无他法，只能使用像U—2飞机这样的绝招儿。况且苏联的卫星早已飞越过美国上空，苏联人还公布过卫星上的摄影机拍下的照片。”

艾森豪威尔烦恼地告诉老朋友：“总之，这件事很难办！”

戴高乐安慰美国总统道：“这类事情所有情报部门都干，只不过他们一般都很谨慎，不把这种事情端出来，亮到所有观众的眼前，也不把本国领导人卷进去。无论怎么说，情报方面的‘翻车事件’，不应破格提到政府首脑会议这一级来。”

艾森豪威尔感激地望老朋友一眼，眼珠一转刺探情报道：“老朋友，赫鲁晓夫对召开四大国首脑会议到底抱何态度？”

戴高乐只得以实相告：“在赫鲁晓夫从莫斯科动身来巴黎之前，我曾让我的驻莫斯科大使当面问赫鲁晓夫：‘在目前情况下，我们是否应当继续召开四大国首脑会议？’赫鲁晓夫说，‘应当继续召开’。”

艾森豪威尔点点头说：“到巴黎之后，他的态度又如何呢？”

戴高乐推心置腹道：“赫鲁晓夫到巴黎之后，我又当面向他提出这个问题，赫鲁晓夫又说应当继续召开。我向他暗示，不要真的指望美国总统会向你赔礼道歉，这一类的事情不能由政府领导人处理，赫鲁晓夫却坚决要求你赔礼道歉，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赫鲁晓夫仍旧愿意使四大国首脑会议如期召开，这是一个有希望的兆头！”

艾森豪威尔仍不放心地问：“你估计会议前途如何？”

戴高乐想了想说：“看一看再说吧。”

巴黎四国首脑会议于1960年5月16日在巴黎爱丽舍宫一间天花板很高的房间里如期举行。赫鲁晓夫和苏联代表团到得最早，英国代表团随后来到，赫鲁晓夫和麦克米伦握手致意。

正在这时，戴高乐陪同艾森豪威尔走进会议厅，赫鲁晓夫对

艾森豪威尔爱答不理，最后打个很随便的招呼，好像只是表示知道有美国人在场了。

不一会儿，法国总统戴高乐作为东道主宣布开会，站着的人都各自就座，戴高乐向各代表团团长致意，感谢他们莅临巴黎，希望本次会议取得丰硕的成果，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并说，全世界人民的眼睛都在看着我们。

戴高乐不想让赫鲁晓夫先发言，就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说除他之外，只有艾森豪威尔总统是国家元首担任代表团团长，所以就请他首先讲话。

赫鲁晓夫一听就大动肝火，怒气冲冲地站起来要求发言。戴高乐知道大事不好，但也只好允许苏联代表团团长首先发言。

此时，赫鲁晓夫不敢信口开河，他开始宣读苏联代表团的强硬声明，他提醒自己宣读的每一个字都必须确切，每一句话都应当严整无误。他滔滔不绝地往下念，当念到要求艾森豪威尔道歉并保证今后不再让美国侦察机飞越苏联领土时，艾森豪威尔轻声问国务卿赫脱说：

“是呀，为什么不呢？我们为什么不发表一个表示道歉的声明呢？”

赫脱皱着眉头，以不容置疑的态度悄悄告诉他的总统：“不行，绝对不行！”

戴高乐已对赫鲁晓夫的冗长声明听过一遍，此时露出无可奈何又强打精神的表情；英国首相麦克米伦惊慌不安，不知如何是好；美国代表团成员沃尔特斯不想听赫鲁晓夫的咆哮之声，暗暗数起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胸前的缓带，发现竟有54条之多，其中还有一枚美国功勋勋章，觉得真有点儿新鲜。

赫鲁晓夫越念越激动，双手都在颤抖，声音越来越刺耳，戴高乐作为会议主席不耐烦了，打断赫鲁晓夫的话，让苏联的翻译告诉他的团长说：“这间房子的音响效果极好，我们都能听见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话，他没有必要把嗓门提得这样高！”

苏联译员被这极不寻常的指责吓得脸色刷地一下变得极其苍白，转身面向赫鲁晓夫，战战兢兢正想翻译，戴高乐怕苏联译员不敢直接翻译，就打手势让法国译员告诉赫鲁晓夫，法国译员毫不迟疑地执行了戴高乐的命令。

赫鲁晓夫听了戴高乐的警告，更加懊恼，从眼镜框上面瞪了戴高乐一眼，不得不放低嗓门，但念不了几句，声调变本加厉，又发疯般叫嚷起来。当念到指责美国在苏联领空飞行时，赫鲁晓夫举起胖手指着天花板，仿佛此时真有一架U—2飞机在头顶上飞似的，离开稿子嘴中念念有辞：“有人从我头上飞过！”

戴高乐看不惯赫鲁晓夫的骄横神气，有意刺苏联人一下，就故意影射苏联卫星飞越法国上空说：“也有人从我头上飞过！”

赫鲁晓夫愚不可及，妄想趁机捞些油水，便问戴高乐：“是你那美国盟友吗？”

戴高乐伸开长手指着赫鲁晓夫，当场揭露说：“不是他们，是你。为了给我们一个下马威，你在就要从莫斯科动身的时候，发射了一颗卫星。昨天，那颗卫星没有得到我的允许，就18次飞越法国的上空。我怎么能知道，你那卫星上没有安摄影机，对我们国家拍照呢？”

戴高乐振振有辞说完，双臂交插在宽阔的胸前，用质问的眼光看着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被质问得张口结舌，面色苍白，不一会儿又计上心来，似滑稽演员一般，把一双胖手举过头顶，煞有介事表白道：

“老天爷在上，我的双手是干净的。你不会以为我会干那种事吧？”

戴高乐以退为进，暗藏杀机：“你那样自豪地给我们看过月球背面的照片，你那自豪也是有理由的，但是那些照片是怎么拍下来的呢？”

赫鲁晓夫不知是计，脱口吐露真言：“啊，我们在那个卫星上安了摄影机。”

戴高乐大嘴一撇讽刺说：“啊，原来你在那个卫星上安了摄影机，也拍照啊！”

戴高乐说到这里朝艾森豪威尔、麦克米伦会心地一笑，那意思是说：“美苏彼此彼此，都搞这一套，不必过分不依不饶，然后含笑对赫鲁晓夫说：“请接着念！”

戴高乐这一段短促出击搞得赫鲁晓夫狼狈不堪，接下去念苏联声明时，手颤抖得更厉害了。

美国国务院顾问、前驻苏大使奇普·波伦边听边向艾森豪威尔嘟囔：“我们不能只是老老实实坐着听这个，我们得回敬！”

艾森豪威尔憋了一肚子气，面颊和脖子都涨得通红，手拿一支铅笔在纸上不耐烦地胡乱划来划去。

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坐不安席，看看怒气冲冲的赫鲁晓夫，瞧瞧脸有愠色的艾森豪威尔；望望不胜其烦的戴高乐，他惊慌不安，不知如何是好。

赫鲁晓夫念到一个地方，又离开稿子猛然喊道：“是什么魔鬼驱使美国人于这种事的？”

戴高乐嘿嘿一笑说：“魔鬼处处有，美苏两边都有。这是一桩间谍公案，这种事情什么时候都会发生，确实不值得政府首脑们来分心考虑，全世界的民众都正巴望着我们来实现他们和平的愿望呢！”

赫鲁晓夫像公牛一样摇摇头接着念下去，终于念完了那冗长的声明。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这样写自己和当时四国首脑会议的气氛：

“我念完声明并坐了下来。坦白他说，我感到很激动，斗志昂扬，心情振奋。正像和我一样单纯的人会说的那样，我卷起袖口想要打架。我的声明引起了很大的骚动，特别是警告如果不能得到美方满意答复，我们就要收回对艾森豪威尔的邀请这一段。接着，出现了长时间的尴尬局面，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办！”

艾森豪威尔面对赫鲁晓夫连珠炮般的攻击，他一声不吭，板着面孔坐在自己的席位上，但他那光秃秃的头顶一阵阵泛起紫红的颜色，脖颈和面孔涨得更红，他手下人说这是这位美国总统凭着意志强行压制自己火气的典型表现。

人们以为艾森豪威尔也会暴跳如雷，但美国总统却出乎意料地言语平和，宣布他已下令停止U—2飞机的侦察飞行，但表示拒绝道歉。

赫鲁晓夫听了气鼓鼓重申：如果艾森豪威尔不赔礼道歉，他就不参加以后的任何会议。

人们知道巴黎首脑会议已面临严重关头，谁也不便讲话，会议出现难堪的冷场局面，还是会议主席戴高乐打破沉默，叹口气说：

“赫鲁晓夫主席，你硬性地提出了一个艾森豪威尔将军显然无法接受的条件。在你从莫斯科动身以前，U—2飞机被击落以后，我曾派我的大使去看你，问过你这次会议是如期召开还是延期举行。你现在所了解的情况，你当时就已经了解了。你当时对我的大使说，这次会议应当如期召开，还会获得丰硕的成果。我在开会以前见到你的时候，又当面向你提出了这个问题，你

又一次说应当如期召开。”

戴高乐稍加停顿，看看赫鲁晓夫，意思是说这些情况都属实吧？见赫鲁晓夫不敢否认，接着挥手指责道：

“现在你硬性提出了一个美国总统显然无法满足的条件，这就使我们的四国首脑会议无法再开下去了。你让麦克米伦先生从伦敦跑到巴黎，让艾森豪威尔将军从美国跑到法国，让我处境尴尬而又难堪。你把话讲得那么死，使会议无法进行，叫我还怎么来组织和参加这次会议？我们应当考虑考虑这些情况，考虑考虑全

世界民众对这次会议所寄托的希望，明天此时继续到这里开会，现在体会。”

赫鲁晓夫霍地立起身来，挥舞拳头重申他的强硬立场，说罢，在苏联代表团人员簇拥下扭头便走，戴高乐像责备任性的孩子一般瞥了他一眼，宣布第二天继续开会。

美、英、法代表见赫鲁晓夫阔步下楼而去，一个个面面相觑。戴高乐善于交际，他走到美国代表团席前，挽起艾森豪威尔的手臂说：

“我不知道赫鲁晓夫会怎么办，也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情况，不过，不管他怎么办，也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我要告诉你，我始终和你站在一起！”

艾森豪威尔深受感动，向法国总统表示感谢，在返回的汽车上大发感慨：“那个戴高乐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赫鲁晓夫回到苏联驻法使馆，仍余怒未息，又举行记者招待会大发雷霆，大骂美国背信弃义不知悔改，含沙射影发出威胁。

第二天上午，美、英、法三国代表来到会议厅准备继续开会，却迟迟不见赫鲁晓夫的踪影。戴高乐派法国外交部官员催问，才知道赫鲁晓夫已和马利诺夫斯基到巴黎郊外的一个小村，去参观马利诺夫斯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驻过的法国村庄，只留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在家留守，处理有关事务。

不一会儿，法国外交部官员回来报告，赫鲁晓夫传话称：除非艾森豪威尔赔礼道歉，否则他决不出席会议。

戴高乐怒容满面，再看看又窘又怒的艾森豪威尔，瞧瞧神情沮丧的麦克米伦，叹口气吩咐法国外交部官员：“你去告诉葛罗米柯，赫鲁晓夫是用书面邀请来的，他也应当用书面回答。”

几分钟后，法国外交部官员回来报告说：“赫鲁晓夫回称，他不愿做书面答复。”

戴高乐面含讽刺之色，吩咐法国外交部官员：“去告诉他，用书面信件回答书面信件，这是文明国度之间的惯例！”

赫鲁晓夫在戴高乐的强硬攻势面前屈服了，声称愿意用书面回答，但不来参加会议。

戴高乐在这个枝节问题上占了上风，便宣布四国首脑会议以破产而告结束，这正是：

四国开会巴黎宫，“寡妇”闹鬼不安宁。

赫氏大发雷霆怒，首脑会议敲丧钟。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笑里藏刀 维也纳美苏首脑互摸底 招摇撞骗 古巴海两霸导弹酿危机

话说巴黎四国最高首脑会议因U—2飞机事件而告吹，使赫鲁晓夫苦苦追求的美苏缓和遭受致命打击，美苏关系又趋紧张。

赫鲁晓夫对改善美苏关系仍寄予很大期望，恰巧1961年1月19日他厌恶的艾森豪威尔下台，年仅43岁的约翰·菲兹杰拉德·肯尼迪入主白宫，赫鲁晓夫认为肯尼迪是“比艾森豪威尔更好一些的政治家”，为新的美苏首脑会晤提供了可能。

1961年元旦，赫鲁晓夫特意向肯尼迪发去新年贺电，表示“愿意忘掉去年5月的U—2飞机事件”，希望与其改善关系。

肯尼迪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上台后雄心勃勃，将艾森豪威尔、杜勒斯的“大规模报复战略”，改为“灵活反应战略”，争取时间大力发展尖端武器，以保持美国的军事优势。

为将又争夺又妥协的美苏关系新格局引向对美国更有利的方向，打破U—2飞机事件给美苏关系造成的障碍，肯尼迪立即接过赫鲁晓夫伸过来的橄榄枝，让美国驻苏大使3月间在西伯利亚会见赫鲁晓夫，探询6月3日在维也纳举行美苏首脑会晤的可能性，赫鲁晓夫自然喜不自禁。

然而，肯尼迪在给赫鲁晓夫一点儿甜头后，又在古巴问题和柏林问题上给赫鲁晓夫连打两闷棍。

原来，卡斯特罗1959年元旦推翻巴蒂斯塔独裁政权，建立临时革命政府并出任总理兼军队总司令后，首先到美国访问，但美国不把卡斯特罗放在眼里，要古巴继续做美国的蔗糖殖民地，卡斯特罗义无反顾保卫古巴主权，下令将外资企业收归国有，美国大老板的企业也包括在内，肯尼迪年轻气盛，1960年竟宣布停止从古巴进口食糖。

肯尼迪的霸道行为激怒了古巴人民，因为制糖业历来是古巴的“经济轴心”，糖是古巴国民收入最主要的来源，依靠糖换回粮食和其他物品，肯尼迪知道，没有蔗糖出口，古巴就不能生存，便宣布取消购买古巴糖的95%配额并且禁止向古巴销售工业设备和日用商品。美国的作法使古巴处于极为艰难的困境。

赫鲁晓夫早就想在西半球扩大影响，为把古巴拉入苏联的势力范围，使古巴成为直逼美国胸口的一把尖刀。因此，在古巴危难时刻，他当即宣布，苏联愿意伸出援助之手，购买古巴蔗糖。2月13日双方签订了苏古贸易和支付协定，苏联保证在5年内每年购买古巴100万吨原糖，答应向古巴提供工业设备，使古巴获得外汇和其他利益。

赫鲁晓夫还向卡斯特罗保证，如果古巴已遇到危险，苏联不会坐视不管；如有必要，苏联军队可以用导弹支援古巴！

中国人民也坚决支持古巴人民的反美正义斗争。当时，中国已遭到三年自然灾害，处于经济困难时期，但为了支援古巴，也仗义地购买古巴大批蔗糖。1961年1月2日，毛泽东主席亲自出席古巴驻华大使举办的古巴国庆招待会；同月底，邀请古巴芭蕾舞团访华，周恩来亲自观看古巴著名艺术家阿丽西里·阿隆索主演的芭蕾舞剧《吉赛尔》，出席古巴大使为古巴芭蕾舞团访华举办的酒会，对古巴进行道义上的声援。

苏联、中国对卡斯特罗政权的大力支持为古巴解了围，肯尼迪好生气恼，

指示美国中央情报局长艾伦·杜勒斯训练了 2000 人

的古巴雇佣军，于 1961 年 4 月 17 日凌晨从古巴吉隆滩（猪湾）登陆，企图一举颠覆古巴革命政权。

在古巴生死关头，卡斯特罗黝黑的脸庞闪出愤怒之色，眉峰高挑，义愤填膺，指挥古巴军民打败了美国豢养的古巴雇佣军，美国也不敢出兵直接干涉。

古巴粉碎美国豢养的雇佣军进攻的消息传出，世界舆论大哗，美国公众对此颇为不满，中央情报局长文伦·杜勒斯羞愧难当，只得辞职下台。肯尼迪恼羞成怒，一面命令美国特务机关派人暗杀卡斯特罗，一面在柏林制造新的紧张局势。

美国把西柏林视为“东西方大门的门铃”，看作入侵、颠覆民主德国的“原子弹”，派遣大批特务进行破坏活动，引诱大批东德人逃往西德。

为反击肯尼迪的猖狂挑衅，赫鲁晓夫 1961 年 6 月再次向美英法三国提出最后通牒，限西方在年底前 6 个月内从西柏林撤出军队。

美国和西方国家也不示弱，公然宣称不能、也决不允许苏联把他们用武力赶出柏林。这样，柏林又爆发了新的危机。

肯尼迪和赫鲁晓夫虽在古巴、柏林问题上严重对立，嘴上都非常强硬，但谁也不摸谁的底牌，互相都心里发虚。

为互摸底牌，便出现了 1961 年 6 月初的肯尼迪、赫鲁晓夫维也纳会谈。两人为此都做了充分的准备，又确定了美苏维也纳首脑会谈的主要目标：互相试探估价，如有可能，建立对以后有好处的个人联系。

6 月 2 日傍晚，赫鲁晓夫乘国际专列徐徐到达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在车站上受到维也纳人的热烈欢迎，但在欢呼声中也夹杂着刺耳的口哨声和嘘声。赫鲁晓夫神采飞扬地接见记者时说：“我希望明天同肯尼迪总统的会谈，能使美苏关系建立在真正的和平与合作的基础上。”

同一天，肯尼迪在前往维也纳途中，于巴黎对记者宣称：“目前，我们大家处在一个危险时期，当西方同中苏集团之间有着这么多严重问题时，我们同赫鲁晓夫先生进行某种联系是重要的。”

肯尼迪 6 月 3 日清晨从花都巴黎飞往欧洲名城维也纳，大队人马穿过车水马龙的闹市，来到美国驻奥地利大使馆。

当日中午 12 点 40 分，赫鲁晓夫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美国驻维也纳大使馆，年轻的肯尼迪疾步走下高高的台阶，握着苏联客人的手说：“能见到你，我感到很高兴。”

赫鲁晓夫简直嫉妒美国总统的年轻活力，他生性粗犷，无拘无束地拿肯尼迪被太阳晒黑了的皮肤开起了玩笑：“怪不得美国黑人多，你也快成黑人了！”

肯尼迪请客人落座，正不知如何开口讲剑拔弩张的美苏关系时，赫鲁晓夫抢先开口，讲起他 1959 年 9 月难忘的美国之行，曾匆匆会见肯尼迪和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会议员，赫鲁晓夫抓住这个难得的话题，轻松而幽默他说：

“我清楚地记得，阁下那次去晚了，除了打个招呼、说声再见之外，什么也没有来得及谈，但阁下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还记得，那次我告诉阁下，我早就听说你这个人政治上大有前途，现在果然当上了总统，这次会见使我感到非常高兴。”

肯尼迪暗想这真是个健谈之人，刚才还说“什么也没有来得及谈”，现

在又吹嘘他有先见之明，但也不便点破，便就同一话题暗中刺客人一下称：“那时，你曾谈到自己年轻时的相貌，自那以后你可是老多了！”

赫鲁晓夫大发感慨道：“要是能够和总统平分你的年岁，或者彼此对换一下年龄，我将会非常高兴。”

肯尼迪暗想你尽想好事，那怎么可能？便利用他占据的心理优势言归正传，希望美苏维也纳首脑会议能使双方对共同感兴趣的国际重大问题有一个更好的了解，于是目光炯炯地盯着苏联客人说：

“在我看来，当前的问题是社会制度不同的两个大国，如何能够在这巨变的时代中避免迎头相撞！”

这话说到了赫鲁晓夫的心坎儿上，他抓住这个机会，采取攻势，滔滔不绝说：

“很长时间以来，苏联一直致力于发展同美国的友好关系。美国必须懂得，共产主义已经赢得了发展和壮大的权利。杜勒斯好战政策的前提是消灭共产主义，这样一种宗旨决不可能引向友好关系。正像我不相信总统阁下会浪费时间来说服我转向资本主义一样，我也不希望劝说总统阁下相信共产主义如何优越，但是，从事实上承认共产主义的存在却是必不可少的！”

肯尼迪年轻气盛，喜欢辩论，这次总算找到了辩论对手，摆开论战架势争辩说：

“美国人对苏联的经济成就怀有深刻印象，这使整个世界都为之高兴，但是，在我看来，倒不是民主国家企图在共产党控制的地区内消灭共产主义，而是共产党人企图在和西方有联系的地区内消灭自由制度。”

赫鲁晓夫出身工人，学识浅薄，真辩论起来就不是受过肯尼迪家族刻意栽培的美国总统的对手，他气恼地反驳说：

“苏联决不可能把自己的政策输出到别的国家去，苏联所断言的，只是共产主义必将获得胜利。这不是宣传，而是对社会发展的科学分析。今天共产主义正在取代资本主义，正像过去资本主义曾经取代过封建主义一样。社会制度的变革是一定要到来的，不过它只能由人民自己的意志来实现。正像总统阁下相信你的那种制度一样，共产党人则相信我们的制度。不管怎样，这是一个可以争辩的问题，不是非要用战争解决的问题。苏联要求实现全面彻底裁军的愿望，就足以证明它无意诉诸武力。”

肯尼迪摇摇头摆出证据道：“不见得吧，毛泽东有一句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请问作何解释？”

赫鲁晓夫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太差，竟一时无言以对，一下慌了神儿，想了想竟若无其事，当面否认说：“毛泽东没有那么说过，因为毛泽东是个马克思主义者，而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反对战争的。”

肯尼迪被赫鲁晓夫的回答弄得啼笑皆非，他以教训人的口吻告诉赫鲁晓夫：

“你必须理解美国的观点，如果我们两个国家不能维护和平，遭受损害的将是整个世界。我的最大愿望就是保证和平，而目前最大的危险却是一个大国可能会错误估计另一个大国的利益和政策！”

肯尼迪那教训人的态度引起赫鲁晓夫的极大反感，而“错误估计”的提法更刺伤了赫鲁晓夫的虚荣心，他圆脸涨红，厉声反驳道：

“‘错误估计’这个词含义模糊，它使我想到，仿佛美国要求苏联像个小学生似地双手放在桌子上坐着不动。我不了解，按照美国的理论，苏联必

须怎样行动来维护和平。我要讲明，苏联决心维护自己的重大利益，不管美国会不会把苏联在这方面采取的行动看作是错误估计。苏联不需要战争，但它也不会让人吓唬住。当然，战争会是毁灭性的，双方都会遭到同样的损失，受到同样的惩罚，但西方最好把‘错误估计’这个对苏联不友好的词放进冷藏库去，因为使用这个词对苏联不产生任何作用。”

肯尼迪虽年轻，但手腕却较圆滑。他见赫鲁晓夫越说越激动，最后还咆哮起来，便觉得这样的对手倒容易对付，就笑着解释说：

“我所说的‘错误估计’，是指预料任何一个国家的下一步行动颇不容易。美国自己也曾做过错误的判断，比如说，美国就没有料到中国会对朝鲜战争进行干预。我认为，我们这次会谈的目的，就是要使双方对形势的估计精确一些，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错误判断的危险。”

赫鲁晓夫听肯尼迪如此这般的一解释，满脸怒容又烟消云散，兴致勃勃他说：

“如果我们的维也纳会谈成功了，钱就算没有白花；如果失败了，那就不仅白白浪费了金钱，而且辜负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希望。”

两人的会谈一直进行到下午两点，才到美国驻奥地利大使馆的餐厅共进午餐，两人边吃边发出欢快的笑声。

肯尼迪手举一块牛排，指着赫鲁晓夫胸前的两枚奖章，明知故问：“那是什么？”苏联客人告诉肯尼迪说，是列宁和平奖章。肯尼迪面带冷笑挖苦说：“我希望你永远挂着它。”

肯尼迪看一眼水果盘中金黄色的香蕉，便把话题拉到火箭登月球上：“赫鲁晓夫先生，美国和苏联为什么不可以一同登上月球呢？”

“那可不行！”赫鲁晓夫断然拒绝。

赫鲁晓夫这么牛气，是因为在他访美前，苏联成功地发射了第二枚宇宙火箭，如期到达月球表面，率先对世界宇宙学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一下震动了世界，震撼了整个美国，认为是对美国的“重大挑战”。

赫鲁晓夫因此而趾高气扬，以为苏联火箭技术先进，不把美国放在眼里，便拒绝了肯尼迪的要求，他更加神气活现了。

赫鲁晓夫又忽然想到美国在宇航方面的技术并不比苏联差，一口拒绝不合适，便急忙改口说：“行啊，为什么不可以呢？”

众人听了乐得哈哈大笑，肯尼迪暗想赫鲁晓夫真是条变色龙，他的主张变得太快，一个大国领袖岂能这样行事？又想到这正是他可以利用之处，于是，肯尼迪又眉头一皱，计上心来。

午餐的最后一个项目是敬酒，肯尼迪将酒杯高高举起致意：“我1959年曾经欢迎赫鲁晓夫主席访问美国，现在很高兴又能够在维也纳的美国使馆里欢迎主席先生。”

赫鲁晓夫愉快地与肯尼迪碰杯，无拘无束地谈他和艾森豪威尔的关系：

“我一直很尊重艾森豪威尔，并为我们俩关系的不愉快发展感到遗憾。我几乎确信，艾森豪威尔总统对U—2飞机的飞行事前毫无所知，只是出于一种骑士精神，他才决定为此承担责任。我很遗憾，一直没有能够在苏联会见艾森豪威尔。”

赫鲁晓夫又举杯对肯尼迪表示友好说：“我希望在时间成熟的时候，能够在莫斯科接待总统阁下。道路是畅通的，但也得谨慎行事。尼克松先生曾企图向苏联人民展示一种梦想中的厨房来使他们倒向资本主义，但那种厨房

事实上并不存在，而且永远也不会存在。我对在这里提到美国公民尼克松的名字表示歉意，但确实只有尼克松才会有这种荒唐的想法。”

肯尼迪见赫鲁晓夫谈兴正浓，为套取更多有用情报，便命身穿粉红草莓色夏服的夫人杰奎琳给苏联客人续酒。赫鲁晓夫见肯尼迪夫人亲自给自己献殷勤，顿觉眼前一片明亮。摆出一副认真的样子说：

“我承认俄国人钦佩你们美国人，特别是你们的技术成就。在意识形态上，我们可能是完全对立的，但那不应该妨碍我们为我们人民的更美好的未来进行努力。我羡慕总统年轻，如果我像你一样年轻，我一定会为这一事业贡献出更多的力量。现在尽管我已67岁了，仍不准备在这一竞赛中弃权。”

午餐后，两人在美国驻维也纳大使馆花园里散了一会儿步，稍事休息，又撇开顾问举行单独会谈，肯尼迪特别强调说：

“变化是不可避免的，但在核时代，战争将是空前的浩劫，因此，双方都必须注意避免可能导致战争的局面。至于错误估计在所难免，我自己对海湾问题就曾做出过错误估计。只要我们能够减少这种估计中不确定部分的幅度，我们两国就可以避免核战争，在竞赛中共存下去。”

肯尼迪一软，赫鲁晓夫又硬了起来：“可是，现在美国把任何地方的革命都看作是共产主义的阴谋，我们还能解决什么问题呢？实际上，革命是由于美国支持一些反动政府造成的，瞧瞧伊朗，瞧瞧古巴。菲德尔·卡斯特罗开始并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而美国的政策却正使他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我也并非生下来就是共产主义者，是资本家使我变成这样的。认为革命是干涉的结果的假想是危险的，而归根结底，造成干涉先例的恰恰就是美国。”

肯尼迪在古巴、老挝问题上与赫鲁晓夫进行激烈争论，赫鲁晓夫在民族解放战争和中国问题上发表了强硬意见，他说：

“民族解放战争是神圣的战争，苏联肯定将予以支持。美国自己就是这样对英国举起义旗的，现在却反对别的民族学习它的榜样。俄国的沙皇拒绝承认革命的美利坚合众国为合法的政府达26年之久，现在美国又拒绝承认中国。然而，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对美国来说，现实主义的政策应该是承认中国，并让它进入联合国。当然，只要蒋介石不论在台湾还是在联合国保持着自己的地位，上述一切就是办不到的。如果我处在毛泽东的地位，大概早就对台湾发动进攻了！”

肯尼迪信奉势力均衡学说，力图保持现存均势，他盛气凌人他说：“如果有更多的国家加入共产主义阵营，再丢失台湾等战略要地，就会打破现有的均衡，带来难以估量的结果，我们恕难让步。”

赫鲁晓夫不以为然并举水桶为例说：“如果我们把均势设想为每边放一只水桶，那么就算有些非洲国家倒向共产主义，那也只不过是在共产主义力量的水桶里加进几滴水而已。而这无疑是人民意志的一种表现，任何想从外部对它加以阻止的企图，都会引起一种连锁反应，并可能引起战争。”

两人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唇枪舌剑，毫无结果，只在老挝问题上同意对各自的被保护者施加影响，使他们在停火方面同国际监督委员会合作。

3日晚，奥地利总统阿·戈尔巴赫在香布劳恩宫举行豪华国宴和芭蕾舞演出，招待美苏首脑。赫鲁晓夫极力制造和谐的气氛，给风流泼辣的杰奎琳讲趣闻轶事，大讲苏联飞上太空的狗已经下了小狗，杰奎琳开玩笑说：“你为什么还不送我一条？”赫鲁晓夫大笑，后来果然给肯尼迪夫人送了一条小狗。

6月4日上午，赫鲁晓夫向苏联战士纪念碑献了花圈，高兴地接受了一

个美国女记者的采访，幽默地向她发出访苏邀请，再次向肯尼迪伸出橄榄枝：“带上你的总统一起来！”

上午 10 时许，肯尼迪乘车来到苏联驻奥地利大使馆，但双方会谈一上午也没有结果；午餐时，两人用玩笑调节紧张的气氛，肯尼迪致祝酒词时说：

“主席阁下，头一天晚上你曾告诉我，在我这样的年岁的时候，你是莫斯科计划委员会的委员，正盼着担任该委员会的主席，可我要是到了你这么大年岁的时候，我则希望当波士顿计划委员会的负责人，或者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

赫鲁晓夫插话讽刺说，“也许你还想当世界计划委员会的主席呢。”

肯尼迪赶快声明：“不，就当波士顿的。”

肯尼迪 6 月 4 日下午再次要求进行单独会谈，首先提出希望说：“为了美苏两国的共同利益，主席阁下不要迫使我面临一个像柏林问题这样深刻地牵涉到美国国家利益的危机。当然，关于东德，你愿意做出什么决定，完全是自己的事，但现在全世界到处都在发生变化，结果如何是谁也无法预测的。在这样一个时刻，一切决定都必须仔细考虑才行。”

赫鲁晓夫听着火气升腾，又咆哮起来：“东德政府将使用武力阻止西方国家穿越东德控制区进入柏林，任何试图使用武力通过东德领土的行动都是交战行为。”如果美国在这个问题上选择了战争，那是你们的事！”

肯尼迪不肯示弱，“要想强迫改变现状的是你，不是我。”

赫鲁晓夫寸步不让：“是和平还是战争，完全取决于美国。苏联除了接受挑战，别无选择，它必须，也一定会做出反应的，不能再拖延了，苏联准备 12 月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单独签署和约。”

肯尼迪意味深长他说：“那将是一个寒冷的冬天！”这正是：

维也纳市乃名城，美苏首脑频争攻。

相互试探射暗箭，唇枪舌剑刀枪鸣。

美苏首脑在维也纳的会谈失败后，两国在柏林的冲突迅速升级。

肯尼迪鼓动东德熟练工人和技术人员大批逃亡西德，平均每天 1500 余人，使东德经济面临严重威胁。

赫鲁晓夫认为西柏林是美国伸在欧洲的一只脚，苏联什么时候想踩美国人的脚，只要切断西方通过东德领土同西柏林的交通就行了。

赫鲁晓夫决定在 1961 年 8 月踩美国人的脚。他和东德领导人昂纳克磋商后，8 月 13 日让东德政府命令上万名东德工人战斗队员，与苏联、东德军队一起行动，在一夜之间修起了一座柏林墙。

肯尼迪闻讯大惊，忙派 1500 名美军增援西柏林，并出动卡车撞毁了部分柏林墙。赫鲁晓夫不甘示弱，指示苏联元帅科涅夫命苏军重型坦克部队开了上去，使美军的吉普车、坦克、卡车、兵员运输车和推土机处于苏军坦克的炮筒之下，双方紧张对峙一夜。

赫鲁晓夫看美苏关系紧张到极点，就指示科涅夫称：“我看你还是命令我们的坦克掉头，从边界开回来为好。我敢肯定，在 20 分钟之内，美国坦克也会开回去。”

苏联坦克撤走后，美军坦克也掉头而去，双方直接冲突得以避免，美国也不得不接受了柏林墙的既成事实。

赫鲁晓夫在柏林危机中占了上风，又加紧向古巴运送导弹。1962 年 8 月 29 日，美国 U—2 飞机在古巴发现了苏联在古巴的导弹发射场，但苏联矢口

否认，肯尼迪又命 U—2 飞机反复侦察，10 月 16 日获得最准确情报，使他“震惊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因而立即召开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会议。会议经过 4 天激烈争论，决定对古巴实施封锁。

10 月 22 日晚 7 时，肯尼迪发表电视演说，声称美国一直对苏联在古巴的军事集结情况进行严密监视，现已有确凿证据，发现在古巴有苏联的进攻性导弹，因而宣布对古巴进行隔离和严密监视，要求苏联马上拆除导弹发射设施，否则，美国总统将毫不犹豫地消灭之。他命令出动美国大批海军军舰和 2 万名海军士兵开始执行封锁古巴的行动，肯尼迪声色俱厉地发出警告：

“我们决不会选择屈服和投降的道路！”

古巴导弹危机的消息传到中国山东著名泉城济南的珍珠泉宾馆，毛泽东顾不得欣赏夕阳斜照下宛如万千颗晶莹剔透的珍珠泉，忙通过电话与周恩来研究支持古巴人民正义斗争问题，周恩来急切地报告：

“苏联在古巴修建了几个导弹基地，被美国发现了，肯尼迪昨晚发表了广播演说，军事封锁加勒比海，加紧对古巴的侵略准备……”

毛泽东很关心赫鲁晓夫如何动作，眉头紧锁问：“苏联的态度怎么样？”

周恩来在北京遥遥报告：“目前美苏双方的态度都很强硬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肯尼迪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言行做过深入思考，认为肯尼迪才思敏捷、年轻气盛却又狡诈圆滑；赫鲁晓夫好大喜功，刚愎自用，却爱虚张声势、卖弄手腕，就胸有成竹地说：

“我看啊，这是一场心理战，两边都在搞核讹诈，谁也没有胆量真打。不过，从赫鲁晓夫上台后的一系列动作看，他有神经衰弱症，搞不好会受胁，我看咱们要伸一把手，声援一下古巴兄弟，也给赫鲁晓夫打打气。”

毛泽东看一眼窗外的高檐飞角，成阵游鱼，再看看园中两抱多粗的银杏古树，一种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在胸中奔腾汹涌而出，神情格外凝重：

“我们还没有原子弹，但就不怕核大战！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也是活老虎，关键是要弄明白它什么时候是纸糊的，什么时候要吃人。我看搞点集会、游行，声势搞大一点。赫鲁晓夫不是悄悄在同尼赫鲁调情嘛！这样一来他们就难办了。这时候声援古巴一下，对提高中国的国际威望，使国际舆论对中印边界的冲突持公正态度，都有好处。具体问题，你组织办。”

于是，10 月 23 日，中国境内各大都市都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和示威游行，中国人民愤怒地挥拳高呼：“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海盗行径！”“要古巴，不要美国佬！”“坚决支持古巴人民的正义斗争！”……

赫鲁晓夫完全没有料到肯尼迪会采取如此强硬的态度，也不示弱，命令加快向古巴运送中程导弹和伊尔—28 式轰炸机。

1962 年 10 月 23 日，肯尼迪宣布美国将拦截可能前往古巴的一切舰船，勒令其听候美国人检查。肯尼迪下令在古巴领海周围设置警戒线，由 90 艘舰艇组成的美国舰队在 68 个空军中队和 8 艘航空母舰的护卫下驶往古巴，庞大的登陆部队也集结待命，准备参战。

美国军队的大规模频繁调动吓坏了美国民众，纷纷抢购食品和猎枪、来福枪，有的在商店为抢购最后一听猪肉豆罐头展开激烈的争夺，简直到处一片大战即将来临的气氛。

对苏联的强硬态度，美国报之以讹诈，于是，美苏都进入临战状态，加勒比海危机终于爆发。

“隔离”生效的 10 月 24 日 10 时，苏联“加加林”号和“科米莱斯”号

运输船驶至距离美国“隔离”障碍物仅有几海里的海区，按照美国原先宣布的计划，美国就要用巡洋舰拦截了，形势达到白热化的程度，赫鲁晓夫和肯尼迪都整天呆在办公室，困了和衣在藤椅上而眠。

这时，肯尼迪为避免危机升级为战争而下达指示称：“要力争不使赫鲁晓夫失面子，不让苏联丢脸，不令他们由于感到对国家安全和民族利益负有义务而将他们做出的反应予以升级。”

10月25日，苏联油船“布加勒斯特”号在古巴海面被美国海军拦截，苏联油船赶快说明其油船身份，美国海军将其放行，这才没有引起直接冲突。

要不要登上苏联船只进行检查？美国海军将领请示美军总司令肯尼迪，年轻的美国总统谨慎地选定将“马卢克拉”号作为第一艘使之停航并强行上去检查的船只，因它是一艘美国造的、属巴拿马所有的自由轮，在黎巴嫩注册，为苏联租用，估计产生对立的可能性较小。

这样，肯尼迪命令由两艘驱逐舰组成的武装船队强行派人登上“马卢克拉”号进行检查，结果是没发现任何武器而将其放行。

为寻找缓和措施，赫鲁晓夫命苏驻美大使馆参赞亚历山大·福明会见有白宫背景的美国记者称：“假如苏联答应撤走导弹并保证不再把进攻性武器运进古巴，美国是否可以放弃入侵古巴的计划？”

肯尼迪得到美国记者通报的福明表达的信息，急忙答应可以接受，但要有苏联政府的正式交涉。于是，10月26日晚6时，肯尼迪接到赫鲁晓夫的来函，承认古巴装备有苏联的导弹，但表示只要美国不进攻古巴，苏联可以在联合国的监视下，撤出古巴境内的导弹，特别说明“我们都是正常人，不会发动战争”。

肯尼迪这才放下心来，兴致勃勃地看着窗外白宫草坪上喷泉的白色水柱在空中飞舞，五彩缤纷的霓虹灯广告闪烁发光，不禁发出“和平是一件多么脆弱的东西”的感慨。

10月27日，美国收到苏联外交部的正式文件，要求美国必须撤走部署在苏联近邻土耳其的导弹，苏联才肯撤走在古巴的导弹。仿佛要显示苏联的强硬立场，苏联导弹又击落飞至古巴上空的U—2飞机，飞行员当场毙命。

美国军方又向肯尼迪报告：古巴的苏联导弹基地正在日夜不停地抢修，已经接近实战之用，这使肯尼迪刚刚放松的神经又紧张起来，忙命他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去见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进行交涉。多勃雷宁马上向赫鲁晓夫报告两人会见情况说：

“罗伯特·肯尼迪困顿不堪。从他的眼睛里可以看出他已有好多天没睡觉了。他自己说已经6天6夜没有回过家。罗伯特·肯尼迪说：‘总统处境严重，不知如何才能解脱，我们都处在很重的压力之下……如果这种局势再继续下去，总统就不能肯定军方是否会推翻他而夺取权力。美国军队可能会达到无法控制的地步。’”

罗伯特·肯尼迪还把自己的电话号码告诉苏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并在电话中带着哭腔说：“我已有好几天看不到我的孩子了，总统也一样，我们整天整夜都呆在白宫，我不知道我们还能对我们的将军们坚持多久。”

此时的古巴外海，简直成了现代海上武器陈列馆：各种型号的战列舰、驱逐舰、鱼雷快艇来往如梭，巨型航空母舰各守一方，各种作战飞机时而腾空而起，形势紧张到了极点。

这时，美国高级官员对此复杂局势愁得一筹莫展，还是罗伯特·肯尼迪

急中生智，建议不理睬苏联外交部的正式文件，只答复赫鲁晓夫的来信，向他表明只要苏联拆除在古巴的导弹基地，美国可以不入侵古巴，否则美国将在 24 小时后立即向古巴开火。罗伯特·肯尼迪还私下告诉多勃雷宁：肯尼迪愿意在危机过后撤走美国设在土耳其的导弹。

在这种情况下，赫鲁晓夫态度软了下来，于 10 月 28 日复信肯尼迪，一笔勾销了以撤除美国在土耳其的导弹为对等条件，表示将下令撤除苏联在古巴的导弹，同意联合国检查核实，单方面向美国低头让步。

11 月 8 日至 11 日，苏联灰溜溜地撤走在古巴部署的导弹，在公海上接受了美国海军船靠船的视察，还派米高扬访问古巴，压卡斯特罗同意从古巴撤走导弹和伊尔—28 重型轰炸机。

11 月 20 日，肯尼迪宣布取消美国对古巴的“隔离”。至此，加勒比海导弹危机宣告结束。这正是：

麻杆打狼两头怕，出动导弹鬼神惊。

古巴外海列军舰，虚张声势一场空。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气壮如牛 肯尼迪陈兵孟加拉湾
先礼后兵 毛泽东教训美苏印度

话说美苏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相互角逐的同时，却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共同支持尼赫鲁的扩张主义立场。

1962年10月1日，当中国人民正欢庆建国13周年的时候，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防部作战室里，印度国防部长梅农召开了一个杀气腾腾的印度高级军官会议，他在会上发表煽动性的讲话说：

“尼赫鲁总理已前往伦敦参加英联邦总理会议，临行时授权让我制定一个将中国军队清除出去的作战计划。我已经指令总参谋部拟定好了《里窝那作战计划》，下面就请帕利特准将宣读作战计划的文本。”

在帕利特宣读完作战计划后，国防部长梅农又讲明作战目标：在东部，要占领塔格拉山脊；在西部，要拔除中国军队的21个据点，占领全部有争议的阿克赛钦地区。特别要求在10月10日前完成作战准备。

印度高级将官听了梅农的命令和讲话议论纷纷，一个个摇头不止，认为印度哪里是亚洲大国中国的对手，何况中苏订有友好同盟条约，中国可不是好惹的！

印度国防部长梅农哈哈大笑道，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已经名存实亡，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早就和尼赫鲁总理成了好朋友，赫

鲁晓夫是支持印度的，你们不要害怕！

印席高级官员对此极感兴趣，忙问究竟，梅农便滔滔不绝他讲起赫鲁晓夫与尼赫鲁两人的非同寻常的关系：

为促使尼赫鲁和印度反华，赫鲁晓夫说西藏已对印度“构成威胁”，他暗中支持印度在西藏挑起叛乱，虽然在公开场合不得不支持中国对西藏问题的立场，但他非常“理解尼赫鲁总理所处的地位”，对“在印度边境一侧有一个中国的西藏看起来很不舒服”。

赫鲁晓夫极力讨好尼赫鲁，硬说中国挑起中印纠纷，不惜歪曲事实说“尽管在中印之间的冲突中，正义和真理在印度一边，而不在中国一边”，但是，“苏联不愿称中印任何一方为侵略者。在苏联通过塔斯社发表的声明中，苏联采取的立场是：一场误会导致了我们的印度朋友同我们的中国兄弟之间的意外的战争。苏联表示遗憾，并呼吁双方进行停战谈判和恢复友好关系。苏联事先知道我们的声明是不会受到北京欢迎的”。

梅农得意他说，赫鲁晓夫认为尼赫鲁总理是“一个明白事理与热爱和平的人”，赫鲁晓夫“觉得中国应该受到责备”，因而他两次访问印度，向印度提供长期贷款，从1960年起开始提供军援；苏联认为中国“奉行的是失去理性的政策”，因而赫鲁晓夫还把苏联最先进的米格—21战斗机交给印度，用于对中国作战。

梅农还声称，美国总统肯尼迪也认为中国是美国“最危险的敌人”，向印度提供大量经济和军事援助，用于对付中国人。有美苏大力支持，“我们不怕中国人！”虽然中国总理周恩来多次访问新德里，同我们的各部部长谈话，但我们都置之不理，有美苏背后支持，还怕对付不了中国人！

梅农和尼赫鲁的煽动性讲话，激起了印度扩张主义者的反华狂热，不断向中国进行挑衅活动。

1962年9月17日，在尼赫鲁、梅农的一道道命令催逼下，60名印度士

兵从三面向克节朗河 2 号桥头的中国哨兵逼近，中国哨兵喊话要他们停止前进，但印度军官却命令印度士兵举着步枪、机枪对准中国哨兵，大吼大叫要把中国哨兵轰走。在边境冲突中，两个中国哨兵被当场打死。

周恩来怀着悲愤的心情于 10 月 2 日向毛泽东做了详细汇报，又自我批评说：

我今天来，就是想汇报一下有关印度的情况。我的访问看来没有解决问题。现在，印度国内的舆论非常激烈，尤其是国防部长梅农，叫嚷要和我们打一场有限的战争。在这种气氛中，尼赫鲁也越来越强硬。我几次给尼赫鲁去信，希望举行高级会议，解决边界争端，他都坚决拒绝。他强调，会谈的前提是中国的军队全部撤出有争议的地区……

毛泽东“唔”了一声，望望菊香书屋外绿油油的菠菜，红红的辣椒，皱着眉头抽口烟缓缓吐出说：

“这不行！我们都撤出来，让给他，将来还谈些什么？中国有 96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是小学课本上都有的，不能轮到我毛泽东，领土就变成了 950 万、 930 万，我无法向六亿人民交代。”

中印边界战争前夕，毛泽东自然想到他真正的对手肯尼迪、赫鲁晓夫。他不知这两个劲敌在多大程度上支持印度扩张主义者，就问周恩来：“嗯，印度这样强硬，一定有后台吧？”

周恩来忧虑忡忡，双手抱在胸前，急切地向自己敬重的主席汇报说：

“英国、美国支持他们不用说了，据可靠情报，苏联也私下支持他们。从我国撤走的苏联专家，有一大部分已转往印度。苏联援印的比莱钢铁厂，如今已开工生产，钢铁产量翻了一番……据说苏驻印大使维列基正准备同印度签订新的经济协定，贸易额还将增长一倍。为了支持印度打这一场边界战争，苏联还准备提供 40 架图—12 运输机。”

毛泽东原以为赫鲁晓夫只是一个爱出风头的人，还想尽量帮助他，把他拉回到马列主义的轨道上来；但在得悉赫鲁晓夫支持印度入侵中国后，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已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叛徒，一个反复无常的卑鄙小人。他在《七律·和郭沫若同志》的诗作中表达了这一激愤之情：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

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域必成灾。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毛泽东收回思绪，愤愤不平他说：“古有名训，生意不成礼义在咳！看来，赫鲁晓夫此公是不讲礼义喽！”

周恩来拿出《真理报》上的一篇文章，给毛泽东看，讥讽说，赫鲁晓夫竟向最坚决主张谈判解决中印边界冲突的中国大讲谈判的好处，跟西方观察家一个腔调。文章中写道：

“苏联过去和现在都相信中印之间没有理由发生边界纠纷，更没有理由使纠纷转化为武装冲突……如果双方能坐到谈判桌上来，心平气和地、不带任何成见地讨论他们相互的指控，毫无疑问，冲突早就会得到解决。谈判即使再困难，也总比战争要好。争执的问题必须在谈判桌上通过和平方式求得解决，而不能通过军事方式得到解决。”

毛泽东、周恩来又谈到肯尼迪。周恩来说：肯尼迪写信给尼赫鲁，大肆吹捧印度扩张主义者。肯尼迪说：

“在这种局面下，美国完全同情你。你在同中国打交道中，已经表现出高度的克制和耐心。凡是伟大的宗教领袖们所极力提倡的，你部已身体力行，而他们的信徒中能够做到这样的，却是寥寥无几。”

周恩来还说：美国驻印度大使约·肯·加尔布雷恩奉命改变了美国在麦克马洪线问题上的含糊态度，把英国殖民主义者制造的中国政府历来不承认的中印边界线，说成是一条“为现代惯例所承认”的国际边界线。

周恩来又告诉毛泽东一条来自巴基斯坦的消息，并说：我们应该及早设法防止肯尼迪唆使尼赫鲁挑起新的边界争端。他说：

“巴基斯坦有家报纸说，印度跟中国制造麻烦，与其说是为了争领土，不如说是为了搞到更多的军援。每当美国国会开始讨论援外计划的时候，印度就毫无例外地仇视中国，以便捞取更多的美援。现在又到了美国国会表决具体拨款的时间，所以印度又频繁地挑起边境冲突。”

毛泽东吸口香烟频频点头说：

“有道理，有道理啊！蒋介石的军队就是这样，打一枪，看看主人的脸色，主人赏两块银元，就再打。不赏钱，就泄气了喽！”

周恩来说：“现在中印边界非常吃紧，不少边境哨所受到威胁，战士和边民的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零星枪战时有发生。西藏、新疆军区多次来电，询问该怎么办？”

毛泽东感到处理中印边境冲突问题要谨慎行事，便说：

“尼赫鲁是我们的老朋友，印度是同我们建交的第二个国家，为新中国在世界的地位的提高出过力，我们不能对不起人家。他不谈判，不要紧，我们可以等。谈判的大门，不能从我们这边关上。”

毛泽东在菊香书屋缓缓踱着步子，他知道这是中国同赫鲁晓夫、肯尼迪在中印边界问题上进行惊心动魄的较量，手一挥毅然做出指示：

“电告西藏张国华、新疆何家产，在中印边境纠纷中，我们坚持不先放一枪，不先伤一人，尽量避免流血事件的发生，但我们不能退，退了没得理讲。犬牙可以交错，要准备长期武装共处。总之，我们不想打仗，再做最后一次努力，让尼赫鲁走到谈判桌上来……”

10月3日，印度总理尼赫鲁参加完英联邦会议后回到印度，又受到英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的煽动，他以为中国软弱可欺，更起劲地挑起中印边界冲突。

10月7日，中国外交部长陈毅同印度驻华大使班纳吉再做会谈。班纳吉奉尼赫鲁之命威胁中国，要中国做出让步，其言辞充满火药气味，使会谈气氛极为紧张。接着，印度方面蛮横地关闭了中印边界谈判的大门。

10月8日，印度总理尼赫鲁乘专机飞往中印边境地区，与印度前线指挥官考尔中将密谋全面进攻之方策，考尔气势如牛，下了决心：

“叔伯。我想把全线反击的日期定在10月20日，在这之前，做好一切准备。不管怎么样，我将把最后的胜利——新的印度版图奉献给您！”

尼赫鲁一理带钮扣的家织白色布上衣，望望特意插在第二个扣眼里的那朵玫瑰花，对考尔大加赞扬，两人决定即日起停止零星军事活动，全力以赴准备发起全线进攻。

于是，中印之间这段近300公里的边界线上，突然停止了终日不断的枪炮声，出现了大战之前的异常静寂。

周恩来接到中国边防部队的敌情变化紧急报告，马上向毛泽东做了汇报。为警告苏联不要明目张胆地支持印度扩张主义者，周恩来10月8日下午

3 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契尔沃年科，毫不含糊地让他转告赫鲁晓夫：“印度可能在中印边境东段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如果他们一旦发动进攻，我们就坚决自卫。他们利用了苏制米格直升机在中印边界西段和东段进行空投，运送军需，有时还用苏制运输机。印度使用苏制飞机进行挑衅，对我们前方战士有影响。我们认为事先通知苏方是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但是我们只是通知，对苏联没有任何要求。”

赫鲁晓夫不敢小看中国的警告，便劝尼赫鲁小心从事。尼赫鲁头脑发热，以为中国软弱可欺，1962年10月10日命印军拉其普特联队的先头部队抢占了塔格拉山脊。

尼赫鲁见中国边防军在塔格拉山脊采取忍让态度，更加气焰嚣张，指使印军得寸进尺，于是，一名印军大胡子士兵竟背着轻机枪，面对中国士兵站着，摸着大胡子讥笑中国士兵不敢开枪还击，然后悍然开枪挑衅……

印军首先开枪挑起冲突，中国边防军被迫还击，保卫祖国领土，玩火者遭到应有的惩罚。中国乃礼仪之邦，以正式的军礼埋葬了印度挑衅士兵，警告印军官兵不要受人挑唆，再干自取其辱的傻事。

尼赫鲁迎头遭一闷棍，不能不想到中国的严正警告，但确实不摸中国的虚实，便请赫鲁晓夫出来暗中帮忙。

赫鲁晓夫对中国也两眼一抹黑，一时束手无策，他拍着秃头想了半天，便指示苏联驻朝鲜大使去见金日成首相，想通过金日成与中国的特殊关系摸中国的底牌。

金日成首相认为中国和印度作为万隆会议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发起国，发生大规模战争是不幸之事，便利用他与周恩来、尼赫鲁都友好的特殊关系，向中国表示愿做调解工作。

毛泽东、周恩来非常重视亲密友邦朝鲜的意见，不放过一切使中印边界冲突向良好方向发展的机会，决定派周恩来和外交部长陈毅借与朝鲜签订中朝边界条约的机会，仔细倾听金日成首相的意见。

10月11日，周恩来和陈毅到达平壤，受到金日成的隆重欢迎，双方先在平壤内阁办公大楼亲切会见，12日又在平壤牡丹峰宾馆促膝交谈。

周恩来深知中国正与尼赫鲁及其背后的赫鲁晓夫、肯尼迪做尖锐复杂的激烈较量，就将前身稍向前倾，对老朋友金日成说：

“为了解决中印边界问题，1961年我和陈总去印度和尼赫鲁进行过多次会谈，证明印度人没有诚意解决边界问题。回来后我们就建议，为了避免双方人员冲突，各自从当时的巡逻线上撤退20公里搞一个缓冲区。以后，我们主动撤了，但印度方面没有撤。这样保持了一年半的时间没有发生问题。”

金日成对中国为改善中印关系做出的巨大努力给予崇高评价，又问起近况，周恩来详细介绍说：

“今年，台湾海峡局势有些紧张，中苏关系不好的消息传出后，印度就配合美国和蒋介石在中印边界上闹事。首先在西部蚕食我领土，在西部共设据点、哨所43所。我们发现后，恢复了巡逻，这样，我们在这一地区的哨所，就同印度的哨所形成了犬牙交错的形势，互相距离有的相隔只有20米，互相可以看得到。我们的方针是，你不打我，我也不打你。你进攻我，我击退你，我不出击。开始他们没有打枪，后来他就打枪逼我退，我不退。我们向印度提出过数次抗议，他不听。我们忍无可忍，采取了自卫措施，这样双方都有了伤亡。”

金日成对中印边界局势恶化极为担心，又说赫鲁晓夫对此也非常关切。周恩来微微一笑，有针对性地揭露赫鲁晓夫的虚伪态度说：

“从地形条件上说，发生中印边界冲突对印度是不利的。印度人要进入中国哨所，须要爬山上来。从9月下半月起，那个地区已经大雪封山。他们就用苏联造的安—12直升飞机运东西给印度军队。要打，是很好打的。战士们看到苏联造的飞机非常生气！”

周恩来谴责赫鲁晓夫用军事装备支援印度扩张主义者后，又以东方外交家既温文尔雅又威严自重的态度，告诉中国的亲密朋友：

“在这一地区，印度人是没办法前进的。以后，印军就在东段进攻，他们进到麦克马洪线以北。我们的方针是不承认麦克马洪线，也不超过，我们打算和他们谈判。”

尼赫鲁通过赫鲁晓夫得知中国愿意与印度谈判解决中印边界冲突，更认为中国软弱可欺，就在10月12日公然宣称，他已下令要把中国部队从他所谓的入侵地区“清除掉”，这表明印度扩张主义者蠢蠢欲动，要大肆动武了！

印度扩张主义者猖狂扬言进犯，毛泽东认为需要认真对付，便在香山召开军事会议，商讨军事与外交对策。中国著名政治、军事家周恩来，陈毅、叶剑英、刘伯承、罗瑞卿、杨成武、肖华、张国华、何家产等参加了这次会议。

毛泽东先领众人欣赏香山秋末犹如西天晚霞的紫锦，又似沸腾、炽烈火海的枫叶美景，一个个豪情满怀，胸襟大开，众人都请毛泽东面对良辰美景赋诗纪胜，毛泽东满口答应，稍加考虑随口念道：

西山红叶好，霜重色愈浓。

革命亦如此，斗争见英雄。

陈毅见毛泽东借用自己的新诗，勉励众人做敢与赫鲁晓夫、肯尼迪支持的尼赫鲁和印度扩张主义者斗争的英雄，由衷地佩服毛泽东有如此好的记性，又用得这么得体，便笑着请毛泽东亲自来一首，毛泽东笑道：

“眼前有景道不得，陈毅有诗在上头。”

毛泽东借此对众人鼓舞一番士气，将烟蒂掐灭宣布开会说：

“今天找大家来，是开一个军事会议。我们和印度的边境纠纷，闹了好多年了。我们不想打仗，原来想通过谈判解决，可是尼赫鲁不想谈，调集了不少部队，硬逼着要和我们打一架。现在看来，不打是不行了。可打，怎么个打法？打成个什么样子？还请大家献计献策！下面，先请陈毅把外交斗争的情况介绍一下。”

陈毅豪情满怀，介绍了美苏对中印边界冲突的态度，愤愤不平说：

“我们外交部虽然做了多种努力，但是尼赫鲁就是不肯坐下来谈，他尝到了前进政策的甜头，要硬着头皮走下去。看来，只好战场上见了。”

毛泽东以渊博的知识介绍中印一千多年来的友好交往史，分析了中印之间在唐朝、元朝发生的战争，高瞻远瞩为中印自卫反击战定下了极为高明的指导方针：

“今天我们打仗，我看有两条：一要打胜，把尼赫鲁打到谈判桌上来；二要有理、有利、有节。”

接着，世界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周恩来、叶剑英、刘伯承、罗瑞卿等发表了极有见地的意见，最后，毛泽东强调这一仗实际上也是同赫鲁晓夫、肯尼迪的一场激烈较量，要为确保30年和平决一死战：

“中印两国开战，美苏两个大国不用说，许多不明真相的国家也会站到他们一边，蒋介石也可能要搞点动作，我们是有点孤立了，我看，不怕。只要前线打得好，我们会处于主动地位。”

毛泽东霍然站起，慷慨激昂，一字足有千斤之重，真是掷地有声，动人心魄：

“我还是那句话，与其跪着生，不如站着死。想要我们死，也不那么容易。这一仗，我们不打则已；打，就要打出威风，起码要保证30年的和平。”

尼赫鲁自恃有赫鲁晓夫、肯尼迪背后支持，从10月18日开始，向中国边防哨所发动猛烈炮击；倾泻炮弹14800余发。

尼赫鲁以为这一下准把中国边防哨所打个稀巴烂，然后再驱步兵抢占大片中国领土，哪里想到毛泽东号令一下，从10月19日凌晨5时20分开始，中国边防部队开动重炮实施30分钟的炮火急袭，中国士兵随着惊天动地的吼声，在中印边境东、中、西三段近600公里的战线上发动猛烈反击。

尼赫鲁满以为中国不敢还击，等中国一动手，尼赫鲁才发觉自己的如意算盘打错了。经过17小时的激战，中国边防部队在东段歼灭了非法人侵到麦克马洪线以北克节朗地区的印军，在西段拔除了印度扩张主义者在中国领土上非法设立的侵略据点，取得了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第一阶段的巨大胜利。

10月22日，周恩来把初战获胜的消息，打电话报告在济南视察的毛泽东：

“中印边界反击战开战两天，进展顺利，东西两线的部队都打得不错，印军越境建立的据点，已大部分被拔除，印军王牌第七旅已经被我们团团围住，总参谋部的同志请示是否越境作战。”

毛泽东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脸上露出欣慰的神情，不禁为三军将士英勇善战、捷报初传而感到骄傲！他以初战胜利为基础，开始针对赫鲁晓夫、肯尼迪和世界舆论做大文章，他指示道：

“对这场战争，有许多国家的朋友还不理解。既然我们打胜了，就放尼赫鲁一马，有好日子大家过嘛！我看暂时不要越境作战，不但不越境，还要后退20里，表明我们愿意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边界纠纷的诚意。如果尼赫鲁不愿谈，还要打，那我们就奉陪到底，世界舆论也会对我们有利……”

接着，周恩来汇报说苏联和美国在古巴海区尖锐对立，美苏导弹危机剑拔弩张，双方的态度都很强硬。

毛泽东风趣地指示周恩来说：“赫鲁晓夫不是悄悄在同尼赫鲁调情嘛！这样一来，他们就难办了。这时候声援他们一下，对提高中国的国际威望，使国际舆论对中印边界的冲突持公正态度，都有好处。”

于是，中国政府于10月24日向全世界宣布解决中印边界冲突的三项建议，呼吁“双方确认中印边界问题只能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双方尊重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脱离接触，由中印两国政府指派官员谈判，再进行中印两国总理会谈。

赫鲁晓夫暗自慨叹毛泽东、周恩来斗争艺术高明，感到中国人不好惹，同时感到中国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支持了他，就决定在中印边界问题上也暂时摆出支持中国的姿态，以便捞到与肯尼迪立场截然不同的政治资本。

于是，赫鲁晓夫在10月20日中国被迫自卫反击的几小时之后，公布了一封致尼赫鲁的信，对印度企图以武力解决同中国的边界争端的报道表示关切，警告印度说：这是一条十分危险的道路，奉劝尼赫鲁接受中国关于谈判

解决的建议。

10月24日，赫鲁晓夫又让《真理报》发表支持中国观点的社论，认为中国的三项建议是诚恳的、建设性的，为中印会谈提供了一个双方可以接受的基础。

尼赫鲁对赫鲁晓夫不像美国总统肯尼迪那样完全支持他挑起中印边界冲突，大失所望。认为赫鲁晓夫给了他当头一棒，暗想赫鲁晓夫真不够朋友，你我不是站在一起反对中国吗？怎么又向中国挥动橄榄枝呢？在尼赫鲁的授意下，《印度教徒报》政治记者撰文向苏联表示不满：

“过去认为俄国人最多不过是继续采取中立主义的态度，但是当《真理报》发表了一篇全力支持中国立场的社论后，所有这些希望全都落空了……赫鲁晓夫致尼赫鲁的信和《真理报》的社论唱的完全是同一个调子。不仅是印度首都的官方和非官方人员，而且一部分印度共产党人都对此感到沮丧。他们认为苏联的态度不仅不是体贴别人，而且是伤人感情的。”

尼赫鲁还让国防部长梅农召见苏联驻印度大使，向赫鲁晓夫表示不满。苏联驻印度大使告诉梅农，苏联的态度不久就会发生变化。

果然，苏联从古巴撤走导弹后，又很快恢复了原有立场，在中印边界冲突中公开袒护印度入侵者。

尼赫鲁明白了赫鲁晓夫支持中国的姿态，只不过是权宜之计，他在10月底对美国电视台记者说：

“赫鲁晓夫态度急速变化的奥妙。我猜想大概是由于古巴事态发展等原因，使得俄国人认为有必要暂时同中国人闹翻，现在古巴导弹问题已不是个障碍了，赫鲁晓夫和苏联也果真很快地恢复了原有立场。”

在赫鲁晓夫和肯尼迪支持下，尼赫鲁粗暴地拒绝了中国人民政府的三项合理建议，采取一系列措施恶化中印关系，从11月14日起再次向中国发动大规模进攻，中国边防部队奋勇自卫反击。印军与中国边防军一交战便溃不成军。印军前线总指挥考尔中将无可奈何地向尼赫鲁、梅农叫苦：

“印度武装部队无力抵抗锐不可挡的中国优势兵力……这个意见不是出于惶恐，而是正视严酷的现实。”

印度总理尼赫鲁见主力军第七旅全军覆没，旅长达尔准将被中国生擒，辛格准将殒命，他急忙召见美国驻印度大使加里布雷思，紧急呼吁美国总统肯尼迪派15个空军中队攻击中国部队。

加里布雷思紧急向美国总统报告，“我生平第一次看到了公众士气的瓦解”，请求肯尼迪赶快发兵印度，否则中国大军将横扫新德里。

肯尼迪见印度形势危急，便答应尼赫鲁要求，派美国一艘航空母舰气势汹汹开到孟加拉湾；赫鲁晓夫也紧急向印度提供一批军事装备，尼赫鲁才又重抖精神，叫嚷要不惜一切打败中国。

毛泽东坐在菊香书屋宽大的沙发上，听了周恩来的汇报，掸掸手中已吸一半的香烟的烟灰，从容不迫地笑道：“真可谓黑云压城城欲摧，看样子要把整个喜马拉雅山推倒喽！”

周恩来一夜未眠，面带倦容的脸上忧虑忡忡：“主席，印军的兵力增加到了两个师部、九个旅，武装挑衅也是愈演愈烈了，”

毛泽东见赫鲁晓夫支持尼赫鲁越闹越凶，语带讥讽之意说：“老朋友的情面一点也不要喽，看来老是好言相劝不行吧，人家听不进去嘛！”

周恩来又汇报了美国航空母舰开到孟加拉湾伺机而动的严重事态，认为

不仅要对付赫鲁晓夫，也要暗防肯尼迪背后插上一刀，提醒毛泽东说：

“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外交努力，这件事情美国已经插手了，帝国主义是希望打得越大越好。”

毛泽东尖锐地揭穿肯尼迪的阴险目的说：“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嘛！美国资本家还是很大方的，只要是反共的，他就出钱，出武器。”

周恩来气愤他说：“尼赫鲁刚伸出手来，肯尼迪就满口答应了，要什么给什么，许多装备还是新式的。”

提起美国总统肯尼迪，毛泽东自然忘不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给中国施加的巨大压力，辛辣地讽刺说：“老大哥不是也给了吗？”

周恩来点点头，揭穿印度总理的内情底细道：“正是有了后台，尼赫鲁的腰杆才壮起来了！”

湘楚文化造就的毛泽东颇有屈原的宁折不弯之风，人穷国穷志不穷：“人家有的我们没有，现在没有将来总会有，我们有的他们永远也不会有！”

周恩来感到毛泽东像中国大文豪鲁迅那样，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有的尽是堂堂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精神为之一振：“主席说得对，他们有飞机大炮原子弹，我们有革命精神！”

毛泽东不愧为炎黄子孙，望望中南海菊香书屋外的挺拔苍劲

古柏，道：“人总要有一点精神嘛，武器总不是决定的因素吧？”

周恩来讲到印度已争取不明真相的 39 个国家对其表示支持，一些西方国家还策划利用联合国制造对印度有利的舆论，甚至怂恿联合国像朝鲜战争那样出兵印度，毛泽东听了朗声大笑道：

“真是贵人多忘事啊，大不了再一次证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中国人民是不好惹的！”

周恩来饶有兴味地提起《星期日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马居斯的文章，马居斯写道：

“中国报刊更多是刊登政治方面而不是军事方面的新闻，甚至中国打胜仗的消息也轻轻一笔带过。中国报刊没有打算引起读者们强烈的战争感觉。新华通讯社对局势的报道，一般很简短，其他报刊也不常报道，这与印度大肆渲染战争气氛恰成鲜明对照。”

毛泽东对这则报道非常感兴趣，只见他坐在沙发上，右手夹着香烟听得津津有味。周恩来又告诉他英国著名记者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写过这样一则评论：

“在北京看来，在古巴问题上，赫鲁晓夫犯了‘冒险主义’的错误，首先他把俄国导弹安置在古巴，从而造成了美苏对抗；接着他又在美国压力下后退，拆除了导弹，从而又犯下了‘投降主义’的错误。中国反击印度的作战行动获胜，向全世界表明了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恐吓威胁置之不理或予以蔑视，不但无害反而有利，这样也就格外显出赫鲁晓夫及其‘修正主义集团’的虚弱和无能。”

周恩来虽几日没合眼了，但仍精神抖擞说：“主席，打胜这一仗是有把握的，问题是要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要打出国威、军威，就不能打无把握之仗。”

毛泽东受到周恩来乐观情绪的感染，又点燃一支香烟香甜地吸上一口，以哲学家的思维沉吟道：

“我在想，战争与和平是一对矛盾，又是统一的，这一仗打好了，至少要争取到 20 年到 30 年的和平，就是前人种树，后人才能乘凉，目光要远一点嘛！”

尼赫鲁见肯尼迪派美国航空母舰到孟加拉湾为印度助威，赫鲁晓夫也改变了昙花一现的骑墙态度，继续大力支持印度扩张主义者，就命令印军再次对中国发动猛烈进攻。

中国边防部队奋起反击，相继收复“07”、“08”高地，攻克瓦弄、西山口，印度第四军全线崩溃，印度全国惊恐不安。美国航空母舰气势汹汹开到孟加拉湾，看到印度兵败如山倒，肯尼迪明白美国帮不了尼赫鲁多少忙，只好命美国航母匆匆走掉。

为配合军事胜利，中国总理周恩来向 20 多个国家首脑写信，阐明中国的原则立场，毛泽东 11 月 17 日兴致勃勃询问周恩来：

“一边是军事仗，一边是外交仗，都要争取主动。我看打得差不多了吧？”

周恩来以轻快的语调报告：“总参送来的报告，部队士气高昂，东西两线都推进得很快，已经到达传统习惯线，歼灭敌人 5000 余人，缴获了一大批武器装备。”

毛泽东手举香烟满意地称赞：“好嘛，基本上是歼灭战。”

对善后方策，周恩来已有高明考虑：“为了给和平谈判造成有利条件，我们准备就地停火，部队后撤，你看可以吗？”

毛泽东邀请周恩来沿着中南海的林荫道边走边谈，两人所见略同，不谋而合：“我看可以，就地停火，退避三舍，我们让他们一点，也看出谈判的诚意。”

周恩来剑眉一挑，双手抱在怀前，豪情满怀：“这样做在国际上是没有先例的。”

毛泽东在雨路边的石凳上坐下，点上一支烟吸一口，缓缓吐出：“我们做了这就是先例，总要有人先做吧！”

于是，周恩来 11 月 19 日晚接见印度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班纳吉，以高屋建瓴之态说：

“现在我们两国处于一个严重的时刻，亚非国家和爱好和平的国家都把我们看作是亚洲最大的国家和人民，而现在，两国关系由于边界冲突而发展到这样的状况，这总是不幸的不利的。我们这几年来一直努力主张无条件地举行和平谈判，为的是使双方不受任何约束地到谈判桌上来客观、友好地解决问题。”

1962 年 12 月 21 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自次日起在中印边界全线主动停火，从 12 月 1 日起，中国部队从 1959 年的实际控制线后撤 20 公里。

这消息立即轰动全球，赫鲁晓夫、肯尼迪无可奈何，只得承认又败给毛泽东一个回合。12 月 26 日，毛泽东有感做《七律·冬云》：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

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明枪暗箭 肯尼迪氏饮弹毙命达拉斯
罪有攸归 赫鲁晓夫被轰下台莫斯科

毛泽东怎么也没有想到，在 60 年代初，他正和肯尼迪、赫鲁晓夫斗得起劲，一个对手却毙命身亡，一个对手被轰下台去。

毛泽东认为，这两个对手迥然不同，各有特点：肯尼迪年轻气盛，狡诈阴险；赫鲁晓夫粗鄙幽默，刚愎自用。与其斗争，奥妙无穷，因而在 1963 年 1 月 9 日作词《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以抒与肯尼迪、赫鲁晓夫斗争时的宽阔胸怀和乐观主义精神：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
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
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
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多少事，从来急；
天地转，光阴迫。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要讲毛泽东、肯尼迪、赫鲁晓夫三个人之间的复杂微妙关系，还是从美苏首脑之间的争斗讲起更生动有趣。

在肯尼迪同尼克松竞争美国总统时，尼克松派他的副总统候选人卡伯特。洛奇于 1960 年 2 月访问莫斯科。

因为洛奇曾陪同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各地，两人私人关系很好，这次像老朋友一样见面。洛奇在寒暄之后，就道出他此次莫斯科之行的重要使命——为尼克松寻求支持。洛奇说：

“赫鲁晓夫先生，不要介意那些竞选演说。请记住，这些竞选演说仅仅是政治声明。尼克松先生一旦进入白宫，我肯定——我能绝对肯定——他会采取维持甚至改善我们两国关系的立场。”

赫鲁晓夫摆出苏联最高领导人的派头问道：“尼克松先生对我有什么要求？”

洛奇匆忙提出要求：“我们并不要你们赞扬尼克松先生，只要苏联报纸对尼克松保持一种既不攻击、也不赞扬的中立态度。”

赫鲁晓夫认为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比尼克松入主白宫对苏联更为有利，因而对洛奇的要求没有明确答应。

就在美国总统大选投票的前一天，总统艾森豪威尔照会苏联政府，正式要求释放美国间谍鲍尔斯和在北极上空被苏联击落的美国飞机驾驶员。赫鲁晓夫在苏联核心领导会议上讲他的看法说：

“美国政府已向苏联提出要求，希望释放鲍尔斯，但现在还不是释放的时候，因为肯尼迪、尼克松两个总统候选人都想在改善美苏两国关系问题上捞取资本。如果我们现在释放鲍尔斯，形势就会对尼克松有利。根据美国报纸判断，我认为双方是势均力敌，如果我们对尼克松作出哪怕是微小的支持，人们就会认为我们是在表示希望尼克松进入白宫。这将是一个错误。假如尼克松当了总统，我不相信他会改善美苏两国的关系做出贡献。因此，我们应慢一些释放鲍尔斯，一俟美国总统选举结束，我们立即就释放鲍尔斯。”

苏联其他领导人同意赫鲁晓夫的意见，没有应艾森豪威尔的要求支持尼克松，而暗中帮助肯尼迪入主白宫。

1961年6月3日，赫鲁晓夫在维也纳会谈时，觉得肯尼迪“很友好，很讲道理”，认为“他是一个比艾森豪威尔更好一些的政治家”，就和肯尼迪开玩笑说：“在击败那个婊子养的理查德，尼克松之战中，肯尼迪先生，我们投了你决定性的一票。”

肯尼迪瞪大眼睛注视着赫鲁晓夫笑了，问是什么意思：“怎样投的呢？”

赫鲁晓夫赶紧解释说：“我们一直等到美国总统选举结束，才释放美国U—2飞机的飞行员加里·鲍尔斯，这样我们就使尼克松不能声称他对付得了俄国人。我们这个行动至少抵得上50万张选票，给你上台创造了有利条件。”

肯尼迪哈哈大笑说：“有道理，我承认你在美国总统选举中起了作用并投了我的票。”

赫鲁晓夫、肯尼迪的维也纳会谈虽以失败告终，但两人却互有好感。

赫鲁晓夫怀着懊丧的心情离开维也纳，在回忆录中写他当时的情绪极低：

“我心里加倍感到难过，因为我们的会谈没有为改善两国间的关系创造有利条件，相反，却加剧了冷战，这使我感到担忧。如果重新回到冷战时代，我们将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

赫鲁晓夫对肯尼迪推崇备至，不顾美苏尖锐对立，逢人就吹捧肯尼迪：

“约翰·肯尼迪和我作为各自国家的首席代表，坦率地进行了直接的对话。他在回答我的问题时显得十分自信，并明确谈出自己的观点。这是很了不起的，因而，他立刻赢得了我对他的尊重。可以说，他既是我的伙伴，又是我的对手。从我们各自都坚持不同的立场这一点来说，他是我的对手；但就我们都在进行会谈并相互交换意见来说，他又是我极为可敬的伙伴。据我观察，如果肯尼迪总统能够对和平共处政策有所理解，那么他就会执行和平共处政策，而且他也不会仓促地做出任何可能导致军事冲突的决定。这样的人是值得我尊敬的。”

无独有偶，肯尼迪也怀着闷闷不乐的心情离开维也纳，奥地利外交部长克赖斯基到机场为肯尼迪送行后，马上告诉尚滞留在维也纳的赫鲁晓夫说：

“肯尼迪总统在机场上脸色十分阴沉，看上去心烦意乱。他的面孔变了样，显然，对他来说会谈进行得很不顺利。”

赫鲁晓夫知道他说的话，克赖斯基一定会一字不漏地告诉肯尼迪，于是便满面笑容，以极其理解老朋友的口吻说：

“是的，我看出了他的心情，但这是因为肯尼迪总统对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仍然缺乏了解，他还没有充分理解各种力量的变化，他仍然执行自己前任们所执行的政策——至少在柏林问题上是这样。他还不准备消除在柏林问题上打一场世界大战的危险。我们的会谈是有帮助的，因为它使我们有机会把各自的观点摆出来，由此取得相互了解，但仅仅就此而已，这是不够的。”

赫鲁晓夫对西方人吹捧了肯尼迪后，又滔滔不绝地向中国和东欧国家吹捧肯尼迪：

“我认为肯尼迪比他以前所有总统都聪明。我希望我在共产党内的兄弟们能正确理解我的意思。赞扬一个值得称赞的人，并不意味着给那个人所代表的社会和政治制度涂脂抹粉。肯尼迪是一个资本家，是资产阶级的一个代表人物，但他明白，社会主义阵营在经济和文化领域内的力量已经如此之大，

拥有的科学和技术知识如此之多——其中也包括战争的手段在内——以致美国及其盟国再也不能真的想要发动一场反对我们的战争了。我将永远为此而尊敬他。”

肯尼迪被赫鲁晓夫吹捧得舒舒服服，觉得赫鲁晓夫这个人很有意思，对赫鲁晓夫在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事件上对他的让步念念不忘，更在维也纳会谈中摸到了赫鲁晓夫的底。他不想给赫鲁晓夫造成他是弱者的印象，私下对《纽约时报》记者赖斯顿倾诉衷肠：

“我觉得，赫鲁晓夫好像在说我太年轻，阅历又浅，陷入这样的困境，很难自拔。我们必须消除赫鲁晓夫对我的这种看法，否则双方无法达成任何协议。我们应当立即行动起来。”

肯尼迪总结他在柏林和古巴导弹危机中与赫鲁晓夫相斗的经验教训，认为只有对赫鲁晓夫采取强硬手段才能取胜，他在维也纳就暗下决心，加速向南越派驻军事人员，成立了以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泰勒为首的“特别作战部”，设法控制南越傀儡军队的指挥权，美国派往南越的军事人员数量急剧上升，到1963年1月已达到一万余人。

肯尼迪在柏林、古巴、南越与赫鲁晓夫的较量中都占了上风，他春风得意，向亲密助手吹嘘他在南越的行动说：

“就像在柏林一样，美国部队开进南越，军乐队吹吹打打，群众鼓掌欢迎，但四天以后，人们就把这件事全忘掉了。那时，他们又会对我们说，还得再派些军队来。这就像人喝过一杯酒，酒劲很快就过去了，还得再来一杯。”

毛泽东、周恩来对肯尼迪的看法，与赫鲁晓夫大相径庭。1961年9月28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驳斥赫鲁晓夫之流对肯尼迪的无耻吹捧说：

“肯尼迪上台以来，其所作所为的结果，反而不利于美帝国主义。今年4月3日，我在人大常委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曾经指出，美帝国主义在世界上面临着五大矛盾，这就是它同本国人民的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它同它的同盟国的矛盾，它同民族独立运动的矛盾，以及它同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这五大矛盾，它都是无法解决的。”

周恩来尖锐指出肯尼迪把主要矛头指向中国，实行反华、反共、排挤老殖民主义势力三位一体的政策，看起来气势汹汹，不可一世，但却困难重重：

“肯尼迪上台之后，想解救美帝国主义的经济危机，但他是始终走不出死胡同的。因为他发展军火生产，扩军备战，企图从战争中寻找出路，但是现在还不可能打世界大战。最近肯尼迪在联大的演说，尽管有战争威胁的成分，但是也可以看出，敢于打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很小。军火不能吃，也不能穿，又不能用，生产的军火技术水平提高了，原来的东西就成了废物，这不是最大的浪费吗？……肯尼迪现在着急了，这怨谁呢？还不是他自己造成的？”

毛泽东更集中精力对肯尼迪家族及其本人进行深入研究，认为此人敢于公然派雇佣军进攻古巴，也敢于同苏联在柏林、古巴进行冒险较量，在具有疯狂冒险性的同时，手腕又较艾森豪威尔等圆滑和多样化，擅长搞阴险的两面手法，因而毛泽东在1963年8月8日发表的《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斗争的声明》中，特别提到肯尼迪的这一特点：

“美国黑人斗争的迅速发展是美国国内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日益尖锐化的表现，引起了美国统治集团日益严重的不安。肯尼迪政府采取了阴险的两

面手法。它一方面继续纵容和参与对黑人的歧视和迫害，甚至派遣军队进行镇压；另一方面，又装出一副主张‘维护人权’、‘保障黑人公民权利’的面孔，呼吁黑人‘忍耐’，在国会里提出一套所谓‘民权计划’，企图麻痹黑人的斗志，欺骗国内群众。但是，肯尼迪政府的这种手法，已经被越来越多的黑人所识破。美国帝国主义对黑人的法西斯暴行，揭穿了美国的所谓民主和自由的本质，暴露了美国政府在国内的反动政策和在国外的侵略政策之间的内在联系。”

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对肯尼迪入木三分的分析，在国际问题上创造性发挥道：

“当前世界局势的一个特点是美帝国主义玩弄反革命的两手。这次肯尼迪在联大暴露得更清楚了，他公开表明，美国是假和平，真备战……杜勒斯搞边缘政策，打到边缘就不敢再打了。肯尼迪比杜勒斯进了一步，要打局部战争，但是世界舆论一反对，国内人民一反对，就停一下，这说明美帝的软弱。”

毛泽东、周恩来看到了肯尼迪和美国外强中干的本质，却未料到肯尼迪已走到他生命的尽头。

那时候的肯尼迪可谓红得发紫，春风得意，气壮如牛，美国记者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这样描写处在顶峰时期的肯尼迪，竭力吹捧他说：

“肯尼迪可谓长得最漂亮，穿着最讲究，口齿最清楚，像小羚羊那样优雅。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个无所不知的人，能够在几分钟内吞咽和消化整整一本书；他的眼睛一下子就能抓住冗长文件的要点，他有比专家们更专门的知识而使专家们羞愧。他是一个在任何地方都可能出现的人；没有一个想打瞌睡的属员敢于肯定他不会来电话或突然出现；每个宴会的女主人都希望他会突然光临，他是一个万能的人，能亲自指挥和监督整个班子进行工作；他并不需要艾森豪威尔式的参谋机构；他比狮子更勇猛；比狐狸更机灵。他简直是个超人！”

那时候，肯尼迪趾高气扬，心情舒畅，话也格外多，常常这样用打油诗和总统特别安全助理麦乔治·邦迪开玩笑：

漂亮的小伙子麦乔治·邦迪，耶鲁毕业是星期一，竟然在下个星期天，坐上了哈佛院长的交椅。

肯尼迪精力旺盛，又生性多情，即使在蜜月里也忘不了与所

遇到的每一个稍有姿色的女人调情，他对漂亮女人的毫不掩饰的兴趣使他的妻子杰奎琳很恼火，因而当肯尼迪要到得克萨斯州竞选时，杰奎琳积极要求陪伴丈夫前往，而肯尼迪也愿意让这个擅长做调解、周旋工作的杰奎琳为其排难解忧。因而1963年11月22日，这一对年轻夫妇欢欢喜喜地乘坐总统“空军一号”专机到达多佛机场。

得克萨斯州州长康纳利陪同肯尼迪和杰奎琳坐在一辆林肯牌敞篷轿车的后排座位上，在浩浩荡荡的警察车队保护下驶向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中心。三人中间放着一束盛开的长茎红玫瑰，红玫瑰与杰奎琳身穿的粉红草毒色毛料套服的颜色争奇斗艳，绚丽夺目，引来欢迎人们的声声赞叹，肯尼迪和杰奎琳兴高采烈地向欢迎的人们挥手致意。

当浩浩荡荡的总统车队经过得克萨斯学校图书馆时，从六层楼的一个窗户里突然射出一颗子弹，接着响起一阵震耳欲聋的枪声。

美国总统的车队立刻大乱，人们首先关心的是总统的安危，只见肯尼迪

已躺在血泊之中，头部、肺部中弹，脑浆四溅，鲜血满车。

杰奎琳大惊，立时吓呆了，半天才反应过来，放声大哭：“上帝啊，他们在干什么？他们杀了杰克！他们杀了我丈夫！杰克！

杰克！”

得克萨斯的枪声，震动了华盛顿，震动了全世界！

肯尼迪居然被刺！美国文武官员大惊，急忙下令逮捕凶手，把肯尼迪紧急送往帕克兰纪念医院，经一个小时的紧急抢救无效，43岁的总统伤势过重，不治身亡。

美国军警如临大敌，大肆搜捕，终于将嫌疑凶手奥斯瓦德抓获，24岁的凶手自称是“公平对待古巴委员会”主席，美国警方正要循此线索追查破案，两天后凶手又被达拉斯夜总会老板杰克·鲁比杀害。

继任总统约翰逊对肯尼迪一直没有好感，常常情不自禁地怀有几分酸溜溜的嫉妒之心，认为肯尼迪年轻、英俊、具有贵族风度，从来不把55岁的副总统约翰逊放在眼里，只是通过他获取美国南方各州的绝大部分选票，肯尼迪私下向助手肯尼恩·奥唐奈透露其中的奥妙称：

“我今年才43岁，是身体最强壮的总统候选人……我不会在任职期间死去，因此谁当副总统都无关紧要！”

然而，肯尼迪却偏偏年轻就惨死在总统任期之内，可见人真有旦夕祸福，办事说话总要留有余地，万不可太目中无人，这正是：

四十三岁进白宫，勾结赫氏霸宇中。

狂言不会任年死，偏死任年恶满盈！

约翰逊料想不到素所忌恨的肯尼迪就这样早早死于非命，并使他出乎预料地登上停靠在达拉斯机场的“空军一号”总统座机，由地方法院女法官休斯女士主持，宣誓就任第三十六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夫人杰奎琳就站在他的身旁，玫瑰色的裙子上还沾有肯尼迪被击毙时的点点血迹。约翰逊感慨恶梦般的肯尼迪时代已经逝去，他约翰逊飞黄腾达、展翅横飞的时代业已到来。

赫鲁晓夫得到肯尼迪遇难身亡的消息，一下子惊呆了，一屁股跌坐在宽大的沙发里，痴呆呆盯着天花板，一句话也说不出，只见眼泪不停地流了下来。

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赫鲁晓夫对肯尼迪可以说是一片痴心，一心想与肯尼迪搞缓和，发展美苏既争夺又缓和的势头。

赫鲁晓夫万万没有想到，他的一腔宏愿正要通过勾结肯尼迪共同实现时，肯尼迪却撒手离他而去，他怎能不悲痛欲绝呢？

一连几天，赫鲁晓夫不吃不喝，失魂落魄，在办公室里发痴似地来回踱步，又闹着要亲自去华盛顿参加肯尼迪的盛大葬礼。苏联其他领导人一致反对，认为此时让苏联第一把手去美国参加肯尼迪的葬礼是不合适的，赫鲁晓夫不得已才派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赴美。

美国新总统约翰逊出身于三代议员世家，29岁就当选议员，作为肯尼迪的副总统，曾以总统特使身份出访过30多个国家，发表过150多次演说，现在意外登上总统宝座，怕人说他不是凭自己的实力上台，因而总觉得肯尼迪的阴魂不散，处处注意提高自己的声望和地位。

约翰逊很感兴趣地接待了苏联吊唁肯尼迪的代表米高扬。

约翰逊早就听到过米高扬的大名，知道他是一个擅长搞微妙外交的老牌布尔什维克，处事精明，人们甚至说他神通广大，能成功地向生活在冰天雪

地里的爱斯基摩人推销电冰箱。

约翰逊把米高扬作为赫鲁晓夫的特别代表予以接待，他向米高扬保证，他将始终不渝地为缓和世界紧张局势做出贡献。他从国务卿腊斯克那里得知赫鲁晓夫醉心于缓和，便托米高扬向赫鲁晓夫转交一封信，希望继续改善美苏关系，愿为解决悬而未决的国际问题寻找办法。

赫鲁晓夫又对约翰逊大有好感，认为约翰逊也是与他一起搞美苏缓和、共同称霸世界的“懂事理的人”，于是脑瓜一热，提出一个简易的倡议，要求美国和各国政府集体做出保证，不使用武力改变现有的边界线，赫鲁晓夫起劲地向美国总统约翰逊游说：

“目前的边界线是在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下形成的，因此在领土纠纷中，很难说清谁是谁非。有些国家分成了两部分（朝鲜、越南、德国）。这些国家的人民渴望统一的感情，当然应该得到理解和尊重。统一问题应该让这些国家的人民在没有外来干涉和压力

的情况下，自然是在不被占领的情况下，来研究解决，但事实上，南朝鲜和南越仍被外国占领。”

刚上台的约翰逊立即对赫鲁晓夫的倡议做出友好的反应，开始进行旨在阻止中国等无核国家拥有核武器的《防止核武器扩散条约》的谈判，但不久即由于发生东京湾事件，美国开始对越南北方进行轰炸，而使美苏关系又紧张起来。

毛泽东和赫鲁晓夫是长期斗争的老相识，两人的关系错综复杂而又微妙有趣。

赫鲁晓夫对毛泽东是既恨又怕，既感到才智无法与毛泽东相比，又不甘居毛泽东之下，总想对毛泽东发号施令。毛泽东从心里看不起赫鲁晓夫，但能从大局着眼，长期对赫鲁晓夫做社会主义阵营的首领予以支持，但在维护中国主权问题上毫不让步，敢于同赫鲁晓夫的背信弃义和霸权主义行径做坚决斗争。

赫鲁晓夫承认“毛泽东简直就是隐藏自己思想和意图的大师”，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对毛泽东大加攻击、尽量贬低，但也说了一些真话：

“自我第一次认识毛泽东起，我就认定并告诉我们的同志，他绝不会听从国际共运内部超过他自己的党之上的任何别的共产党差遣，他绝不会忍容这样的事……毛泽东也许是个民族主义者，但他决不是蠢人。”

毛泽东承认对赫鲁晓夫有一个认识过程，1964年1月17日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柯弗兰、爱德乐、爱泼斯坦、李敦白等人谈话时，回忆他与赫鲁晓夫的交往历程说：

“苏共二十大之后，我们已经感到赫鲁晓夫不对头，但是从那时到1958年上半年，我们是采取帮助他的态度，因为我们当时考虑苏联人民要换一个领袖是不容易的。后来在1958年发生了海军基地问题。那年赫鲁晓夫来过北京一次。为什么来呢？苏联驻华

大使同我们谈海军基地问题谈翻了，赫鲁晓夫只好自己来收拾。我对他说：‘把中国的海岸线都给你好了’。他说，‘那你做什么呢’？

我说，‘我上山打游击’。他说，‘打游击没有用’；我说，‘你把我的鼻子都塞住了，我不去打游击怎么办’？”

毛泽东以幽默的语言说到此处，看诸位老朋友一眼，见大家对他的话都能领会，就怀着激愤之情继续说：

“然后就是1959年的中印边界事件。赫鲁晓夫在访美前通过塔斯社发表声明，在中印边界事件上表示‘中立’。访美后，他又到北京来了。这次他谈到台湾问题，要我们用苏联过去对远东共和国的办法来对待台湾。我对他说，‘远东共和国是你们建立的，蒋介石集团可不是我们搞起来的’。另外，他还要我们放那时关在监狱里的四五个美国犯人。两个问题都没谈成，他说：‘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对我说过，你这次去北京一定是白跑！’”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听毛泽东说得那么有趣，不由笑出声来，爱泼斯坦等人也跟着笑了起来，遂使接见气氛十分活跃，毛泽东的情绪受到感染，语调转为轻松活泼：

“从苏共二十大到去年（1963年）7月，我们比较被动。现在我们转入反攻，有大闹天宫的势头，打破了他们的清规戒律。他们的那些清规戒律，不能完全服从！他们骂我们是教条主义、托洛茨基主义、专讲空话、假革命、民族主义，可是他们偏偏怕我们的‘空话’。口里说我们讲的是空话，实际上是把它当成瘟疫，封锁得那么厉害，甚至把过去用来干扰美国之音的电台也用来干扰我们的广播。”

接着，毛泽东把话题转到人们最关心的赫鲁晓夫要求停止公开争论上来，客人们都想知道中国的态度，只听毛泽东娓娓而谈：

“现在他们要求停止公开争论，紧张得很。我去年3月间对苏联大使说，你们说我们是教条主义、托洛茨基主义、专讲空话、假革命、民族主义，如果我们真是这样，那你们当然应该批评，就放手批评好了。他说这样下去不得了。我说，打打笔墨官司有什么了不起呢？第一，大不会踢下来；第二，山上草木照样长；第三，女人照样生孩子；第四，河里的鱼照样游。不信，你到河边去看看。他们最近的来信还引了我的一段话。停止争论不是一方说了算，而必须双方都能接受公平协议。双方不止是两个党，而是几十个国家的党。因此，争论很难停下来。”

毛泽东以他那卓越的洞察力，发现赫鲁晓夫和约翰逊都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幽默地以唯物辩证法分析说：

“有些同志担心苏、美合作对我们不利。我总相信《红楼梦》上王熙凤说的那句话，‘大有大的难处’。现在，美、苏两国都很困难。美国政策委员会主席罗斯特曾发表一篇文章，基调是说美苏都碰到了许多困难，而且是没法解决的。我也不认识这个人，他同我的某些想法不谋而合，差不多。美国不论国内、国际到处都碰钉子；赫鲁晓夫也是这样。不要忘记这一点，还是《红楼梦》上冷子兴说的，‘百脚之虫，死而不僵’。美国《锤与钢》杂志也说：美国像一株空了的大树，里边已被虫子咬空了，外边还枝叶茂盛。”

不久，赫鲁晓夫处境更加困难，毛泽东专门发表《赫鲁晓夫的日子不好过》的谈话，对赫鲁晓夫分析得可谓入木三分，他分析赫鲁晓夫攻击中国的原因说：

“无论如何，中国除了手榴弹，只是多了几个人。在赫鲁晓夫看来，多几个人，只不过是一堆肉，而且他还说，现在中国是5个人穿一条裤子，大家喝清水汤。其实，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正是他那里裤子太少而清水汤太多的时候。他的日子比我们好过不了多少，他在最困难的时候讲这种话，是为了向人民说：看，我们国家多了不起，裤子不少，清水汤不多。”毛泽东深刻分析国际和苏联形势，指出赫鲁晓夫好日子不多了：

“赫鲁晓夫的日子不好过。据统计，从苏共二十大以来，苏共

主席团的老人已换得剩不了几个。这个现象说明那里不稳定……

实际上，赫鲁晓夫在社会主义阵营的 13 个国家中，支持他的并没有占多大的多数。罗马尼亚就同他不一致，波兰也只能算半个支持。他是要控制别人，像美国人一样。他要人家搞单一经济，这行不通，罗马尼亚不干，古巴也在同他吵。”

诚如毛泽东所预料，赫鲁晓夫执政的日子屈指可数了，当时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的勃列日涅夫等人早在一年前就开始了把赫鲁晓夫赶下台的密谋活动，但进行得并不顺利，赫鲁晓夫听到了一些风声，便在 1964 年 10 月 1 日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气急败坏地发出警告：

“朋友们，不知你们为什么想要造我的反，当心点儿，万一出什么事，我会像对付狼崽子那样把他们打败！”

赫鲁晓夫把勃列日涅夫等人吓得灵魂出壳，这些人以为密谋败露，大祸将临头了。但是，灾难没有发生，赫鲁晓夫让米高扬调查事情真相，自己到南方休养去了。

10 月 11 日晚，赫鲁晓夫又得到有人“谋反”的报告，就往莫斯科打电话威胁说三四天后“给点儿厉害看看”。

在莫斯科留守的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柯西金、中央委员波利扬斯基知道大事不好，急忙给正在柏林访问的勃列日涅夫打暗语报警电话：“不要弄错，莫斯科天气很好，三四天后 H.C. 回来。”

勃列日涅夫知道事态紧急，当即回答：“明白了，我现在就去机场，已下令准备飞机紧急起飞，两小时后与你们会面。”

勃列日涅夫匆忙自柏林赶回莫斯科，把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和克格勃头子谢米恰斯内争取过来，在力量对比上占了优势，10 月 12 日通知赫鲁晓夫参加中央主席团会议。

赫鲁晓夫还被蒙在鼓里，10 月 13 日与米高扬飞回莫斯科，谢米恰斯内立即解除了赫鲁晓夫接待室的警卫，又撤换了其府邸和别墅的卫队。

在克里姆林宫召开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会议上，勃列日涅夫带头向赫鲁晓夫进行责难和围攻，柯西金等一哄而上，赫鲁晓夫吃惊地张开大嘴，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拼命反驳、辩解，但根本没人听。

车轮战战至第二天，赫鲁晓夫看大势已去，长叹一声，沮丧地愿意投降：“我请求你们让我写一份辞职报告，我签字。”

10 月 14 日中午，勃列日涅夫请赫鲁晓夫参加午宴，赫鲁晓夫觉得无脸参加，借口身体不适要回家，也没人去挽留他。

在下午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决定由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分别出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

在当晚 6 点继续举行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苏斯洛夫作了《关于因赫鲁晓夫错误行为在中央主席团造成的不正常局面》的报告，接着宣读了赫鲁晓夫的辞职申请。

于是，1964 年 10 月 15 日塔斯社发布了一条震动苏联和全世界的消息：

“赫鲁晓夫已接受中央委员会对他提出的主要批评。他从自己的健康状况、年龄考虑，决定不再担任目前的工作，他本人已正式提出辞职。”

10 月 16 日，苏联驻中国大使契尔沃年柯向中国通报了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也就在这一天，毛泽东下令进行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并取得成功。

这两条表面互不相关的爆炸性消息，一下子成为震动全世界的特大新闻。各国记者对此议论纷纷，大发宏论，不少记者竟认为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把不可一世的赫鲁晓夫一下轰下了台！

热情豪放的著名诗人、外交部长陈毅认为这是双喜临门，可谓大大的巧合，他豪情满怀，灵感大发，做《感事》诗以抒胸怀。这首诗因准确而形象地道出了亿万中国人民的心声，遂不胫而走，被广为传颂：

历历眼前事，突兀上下台。

爆炸天不坠，造孽地难埋。

为群荣雁奴，作侏耻鹤媒。

历史最公正，判决终到来。

正确能领导，错误必下台。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穷凶极恶 约翰逊扩大侵越战争 屠心叵测 柯西金插手巴黎和谈

话说古巴导弹危机、中印边界战争之后，美国、苏联、中国斗争的热点又逐渐转移到印度支那地区，在越南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几十年的反对美、法帝国主义侵略过程中，毛泽东、周恩来、胡志明、斯大林来往密切，肝胆相照，结下了深厚友谊，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美谈。

1945年8月，胡志明领导越南人民举行八月总起义，9月2日在已亭广场发布《独立宣言》，宣告越南民主共和国诞生，但美国支持法国远征军9月23日在西贡登陆，越南人民奋起以棍棒对抗敌人的飞机大炮，面临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

在越南的生死关头，新中国于1949年10月1日宣告成立，并立即对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表示支援。

当时，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黄杰率领残兵败将3万余人逃往越南，白崇禧残部2.7万人亦由广西逃入越南。法国殖民当局勾结逃越蒋匪军，企图将越南共和国扼杀在诞生之初。

在越南危急时刻，中越两党和政府指示两国军队密切配合，击退法国和国民党军队的猖狂进攻，打破了国民党残余部队企图把越南作为遁逃所和卷土重来的梦想。

1950年1月18日，新中国成立不到4个月，就首先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尽最大努力支援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这对美国支持的法国侵略者是个极大打击。为纪念中越建交，越南政府决定把1月18日定为越南外交胜利纪念日。

1月30日，苏联与越南建交，东欧国家亦相继承认越南。胡志明高兴来到北京，与毛泽东、周恩来亲切会谈，代表越共中央向中共中央提出援越抗法的请求。

胡志明与毛泽东、周恩来的会谈因毛泽东访苏而中断。2月初，胡志明与周恩来一同前往莫斯科。

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苏联政府16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盛宴招待毛泽东、周恩来和卢国代表团全体人员，胡志明也应邀参加。

斯大林情绪高涨，手举著名烟斗不断同毛泽东、周恩来、胡志明亲切交谈，不时开些玩笑。

胡志明见中苏友好关系取得巨大进展，不仅触景生情，便想借此良机推动越苏关系向前发展，就满怀希望之情说：“斯大林同志，你对越南革命有什么指示？”

斯大林对此毫无思想准备，爽朗地以笑掩饰说：“我怎么能指示你？你是‘总统’，官比我还大呢！”

胡志明不失时机地以半开玩笑方式道出真意：“你们同中国同志订了个条约，我也正在这里，咱们也订个条约吧！”

斯大林未考虑这个问题，便以胡志明这次是秘密访苏为由反问道：“那人家要问你是从哪里突然冒出来的呢？”

胡志明从容而答：“那好办，你派架飞机把我送到天上转一圈，然后再找些人到机场欢迎我，在报上发个消息不就行了？”

斯大林笑道：“这才是你们东方人特有的想象力。”

胡志明见斯大林那么和蔼可亲，便兴致勃勃地向斯大林讲述越南人民正在进行的反法斗争，请求苏联提供援助，特别是支援武器弹药。斯大林正在集中精力考虑中苏关系问题，对胡志明的援助要求未作考虑，仅答应给半吨治疗疟疾的奎宁。

胡志明叹口气，从皮包中拿出一本苏联杂志，请斯大林签名留念，斯大林欣然挥笔签名，胡志明将此视为越苏友谊的珍贵文献仔细保存，后来却多次查找都没有踪影，使他极为惋惜。他万万没有想到，堂堂苏联大国领袖斯大林，对给胡志明签名留念又十分后悔，特意派克格勃人员悄悄从河内偷回莫斯科。

胡志明向斯大林要求援助碰了钉子，就更觉得“越中两国人民数千年来血脉相通，在历史上素称兄弟之邦，越中原是一家”，向中国再次提出援越抗法的要求。

毛泽东、周恩来慨然相允，中央军委4月17日下达指示，任命韦国清任援越军事顾问团团团长，调集79名干部、250名随员赴越，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亲自接见援越人员，向他们提出要求：顾问团的任务是帮助越南组织、建设一支革命化的正规军队，协助组织指挥运动战和较大规模的运动战。当顾问是当参谋，要多做调查研究，想办法，出主意，不可包办代替，更不能当“太上皇”，发号施令。一定要戒骄戒躁，谦虚谨慎，诚心诚意帮助他们。

从1950年4月起，中国的援越物资源源不断进入越南，又应越方要求派陈赓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赴越指挥边界战役。胡志明信任地握着陈赓的手说：“部队都交给你指挥了，但有一条，只许打胜，不许打败。”

陈赓不负胡志明厚望，指挥越军奋战7昼夜，全歼法军两个精锐兵团，又乘胜发动攻势，取得边界战役巨大胜利，然后载誉归国，由韦国清继续带领顾问团协助越军取得奠边府等一系列战役的胜利，宣告了法国侵越战争的彻底失败。

在1954年春举行的日内瓦会议上，中苏越三国领导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

三国代表团首先在莫斯科召开预备会议，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周恩来、胡志明、范文同等参加会议。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说胡志明的印象使他终生难忘：

“在我的政治经历中，我接触过许多人物，但是胡志明给我一种非常特殊的印象。信教的人常常讲起那些神圣的信徒。那么，他就是像圣徒那样生活，那样感动人。胡志明就像那些圣徒中的一个，他是一个革命的圣徒。我始终忘不了他的眼神，他凝视人们时眼睛里闪耀着一种特殊的真诚和纯洁。这是一种高尚的共产主义者的真诚，是在原则上和实践上献身革命事业的人的纯洁。他的公正和他的那种确认共产主义事业是越南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正义事业的不可动摇的信念，足以感动任何人。他的每一句话好像都反映出他的信念，即所有共产主义者都是阶级兄弟，因此，一切共产主义者在相互交往中都应该开诚相见和忠诚老实。胡志明真是共产主义的‘圣人’之一。”

赫鲁晓夫当时把越南面临的问题看得很严重，他忧心忡忡他说：“形势很严重，越南的抵抗运动处于崩溃的边缘。越南游击队都指望日内瓦会议能产生一个停火协定，使他们能保住越南人民在反对法国占领者的斗争中所赢得的战果，因为当时河内仍牢牢地掌握在法国人手中。”

出乎赫鲁晓夫的预料，由于周恩来、莫洛托夫、范文同率领中苏越三国代表团在日内瓦密切协同动作，由于中国帮助越南取得奠边府战役的巨大胜利，越南的抵抗运动胜利了，因此，赫鲁晓夫惊喜他说：

“奇迹出现了。当各国代表团到达日内瓦出席会议时，越南游击队赢得了伟大胜利，攻克了奠边府要塞……当我们从日内瓦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坦白他说，我们是又惊又喜地喘了一口气。我们并未指望得到这样的东西。十七度线，是我们自己的最高要求。我们指示我们在日内瓦的代表，要他们提出分界线还要向南移到十五度线，这仅仅是为了讨价还价。经过一段时间的争论之后，我们接受了孟戴斯—弗朗斯的建议，并签订了条约，我们成功地巩固了越南共产党人所取得的战果。”

胡志明绝没有想到，越南刚刚打走了法国狗，又进来了美国狼。

美国总统肯尼迪野心勃勃，在越南推行“特种战争”政策，侵越美军很快达到一万余人；约翰逊上台后更变本加厉地使侵越战争升级，大量向越南增兵。

1964年8月2日，约翰逊精心制造了“北部湾事件”：派美国驱逐舰“马多克斯”号入侵越南领海北部湾，声称美舰受到越南的袭击，以此取得美国国会授权：一旦美军遭受武装攻击，约翰逊有权下令采取一切必要的反击手段。

8月5日，约翰逊悍然派美国飞机轰炸越南北方沿海一些港口，把侵略战火烧到了越南北部，接着又派美国地面部队在南越岬港登陆，开始了以美军为主、以“南打北炸”为特点的“越南局部战争”。

8月5日，周恩来总理、罗瑞卿总参谋长致电胡志明主席、范文同总理、文进勇总参谋长，建议越方“查清情况，议好对策，以利行动”。

翌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郑重宣告：“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绝不会坐视不救。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战火是美国点起的，美国既然这样做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就取得了反侵略的行动权利，一切维护日内瓦协议的国

家也就取得了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反侵略的行动权利。”

为表明中国人民的坚定决心，中国各地举行有几千万人参加的抗美援朝大示威，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参加了北京100万人的声援大会，中国政府庄严声明：

“中国将给予越南人民一切必要的物资支援，还准备在越南人民需要的时候，派遣自己的人员同越南人民共同战斗。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可靠的后方。中国人民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甚至不惜民族牺牲，竭尽全力，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进行到底。”

在中国大力支持下，越南南方人民武装1965年2月7日采取闪电式攻击，取得波来古大捷，打死打伤美军234名，击毁击伤美机31架，破坏美军营房52所。侵越美军司令威斯特摩兰大惊，火速赶到波来古，只见尸横遍野，飞机残骸遍地，不由连声感叹：“真糟糕，太糟糕了！”

约翰逊的欲望没有止境，办事又不深思熟虑，因而头脑发热，疯狂扩大侵越战争，戴维·哈尔伯斯但在《出类拔萃之辈》一书中人木三分地这样刻画他：

“约翰逊的特点就是，他能叫别人离开他们既定的路线而为他所驱使。

他的窍门是：面对面地同人家短兵相接。他对此深信不疑，几乎是相信过头了。他不是一个读书人，不善于思索，也不相信历史有自己的规律。他认为，什么事情都是可以用手段来办成的，只要同领导人谈通了，争取他们支持就行了，归根结蒂，他认为每个人都可以收买。他这种思想及他本能地老是把任何事情都归结到个人，是使他陷入越南泥淖的部分原因。他认为，越南问题不过是他跟胡志明两个人单枪匹马进行决斗而已。他揣摩胡志明的要价和弱点，考虑轰炸北越好呢，还是出兵威胁好，过后再给胡志明一块糖，给予大量的经济援助和进行区域性的开发——提出一个湄公河三角洲的开发计划。可是，他这次发现他的对手是一个真正不屈的革命家，是一个没有任何价钱可以收买得了的人，是任凭约翰逊有多少西方炸弹和美元也无法使他折腰的人。”

约翰逊认为，同中国或苏联打仗才算是战争，“北越这个四等小国算个屁”！同胡志明打不算战争，炸也得把胡志明炸垮！因而，约翰逊鲁莽地决定对北越实施大规模轰炸，他模仿肯尼迪的豪言壮语说：

“我们爱好和平。为了我们自己 and 全人类，我们将尽一切可能来维护和平，但是我们更酷爱自由。我们将接受一切挑战，我们将对一切威胁做出回答。我们将付出一切代价，以确保自由不从地球上消失！”

约翰逊的侵越政策犹如在陡峭山坡上下滑的雪撬，迅速滑下危险的深渊：1965年2月13日他决定对北越实施持久的大规模轰炸，9天后，美国侵越部队司令官威斯特摩兰要求向越南派遣两营美国海军陆战队，以保证岷港美国航空基地的安全。

威斯特摩兰是约翰逊最喜爱的将军，不仅仪表堂堂，擅长辞令，对约翰逊绝对忠诚，而且有些文学爱好，曾给约翰逊背诵过英国著名小说家、诗人拉迪亚德·吉卜林的一首诗：

倘若你能同民众共处而保持你的美德，或同帝王交游——又不失平民本色，倘若敌人和密友都伤害不了你，倘若你尊重别人而又不卑躬屈膝，倘若宝贵的光阴，你不虚度点滴，争分夺秒，不失时机，那整个大地及其万物都将属于你，

而且——更重要的是——孩子啊！

你将是一个堂堂的大丈夫！

不喜欢读书的约翰逊对威斯特摩兰居然能背诵英国著名诗人的诗大感惊讶，认为真是文武兼备的美国将军，又只要求增加两个营，便点头应允。

从此，美国军队一个营一个营像添灯油一般开往南越，加之对北越的狂轰滥炸，侵越战争逐步升级，胡志明面临沉重压力，1965年2月中旬秘密到长沙向毛泽东求援。

毛泽东与胡志明亲切握手，热烈拥抱。

毛泽东见胡志明仍穿那身米黄色咔叽中山装，长长的胡须已经灰白，身体消瘦，满面愁容。他知道胡志明原有一个女友，但在对敌斗争中牺牲了。胡志明一直深深怀念这位女友，没有再找对象，毛泽东便热情地主动开口说：

“胡主席，你来自越南，我在湖南，咱们一家子嘛！有什么困难？要人有人，要物有物，你说。”

胡志明叙说约翰逊又轰炸又增兵，勃列日涅夫不真心支援，看来得主要依靠中国帮助，然后从中山装的口袋里摸出一张条子一声不吭交给主人。毛泽东接过一看，原来是请求中国帮助修建河内以北12条公路的示意图，便给

周恩来打电话要他尽快落实。

3月1日，周恩来乘飞机赶往河内，在河内西湖别墅与胡志明、黎笋进行具体商谈。胡志明与周恩来私人关系极好，手捻长须询问对勃列日涅夫的看法，周恩来坦然相告：

“赫鲁晓夫下台，苏共新领导上台，我们总认为他们会有些变化，因此，建议我们共同去庆贺，看一看，但结果很使我们失望。对苏共新领导，我们认为不能只看一次，而要多看一看。经过这几个月，现在看得很清楚了，苏共领导执行的就是赫鲁晓夫主义，根本不可能改变！”

4月初，黎笋访华，要求提供援越部队：“我们想要一些志愿的飞行人员、志愿的战士……其他方面的必要人员，包括公路、桥梁等方面的人员都在内。”

周恩来召集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进行紧急研究，胡志明仍不放心，又秘密赶到长沙，同毛泽东、周恩来商谈请中国尽快派兵问题。毛泽东、周恩来请董必武陪胡志明到黄山休息，等候消息。

在黄山的18天中，胡志明无心欣赏幽静迷人的美景，太极拳也时断时续，人间少有的黄山瀑布的隆隆巨响，在胡志明听来却像是美国飞机轰炸河内的惊天动地的枪炮声。

善解人意的董必武想到毛泽东、周恩来的重托，就挥笔写下一首别有风味的黄山诗赠胡志明，想以诗词互答来陪客人渡过黄山的等候消息的难挨时光：

美帝横行侵越南，三军十万逞凶顽。

披发纓冠将往助，那能闲逸看青山。

胡志明看罢，更思念战火纷飞的越南战场，根本无心思作诗酬答，董必武笑着又写一首绝句相赠：

胡公更是当事人，好整以暇斗强横。

既荷子肩不愿卸，定将纸虎付牺牲。

董必武见胡志明仍无意酬诗，就又写诗两首，便成为《别黄山四绝》赠胡志明，胡志明觉得盛情难却，便写《游黄山日记诗》回赠董必武：

董公赠我以长诗，我欲作诗奉和之。

可是抗美救国事，完全占领我心思。

董必武看罢，更对胡志明增加了几分敬重之感，正不知如何去劝，突然接到中国援越先头部队浩荡开出睦南关的消息，赶快告诉胡志明这个好消息。胡志明认为1965年6月9日是令人难以忘怀的一天，便匆匆动身回国。

周恩来与胡志明私交最好，但为胡志明找老伴的事却使他极其为难。

原来，越南人都把胡志明叫胡伯伯，这就使他不好从越南人中找对象，越共中央一个负责同志向陶铸提出给胡志明在中国寻找合适的伴侣，陶铸热情帮忙，在广东找了个女医生，陶铸兴冲冲来找周恩来商量，周恩来考虑到越南党内亲苏派的反对意见，为难他说：

“好事是好事，但又十分复杂。越南党内的情况你们考虑过没有？他们党内的一些同志对我们的态度你们考虑过没有？……在这种情况下，这种事就会带有政治色彩，成为政治问题。那些同志就更认为我们想控制越南党，这就不利于越南党，这就不利于越南党内的团结，更不利于中越两党的团结，甚至会影响越南人民的抗美斗争。”

周恩来将此事提交越南党决定，一直没有下文。周恩来见给老朋友在找

伴侣问题上帮不了忙，就在抗美大业上帮助胡志明给美国总统约翰逊当头一棒，请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向约翰逊传去四句话：

（一）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

（二）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那就是，如果亚非或世界上的任何国家遭到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是一定要给予支持和援助的。如果由于这种正义行动引起美国侵犯中国，我们将毫不犹豫地奋起抵抗，战斗到底。

（三）中国是做了准备的，如果美国把战争强加给中国，不论它来多少人，用什么武器，包括原子武器在内，可以肯定他说，它进得来，出不去。

（四）战争打起来，就没有界限。

约翰逊外表看来慈眉善目，风度翩翩，聪明过人，实则学识浅薄，野心勃勃，又特别爱故做风雅之态。他听说毛泽东酷爱游泳，快飞如鱼，得到赫鲁晓夫的大力称赞，便也对游泳突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这一天，约翰逊正游得起劲，回头一看国务卿腊斯克、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等人立在游泳池边看热闹，便向他们大发雷霆，要助手们都下来游泳。

腊斯克是约翰逊的“受气包”，他知道这位总统爱找他人的毛病，不听话就借此整人，深知这是“典型的约翰逊行为”，只得换上泳裤，招呼众人跟着约翰逊跳入游泳池胡乱扑腾，倒也弄得欢声笑语，热闹异常。

突然，白宫工作人员赶来报告有周恩来紧急传话，约翰逊不敢怠慢，急忙换上礼服，到白宫会客室接见已基斯坦驻美大使，接受了巴基斯坦的外交文书，脸上的傲气顿时烟消云散。约翰逊急忙召集文武大员商量对策，大肆叫嚷“必须打败越南人，使美国在世界上雄风长在！”

新任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较有头脑，反对派飞机轰炸中国说：“不能轰炸中国，不能忘记朝鲜战争的教训，不要小瞧了毛泽东、周恩来！”

一提到毛泽东、周恩来，约翰逊及其文武大员立时老实了许多，一致认为应选择既能征服越南又不使中国人参战的最佳方案。

约翰逊牛气冲天，拍着肚皮下令每天出动 3000 架飞机，对越南实施狂轰滥炸，以“滚雷行动炸服胡志明”；对中国，约翰逊决定下点“毛毛雨”，而且要逐步升级，又下令注意不要激怒毛泽东，看中国的反应再决定下一步行动。

于是，美国开始更大规模轰炸北越，又从 1965 年 7 月 11 日派飞机侵犯中国云南河口领空，对中越实施战争升级。中国则从 1965 年 10 月开始每年派出十几万大军赴越作战，到 1968 年 3 月共派出 30 多万人，最高年份达 17 万多人。中国援越部队同越南人民军并肩作战，用鲜血和生命保卫越南北方领空，保证越南北方运输线畅通无阻，使越南人民军能抽出兵力到南方作战，一千多名中国战士的遗骨就地安葬在越南国土上。

随着越南战争的深入发展，勃列日涅夫改变了赫鲁晓夫对越南抗美救国战争不积极支持的态度，让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率领苏联党政代表团访问越南，恰遇美国飞机对越南北方洞海市和永灵地区进行轰炸，柯西金谴责美国轰炸越南，指出“越南是社会主义阵营在东南亚的前哨”，并发表苏越联合声明对越大力支持。南越民族解放阵线也借柯西金访越之机连续发动攻势，取得抗美斗争的巨大胜利。其后，黎笋多次访苏，签订了苏联向越南提供无偿经援、军援和长期贷款的协定。

柯西金往返河内都经过北京，周恩来每次都亲自到机场迎送并进行耐心

的会谈。2月11日在送柯西金赴机场途中的轿车上，周恩来为改善中苏关系诚恳地提出中国的建议：

“中苏双方对外交问题、国际问题是需要经常交换意见的。我们之间的观点和政策可能有不同意见，可以通过不公开的、非正式的方式交换意见，终究能够了解。不求一次了解一切，多次交换意见以后，总会了解对方的意见是什么。”

约翰逊在扩大侵越战争的同时，出于各种需要玩弄和谈阴谋，提出与越南进行无条件讨论，胡志明要求约翰逊起码要无条件停止轰炸北越。

约翰逊被胡志明顶回，又把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唤来，用恶狠狠的目光盯着吴丹，要他向中苏越试探和谈的可能性。中国《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正告吴丹》的社论，指出联合国从来没有谴责美国侵略越南的罪行，态度不公正，联合国在解决越南问题上没有任何发言权，根本用不着联合国插手越南问题。

约翰逊又通过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英国首相威尔逊、法国总统戴高乐、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提出“和谈”要求。周恩来1965年3月30日访问阿尔及利亚时对其总统本·贝拉揭露约翰逊的阴谋说：

“越南问题完全是美国搞出来的乱子。本来，根据1954年的日内瓦协议，法国要从越南撤军，两年后南北越实现和平统一，但是美国入侵阻止了南北越和平统一的实现。目前美国想以扩大战争吓退越南，要越南在轰炸下屈服，同意和谈。美国还想吓唬中国，来接受和谈。美国还经过苏联、英国、法国甚至于其他国家进行和谈活动。美国妄想通过和谈，取得它在战场上所得不到的东西。‘无条件停火’——这就是要南越人民停止武装斗争，要北越不能再援助南越的斗争，使南越伪军可有一个喘息机会，使美国在南越的武装力量也可以加强。”

周恩来激昂慷慨，剑眉一挑格外强调说：

“现在南越无条件停火，不行，这意味着南越再一次受奴役，继续处在傀儡政权统治下。无条件停火的活动来自各个方面，英国也在各方面活动，有的是美国直接指使的，有的是间接指使的。也有好心肠的人认为和谈可以解决问题，但客观上都不利于南越人民解放。”

作为世界一流外交家，周恩来对约翰逊及其侵越政策有独到看法。1965年5月28日晚在广州白云山宾馆，回答印度尼西亚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苏班德里约的提问时，入木三分地谈称：

“美国没有做好战争准备，就在越南横冲直撞。它的一切估计都是错误的。它提出‘逐步升级’，意思就是走一步看一步，这是军事上最忌讳的。泰勒、约翰逊等是极端的实用主义者，他们没有长远的战略方针。”

不少国家领导人不太理解中国那么全力支持越南进行抗美战争的原因，认为有些得不偿失，周恩来同年6月4日访问坦桑尼亚时，耐心地对尼雷尔总统解释说：

“孤立的看刚果，刚果问题是很严重的，但就全世界来看，越南问题是目前最严重的问题。美国的力量牵制在越南越大，对民族独立解放运动越有利。目前支持越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愿在各方面全力支持越南。美国被牵制在越南对世界人民有好处。美国力量虽然强大，但力量分散，也就变得没有力量了。”

勃列日涅夫见越南抗美救国战争影响巨大，又嫉妒中国随着用血肉支持

越南战争换来的国际威望提高，提出在援越问题上与中国搞联合行动，同时还造谣说中国扣留、阻挠苏联的援越物资。

勃列日涅夫请罗马尼亚部长会议主席毛雷尔 1966 年 10 月来华试探中国的反应，毛泽东在北京钓鱼台宾馆 18 号楼热情接待毛雷尔，对罗马尼亚客人提出的问题回答说：

“在越南问题上，中苏立场绝对相反，无任何联合行动可言。苏联援越物资要通过中国，我国按协议办事，这个问题无联合行动的可能。”

勃列日涅夫乘中国发生“文革”之机，邀请黎笋访苏，向越南提供无偿军援和经援，扩大苏联在越南的影响，企图使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半途而废，使越南领导人在战、和大计上发生争论。1967 年 4 月中旬，周恩来把越南总理范文同、国防部长武元甲请来，有的放矢做工作说：

“中国有句俗话，行程百里半九十，就是说，已经走了 90 里路，最后剩下 10 里，更困难。爬山也是这样，比如爬喜马拉雅山，最后一段路是最难爬的，我们相信，你们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我们要动员全世界人民来支持你们取得胜利，而苏联一定要你们半途而废。”

勃列日涅夫眼见使越南半途而废的阴谋破产，又派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于 1967 年 6 月到美国参加联合国关于中东问题的特别会议之后，与美国总统约翰逊进行美苏首脑会晤。

约翰逊把柯西金请到美国新泽西州葛拉斯堡州立大学校长的家里进行会谈，极力制造缓和气氛。约翰逊和柯西金进行了两次秘密会谈，主要在越南问题上争吵不休。美苏虽未发表联合公报，但肯定研究了压越南进行谈判问题，因此在柯西金访美后，苏联就频频向胡志明施加压力。

胡志明感到事关重大，急忙秘密来到广州与毛泽东、周恩来交换意见。胡志明心急如焚，衬衣全湿透了，毛泽东急忙递过扇子，见仍不解决问题，就干脆请胡志明光了膀子谈话。摄影记者要进来照相，也被毛泽东挡住：“今天胡主席来做客，不照相！”

话转入正题，毛泽东提到 1954 年的日内瓦协议可能签错了，协议签订以后越南南方很多战士撤到了北方。美国当时不肯签字，如果我们不签字也有理由。

胡志明说，这样也有好处，经过一个困难阶段，吴庭艳逮捕、禁闭、镇压南越革命人民，差不多 20 多万人牺牲了，经过这一痛苦的教训，南越人民自觉地起来闹革命，才取得了今天这样一个好形势。

迫于国内外舆论的压力，3 月 31 日约翰逊下令对北越的轰炸

逐步降级，越南也准备与美国进行巴黎会谈。为制定谈判方针，胡志明派春水部长 5 月 7 日来中国协商。周恩来向春水详细介绍中国同国民党谈判、朝鲜谈判、中美大使级谈判的经验教训。

周恩来着重指出，朝鲜谈判那个时候的情况与你们的情况不同。那时是半个朝鲜的问题，现在你们是统一越南的问题……朝鲜谈判的情况差不多等于 1954 年日内瓦会议时的情况。朝鲜谈判是在战场上进行的，前后差不多打了三年，谈了两年。这次你们的情况不同，是分步骤同美国接触谈判。这样也好，走一步看一步。我们觉得，你们答应得太快了，太急了。这可能给美国人一个错觉，你们急于要谈。毛泽东同志向范文同同志说过，谈是可以的，但是一定要高姿态。第二点，美国、仆从军和伪军三方面有 100 万军队，不打破他们的脊梁骨，或不把 10 个指头打断五六个，他不会认输，不会走的。

从1968年5月31日开始，美越在巴黎进行和平谈判，勃列日涅夫千方百计插手，企图予以控制，不少人担心越南上当，胡志明心里也吃不准，又派范文同总理来华商量。

11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亲自与范文同促膝交谈，毛泽东谈笑风生说：

“我赞成你们又打又谈的方针。我们有那么一些同志，就是怕你们上美国人的当。我看不会。这个谈判不是同打仗一样吗？在打仗中间取得经验得出规律嘛！有时是要上些当的，正如你们所说，约翰逊说话不算数。约翰逊曾公开说，甚至条约有时也不算数，但是事物总是有个规则的，例如你们的谈判，难道要谈100年吗？我们的总理说，尼克松再谈两年不解决问题，他下一届再当总统就困难了。”

这时美国、苏联都有些人想压越南投降，以推行美苏合作争霸世界的方针，否则美国会轰炸河内市区和中国，毛泽东豪情满

怀，要越南人不要只看自己的困难，更要看到美国不敢惹中国这个巨人：

“这么多年来，美国的陆军没有进攻北越，没有封锁海防，也没有轰炸河内市区。它是留了一手的。它有个时候说是要‘穷追’，可是你们的飞机从我们国内飞来飞去，它也不‘穷追’，所以那是它说的空话。你们的飞机在我们的机场来往，它根本不提。又例如，中国有那么多人是你们那里工作，它是知道的，但它一个字也不提，好像没有这么回事似的。”

在中国大力支援下，越南人民边打边谈，迫使约翰逊1968年11月宣布完全停止对北越的轰炸，标志着美国发动的侵越战争实际上宣告失败。

1969年尼克松入主白宫，提出了所谓“越南战争越南化计划”，其实质就是“用越南人打越南人”，还阴谋把越南战争扩大到老挝和柬埔寨，使美国发动的越南战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勃列日涅夫一方面向越南提供一些物质支援，一方面大力挑拨中越关系，胡说中国要控制越南，压越南按中国的意图进行巴黎会谈。

在此关键时刻，胡志明不幸于1969年9月4日逝世，周恩来立即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前往河内吊唁，发表情深意切的谈话：

“我们来得仓促，但还是晚了。胡志明主席不幸逝世的消息传到中国，中国党、政府、军队和中国人民感到十分悲痛。胡主席一生奋斗，不仅为越南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导越南人民进行抗美救国战争，而且对国际无产阶级事业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胡主席同中国革命、中国党的关系尤其密切，不比一般。他几次到中国，参加中国革命，同中国人民共患难，并肩战斗，同中国人民、中国党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把中越两党两国人民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因此，我们更感觉到这一

次我们不是来早了，而是来晚了，没有能够在胡主席去世之前同他见一面。”

周恩来怀着沉重的心情到越南主席府正厅胡志明灵堂前，面对老朋友的遗像敬献花圈、默哀，又前往医院瞻仰胡志明的遗容，勉励越南同志继承胡志明遗志，把抗美救国战争进行到底。

苏联参加吊唁的代表私下大肆活动，向罗马尼亚总理毛雷尔等国代表吹嘘苏联对抗美援朝的巨大贡献，竭力挑拨中国与越南、罗马尼亚的关系。毛雷尔向周恩来询问有关情况，周恩来说：

“对于美越巴黎会谈，中国从来不过问，一则由于越南是主人，再则苏

联插手，我们更不愿参与。会谈进行快慢，我们不予注意。苏联把越南问题、中东问题、西柏林问题、中国问题当作它同美国讨价还价的王牌，一切问题都从属于他们的对外政策。他们的对外政策就是两个超级大国联合起来，主宰世界。关于中苏关系，最近几个月发生的几十次边境冲突，是苏联蓄意挑起的，目的是转移人民视线，为国内困难找出路。”

正在此时，印支形势发生巨大变化，这正是：

越南战场起烽烟，美国战败又和谈。

六亿人民做后盾，不怕威胁不受骗。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无中生有 柯西金毒传虚假情报
暗渡陈仓 以色列计夺戈兰高地

话说美国和苏联在中东的激烈争夺,导致了60年代中期的第三次中东战争。

1964年10月14日赫鲁晓夫下台后,苏联出现了三驾马车式决策人物,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各唱各的调,柯西金、马利诺夫斯基都想在外交政策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借外交成就在国内取得对自己有利的地位:

马利诺夫斯基军权在手,志满意得,野心勃勃,他认为中国是苏联的头号敌人,因而别有用心地鼓动赴苏参加十月革命节庆祝活动的贺龙元帅:

“苏联把赫鲁晓夫轰下了台,中国也应该把毛泽东轰下台,中苏才能友好!”

贺龙当即将其顶回,贺龙回来向周恩来做了汇报,周恩来立即向勃列日涅夫提出抗议。

勃列日涅夫为马利诺夫斯基打圆场说他喝醉了,讲的是酒后的胡言乱语,周恩来严正指出,马利诺夫斯基是酒后吐真言,必须向中国道歉;勃列日涅夫无奈,只得向周恩来赔礼道歉。

由此,马利诺夫斯基更对中国恨之入骨,强烈主张苏联动用现代化军队对付中国,避免同美国在西欧、中东发生冲突。柯西金同周恩来打交道较多,深知中国不好惹,而想充当1965年印巴战争后印巴关系的调解人,1966年他撮合印巴领导人在苏联塔什干进行和谈,使柯西金捞取了一点儿政治资本。勃列日涅夫才能虽较平庸,但却已看到柯西金、马利诺夫斯基在中国和印巴问题上都难以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而中东却是可以大捞政治油水的地方,于是他在国防部副部长格列奇科支持下,一心想与美国总统约翰逊在中东进行争夺,抵制中国在中东的巨大影响,使苏联控制中东,其有效办法就是点燃中东的火药库,使中东保持不战不和的混乱局面,以便苏联趁机乱中取胜,称霸中东,进而称霸世界。

勃列日涅夫越想越有精气神儿,就大力拉拢叙利亚、埃及,向其提供大批军事装备,鼓动这两个中东大国报仇雪恨,准备向以色列开战。

勃列日涅夫首先想把叙利亚作为“中东冲突的制造商”利用,以“保护苏联武器秘密”为借口,把苏军谍报部队的要员派到叙利亚;1966年2月23日策动叙利亚总参谋长萨拉哈·贾迪德发动军事政变,把阿明总统赶下台,让贾迪德登上总统宝座,使叙利亚共产党的两名干部进入内阁当了部长,流亡在国外的叙共总书记哈立德·巴格达什也得以返回大马士革。贾迪德和叙利亚共产党代表团相继访苏,叙利亚、苏联关系迅速加强,贾迪德雄心勃勃宣称:

“我们只能进行解放战争,别无他路,阿尔及利亚和越南就是我们的榜样。”

与此同时,勃列日涅夫也加紧拉拢埃及总统纳赛尔,特意请埃及副总理兼军队总司令阿密尔元帅访问莫斯科。格列奇科同阿密尔会谈时,鼓动埃及把联合国部队从西奈半岛驱逐出去,如果发生战争,苏联将援助埃及。

一个月后的1967年3月,格列奇科又派密使到达开罗,向纳赛尔建议让

联合国部队撤离西奈半岛。

3400 人的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是 1956 年的第二次中东战争之后，纳赛尔和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商议建立的，对防止埃及与以色列发生军事冲突起了重要作用，当时规定埃及有权随时要求联合国维和部队撤走。

为促使纳赛尔下此决心，勃列日涅夫 1967 年 4 月 11 日派苏共书记 N G 叶戈里契夫访问开罗，同埃及亲苏派阿里·萨布里等人密谈，保证苏联将支持埃及与以色列开战的军事计划。纳赛尔的心腹海卡尔认为，4 月 11 日的叶戈里契夫、萨布里会谈是中东进入战争的转折点。

纳赛尔为摸清勃列日涅夫的真实意图，派他的接班人萨达特出访苏联。

萨达特是个嗅觉灵敏的人，他发现 4 月 29 日与柯西金会谈时苏联不冷不热，而当他 5 月 12 日从平壤返回莫斯科时，克里姆林宫的态度发生了异乎寻常的变化，他顺藤摸瓜，才搞清楚一起现代谍报史上的重大事件。

原来，5 月 10 日，苏联游戈在东地中海的一艘天线林立的电子侦察船突然忙碌异常，截获以色列一份绝密电报，称以色列已在叙利亚边境附近集结 10 个旅的重兵，5 月 17 日凌晨将对叙利亚发动大规模进攻。

马利诺夫斯基 4 月 6 日去世后，格列奇科就任苏联国防部长，勃列日涅夫把军政大权都抓到了自己手中。

格列奇科把截获的以色列故意泄露的情报呈送勃列日涅夫审阅，勃列日涅夫立即召集苏联谍报部门首脑分析判断，一致认为这是以色列故意放出的假情报。

勃列日涅夫和格列奇科等密谋策划，决定将错就错，为促使埃及、叙利亚与以色列开战，而将这份假情报拿给萨达特看。萨达特看后大吃一惊，5 月 14 日匆匆忙忙从莫斯科赶回开罗，向纳赛尔做了紧急汇报，苏联驻埃及大使也向纳赛尔送来了这份情报的抄件。

两天后，一个西方秘密情报组织破译了苏联驻埃及大使馆发给莫斯科的一份绝密电报，真令西方情报界触目惊心：

“今天我们向埃及政府提供了以色列将突然袭击叙利亚并集结重兵的情报，并建议埃及采取必要措施。”

美国和以色列情报官员又获悉埃及把此情报郑重其事转告叙利亚，埃及、叙利亚更加紧备战，美国人和以色列人不由暗中发笑，便将此称为“苏联的谎言”。

美以情报官员认为勃列日涅夫昧着良心这样干居心有二：一是让纳赛尔相信以色列进攻叙利亚的谎言；二是借此排除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内的反对意见，以便迅速点燃中东火药桶，使苏联进一步控制埃及和叙利亚。

美以情报官员弹冠相庆，认为这是西方情报界的又一杰作，堪称尼曼情报的翻版：1957 年，以色列情报部副部长尼曼也曾向中东阿拉伯国家抛出假情报，鼓吹埃及和叙利亚如向以色列发动进攻，短期内准能获得预想不到的胜利，从而导致当年以色列情报界的“巨大胜利”，埃及诸国对苏联切齿痛恨，这正是：

自古情报早为先，真真假假不新鲜。

卑鄙苏联传谎言，埃及被卖处境惨。

纳赛尔受苏联蒙蔽和怂恿，1967 年 5 月 15 日在亢奋不已的情绪支配下，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吴丹撤走已驻守 10 年的 3400 人 397

的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拆除了阻止双方交战的“栅栏”，又下令向西

奈半岛增兵，5月22日铤而走险宣布封锁亚喀巴海湾上的蒂朗海峡，在苏联的怂恿下发出豪言壮语：

“犹太人用战争来威胁我们，我们的回答是：来吧，我们严阵以待！”

勃列日涅夫命塔斯社发表文章，向以色列发出强硬警告，煽风点火说：“使中东局势紧张到极点的罪魁祸首是以色列，人们不仅要问，以色列究竟想干什么？毫无疑问，谁试图在中东发动新的侵略，他的矛头就不仅指向阿拉伯各国的联合部队，而且也是指向苏联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的！”

为给纳赛尔打气，勃列日涅夫5月25日邀请埃及国防部长沙姆赛丁·巴德朗率领埃及军事代表团访苏，让柯西金和格列奇科给巴德朗灌迷魂汤。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对苏联已经答应提供给埃及的军事援助只字不提，反而夸夸其谈，挑动纳赛尔向以色列挑战：

“你们已经取得了一个政治上的胜利，因此，现在应该是从政治上考虑报仇雪恨的时候了！”

勃列日涅夫让他的亲信、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向埃及保证：“患难见真知，只要肯与以色列干，要什么有什么！”

埃及国防部长巴德朗离开莫斯科时上当确信：“俄国人准备支持埃及，直到最后胜利！”

另一个超级大国美国一直在中东玩弄比苏联更狡猾的把戏，对阿以双方都软硬兼施，与苏联展开更激烈的争夺。

美国总统约翰逊对纳赛尔封锁美以的海上通道蒂朗海峡大发雷霆，指责纳赛尔脾气暴躁，采取了非法的威胁中东和平的封锁海峡行动，同时向纳赛尔递交一封充满和解言辞的信件，又派美国副总统汉弗莱前往开罗，劝纳赛尔不要采取任何战争行动。

约翰逊又把以色列情报部长迈耶·阿米特秘密召到华盛顿，让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告诉以色列人，美国认为以色列如果失败，将会使整个中东陷入苏联手手中，而苏联在中东态度强硬，蓄意在中东制造事端，但苏联只是想牵制美国向越南大规模介入，并不打算冒和美国冲突的风险向中东扩张，因而以色列尽管放心大胆教训阿拉伯人！

5月25日，约翰逊又把以色列外交部长埃班召到华盛顿面授机宜，约翰逊向其明确保证，美国将“在军事上充分保卫以色列”，美国喷气式飞机将“对以色列城市实行空中保护”。

于是，美国军事装备和炸弹紧急地源源不断运往以色列，美国第六舰队的三艘航空母舰和大批作战舰只浩浩荡荡驶过地中海，直奔中东的埃及、叙利亚而来。

6月1日，以色列让极端好战分子摩西·达扬进入内阁担任国防部长，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意味深长地对以色列谍报部长迈耶·阿米特说：

“明白了，我刚刚听到达扬将军就任国防部长的消息。1965年在他访问越南之后，我曾有机会和他谈过话，知道他是一位善于对形势做深入分析的人，我希望他能完成自己的使命。”

6月2日，达扬身着军装赴任，决定毫不迟疑地发动一场军事进攻，但他却狡猾地制造假相，下令几千名预备役军人解甲归田，给部分士兵放短假，广为散发以色列军人在海滨渡假的照片。在此掩盖下，做出了发动第三次中东战争的最后决定。

为掩护以色列对埃及和叙利亚发动进攻，约翰逊6月4日给以色列总理

艾希科尔发去一封书信，美国总统保证继续努力促使航海大国发表一项共同声明，但条件是要在联合国竭尽全力也无 399 法解决的情况下才这样做；至于美国政府，约翰逊诡称不能采取孤立的行动，要纠集英国、荷兰、澳大利亚、冰岛、比利时、新西兰同唱一个调子，掩护以色列紧急调兵遣将，准备动手。

勃列日涅夫为了同约翰逊在中东争夺势力范围，一贯以支持阿拉伯国家捞取政治资本，在得知以色列即将向阿拉伯国家开战的情况下，为了同美国避免冲突，便不敢再支持阿拉伯国家了，而学着约翰逊的调子，发表声明不支持埃及并要求撤出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不支持埃及封锁亚喀巴湾，又按照美国总统约翰逊的意图，警告埃及“不要首先开火”。

在取得美国、苏联的暗中支持、庇护后，以色列悍然于 1967 年 6 月 5 日向埃及、叙利亚、约旦发动进攻，挑起了第三次中东战争，因在 6 月 5 日发动，又称“六·五战争”；又因为打了六天，又称“六日战争”。

6 月 5 日凌晨，一轮红日冉冉升起，万道金光照射大地，将散未散的薄雾给埃及飞机场披上一层淡淡的绛红色轻纱。埃及空军早晨的戒备状态刚刚解除，飞行员正走下飞机到餐厅吃早点。

以色列抓住埃及防空最薄弱的时刻，凌晨 7 时 10 分派 183 架“兀鹰”、“幻影”、“神秘”、“风暴”式战斗机，遮天蔽日扑来，经过几分钟的超低空飞行，突然乘埃及空军雷达毫无觉察之时，将重磅炸弹暴风骤雨般倾泻下来，三个小时便把埃及对以色列威胁最大的 300 多架作战飞机炸毁，叙利亚空军损失过半，以色列陆军横冲直撞，在埃及、约旦、叙利亚势如破竹，占领西奈半岛、戈兰高地，仅六天就大获全胜，史称“六日战争”。

当埃及、叙利亚、约旦军民正与以色列侵略军浴血奋战时，美苏却通过“热线”联络频繁，相互勾结，帮助以色列在中东肆虐。

所谓“热线”，是 1963 年 8 月间分设于克里姆林宫和五角大楼的四台电传打字机，专门用于重大危机时的美苏联络。每小时试机一次，美国发送球赛消息，苏联播放契河夫小说，从未正式启用过，“六·五战争”中可派上了大用场。

纳赛尔接到埃及空军全军覆没的消息，一下子惊呆了，即于 6 月 5 日早晨召见苏联驻埃及大使，要求苏联出面调停停火。

勃列日涅夫接到苏联驻埃及大使关于埃及惨遭失败的消息，引起巨大震惊，立即让柯西金通过“热线”与约翰逊联系，担心中东战争导致美苏直接对抗。约翰逊让国务卿腊斯克向苏联提出立即实现停火以巩固以色列的既得利益；勃列日涅夫则让柯西金告诉美国总统，苏联不会为了支持阿拉伯人而同美国对抗。

约翰逊不摸苏联人的底，没有心思吃饭，一直焦急地等着热线消息，接到柯西金的回答，才一块石头落地，如释重负长出一口气说：“世界大战不会发生了！”约翰逊突觉肌肠辘辘，方知尚未吃早饭，急忙前去进餐。

于是，美苏驻联合国代表出现了少有的合作行动，6 月 6 日、7 日接连在安理会提出无条件停火、立即停火、限期停火方案，都不过是对以色列侵略扩张既成事实的默认而已。以色列虽在 6 月 8 日宣布接受安理会停火决议，但完全是为掩人耳目，6 月 9 日又大举进攻叙利亚企图占领戈兰高地。

对美苏支持以色列侵略阿拉伯国家的行径，中国虽在军事上缺少施加影响的手段，但却从道义上支持阿拉伯国家和人民的正义斗争。早在 5 月 27

日，中国政府就发表声明，首先揭露美国侵略中东的罪行：

“目前，美帝凶相毕露，一方面公开威胁要使用武力，迫使阿联开放亚喀巴湾；另一方面，美国头子约翰逊和联合国秘书长吴丹之流，正在密谋策划，妄图利用联合国这个御用工具，扼杀阿拉伯国家的反帝斗争。美、苏、英、法接触频繁，布朗访问莫斯科，目的都是为了利用它们的所谓‘大国地位’，主宰阿拉伯人民401的命运，迫使阿拉伯人民屈服。”

中国政府的声明，也尖锐地谴责苏联出卖阿拉伯国家人民利益的罪行：

“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是美帝国主义的头号帮凶。它到处为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效劳。目前，正当阿拉伯人民掀起一次反对美帝和以色列的新高潮的时候，苏联领导集团又同美英帝国主义狼狈为奸，大作政治交易，大力贩卖‘塔什干精神’的黑货，妄想破坏阿拉伯人民的反帝正义事业。它绝口不谈美帝国主义侵略阿拉伯国家这一最本质的问题，也不支持埃及要求联合国撤军和封锁亚喀巴湾的正义行动，这是一种赤裸裸的背叛行为。”

6月6日，周恩来总理又分别致电埃及总统纳赛尔、叙利亚国家元首阿塔西、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舒凯里，支持中东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中国政府同日发表声明郑重指出：

“这是美帝国主义及其工具以色列对阿拉伯人民犯下的又一滔天罪行，也是对亚非人民和全世界犯下的严重挑衅。阿拉伯各国人民同仇敌忾，一致奋起，正在给予侵略者以迎头痛击。一场反对美帝侵略斗争的风暴，已经席卷整个阿拉伯世界……中国政府庄严宣告：中国人民，决不容许美帝国主义及其合伙者横行霸道，到处侵略。我们坚决站在阿拉伯人民一边，坚决支持他们反对美以侵略的正义战争。”

约翰逊对来自中国的抗议不敢轻视，正在心烦意乱之际，突然接到美国间谍船“自由”号被炸、34名军人丧生的消息，大吃一惊，急忙下令调查事实真相。

原来，6月8日下午2时，“自由”号间谍船正在埃及附近水域监听埃及电讯，突然遭到火箭炸弹的猛烈攻击，爆炸声震动大海，火光冲天，美军官兵34人当场丧生。

美国间谍船被炸的消息传到白宫，美国领导人一片混乱，约翰逊大惊失色道：“天哪，这种事终于发生了，俄国人向我们开火了，我们可能已处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前夕！”

约翰逊立即以美国军队总司令的名义，下令三军处于戒备状态，美国导弹部队准备出动，作战飞机从航空母舰上一架架腾空而起，呼啸着飞向“自由”号出事地点。

在埃及附近海域游戈的苏联地中海舰队见美国几十架战斗轰炸机腾空而起，大批美国作战舰只云集中东，不知出了什么大事，紧急上报莫斯科请求指示。

勃列日涅夫、柯西金闻讯大惊失色，惊呼美国人要对苏联动手，紧急召集苏联高级将领研究对策，做好一旦美苏开战的准备。

在此千钧一发之际，约翰逊接到以色列总理艾希科尔的一封紧急电报，承认以色列空军误袭美国间谍侦察船闯下大祸，深表歉意，愿意赔偿美国一切损失。约翰逊狠狠骂一声“瞎了眼”，却也一块石头落地，急忙指示国务

卿腊斯克通过热线电报告诉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地中海美军飞机出动，绝无进攻苏联军舰的意图。

勃列日涅夫通过敏锐的苏联情报系统，获悉美国间谍船事件是以色列闯下的大祸，不免有几分幸灾乐祸，却也长出一口气，让柯西金马上通过热线答复约翰逊表示理解，一场迫在眉睫的大战才得以避免。

约旦受到以色列 48 小时打击后首先宣布停火，埃及总统纳赛尔怎么也不甘心失败，发表讲话要与以色列打到底，但再看看自己的军队，埃及空军已全军覆没，陆军也溃不成军，苏伊士运河以东的大片领土已被以色列占领，要打下去就必须补充先进的军事装备。于是就把苏联驻埃及大使请来，请求苏联提供武器装备，支援埃及与以色列奋战到底。

403

勃列日涅夫此时伤透了脑筋，不得不承认苏联对中东形势的判断发生了失误，竟认为无论在战争能力上还是在国内情况上，以色列都不可能继续作战；即使继续作战，也不可能战胜用苏联优势装备武装的埃及和叙利亚军队，因而苏联对埃及、叙利亚进行规模空前的援助，苏联宣称对埃及的援助规模此时已达到 80 亿美元。正因为如此，苏联鼓动埃及总统纳赛尔采取冒险行动，封锁美国、以色列的石油运输通道蒂朗海峡，硬要埃及执行“允许以色列首先进攻、尔后转入反攻”的后发制人的战略，才导致这场战争的暂时失利。

现在埃及马上要求补充大量武器装备，勃列日涅夫认为是白往大海里扔金条，埃及不可能打过横扫阿拉伯世界的以色列军队，于是便让柯西金给纳赛尔大讲特讲：

“苏联政府谴责以色列方面的侵略行径，并且要求以色列政府立即无条件地停止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埃及改称阿联）、叙利亚、约旦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军事行动，把自己的军队撤至停战线以外，作为消除军事冲突的第一个刻不容缓的措施。苏联政府表示希望，包括大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也从自己方面尽一切努力，来熄灭近东的战火和恢复和平。联合国应当履行自己的直接责任谴责以色列的行动，火速采取恢复近东和平所必要的措施。苏联政府保留根据形势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纳赛尔见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只讲空话，只字不提要求补充军事装备之事，才知道苏联根本无心援助埃及战胜以色列，面如死灰，跌坐在总统办公室的椅子之上。

纳赛尔的接班人萨达特看总统如此失魂落魄，就劝纳赛尔不要太迷信苏联的武器装备，那些笨重东西不见得适应中东战场的实际，过分依赖它反而坏事，他劝纳赛尔说：

“你看，明明是在沙漠作战，俄国坦克却具有两栖能力；明明是在炎热地区打仗，装备除雪设备又有何用？沙漠里连一棵树都见不到，要那么多伐木锯干什么？沙漠里没有河流，苏联坦克却有浮桥，真是活见鬼！与此相反，我们在沙漠作战最急需的推土机和坦克运输车却不见踪影，我们的坦克只好先用火车运到转运站，再依靠坦克自己的动力横越数百英里的沙漠，到不了前线就故障百出，苏联装备有了也不中用！”

纳赛尔此时觉得苏联靠不住，美国更是虎狼之国，唯有中国才是可靠的朋友，他和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结下难忘之交，又在 1956 年的苏伊士运河战争中得到过中国和周恩来的大力支持，至今仍铭记在心。现在他六神无主，

便指示埃及驻华大使伊马姆征求周恩来的意见。

6月8日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伊马姆，紧紧地握着伊马姆的手，炯炯的目光盯着这位大使，对外处在极端困难状态下的埃及总统纳赛尔和人民表示极大的同情和支持，满腔热情他说：

“这次以色列突然袭击阿拉伯国家，也是在美英策动和指使下进行的，证明大国强权政治是我们亚非拉曾受压迫的人民和仍被压迫的人民的敌人。”

周恩来知道纳赛尔目前处境极其危险，就耐心地揭露美苏对埃及的狼子野心，指出苏联把中东问题当成同美国讨价还价的王牌，竭力使中东问题从属于美苏的对外政策，揭露美苏的外交政策就是两个超级大国联合起来，主宰世界。

为鼓舞纳赛尔和埃及人民从失败中振作起来，周恩来请伊马姆转告纳赛尔，中国认为埃及和阿拉伯民族是很有战斗性的，如果你们团结起来，帝国主义的阴谋就不可能得逞。

为表达中国人民对埃及人民反对以色列斗争的坚决支持，周恩来宣布中国将向埃及提供一批物资援助，但因中国距埃及遥远，405本身又是发展中国家，对于远在中东的这场战争，从军事上缺乏对它施加影响的手段，但关键是埃及总统和人民不被失败所吓倒，就能领导人民保卫国家。

纳赛尔听了周恩来的话，颓唐情绪为之一扫而光，他向周恩来致电表示：“你们的支持，加强了我们对自已正义事业的信心。”

纳赛尔从周恩来的话中获得了力量，心里有了主心骨，6月8日晚宣布埃及同意停火，设法稳定内部。

6月10日，纳赛尔发觉美苏暗中要把他赶下台，想起周恩来关于在困难时不能向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屈服的忠告，就主动引咎辞职称：“如果人民判我有罪，把我绞死，我认为他们有权利这么做，我将把权利交给副总统毛希丁！”

埃及人民对纳赛尔引咎辞职表示反对，反而把他当作在国难当头挽狂澜于既倒的砥柱中流式的英雄人物，纳赛尔因战争指挥失利而造成的地位不稳重新巩固了起来。

纳赛尔站稳了脚跟，就向苏联施加压力，严厉地声称：“以色列发动进攻占领西奈半岛和耶路撒冷，转眼将把中东囊括手中，我们埃及丧权辱国是由于苏联支持不力，岂不丢尽你们俄国人的脸面，今后谁还会相信克里姆林宫？”

这时，苏联因出卖埃及人民利益遭到世界舆论的严厉谴责，觉得很丢作为超级大国的面子，正在研究如何挽回苏联颜面的办法，接到纳赛尔的埋怨报告，正好戳到了勃列日涅夫的疮疤，便和柯西金等人商议对策，终于想出一个办法，阻止以色列在戈兰高地向前挺进。

原来，戈兰高地是叙利亚西南部的著名高地，位于叙利亚同巴勒斯坦、约旦和黎巴嫩的交界处，面积虽只有700平方公里，人口6000万，但有大片牧场和农田，不仅物产丰富，而且国际输油管自南向北纵贯高地，通往黎巴嫩的西顿。战略地位相当重要，是历次中东战争中的兵家必争之地。

奇怪的是以色列在“六·五战争”开战五天后才发动对戈兰高地的进攻，这是为何？

以色列国防部长摩西·达扬狡诈异常，虽然这次战争初期以色列的闪击战的胜利使许多人冲昏了头脑，要求尽快拿下戈兰高地，但达扬却迟迟没有贸然下令发动进攻戈兰高地。达扬主要有两个担心：一是担心招致苏联的介入，二是以色列部队疲惫不堪，稍有不慎就会带来不可收拾的结果。

可是到6月9日凌晨3时，情况发生了变化。达扬接到以色列特务机关“摩萨德”的报告，说埃及总统纳赛尔已跟柯西金发了脾气，柯西金正和纳赛尔设法结束这次中东战争，如果叙利亚也同意停火，以色列将失去夺取戈兰高地的机会。

“独眼将军”达扬一不做二不休，终于在6月9日上午下达了进攻戈兰高地的命令。为不致引起苏联介入，达扬连续下达了两个命令，强调不许越过非军事区，而且以攻取库奈特腊为最终界限，尔后立即转入防御态势，争取得到苏联的默许。

以色列进攻戈兰高地的炮声吓坏了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认为以色列会毫无阻碍地一直打到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造成对苏联极其不利的态势，于是苏联便和埃及、叙利亚紧急行动起来，向联合国安理会呼吁停战，力争在最短时间内通过中东停火的决议。

以色列外交部长埃班在美国国务卿腊斯克支持下，玩弄“需请示本国政府同意”的手法，千方百计使安理会做不出停战决议。

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急了，害怕背上阿拉伯人民的叛徒的罪名，因而于6月10日清晨通过热线警告约翰逊：美国必须让以色列在几小时之内停止进攻，不然的话，苏联将采取“必要的措施”，如果需要，将采取“军事措施”。

约翰逊不敢无视柯西金的热线警告，急忙召集文武大员紧急407协商对策。

约翰逊明白，苏联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真是丢人现眼：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自吹为阿拉伯人的坚强后盾，借此捞取政治资本，但却没能挽救阿拉伯人的失败，使阿拉伯人极其失望，苏联的外交行动显得非常无力。在这种情况下，约翰逊十分担心，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为改变在中东战争中的不利处境，不被阿拉伯人民骂为叛徒，苏联会不会铤而走险？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室内“死一样的沉默”，约翰逊觉得自古巴导弹危机以来，世界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危险地“濒临一场核战争的边缘”。

国务卿腊斯克翻阅着美国中央情报局送来的一大堆报告，突然大声笑了起来，约翰逊暴跳如雷指责说：“混蛋，我都快急死了，你却能笑出声来！”

腊斯克遭到约翰逊的训斥并不生气，反而笑嘻嘻解释说：“总统阁下请放心，我自有暗渡陈仓之计！”

约翰逊才识浅薄，他知道腊斯克出身寒微，完全靠自我奋斗获得牛津大学著名的罗德斯奖学金和高材生两项桂冠，其后任美国驻中缅战区军队总参谋长史迪威的副参谋长；朝鲜战争时作为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利用他与联合国的特殊关系，促成联合国通过了武装干涉朝鲜内战的美国提案，为美国打着联合国旗号公开进行侵朝战争铺平了道路。

约翰逊想到这里，改成笑脸向腊斯克询问“暗渡陈仓”之计，腊斯克不慌不忙他说：“总统阁下，你尽管答应柯西金的要求，我保你平安无事！”

约翰逊仍不放心，腊斯克这才轻声慢语道出其中的奥妙：他已接到以色列外交部长埃班的战况通报，等到安理会停火决议生效时，以色列早就可以拿下戈兰高地。

约翰逊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指示腊斯克把这个顺水人情送给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

事情诚如美国国务卿腊斯克所料，6月10日中午刚过，以色列总参谋长拉宾收到“即将占领库奈特腊”的报告，立即将此消息发给在美国出席联合国安理会会议的以色列外交部长埃班，埃班又把这个消息通知了腊斯克。

于是，腊斯克指示美国驻联合国安理会代表与以色列密切合作，不再设置重重障碍，更不动用否决权捣乱破坏，而使安理会于纽约时间6月10日拂晓（以色列时间10日12时30分）通过了中东战争停火决议。

令人可气的是，当中东停战决议好不容易通过并于6月10日下午6时30分生效时，以色列已夺取了全部进攻目标，并完成了防御态势，这正是：约翰逊面目狰狞，腊斯克算盘奇精，柯西金徒然空喜，竹篮打水一场空。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煽风点火 导致阿以再战 勾心斗角 两霸舌战热线

话说埃及总统纳赛尔对在 1967 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中被以色列打败很不甘心，发誓要报此深仇大恨。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认为纳赛尔要报仇雪恨就需要武器装备，苏联就可以借此控制纳赛尔和埃及，他私下透露其中的奥秘说：

“ 尽管纳赛尔在意识形态方面是冒失鬼，但他是个正直的人。事实已证明，他是个可以信赖的人。他在阿拉伯解放运动中的表现是首屈一指的。在现阶段，这一点对苏联来说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一旦阿拉伯人民认识到他们的真正的利益，苏联就不再需要这个纳赛尔了。 ”

苏联领导人中有不少人种族主义情绪严重，经常毫不掩饰对阿拉伯人的蔑视之情，认为阿拉伯人干不出什么大事来，但却认为纳赛尔在埃及和中东享有独一无二的威望，为控制埃及，因而在“六·五战争”停火十天后的 6 月 20 日，勃列日涅夫即派苏联军队总参谋部代表团访问开罗，信誓旦旦向纳赛尔保证：

“ 苏联忠于总统阁下、埃及和各国人民和平、自由和独立的理想，将在联合国内外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以争取消除侵略的后果并协助安排这一地区的和平，苏军将帮助埃及军队重新武装成一支中东劲旅！ ”

第二天，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波德戈尔内亲自飞往开罗，拍着胸脯保证帮助埃及重建军队。这回俄国人不敢说假话了，1967 年 7 月即有作战飞机 110 架、坦克 200 至 250 辆等新式武器源源不断运到开罗。到同年 10 月，埃及军队的作战飞机已达到战前水平，坦克也增至 700 辆，埃军慢慢恢复了元气。到 1968 年春，苏联又向埃及提供了比战前更先进的飞机、坦克、火炮，埃及又开始与以色列军队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

对纳赛尔过分依靠苏联恢复埃及军队建设，中国觉得有些危险，1968 年 7 月 19 日，周恩来在陈毅陪同下接见阿联驻华大使伊马姆，推心置腹提醒说：

“ 一年前的‘六·五战争’，事前我们没有得到通知。我们知道时已发生蒂朗海峡事件，我们感到有点意外。我们知道海峡的事是会引起冲突的。既然主动采取了这一步骤，我们想那么其他一系列步骤都应准备好了，后来才知道没有准备好。更严重的是你们过分相信苏联顾问，又上了美国的当，它说他们不会援助以色列。这事对阿联人民和阿拉伯人民是最大的教训。阿以战争后，你们经济上受到很大损失，你们的处境我们是理解的，但是，一个民族要能够站起来，就是要在困难时不屈服，就能逼出东西来，新中国就是这样逼出来的。 ”

纳赛尔听了伊马姆报回的周恩来的肺腑之言，觉得大长了民族志气，特意要伊马姆向中国表示发自内心的感谢。周恩来见纳赛尔能听得进逆耳之言，1969 年 3 月 26 日又让访华的巴勒斯坦“法塔赫”代表团成员海里勒、约柯蒂、尤尼斯等人转告纳赛尔说：

“ 任何一个民族要独立，必须靠自己。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民族、小民族都是如此，这是决定性的一条。凡不 411 是本民族自己打出来的，独立就靠不住。埃及是个有悠久历史的中等国家，曾经依靠自己的力量推翻了法鲁克王朝，苏伊士运河一仗打得很好，顶住了

英、法武装侵略，可是在前年的中东战争中，只打了一天，就大败特败。为什么？原因很简单，不依靠人民，依靠外国。”

纳赛尔觉得周恩来字字金玉良言，对周恩来更加敬重，根据埃及当时刚从战败中恢复过来的实际情况，打算以优势的野战火炮、重迫击炮不断对占领苏伊士运河的以色列军队进行猛烈炮击，使以色列在遭受巨大损失后被迫从苏伊士运河撤退，或者不得不根据阿拉伯方面的要求，用政治方式解决问题，于是纳赛尔发动阿联亚历山大城 50 万人举行反对以色列侵略的大示威，还胜利进行了沙德旺战斗。

对此，周恩来欢欣鼓舞，1970 年 2 月 2 日特意写信给埃及总统纳赛尔，表示坚决支持阿拉伯人民反对美以侵略的正义斗争，同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埃及驻华大使阿卜德，面交了他致纳赛尔总统的信，热情地将双手交叉胸前鼓励说：

“最近的沙德旺战斗和亚历山大城 50 万人的示威，体现了你们的战斗精神，这是令人感动的。我们支持埃及人民、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人民的正义斗争。”

面对阿拉伯日益高涨的反对美国和以色列侵略的斗争，美国支持以色列耗资 2.38 亿美元，在苏伊士运河东岸修建起“巴列夫防线”。

此防线长 123 公里，平均高达 8.5 米，设置了密密麻麻的蛇形铁丝网、碉堡群，布满了地雷，还在苏伊士运河沿岸敷设了汽油管道，一声令下就可喷出大量燃烧的汽油，刹时间把运河化为一堵火墙，使对方插翅难以飞过，加之在西奈地区驻有 8 万重兵，以色列便宣称巴列夫防线固若金汤，天下无敌。

这可难坏了埃及总统纳赛尔，他报仇心切，便一次次飞往莫斯科，请求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提供大量先进武器。面对苏联人的冷嘲热讽、无理刁难，纳赛尔忍辱负重，终于在 1970 年 3 月，盼来了 1500 名苏联军事人员，带着 40 部萨姆—3 导弹发射架、100 架米格—21 型喷气式飞机到达埃及，接着又派来 1.6 万名苏军技术人员，运来一批萨姆—2 型高空防空导弹。

纳赛尔满心欢喜，忙下令在苏伊士运河以西地区部署苏联先进导弹，但一与以色列军队交战，纳赛尔就发现埃及的导弹总比以色列的低一个档次，而且最先进的轰炸机和坦克苏联都迟迟不给，才知道美苏为维持中东不战不和的局面，私下早已达成默契，不把最先进的武器提供给阿拉伯国家。

纳赛尔满怀一腔报仇雪恨之心，结果发现受了苏联戏弄，不禁怒火中烧，忧愤交加，加之约旦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1970 年爆发流血冲突，他忙于调停，疲于奔命，又悲愤满腔，竟于 1970 年 9 月 28 日心脏病突发，与世长辞。周恩来 9 月 29 日晚上前往埃及驻华大使馆吊唁纳赛尔总统不幸逝世，悲叹这位埃及一代雄杰竟因过分相信苏联霸权主义而被气绝身亡。

勃列日涅夫得知萨达特继任埃及总统暗暗叫苦，因为苏联长期以来暗中支持萨布里，甚至企图搞掉萨达特。刺杀毒计失败之后，苏联又暗中搞过一次针对萨达特的军事政变，萨达特只是在最后一分钟才挫败了苏联的阴谋。

现在，不合克里姆林宫胃口的萨达特竟然登上埃及总统的宝座，勃列日涅夫气歪了鼻子也只得面对现实，马上和柯西金协商对埃及新领导的对策。

勃列日涅夫问柯西金对萨达特的印象，柯西金与萨达特有过几面之交，他若有所思他说：

“安瓦尔·萨达特是个难以捉摸的人。他性格有点压抑，常常 413

忽而猝然大喜，忽而突转抑郁；他还是一个善于深思的人，不像性格开朗的纳赛尔那样感情奔放。因此，比起他的前任来，他这个人一直是难以揣测的。”

柯西金这番话把勃列日涅夫说得心急火燎，认为事不宜迟，让柯西金马上飞往开罗，设法把萨达特控制在苏联掌股之中。

柯西金在纳赛尔逝世的第二天，就风风火火赶到开罗，声称苏联在埃及有着巨大的军事和政治投资，竭力对萨达特施加影响，劝萨达特对以色列采取和解政策。

萨达特与柯西金是话不投机半句多，旗帜鲜明他讲出他的主张：“从纳赛尔逝世、我接任的那天起，我就知道我非得打仗不可，纳赛尔也知道我们非打不可。这是我承继下来的遗产，但是我受过英国人的监禁，使我学会了忍耐。”

柯西金访问开罗未达到控制萨达特之目的，对外却宣传苏联与埃及关系大有进展，苏联的军事装备将源源不断运往开罗。

尼克松入主白宫后不明真相，为与苏联争夺中东，便派国务卿罗杰斯于1971年5月访问开罗，对萨达特百般拉拢。萨达特后来在回忆录中讲到他和美国的关系时说：

“在1970年和1971年的时候，我确曾对罗杰斯国务卿存在一线希望，他是来这里做交易的，但他所做的却是逼我们一再让步，而对以色列却毫无要求。”

萨达特从他多年与美国人打交道的经验中，马上意识到了美国人狡猾作法的“奥妙之处”：“罗杰斯认为埃及决不会再与以色列开战，以色列人也认为他们不可能遭到突然袭击，西方认为我们是残兵败将。”

罗杰斯前脚刚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就马不停蹄赶到开罗，伙同埃及的亲苏派萨布里对萨达特展开猛烈攻势，诱使萨达特同苏联签订了一项为期15年的友好条约，又邀请萨达特1971年10月访苏，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三人同萨达特举行了长时间会谈，双方就武器交易取得专门协议，苏联保证把这批武器在1971年年底以前运到埃及。

萨达特满怀希望回到埃及，但从1971年10月一直等到12月中旬，也不见苏联已答应卖给埃及的武器的影子，萨达特原来把1971年当作向以色列开战的“决定性的一年”，曾为此大张旗鼓进行宣传，现在让苏联故意拖延而不得不宣告破产，因而对波德戈尔内、柯西金、勃列日涅夫恨得咬牙切齿。

萨达特把苏联驻开罗大使弗拉基米尔·维诺格拉多夫召来，怀着“决定性一年”计划破产带来的羞辱心情，声称为全面澄清埃及同苏联的关系，他要立即访苏，一举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

拖了几天，苏联驻开罗大使带回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的答复，要萨达特先冷静冷静，等1972年2月访苏也不晚。

萨达特含着眼泪吞下这份羞辱苦计，耐着性子等到2月2日到苏联访问时，勃列日涅夫一见面就冷笑着指责说：

“我至今仍为埃及1967年的溃败震惊不已，只要你们的每辆坦克打一炮，那次战争的格局就会大不相同，但你们的炮连动都未动过，我怀疑你们根本不会使用这些先进武器！”

萨达特知道，勃列日涅夫毫不掩饰地怀疑阿拉伯人使用苏联武器的能力，实际上是不愿意提供先进武器。

萨达特终于才弄明白：“事情很清楚，不战不和的僵局正中中美苏两个超

级大国的下怀，美苏对供应埃及武器数量和水平有着某种协议，归根结蒂，缓和只会进一步消蚀阿拉伯国家利用超级大国的争斗谋求解决中东问题的能力。”

萨达特带着采购进攻性武器的单子乘兴前往莫斯科，但却败兴失望而归。

415

勃列日涅夫看不能控制埃及，两个月后又邀请萨达特于1972年4月底访苏。萨达特行前发表强硬演说，批评苏联不供应埃及所要求的武器，以此向苏联施加压力。一见面，萨达特就明确讲道：“我们总有一天要打仗，别的选择是没有的！”

勃列日涅夫连连摇头说：“我可不想来一场超级大国的对抗！”

勃列日涅夫借口要看尼克松是否能连选连任，仍不给埃及先进武器，但为控制埃及，却向埃及大量派遣苏联军事顾问和军事技术人员，使苏联在埃及的军事人员竟达两万人之多，其权力也大得惊人，竟能够有效地否决萨达特的任何军事计划，怎不让萨达特恼火！

萨达特忍无可忍，1972年6月向勃列日涅夫提出七个问题的单子，讲明埃及同苏联的关系取决于对这一单子的答复。

勃列日涅夫对此拖而不答，经萨达特一再催促，迟迟才来回音，绝口不谈提供军援之事，反而要求萨达特搞军事缓和。

萨达特怒火万丈，对苏联驻开罗大使维诺格拉多夫大发雷霆，飭令所有的苏联顾问必须在10天之内离开埃及。

勃列日涅夫气哼哼命两万名苏联军事顾问和专家7月17日开始撤离，美国人和以色列人心花怒放，这使勃列日涅夫极为恼火，为了保持苏联在中东的桥头堡，1973年2月无可奈何答应萨达特的要求，同意提供开罗所需要的进攻性武器。

为促使美国向以色列施加压力，萨达特又派埃及国家安全顾问哈菲兹·伊斯梅尔访美，同尼克松和国务卿罗杰斯进行会谈。这时，尼克松再次当选美国总统，又深信勃列日涅夫需要缓和，还急于为美国共和党拉犹太人的选票，就不仅拒绝向以色列施加压力，而且向3月1日访美的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宣布，再向以色列提供48架鬼怪式和36架空中之鹰式战斗机。

在这种情况下，埃及、叙利亚被迫秘密进行战争部署。美国和以色列官员狂妄自大，竟然认为阿拉伯国家已大伤元气，再无决心发动复仇战争。

10月是阿拉伯人的“斋月”，10月6日又是犹太人圣节“赎罪日”斋戒开始的日子，以色列全国忙于宗教祈祷，军人也全都参加宗教活动，因而在扼守苏伊士运河东岸的巴列夫防线上，有一半防御工事里空无一人，以色列坦克兵也冻得跑到坦克外活动取暖。

阿拉伯国家就选择这一时刻发动进攻，可谓用心良苦。

1973年10月6日下午2时，埃及潜伏多时的2000门大炮同时发出怒吼，200多架战斗轰炸机腾空而起扑向敌军，只用50分钟便将以色列的巴列夫防线炸成一片火海。以色列军官慌忙命令士兵打开苏伊士运河边的油管阀门，企图用200吨燃油巨火烧退埃及军队，未想到埃及军队的潜水蛙人早已将油嘴封死，10万埃及军队得以浩浩荡荡开过苏伊士运河；叙利亚军队也对戈兰高地发起猛攻，终于打破了以色列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阿拉伯世界一片欢腾。

这次中东战争因发生在十月，故称“十月战争”；因在赎罪日（6日）开始，又称“赎罪日战争”。

苏联早在10月3日就接到了萨达特要开战的内部通报，4日撤走了苏联驻埃及人员的家属。6日晚8时，苏联驻埃及大使维诺格拉多夫紧急会见萨达特，声称叙利亚战事不利，已向苏联表示准备停火，苏联希望埃及也同时停火。萨达特大吃一惊表示怀疑，忙问苏联大使：“这仅是让我知道一下，还是另有其他目的呢？”

维诺格拉多夫一阵慌乱，匆忙编造假话说：“我告诉你，是因为我们得到了叙利亚的正式请求，而我们希望你同阿萨德总统取得接触。”

萨达特在埃及军队节节取胜之时，听到苏联的荒谬意见暗暗417生气，板着脸孔回答说：“对不起，我只能拒绝下令停火，我要求大使阁下把这一点转告贵国政府！”

萨达特随即打电报给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要求证实苏联驻埃及大使提供的骇人听闻的消息。

第二天即10月7日，萨达特收到阿萨德的回电，矢口否认叙利亚要求停火的消息。就在这时，苏联驻埃及大使维诺格拉多夫再次紧急求见萨达特，继续玩弄欺骗花招儿，又一次胡说叙利亚要求停火。

萨达特对俄国人公然无耻造谣忍无可忍，大发雷霆予以斥责，辛辣地讽刺说：

“我对阿萨德总统的回答是满意的，我只相信这个答复！”

维诺格拉多夫被抢白得大长脸一阵红一阵白，只得讪讪离去，苏联的无耻造谣以惨败而告结束。

三天后，勃列日涅夫见阿拉伯军队捷报频传，感到光讲空话不行了，才急忙把几万吨军火紧急运往埃及。

美国以为有它全力支持的以色列，三四天就能把埃及和叙利亚打败，因而在这次战争初期按兵不动，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两次向基辛格国务卿打来紧急电话，惊慌失措地报告以色列军队已遭受沉重打击，要求美国赶快亲自动手，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基辛格稳坐钓鱼船，仍持观望态度，他不急不忙他说：“危机的急剧爆发往往最能解决棘手问题，让他们先打一阵子吧！”

美国当时的如意算盘是想让以色列先遭受某种有限的挫折，以使阿拉伯国家感到满意，也可让以色列领导人的头脑冷静下来，给以色列泼一盆冷水，以便在必要时逼以色列领导人坐到谈判桌旁，按美国的主张同阿拉伯国家进行谈判，但也不能让以色列跌更大跟头，以使苏联得到宣传上的胜利，更不能逼使梅厄夫人下台。

418

到了10月10日，基辛格发觉自己的估计不太对头了，他私下承认：

“到战争真的爆发时，问题很清楚，我们判断错了，但我们还是相信，美国对战争结局的估计仍然正确。”

基辛格为同苏联抗衡，赶紧同五角大楼首脑商讨对策，决定建立通过亚速尔群岛直达以色列的空中桥梁，从美军现役部队装备中调拨大量军火运抵以色列，美国与苏联随即在中东展开了一场军人运输竞赛。

尼克松开始在中东进行新的军事冒险，他下令调美国第六舰队的王牌——“独立号”航空母舰从其希腊母港比雷埃夫斯开往中东，尼克松宣称这艘

航空母舰有 80 架舰载作战飞机，堪称令人生畏的现代化武器；另三艘航母“富兰克林·罗斯福号”、“约翰·肯尼迪号”、“瓜达卡纳尔号”也奉命大张旗鼓开赴中东；苏联 30 多艘作战舰只也加速开往埃及，遂使中东气氛顿时更加紧张起来。

在美国大力支持下，以色列前线指挥官沙龙乘埃及暂停进攻之机“创造拿破仑式的战绩”，首先以优势兵力击垮叙利亚部队，乘胜追击至大马士革近郊，又回师西奈半岛，发动世界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坦克会战，打掉了埃及军队的锐气，摧毁了埃及导弹基地，包围埃及第三军团 4 万余人，再次兵临苏伊士城下，彻底扭转了战局。

这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已由这次中东战争初期的旁观者变为武器供应者，两霸害怕再发展升级为直接交战者的角色，开始叫停了。

勃列日涅夫对埃及军队能否应付以色列的下一步进攻抱极端悲观态度，确信需要停火了，就让柯西金 1973 年 10 月 16 日突然取消与来访的丹麦首相那恩森的会谈，临时执行一项“紧急任 419 务”，秘密飞往开罗。

在开罗，柯西金真可谓抓紧时机，分秒必争，与埃及总统萨达特举行了五次会谈。柯西金软硬兼施，压萨达特放弃要求以色列完全撤至 1967 年中东战争前的边界线的主张，而改为撤至“稍作修正的边界线”。

柯西金 10 月 18 日将此消息电告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要他火速向美国国务卿基辛格通报。

苏联人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强使萨达特接受的意见，却被基辛格一口拒绝：“对不起，如今战争正在按以色列人的意志进展，他们接受这一方案的可能性极小！”

柯西金在开罗得到这一消息失望之极，他要萨达特不惜一切代价在军事上顶住，苏联决心不惜采取任何手段结束中东战争，马上命 300 名军事人员飞往开罗，帮助埃及作战。

美国立刻对苏联的助战行动做出强烈反应，尼克松让他的总统助理莱尔德发表声明制造紧张气氛说：

“可以实现缓和的唯一方法是行动而不是言语，而苏联迄今的所作所为并不能表明缓和的存在，我们的最后结论是，苏美之间在中东问题上已经存在着某种对抗。”

基辛格害怕发生美苏直接对抗，急得坐卧不安，没想到 1973 年 10 月 19 日事情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勃列日涅夫看到事态发展日趋严重，便命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给尼克松带来紧急口信称：

由于时间至关重要，甚至每小时都事关重大，我的同事和我建议，美国国务卿、你最亲密的同事基辛格博士从速前来莫斯科，以便同他，作为你授权的个人代表进行适当的谈判。如果他能在 10 月 20 日目前来的话，那就

太好了。你如能迅速作复，我将甚为感激。

尼克松、基辛格接到这个口信大感意外，对此正求之不得，基辛格在回忆录中这样写到他当时的心情：

“当我读到这一邀请时，我觉得解决了我们大部分的问题。在达成我们能够接受的结局之前，可以使这一争端不提到联合国去。

在我前往莫斯科途中和谈判期间，它可以使苏联不再大吵大嚷进行恫吓。我将至少再争取到 72 小时，以加强军事压力。尼克松和我按照这种思路

同黑格和斯考克罗夫特进行了讨论，我们的结论是莫斯科之行将促进我们的事业。”

尼克松、基辛格得意地笑了，他俩知道勃列日涅夫、柯西金骨头不太硬而死要面子，确信在施加压力后再给一些面子，俄国人是会让步的。

基辛格这次又是秘密行动，但还不能立即前往莫斯科，他必须出席当晚中国驻华盛顿联络处主任黄镇举行的宴会，然后才悄然动身，以掩人耳目。

基辛格已和黄镇有几面之交，他曾认为倾听黄镇谈笑风生的谈话是相当愉快的事，但今天肩负尼克松交给的重要秘密使命，全然没有了往日的浓厚雅兴，时刻感到时不我待，心想早些告辞而去，但又不敢在新中国的首次华盛顿宴会上提前离席，只好暗暗叫苦，好不容易等到席终才得以告辞。

基辛格告辞黄镇时已是凌晨一时，也顾不得回家就在深夜驱车直接前往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带着已久候多时的 19 名美国外交官腾空而起，风风火火赶到莫斯科。

勃列日涅夫一反常态代替柯西金冲上外交第一线，以一种好斗的口吻首先气势汹汹发出警告说。

“埃及的战争机器正一步一步被捣毁，苏联对此不能袖手旁观，莫斯科不允许 1967 年的往事重演，苏联可能不得不转入后果难以预料的进一步卷入阶段。”

基辛格可不怕勃列日涅夫，只冷冷地说美国已注意到苏联的建议，有意针对勃列日涅夫的骄横态度大讲以色列在战场上的“辉煌胜利”。勃列日涅夫则搬出尼克松致他的信，要求进行实质性谈判，尼克松的信说：

我们两人要坚定地承诺，为实现该目标（持久和平），贡献我们的全部力量，并成为该地区我们各自朋友的坚强的有说服力的领导。我将致电基辛格博士，要他口头向你转达我个人有关这方面的坚定的承诺。

这个电报顿使基辛格大吃一惊，急忙向白宫发电，要尼克松收回对基辛格授予的全权，防止苏联逼美国当场做出承诺，但这时水门事件已把尼克松搞得焦头烂额，尼克松心情颓丧，不想再做改变，事实上给苏联的电报早已发出，也无法改变了。

苏联办事效率一向较低，但这次利用尼克松的失误却分外迅速，可见勃列日涅夫对有关中东战争的情况了如指掌，他马上给尼克松发回同意的电报称：

完全像总统你说的那样，我理解基辛格博士是你所充分信任的最亲密的同事，这次也将代表你讲话，并理解在我们同他商谈的过程中，他所做的承诺将得到你的全力支持。

勃列日涅夫充分利用这一点，提醒基辛格是被授予全权的，没有必要事事向华盛顿请示汇报，应该把美苏全面解决中东战争的方案强加给中东各方。

基辛格板起面孔顶撞说：“我是来谈停火的，不想谈全面的解决方案！”

双方意见尖锐对立，气氛极为紧张，后来，双方同意第二天上午 11 时继续谈判。基辛格开玩笑缓和气氛说：“明天这么晚才开始，一定是想让多勃雷宁有时间去做礼拜吧？”

勃列日涅夫也巧妙地回敬说：“那是他的衷心愿望。”

基辛格依仗其强有力的谈判地位，在第二天的会谈中大谈美国的就地停火和让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直接谈判的主张。

勃列日涅夫虚张一阵声势之后，就不再提苏联的要求，而切切实实讨论起美国的建议来。经十小时讨价还价，美苏终于达成三项协议并联名向安理会提出：

安理会：

（一）要求现在战斗的各方，在本决议通过之时起 12 小时内，在目前各自占领的阵地上，立即停止各种射击并终止一切军事活动。

（二）要求有关各方于停火后立即开始执行安全理事会第二四二号决议的所有各项条款。

（三）决定一旦停火，有关各方在适当方面的主持下便立即开始谈判，以求在中东建立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基辛格长出一口气，休息了一个小时，又突然发现他给尼克松的报告还没有发出，他站在房间中央怒气冲天，向部下喝问这是为什么？美国官员报告，通过美驻苏使馆、总统专机、公开电报发出的电文都面目全非，准是苏方有意干扰，基辛格又与苏方交涉，才将电报发了出去，结果招致以色列极为不满。

以色列利用美国给它拖延的时间，迅速摧毁埃及导弹基地，包围埃军第三军团，埃及、叙利亚再次面临灭顶之灾，只得接受安理会停火决议，但以色列却不停止进攻，继续向苏伊士城发动猛攻，埃及第三军团面临被全歼的边缘。萨达特万般无奈，想请美国和苏联两国联合出兵中东监督停火。

这正是勃列日涅夫求之不得之事，急忙给美国总统尼克松发“热线”电报称：

“让我们，苏联和美国，一起把苏联和美国的军队紧急派往埃及，以确保 10 月 22 日和 23 日安理会关于停火和停止一切军事活动的决定的实施，并确保我们同你们就保证执行安理会的各项决定所达成的谅解……如果你认为在这件事上不可能同我们一起行动，苏联就不得不紧急考虑采取适当步骤的问题。苏联不能允许以色列方面的专横行为！”

勃列日涅夫让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向美方暗示这是苏联的最后通牒，甚至可以在电话上向基辛格重读勃列日涅夫的强硬意见。

基辛格认为这是苏联领导人美国总统的最严重的挑战之一，信的开头就不礼貌，结尾同样无礼，竟要求“立即给予明确答复”；而内容不但要求强行停火，而且要求强行最后解决。

基辛格得到中央情报局的报告称，苏联正集中飞机空运空降部队，苏联在地中海的舰艇已达到 85 艘，12 艘作战舰只正向亚历山大港开进，基辛格认为情况紧急，就打电话警告多勃雷宁：

“我们就要开会，考虑你们的信，我只想告诉你，在我们答复之前采取任何单方面的行动，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的！”

多勃雷宁也像好斗的公鸡：“我将转达你的意见。”

基辛格大声强调：“这件事关系重大，不要对我们施加压力！我再重复一遍，不要对我们施加压力！”

多勃雷宁虽口里答应：“好！”但却表示出危机就要到来之意。

基辛格见事态严重，便请黑格报告美国总统尼克松，被水门事件搞得狼狈不堪的尼克松当即做出极其强硬的指示：

“你（黑格）和基辛格马上在白宫开会制订计划，对苏联这种赤裸裸的单方面干涉的威胁做出坚定的反应。讲空话是没有用的，我们需要的是行动，

甚至宣布处于军事戒备状态！”

基辛格玩弄釜底抽薪之计，以尼克松的名义给萨达特写信，要他撤回邀请苏联出兵之举，绝了勃列日涅夫出兵中东的借口，他向埃及总统施加压力说：

“请你考虑一下，如果两个核大国在你的土地上发生对抗，对你的国家将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我还请你考虑，如果两个核大国中的一国的军队在埃及土地上被牵涉进去，美国就不可能进行基辛格博士 11 月 7 日以访问开罗开始的外交主动行动。”

基辛格又得到情报称苏联运输机即将起飞，10 月 25 日将向埃及空运 5000 名苏军，他便在 10 月 24 日深夜 11 时主持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会议，决定全球美军进入三级戒备，调集美海军前往中东准备与苏军交锋。

10 月 25 日晨 5 时 40 分，尼克松复信勃列日涅夫，以强硬的口吻宣称：

“你必须了解，美国决不可能接受单方面的行动，这将违反我们所达成的谅解……对我们两国都将产生难以估计的不利结果，并将使我们经过艰苦努力争取实现的一切目标全部结束。”基辛格知道勃列日涅夫死要面子，在 10 月 25 日中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注意不伤害苏联人的自尊心：

“我想说明一点，到目前为止，苏联还没有采取任何不可挽回的行动，我们希望不会采取这样的行动。我们不是在寻找机会与苏联对抗，我们并不要求苏联撤销它所做过的任何决定。”不见勃列日涅夫回答，白宫空气紧张得简直要爆炸了，尼克松赶紧再给苏联领导人写信，坚决反对苏联单独出兵中东，但可考虑由联合国派出不包括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军队。

这时，萨达特已意识到把美苏军队引进埃及不是好事，表示同意派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在此情况下，勃列日涅夫的态度终于软了下来，给尼克松回信，好像完全没有发生昨天夜里的危机，根本不提一再坚持的要苏联单独派兵的威胁，实际上向美国屈服了，但却打肿脸充胖子，以一贯的“高傲姿态”，硬把停止对抗说成好像是美国屈从于苏联的压力，甚至把过去 24 小时美苏濒临战争边缘的危机事件，说成是美苏“更加合作的前奏”。

尼克松、基辛格相视苦笑，但庆幸勃列日涅夫总算缩回去了，眼前的危险终于过去了，接着又压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不准歼灭埃及第三军团，以色列说什么也不干，基辛格大发雷霆指责梅厄夫人采取“自杀做法”，梅厄夫人无奈，只得下令以色列国防部长达扬撤回以色列军队，第四次中东战争才得以收场，这正是：

沙海鏖兵战犹酣，阿以冲突再开战。

可笑苏联自取辱，两霸激斗在热线。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搬弄是非 挑动印度狂徒发动侵巴战争 别有用心 唆使甘地夫人肢解巴基斯坦

话说二次大战后特别是 70 年代，中美苏在印度、巴基斯坦关系问题上，进行过多年错综复杂而又奥妙无穷的斗争。

在 50 年代，中国和巴基斯坦间存有重大障碍，而和印度关系友好，后来才发生难以预料的复杂变化。

在 50 年代，中印两国关系友好，中国声援印度收复果阿的斗争，与印度、苏联一起主持国际正义，反对美国在联合国搞诬蔑中国为侵略者的决议，主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特别是中印两国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苏联一起反对美国的侵略，受到世界人民的广泛赞扬，尤其是在 1955 年召开的亚非会议上，中印总理友好协商、密切合作，共同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做出了贡献。

那时候，中巴关系存在重大障碍，因为那时巴基斯坦同美国结盟，是美国拼凑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组织成员国，追随美国敌视中苏，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在台湾问题上深受美国蒙蔽。

考虑到巴基斯坦是南亚地区第二大国，在地缘政治上具有重要地位，周恩来在与巴基斯坦交往中，强调中巴山水相连、友好关系源远流长，愿与巴人民友好往来，因而从 1953 年 12 月开始，

对已参加美国拼凑的军事集团、谈判缔结巴美军事协约表示异议，指出这是直接关系中国的安危的问题。

巴基斯坦总理阿里认真考虑周恩来的意见，感到中国、苏联是世界政治大国，不愿得罪中、美、苏任何一方，便在 1954 年 2 月 13 日指示巴驻华大使罗查将军到中南海西花厅会见周恩来，说明巴基斯坦与美国签署军事协定是为了得到美国的援助，绝对没有敌视中国的意图。

周恩来热情地招待罗查大使，欢迎巴基斯坦主动对此问题做出澄清，也坦率地讲出中国的观点，认为巴美军事协定严重损害巴基斯坦本国人民的基本权利，有碍该国主权，也对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的安全构成新的威胁，加深了国际紧张局势。

周恩来坦率地向巴基斯坦朋友指出，组织军事集团是美国统治者妄图建立世界霸权的实力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矛头是针对中苏，首先是中国的，他恳切地对 1956 年 10 月访华的巴总理苏拉瓦底说：

“这个军事同盟不仅支持美国在远东以中国为主要敌对目标的政策，并且便利美国从各方面侵略亚洲国家。根据这个条约，美国可以借口实际并不存在的所谓‘共产党侵略’，任意散布恐惧和疑虑，在亚洲制造分裂，唆使一些亚洲国家去反对另外一些亚洲国家。根据这个条约，美国可以借口防止和对付所谓‘颠覆活动’，任意干涉东南亚各国的内政，镇压亚洲的民族解放运动。根据这个条约，美国可以利用‘经济措施’的条款，搜刮东南亚地区的战略原料，奴役这个地区的人民，建立美国自己的殖民统治。根据这个条约，美国还可以借口‘危及本区域和平的任何事实和情势’，任意指定它的所谓‘保护’区域，把它的武装干涉扩大到亚洲其他地区。”

苏拉瓦底听得津津有味，真诚地表明心迹说：“巴基斯坦对中国没有恐惧感，两国没有利害冲突，巴没有侵略野心，希望同中国友好，愿意同中国建立更多的联系，不怕美英因此生气！”

周恩来身向前倾，直率地再次提出巴基斯坦参加两个军事条约的问题，目光炯炯地直率相劝：

“中国对巴基斯坦没有恐惧，只是担心巴基斯坦参加这两个军事条约组织，会被美国用来制造紧张局势，甚至在巴基斯坦建立军事基地来威胁中国。”

苏拉瓦底急忙分辩，保证不追随美国参加侵略和威胁中国的战争，周恩来满意地点点头，双手抱在胸前，揭露美国的阴险目的说：

“民族主义国家想同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同时保持友好关系，要求独立的经济发展而不受任何一方的控制，对此，我们是赞成的，但是美国并不这样。杜勒斯公开说中立是不道德的。巴基斯坦参加两个条约组织，我们还是对巴基斯坦友好，因为相信你们的善意。你们愿意同双方都做朋友，也许你们在这方面能做更多的工作，可以劝说双方和缓局势、和平共处，我们希望巴基斯坦能起这样的作用，使巴基斯坦参加的条约的侵略性质逐步消失。我们在思想意识上有所不同，但在政策上可以找到共同点，共同为和平正义而努力。”

周恩来的真诚立场感动了巴基斯坦人，布托外长 1963 年专程来华签订《中巴边界协定》，亲切地对周总理和陈毅外长说：“由于巴基斯坦不追随美国采取反华的立场，东南亚条约组织已经失灵了，而且这种症状还得继续下去，巴格达条约组织也在起着类似的变化。”

1964 年 4 月，周恩来访问印尼，同亚非国家领导人磋商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问题，巴基斯坦外长布托也为此来到雅加达，老朋友见面分外亲热，布托向周恩来倾诉衷肠道：

“由于巴基斯坦的反对，东南亚条约组织基本上已失去作用，美国对此十分恼火，推迟了阿尤布总统对美国的访问。”这正是：

朋友相交贵赤诚，坦率共处增友情。

主持正义不反华，条约失灵利和平。

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和美英帝国主义的恶意挑拨，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为克什米尔等问题长期不和，甚至兵戎相见，两国都极力拉拢中国对其予以支持，中国则坚持不偏不倚，当印巴冲突的“调和人”。

毛泽东接见印巴客人时，多次劝说印巴和解，互相协商，互相妥协，免得被美帝国主义利用，他风趣地劝尼赫鲁说：

“朋友之间有时也有分歧，有时也吵架，甚至吵到面红耳赤，但是这种吵架同我们和杜勒斯吵架，是有性质上的不同的。”

周恩来也从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大局着眼促使印巴和解，1956 年 1 月语重心长地对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阿哈默德说：

“巴印是源出同一母体的姐妹国家，应为两国人民的利益着想，友好相处，通过协商解决分歧，勿为外人利用而损害两国团结，这就是万隆精神。”

当印巴双方利用各种机会要求中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对其予以支持时，周恩来都坚持从反帝反殖的大局考虑，劝双方坐下来协商解决，他对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的求助要求的回答最语重心长：

“我即将去印巴访问，也将对双方履行同样的劝和使命。在这个问题上，我也许会一事无成，但我不灰心，要继续努力，因为你们两家和好，对亚洲和世界和平都有好处。”

后来，印度在美苏挑唆支持下，扩张主义恶性膨胀，尼赫鲁竟然扬言，

印度以其地位不能在国际事务中只当二三流角色，要么做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甚至依仗美国和苏联的支持，对巴基斯坦、中国、锡金等国玩弄地区霸权主义，这就要分清是非，痛击地区霸权主义了。

1965年9月6日，印度在美苏支持下，大举入侵巴基斯坦，发动了不宣而战的侵略战争。

美国、苏联为什么支持印度对巴基斯坦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呢？

美国原来与巴基斯坦关系密切，对巴提供了一些经济和军事援助，但从60年代初期巴基斯坦与中国改善关系逐渐使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组织失灵后，美国就对巴基斯坦施加粗暴的压力，而在印巴冲突中越来越偏袒印度。

美国长期对印度推行笼络之策，在印度扩张主义者推行地区霸权主义后，美国对其反华活动颇为欣赏，对印度多次挑起中印边境冲突大加奖励，提供大量军经援助。

赫鲁晓夫为制服中国，早就看中了印度。1955年12月，赫鲁晓夫就声称克什米尔是印度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赫鲁晓夫其后的苏联领导人也都偏袒印度，支持印度对克什米尔的兼并政策，他们不顾事实为印度的对外政策涂脂抹粉，吹捧印度忠实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唆使印度从事反对中巴的活动，苏联对印度提供了大批军经援助。到1965年9月，苏联已给和答应给予印度的经济援助共达80多亿卢比，使印度从苏联提供的军事援助中，获得了大量飞机、坦克、大炮、潜水艇等先进武器。

印度在1965年发动的侵巴战争是由克什米尔问题引起的。1965年8月，为反抗印度当局的残酷统治和宗教迫害，克什米尔印占区的穆斯林爆发了大规模武装抵抗活动，印度政府派出大批军警进行血腥镇压，又得寸进尺，公然破坏印巴两国早有协议的停火线，派军队侵入巴基斯坦控制区，接着又依仗有美国和苏联背后撑腰，9月1日挑起印巴间的大规模武装冲突，还派飞机侵入巴基斯坦本土的领空。

为给巴基斯坦施加要其向印度妥协投降的压力，美国早在1965年7月间就宣布延迟对巴贷款。印巴战争一开始，美国就借口坚持不偏不倚态度，停止了对印巴双方的军援。美国此手极毒，因为印度可以毫无阻碍地从苏联得到大批贷款和武器，巴基斯坦则无此可能，巴基斯坦忍无可忍，便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控诉。

美国开始还把中立挂在口头上，不几天就公然站在印度立场上诬蔑巴基斯坦挑起战争，美国驻印度大使鲍尔斯公开宣称：

“美国政府同情印度，接受关于印度遭受巴基斯坦侵略这一看法。”

美国总统约翰逊发现，他与勃列日涅夫在支持印度对付巴基斯坦问题上有惊人的共同语言，就指示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戈德堡同苏联代表协同步调，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貌似中庸实则支持印度的决议。

9月1日，巴基斯坦军队对印军的猖狂进犯发起英勇反击，加上克什米尔印占区穆斯林的大力支持，很快击退了印军的进攻。

约翰逊、勃列日涅夫见印度军队在克什米尔节节败退，印军处境困难，便指示美苏驻联合国代表设法支持印度，操纵安理会于9月4日通过了呼吁印巴双方停火的决议，根本不提印度首先破坏印巴两国早有协议的停火线，从而使印度军队获得喘息时间，觉得有美国、苏联和联合国安理会的支持，更加有恃无恐。

9月6日，印度军队在美苏大力支持下，在拉合尔方面大举侵入巴基斯坦国境，并出动大批飞机对巴基斯坦临时首都拉瓦尔品第等城市狂轰滥炸，从而发动了不宣而战的侵略战争。

美苏为让印度彻底教训胆敢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的巴基斯坦，在印军入侵巴基斯坦大片领土的情况下，又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一项决议，根本不提印度发动和扩大侵略巴基斯坦的事实，不站在正义公正的立场上责令印度停止侵略行径，不命令印度从巴基斯坦国土上撤走侵略军队，只笼统说到战争扩大，加剧了西亚局势的严重性，事实上包庇纵容印度侵略，歪曲事实真相，为印度的侵略行径开脱。

印度扩张主义者自以为有美苏支持，在发动侵巴战争的同时，也在中印边境进行挑衅活动。印度利用锡金的保护国地位，派军队越过明确划定的中国与锡金的边界，侵入中国境内设置工事，蓄意进行骚扰。为打击印度扩张主义者的嚣张气焰，中国政府9月7日郑重发表声明称：

“印度对它任何一个邻国的侵略都是关系到它的所有邻国的。既然印度政府跨上了侵略巴基斯坦的第一步，它就不能逃脱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后果。”

中国警告印度必须退还在中锡边界盘踞的中国神圣领土，印度却矢口否认，堂堂中华民族岂能任印度欺压？中国政府9月16日向印度当局提出明确要求说：

“中国政府现在要求印度政府在文到之日三天内，拆除它在中锡边界中国一侧和跨中锡边界线上的所有侵略工事，并且立即停止在中印边界和中锡边界的一切入侵活动，送回被劫走的中国边民，归还被抢走的牲畜，保证今后不再越境骚扰。否则，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必须由印度承担全部责任！”

印度当局接到中国的强硬照会，不能不想到1959年、1962年两次挑起中印边境争端遭到的沉重打击，晓得中国人说话的份量，不得不向中国发来照会，承认在中锡边界的中国一侧设有工事，极不情愿地表示有解决问题的意愿。中国宽宏大量，把三天期限延长到9月22日的午夜12时。

5天后，西方记者发现中锡边境地区的印军已全部撤走，越境建造的工事也都平毁，认为中国既保卫了本国领土主权的神圣威严，客观上也给正在发动侵略战争的印度扩张主义者以沉重打击，对正在进行反侵略战争的巴基斯坦人民更是肯定而及时的支援。印度扩张主义者认为这是中国在印巴战争期间对巴基斯坦人的配合行动，妄想借此大做文章，也是枉然无力的，这正是：

印巴相争起烽烟，又向中国挑争端。

侵我主权岂能容，欺软怕硬羞人间。

中国对在其西南边界发生的这场印度侵略巴基斯坦的战争十分重视，认为这场战争由克什米尔争端引起，印度为霸占整个克什米尔，与巴基斯坦争斗十年也无结果，克什米尔地区的穆斯林不买印度的账，不肯做印度的顺民，他们聚众抗议，发起武装暴动，印度当局出兵镇压，才酿成印巴间的全面战争。它又不单是印巴之争，实际上贯穿着中美苏三国的复杂斗争。

9月7日，中国政府正式发表声明，严厉谴责印度扩张主义者发动以强凌弱的侵略战争，坚决支持巴基斯坦人民奋起进行反侵略的正义斗争，严正警告印度政府要对这一扩大侵略的行为承担一切严重后果。

同日下午，周恩来总理先后接见巴基斯坦民航主席阿斯加·汗和巴驻华

大使罗查，毫不含糊地对巴进行反侵略战争表示坚决支持。

9月9日晚，朝鲜驻华代办郑风珪隆重举行朝鲜国庆招待会，西方驻北京记者很快发现这个国庆招待会很一般，中国以最强阵容出席：不仅周恩来总理届时光临，国家主席刘少奇、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等领导人物也打破惯例全都出席，觉得这是中国异乎寻常的举动，认为这固然是对兄弟国家朝鲜的特殊尊重，也预示着中国将有重大外交举措。

果然，周恩来今天神情格外庄重而威严，以堂堂凛然正气发表义正辞严的演说，立即震动了全场，震动了华盛顿、莫斯科和新德里：

“美帝国主义及其合伙者摆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好像印巴之间根本没有什么是非，印度的侵略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他们联合起来利用联合国，一股劲地呼吁不分是非的和平。这是骗不了人的！”

周恩来揭穿美国约翰逊政府是唆使印度发动侵巴战争的罪魁祸首，又反驳印度扩张主义者把自己说成是“正义力量化身”的谬论，以犀利的语言剥下印度扩张主义者的画皮说：

“印度是侵略者，无论是在克什米尔的局部冲突中，或者是在印巴的全面冲突中，印度都是赤裸裸的侵略者。中国政府坚决支持巴基斯坦反侵略的正义斗争，毫不动摇地支持克什米尔人民争取自由和自决的斗争，严厉谴责印度的侵略行为，严正警告印度政府，要对扩大侵略的一切后果承担全部责任。”

西方记者见周恩来剑眉高挑，神态庄重，不怒而威，几句话就概括出印度扩张主义者的侵略本质，可谓不畏强暴，真正为巴基斯坦等弱小的被侵略国家讲了话，真是世界上最主持正义的外交家，正在谱写世界当代外交史的新篇章。西方记者一个个听得兴味盎然，争相以最快速度，将中国总理的划时代发言作为头等重要新闻发往全世界。只见周恩来以更威严的神态，将矛头指向印度扩张主义者的真正后台约翰逊政府：

“几个月来，美帝国主义就用尽种种手段，压迫巴基斯坦放弃独立自主的政策。印度对巴基斯坦的武装进攻，正是美国这一政策的必然结果。事实是清楚的，没有美国的同情和支持，印度不可能采取这样严重的军事冒险行动！”

美国记者对中国只谴责美国不谴责苏联，感到很不服气，见苏联记者趾高气扬，幸灾乐祸，就要向周恩来提出这个问题，周恩来明察秋毫，又发出重型炮弹：

“在这当中，苏联人也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他们反复说什么克什米尔是印度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不是公开鼓励印度走上军事冒险的道路吗？”

当时巴基斯坦面临灭顶之灾，对中国寄托着无限的希望，见世界上只有中国敢于仗义直言，谴责美苏两霸支持印度发动侵巴战争，巴驻华大使罗查将军激动得满含热泪，同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邓小平总书记紧紧握手，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千言万语汇成这样一句话：“中国是巴基斯坦最可靠的朋友！”这正是：

有道患难见真情，敢揭两霸抓真凶。

不畏强暴主正义，大小霸权露原形。

美国和苏联见中国坚决支持巴基斯坦反击印度大规模入侵，就从经济、军事上援助印度进一步扩大侵巴战争，使巴基斯坦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

为主持国际正义,中国副总理兼外长陈毅元帅 9 月 29 日主持大型记者招待会,义愤填膺地发表讲话称:

“巴基斯坦是受害者,印度是侵略者,这是事实。最近印度军队继续在拉哈尔地区发动进攻,我们不希望事态扩大,中国政府和人民当然要在道义和物质上给予巴基斯坦支持,这是肯定的!”

这时,印度扩张主义者仗着有两霸做后台老板,头脑发热,一意孤行,陈毅以大无畏气概向其发出严重警告:

“不要仗着美国、苏联等国的支持,就企图为所欲为,这是吓不倒人的。我们希望它有所觉悟。”

巴基斯坦军民在中国和世界舆论支持下英勇作战,多次击败入侵巴基斯坦国土的印军;印度虽有美国和苏联支持,但战争的非正义性决定它不得人心。几个回合下来,印巴双方打成平手,印度扩张主义者只得从巴基斯坦撤军,虽恨恨不止,却也无可奈何。

印度扩张主义者 1965 年发动侵巴战争失败后仍不甘心,处心积虑寻找复仇机会,到 70 年代初,终于等到了机会。

1970 年是巴基斯坦罕见的凶灾之年,天下大雨,河水倒灌,泛滥成灾;穆吉布的人民联盟在大选中获胜,要求巴基斯坦实施松散的联邦制、东西巴各自高度自治,被巴总统叶海亚拒绝,东巴便宣布独立,叶海亚出动军队镇压,东巴军队兵败, 1000 多万难民漫山遍野向印度涌去。

印度总理甘地夫人幸灾乐祸,欢欣鼓舞,急忙调集军队准备进攻东巴。印度陆军参谋长马内克肖头脑较冷静,他认为中国是巴基斯坦的亲密邻邦,1965 年发生印巴战争时,中国曾大力支援巴基斯坦,现在又公开声明支持巴基斯坦维护领土主权完整,反对外来干涉,给印度敲响了警钟,他奉劝甘地夫人小心从事。

一提到中国,印度的文臣武将便心有余悸,大都认为中美关系正在解冻,尼克松正同毛泽东、周恩来有滋有味地跳小步舞、打乒乓球,不好拉拢,而抱定苏联粗腿,就能有效地牵制中国,再把进攻巴基斯坦的时间选择在 11 月,那时中印边界大雪封山,飞鸟难过,中国就难以出兵援助巴基斯坦。

甘地夫人听罢大喜,便派印度外交部长达尔飞抵莫斯科,向勃列日涅夫讨教。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推行霸权主义,图谋染指南亚已非一日,支持印度进攻巴基斯坦,正好从南面包围中国,便对达尔热情招待,密商“教训巴基斯坦和中国之策”,勃列日涅夫又派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赶往印度,同甘地夫人商谈对付中巴的方策。

苏印一拍即合, 1971 年 8 月 9 日签订了“苏印和平友好条约”,其第九条规定,任何一方遭到“战争威胁”,双方都将迅速协商行动。明眼人不难看出,虽名曰“和平条约”,实际上却是公开支持印度反对中国、肢解巴基斯坦的战争条约。

印苏条约一签订,苏联的大批军火就源源不断运往新德里,甘地夫人腰板顿时硬了起来,煞有介事宣称“印度受到巴基斯坦攻击,不得不自卫反击”,于 1971 年 11 月 21 日派数十万印军越过边境线,对巴不宣而战,第三次印巴战争爆发。

巴基斯坦军队与东巴游击队已纠缠半年之久,早已疲惫不堪,东巴游击队溃不成军,不得不化整为零活动,巴基斯坦军队在精疲力竭之时突然遭受

几十万印军的猛烈攻势，又有东巴游击队聚集起来予以配合，因而已军虽在局部地区顽强作战，但毕竟抵挡不住印军的猖狂进攻。

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边命部队拼命抵抗，边尽力争取国际社会支持。

巴基斯坦驻联合国代表布托是个很精明的政治家，他见中、美、苏三国围绕印巴战争正在进行复杂的斗争，就精心设下利用中、美、苏三国微妙关系之计。他与同为卓越政治家的女儿贝·布托商量妥当，当苏联驻联合国代表来访问布托时，女儿就进来报告，假称有美国人或中国人打电话找；如果美国外交官来访，就报告苏联人打电话找，以利用美苏矛盾，寻求巴基斯坦的最大利益。

印度在苏联支持下肢解巴基斯坦触犯了美国在南亚的利益，美国就同维护正义、反对侵略的中国有了一些“共同语言”。

印度对巴基斯坦不宣而战的第三天，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把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黄华请到纽约东 30 区一幢陈旧的褐色楼房内，带来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提案，征求中国的意见，协商反对苏联在印度次大陆推行霸权主义的方策。

于是，在第二天的联合国安理会上，中国代表黄华痛斥印度在一个大国支持下悍然肢解巴基斯坦，宣告中国将坚定不移地支持巴基斯坦军民的反侵略战争。

接着，美国代表提出要求印巴立即停火、印度迅速撤军的决议案。

甘地夫人见美国提案得到大多数国家的赞同，急忙向勃列日涅夫求救，勃列日涅夫便命苏联代表行使否决权，否决了美国提案，其后十几个提案也被苏联蛮横否决。各国代表均表示气愤，只得寻找绕开苏联提交联合国大会讨论的途径。

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见苏联如此无耻地包庇、纵容印度侵略者，感到中国主持正义最可靠，便命巴驻华大使凯瑟 11 月 24 日紧急拜会周总理，递交叶海亚总统的求援信。周恩来对这几天的印巴战争的进展表示关切，答应将采取重大措施支援巴基斯坦的正义斗争。

11 月 29 日，周恩来和李先念副总理出席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罗博为庆祝阿解放 27 周年举行的招待会，李先念义正辞严发表谈话说：

“最近几天来，印度政府在苏联的支持和鼓励下，对东巴基斯坦进行颠覆活动和军事挑衅，加剧了南亚次大陆的紧张局势。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当前印巴局势十分关切。中国认为，国与国之间的争端应该由当事国双方通过和平协商求得解决，而决不应诉诸武力，更不应以任何借口动用大量武装部队任意越出国境，侵占别国的领土。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反对外来侵略、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为了缓和当前的紧张局势，中国方面认为叶海亚·汗总统关于印巴两国武装部队从边界各自后撤、脱离接触的合理建议，应该得到认真的考虑。”

印度依恃苏联背后支持，不顾中国等爱好和平国家的严正要求而变本加厉，12 月 3 日向巴发动全面进攻。

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一面指挥部队拼死抵抗，一面向国际社会发出呼吁。12 月 4 日，中国常驻联合国安理会代表黄华在安理会紧急会议上仗义直言说：

“东巴问题纯属巴基斯坦内政，任何人无权干涉。印度政府以东巴问题为借口，武装侵略巴基斯坦，这是不能容许的。”

苏联利用否决权，12 月 4、5 两日连续否决两个要求印巴双方立即停

火并把军队撤至本国领土的提案。广大国家非常气愤，强烈要求召开苏联不能行使否决权的联合国大会。在 12 月 7 日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激昂慷慨，提出中国的

主张：

“联合国必须做到：（一）严厉谴责印度对巴基斯坦的侵略，彻底揭露苏联对印度侵略者的可耻支持；（二）呼吁所有国家支持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反击印度侵略的正义斗争；（三）要求印度政府把它的武装部队和它派遣的武装人员立即无条件撤出巴基斯坦领土，巴基斯坦政府为进行反击而进入印度领土的武装部队也撤出来；（四）建议双方武装部队从印巴边界各自后撤，脱离接触，为和平解决印巴争端创造条件。”

经中国多方做工作，联合国大会以 104 票赞成、11 票反对、10 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要求印巴停火、撤军的决议，表达了多数国家对苏联支持印度武装侵略巴基斯坦行径的强烈愤慨。

对此决议，巴基斯坦立即宣布接受，印度却粗暴拒绝，派出侵略军直逼东巴首府达卡，还命海军封锁东西巴港口和海道，指挥空军对巴狂轰滥炸。

12 月 13 日，苏联应印度请求，否决了安理会要求印巴停火、撤军的提案，从而为印军攻占达卡赢得了时间，甘地夫人命印军趁机攻陷达卡，彻底打败巴基斯坦。

对此，中国答应坚决支持巴基斯坦打到底，美国也派第七舰队航母“企业号”率一支特混舰队驶入孟加拉湾，露出美国准备进行军事干预的迹象。在纽约，黄华与基辛格频繁接触，商谈对付印度之策，美国、中国与苏联、印度间的军事对抗正在酝酿之中。

谁料巴基斯坦指挥官尼亚兹缺乏英雄气概，手下还有 9 万人却于 12 月 16 日向印度投降，中国、美国再想帮助也无济于事。这一来，美、冲、苏三国间倒是免去一场战争危机，但中国政府并不因此而改变对这场战争性质的原则态度，12 月 16 日发表中国政府声明称：

“印巴战争是一场侵略和反侵略、分裂和反分裂、颠覆和反颠覆的斗争。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的反侵略、反分裂、反颠覆的斗争，不仅在政治上这样做而且将继续在物质上给予援助。”

孟加拉国成立初期与苏联、印度关系密切，但苏联、印度都依仗支持孟加拉建国“有功”，竭力控制孟加拉，苏联在孟加拉大搞情报活动，导致 1983 年孟加拉国驱逐苏 14 名外交官；印度在印孟边界架设铁网、枪杀孟边民，也引起孟加拉国的强烈抗议。

在苏联、印度欺侮太甚的情况下，孟加拉国转而与中国发展关系，1975 年中孟建交后双方领导人频繁互访，进行互利的经济贸易合作，谱写出中孟友谊的新篇章。与此同时孟加拉国与美国发展关系，到 1987 年美向孟提供的援助达 24 亿美元，其中粮食援助约占一半。这正是：

友好共处莫相欺，霸权主义被人斥。

纵令一时得甜头，终究反目信无疑。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变本加厉 美国招侵越战争扩大到者挝 嫁祸于人 苏联将西哈努克硬推给中国

话说尼克松是个颇有战略头脑的美国政治家，他抓住美国在侵越战争中越陷越深的机会，在总统大选中提出了“结束越南战争”的口号，击败在位总统约翰逊，1969年1月20日，于阴沉沉的隆冬登上美国总统的宝座。

美国侵越战争始于肯尼迪任内，到约翰逊任内侵越美军总兵力达到54万人，加上南越伪军80多万，却连连遭到惨败，美军伤亡30多万人，消耗了美国大量财力，美国人民反战运动风起云涌，尼克松以“结束越南战争”的竞选口号获得大选胜利，但真要他从越南撤军时，他却又大肆讲究“体面地撤出”越南了。

尼克松以反共斗士起家，按他的脾气，越南战争不但要继续打，而且要大打，但他有较高的政治敏锐性，他认识到美国打不赢越南战争，在越南谋取“全面的军事胜利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但又不肯“背弃美国早就做出的支持南越的承诺”而撤退侵越美军，因而只能临时应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被动挨打，边走边瞧。

尼克松人主白宫刚满一个月，中国和苏联就支持越南人民武装力量向侵越美军发动了一次大规模攻势。

如何对付中苏支持的越方攻势？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惠勒提出恢复轰炸北越的命令，尼克松担心恢复轰炸会在美国和世界上掀起轩然大波，不敢贸然行事。

惠勒又提出用B—52战略轰炸机轰炸柬埔寨境内的“共产党庇护所”，尼克松认为此议可行，就悍然下令对柬埔寨实行轰炸，但美政府内又有人强烈反对，尼克松只好两次收回成命。到1969年3月中旬，尼克松才下令偷偷摸摸出兵轰炸柬埔寨。这样，尼克松上任不到两个月，就把侵越战争从空中扩大到了柬埔寨。

尼克松知道狂轰滥炸不能摆脱美国侵越战争的困境，又伙同国防部长梅尔文·莱尔德、前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提出了“越南战争越南化”计划，1969年7月25日在关岛发表尼克松主义，宣称就国际安全和军事防御问题而言，“美国将鼓励而且有权期望亚洲国家本身将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处理这个问题，对此承担起责任来。”

为和南越伪总统阮文绍商讨从南越撤走美军的问题，尼克松要到西贡视察，但他害怕越南人民武装射击他的座机，虚晃一枪说他此次的亚洲之行不打算到越南去。

7月30日，尼克松乘一架直升机匆忙飞向西贡的南越伪总统府，由于担心南越游击队袭击，慌忙从云端像一块石头一样呼啸而下，栽到阮文绍办公室外的林木之间，几乎起火要了尼克松的命。

尼克松视察了西贡附近的美军营地，事前把越南人全部赶回家去，届时美军在地面层层保护，空中有大批武装直升机像蜂群一样巡逻，尼克松才敢大着胆子出面给侵越美军打气，声称西贡“不会成为胡志明市”。没想到6年后西贡偏偏改名胡志明市，成了天大的笑话。

尼克松见越南战场形势不利，恢复对越轰炸也收效甚微，美国人民的“反对死亡进军”却声势浩大，他又被迫三次宣布从越南撤军，但这位“反共斗士”性情固执，刚愎自用，仍妄想在不利情况下侥幸取胜。

尼克松的侥幸取胜之策是把战争从地面上扩大到柬埔寨，捣毁中苏越的“庇护所”，先占领柬埔寨，再回过头来对付越南人民武装。

在尼克松眼里，当时的西哈努克亲王公开站在中国和苏联一边，与美国作对。

在尼克松看来，西哈努克与毛泽东、周恩来保持着长期的特殊友好关系。

尼克松非常清楚，1954年日内瓦协议签订后，法国军队一撤走，美国就乘虚而入，趁西哈努克出国访问之机，压柬埔寨与美国签订了提供军事援助的协定，派美国军事顾问常驻金边，企图控制柬埔寨。

中国总理周恩来敏锐地一发现美国公然违反日内瓦协议，就发表声明指责美国破坏柬埔寨的和平中立地位，要求负责监察和监督日内瓦协议实施的国际委员会对此进行干预。

在柬埔寨面临被美国控制的紧要关头，西哈努克亲王于1955年9月出任首相，推行与中国和苏联友好的政策，宣布柬埔寨不同外国订立军事同盟，不向外国提供军事基地，不允许外国把柬埔寨作为军事转运站，不接受美国拼凑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别有用心心的“保护”。

1955年的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设午宴招待西哈努克，两人结下了深厚友情。西哈努克说他最信任中国，不担心中国干涉柬埔寨内部事务，他对周恩来推崇备至：

“周恩来那高超的智慧、渊博的学识和文雅的风度，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住了。他向我介绍他的助手陈毅元帅，陈毅也成了我最要好的朋友之一。”

1956年2月，西哈努克应邀访华，毛泽东与他进行了亲切的会谈，赞扬西哈努克政府推行的新政策，指出柬埔寨的和平中立政策在国际上有很大影响。

同年11月，周恩来应邀访柬。就在中国代表团离开印度前往金边时，突然传来柬埔寨国王英年驾崩的噩耗，要不要马上赴金边就成了争论的问题，有人主张推迟访问，周恩来善解人意，他认为在西哈努克亲王内有丧父之哀、外有美国压力的情况下，应该按计划如期访柬以示支持，于是决定访柬计划不变，临时找印度裁缝为中国代表团成员每人赶做了两套丧服。

当中国代表团走下飞机时，西哈努克一下惊呆了，发现周恩来等全身素装，堂堂大国总理竟为一个小国国王去世改穿素服，他激动地流下眼泪，紧紧握往周恩来的手，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周总理，谢谢你！”

当身穿白色丧服的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访问金边市区时，被臂带黑纱的柬埔寨民众围得水泄不通，周恩来的一片赤诚融化了国王去世引起的悲哀气氛，扫去了柬埔寨人对中国的疑虑和不安，争相把花环套在周恩来的脖子上，远处的柬埔寨市民纵情欢呼，将花环抛过来，顿时，鲜花飞舞，似雪片飞扬，象征着中柬友谊的灿烂春天……

与此同时，西哈努克多次访问苏联，苏联也不断向柬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赫鲁晓夫1962年向西哈努克写信，称苏联是“柬埔寨最可靠的朋友”。1967年，苏联向柬赠送一批战斗机、运输机和高射炮，发表声明承认柬现有边界内的领土完整。1968年，柬国防大臣杨森安访苏，苏向柬提供550万卢布的军援。1969年，柬武装部队总司令刁龙访苏，联系向苏联购买海军装备问题，不久苏联驱逐舰“布列斯佳奇顿号”访柬，西哈努克登舰参观，宣称苏舰访柬将光辉地载入两国友好史册。

为削弱中国和苏联在柬埔寨的巨大影响，尼克松暗中策划柬埔寨右派朗

诺、施里玛达发动搞掉西哈努克的政变。

1970年3月17日，美国总统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基辛格给尼克松撰写了一份备忘录，报告朗诺打算扩充右派军队1万人。尼克松立刻做出批示：要搞一份计划帮助朗诺实现这个目标。

3月18日，朗诺、施里玛达趁西哈努克不在国内之机发动政变，建立亲美政权，由朗诺出任首相，尼克松大喜，指示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拟订并执行一项计划，为柬埔寨亲美分子提供最大限度援助”，指示中央情报局在金边建立情报站。

朗诺要求美国紧急提供10~15万件武器和大量弹药，美国没有及时提供，尼克松得知情况大发雷霆，让基辛格催促有关方面尽快落实。

3月18日，西哈努克正在苏联访问，不知道柬埔寨已发生政变。勃列日涅夫缺乏战略眼光，只图眼前利益，见西哈努克已被朗诺推翻，便认为已失去利用价值，就将柬发生政变的消息封锁起来，不告诉西哈努克，而用甜言蜜语把西哈努克哄上开往北京的飞机，把这个包袱甩给中国。

3月19日，周恩来亲自到机场欢迎西哈努克，见西哈努克喜气洋洋，仍被蒙在鼓里，便悄悄把不幸消息告诉了亲王。西哈努克一下惊呆了，想到自己已被推翻，再看中国仍以国家元首规格欢迎他，仍安排他住在钓鱼台宾馆5号楼，热情招待，甚为感动。

周恩来看西哈努克情绪消沉，便以老朋友身份真诚而问：“你准备退位还是斗争？决定权在你手里。”

西哈努克从周恩来熠熠生辉的眼神里，体会到了真朋友的殷切期望，稍作考虑，坚定地回答：“我准备斗争下去！”

周恩来清瘦的脸上显出欣慰的笑容，双手紧紧与西哈努克相握，充满了战斗的豪情：“我们将与你站在一起，直到胜利！”

西哈努克提出马上回金边与朗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周恩来告诉他，朗诺已利用柬埔寨国会免了你的职务，禁止你返回柬埔寨；尼克松也把你视为侵略印支地区的眼中钉和绊脚石，回去太危险。还劝他说：

“贵国一切恢复正常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请暂时把中国当作你的第二个家吧，我们觉得你不马上回去更好。”

西哈努克不好意思地说：“那太麻烦贵国了……”

周恩来诚恳地笑道：“不要客气，我们有在万隆建立起来的多年的牢固友谊。”

为鼓舞西哈努克的战斗意志，周恩来特意把陈毅外长1964年访柬时写的诗抄赠给他：

勇哉柬埔寨，独立天地间。

复国反法帝，坚心拒美援。

和平树功业，建设战艰难。

声誉日洋溢，人民意志坚。

西哈努克越想勃列日涅夫对他的态度，心里越有气，就向周恩来倾诉衷肠说：“有一种情况使我不安，谢桑告诉我，苏联现在对柬埔寨态度非常谨慎，不少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看苏联的脸色行事。”

周恩来早看透了苏联“老大哥”的本性，轻蔑地说：“苏联一直是这样，现在不仅对柬埔寨如此，对越南也是这样。将来印度支那三国发表声明，苏联将很尴尬，它不得不考虑一下。”在中国大力支持下，西哈努克在柬埔寨

发生政变 5 天后，于北京宣布成立柬埔寨民族统一战线，斗志昂扬地发表《告高棉同胞书》，号召柬埔寨人民奋起进行抗美救国战争。

4 月下旬，老挝、柬埔寨和越南南北双方领导人苏发努冯、西哈努克、范文同、阮友寿在中、老、越边境地区举行印度支那最高级会议，在周恩来的帮助支持下发表联合声明，表示要把抗美斗争进行到底。

为打消美苏的破坏和干扰，周恩来 4 月 13 日就与越、老代表黄国越、富米·冯维希进行会谈，讨论三国四方会议的准备问题；4 月 25 日又亲自赶到广州，在珠海宾馆会见范文同、阮友寿、苏发努冯，帮助解决疑难问题，又举行盛大宴会招待三国四方领导人，庆贺这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取得圆满成功，还给客人带来一件最珍贵的礼物——宣布中国 4 月 24 日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一时欢声雷动，掌声如潮，庆祝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联合抗美斗争从此进入一个新阶段。

尼克松得知这一消息尖下巴气得更歪，他面临侵越美军逐步撤出越南、战争规模缩小和美国人民声势浩大的反战示威引发的蔓延全国的经济危机的压力，又看到勃列日涅夫对西哈努克态度暧昧，朗诺发动政变后，苏联驻柬埔寨大使馆又一直呆在金边，同朗诺集团保持外交联系，就横下一条心，把侵越战火扩大到柬埔寨：在越南打不赢，就在柬埔寨发动突然进攻，以赚回脸面，再从越南撤军。

说着容易做着难，尼克松心头又涌起无限的忧愁，他深知这场战争实际上是他同毛泽东、周恩来、勃列日涅夫的复杂较量。勃列日涅夫虽态度暧昧，但事前已给柬埔寨以部分军事、经济援助，更何况毛泽东、周恩来会毫不犹豫地支持柬埔寨与他斗争。

再说美军和南越伪军一旦入侵柬埔寨，作战是否会进展顺利，能否达到预期之目的，尼克松都毫无把握，而更严重的问题还在美国国内，眼下美国人民的反战运动已呈一触即发之势，侵柬消息一公布，美国民众的反战风暴必将爆发，它好比一把悬在尼克松头上的利剑，搞不好会使他在 1972 年的大选中重蹈约翰逊的覆辙，甚至连他本人和家属的安全都难保证，这不能不使尼克松胆战心惊。

尼克松毕竟是个敢冒风险的人，他感到有几个因素可以给他壮胆：首先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使其元气大伤，支持印支三国有些力不从心；苏联对此态度暧昧，有机可乘；加之美国“军界—工业界集团”和以劳联—产联主席乔治·米尼为首的工人贵族都支持他在印支地区采取“突然的、重大的战争升级活动”，因而尼克松心一横就在入侵柬埔寨问题上下了赌注。

赌注虽下，但尼克松却又无充足兵力可派，这又使他焦的不安。

原来，到 1970 年 4 月，尼克松 1969 年 12 月宣布的从越南分三期撤军的计划已经期满，共撤出美军 11 万人。要入侵柬埔寨，就面临两大难题：一是必须对付美国人民声势浩大的反战运动，第四期撤军数量要大量增加，至少需撤 15 万人；二是若再撤 15 万美军，入侵柬埔寨就无法进行。

尼克松摸着尖尖的下巴向他的总统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基辛格请求锦囊妙计，一时也难坏了博士。他同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侵越美军司令部头目连夜密商，终于想出了一条妙计，兴冲冲向尼克松献上偷天换日之策：

“总统先生，你可以宣布一个巨大的撤军数字，同时把撤军时间延长到一年。”

尼克松摇摇头：“要撤多少人？”

基辛格不慌不忙：“我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惠勒将军仔细磋商，认为可撤 15 万人！”

尼克松大惊：“撤那么多，还能在柬埔寨有所作为吗？”基辛格侃侃而谈：“按每月平均数计算，这比过去略有增加，但是作为补偿，我建议在开始 90 天，只撤出极少数的人，大部分人计划在 1971 年撤出。”

尼克松听出了名堂，他明白这样干可使他在战略上拥有灵活处置的余地，还能在美国公众中造成有利影响，可说是对美国人民反战运动的“迎头一击”，不由击掌赞叹说：

“好办法！宣布一个巨大的撤军数字，可以给美国春季反战抗议风暴迎头一击，而把撤军计划延长一年，开始 90 天只撤极少数的人，就有足够的地面部队派往柬埔寨，真是两全其美、天衣无缝的锦囊妙计！”

话虽如此，尼克松还是心底发虚，当预定宣布美军和南越伪军入侵柬埔寨的日子——1970 年 4 月 30 日来临时，他担心美国人民的反战运动对他不利，遂取消了参加次女朱莉和女婿戴维在史密斯大学的毕业典礼活动。

美国副总统阿格纽认为尼克松不应让美国反战学生吓破了胆，一向敢作敢为的尼克松却不愿在中苏领导人注视之下丢丑，把头一缩说：“不值得为此去冒险。”

尼克松仍担心美国反战学生会找他女儿和女婿出气，就让私人秘书罗斯给朱莉打电话，让她和戴维马上离开学校，到白宫避难。

4 月 29 日晚，尼克松整夜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在床上翻来复去折腾了一个多小时，实在睡不着了，就干脆起床来到林肯室，呆坐到凌晨 5 时 30 分，再仔细修改发言稿，一直到 4 月 30 日晚 9 时，才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全国发表电视演说，宣布已派遣美军和南越军队进入柬埔寨作战，他挖空心思为美国的侵柬行径辩护说：

“这并不是入侵柬埔寨。这个行动的目的并非要把战争扩大到柬埔寨，而是要使实现和平成为可能，以结束越南战争。”

尼克松不知美国的侵柬行动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因而心里发虚，宣读讲稿时不一会儿就找不到念到什么地方了，手忙脚乱胡翻一通，总算找到了应接念之处，才避免了在电视上出洋相。

5 月 1 日，尼克松迫不及待前往五角大楼的美国国家军事指挥中心，听取入侵柬埔寨的战场报告。

尼克松边听汇报边仔细观察墙上的巨幅柬埔寨地图，突然有了重要发现，又有几个“被共产党部队占领的地区”没有包括在进攻命令中去，便当场提出意见：“在南越军队和我们自己的共同努力之下，我们有没有能力对那些地区发动进攻？”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惠勒认为美军在柬埔寨扩大作战范围，将在美国新闻界和国会引起“十分消极的反应”，遭到世界舆论特别是中苏两国的强烈反对。

尼克松决心孤注一掷，将手一挥吩咐：“关于政治上的反应，不妨由我来判断！”

尼克松暗想在中苏美这场新较量中决不能输给毛泽东、勃列日涅夫，就打破他向来不当场在会议中做决定的惯例，以总统兼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身份，一反常态当场下令：

“我要拔除所有那些庇护所。你们要制定必要的计划，然后立即付诸实

施。要把它们铲除干净，不让共产党人利用它们来反对我们！永远不让！”

对美国入侵柬埔寨，毛泽东义愤填膺，坚决支持柬埔寨成立民族团结政府，指示提供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5月19日，毛泽东又决定采取支持柬埔寨的更大步骤和行动。

当晚，周恩来在钓鱼台国宾馆5号楼同西哈努克举行柬埔寨政变后的第十三次会谈，满面春风告诉他一件喜事：

“亲王，明天晚上将发表毛主席的一项声明。毛主席在声明里支持亲王，支持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支持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领导下的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支持全世界人民的反美斗争。毛主席的声明很短，他托我把声明拿来给亲王看，征求亲王对这一声明的意见。”

西哈努克连连向毛泽东、周恩来表示感谢，表示要把抗美斗争进行到底。

5月21日，毛泽东、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118厅会见西哈努克，又共同登上雄伟的天安门城楼，出席首都30万人民支持柬埔寨反美斗争大会，首先宣读毛泽东气势磅礴的“五·二声明”，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毛泽东的声明极大地鼓舞了柬埔寨人民的抗美热情，美军连吃败仗，南越伪军更不愿为美国卖命，因而一败涂地，溃不成军。

更使尼克松吃惊的是美国各地爆发了迅猛而浩大的反战运动，尼克松命令国民警卫队在全国不少城市戒严，派军警进行大搜捕，甚至开枪打死俄亥俄州肯特大学4名大学生，这就是名闻世界的“肯特大屠杀案”，由此激起全国范围的“美国的五四运动”，在威斯康星州等7个州又发生学生焚烧军事建筑和兵工厂事件，40多处发生燃烧弹爆炸起火事件，美国人民发出怒吼：

“如果他们继续对我们的越南、柬埔寨兄弟姐妹进行战争，我们就不仅要到白宫去抗议，而且还要烧掉白宫！”

尼克松原知道打不赢这场侵越战争，他只想把战争扩大到柬埔寨得些小胜，借以提高自己的声望，打击反战派，安抚主战派，压越南在谈判桌上让步，没想到偷鸡不成反蚀把米，但尼克松的过人之处在于他不是死硬派，他看在柬埔寨之战也打不赢，就下令在入侵柬埔寨两个月后，于6月30日从柬埔寨撤军，尼克松进行的侵略柬埔寨的军事、政治赌博，就这样无可奈何结束了。

尼克松绝不想就此乖乖罢手，又在1970年11月20日策划了派直升机偷袭越南北方的山西战俘营之举，企图把越南关押在那里的美国战俘劫夺回来，再大张旗鼓地宣传胜利，届时尼克松将亲自出面与美国战俘握手、拥抱，接见劫后余生的美国战俘和他们的家属，再发表演说，举行记者招待会，借此向中国、苏联炫耀美国的无比强大，以英雄形象代替失败者形象，平息反战运动，以再次连任总统：一举多得，岂不美哉！

尼克松没想到美国情报机器失灵，越方事先已把美国俘虏转移他处，美国武装直升机偷袭了一座空空如也的战俘营，在全世界传为笑柄。

尼克松认为堂堂世界第一强国连小小的越南、柬埔寨都打不赢，未免太失大国总统身份，在柬埔寨发动地面进攻失败后，又想在老挝动手沾点儿便宜，虽不能扭转整个印支战局，却也可赚回点儿面子。

尼克松把侵越战争扩大到老挝的决心虽下，但真要于时发现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主要是担心掀起美国更大规模的反战运动把他轰下台，因而不敢动

用美国地面部队，而决定用南越军队当炮灰，美国只提供空中掩护和炮火支援。由于此次作战不死美国人，因而深得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军方首脑赞许，认为“这是一个很出色的构想”，基辛格认为“其致命弱点是与越南的现实完全不相吻合”。

尼克松何尝不知道基辛格一针见血抓住了要害，但他仍存有侥幸心理，企图借此检验策划已久的“越南战争越南化”的计划到底灵不灵，硬着头皮下达了进攻老挝的命令，声称作战目的在于“攻击在老挝的敌军，以切断胡志明小道”。

1971年2月8日，尼克松一声令下，3万南越伪军在美国空中掩护和炮火支援下，大举侵入老挝境内。

那时，南越军队经美国长期培养、武装，又经过多年战斗锻炼，已发展成为一支100多万全部美式装备、机动性较强的军队，不仅能进行反游击战，还能够向越南北方进攻，比柬埔寨、老挝政府军的战斗力高得多，因而尼克松认为用南越军队进攻老挝，可以稳操胜券。

尼克松命侵越美军帮助南越总统阮文绍制定了进攻老挝的代号为“蓝山719”的作战计划，但却未想到阮文绍已给他的军队下达密令：千方百计保存实力，规定一旦伤亡达3000人，就立即停止侵略老挝的全部军事行动。

这时，老挝人民解放军在中国的大力支持援助下，在寮国战斗部队的基础上，已发展成为很有战斗力的部队，他们为保家卫国，同南越军队展开浴血奋战，尼克松惊呼：“共军的坚强抵抗出乎美国的预料之外，美国驻西贡的司令部又未能针对这一意外剧烈的战斗水平，为南越进攻部队相应地增加必要的空中掩护，结果南越陆军伤亡惨重。”

南越军队本无斗志，又接到阮文绍保存实力的密令，因而在老挝人民解放军和越南南方人民解放武装力量的配合进攻下，大规模败退，在40余天的战斗中，被歼灭1.5万多人，南越军队的4个旅、两个团、8个炮兵营被全歼，其第二骑兵旅旅长被生擒。

尼克松见老挝形势危急，急忙派出大批B—52战略轰炸机轰炸老挝解放区，又利用泰国军队在老挝南部九号公路地区与万象军队一起向老挝解放区发动进攻。

在中国的大力支持下，老挝人民解放军越战越勇，在九号公路战役中取得重大胜利，使尼克松发动的侵略老挝的战争宣告失败。

尼克松发动的侵略老挝的战争是美国侵略印支战争的最后一次进攻性行动，被称为美国侵略印支战争的分水岭。至此，侵越美军已经撤出不少，再想发动地面攻势，也没有足够的部队可供调遣了，因而宣告了尼克松精心泡制的侵越战争“越南化”的彻底破产。

尼克松把侵越战争扩大到老挝，既以失败告终，又激起美国人民更强烈的反战运动，使尼克松焦头烂额，狼狈不堪。

尼克松的过人之处在于，他清醒地认识到美国侵略越南、柬埔寨、老挝的战争打不赢，在历经几次扩大战争的惨败之后，走了个“之”字型道路，要最终设法结束侵略印支的战争了。

尼克松从战略观点出发，认为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最大的敌人是苏联，不能让中国和苏联支持的印支战争把美国拖垮，他就设法尽快缔结美越巴黎协定。

尼克松见越南和谈代表黎德寿态度强硬，知道中苏是越南的后台，便请

中苏两国做压促越南在和谈中让步的工作。

尼克松派基辛格 1971 年 7 月秘密访华，请求中国在巴黎谈判问题上助美国一臂之力，周恩来劝美国痛痛快快撤出越南，不要当猴子留尾巴，才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

尼克松又转而请苏联出面压越方让步。这时，勃列日涅夫正为基辛格访华改善美中关系暗生气，他认为基辛格的北京之行，使苏联一直萦绕脑际的对中美改善关系的恐惧具体化了，觉得绝对有必要对美国采取点儿对策。

于是，勃列日涅夫先通过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向巴基斯坦开刀，设法肢解巴基斯坦，他认为巴基斯坦人是美国人和中国人的朋友，曾为基辛格秘密访华出过力。

在越南问题上，勃列日涅夫也想对尼克松以牙还牙，便让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 1971 年 10 月访问越南，大讲南越傀儡军队软弱，美国国内反战运动风起云涌，总统大选临近，经济危机严重，迫使侵越美军撤得只剩下 7 万人，因而美国不可怕，听苏联的话才有出路，也“要河内提防中国的背叛”。

为表明苏联才是越南的真正朋友，抵制中国的影响，波德戈尔内与越方签订了苏联对越 1972 年度无偿援助协定和新的贷款协定，加速提供军用物资，使越方在 1972 年 3 月从三条战线上发动进攻，尼克松被整得焦头烂额。

尼克松再次请求勃列日涅夫向越南施加压力，勃列日涅夫拿腔作势说华盛顿过高估计了苏联对越南共产党人的影响力，但还是答应为 5 月 2 日恢复巴黎秘密会谈进行斡旋。

这时，尼克松得到报告称，南越解放军的三条战线攻势取得了惊人的胜利，侵越美军和南越伪军沿着高原被切割成两个部分。美国空军对南北越南的大规模轰炸也挽救不了美国的败局，只有一张王牌可打，那就是全面封锁北越并在北越沿海布雷。

这一步非同小可，当年约翰逊由于害怕苏联和中国干预没敢动手，现在尼克松决心试一下。基辛格担心苏联会取消邀请尼克松 5 月 22 日访苏，尼克松却摸透了勃列日涅夫的脾气，一挥手下了孤注一掷的决心：“这次首脑会晤一文不值，不值得用输掉战争来换取！”

尼克松下令对北越狂轰滥炸后，5 月 8 日致函勃列日涅夫，建议美苏共同致力于“消除越南冲突对美苏两国关系和对世界和平造成的恶果”。

5 月 10 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向美国国务卿基辛格递交了一份抗议书，对美国飞机空袭停泊在越南海防的苏联船只、打伤苏联船员提出抗议。基辛格正准备送客，多勃雷宁却毫无告辞之意，主动提出尼克松总统是否打算接见途经华盛顿的苏联对外贸易部长帕托利切夫？

原来，勃列日涅夫让帕托利切夫给尼克松带来了邀请他 5 月下旬访美不变的消息，经基辛格斡旋，尼克松 5 月 11 日接见了帕托利切夫。会见结束后，记者询问美苏首脑会谈是否如期举行。帕托利切夫对此表示奇怪说：“对此，苏联从未怀疑过，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向我提出这个问题！”

美国总统尼克松摸到了苏联的底，就放手对北越进行轰炸，6 个月投下 40 万吨炸弹，几乎相当于约翰逊当政时 3 年密集轰炸的投弹数量总和。

就在美国对北越狂轰滥炸的情况下，尼克松 5 月 22 日赴苏访问，柯西金却唱出异乎寻常和解的调子，最硬的话仅是“越南人在紧要关头可能接受外国军队的援助”。

基辛格对此心领神会，他明白这番话主要是用来安慰河内的，尼克松听到柯西金下面马上补充的一句话笑了，只听柯西金小心翼翼补充说：“根本没有苏联船只载着武器驶向越南。”

适应尼克松的意图，波德戈尔内 1972 年 6 月 22 日再次访问河内，压越南改变在巴黎和谈中不准美国讨价还价的作法，同年 11 月至 12 月，波德戈尔内又邀请越南国会常务委员会主席长征赴苏参加苏联成立 50 周年庆祝活动，勃列日涅夫、柯西金都与长征进行多次会谈，签订了苏联对越南的无偿援助协定和 1973 年换货协定，压越对美国做出让步。于是，勃列日涅夫兴致勃勃指示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转告美国务卿基辛格：

“好消息，北越人已经准备在巴黎会谈中与美国讨价还价，但河内在决定是否应该结束越南战争之前，可能还要等着看看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

越南通过苏联和其他途径深入分析尼克松和麦戈文竞选的情况，看到麦戈文虽然把反对美国干涉、侵略越南作为他整个竞选运动的中心口号，但却无法与在任总统尼克松抗衡，苏联认为麦戈文不可能获胜，还要从尼克松身上打主意。

于是，1972 年 7 月 13 日，越南谈判代表黎德寿接受苏联劝告，与美国谈判代表进行秘密会晤，态度较前大为和解，希望在尼克松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内使美越谈判达成协议，还改变了赶走南越伪政府全体成员的作法，同意除阮文绍外，西贡政府的其他成员都可以暂时保留职务。黎德寿还表示，只要美越双方重新考虑各自的立场，他本人愿为停止越南战争做出“巨大努力”。美国谈判代表知道苏联暗中施加了压力，越南方面才第一次表示要考虑采取这种妥协态度。

苏联软硬兼施对越南施加压力之后，越南谈判代表黎德寿在 8 月 1 日的巴黎秘密会谈中，做出更大让步，不仅不要求南越总统阮文绍辞职，而且放弃了在组成南越三方联合政府问题上的否决权，不再将这个三方联合政府看成是临时性机构。

尼克松对越方在巴黎会谈中“前进的步子如此之大”简直不敢相信，让基辛格向多勃雷宁表示感谢，又命基辛格紧急前往西贡，劝说阮文绍抓住这个难得的有利机会。组成南越“民族和解委员会”，让越共参加经选举产生的政府。

阮文绍害怕斗不过南越民族解放阵线，基辛格劝阮文绍不要多虑，20 个部长中只有两个共产党人，他们翻不起大浪，基辛格劝梗着脖子死不让步的阮文绍说：

“在美国，让政敌进入内阁，不是让他们起作用，而是使他们不起作用。”

美国让阮文绍不断制造麻烦拖延谈判，终于迫使越南 10 月 8 日提出一个九点计划，不再坚持停火前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而让步组织“全国和解与和睦委员会”，负责实施普选。

尼克松对此当然求之不得，马上命基辛格到巴黎与黎德寿取得一致意见：10 月 18 日美国停止对北方的轰炸，23 日在河内草签停战协定，两人热烈拥抱祝贺。

当基辛格说服南越当局接受美越和平协定后，阮文绍却顽固反对，气得越南总理范文同谴责美国背信弃义。恰在这时，尼克松连选连任美国总统，态度马上强硬起来，11 月 14 日决定采取“大规模的冒犯措施，用美国的意志影响事态发展，迅速结束这场战争”。

12月18日，尼克松下令派B—52巨型轰炸机猛烈轰炸北越，重点轰炸河内，10天内扔下的炸弹的总当量相当于在广岛投下的两颗原子弹，越南遭到骇人听闻的空袭。27日，和平谈判在巴黎恢复；30日，白宫趾高气扬宣布，看来越方“认真的谈判”将会恢复，因此暂停对越南北纬二十度以北地区的轰炸。1973年1月27日基辛格和黎德寿在巴黎签订了《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3月29日，从南越撤走了全部美军和仆从军；同年2月21日，老挝各方签订了《关于在老挝恢复和平和实现民族团结的协定》。

尼克松又不肯善罢干休，有意在南越留下美国军事顾问，支持阮文绍破坏巴黎协定，不断向解放区发动进攻，迫使越南人民向西贡反动集团发动总进攻。1975年4月柬埔寨全国解放；越南南方5月1日全部解放；12月成立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印支三国的抗美战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正是：

侵越战争泥潭深，被迫拔腿不甘心。
战火扩大到老柬，头破血流才脱身。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遁身山城 基辛格幸会周恩来 大势所趋 新中国重返联合国

话说随着国际风云变幻，中美苏三国关系也发生了难以想象的变化，不能不令毛泽东感慨万千。

毛泽东 1944 年在延安第一次接见包瑞德为首的美国“迪克斯”使团成员，是他一生首次接见美国官员。

那时候，毛泽东既看到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曙光，又对美国寄予希望，希望美国停止对国民党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于是又在延安接待了罗斯福总统的私人特使赫尔利，共同制定并签署了名为《五点方案》的国共联合计划，但却为蒋介石破坏。

日本投降后，赫尔利又到延安邀请毛泽东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好不容易达成的双十协定，又被蒋介石破坏，其后美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才使中国共产党同美国的关系恶化，毛泽东挥笔写下《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千古名文，对美国的侵华政策冷嘲热讽，猛烈抨击。

新中国成立不久就爆发了朝鲜战争，使中美关系一直处于僵持状态。50 年代末、60 年代初，中苏关系紧张后，从对苏战略出发，中国和美国的对外政策都在发生微妙的变化，毛泽东也巧妙地发出中美关系似可解冻的信息：

1959 年 3 月的一天早晨，毛泽东在美丽的武汉东湖之滨石屋别墅，迎着东升的旭日，接待了美国著名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黑人朋友杜波伊斯夫妇。

当时，毛泽东 66 岁，斯特朗 73 岁，杜波伊斯 91 岁，毛泽东对杜波伊斯年老而健壮的体魄大发感慨说：

“按您的年龄，可算是我的父辈了，但即使是我，也感到上年纪了。不过，我依然很有精力和体力，我每年仍然可以畅游长江。我还游过珠江和黄河，我还想游黑龙江呢！”

安娜·路易斯提醒毛泽东注意当时中苏关系恶化，要小心从事：“您要是真去游黑龙江，就能游过江到达俄国了。”

斯特朗哪里知道，毛泽东并不是真要去游黑龙江，而是要通过长江、黄河、黑龙江、密西西比河，把中苏美三国联在一起：

“啊，您说得真不错，要是你们三个同意，我倒愿意去密西西比河游泳。不过，也许另有三个人反对——艾森豪威尔、尼克松和杜勒斯。”

杜波伊斯见毛泽东向自己投来询问的一瞥，便根据自己对美国政情的了解，带着严肃的神情回答说：

“相反，他们可能乐意您去密西西比河游泳，特别是顺流而下，到特别宽广的水域中去。”

毛泽东欣然问道：“真的？那么，只要他们三个同意，过几天我就作为一名旅游者动身。”

斯特朗想到苏联外贸部长米高扬最近的美国之行，便问她的老朋友说：“就像米高扬访美一样吗？”

毛泽东手举香烟在空中一摇争辩说：“哦，不是。米高扬谈的是政治，我不要谈任何政治，我就是到密西西比河游泳。然后，如果艾森豪威尔允许，我将看他打高尔夫球，也许还要去医院拜访杜勒斯先生。”

这使三个美国客人略吃一惊，杜波伊斯按他的理解大发宏论：“那一定会给杜勒斯突然一击。”

毛泽东微微一笑，香甜地抽口香烟，慢慢地边吐烟圈边纠正说：

“这不是我的本来愿望。我十分关心杜勒斯先生的健康，我希望他能康复，继续担任国务卿。他干那项工作，对我们很有利，对美国人民和全世界劳动人民都有利。”

三个美国客人对此都大惑不解：“真的吗？”

毛泽东换枝香烟，划火柴重新点燃，格外认真地做解谜式的回答：

“确实如此，我常这么说：杜勒斯之所以有用，是因为他坚持自己的原则，他顽固地反对共产主义、反苏、反华。为了这个目的，他镇压人民运动，向全世界派出军队，到处建立军事基地。所有这些，对整个世界都是有用的，我希望他不要改变这个政策。”

毛泽东知道这些道理一时还难以让人们都透彻地理解，便有意地询问在座的最年长者：“您相信这点吗？”

经历 91 年人生沧桑的杜波伊斯为杜勒斯辩解说：“这要看究竟有多少明智的人，能够懂得杜勒斯的所作所为了。十分明智的人对他迷惑不解，因而变得很不礼貌。我对冷战感到恐惧，我不愿这种形势持续太久。”

毛泽东摇摇头：“我不同意，这一时期不是太长，而是太短了。”

杜波伊斯固执地坚持己见反驳说：“你经受过这一时期的危害，但不像我经受过那么长久。”

毛泽东庆幸找到了辩论的对象，又滔滔不绝地讲起他对未来 10 年中美关系的展望：

“我希望杜勒斯再继续担任 10 年的国务卿，我们十分希望 10 年以内，我们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也不搞贸易。这将对我们有利。至于侵占台湾，杜勒斯乐意继续多久就继续多久吧！反正美国最终不得不撤离台湾。不过，我们倒乐意让他们在那里多呆些日子，当我们人民的反面教员嘛！一旦他们撤离，对我们反而较为不利了。对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来说，还有什么更好的教员呢？”

毛泽东又从台湾问题谈到中东问题，以嘲弄的语调加强语气道：

“中东事件也很有教育意义，我曾希望美国留在黎巴嫩至少半年。现在看来，留一年两年会更好些，他们干嘛要那么快撤军呢？”

杜波伊斯的夫人雪莉·格雷厄姆推测说：“也许，他们中的一些人遭到了重创。”

毛泽东认为格雷厄姆讲到了点子上，豪情满怀幽默他说：“即使我们要求他们，他们也不会再呆下去了。”

其后，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确实按照毛泽东揭示的历史辩证法。发生了异乎寻常的变化，其速度大大超出了毛泽东的预料。

中美两国从对苏战略出发，各自关切地注视着对方。毛泽东、周恩来敏感地发现尼克松上台后，不断发出谋求中美接近的信息：

1967 年 10 月，尼克松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文章，第一次提出了同中国接近的主张；1969 年 1 月 20 日，尼克松在就职演说中，间接地提到中美建立关系问题；1970 年 10 月 1 日，尼克松向美国《时代》杂志记者发表谈话，第一次公开表示愿意访华；又不断通过巴基斯坦、罗马尼亚向北京发送信息，还逐步采取放松对华贸易及旅行的限制；1971 年春，特意提

出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毛泽东、周恩来堪称当今世界最善于观察形势、把握时机的外交大师，他们决心以小小“银球”击碎大洋彼岸的冰川，结束中美长达 25 年之久的冷战局面，从而改变世界政治格局，给向中国施加强大威胁的勃列日涅夫以当头一棍，美国记者沃尔特·拉弗贝以最钦佩的笔调对中国大加称赞：

“中国是善于掌握世界风云变幻的。毛泽东的政府申明要继续鼓励第三世界的革命运动，但在 1971 年春，中国人却戏剧性地邀请一个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这是 1949 年以来第一批美国人访问这个国家。发出邀请的时机恰好说明了北京的意图所在，原来这时俄国人正准备召开世界共产党代表大会，想纠集一些力量搞反华。毛泽东这样做是在利用美国对付苏联人。由于这时尼克松一方面已经着手从越南撤军，一方面同中国也逐渐开展了一些贸易关系，所以毛泽东认为俄国是中国的头号敌人，不是美国。苏联人已经沿中苏边境集结了将近 100 万军队。1969 年，苏联军队还同中国军队进行了几次大的交火。”

基辛格劝尼克松赶快批准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尼克松微微一笑，意味深长他说，“有趣的是，今日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冲突不是在美国同苏联之间，而是在苏联和共产党中国之间！”

尼克松敏感地预见到中国与美国的乒乓外交将使中美苏三角关系发生令人感兴趣的变化，基辛格庆幸找到了尼克松这个志同道合的“首长”。基辛格神采飞扬地大发宏论：

“要使三角外交有效，那就要靠参加角逐的人本来的动机和倾向去发挥作用。这种外交必须避免给人一种印象，就是说你正在‘利用’竞争的一方去反对另一方；否则的话，你就有遭到报复或讹诈的危险。美国要同中苏双方都保持密切的关系，要比它们彼此间的关系更密切些。只有这样，中苏之间互相敌视的关系才能有效地为美国的目的服务，其余的事就只有让事件本身产生的力量去决定了。”

尼克松对此欣然赞同，他指示基辛格和白宫新闻发布官齐格勒对中苏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必须让中国人心领神会。

于是，基辛格 1971 年 4 月 13 日以总统特别安全事务助理身份接见苏联驻美临时代办尤里·伏龙索夫，把美国决定与中国开展贸易关系的决定通知他，极力装出同情的口吻说：

“真是对不起，好像命中注定要阁下接受不愉快的消息似的，这并不反映美国有什么反苏意图，提前通知贵国就说明了这一点。”

伏龙索夫不是好愚弄的，他完全明白这是外交上惯用的抚慰对方的手段，正要揭穿基辛格的花招，基辛格却手腕高超，说齐格勒马上要举行重要新闻发布会。伏龙索夫无心恋栈，急急忙忙赶往记者招待会，只见齐格勒正讲此事。更使苏联外交官气歪了鼻子的是，齐格勒又说他同意周恩来的如下远见卓识：

“毫无疑问，尼克松总统所采取的主动行动，已打开了美国和中国关系上新的一页。”

4 月 27 日下午，巴基斯坦驻美大使希拉利紧急要求会见基辛格，宣称他的消息不能等，基辛格急忙扔下手头工作接见希拉利，接过他转来的周恩来的书信看下去：

“中国政府重申它愿意在北京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的一位特使（例如基辛

格博士)或者是美国国务卿,或者甚至是总统本人,以便直接进行会晤和讨论。”

这时,没有参预此事的国务卿罗杰斯却大放厥词,宣称美国认为台湾和澎湖列岛的主权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将来要在国际上求得解决”;又说斯诺报道的毛泽东邀请尼克松访华的消息是“随随便便提出的”,“不是当真的邀请”,诬称中国的外交政策在许多方面都是“扩张主义的”,使问题又复杂化了。

罗杰斯的话对尼克松、基辛格犹如晴天霹雳,他们担心中国把罗杰斯的话当作对其所发信息的答复,尼克松急忙亲自出面发表纠正罗杰斯讲话的声明,希望北京听来比莫斯科更有意义:

“我希望,事实上是预期在某个时间,以某种身份访问中国大陆,以什么身份出访,我还拿不定主意。”

对此,中国果然发出严厉警告,声称罗杰斯的谬论是以中国为敌的行动。勃列日涅夫则幸灾乐祸,授意苏联电视台评论员评称:“压力对苏联不起作用,与苏为敌是注定要失败的。”为消除误解,基辛格5月9日请希拉利给中国送去一封信,希望中国同意基辛格访华。5月20日,美苏在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中取得了程序问题上的突破,基辛格急忙把预发副本转交中国,向中国保证“不会缔结把矛头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任何协定”,基辛格访华时将讨论与此有关的问题。

等了两个星期,尼克松不见中国发回信息,有点儿沉不住气了,不断催问基辛格是否发生了意外。

1971年6月2日,基辛格上气不接下气跑进总统椭圆形办公室,边跑边喊:“来了,来了,周恩来的信来了!”

原来,希拉利来转交周恩来的复信。周恩来的信被基辛格一字不落地记在脑海中:

周恩来总理认真研究了尼克松总统1971年4月29日、5月17日和5月22日的口信,并且十分愉快地向毛泽东主席报告尼克松总统准备接受他的建议访问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进行直接会谈。毛泽东主席表示,欢迎尼克松总统来访,并且期待着届时同总统阁下进行直接谈话,其中各方可以自由提出自己关心的主要问题……

基辛格飞跑去见尼克松,来到白宫正厅,得知尼克松正在宴请尼加拉瓜总统索摩查,便请随从武官悄悄把尼克松叫了出来。基辛格对尼克松小声做了汇报,尼克松大喜过望,把基辛格领到林肯厅,自己动手倒了两杯白兰地,兴高采烈地致祝酒词说:“亨利,我们现在喝这杯酒不是为了祝贺我们个人或我们的成功,也不是为了祝贺使我们能够收到这封信并享受今晚难忘时刻的我们这届政府的政策。让我们为今后的几代干杯,他们可能会由于我们现在所做的事而有更好的机会过和平的生活。”

苏联依靠灵敏的情报系统掌握了中美接近的动向,作为中美苏三角关系的另一边也紧张活动起来。

苏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到戴维营找到基辛格,两人各怀心腹事漫谈三角关系。多勃雷宁装作心平气和他说:

“亨利,我们并不反对美国逐步地改善与中国的关系,甚至可以告诉你,苏联是怎样估计中国各个领导人的,但应首先考虑美苏最高级会谈问题。”

基辛格看出俄国人在跟他玩捉迷藏的游戏,就采取进攻态势以摸虚实:

“我们已经探索了 14 个月的时间，看来确定美苏最高级会谈日期的时间已经到来，美国希望尽早召开。”

多勃雷宁一下露了馅，找出种种借口向后拖延。

基辛格手推眼镜得意地笑了，事实上，美国才不忙于召开美苏最高级会谈呢，看来俄国人无意中又为美国解决了难题。

6 月 28 日，尚被蒙在鼓里的美国务卿罗杰斯告诉基辛格一条消息：“亨利，《纽约时报》说你可能出任美国首任驻华大使。”

基辛格为在对华政策上“侵犯”了国务卿的职权略显内疚，特意开玩笑说：“也许是国务院故意泄露机密，以便把我弄到远离华盛顿的地方，愈远愈好。”

罗杰斯也拿基辛格逗趣说：“如果你真愿摆脱在华盛顿的种种烦琐事务，不被多勃雷宁追得团团转，到北京去倒是个好差事。”

基辛格不肯道破瞒着罗杰斯访华的天机，表示同意说：“我喜欢吃中国菜。”

在进行周密准备之后，基辛格从 1971 年 7 月 1 日开始了解情况的东南亚之行，沿途尽量缩小影响，到 7 月 8 日抵达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时，只剩下 3 名记者跟随，正好演出“遁身剧”。

在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为他举行的盛大宴会上，基辛格正要装病，肚子突然真的痛了起来，暗想这也许是我说假话太多而遭上帝的惩罚吧，因而更逼真地大叫“肚子痛”，叶海亚便按事先的

策划，宣布让基辛格到纳蒂亚加利山庄休息。

美驻巴大使法兰蒂带一大长串车队奔向山庄，基辛格却悄悄来到伊斯兰堡机场，登上周恩来派来的专机，越过喜马拉雅山，飞越长江、黄河，于 7 月 9 日到达北京南苑军用机场，叶剑英元帅陪他住进钓鱼台国宾馆。

丰盛的午餐后稍事休歇，叶剑英兴冲冲前来相告，周总理要来看望美国贵宾。

基辛格对周恩来心仪已久，听说当今世界首屈一指的大外交家竟这么快前来探望，简直有点儿受宠若惊，一跃而起带手下人出来欢迎。

见周恩来敏捷地跳下轿车，基辛格快步上前，大老远把手伸了出去，可能是太紧张了，看来动作有些僵硬。

周恩来善解美国客人初次踏上中国国土后的紧张心理，滞洒而庄重地与客人用力握手，道出警世之辞：

“这是中美两国高级官员，二十几年第一次握手！”

两位世界一流外交家的第一天会谈只是一般性交谈，第二天就短兵相接了，基辛格毕竟有点儿紧张，拿起一厚本文件读了起来，连自己也觉得枯燥乏味，只见周恩来一扬手微笑着建议说：

“交谈嘛，何必照着本子念呢！”

基辛格笑着辩解道：“我在哈佛大学教了那么多年书，还从未曾用过讲稿，最多拟个提纲，可这次不同，对周恩来总理，我念稿子都跟不上；不念稿子，就更跟不上你了！”

周恩来单刀直入提出关键问题：台湾是中国的组成部分；苏联人的贪婪对全世界是一个威胁；中美有着巨大分歧；尼克松总统访华意义重大……两人围绕台湾问题展开激烈争论。

基辛格一下子被周恩来吸引住了，他认为这位世界级外交大师“头脑非

常清醒”，具有“非凡的预见能力”，觉得周恩来、戴高乐、毛泽东是对他最有吸引力的人，尤其对周恩来的印象更刻骨铭心：

“周恩来面容瘦削，颇带憔悴，但神采奕奕，双目炯炯。他的目光既坚毅又安详，既谨慎又满怀信心。他身穿一套剪裁精致的灰色毛式服装，显得简单朴素，却甚为优美。他举止娴雅庄重，他使举座注目的不是魁伟的身躯（像毛泽东、戴高乐那样），而是那外驰内张的神情、钢铁般的自制力，就像是一根绞紧了了的弹簧一样。他似乎令人觉得轻松自如，但如小心观察就知并不尽然。那轻快的微笑在没有翻译的情况下，也能准确无误地理解英语的含义。他相当机敏，从他的脸上可以明显地看出，经过半个世纪的磨练，使他更加镇定自如，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当晚，周恩来到中南海向毛泽东汇报会谈情况，讲到美国还想在台湾保留点儿军队，毛泽东口吐烟圈，以独特的比喻说：

“猴子变人还没变过来，还留着尾巴，台湾问题也留着尾巴。它已不是猴子，是猿，尾巴不长！”基辛格也是世界一流外交家，他对70年代初的美中苏三角关系有深入而独特的研究，认为当时美国享有左右逢源的有利地位，是70年代初特殊国际关系的最大受益者。要使美国的左右逢源地位保持下去，就要对三国中力量最弱、最容易遭受打击、也最难发挥力量和影响的中国助一臂之力，尤其是对面临苏联百万大军威胁的中国，表明中美共同对付苏联的态度，是他此次访华取得成功的关键，于是便根据事前与尼克松商定的中美联合抗苏的计谋适时表态说：

“请你们放心，美国要同中国来往，决不会对中国进攻。美国同自己的盟国决不会和对手联合起来对付中国。中国对付美国的军队可以向北开，摆在别的地方。”

果然，毛泽东听了汇报极感兴趣说：“他们要我们把军队往北开啊！过去我们是北伐，后来是南伐，现在是北来北伐，南来南伐！”

是共同的战略需要，使毛泽东对基辛格访华公报做出决断：“尼克松来访，谁也不主动，双方都主动。公告中也不写我要见他的话，要学诸葛亮留一手。”

基辛格、周恩来、毛泽东以非凡的智慧和胆识做出邀请尼克松访华的决定，基辛格离华前颇有风度他说：

“我带着希望而来，带着友谊而去。访问成果超过了我原来的期望，圆满地完成了我们的秘密使命。”

基辛格逸兴遗飞，得意洋洋向尼克松报告：

“我们已经为您本人和毛泽东共同翻开历史的新的一页奠定了基础……我们已经开了头的这个进程将在全世界产生巨大的冲击波。我们不应对这一前景抱幻想，中美一旦关系恶化，就有可能成为难以和解的敌人。”

7月15日，中美同时宣布了尼克松应邀访华的消息，勃列日涅夫很不高兴，授意《真理报》7月24日发表充满哀怨而又无可奈何的文章：

“不言而喻，利用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接触，来向苏联和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施加某种压力的任何企图，都是脱离现实的。”

勃列日涅夫为抵制尼克松访华的影响，指示多勃雷宁去见基辛格，劝尼克松访问北京之前先访问莫斯科。基辛格基于首先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毫不迟疑地回答：尼克松要访苏，但排在访华之后。

勃列日涅夫对此恨得咬牙切齿，决定尽快派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波德戈尔内访问印度，签订苏印条约肢解巴基斯坦，以此对美国和中国进行报复。

中美冲破苏联的干扰，加快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1971年10月20日，基辛格第二次访华做尼克松来北京的准备工作。他兴致勃勃地到处兜风，却看到有些地方写有反对美帝侵略的标语，还发现宾馆客房摆放着印有“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英文电讯稿，引起一场虚惊，洛德生气地嚷道：

“中国人怎么搞的！既然欢迎我们访华，为什么还搞这些不友好的行为！”

洛德要向中国官员提出抗议，却被基辛格喊住，吩咐他把所有英文电讯稿收集起来，作为以前丢在这里的东西交给中方。此事很快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批评，做了补救工作。

双方在讨论公报草案时意见尖锐对立。基辛格认为中国方案“用词尖锐”、“都是以最不妥协的词句提出来的”，美方难以接受。

周恩来循循善诱劝说道：“公开摆明分歧，就是解决问题的开始，也是通向未来的第一步。博士，你说是吗？”

周恩来适时提议休息。基辛格在百花争艳的花园散步，抬头仰望深远的天空，终于想通了周恩来的意见，欣喜他说：

“公开地摆明分歧，难道不会使双方的盟国和朋友感到放心吗？这说明他们的利益得到了保护，还会使各方面的人确信公报是真实的。”

在双方争论最大的台湾问题上，基辛格也挖空心思，想出了模棱两可的提法：

“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持异议。”

10月26日凌晨，双方完成了公报草案，加之周恩来得到联合国已通过恢复中国代表权提案的消息，心情格外愉快。周恩来迈着轻盈的脚步把基辛格送到钓鱼台国宾馆六号楼门口，兴致勃勃地操英语说：“博士，欢迎你快些回来，共享会谈的愉悦……”

本来，周恩来想把中国重返联合国的消息告诉基辛格，但怕美国客人下不来台，欲言又止，只悄悄将此消息告诉了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就同基辛格握手道别。在送基辛格前往机场的路上，乔冠华抑制不住心头的喜悦，想跟基辛格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就满面春风地对基辛格说：

“据估计，现在这个时候，联合国大会正在对恢复中国席位进行表决。博士，你看今年这届联大能恢复我国的席位吗？”

基辛格还被蒙在鼓里，对他与罗杰斯制订的拖延中国重返联合国的方案深信不疑，就极有把握地回答：“不行，你们今年还进不了联合国。”

乔冠华乐得合不拢嘴，故意跟这个新朋友开玩笑：“你估计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进联合国？”

基辛格认真思索一番，得出美国人最最乐观的推测：“估计明年吧，等尼克松总统一访华，你们就能进入联合国了。”

乔冠华仰头大笑：“我看不见得吧！”

基辛格一行心满意足地离开北京，正津津有味地欣赏华夏大好河山，突然闻听“啊呀呀，不好！”众人忙看，原来基辛格手里拿着一份电报呆若木鸡，助手们凑过去一看，都大惊失色：联大刚才已以76票对36票通过接纳

中国并驱逐台湾的决议。

基辛格回想刚才周恩来、乔冠华的寓意深长的谈吐风度，由衷赞叹：“周恩来此人可交，用心良苦啊！”

洛德等人感到后怕，倒抽一口凉气，感慨万千说：“要是换了赫鲁晓夫，我们就难逃一场讽刺挖苦了！”这正是：

与人为善有良朋，乘人之危小人行。

得让人处且让人，五洲四海颂周公。

原来，尼克松大国霸权主义积习难改，1971年还不想让中国重返联合国，就利用苏联表面赞成、实则漠然处之的机会，指示驻联合国代表乔治·布什，伙同日本代表中川融、台湾代表周书楷泡制种种“两个中国”的方案，又拼命在联合国内外拉票，手段真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为了得到某国的选票，除以提供经济援助利诱外，还常常在餐厅门口“探寻等候”。有的国家代表躲到厕所里，台湾代表甚至跟着人家进入厕所，摇尾乞怜。

怎奈时势变幻无穷，连尼克松自己都宣布要“屈驾”访问中国了，却要别人卖力反华，世上哪有如此荒谬的逻辑？

因此，在1971年10月26日，联合国大会终于通过了接受中国、驱逐台湾的决议。顿时，会场上一片欢腾，各国代表像遇上重大节日，热烈欢呼，鼓掌，拥抱！刹时间，歌声、欢呼声、掌声汇成一股汹涌澎湃的交响乐，回荡在金黄色圆屋顶的联合国大厅内，也响彻五洲四海。

西方记者有意出苏联代表马立克的洋相，围拢他询问对此表决的感想。马立克极不情愿地摆出“理直气壮”的样子说：“苏联从来都投票赞成中国加入联合国！”

西方记者看马立克那言不由衷、无可奈何、有苦说不出的狼狈相，完全丢失了往日霸权主义的蛮横嘴脸，便你一言我一语地嘲笑苏联，马立克理屈词穷，目瞪口呆。

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布什气得骂第三世界人太猖狂，却被西方记者逮个正着，幸灾乐祸地问他：“请问美国代表先生，此时此地，有什么感想？”

布什毕竟胸有韬略，收起刚才的懊丧漫骂，寻词择句为自己的尴尬处境解脱称：

“任何人都不能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刚刚投票的结果，实际上确实代表着大多数联合国会员国的看法。真遗憾，有些答应支持美国提案的代表没有出席会议，有些做出承诺的代表弃权了，我无力回天！”

西方记者仍不肯轻易放过布什，问此举对美国是福还是祸？布什不愧是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他抛开个人不愉快情绪而谈美中关系的大局说：

“这是联合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反西方集团（包括共产党国家）在美国威信处于危险状态时，第一次击败美国。不论我个人对驱逐台湾的感受如何，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建立和北京的外交接触，显而易见是高瞻远瞩和明智的。”

有人说这是尼克松和基辛格顺手推舟、因利乘便设计的一个外交骗局，完全是做样子给西方和台湾的蒋介石等“老朋友”看的，竭力装出努力防止台湾给赶出联合国的样子，以装点门面，而布什当时还被蒙在鼓里，卖劲地鼓吹“一中一台”的提案，使外界看起来好像美国是很真诚地维护蒋介石的席位似的，作为其有力证据之一，是基辛格第二次访华时曾私下向周恩来透

露的真情：

“虽然美国将支持保留台湾在联大的会员国资格的提案，但如果这一议案通不过，尼克松总统根本不会在乎。”

当时，白宫官员一个个垂头丧气，基辛格则胸有成竹开导说：“这也是迟早要发生的事，不必介意。试想，中国进了联合国，我们与中国的关系不就更好搞了吗？”

这件事发展速度过快，倒把中国闹了个措手不及。中国人没料到这件好事会来得这么快，准备不太充分，因而当周恩来召集各部代表研究应急措施时，多数人主张今年不登联合国这个“资产阶级反动派的讲坛”。

毛泽东对此事的见识又高一筹，他力排众议，当即做出明确决断：“要去！为什么不去？马上就组团去！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

毛泽东意犹未尽，又做出更进一步决策：“派一个代表团去联大，让‘乔老爷’做团长！”

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制订了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指导方针，那就是：

“把平等协商的精神带到联合国去；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为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讲话，为广大中小国家的人民讲话，特别为印度支那、朝鲜、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讲话；在联合国的各项活动中切实体现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原则立场；在对外活动中做到谦虚谨慎，不卑不亢，平等待人，不轻然诺。”

11月8日晚，毛泽东把周恩来和代表团主要成员接到中南海，他身穿毛巾睡衣站在书房门口同众人一一握手。毛泽东这天兴致盎然，手拿小雪茄，慢悠悠抽着，纵谈世界风云。他以《三国演义》中的“柴桑口卧龙吊孝”来比喻中国代表团在特殊情况下出席联合国大会，豪情满怀提出中国代表团应有汉朝外交家班超出使西域时“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勇气。他毫无倦意，谈笑风生说：

“我国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倒台，一个就是恢复联合国席位。到联合国，要发扬阿庆嫂的方针，见机行事，不要怕说错话，当然要搞调查研究，但不能什么都调查好再说。”

中国代表团到达纽约轰动美国：联合国总部官员、各国驻联合国代表、旅美华侨、美国友好人士和400名记者把中国代表团围了个水泄不通。在热情的欢呼声中，乔冠华团长将大长头发一甩，风度翩翩发表讲话说：

“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有着深厚的友谊，我们愿借此机会，向纽约市各界人民和美国人民表示良好的祝愿。”

这话讲到了美国人民的心坎上，在美国和联合国引起巨大反响，美国报刊以突出地位加以报道，各电视台纷纷播放录像，而且反复播放，突出刊登那几句最打动人心的话。

中国代表团到联合国总部时，更是人山人海，盛况空前，都说这是联合国历史上罕见的场面。

美国驻联合国代表乔治·布什对如何与乔冠华见面颇费了一番心思，终于找到了“既自然又热情的方式”：

11月15日，布什早早来到乔冠华出席联合国大会必须经过的会议大厅外走廊，以打电话为借口久候多时。当美国礼宾官小声报告乔冠华走过来时，

忙由礼宾官介绍，走上前与乔冠华握手致意，几个美国记者赶忙过来拍下这意味深长的镜头，在全世界广为传播。

然而美苏两国都竭力想把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的影响，缩小到最低限度，布什和马立克都主张仅在程序上由联大主席宣布议程并致简短欢迎词，然后请几个区域性代表做限制时间的发言完事。

广大中小国家不买两个超级大国的账，他们向联合国秘书处抗争，指出没有任何理由限制小国发言，终于取得限制与反限制斗争的胜利，允许他们尽情倾诉对代表中小国家利益的中国的衷心欢迎。

当中国代表团昂首阔步进入会场时，爆满的大厅立刻响起春雷般的掌声。这掌声寄托着各国对中国的无限期望，宣告两个超级大国欲限制中国影响的图谋破产。

本届联大主席、印尼代表马利克热情洋溢致词说：“今天上午，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第一次在联合国大会就座。作为大会主席，我很高兴地欢迎这个代表团。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开始参加世界这个主要的政府间组织的工作。毫无疑问，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工作，联合国的工作成效将得到加强。”

其后，一国代表接一国代表如洪水泄坝般冲破两个超级大国的阻挠，发言倾吐对中国的欢迎之情，最有代表性的是智利驻联合国代表温贝托·迪亚斯·卡萨努埃瓦，他激动他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中国人民唯一真正代表的资格恢复了她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这是联合国前途吉祥的预兆，是全世界各国人民的胜利。”

为表达对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崇高敬意，智利代表满怀激情地用不太熟练的汉语，朗诵了毛泽东的光辉词章《减字木兰辞·广昌路上》：

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

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

此行何去？

赣江风雪迷漫处。

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

智利朋友以此气派雄伟的诗章热情地赞扬今天的新中国和当年进行艰苦卓绝长征的工农红军一样，都是举世无双的进步力量的胜利，标志着过去旧的政治的结束，表明一个新的现实主义和充满希望的时代的开始，受到与会各国代表的热烈欢迎。

美国代表乔治·布什坐不住了，他为怎样讲才得体而苦苦思索，终于想出符合当前美中关系现状和有意讨好中国人的“绝妙好词”，就抖擞精神，以东道国身份发言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来到这里以后，联合国将更能反映世界当前的现实情况。美国人民同中国人民有着长期的友好联系，美国相信，只要重新献身于宪章的原则，我们就能走向世界和平与正义。”

苏联代表马立克见布什与中国代表拉关系，也主动过来与乔冠华热情握手，特意摆好姿势让记者拍照，又发表言不由衷的长篇讲话。

阿尔巴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萨米·巴霍利看不惯苏联人的两面派作风，走上讲台揭露苏联和美国阻挠恢复中国代表权的真面目说：

“世界上所有进步人民都凝视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她是各国人民自由和独立事业的最强大的保卫者，是各国人民主权的保卫者。伟大的人民中

国在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她已成为社会主义与和平的坚强不屈的堡垒，成为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霸权计划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巴霍利越讲越激动，苏联代表马立克气得脸红脖子粗，呼哧呼哧直喘粗气，却又无可奈何。

57国代表发表完欢迎词后，乔冠华在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中，登上联合国大会讲坛。

乔冠华独特的外交家风度立刻引起全场人员的强烈关注，敏感地发现这个中国著名外交家颀长而瘦削，严肃中透着浩然正气，深沉的目光，雍容儒雅的学者风度，无不令人肃然起敬。

乔冠华极有风度地向支持中国的朋友表示衷心感谢，发表中国对重大国际问题的独特见解，有力地抨击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行径，成为联合国的最强音。他一反中国过去的屈辱外交作风，表现出挥洒自如的泱泱大国风度，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在世界讲坛的威信，使中美苏三角关系又发生了复杂的变化。这正是：

自古外交多波澜，今年联大出奇观。

中国重返联合国，欢迎盛况史无前。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审时度势 尼克松决心冲破中美坚冰 弄巧成拙 柯西金无耻破坏自取其辱

话说 60 年代末、70 年代初，随着苏联露骨推行霸权主义和世界多种力量的形成，特别是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中、美、苏三角关系错综复杂，三国围绕中美建交展开更曲折微妙的斗争。

历史的辩证法是相当有趣的，竟是苏联加紧反华促使了中美接近，珍宝岛事件就促使中美关系出现转机。

1969 年 3 月初，中苏在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注意。

尼克松、基辛格从其一贯反共反华的立场出发，主观认定是好斗的中国挑起了乌苏里江的冲突，但有趣的是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帮助他俩改变了看法。

3 月 11 日，多勃雷宁气冲冲来到基辛格的办公室，情绪激动他讲起乌苏里江冲突，谴责中国人好战。

基辛格认为两人虽有较好的私人关系，两人互称“阿纳托尔”、“亨利”，但基辛格连问都没问到珍宝岛冲突，多勃雷宁却坚持要向基辛格讲述所谓中国犯下的“血淋淋罪行”。基辛格不愿听俄国人的一面之辞，试图改变一下谈话主题，指出这是中苏之间的问题，美国不妄加置评。

尽管如此，多勃雷宁仍不依不饶，声称中国问题是牵涉到大家的问题，拉拢美国给苏联以支持。

多勃雷宁没想到自己弄巧成拙，反而引起基辛格的怀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苏联心狠手辣的外交倒使我们考虑起美国的机会来了。”

3 月 11 日晚，基辛格把多勃雷宁来访的情况报告了尼克松，引起了尼克松的极大兴趣，若有所思说：

“往往有些意料不到的事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乌苏里江事件一定震动了中国人。”

基辛格建议应该抓住这个巨大的战略机会，打开中美关系的僵局。尼克松早有此意，便让基辛格领导审查美国对华政策，特别是美国对“亚洲共产党国家的贸易禁运问题”。

多勃雷宁敏感地察觉了尼克松政府的这一细微战略苗头，出于对中国的极端过敏和敌视来找基辛格，想把这个苗头消灭在萌芽状态，他鼓动如簧之舌劝说基辛格：

“亨利，你要知道，现在还有时间由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来指导世界事态的发展，若把中国弄到国际社会中来。不久我们就不会有这种力量了。对许多苏联人来说，看来台湾很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基辛格暗中冷笑，美中还没有进行正式接触，就把堂堂苏俄超级大国吓成了这个样子，美中若开始来往，准有好戏要看，而且多勃雷宁竟以鼓吹台湾独立来取悦美国，可见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之流真是虎狼之辈，为反华竟不惜采取如此卑劣的手段，就从心里瞧不起俄国人，但基辛格颇有韬略，使尽全副本领装作高深莫测的样子，只给多勃雷宁一个含糊其词的回答，暗示“重建接触的选择已摆在我们面前”。

尼克松和基辛格决定“吊北极熊的胃口”，1969 年 4 月 24 日给柯西金写了一封信，指示美驻苏大使雅各布·比姆把信亲自交给柯西金。

柯西金看尼克松在来信中讲了美苏关系的许多问题，但就是只字不提中国，感到很不过痛，明知是尼克松故意卖弄玄虚，但也无可奈何。

比姆见柯西金呈吞吞吐吐之态，暗暗称赞基辛格手段高明，就按尼克松、基辛格的密电所授妙计口头说明：“我们无意利用中苏之间的困难”。

柯西金这个老练外交家，马上领会了比姆所传尼克松、基辛格口信的言外之意：“这意味着，如果美国愿意的话，美国是能够利用中苏分歧的。”

柯西金对此默默接受，回去和勃列日涅夫研究了一个多月，才搞出复尼克松的信，5月27日让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向比姆转交复信，大做官样应酬文章，而把勃列日涅夫的真正意图口头做了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表达：

“苏联也不会利用美国同中国之间的麻烦，而且总的说来，美苏关系应该建立在长远考虑的基础之上。”

尼克松、基辛格看了比姆的来电，兴味无穷地笑了。基辛格意味深长他说：“总统阁下，你是否已有预感，仍然非常模糊的美苏中三角关系，已经初露端倪了？”

这时；基辛格又拿出林彪4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仔细研读，博士对下面这段话发生了兴趣：

我们决不可因为胜利，放松自己的革命警惕性，决不可以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毛主席早就说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它们一定要打，我们奉陪到底，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打出来的。

基辛格确实有非凡才能，他从人们谁也不太仔细去读的中国官方文件中，发现了中国的重要战略动向，得出异平常人的结论。

“尽管报告的调子好战，但是它是使人感兴趣的，而且是逗人的、充满寓意的。报告强调，除非中国首先受到进攻，它就不会发动进攻。这样，美国就减轻了对中国会干涉印度支那的担心。报告指出，苏联和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构成了同等的威胁，这就满足了实现三角外交的先决条件之一，即美国不应该被视为主要的敌人。”

基辛格去见尼克松，提交了他对中共九大的评估报告，兴高采烈地提醒美国总统尼克松说：“毛泽东贬低美国只是走走形式，中国人首先关心的是苏联的威胁，而不是美国。”

反共斗士尼克松对此有独特的反应。基辛格认为中共九大报告中提到毛泽东继续为整顿教育政策而斗争的部分，引起了尼克松固有的报复心理的反应，他在基辛格提交的对中共九大的评估报告上批示：

“亨（利）·基（辛格）：注意毛（泽东）也对教育机构进行斗争。”

其后，不断发生的中苏边界冲突吸引着基辛格的注意力，固有的反共观点使他仍认为是中国挑起了边界冲突，但新疆边界的枪声改变了他的看法，基辛格这样谈他思想的变化过程：

“在新疆发生的敌对行动打翻了我心中对谁是可能的进攻者的天秤。最初，我也同意流行的看法，认为中国是一个好战的国家，但是，我看了一份详细的地图，发现新疆事件发生的地点离苏联的铁路终点只有几英里，而离中国的任何一个铁路终点却有几百英里。这使我认识到，中国军事领导人不会选择这样不利的地点发动进攻。此后，我对问题的看法就不同了。”

基辛格把他的看法告诉了尼克松，美国总统也大感意外，他问基辛格：“这对美国是福还是祸呢？”

基辛格怀着进深山探宝的强烈兴趣，来回踱步分析：

“如果苏联是进攻者，对美国来说既是问题，也是机会。问题是，苏联对中国的全面入侵不仅会破坏地缘政治。而且也会打破世人的心理平衡，以致出现无法阻挡的严酷局面。”

尼克松摸着尖下巴点点头，既而又双手一摊苦笑说：“中国目前和美国毫无关系，我们挺身而出有必要吗？”

基辛格眼镜片后面闪着智慧的光芒，吐出真知的见：

“对于一个我们既没有与之建交，又没有在任何一级建立有效联系的国家来说，要为它出面抵制这种入侵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机会在于中国可能愿意重新进入外交舞台，为了弄清这种可能性，我们需要同中国领导人建立某种联系。”

尼克松当即做出决断，指示设法与中国挂钩，但要掌握时机。基辛格欣然赞同说：

“是的，如果我们行动过快，或者太张扬——在文化革命没有完全结束之前——中国人就可能拒绝这种行动。如果美国行动太迟缓，又可能会促使中国人怀疑这是美苏勾结，这可能促使中国只好同莫斯科做现实的交易。”

尼克松、基辛格权衡利弊，认为历史表明，在两个敌对的伙伴之中，联合弱的一方更有利，因为这样可以遏制强者，而改善美中关系不会破坏美苏关系。

于是，尼克松在环球旅行中，注意“在每一站都给中国人留下一张名片”，精心地开辟了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通道，首先通过戴高乐向中国试探进行接触的可能性。

面对新的国际形势，毛泽东、周恩来决定调整中国外交格局，打破中美关系僵局，寻找给尼克松、基辛格发回信息的机会。

1969年7月16日，广东省公安厅在香港附近海面抓到两名侵入中国领海的美国人，硬说是美国特务，要向美国提出抗议。周恩来敏感地注意到美联社驻莫斯科记者索尔兹伯里的一篇报道：

“在中苏冲突中，给尼克松一个大好机会——使他能成为像样的历史人物的机会。当然，也存在着巨大的危险性，尼克松得下大赌注。一旦中美接近，将使世界的政治形势产生结构性的变化。”

周恩来力排众议，坚持查明事实真相，确定为美国游客误入中国领海，便下令予以释放。在太平洋彼岸，尼克松和基辛格领会了毛泽东、周恩来传回的信息，决定放宽美国对华贸易和旅行的限制措施。

这是尼克松上台后，中美之间第一次无声无影却奥妙无穷的对话，堪称世界外交史上的绝唱，有诗为证：

外交大师果不同，远隔重洋信息通。

人不见面话不讲，超级智慧人称颂。

尼克松为改变反共斗士形象对美国官员宣称：“苏联是更具有侵略性的一方，如果听任中国在一场中苏战争中被摧毁，那是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

尼克松不顾美国文武大员对他立场迅速变化的不满，指示尽快打开中美关系大门。谁知老天故意捉弄人，他却听到周恩来和柯西金在北京进行会谈的消息。这使他大吃一惊，暴跳如雷。

原来，越南共产党主席胡志明1969年9月3日逝世后，中共中央决定派

周恩来参加葬礼，还决定周恩来在河内避免与柯西金接触，以表明对苏联在新疆挑起边界冲突的抗议。

周恩来9月4日到达河内，向胡志明遗体告别之后，当即起飞返回北京。

鉴于中苏关系紧张，柯西金绕道印度前往河内，9月10日自河内返回莫斯科时已飞到苏联的中亚城市杜尚别，又突然提出要转道北京与周恩来会晤。

柯西金此举虽出人预料，但毛泽东、周恩来却有外交大师风度，他们都认为，不管中苏立场多么对立，不论柯西金有没有诚意，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要来北京谈，总不能拒人于门外。当然，也绝对不抱幻想。

在首都机场会客室，周恩来与柯西金进行了坦率的谈话，并就严格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边界发生争执时协商解决等问题达成协议。其后，周恩来以致柯西金信的方式予以确认。

对此事，9月11日的中国《人民日报》在不显眼的位置发表了中苏公报：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今天在首都机场会见了从河内参加胡志明丧礼后回国途经北京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双方进行了坦率的谈话。

就是这样一则简单的新闻消息，却触动了尼克松的神经，他担心突兀出现的中苏首脑会谈会使刚有起色的中美接触计划夭折。他被这事前毫无迹象的事情惊呆了，迫不及待地把基辛格找来，阴沉着脸怒吼：

“中国人要干什么？苏联人要搞什么名堂？这是不是意味他们之间的缓和？”

基辛格也是刚得知这一消息，但他见尼克松这样气急败坏，反而冷静下来，冷静地给尼克松分析说：

“初步看来，关于中苏高级会谈的联合声明是非常冷淡的，声明中没有使用他们过去描述这种会谈的标准形容词——‘兄弟般的’，这就意味着有严重分歧。我揣测，中国人可能邀请柯西金路过北京，因为他们认为使‘温度’降低一些，符合中国的利益。”

“这是否意味着苏中关系的缓和？”

“不是。在我看来，这是双方严阵以待，以准备下一回合的斗争。”

尼克松又问起此事的起因和是谁先主动提出的，基辛格果断地做出判断说：

“关于这次会晤的起因，有各种各样可能的解释。我认为，柯西金的飞机在杜尚别改变方向。可能是由于中国在最后一分钟提出的邀请。无论如何，中国给予柯西金的不过是起码的礼仪待遇，没有允许他离开机场。苏联首先宣布这次会晤，这可能意味着是苏联采取了主动行动。”

尼克松仍不放心，又问及这次会晤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基辛格凭借他对中美关系的深入研究侃侃而谈：

“我觉得程序性协议改变不了渊源深远的紧张关系。不管是中国想寻求和解也好，或是苏联给北京的最后警告也好，有一点是清楚的：中美关系在走向一个危机点。”

基辛格拿出两则电信来证明他的判断。

第一条电信是名为苏联自由撰稿人、实则是苏联政府发言人的维克托·路易斯大讲苏联对设在新疆罗布泊的中国核试验基地进行空袭的可能性，他以“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权威姿态宣称：

“过去一年的事态发展，证明苏联恪守这样一个理论，即社会主义国家

为了自身的利益或者那些受到威胁的国家的利益，有权干涉彼此的事务。”

第二条电信是引人注目的新闻评论：

“周恩来不避免会晤柯西金，不表明中苏冲突有任何新变化，而表明冲突糟到什么程度，说明整个中苏问题已经达到没有任何伸缩余地的地步……”

尼克松终于被基辛格说服，继续采取改善中美关系的措施。

这样，美中之间跳开了轻盈的小步舞：1969年12月12日，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代办雷阳同美驻波大使斯托塞尔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断两年后首次接触；同时，美国国务院宣布，从12月23日起，允许美国公司的国外子公司向中国出售非战略物资。一周后，美国国务院宣布取消对中国的贸易禁运，第七舰队亦减少在台湾海峡的舰只和巡逻活动。

到1969年底，美国同共产党世界的关系就慢慢演变成更为典型的中美苏三角关系了，而中美间的小步舞更引人注目，基辛格对此有精确描绘：

“这样，我们与中国人之间就开始了一场错综复杂的小步舞。这种小步舞安排得如此微妙，以致双方都能够总是说他们没有任何接触；如此风度优雅，以致任何一方都无需显出主动的样子；如此圆润周到，以致双方现存的关系都没有受到妨碍。”

勃列日涅夫对美中之间的美妙小步舞既恨又怕，使命多勃雷宁要求美国务卿罗杰斯向苏联通报中美的一切接触的情报。尼克松对此表示反对，他让基辛格通知罗杰斯说：

“总统要求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向多勃雷宁通报中美会谈的情况。如果多勃雷宁问到此事，可以若无其事地回答说，中美会谈只涉及双方关心的问题而没有其他，总统关心的是下级机关在非正式的谈话中不要超出这样一个限度。”

勃列日涅夫得不到中美会谈的情报，心里直发毛，对多勃雷宁大加申斥，限令多勃雷宁必须掌握中美关系进展的情报。

多勃雷宁调动苏联在美国的所有情报手段，获悉美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1970年1月20日在中美华沙会谈中表示，愿派美国官员去北京直接讨论打开中美关系问题，或请中国官员赴华盛顿完成同样的使命。

多勃雷宁心里如同长了草一般，1月21日就莽撞地跑到基辛格的办公室，大惊失色叫道：“亨利，听说你们要让中国人到华盛顿来，可别引狼入室呀，请给我介绍这方面的情况。”

基辛格觉得“苏联人的愚蠢是够典型的”，其实中美这次华沙会谈的情况很简单，无非是中美大使各念了一篇预先准备好的发言稿，就使俄国人紧张到了这个样子，真是又可气又可叹，就以开玩笑的方式拒绝道：

“阿纳托尔，莫斯科从未开恩向我们介绍过任何情况，你竟来要我帮忙，这不是要我为难吗？”

多勃雷宁仍不死心，死乞百赖请求说：“老朋友，希望你们不是在考虑利用中国作为一种军事威胁！”

基辛格拿定避而不谈的老主意，手推眼镜嘲讽道：“阿纳托尔，你这样说，实在有点儿太荒唐了！”

多勃雷宁被勃列日涅夫所逼，命令苏联驻美国大使馆官员倾巢而出刺探中美接触情报。基辛格对此暗中冷笑，感到北京已成为触发莫斯科“神经痛”的有力手段，就怀着几分痛快之感推动美国总统尼克松1970年2月18日发

表对外政策报告，对中国大献殷勤：

“中国人是一个伟大的生气勃勃的民族，不应该继续孤立在国际大家庭之外。从长远来说，如果没有这个拥有七亿多人民的国家出力，要建立稳定而持久的国际秩序是不可设想的。”

尼克松下面的话，更是有意针对他的老对手勃列日涅夫而言：

“我们希望改善中美关系，不是想要利用中苏冲突的一种策略手段……我们不打算袒护中苏任何一方，美国也无意与任何一个大国联合起来，结成敌对性的联盟，来反对两个共产党大国中的一个。”

尼克松在密切注视中苏关系的时候，突然看到 1970 年 4 月的一则报道说，中苏边界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他一下拉长了下巴，噘着嘴提笔写出对国务院的指示：

“我要求你们注意已出现的报道，我们务必使国务院不致于在有关北京会谈上拖延。”

尼克松立即把基辛格请来，将条子塞给他。基辛格感到尼克松写的评语“好像从天而降的雷声似的”，旋即极有把握地分析说：

“中苏边界谈判中所取得的进展，固然可能使中国人希望同美国举行更高级会谈的紧迫性减少一些，但不会改变基本现实。我们知道，苏联人对中国的政策和意图的疑心极大，而中国人已十分明确地表示，他们就是不买他们现在称为‘新沙皇’的苏联人的帐……因此，我们对共产党中国的战略似乎没有必要做重大的改变。中国人很可能仍然希望发展同美国的关系，作为抗衡苏联人的措施。他们似乎对和美国开展贸易也颇感兴趣。”

尼克松赞成基辛格的分析，指示国务院发言人罗伯特·麦克洛斯基宣布加快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善关系的进程。为准确无误并引起中国人的注意，基辛格叮嘱麦克洛斯基要重复三遍。

美国的这一举动立刻引起勃列日涅夫的恼怒，指令多勃雷宁向基辛格兴师问罪。

多勃雷宁气冲冲闯进基辛格的总统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办公室，仗着人熟质问道：“亨利，你们为什么对中国改变了称呼？”

基辛格满脸不高兴，以不可辩驳的口吻回敬道：“你们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称呼叫了 20 多年，难道我们用一次都不行吗？亲爱的阿纳托尔，请问这是什么逻辑！”

多勃雷宁被顶得面红耳赤，哑口无言，只得悻悻拂袖而去。

尼克松为集中力量与苏联争霸世界，决定从越南撤出美军，但又不甘心老老实实撤出，1970 年 4 月把侵越战争扩大到柬埔寨。中国政府 5 月 4 日发表政府声明，严厉警告、抗议美国进行明目张胆的挑衅，5 月 18 日宣布暂停中美大使级会谈。

中国支持西哈努克在北京建立流亡政府坚持抗美斗争，美国、苏联都感到不快。勃列日涅夫授意苏联《真理报》发表文章，指责中国拒绝苏联提出的在柬埔寨问题上采取联合行动的要求，尼克松对此暗中叫好。

为回击勃列日涅夫的指责，沉重打击尼克松扩大侵柬战争的罪恶行径，毛泽东以最厉害的炮火还击，5 月 20 日发表了《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引起世界范围的强烈反响。

尼克松收到毛泽东的声明的时候“脾气特别坏”，他咆哮如雷，对基辛格下令，凡是在越南用不着的美第七舰队的作战舰只全部开进台湾海峡，并

气急败坏地嚷道：

“一定要挫掉中国那好战的锐气，我要他们知道，美国不是在虚张声势和恐吓他们，这是总司令的命令，事情已经无可挽回，我命令第七舰队作战舰只在 24 小时内到达台湾海峡！”

基辛格等总统亲信知道，当尼克松说“无可挽回”时，正突出地表现出他对紧急事态“把握不定”，类似刚才的命令最好在 24 小时内不予执行，便唯唯而退，扣住尼克松的命令不发。

等尼克松情绪稳定下来时，基辛格才以犀利的语言分析说，毛泽东实际上是“非常谨慎的”。基辛格极有把握地说：

“实质上，那是一篇非常空洞的声明，它只提出要‘热烈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甚至关于中国是斗争的‘后方’这种常用的词句都没有。毛泽东声明的中心论点是：小国能够打败大国，河内看来必定从中得不到什么安慰。它没有提出什么威胁，没有承担什么义务，对你没有进行人身攻击，在有争议的双边问题上避免表态。”

尼克松疑惑地问：“那么，毛泽东发表这个声明的目的是什么？”

基辛格基于对当代国际问题特别是对毛泽东的深入研究，当即提出自己的独特看法：

“我认为，从策略上来说，毛泽东的声明是要达到这么几个目的：利用你在柬埔寨的行动大事宣传中国的正义立场；以毛泽东的威信加强中国人对西哈努克的支持；毛泽东的声明尖锐地指出，已有 20 个国家承认西哈努克（莫斯科没有承认西哈努克，而且始终不承认他）。”

作为敏感的政治家，尼克松恍然大悟自己做了傻事，自言自语说：

“看来，在台湾海峡重新部署力量并非良策，把柬埔寨同中国问题连在一起不可能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毛泽东还是留着不少的口子，以待恢复美中两国互相接近的长征，在盛怒之下把这些口子都堵死是一点好处也没有的——哎呀，不好，我的命令下糟了——”

“对不起，被我扣住未发！”基辛格说。

“扣得好，你真是我的好助手，不亏人称智多星！”

尼克松、基辛格继续不断向毛泽东、周恩来发送改善中美关系的信号，其中以 1970 年 9 月 16 日基辛格在芝加哥的讲话最引起中国人注意：

“当今世界上最深刻不过的斗争也许是……苏联和共产党中国之间的斗争。沿着 4000 英里长的边界，在一边有领土要求问题，在另一边集结了大量的军事力量，由于这两个共产党大国之间还有谁是正统的共产主义中心之争，使他们的冲突具有准宗教的含义，因而他们之间的斗争就更加严重。”

毛泽东、周恩来眼观世界风云变幻，准确地把握着地球的脉搏，他们认为改善中美关系的时机渐趋成熟，该向尼克松和基辛格发个信号了，就在 1970 年 10 月 1 日，把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请上雄伟的天安门城楼，给美国人史无前例的殊荣，让斯诺同毛泽东站在一起检阅声势浩大的国庆节游行队伍，特意在中国各大报登出照片，向美国发出含蓄而有深意的信息，但却没有引起应有的反应，基辛格特意讲到此事时说：

“不幸他们对我们敏锐地观察事物的能力估计过高。他们传过来的信息是那么拐弯抹角，以致我们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理解不了其中的真意。”

幸好尼克松与中国接近的决心已下，继续采取改善中美关系的措施，以

基辛格那充满哲理的形象语言来讲，尼克松“不像毛泽东举一把轻剑发送幽妙信息；在同一天，尼克松举着大锤传达他特殊的明显信号”：

“如果说在我去世之前，还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不能去，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去。”

1970年10月，联合国隆重举行庆祝成立25周年纪念活动，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应邀参加。尼克松知道这两人都与中国有非同寻常的关系，就眼睛一亮，计上心来。

尼克松首先于10月25日把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请进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盛情招待，称赞叶海亚是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的政治家，又与中国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他请求叶海亚向中国政府传话，说他认为中美和解极端重要，美国绝对不会与苏联合谋反对中国，并说美国愿意派一位高级使节秘密访华。

尼克松认为仅接通“巴基斯坦通道”还不保险，又决定接通“罗马尼亚通道”，便在10月26日把齐奥塞斯库请进白宫，请他转告中国领导人，即使不能达到同中国重新建立外交关系的最后理想，也可以进行中美高级代表团的互访。

同一天晚上，尼克松又出席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在华盛顿举办的盛大宴会。尼克松在发表讲话时，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提法，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美国总统首次正式使用这一名称。尼克松后来透露，他是“有意识地”这样做的。

这正是“说者有心，听者有意”，尼克松总统对新中国称呼的变化，刺痛了在场的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的神经。

罗马尼亚的宴会一结束，多勃雷宁就风风火火赶回苏联驻美国大使馆。直接打电话给基辛格，质问尼克松使用这一用语的含义。

基辛格见多勃雷宁竟如此气势汹汹向他兴师问罪，心中不由无名火起，当即毫不客气地反问道：

“请问，苏联不是也称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吗？你们用了几十年，我们用一次就不行吗？天下哪有如此霸道的事情！”

“这……这……”多勃雷宁顿时张口结舌，自讨了个没趣，只得悻悻放下电话。

1970年11月10日，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周恩来亲自到机场迎接。在当晚的单独会谈中，叶海亚极客气地主动问候周恩来：“色拉目阿某枯姆。”

周恩来与巴基斯坦客人来往频繁，也极其注重礼节，明白客人是在“祝你平安”，便也彬彬有礼地回敬了个“也祝你平安”：“沃耳来枯姆色拉目。”

叶海亚由此更加敬重周恩来，便非常乐意地为尼克松传话。周恩来感谢叶海亚去年和今年两次转告美国的口信，郑重地表示将他的传话报告毛主席。

毛泽东听了周恩来的汇报，11月13日让周恩来陪同他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叶海亚，感谢叶海亚为改善中美关系大力帮忙。

毛泽东又和周恩来详细研究如何回答美国的口信，然后由周恩来于11月14日与叶海亚进行第五次单独会谈，专门回答叶海亚转达的尼克松的口信。

周恩来特意说明，因为尼克松总统通过阁下调转告的是口信，我们也应该

通过阁下口头回答尼克松总统。于是，周恩来正式告诉叶海亚总统说：

“阁下清楚，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不容外人干预。美国武装力量占领中国台湾和台湾海峡，是中美关系紧张的关键问题，中国政府一直愿意以谈判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谈了 15 年还没有结果。现在，尼克松总统表示要走向同中国和好。如果尼克松总统真有解决上述关键问题（指台湾问题）的愿望和办法，中国政府欢迎美国总统派特使来北京商谈。时机可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商定。”

周恩来目光炯炯地盯着叶海亚询问：“这就是我们的口信，是否需要重复一次？”

叶海亚早已牢记在心：“不需要，我清楚了，请放心。”

11 月 21 日，罗马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勒杜列斯库到达北京，周恩来知其所负使命，当天即在人民大会堂与其亲切会见。

勒杜列斯库受齐奥塞斯库委托转告说，尼克松总统、罗杰斯国务卿对寻求同中国关系正常化的解决办法是十分关切的，尼克松总统请求齐奥塞斯库总统，如果有可能的话，向中国方面转告：美国准备通过任何途径、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同中国进行谈判，以便改善中美关系。美国愿意同中国发展经济、科技方面的关系，如果中国愿意的话。

周恩来听了稍作思考回答说，中国和美国之间没有别的问题，关键问题就是台湾问题，因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领土。尼克松总统说愿意跟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恢复会谈，如果他真有解决关键问题的愿望和办法，我们欢迎他派特使来北京谈判。

勒杜列斯库兴高采烈地说：“如果周总理允许的话，请让我这样告诉齐奥塞斯库总统转告尼克松总统：中国欢迎尼克松派特使到北京来谈判。”

周恩来断然纠正说：“这不行，应该是一句完整的话，一定要把前提讲清楚。”

看勒杜列斯库在认真地做记录，周恩来又严肃地补充说：“不仅是特使，尼克松自己来也可以。他可以到布加勒斯特、到贝尔格莱德去，为什么不可以到北京来啊？”

周恩来和毛泽东仔细商议，决定通过巴基斯坦驻美大使阿迎·希拉利传达正式信息。

于是，12 月 9 日，希拉利神气活现出现在基辛格的白宫办公室里，神秘地拿出一个信封，抽出一封用印有蓝道的白色信纸手写的函件。基辛格伸手要接，希拉利却把手缩回，郑重地告诉美国人：

“我没有被授权可以把这个文件留下来，因此，我不得不读给你听。我慢慢念，你把它记下来。”

这是基辛格外交生涯中绝无仅有的事件，他只得拿起笔，亲自记下希拉利用英语宣读的周恩来致尼克松的权威性信息：

中国一直愿意并且一直在设法通过和平方式进行谈判。为了讨论美军撤出中国领土台湾问题，尼克松总统的一位特使将会在北京受到最热忱的欢迎。美国通过各种渠道发出的许多信息都已收到，但是，一个国家首脑通过另一个国家首脑向另一个国家首脑提出建议，这还是第一次。美国知道巴基斯坦是中国的真实可靠朋友，我们十分重视这个信息。

基辛格怀着激动的心情这样写下他当时的独特感受：

“我们当时忙于这种刻板的事，根本没有注意到，一个以古典宗教为立

国之本的国家的杰出的举止文雅的代言人，口念一个富有战斗精神的亚洲革命国家领导人的信息，而由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领导人的一个代表把它记下来，这是多么不和谐；也没有注意到，在这个信息随发随收的时代，我们竟回到前一世纪那种外交方法——由一名信使传递、宣读手写的照会的方法。一件带有根本性的重大事件发生了，其方式是学究式的，几乎是平淡元奇的。”

基辛格送走希拉利，立即穿过大厅走到美国总统椭圆形办公室，把周恩来的来函记录交给尼克松，啧啧称赞说：

“中国的外交文书总是独具特色，文明优雅，在风格和行文方面也细致得多！”

尼克松和基辛格一致欣然接受邀请，但主张不仅限于谈台湾问题。12月16日通过希拉利给周恩来复信称：

“美国准备与北京举行高级会谈，以讨论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存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之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两天后，毛泽东在北京接见斯诺。他抽一口外表裹着塑料膜的雪茄烟，发出惊世之言：

“如果尼克松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当作旅行者也行，当作总统也行。目前，中国和美国之间的问题，要同尼克松解决。”

其后，很长时间音无音信。

基辛格认为，毛泽东又一次把尼克松的敏锐性和美国情报机构的能力估计过高，尼克松几个月后才知道毛泽东这次谈话的内容，但因美国1971年春扩大侵略印支战争而被搁置。

恰在此时，随着日本漫山遍野开放的樱花，中美关系也迎来了初现花蕾的早春景象：

在名古屋举行的第三十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中美运动员的密切交往推动了历史的发展，这开始出于美国乒乓球队副领队对中国运动员的一句玩笑话：

“你们中国邀请美国南面的墨西哥运动员去访问，也邀请我们北面的加拿大运动员去访问，你们能不能也向我们美国运动员发出访问的邀请呢？”

中国领队不敢擅自回答，忙把这个消息报给北京，周恩来心头迅即出现以小小银球推动大球运转的宏伟外交设想，在外交部和国家体委的联合报告上批下扭转乾坤的三个大字：

拟同意。

周恩来又周到细致地写下闪着超群智慧之光的意见：

“可留下他们的通讯地址，但对其首席代表在直接接触中应表明，我们中国人民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阴谋活动。”

报告送进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从报告中看到中美乒乓球运动员友好交往的佳话已引起世界舆论的广泛赞扬，而已在西方报刊上成了头号新闻，而有关莫斯科召开苏共二十四大的新闻却逊色三分，心中非常高兴。

在丰泽园的智慧灯光下，毛泽东决心让美国乒乓球队打头阵，以其作为打开中美关系新局面的开端，为尼克松访华创造良好的气氛，于是便毅然做出立即邀请美国乒乓球队来华访问的决定。

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队访华的消息震动全球，尼克松、基辛格措手不及，但却欢欣鼓舞，异口同声惊叹中国人手法高明，基辛格当着尼克松的

面，对此事赞不绝口：

“ 这整个事情是周恩来的代表作！跟中国人的所有举动一样，它有许多层意义，描画得光彩夺目的表面是最不重要的部分。对这些美国青年的邀请的最明显的意义是：它象征着中国已承担了和美国改善关系的义务；而更深一层的意义是：它保证——比通过任何渠道发出的外交信息都更有份量——现在肯定将被邀请的使节将来踏上的是友好国家的国土。这是向白宫发出的一个信号，表示他们已注意到美国的主动行动。 ”

尼克松极感兴趣地问：“ 毛泽东。周恩来到底是怎么想的？ ”

基辛格极有把握地侃侃而谈：“ 从中国的观点看，由于这些选手不可能代表某一种政治倾向，这一做法更加具有吸引力。这样，中国就可以在根本不可能刺激美国评论界的情况下，表明它的真意。周恩来最懂得怎样作才不会遭到拒绝。在中国内部，这有助于使党政干部适应外交方针上即将发生的革命性变化。不过，这也暗暗含有对美国的警告：如果中国的建议遭到拒绝，北京可以积极开展民间的来往接触，设法发动一场公众的运动，以求达到他们的目的。 ”

尼克松从未料到对中国的主动行动会以乒乓球队访问的形式得以实现，当即批准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勃列日涅夫大吃其醋，急命多勃雷宁去见基辛格，企图以邀请尼克松访苏进行美苏最高级会谈阻挠中美接触，软硬兼施，无所不用其极。

尼克松、基辛格暗笑勃列日涅夫又犯了爱占小便宜的老毛病，殊不知华盛顿手里拿着莫斯科根本不知道的底牌，结果苏联弄巧成拙，倒替中美解决了问题，其高压政策促使中美首脑加快了建立新的中美苏三角关系的步伐。这正是：

顺应潮流万事通，是非功过自分明。

可笑苏联真愚蠢，弄巧成拙遭报应。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顺风张帆 美总统初访新中国 语惊四座 毛泽东会见尼克松

话说尼克松、基辛格从美国的全球战略出发，加紧准备尼克松访华。

1972年1月3日，尼克松派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将军率先遣组来华，为尼克松访华做技术安排。

周恩来知道黑格虽仅为准将，却是尼克松和基辛格的亲信，在与苏联打交道和压南越伪总统接受美越巴黎协定中有上乘表现，到北京后又对中国代外长姬鹏飞说有重要情况要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便在1月4日凌晨会见了黑格。

黑格没有想到周恩来这么快会见他，因而既兴奋又紧张，一见面便说要以军人的直率作风向周恩来转达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口信，于是便从美中大三角战略关系投中国的所好说：

“苏联政府对印度次大陆问题的政策是使次大陆保持分裂和再分裂状态，可是苏联现在决定迅速地、大幅度地改变原来的政策，他们企图通过树立一些你们的敌人或敌人的代理人包围中华人民共和国，苏联为此曾多次邀请基辛格博士作为勃列日涅夫个人的客人访问莫斯科，还愿意就防止意外战争和军事挑衅问题达成协议。美国拒绝了苏联的这些建议，主要原因有两个：首先，不能允许苏联分裂巴基斯坦；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来的生存能力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

周恩来对黑格后一句话极为反感，认为这是典型的帝国主义观念，就威严地问道：“我要请教一下黑格先生，你们为什么非要在公报中使用生存能力这个词呢？”

黑格从大三角关系出发振振有辞解释说：“我们完全是为贵国着想。你看，苏联在贵国的北部边境摆着50个正规师，百万大军压境，威胁着你们的……生存，美国是不能坐视不管的，那是霸权的表现。”

周恩来为了向美国传达这样一个信息：中美建交要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不需要由美国来保护。他剑眉一挑，堂堂正正宣称：

“我们反对霸权主义，反对任何国家在任何地区称霸的努力，这是中国政府一贯的立场，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存，不需要任何国家或集团来保护。”

黑格这才晓得问题不那么简单，急忙陪着笑脸，从对苏战略角度，小心翼翼解释说：

“我们拒绝苏联的建议，不是因为美国对中国突然产生了某种喜爱，而是因为美国认为苏联的战略首先是要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失去作用，然后是要进攻美国，我们这样做完全是出于自私自利的国家利益的原因。”

周恩来以中国人的凛然正气，毫不客气他讲明中国的观点：

“你们美国人的观点有点问题。为什么我们这样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的生存能力，要你们美国政府来关心呢？美国人在世界上就是习惯于到处充当保护人。我要直率地说，这是一种帝国主义观念的反映！”

黑格一再解释说这是美国出于对苏战略的考虑，以图抵消苏联对中国的威胁，美国还可提供苏联对中国威胁的有关资料，希望中国设法加强尼克松的世界领袖形象。周恩来双手抱在胸前，有

板有眼说：

“我们两国接近，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缓和远东局势，这不仅对美国有利，同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利，而且对中美两国人民和远东各国人民都有利。关于南亚次大陆和印度支那问题，苏联的插手，我看不是由于苏联战略方针的改变，而是由于中美接近，它必然要采取这样的对策。中国要承担中美接近的后果，我们是做了准备的。这对我们是没有什么意外的。”

黑格特别提到苏联为反对尼克松访华，正采取一系列措施，因而捎来尼克松的口信，建议中美认真对付。周恩来堂堂正正地回答说：

“第一，随着中美会谈的临近，某些敌对势力不断加紧破坏，这是可以料到的，中国对此也是有准备的。第二，尼克松访华公告发表后，苏联在欧洲匆忙做出让步，就柏林问题同西方达成协议；在亚洲，同印度缔结了名为‘友好条约’实则是军事同盟的条约；接着支持印度侵略巴基斯坦，占领东巴。这是苏联一贯奉行的争夺霸权政策在新情况下的继续，说不上什么战略转变。实际上更加暴露了它的扩张主义的面目，在世界上和联合国中陷入空前的孤立，事态的发展正说明次大陆将从此动荡不已。”

诚如周恩来所料，勃列日涅夫不能阻止尼克松访华，就设法在中美之间挑拨是非，他知道法国作家、哲学家安德烈·马尔罗将被尼克松请去介绍中国情况，就暗中向马尔罗施加影响，通过马尔罗之口讲莫斯科想说而无法向尼克松讲的话。

于是，70岁的马尔罗被尼克松请进美国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恭恭敬敬问尼克松道：“在几年以前，你是否会想到中国领导人会同意会见一位美国总统？”

马尔罗早在30年代就认识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其后40年间仍不断同中国领导人保持联系，他关于中国领导人的著作《反回忆录》是西方领导人了解中国领袖最有价值和极富趣味的读物，他以权威资格告诉尼克松：

“中美和解势在必行，这是中苏分裂的必然产物。越南战争不会构成障碍，因为中国的行动是它国内需要的反映。”

尼克松见马尔罗回答得如此干脆利落，不免对其敬佩有加，就提出他最关心最想了解的问题：“毛泽东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马尔罗一拢白须，以颇带几分神秘的语气说：“总统先生，你将会晤的是一个命运奇特的人，他相信他正在演出自己一生的最后一幕。你可能以为他是在对你说话，但实际上他将对死神说话。无论如何，你到北京跑一趟是值得的。”

尼克松越听越有味道，又问及毛泽东去世以后中国的发展方向，马尔罗趁机贩卖从莫斯科弄来的货色说：

“正像毛泽东自己所说的，他没有继承人。这话他是指什么说的呢？他的意思是，据他看来，伟大的领袖人物——丘吉尔、甘地、戴高乐——是世界上不会再出现的那种医治创伤的历史事件的产物。从这个意义来说，他认为他没有继承人。”

马尔罗奉承尼克松攻击毛泽东说：“总统先生，你是在理性范围内行事的，但毛泽东却不是。他带有一点巫师的味道。他脑子里有个幻象，这幻象迷住了他。”

尼克松将信将疑，又把话题拉了回来：“你为什么认为中美和解势在必行，是因为有了越南战争吗？”

马尔罗学着俄国人的腔调大放厥词：“啊，是的，即使这样，中国在越

南问题上所采取的行动也是骗人的。有一个时期，中俄之间的友谊曾是晴空无云，他们让俄国的武器经过他们的领土运往越南，但是中国从未帮助过任何人！既没援助过巴基斯坦，也没帮过越南。中国的外交政策是一个聪明的骗局！中国人自己什么也不相信，他们只相信中国，只有中国！”

尼克松感到这与他掌握的中国情况迥然不同，作为美国三军总司令，他指挥美军在越南作战多年，他确实知道，中国部队已入越作战，越南人使用的武器装备绝大部分来自中国。尼克松正要反驳，只听马尔罗又对中国和毛泽东大加攻击道：

“对毛泽东来说，中国是一个大陆——它自成一洲，像澳大利亚一样。唯有中国才是重要的。如果中国有必要接待桑给巴尔的苏丹，它是会这样做的，或者对美国总统也是这样的，中国人并不在乎。”

尼克松这才发现马尔罗讲的完全是勃列日涅夫那一套，原来对他的崇敬之情至此烟消云散，一怒之下，几乎把马尔罗轰出白宫，只是想到这是自己请来的客人，才客客气气送走。这件事倒促使他尽快访华，去看看毛泽东到底是不是巫师……

1992年2月21日上午9时，尼克松乘坐“七六年精神号”专机抵达上海，虽只稍作停留，却也发现这个昔日冒险家的乐园已今非昔比。接着又飞向北京，从机窗向外眺望，只见冬季的田野一片灰黄，小村镇就像他从图画册里看到的中世纪的村镇一般，更对中国充满了神秘感。

抵达北京机场后，尼克松让保安人员拦住其他官员，只带夫人走下舷梯，大远就主动向在寒风中鼓掌欢迎的周恩来伸出手去，两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两个彼此久闻大名的政治家目不转睛地彼此端详，微笑着轻轻摇晃着握在一起的手足有一分钟，彼此心照不宣：一个旧时代结束了，一个新时代宣告开始！

还是东道主周恩来首先致意贵宾：“总统先生，你把手伸过了世界上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25年没有交往了啊！”

尼克松看到过胡志明、金日成访问北京的群众欢迎盛况，暗想我堂堂两个霸主之一，总不能不如“四等破烂小国越南”、只有半壁河山的胡志明、金日成吧？

使尼克松失望的是他只受到低格调的欢迎，除了350人组成的仪仗队之外，机场上没有盛大而热烈的欢迎场面，尼克松不免有些闷闷不乐，基辛格劝说道：

“整个欢迎仪式虽简朴到了极点，但这样极度的简朴反映了一个真理，只有最紧迫的必要性才使美中两个国家走到一起来了——它们的其他关系根本不配享有国事访问常有的那种喜人的欢迎仪式。”

尼克松仍抱有一线希望，一相情愿希望在天安门广场会出现人山人海的欢迎场面，但长串车队驶过举世闻名的天安门广场时，却发现巨大的广场空无一人，尼克松怀着某种莫名其妙的失落感，驶过久已向往的紫禁城的红墙和它对面庞大而坚实的人民大会堂，驶过只在电影上见过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巨幅画像，开进座落在钓鱼台湖畔的头等国宾馆。

周恩来以出类拔革的外交风度——与美国贵宾打招呼，他带来的毛泽东要接见尼克松一行的喜讯更驱散了尼克松心头的疑云，他大喜过望，就要起身前往中南海。

这时，尼克松却见基辛格给他使眼色，便稳坐钓鱼船不动声色，只听基

辛格不紧不慢对周恩来没话找话说：“在今天的宴会上，你准备念讲话稿呢，还是做即席发言？”

“准备念讲话稿。”

“你看我们讲话的口气应该温和一些呢，还是强硬一些，以便与总理的讲话语调相配合？”

周恩来急于落实毛泽东要接见尼克松的事，有些不耐烦地说：“我将把我的讲话稿事先给你一份。”

至此，基辛格才答应陪同尼克松去见毛泽东。

这样，世界上最革命和最反共的两个大国领导人终于见面了，两人边握手边仔细打量对方，纠正着想象和实际所见的差距。

在尼克松眼里，毛泽东是一个慈祥的老者，虽谈吐随便，谈笑风生，但无疑是一个强有力的人，具有压倒一切的宏大气魄，他这样描写初次见面的毛泽东：

“他身体的虚弱是很明显的，我进去时，毛泽东要秘书扶他起来，他很抱歉地对我说，他已不能很好他讲话。周恩来后来把这一点说成是患了支气管炎的缘故，不过我认为实际是中风造成的后果。他的皮肤没有皱纹，不过肤色看上去却几乎像腊黄色的。他的面部是慈祥的，不过缺乏表情。他的双目是冷漠的，不过还可以发出锐利的目光。他的双手好像不曾衰老，也不僵硬，而且还很柔软，不过年岁影响了他的精力。”

在毛泽东眼里，尼克松身着深色西服，下已尖尖突出，因紧张而导致面部肌肉略显抽搐，却竭力摆出超级大国领袖的架子。

毛泽东和尼克松握手达一分钟之久，然后又伸手与基辛格相握，上下打量一番，又用下颌点了点头说：“哦，你就是那个有名的博士基辛格。”

基辛格笑着说：“我很高兴见到主席。”

双方着重谈了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态度问题，毛泽东回答尼克松两霸中哪一个威胁更大的提问时明确指出：

“目前，美国发动侵略和中国发动侵略的可能性都小……你们想撤回一些在外国的军队；我们的军队是不在国外的。”

尼克松明白毛泽东通过排除法，显然说明苏联是中国安全方面的主要威胁。尼克松激动万分，甚至想跟中国签订一项互不侵犯条约，他手摸下巴表示赞成说：

“我们应该问问自己——当然也只能在这间屋子里谈——为什么苏联人在面向中国的边境上部署的兵力，比面向西欧的边境上部署的还要多？我们必须问问自己，日本的前途如何？我知道我们双方对日本问题是意见不一致的，但是从中国的观点看，日本是保持中立并且完全没有国防好呢，还是和美国有某种共同防御关系好呢？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决不能留下真空，因为真空是有人来填补的。例如，周总理已经指出，美国在到处伸手，苏联也在到处伸手。问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的危险究竟来自何方？是美国的侵略，还是苏联的侵略？这些问题都不好解答，但是我们必须讨论这些问题。”

基辛格更对毛泽东充满敬佩之情，只见这个世界上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中国领袖身材高大魁梧，面带微笑注视着不久前还是不共戴天的仇敌，其眼光敏锐而微带嘲讽，身上发出一种磁石般的吸引力，便觉得“中国人太精细微妙了，到底经历了几千年文明的熏陶”，只听毛泽东幽默地对尼

克松说：

我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头子，而你是世界上著名的反共头子，历史把我们带到一起来了，我们的共同的朋友蒋委员长可不喜欢这个。他叫我们共匪。

尼克松极感兴趣地问：“蒋介石称主席为匪，不知道主席叫他什么？”

毛泽东开心地笑了，周恩来适时回答说：“一般地说，我们叫他们‘蒋帮’，有时在报上我们叫他匪，他反过来也叫我们匪。总之，我们互相对骂。”

毛泽东在戏谑、玩笑和轻松的俏皮话之间，巧妙地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其实，我们同蒋介石的交情，比你们同他的交情长得多。”

基辛格觉得毛泽东在轻松自如的空气中，引导着这场苏格拉底式的对话，以高超的语言艺术牵着对话者绕来绕去，巧妙地表达了中国的战略意图，却规避了一般外交家难以避免承担的义务。基辛格觉得毛泽东的话犹如紫禁城内的庭院，一院套一院奥妙无穷；毛泽东诙谐的谈吐中总夹带一些对世界大三角关系的精辟看法，犹如瓦哥纳歌剧的序曲，需要以智慧的头脑，借助对中美苏三角关系的深入研究，才能展示出它们的意义和奥妙。

基辛格认为这是世界外交史上的顶尖杰作，毛泽东、周恩来、尼克松和他自己正创造当代外交的经典艺术。他越想越感到回味无穷：

“毛泽东省略的语句像墙上的人影，虽然是现实的反映，却没有现实的内容。他的话指点了一个方向，但却不规定前进的道路。毛泽东有时也下几句断语，这种断语使听者猝不及防，造成一种令人迷惑并略带威胁的气氛。这个情况竟像是面对着来自另一世界的神灵，他偶尔揭开掩盖着未来的帷幕的一角，让我们瞥上一眼，但从来不允许我们看到全貌，这全貌唯有他自己才看到过。”

尼克松被毛泽东非凡的谈吐吸引住了，深知是勃列日涅夫的霸权主义使中美从战略角度走到了一起，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对付苏联人，就需要中美领导人增强相互信任。

尼克松见周恩来频频抬腕看表，又看毛泽东面呈疲劳之色，就抓紧时机使这次在某种意义上空前绝后的外交会谈更锦上添花：

“主席先生，在我们的谈话即将结束的时候，我想说明，我们知道你和总理邀请我们来这里是冒了很大风险的。这对我们来说，也是很不容易做出的决定，但是，我读过你的一些言论，知道你善于掌握时机，懂得只争朝夕。”

毛泽东听尼克松竟能熟练地讲出他诗词里的话，得意地笑了，饶有兴味地听来自大洋彼岸的美国总统继续讲下去：

“我还想说明一点，就个人来说——总理先生，我这也是对你说的——你们不了解我。既然不了解我，你们就不信任我。你们会发现，我绝对不说我做不到的事。我做的总要比我说的多。我要在这个基础上同主席，当然也要同总理，进行坦率的会谈。”

毛泽东由于尼克松谈到他的诗而兴致勃勃，对中美关系又发表看法说：

“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这个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大问题，因为现在我们两个国家不存在打仗的问题。你们想撤一部分兵回国，我们的兵也不出国，所以我们两家怪得很，过去22年总是谈不拢，现在从打乒乓球起不到10个月，如果从你们在华沙提出建议算起两年多了。……我们办事

也有官僚主义，你们要搞人员来往这些事，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是死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

毛泽东也想结束这场谈话，手举香烟说：“你们下午还有事，吹到这里差不多了吧？”

基辛格表示赞成说：“对，‘只争朝夕’！”

毛泽东指着基辛格又谈兴大发：“‘只争朝夕’，我觉得，总的说来，大概我们这种人放空炮的时候多，无非是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修、反，建设社会主义。”

周恩来乐得哈哈大笑，尼克松也幽默地“对号入座”说：“就是像我这样的人，还有匪帮。”

毛泽东探身向前，对尼克松微笑而谈：“就个人而言”，你可能不在打倒之列。”

毛泽东又指着基辛格说：“他们说，你这个人也不在被打倒之列——如果你们都被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

尼克松抓住最后一点时间，想和毛泽东建立密切的私人关系，就对其大加赞扬说：

“主席先生，我们大家都熟悉你的生平。你出生于一个很穷的家庭，结果登上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一个伟大国家的最高地位。我的背景没有那么出名。我也出生于一个很穷的家庭，登上了一个很伟大的国家的最高地位。历史把我们带到一起来了。我们具有不同的哲学，然而都脚踏实地来自人民，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实现一个突破。这个突破将不仅有利于中国和美国，而且有利于今后多年的世界。我们就是为了这个而来的。”

毛泽东不愿谈这个话题，极有分寸地称赞尼克松说：“你那本《六次危机》写得不错。”

尼克松乐滋滋的，回敬说：“你读的太多了。”

毛泽东摇摇头，一举香烟认真他说：“不，读得太少，对美国了解太少了，对美国不懂。要请你派教员来，特别是历史和地理教员。我曾跟早几天去世的记者斯诺说过，我们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何必僵着呢！一定要谈成。一次没有谈成，无非是我们的路子走错了。那我们第二次又谈成了，你怎么办啊？”

这时，所有人都已站了起来，尼克松握着毛泽东的大手，说出他的心里话，“我们在一起可以改变世界！”

毛泽东头脑非常清晰，对这句话不表示态度，只讲告别之词：“我就不送了。”

有人写诗赞颂毛泽东、周恩来、尼克松、基辛格的此次四人会谈称：

四人会见举世惊，谈笑风生见解精。

世界外交称一绝，千秋万代留美名：

一小时后，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盛大宴会上，尼克松怀着会见毛泽东的亢奋激情，试图用理想主义的语言来表达他对华采取主动行动的坚实而深厚的基础：

“全世界都在注视着，全世界都在倾听着，全世界都在等着看我们将做些什么……毛主席写过：

多少事，从来急；

天地转，光阴迫。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现在是只争朝夕的时候了，是我们两国人民攀登伟大境界的高峰，缔造

新的、更美好的世界的时候了。”

周恩来和尼克松以“只争朝夕”的精神进行紧张的谈判，中美苏大三角关系是重要谈话内容，周恩来高瞻远瞩说：

“你们美苏两家搞军备竞赛，水涨船高。美国的军费是公布的，苏联的不公布，但它占的比例不会少，所以他们国内人民生活很苦。苏联农业生产上不去，不能仅仅说是气候的原因。苏联同加拿大的气候差不多，加拿大的农业并不坏嘛！苏联就是因为军费大多，这样浪费，搞核武器花那么多钱，不能吃，不能穿，又不能用，到一定时候还要报废，下个世纪人民会批评为什么用那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搞核武器，中国希望美苏达成协议，减少核军备。美苏搞好关系，我们赞成。”

尼克松对周恩来的精辟分析极为叹服，又站在美国立场上侃侃而谈：

“我并不想硬说苏联的现领导有怎样的动机，我只能尊重他们自己的说法，但是我必须依据他们的行动来制定政策。就核力量的对比而言，苏联在最近四年间一直以非常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我决心不使美国落在后面。如果美国落在后面，美国对欧洲提供的保护盾牌，我们对太平洋地区同美国订有条约的各国提供的保护盾牌，就会变得毫无价值。”

在印度支那问题上，尼克松则有求于中国帮助他从中越脱身，他揭露苏联的阴谋说：

“越南问题很简单，战争拖下去，唯一得到好处的是苏联，他们要把美国拖住，因为他们想借此扩大他们在北越的势力。从美国所得到的所有情报来判断，苏联甚至可能在怂恿北越坚持打下去，不要解决问题。”

周恩来坚持原则，明确告诉尼克松：“胡志明是我的老朋友，1922年我在法国就认识他。我认为美国撤出越南是唯一正确的做法，只要美国继续推行越南化、老挝化和柬埔寨化，只要他们一天继续打下去，中国就不能不继续支持他们。”

尼克松发现，“中国人对苏联既有极端的蔑视，又有相当大的担心”，周恩来完全意识到尼克松访问莫斯科之前，先访问北京的象征意义和影响，他看到苏联报纸谴责尼克松访华，就非常高兴地对尼克松说：

“你先到这里来，莫斯科气得要命！苏联广泛动员他们的人、他们的追随者，大骂中国。让他们去骂吧，我们不在乎！”

访问中国短短一周，美国人对中国、苏联的外交差异有了鲜明的对比，这令美国人耳目一新，基辛格饶有兴味地在日记中写道：

“就这样，尼克松第一次亲自领略到中国式的外交。苏联人一般比较生硬，中国人拐弯抹角。苏联人坚持特权，中国人讲究普遍的原则，表现出自信心，试图使实力问题显得无足轻重，而在这样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要求。苏联人把友好作为谈判成功后的奖赏；中国人在谈判之前就把友谊当作僵绳，他们至少在形式上使对方成为私交，这样就微妙地限制了对方能提出的要求。”

尼克松、基辛格津津有味地研究中苏外交风格迥然不同的文化方面的深层次原因，得出这样饶有兴味的结论：

“苏联人所居住的国家曾屡次入侵人家的国土，近期则主要利用武力扩大自己的势力，他们对自己的要求的道义根据缺乏把握，因而不敢承认犯错误的可能性。苏联人从自以为绝对正确的教条转移到不可改变的立场（不知改变了多少次）。中国人在世界的这个地区执文化的牛耳，甚至能用自我批

评作为工具来为自己服务。中国人征求来访者的意见——这是一种赢得同情和支持的谦虚姿态。这样做还可以使来访者说出自己的价值标准和目的，结果他就约束了自己，而中国人以后就能够利用他自己的建议（而且时常这样做）。苏联人脾气暴躁，有时口是心非，给人留下一种心理反常、心神不安的印象。中国人则强调价值标准的独特性，并对之深信不疑。因此，中国人表现了一种不为压力所左右的优越感，他们甚至用暗示‘原则问题不容谈判’的方法，事先就阻止对方施加压力。”

尼克松问他的智囊：“中国外交家可靠吗？”

基辛格毫不犹豫地告诉他的总统：“中国外交家是可靠的，他们从不搞小动作，他们不讨价还价，他们很快就亮出底牌，进行说理，顽强地加以辩护，他们信守协议的意义和精神，正如周恩来喜欢说的：‘我们说话是算数的’。”

由于双方的共同努力，中美会谈取得重大成果，双方建立了互相尊敬和友好信任的关系。周恩来怀着轻快的心情对尼克松谈开了文化诗词，这使尼克松甚感意外，只听周恩来以温文尔雅的神态说：

“总统阁下，在你楼上的餐厅里，我们挂了一首毛主席书写的关于庐山的诗，最后一句是：‘无限风光在险峰’，你到中国来是冒了一定风险的。”

尼克松见周恩来如此善解人意，这样同情他的困难处境，一股暖流涌遍周身，无限自豪他说：“现在我们已经到了顶峰了！”

周恩来见尼克松理解了毛泽东诗词的含义，觉得找到了谈话对象，因而谈兴大发，滔滔不绝地谈开了诗：

“还有毛主席的一首《咏梅》，我想挂而找不到合适的地方。主席在这首诗词里指的是，采取主动的人不一定是伸手的人，等到百花盛开时，他就要消失了。”

尼克松对此极感兴趣，请周恩来指教，周恩来就充满深情地朗诵起毛泽东那脍炙人口的《咏梅》：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
她在丛中笑。

周恩来决不是泛泛论诗，微微一笑联系中美关系，寓意深刻他说：

“因此，我们同意你的想法，你是采取主动行动的人。你也许看不到它的成功，但是我们当然会欢迎你再来的！”

尼克松深受鼓舞，正要圆满结束他的首次中国之行，未料到国务卿罗杰斯造反了，对中美联合公报提出 15 处修改意见，实际上要推倒重来，这时离发表公报只有 24 小时了，美国代表团一下子乱了套。尼克松大发雷霆：

“我批准了，毛泽东的政治局也批准了，我们又单方面提出修改，我们还有没有脸？看我回去不把国务院那帮家伙都收拾了！”

基辛格冷静地劝说：“还是先顾眼前吧，要紧的是明天发布公报！”

这真是火烧眉毛的紧急大事。尼克松、基辛格商量半天毫无办法，最后决定请周恩来出面解难排忧。

基辛格只好硬着头皮去找中国外交部副长乔冠华求助，乔冠华向周恩来转达此意时，认为周恩来太忙了，美方内部的矛盾还是由他们自己解决吧，

没想到却受到周恩来的严肃批评。他语重心长地启发说：

“冠华，中美联合公报的意义不仅仅在它的文字，而在于它背后无可估量的意义。你想想，公报把两个曾经极端敌对的国家带到一起来了，两国之间有些问题推迟一个时期解决也无妨。公报将使我们的国家，使世界产生多大的变化，是你和我在今天都无法估量的。”

这番话说得乔冠华顿开茅塞，忙笑着回答：“总理，我明白了！”

周恩来马上向毛泽东请示汇报，毛泽东果决地回答：“你可以告诉尼克松，除了台湾问题我们不能同意修改之外，其他部分可以商量，任何要修改台湾部分的企图，都会影响明天公报发表的可能性。”

周恩来特意在杭州看望罗杰斯和美国国务院官员，称赞他们对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大力支持，消除了美方的内部矛盾，使中美上海公报得以顺利发表，震动全球。

世界舆论认为上海公报具有深远的意义，说“尼克松总统答应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要求，第二次公开保证从台湾撤出所有美国军队和设施”，认为中国在上海公报中“所得甚多，所失甚少”；国际问题专家认为中国在中美苏三角关系中的地位因此大大提高，使中美苏三国关系发生了有利于中国的微妙变化。

正在积蓄力量准备竞选总统的罗纳德·里根开玩笑说，尼克松访华是一部很棒的电视“预告片”，应当把它搞成连续的多部电影或电视剧。这正是：

上海公报气若虹，外交奇绩举世惊。

苏联忌恨遭讥笑，中美关系展新程。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香饵钓鱼 勃列日涅夫“绑架”尼克松
投其所好 苏联领导人“流放”基辛格

话说勃列日涅夫见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取得巨大成功，出尽了风头，使美国公众对尼克松的中国之行大加称赞，尼克松获得了蝉联总统的希望，勃列日涅夫心里更加嫉妒，便迫不及待地催促尼克松访苏。

勃列日涅夫对尼克松访华既恨又怕，他找来电视录像反复观看，要求尼克松这次访苏的规格必须超过他访华的规格。只有压倒中国，才能出勃列日涅夫心中的恶气。

勃列日涅夫首先要求基辛格也来一次秘密访问莫斯科，唯一的理由就是因为基辛格曾秘密访问北京，使中国在上大出风头，苏联也有权得到同等待遇。

尼克松和基辛格对勃列日涅夫这一提议都举双手赞成，三人都有自己的小算盘，而且都拨拉得分外精：

尼克松认为基辛格秘密访苏是他正式访苏的垫场戏，等基辛格把气氛造好后他才正式出场，他更省力而会取得轰动全球的外交效果，创造连续成功访问两个共产党大国的外交奇迹，以丰功伟绩载人外交史册，用来巩固不太稳固的总统地位，以便对付反对党和政敌，也可推迟他和国务卿罗杰斯的争论。

基辛格认为这样可以再风光一次，更不受舆论界和批评他的人事先定的规矩的掣肘，从莫斯科返回时就可以根据取得的辉煌成果的来龙去脉讲话，而不必按别人的愿望或虚构的口径讲话。

领袖欲极强而才能平庸的勃列日涅夫对被毛泽东、周恩来压过自己一头极为恼火，处心积虑想搞个外交奇迹给自己脸上贴金。

这样，基辛格于1972年4月20日清晨乘一架总统专机动身前往莫斯科，当晚8时在莫斯科一个军用机场的僻静、黑暗的角落里降落，由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瓦西里·库兹涅佐夫陪同，以100英里的时速驶往俯瞰莫斯科河的列宁山上的宾馆大院，立刻陷进俄国人传统的好客与苏联人出名的狡猾溶为一体的漩涡里。

不一会儿，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和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就来大献殷勤，声称苏联领导人非常重视这次美苏最高级会谈，勃列日涅夫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准备同尼克松会晤。

基辛格完全没有想到，在美国动用B—52战略轰炸机大规模轰炸越南海防四天之后，苏联人仍如此积极地促进美苏首脑会谈。基辛格暗暗冷笑，觉得美国可以利用这次美苏首脑会谈约束苏联的行动，也可以按尼克松的意志放手推行结束越南战争的计划。

4月21日上午，基辛格会见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这位总书记外交经验有限，对会见像基辛格这样的世界上一流外交家心里发虚，不时地拍拍基辛格的肩膀，可一想到柯西金提醒他行为要检点，就又是一本正经。

基辛格将勃列日涅夫的尴尬情态看到眼里，心中更有数了，含笑感谢勃列日涅夫的热情欢迎，只听勃列日涅夫不自然地开玩笑说：“我希望能使博士感到更加热火。”

基辛格有意站在上风头发动攻势：“请问，这是一种威胁，还是意味着一种愉快的前景？”

勃列日涅夫暗暗称赞基辛格果然厉害，急忙小心翼翼答称：“苏联不赞成搞威胁。”

基辛格暗自发笑，觉得勃列日涅夫的窘态是令人高兴的事情，感到颇为新鲜，很自然地将中苏领导人拉在一起进行比较：

“这样，在两个月的时间内，我同两个共产党大国的强有力的领导人都见了面。勃列日涅夫和中国人大相径庭。这两国领导人都领导着多次遭受过外国入侵的幅员辽阔的国家，但是，由于文化、历史和个人经历的不同，产生了他们个性和风格上的悬殊差别：毛泽东和周思来代表这样一个社会，它在行政管理艺术方面具有最悠久的连续经验；他们代表着这样一个民族，它的文化一直为本地区之冠。中国同化了征服者，使他们归化于自己的社会方式和思想作风，从而证明了自己内在的力量。中国领导人潇洒、自信、安详。”

基辛格对毛泽东有一种崇敬、信任之情，对勃列日涅夫则怀有嘲讽和鄙夷的神情：

“勃列日涅夫则代表这样一个民族，它生存下来并不是靠用文化熏陶征服者，而是因为它比征服者更有耐力；他所代表的人民游离于欧亚之间，既不全属于欧洲，也不全属于亚洲，他们的文化传统已经被破坏，但还没有完全被取代。他老是试图用吵吵嚷嚷的言辞来掩饰他的缺乏自信，有时则靠吓唬人来掩饰他的外强中干。”

基辛格掌握了中苏领导人文化背景造成的不同性格和作派，就用不同的方式去交往。

勃列日涅夫对基辛格怀有畏惧心理，又因吸烟、喝酒过多，工作压力过重，心脏已有毛病，因而与基辛格会见时，一分钟也闲不住，双手刚把手表转来转去，转腻了，又玩弄香烟盒（定时开启），他为掩饰文化浅薄和内心空虚自卑，就常用讲一些粗俗故事来表达真意，以达到谈判的目的，现在他给基辛格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俄国沙皇为显示本领高超，他给一个疑难案件批了

御旨：“处决不可能赦免”，但没有加标点。沙皇的原意是：“处决不可能，赦免”，但接到这个御旨的俄国官员却读成：“处决，不可能赦免”。

基辛格耐着性子问：“那个人结果怎么样？”

勃列日涅夫像俄国小市民一样耍弄小聪明说：“我会在美苏这次首脑会谈结束的时候，在你走以前告诉你，我的回答取决于我们会谈的结果如何。”

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在一旁煽风点火，提高威胁程度说：“也许只应该在举行最高级会谈有成果的时候把答案告诉他。”

勃列日涅夫当场亮出价码：“不，基辛格博士离开莫斯科的时候，他的每一个问题都应得到明确的答案，因为你或许要把这个故事讲给尼克松总统听，总统一定会想知道故事的结局。如果你不知道，他就会怀疑你在这里谈了些什么。”

基辛格拉长脸讥讽说：“根据我对官僚主义的体会，他们大概是既处决了这个人，又赦免了他。”

勃列日涅夫看基辛格不对他俯首贴耳，就不肯把这个故事的结果告诉基辛格，又对尼克松在上海宴会上的祝酒词表示不满说：

“尼克松总统在上海说什么，‘美国和中国掌握了世界的未来’，起码这是对苏联的贬低！”

基辛格将脸一板强硬驳斥说：“这句话本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强调的是

平等互惠的精神，你们是用这种精神对待美苏最高级会谈的吗？”

基辛格以上海公报为后盾，讲明美国业已打开对中国的关系，要不了多久，中国、日本、美国、西欧国家就会站在一边与苏联抗衡，就会使苏联面临两方面的挑战，勃列日涅夫既要安抚来自西方的传统威胁，又要腾出手来对付中国，与美国对抗前景不妙！

在基辛格的联华抗苏攻势面前，勃列日涅夫赶快收起咄咄逼人的攻势，在长脸上堆满笑容说：

“我们不希望在美苏最高级会谈中吵架。要吵的话，我们完全可以分别呆在华盛顿和莫斯科吵。”

基辛格见勃列日涅夫实行战略撤退，心中暗喜，只听勃列日涅夫又把进攻矛头指向中国：

“你应该记住，世界上有些强大的势力想要阻止这次美苏最高级会谈。如果美苏首脑会谈开不成，这对中国人一定是个大的礼物。这只会对中国有利，只有中国人反对美苏最高级会谈！”

基辛格发现中国已经成为勃列日涅夫的一大块心病，反对“中国的威胁”已经成为苏联领导人的一种第二大性，“凡是对中国有利的必定对苏联不利”，已经成为勃列日涅夫的一种浅显愚蠢的假定，甚至不分对象、不厌其烦他讲给刚在上海发表过谴责霸权主义言论的基辛格听，真是有点昏了头！

基辛格由此得出结论：勃列日涅夫是个又粗鲁又热情、又蛮横又可亲、又狡猾又善于使人不生芥蒂的典型大活宝，他确信勃列日涅夫会对他做出很大让步，以防止取消美苏最高级会谈，有诗单道勃列日涅夫一味反华而受基辛格愚弄：

勃氏举棋称霸道，反华成病心头绕。

蛮横遇到基辛格，受尽愚弄犹不晓。

基辛格敏锐地抓住时机，决心与苏联摊牌，想估量一下美国在越南进一步采取冒险行动时苏联会有什么反应，就用蛮横的口气对勃列日涅夫说：

“美国有两个要求必须满足：第一，美越巴黎会谈不能在5月6日进行，这首先是因为我那天有事；其次，我已告诉你们的大使多勃雷宁，那个日期太晚了。5月2日是我能参加美越巴黎会谈的最晚的日期，而且秘密会谈在那天举行还有点意义。”

勃列日涅夫心神不宁地追问：“你第二个要求是什么？”

基辛格看勃列日涅夫那副窝囊样，心里早乐开了花，又加重语气发出警告：

“在下次进行美越巴黎会谈的时候，黎德寿必须改变一下他的谈判习惯，我们将不再耐心地听他背诵最后通牒，不能让他把在巴黎把河内的要求简直说成金科玉律，如果他继续这样做，我们就将单方面行事，不管这对哪方面的关系有什么样的危险！”

美国官员惊呼基辛格发射出一颗“货真价实的外交炸弹”，基辛格也发现自己提出的是“有点儿蛮横的建议”，勃列日涅夫的反应却是“异常的和解”，苏联在越南问题、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和5年冻结期等问题上都做出重大让步，顺利地通过了《美苏关系基本原则》。

就在基辛格节节取胜之时，尼克松却听信反对基辛格的人的意见，要基辛格停止会谈打道回国，基辛格以惊人的胆识回电称：

“我是这样估计形势的：勃列日涅夫几乎是不借任何代价要举行美苏最

高级会谈的。他等于对我明说，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会取消美苏最高级会谈。他发誓说他对越方的攻势一无所知，还说他们没有增加援越物资。这些虽然不真实，但却给美国提供了良好机会。”

基辛格坚持留在莫斯科，结果取得了意想不到的结果，他兴致勃勃地向尼克松报告喜讯：

“勃列日涅夫的表现令人感到，他在美苏最高级会谈上是押了大宝的……美国的大选在 11 月份，而他的表现却似乎下一周以及今后每周他都要面临大选。苏联在目前形势下可以选择的各种做法都面临着难题。总之，我只能认为勃列日涅夫本人以及苏联作为一个整体，遇到了他们多年来没有遇到过的最大的政治难题……我利用你的决心这根大棒和有成果的美苏最高级会谈这根萝卜（我去莫斯科所带的和用的就是这些，现在我们必须继续这样做），使我们最有可能左右克里姆林宫内部的政治形势，而且使我们在美国国内的政治斗争中处于最有利的地位。”

尼克松看罢大喜，挥笔批注：“干得出色。”

1972 年 4 月 25 日，基辛格在白宫宣布他秘密出访过莫斯科。顿时引起各国舆论的广泛注意，尼克松愉快地准备出访莫斯科。

5 月 20 日，尼克松偕基辛格踏上访苏的旅程。基辛格兴高采烈地来到尼克松的机舱说：

“总统阁下，这应该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次外交成就！三个星期以前，谁都预言美苏这次首脑会议要取消，可是今天我们却在赴会的路上！”

如何欢迎尼克松，使苏联领导人费尽心思。为显示苏联的大国地位，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不到机场欢迎，而让波德戈尔内、柯西金和葛罗米柯出面。为盖过中国，欢迎场面想比北京热烈一些，但为不引起河内愤怒，群众欢迎场面又被压到了最低规格，因而使尼克松觉得十分冷清。

5 月 22 日下午 4 时，尼克松的座机在莫斯科伏努科沃机场徐徐降落。尼克松兴冲冲走下飞机，向波德戈尔内、柯西金握手致意。为数不多的群众挥舞纸旗欢迎，沿途有 10 万市民迎接，场面并不热烈。

尼克松触景生情，觉得这个欢迎仪式耐人寻味。基辛格悄悄对尼克松大发感慨说：

“这个欢迎仪式是苏联的强暴力量和表面上的效能的绝妙的混合物，使人隐约感到，苏联这部了不起的机器只要出一些小毛病，就会全部停止转动。”

为弥补欢迎仪式上的冷淡态度，勃列日涅夫刻意仿效毛泽东的作法，坚持要单独会见尼克松，连基辛格也被排除在外，这使这位春风得意的博士感到很不是滋味。

勃列日涅夫在他克里姆林宫富丽堂皇的办公室与尼克松会面了，尼克松 13 年前在这个办公室会见过赫鲁晓夫。13 年前，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曾作为美苏高级官员并肩站在美国展览会上，与赫鲁晓夫进行著名的厨房辩论，没想到 13 年后都作为国家领袖再次相见。

尼克松觉得勃列日涅夫看上去同照片一模一样，一双浓眉格外突出，嘴角露出一副呆板却略带几分警惕的微笑。

勃列日涅夫首先强调他为举行这次首脑会谈立下的汗马功劳说：“我必须首先告诉你，鉴于美国最近在越南采取的行动，苏联方面同意与美国进行首脑会晤是不容易的，只是完全由于需要改善美苏关系，由于两大国就某些

重大问题达成协议十分重要，才有这种可能。”

在做了必不可少的表白之后，勃列日涅夫突然热情起来，提议建立类似斯大林和罗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密切关系，尼克松逢场作戏说：“我希望和总书记建立的就是这样一种关系。”

勃列日涅夫真拿棒槌当针（真）了，迫不及待地回答说：“我当然非常高兴，我这方面是完全准备这样做的。”

尼克松暗中冷笑，要这样做，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乖乖听我的话，就诱敌深入说：“我建议还是像战时那样，重大问题由国家首脑拍板，下属官员只要具体贯彻就是了。如果一切决定都让那班官僚去做，我们就永远休想取得进展。”

勃列日涅夫急忙附和说：“他们只会把我们埋在文件堆里！”

勃列日涅夫把大手掌往桌上一拍，开心地大笑，尼克松也开怀畅谈，一时气氛显得颇为活跃。

美苏首脑都强调有国内的麻烦问题，请求对方照顾。

勃列日涅夫说：“我不想让柯西金、波德戈尔内参加所有的会谈，免得他们乱提意见。”

尼克松神秘地一笑：“我的国务卿罗杰斯现在还不知道有这个《美苏关系基本原则》呢，请总书记帮帮忙，就说这是本次会谈搞

出来的，照顾一下美国官场的程式。”

对此，勃列日涅夫心领神会，欣然答应。

美苏首脑越说越近乎，大大超过了礼节性会见的时间，别人还以为他们在讨论重大问题呢。

欢迎宴会会在葛拉诺维特大厅举行。这是克里姆林宫的一个多棱宫，为十五世纪的古老建筑，上面是穹窿形天花板，镶木地板擦得捏亮，四周有拱顶的墙上挂着五光十色的宗教壁画。

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坐在第一桌，直接面对墙上那面比真人大几倍的《耶稣和使徒最后晚餐》的壁画。

勃列日涅夫手指壁画告诉尼克松：“那是耶稣当年的政治局。”

尼克松不无深意地搭话说：“那一定是意味着总书记和教皇有许多共同点。”

勃列日涅夫放声大笑，伸过手与尼克松握了一下。宴会致词开始，波德戈尔内在美国对越南狂轰滥炸的时候，却希望“同美国建立不仅是良好的而且是友好的关系”，而尼克松则预言“美苏两个强大的国家关系中的一个新时代将会开始”。

为显示美苏首脑会谈的丰富成果，双方把早就要签的协议压下不签，在此期间一天签一个，天天大肆宣传。

5月24日，美苏首脑出席美苏联合探索太空的签字仪式后，勃列日涅夫突然心血来潮，在走廊尽头拉住尼克松的臂膀说：“我们何不现在就到乡下去，在白天看看那里的景色呢？”

不容尼克松分说，勃列日涅夫竟把尼克松“绑架”到他的专车上，飞快地开向乡间别墅，又乘小水翼艇在莫斯科河上游览，害得美国保安人员大惊失色，到处去找美国总统，致使美苏保安人员在别墅门口发生冲突，多亏基辛格赶到调解，才没闹出更大乱子。

回到别墅会议室，尼克松发现友好的气氛顿时烟消云散，骤然间阴云密

布，气势逼人，苏联“三驾马车”就越南问题向尼克松发起猛烈的轮番进攻。

勃列日涅夫活像美国的下层工会领袖，涨着脸拍着桌子，大骂美国总统尼克松像希特勒一样，伙同中国推行邪恶的外交政策，上海公报就是最典型的证据。

柯西金一本正经地回顾他和林登·约翰逊的谈话，约翰逊预言美国会取得越南战争的胜利，但最后以惨败告终，你尼克松一意孤行，也将落得同样可悲的下场；诬蔑中国 1965 年就准备出兵越南，却遭到北越的断然拒绝。

波德戈尔内更像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参议员攻击中国好战，苏联“对中国有不安全感”，这个巨大而复杂的邻国常常气得苏联人“丧失理智”。

尼克松被激怒了，声称美国不怕任何威胁。

基辛格在一旁冷眼观战，发现这“三驾马车”都讲究穿着，衬衫袖口都用链扣，均以特有方式追求时髦，勃列日涅夫有一套非常贵重的金制烟嘴和打火机……

基辛格突然看出了名堂。他在回忆录中写当时的情况称：

“忽然间我恍然大悟，别看这些苏联头头口出狂言，十分粗野，其实是在演戏给人看。他们的口气充满敌意，态度极为蛮横，然而所有的讲话都没有包含要采取实际行动的意思。苏联领导人明显地避免采取行动。他们提出的建议只不过是重复北越在巴黎会谈中的口号而已。……苏联领导人只是说一通空话，并没有逼迫美国做什么事，他们发言只是为了记录在案，所说的话够编成一份记录应付一下河内就算了。”

果然，勃列日涅夫三人像大学教授就一件世界大事辩论一通之后，又突然转入友好的谈话，来到餐厅赴宴，谈笑风生，大开玩笑。

勃列日涅夫向尼克松拐弯抹角问起毛泽东的情况，基辛格看尼克松确实不了解毛泽东的近况，就以最近刚见过面的目击者身

份相告：“毛泽东虽然身体不好，从智力上看还是敏锐的。”

基辛格的话勾起勃列日涅夫的诸多回忆。他点上一支香烟慢慢吸了一口说：“毛泽东是个哲学家，不讲实际，是个上帝般的人物。要了解中国是极其困难的，我们欧洲人同他们完全不一样。”

勃列日涅夫摆出悲天悯人之态说：“确实骇人听闻，文化革命中他们居然在天安门广场上砍了人头。当然，苏共领导人开始不再处决反对派，只是使他们在政治上销声匿迹，例如像对赫鲁晓夫那样，算起来也只有短短二十多年的历史。”

勃列日涅夫最后对尼克松强调说：“有些人就是不希望这次最高级会谈获得成功，我们决不能让他们阴谋得逞！”

尼克松暗暗发笑、勃列日涅夫强调的“某些人”就是他很敬重的中国人，对此他不敢苟同，他又发现中苏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态度很不相同：

“有一个侧面也是很有意思的：中国人总是想到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小国；苏联领导人则不然，除了北越和有一次简单地提起北朝鲜以外，他们几乎从来没有谈到哪一个小国。我还颇感兴趣地发现，苏联领导人根本没有提古巴问题，他们对北朝鲜问题的态度是很温和的。”

为拉拢美国人，勃列日涅夫摆上丰盛的晚餐招待，让柯西金用苏联产的白兰地酒拼命地灌美国客人。

勃列日涅夫浪漫而自豪地故作殷勤之态说：“我请诸位贵宾参观俄罗斯的光荣之镜——贝加尔湖，它以面积的巨大、湖水的清澈、景致的优美闻名

于世。”

尼克松不以为然说：“它不是污染的湖泊吗？”

勃列日涅夫勃然站起反驳说：“美国的五大湖污染才严重呢，贝加尔湖富有自然的神韵——这一定是基辛格提供了假情报，责任全在他，应该把他流放！”

尼克松开玩笑说：“那就把基辛格流放到西伯利亚去吧！”

“对，把基辛格流放到西伯利亚，就能让他亲眼看看贝加尔湖是多么美妙！”勃列日涅夫的话引起一阵快活的喧闹，他话锋一转又说，“在流放西伯利亚之前，先让他去跟葛罗米柯进行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吧，葛罗米柯一班人已在外交部恭候多时了！”

基辛格一听暗暗叫苦，时间已到夜半子时，又被勃列日涅夫灌了大半瓶白兰地，喝得晕晕乎乎，神志有些迷惑不清，暗骂苏联人太阴险狡诈、诡计多端：

“这就意味着我将面临一场从凌晨一点开始的严肃会谈。柯西金说，如果我（基辛格）失败的话，把我流放到贝加尔湖去反而便宜了我。我认为他是在挑逗我，想看看一个喝醉酒的外交家是否神智还清醒。我暗自决定当晚拖延会谈，除非苏方出乎预料地接受美方的条件。”

在从别墅返回克里姆林宫的路上，基辛格向尼克松汇报了美苏三年来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曲折历程，建议把740枚新式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作为基数，苏联如果想超过它，就必须拆除老式导弹来交换；如果苏联想达到950枚，就必须拆除全部老式洲际导弹。

回到克里姆林宫，正好收到美国五角大楼反对这个意见的电报。尼克松被急得火烧火燎，光着身子躺在按摩台上，让医生给他治疗腰痛，减轻疲劳，最后终于做出堪称大胆的决定，支持基辛格顶着五角大楼和美国右派集团的压力，以极其强硬的态度与苏方谈判。

在取得尼克松的坚定支持之后，基辛格5月25日凌晨1时15分拖着微醉而疲乏的身躯，来到苏联外交部，他觉得这个摩天大厦可谓典型的俗不可耐建筑，形状酷似结婚蛋糕。

基辛格正在以讥讽的嘲笑神态品评苏联外交部大楼，葛罗米柯带着一个长相奇特的人迎了出来，苏联外长介绍这是副外长斯米尔诺夫，苏联著名的核武器专家。

基辛格定睛打量这位新谈判对手，只见此人脑袋像颗子弹头，身体魁梧，样子很精明，但几句话便露出书呆子的弱点，证明此人不擅长外交樽俎折冲。

基辛格一下有了进攻方案，就故意和斯米尔诺夫开玩笑，这大出这个书呆子预料，被美国博士弄得十分狼狈，显然认为同他心目中严肃的外交谈判气氛和风格格格不入，不由无名火起，恼怒到了发狂的程度，这使基辛格略有快意，微醉的神经似乎舒服了许多。

葛罗米柯也被弄得莫名其妙，不明白他这位副外长缘何这么怒不可遏，照顾到外交礼仪，借口有事把他拉到大厅之外，设法使他平静下来，然后回到谈判桌旁，基辛格又故技重演，几句话又把斯米尔诺夫逗引得大动肝火，不得不再次体会。

再次复会讨论限制战略武器问题时，基辛格马上发现此人不愧是这方面的专家里手，对核武器了如指掌，但对外交谈判一窍不通；葛罗米柯虽有娴熟的外交技巧，但对所讨论的问题却一知半解；而基辛格二者兼而有之，因

此在这次外交谈判中自然占尽上风。

葛罗米柯一看事情不妙，就以攻为守，撤回勃列日涅夫与尼克松谈判时提出的全部建议。神志疲乏的基辛格一下来了精气神儿，连讽刺带挖苦说：

“没想到你们总书记的话也这么不算数，你们的立场竟然全变了，真令人感到惊讶和气愤，让我们怎么同你们谈判？”

基辛格手里有两张硬牌，第一张牌是勃列日涅夫同柯西金的方案差别太大；第二张牌是勃列日涅夫在别墅会谈中规定两天后签署限制战略武器协定，苏联官员都把这看作是一道非执行不可的命令，现在只有36个小时了！

这样，基辛格不慌不忙打出这两张硬牌，故意放慢谈判的步于，就造成了苏联欠了美国人一笔帐的有利态势。

对此，葛罗米柯硬着头皮死顶，形成了僵持局面，尼克松甚至扬言：“我们到莫斯科就是胜利，我们准备在没有达成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的情况下离开莫斯科！”

这一下给苏联造成泰山压顶般的压力，葛罗米柯不敢擅自做主，提议6个小时后再次会面商谈。

基辛格在暮春凌晨的寂静中，步行穿过空旷的克里姆林宫广场，望着洒在克里姆林宫金色的拱形屋顶、赭色的宫墙和红砖砌成的雉堞上的晨曦的微光，突然一种少有的感觉涌上心头，为制服了俄国人而欢欣鼓舞。

苏联内部经长时间激烈争吵，最后终于做出让步，与美国签订了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美苏双方都认为这是美苏关系的“重要里程碑”。

基辛格和尼克松好生纳闷，不明白苏联方面为什么如此迫不及待地要签署这个条约，还是苏联官员私下一语道破天机：“有了这个条约，就能有力地限制中国发展核武器！”

基辛格、尼克松这才恍然大悟，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如此在美苏首脑会谈上下功夫，甚至为了迎接美国总统的到来，对莫斯科进行了紧急修饰打扮：马路重新铺设柏油并大大拓宽，推倒一些有碍观瞻的陈旧房屋，建筑物油漆一新，在谈判中又大做让步，以异乎寻常的热情改善美苏关系，一方面是想得到美国的先进技术和大量美元，以加快苏联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出于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的制华考虑，因为尼克松刚刚访问中国，苏联担心中美接近对其不利。

在8天的访问中，美苏领导人讨论了越南战争、中东、裁军和经济贸易问题，签署了限制战略武器等6个协议，5月29日发表联合公报，声称尼克松访苏确立了两国关系的原则。

尼克松认为他此次访苏所得甚多，宣称“对抗的时代将成为过去，我们将进入一个谈判的时代”。

勃列日涅夫觉得苏联在限制战略武器问题上吃了亏，就想找个地方捞回来。恰巧尼克松在美苏首脑会谈中，几次提出美国向苏联出售粮食问题。

勃列日涅夫听了暗喜，虽装做不感兴趣，却暗中加快行动步伐。

原来美国粮食过剩急需向外推销，尼克松把粮食卖给苏联宣传为美国社会制度比苏联优越的例证，是美国政治外交上的一大成功。

尼克松哪里想到，苏联1972年遭到灾难性粮食歉收，非常需要进口美国粮食。柯西金见美国对此全然不知，就摆出悲天悯人的样子对尼克松、罗杰斯说：“作为对美国的特殊照顾，苏联可以购买美国价值1.5亿美元的粮食，但要在美苏最高级会谈公报中提到此事。”

基辛格不知是计，悄悄告诉尼克松：“这个数字太小，不值得在最高级会谈公报中提及。”

对尼克松的拒绝态度，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私下商量一番，不再提及此事，而把苏联农业部副部长悄悄派到华盛顿，与美国农业部长厄尔·巴茨等私下接触。

巴茨也不了解苏联农业歉收的情况，一味只想把美国过剩的粮食卖出去，一见苏联农业部副部长要大量购买粮食，真是求之不得，对苏联打算在一年内就购买 5 亿美元的粮食感到惊喜，简直将其视为“上帝”，还拿出大量美元对其进行出口补贴，更使苏联人喜出望外，生怕美国掌握了苏联发生大灾荒的情报引起世界粮食市场大幅度涨价，因而更注意封锁农业歉收消息，有意宣传苏联农业丰收、粮食充足。美国人对此大无知了，迫不及待地同苏联签订了一项为期三年包括贷款 7.5 亿美元的购买粮食协定。

苏联农业部副部长还利用美国几大粮食公司之间的竞争关系，压他们互相竞争压价，争相与苏联官员做粮食买卖，尽量多卖粮食，让他们不但在美国农业公司之间相互保密，甚至对美国政府也保密。

就这样，苏联官员在短时间内购买了美国将近 10 亿美元粮食，差不多等于美国全部余粮储存，不但使苏联得以安然度过饥荒，又得到美国政府的补贴，少花了不少美元，真是高兴万分，弹冠相庆。

美国人尚被蒙在鼓里，把卖出 10 亿美元的粮食当作政治上的一大成就热烈欢呼，基辛格在圣克利门蒂举行记者招待会，白宫官员和国务院官员竞相争功，基辛格想为尼克松捞取政治资本，农业部长厄尔·巴茨拒不让步，双方相互攻击，才暴露了事实真相，使美国向苏联出售粮食事件成了政治丑闻，纷纷攻击美国情报机构无能，美国政坛顿时乱作一团，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在一旁幸灾乐祸，火上加油，使美苏关系更加复杂有趣，犹如愈演愈烈的活报剧。这正是：

苏联歉收愁云来，未料美国粮难卖。

巧施计谋买贱米，情报不灵顿成灾。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不识时务 苏联人自讨无趣
善于决断 邓小平风光访美

话说 1972 年 5 月尼克松访苏之后，美苏在越南战争、中东纠纷、限制核武器等问题上的矛盾日益尖锐，中美建立联络处又使苏联疑心丛生。为调和双方矛盾，尼克松邀请勃列日涅夫访问华盛顿。

1973 年 5 月 4 日，基辛格为给勃列日涅夫访美做准备而再赴莫斯科，得以对离开谈判桌的勃列日涅夫深入观察，得窥庐山真貌，略见这位苏共领导人内心世界的奥秘，感到具有非凡的兴味。

基辛格这次没被安排住在莫斯科西郊列宁山暮气沉沉的宾馆，而被领到莫斯科东北约 90 英里的扎维多沃。

这是苏联专供政治局委员们狩猎的场地，外国人只有铁托和芬兰总统乌尔霍·吉科宁才有此殊荣。勃列日涅夫对基辛格一反常态地殷勤备至，为了榨取一点好处而无所不用其极，常常使基辛格难以忍受，使他从骨子里小瞧了苏联人。

勃列日涅夫像个暴发户一样向美国客人炫耀他的高级别墅，得意洋洋地歪头轻问：“博士，你猜我这套别墅值多少钱？”

基辛格从内心里厌恶这一套，漫不经心地胡猜：“值 40 万美元吧？”

勃列日涅夫脸色沉了下来，大嘴一撇，显出一副不屑的神态。

基辛格的同事赫尔穆特·索南费尔特善于揣摩政界人物心理，早明其意，赶紧纠正说：“不，怎么也值 200 万美元！”

勃列日涅夫这下乐了，又以孩子似的自得神态向基辛格显示他获得的各种奖章和贺电，领着美国客人参观别墅，又把基辛格拉上他酷爱的黑色凯迪拉克轿车，介绍说这是尼克松前一年访苏时送给他的礼物，然后熟练地开动汽车，在点缀着湖泊、牧场和一片片森林的绵延起伏的公路上疾驰，一会儿又转入蜿蜒的乡村小道，速度快得令人提心吊胆。看着苏共总书记那实在不敢恭维的车技，基辛格提心吊胆，可又不便阻止勃列日涅夫开快车，只好暗暗乞求上帝，希望在前边一个路口遇到警察，阻止这个鲁莽车手的冒险行动，但他一次又一次地失望了，才想到这是在苏联，没有任何人敢于出面阻拦苏共总书记开车兜风，只好把自己的性命交给勃列日涅夫。

谢天谢地，勃列日涅夫终于在码头前停了下来，又把基辛格领到一艘有水下翼浆的快艇上。基辛格看这回不是勃列日涅夫驾驶，才把心放宽，没想到快艇速度仍快得令人惊魂不定，激烈的颠簸把基辛格弄得头晕目眩，根本没有兴致欣赏莫斯科河上的秀丽风光。

接着，勃列日涅夫又把基辛格拉向狩猎场，让美国客人穿上一套橄榄绿的漂亮猎装，登上高统靴，坐上吉普车去打猎。勃列日涅夫津津有味地讲述狩猎的种种趣闻，不一会儿就打到一只大野猪，基辛格开玩笑说：“凭我的枪法，野猪的死因一定是心脏病突发。”

勃列日涅夫突然收起笑容，开始恶狠狠攻击中国，挖空心思无耻编造荒诞不经的故事，大手一抡嚷道：

“博士哪里知道，中国人奸诈、自大、没有人性，他们斗垮高级领导人的手法，显示出他们的同类相残本性，他们事实上也许是野蛮人。现在中国已经建立了核武库。苏联不能无动于衷，一

定要采取行动。”

基辛格完全明白，勃列日涅夫是在希望得到暗示，要美国能默许苏联对中国发动先发制人的袭击，他不由得暗中冷笑，我们才不那么傻呢，而且我了解的中国情况与你讲的完全不同，就不动声色回答说：“中国的壮大正是使和平解决争端更有必要的条件之一。”

勃列日涅夫对基辛格不附和他的反华狂言心怀不满，斜瞪美国客人一眼，轻蔑地不予置理，仍强调他的论点：

“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力量对每一个人都是威胁，美国给中国的任何援助都将导致战争。”

基辛格从心里讨厌这些话题，拧着浓眉设法把话岔开，并提醒、警告苏共中央总书记说：“对不起，我们与北京连外交关系都没有，其他事更谈不到。我愿讲明，历史将证明美国不会坐视中国遭到袭击！”

勃列日涅夫被顶得哑口无言，但他并不善罢干休，又让多勃雷宁把基辛格拉到一边，气势汹汹施加压力说：

“我们总书记狩猎时提及中国的那部分谈话，你不可当作一般的社交话看待，勃列日涅夫的话字字句句都出自内心。”

勃列日涅夫又转换话题说：“我的华盛顿之行能取得成功吗？我心里无底。我能否得到美国有礼貌的接待？有没有可能出现反对我访美的游行示威？我有机会同普通老百姓接触吗？”

基辛格对此给予明确答复，勃列日涅夫激动得搂着基辛格跳了起来，拍着他的肩膀表示感谢。

基辛格发现勃列日涅夫有两副面孔：时而富有人情味，热情到了极点；时而傲慢自负，杀气腾腾，甚至凶相毕露，两重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不由自己也糊涂起来：

“究竟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勃列日涅夫呢？是那个谈及中国时语带威胁的领导人，还是那个屡述对和平热诚的老人呢？也许两者都是真的。他所谈的和平，只是苏联霸权静止的一面呢，还是接受和平共处所必须履行的责任呢？还是那句话，答案几乎可以肯定是两者皆然。哪一方面占上风，这取决于时势和机会。”

基辛格正在疑惑不定，勃列日涅夫又向他提交一份美苏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核武器的协定，吹嘘这协定“明确而清晰”，“不会引起任何惶恐”，基辛格冷淡地回答：“我不在这上面打赌！”

勃列日涅夫并不死心，不厌其烦大讲这个协定对美苏两国所具有的“历史意义”，见基辛格仍置之不理，最后才讲出中国是真正的攻击目标的“真言”，又张口对中国横加攻击称：

“至少在这里，在我们这些人中，不应对世界上仍然存在作为核大国的中国这样一个事实漠然置之，因此协定中应当有这样的条款，向中国说明把核战争当儿戏是错误的。”

这时，尼克松因水门事件处境狼狈，勃列日涅夫对水门事件感到幸灾乐祸，认为水门事件对苏联有利，因而对他访美充满了热情，打算利用尼克松的不利地位捞取实惠。

1973年6月16日；勃列日涅夫抵达华盛顿，他兴高采烈地检阅仪仗队，讨好地向正在鼓掌和挥舞美苏国旗的欢迎人群招手，又突然跑到欢迎人群面前，像政客搞竞选那样与群众握手、鞠躬致意。尼克松提醒他正式欢迎仪式尚在进行中，勃列日涅夫才走回来搂着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肩头说：“瞧，我

们已取得进展了！”

勃列日涅夫善于推行“触角外交”，他抓住尼克松的手臂强调美苏关系比美中关系更为重要，贩卖抛开中国而由美苏共管世界的货色说：

“就影响和力量而言，世界上只有苏联和美国真正管事。无论任何事情，只要我们两国决定了，即使其他国家不同意，也不得不跟着我们走。”

勃列日涅夫担心美国同中国进行针对苏联的秘密安排，还担心中美可能签订了一项共同防御条约，便要求尼克松与苏联建立向其通报与中国打交道的情况的关系，尼克松婉言拒绝说：

“虽然美国将继续与中国交往，但绝不会同中国或日本做出任何违背刚签订的美苏防止核战争协定精神的安排，苏联对中国人的忧虑是没有道理的。”

勃列日涅夫拉长脸质问：“为什么没有道理？”

尼克松耐心解释说：“我的判断不是根据我们与中国领导人的谈话，而是根据军事力量的实际情况做出的，中国人要获得足以对苏联或其他主要核大国冒险采取侵略行动的核能力，至少需要20年。”

勃列日涅夫将脖子一梗：“在这个问题上，我不同意你的意见！”

尼克松不客气地反问：“你认为中国成为一个主要的核大国需要多长时间？”

勃列日涅夫双手摊开，尼克松以为他在做某种投降姿势，苏联客人神气地挺直了手指，自以为打出好牌说：

“10年，10年之后，中国就会拥有苏联现有的武器。当然到那时，苏联又向前发展了，但一定要使中国明白：不能老这样下去。我记得1963年苏共党代会期间，毛泽东说过这样的话：‘中国人死了四亿，还有三亿’，这就是此人的心理。”

尼克松送勃列日涅夫一辆福特汽车公司捐赠的林肯牌大陆型深蓝色小轿车，勃列日涅夫乐得眉开眼笑，伸出两臂给了尼克松一个真正的熊式拥抱。

勃列日涅夫不住高级宾馆，坚持要与尼克松同住戴维营。尼克松刚刚躺下睡觉，没想到勃列日涅夫兴奋得睡不着觉，又突然提出马上进行美苏首脑会谈。在会谈中，勃列日涅夫采取突袭战术，硬要美国把苏联关于中东的主张强加给以色列，遭到美国人的拒绝。

尼克松认为勃列日涅夫在公开场合的举止和脾气简直像个小丑，表现出典型的俄罗斯性格，时而律己甚严，时而骄横放纵，不由得把勃列日涅夫和赫鲁晓夫进行比较：

“他们都是很强硬、难以对付和讲究实际的领导人，在谈话中都爱夹杂一些轶事。赫鲁晓夫很粗俗，而勃列日涅夫则仅仅是土里土气而已；赫鲁晓夫粗鲁而爱吓唬人，勃列日涅夫则胸襟开朗，比较有点礼貌。两人皆富有幽默感，但赫鲁晓夫看来更为经常地用其幽默感来开周围人的玩笑。赫鲁晓夫的心理反应能力似乎要快一些。在讨论问题时，勃列日涅夫说话毫不留情，斩钉截铁并且总是从容不迫，而赫鲁晓夫则比较容易暴躁和冲动。”

其后，勃列日涅夫见尼克松在水门事件中越来越被动，美国政坛甚至出现了要弹劾尼克松的动向，就想乘尼克松地位不稳之机，压尼克松向苏联多做一些让步，因而邀请尼克松1974年6月27日再访莫斯科。

勃列日涅夫又紧紧抱住尼克松热情地提议说：“我们一定要做出一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情来。我们希望每个俄国人和每个美国人都成为朋友，都

像我和你一样彼此交谈。”

尼克松也举双手赞成，但一讨论限制战略武器和中东等问题，双方就发生极其激烈的争吵，因而使两人的第三次首脑会谈没有取得可以炫耀的成果，只是在中国问题上找了一些令人感兴趣的话题。

尼克松发现特别有趣的是勃列日涅夫对反华最上劲，但却装出忽然完全改变了对中国态度的样子，似乎完全不感兴趣了，不久就发现他实在憋不住了，又向尼克松恶毒攻击毛泽东道：

“毛泽东是个神，一个年岁很老的神。他死了以后，会有一个新神出来。”

尼克松同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私下交谈时，发现葛罗米柯的态度与勃列日涅夫完全相反，他对中国怀有恐怖情绪，愚蠢地攻击中国是“对和平的巨大威胁，因为中国人口众多，不惜牺牲一切，包括中国的城市和人民，以达到中国之目的”。

尼克松对此不感兴趣，他有与中国发展关系的战略设想，从莫斯科归来后，正准备派国务卿基辛格访华，却在1974年8月9日因“水门事件”辞去总统职务，福特未经选举程序登上美国总统的宝座。

福特虽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办公的第一天就会见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重申美国将继续遵循上海公报的原则，继续追求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目标，但在暗中却采取拖的方针，又不断做出违反《上海公报》的事情，实际上把美苏关系看得高于一切。为讨好苏联，他将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什调回，并宣布尚未考虑布什的继任人选。

为调整中美关系，美国总统福特准备访华，事前派国务卿基辛格来华做准备，毛泽东再次会见了基辛格。

基辛格仔细观察毛泽东，发现毛泽东身穿做工考究的中山装，脚登褐色短袜和一双白底黑色布便鞋，身材高大魁梧，脸上透着红光，握起手来很有力，不断地打着手势与客人交谈。基辛格发现这与苏联对毛泽东的造谣完全不同，便从对苏战略方面寻找共同语言说：

“我记得中国曾经说过，军事力量并不能决定一切，中美两国有共同的对手。”

邓小平同基辛格进行了几次深入的会谈，在一次会谈中，邓小平尖锐地批评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态度后退，对苏联霸权主义态度软弱，希望美国从战略角度处理中美苏关系。

福特听了基辛格的访华报告，又认真地研究中国的意见，然后偕国务卿基辛格于1975年12月访华。毛泽东在接见福特和基辛格时，批评福特在中美关系上“放空炮”，只停留在口头议论上而不采取实际行动，邓小平在与福特会谈中更明确指出：

“按照‘日本方式’，就是要接受断交、废约、撤军三个原则，美台间的民间贸易关系可以继续保持，至于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应该由中国自己来决定。”

福特认为毛泽东、邓小平抓住了中美关系中的关键问题，打算在美国大选获胜后解决中美建交问题。谁知天有不测风云，没想到在大选中败于卡特之手，中美建交事宜便与他无缘了。

卡特上任之初，对美国与中国、苏联的关系举棋不定，在以国务卿万斯为代表的“缓和派”与以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为代表的“强硬派”之间来回摇摆。

布热津斯基是个极端的反苏派，强烈主张从美苏对立的角度看待国际关系，要求与中国建立安全关系，在战略上共同对付苏联。

万斯是美国推行与苏联搞缓和政策的代表人物，主张在适当的机会与中国建交，但不建立安全关系，认为那样会给美苏关系、美日关系、美国与亚太其他盟国的关系带来相当的风险，后果不堪设想。

卡特入主白宫时，面临的主要任务是遏制苏联在全世界的扩张势头，同时又要缓和美苏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如何继续进行第二阶段的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就成了美苏关系中最迫切的问题。

于是，卡特下定决心暂时把中美关系置于次要地位，首先发展美苏关系，便于1977年1月20日，即就职后的第6天给勃列日涅夫去信一封。此信由万斯起草，布热津斯基看了大为不满，就给卡特和万斯写了一份备忘录，认为“国务院起草的信简直太热情、太天真了”，“有点过于急切、过于热情奔放”，“希望更集中在实质问题上，而少在美苏关系的气氛上做文章”。

卡特接受布热津斯基的意见进行了修改，这使万斯对布热津斯基更加恼火，但因卡特已做出裁决，万斯也无可奈何。

这样，卡特在给勃列日涅夫的信中强调，“我的目标是在互惠、互相尊重和互利的基础上改善美国和苏联的关系”，特别写明同意勃列日涅夫在土拉的演说中关于不追求军备优势的谈话，宣称这也是美国的立场。

2月1日，卡特兴致勃勃会见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提出研究美苏大幅度地削减核武器、减少先发制人的攻击的可能性，提议美苏削减常规武器，减少国际武器出售等等。

多勃雷宁第一次会见卡特，美方提出的又是这么尖锐的问题，因而一开始极其紧张，脑额冒出了汗珠，然而很快镇定下来，以巧妙的外交艺术与卡特周旋，讨取卡特的欢心。

多勃雷宁又不断携带妻子、女儿到布热津斯基和万斯家做客、下棋，利用私人关系推动美苏关系的发展。

布热津斯基觉得多勃雷宁是条变色龙，时而是位能言善辩的演说家，时而变成拍着朋友肩头谈心的亲切老者，时而又以变得极为凶恶的北极熊的面目出现。

2月4日，多勃雷宁笑容满面来到白宫，送交勃列日涅夫给卡特的复信，傲慢地宣称，“苏联发现美国总统的来信是建设性的、令人鼓舞的，实现裁军是目前苏美关系的中心领域”。

当时卡特对勃列日涅夫充满了幻想，1977年2月7日给勃列日涅夫写信，对苏联人大加吹捧：

“我了解并钦佩苏联的历史，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阅读了你们的古典名著，培养了我的文学鉴赏能力。我也知道你们的人民在离现在多么近的那次战争中，遭受了多么巨大的苦难。我了解你个人在上次大战中所起的作用，也了解战争迫使许多苏联家庭做出了牺牲，这就是我为什么相信，当我们声明我们忠于和平时，我们双方都是真诚的，这使我对未来有了希望。”

卡特哪里知道，勃列日涅夫是个吃硬不吃软的人，他看卡特如此吹捧他，便把尾巴翘到了天上，就于2月25日回信，傲慢地宣称：

“苏联不愿意在任何国际政策问题上，包括苏美关系问题上，使我们的忍耐力受到考验！”

勃列日涅夫给美国总统兜头泼了一盆凉水，卡特失望地与万斯、布热津

斯基协商对策。

国务卿万斯风度翩翩点头称赞：“好，勃列日涅夫在要害问题上很坦率，中肯扼要。”

布热津斯基拍案而起：“我的理解完全不同，我的印象是蛮横、冷嘲热讽、轻蔑，甚至傲慢！”

卡特显然倾向于布热津斯基的意见，针对勃列日涅夫使他相当不愉快的举动做出决断：

“现在我想考虑对中国采取更多的主动行动！”

于是，卡特 1977 年 5 月在圣母大学发表演说时，有意向中国发出信号：

“我们把中美关系看作美国全球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把中国看作全球和平的一支关键性力量。我们希望在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上，与具有创造力的中国人民密切合作，希望找到一种办法，使我们能够跨越某些至今仍把两国隔开的障碍。”

对中美关系极为敏感的中国，很快以独特的方式，对卡特总统的信号做出反应，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邀请布热津斯基进餐，布热津斯基征得卡特的同意欣然赴邀。

双方商量的结果促成了美国国务卿万斯 1977 年 8 月对华做“探索性访问”。邓小平批评万斯立场矛盾，表明卡特在中美关系上还没有下定决心，邓小平手举香烟极有气魄地直言相告：

“如果要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干脆就是三条：废约、撤军、断交。为了照顾现实，中国还可以允许保持美台间非官方的民间往来；至于台湾同中国统一问题，还是让中国人自己来解决，我们中国人是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的，奉劝美国朋友不必为此替我们担忧。”

万斯访华使双方都产生了一种隐约的失望感，但国际形势不久发生了重大变化。苏联霸权主义咄咄逼人，中美都感到需要认真对待，因而黄镇在 1977 年 11 月离任返国的告别宴会上，遵照邓小平指示突然做出惊人之举，对布热津斯基说：

“我以中国政府的名义，请总统顾问先生在方便的时候访问中国。”

这时，美国迫切需要借助中国的力量牵制苏联，美国各大财团不甘心眼看巨大的中国市场被西欧和日本抢占，就不断施加压力要求卡特政府发展中美关系。在此情况下，布热津斯基私下已和卡特在这方面形成共识，因而痛痛快快地回答：“我会高兴地加以考虑。”

美国国务卿万斯一心推行同苏联的缓和外交，风风火火打电话反对布热津斯基访华。布热津斯基联合副总统蒙代尔和国防部长布朗，共同向卡特游说，终于促成布热津斯基 1978 年 5 月访华。

布热津斯基为取得中国和邓小平的信任，格外认真地传达卡特的决心说：

“我奉命向你们确认，美国接受中国的三条，即撤军、废约、断交，我愿意郑重表明卡特总统的决断，在中美建交问题上，美国已经下定决心了。”

布热津斯基建议中美下个月就开始关系正常化的保密谈判，邓小平马上接受了美方的建议，又欲擒故纵说：

“我想这个问题就这样定了，我们期待着卡特总统下定决心的那一天。好吧，咱们谈别的题目吧！”

布热津斯基见邓小平对美国仍不太信任，急得脸膛通红，蹭地站起来声

明：“我已经对您讲过，卡特总统已经下定决心了！”

邓小平摇摇头不紧不慢故施“激将”之计说：“我想你们可能是害怕苏联，对不对？”

布热津斯基有点窝火地回答：“我可以向您保证，我这个人是不怕得罪苏联的，您要是不信，我可以跟您打赌，看谁在苏联更不受欢迎，是您还是我？”

邓小平喃喃自语：“这很难说……”

布热津斯基以志同道合者的口气吐露衷肠说：“你们老是批评我们对苏联搞绥靖主义，我的确认为这很不应该。即使你们的主观动机是好的，然而客观效果却加强了苏联的立场。”

邓小平不以为然，振振有词反驳道：“坦白地对你说，你们每一次同苏联达成协议，都是美国方面让步，以博取苏联的欢心。”

布热津斯基觉得受了莫大委屈，迫不及待地向邓小平解释说：“美国同苏联打交道，还不致于那样幼稚。三十多年来，美国一直在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比中国反对苏联的时间长一倍左右，所以美国在这方面还是有一些经验的。”

两人越谈越兴奋，布热津斯基希望能在华盛顿他的家里设宴答谢邓小平，主人微笑着接受邀请。

为表明对苏联的强硬立场，布热津斯基在邓小平和华国锋举行的宴会上宣称：“只有那些企图支配别人的人，才会害怕美中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布热津斯基获悉邓小平对中日友好条约谈判在反霸权条款上毫无进展深感懊恼，便自报奋勇助中国一臂之力。他了解到关键障碍是日本人害怕得罪苏联，就在返国途中到达东京，向日本首相福田纠夫通报他此次访华情况，有意做福田首相和园田外相的工作说：

“反霸条款没有点哪一国的名，在理论上说可适用于中国、美国或任何国家，更重要的是美国不反对列入反霸条款，并且赞成早日签订中日友好条约。”布热津斯基毫不掩饰的鼓励和卡特总统的明确支持，促使日本首相福田纠夫下了决心，中日友好条约终于得以签订。

布热津斯基访华归来受到卡特总统的欢迎，布热津斯基感到这是“真正温暖甚至是热烈的欢迎”，布热津斯基走进卡特的白宫小书房时，卡特从椅子上跳起来，上前抓住布热津斯基的胳膊，与他的老部下热烈握手，亲切拥抱，叫来摄影师为布热津斯基成功访华摄影留念。布热津斯基在电视上发表针对苏联的强硬讲话说：

“苏联的行动使我很不安：它一直在大力扩大其常规军事力量，特别是在欧洲地区；它陈兵中国边界；它在全世界大搞反美宣传；它包围并渗透中东；它挑起非洲的种族纠纷，并阻挠对这些纠纷的合理解决；它正在设法更直接地进入印度洋。苏联的所作所为很难说是符合所谓的缓和规则的。我但愿通过耐心的谈判以及表示我们的坚决态度能使苏联领导人认识到，达到妥协较为有利，企图利用世界纠纷则是短视的。”

苏联对布热津斯基访华大加攻击，把他和基辛格相提并论，说美国官员中只有他们挑唆中国反对苏联。

美国总统卡特指示美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与中国外长黄华加速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谈判进程，终于达成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协议。1978年12月16日下午3时，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把苏联驻美国大

使多勃雷宁请到他的白宫办公室，并在事先吩咐白宫官员乔丹邀请了几个新闻记者，准备拍摄美苏中三角关系史上最珍贵的镜头。

布热津斯基后来在回忆录中承认，他为了报复莫斯科对他的无端攻击，有意要出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的洋相。为使这一事件更有戏剧性，他故布疑阵说：

“我们的用意是免得新闻界猜测，以为当晚有什么涉及美苏关系的事情要由美国总统宣布。多勃雷宁到达白宫的时候，外界已经知道白宫已预定了当天晚上的电视时间。”

布热津斯基堪称世界一流的滑稽政治戏演员，他见白发苍苍的多勃雷宁兴冲冲来了，忙满面笑容迎出外，拉着他的手一同走进屋来，请多勃雷宁在沙发上坐下，又献上咖啡，然后对美国财政部长迈克尔·布卢门撒尔和商业部长朱尼塔·克雷普斯在莫斯科受到的款待，向多勃雷宁表示感谢，苏联大使也举手致意，一时双方气氛极为融洽。

布热津斯基看他精心安排的出场戏铺垫得差不多了，就出其不意地告诉苏联客人：“老朋友，我荣幸地奉命通知阁下，我们今晚要宣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完全的外交关系。”

多勃雷宁一下楞住了，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使苏联驻美大使的大长脸立刻变得刷白，耷拉着脑袋摸着下巴说出一句话来，半天才恢复了大国外交家的矜持风度，强压着对这位美国著名反苏人物的愤怒之情，却又不肯得罪美国当今的“基辛格”，无可奈何地向面前的白宫实力派人物屈服：“非常感谢阁下的事前通报。”

多勃雷宁说着起身要走，急着要赶回去向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报告中美即将建交的晴天霹雳式“恶信”，布热津斯基看多勃雷宁那副狼狈相，心中暗乐，却装出热情友好的样子，耐心地解释说：

“大使阁下，我愿意告诉您，这件事并不是针对任何人的，如今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也像苏中关系那样正常化了。”

“是的，是那样。”多勃雷宁明白这句话表面上没错，但是骨子里却是挖苦苏联和他的，却也有苦说不出，干生气没有办法，踉踉跄跄冲出布热津斯基办公室，跑去向莫斯科汇报。

在勃列日涅夫之流声嘶力竭的反对声中，中美于1978年12月16日宣布1979年1月1日建立外交关系。

这消息刹时间震动全球。12月17日，布热津斯基正愉快地领着孩子在托马克河畔散步，忽然口袋里的无线电召唤器响了，他马上到公园里的电话亭打电话，原来是卡特总统从戴维营打来长途电话说：“喂，老布啊，你知道吗？中国刚才已经反悔了！”

布热津斯基大吃一惊，情不自禁地对着话筒大叫：“什么？这不可能！”

卡特哈哈大笑，在电话里愉快他说：“没那回事儿，没那回事儿，我和你开玩笑。”

布热津斯基这才放下心来，舒了一口气向卡特报告，世界舆论对中美建交反应良好，对卡特的成功决断表示祝贺，卡特也称赞布热津斯基对中美建交所起的推动作用。

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奉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之命打上门来，找布热津斯基吵架：“你到北京干坏事回来啦？”

布热津斯基冷冷地回答：“是的，我做了一次小小的旅行。”

两人争吵不出什么结果，第二天早晨，葛罗米柯又到卡特面前兴问罪之师，卡特带着讽刺口吻巧妙地回答说：

“现在还是清晨，也许是时间太早的缘故，所以葛罗米柯外交部长阁下列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问题上的发言，这么缺乏合作精神，以后会见苏联人要安排在比较晚的时候。”

中美建交使美苏关系一度陷入僵持状态，12月21日美苏外长日内瓦会谈的气氛十分紧张，葛罗米柯带着怒气和怨气大肆发泄不满：

“请国务卿万斯先生转告贵国总统，苏联不反对美中建立全面的外交关系，但在这个时候，贵国和中国宣布关系正常化，还共同进行所谓‘反霸’活动，这在苏联看来，就犹如大规模的政治游戏。”

万斯作为美国职业外交家，曾参加过关于美越巴黎和谈，善于处理棘手事件，赢得过“美国头号麻烦问题处理专家”的美誉。他见葛罗米柯因中美建交而情绪激动，额头上的青筋突突直颤，不由暗中讥笑这位世界著名外交家的表现失常，就不紧不慢地采取以静制动计谋反驳说：

“卡特总统多次对贵国领导人说过，他的重要目标之一是改善美苏关系。在这里，我向阁下重申卡特总统的个人保证，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矛头并不对着贵国和别人。美国并不打算改变政策，不会向中国或苏联出售武器，在向苏联或中国转让非军事技术时，美国将平等对待。我想，关于中国的讨论，就此结束吧。”

葛罗米柯气鼓鼓想不出还口之词，又抓不住美国和户国的把柄，自讨无趣悻悻而去，想了半天，终于想出反击之策，于是葛罗米柯千方百计鼓动苏联领导人对美、中两国施加沉重压力，阻止邓小平访美。这正是：

中美建交举世庆，五湖四海齐赞颂。

苏联拙劣搞破坏，自讨无趣遗笑柄。

1979年1月29日，在中美和世界各地华人普天同庆新春佳节的喜庆日子里，邓小平冲破苏联领导人设置的重重障碍，乘飞机到达大雪飞扬的美国首都华盛顿。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最高领导人对美国进行的首次正式访问，自然具有非同凡响的国际影响，引起世界舆论的密切关注。

那天下午，华盛顿安德鲁斯机场瑞雪纷飞，漫天皆白，气温低达华氏38度，但寒冷抵挡不住美国人那“有朋自远方来”的喜悦心情，旅美华人更将此视为令中国人扬眉吐气的历史性事件，在新春大节中喜气洋洋冒着严寒迎接邓小平。

在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时刻，邓小平身穿深灰色制服和大衣，神采奕奕地出现在波音—707客机机舱门口，美国副总统蒙代尔率美国高级官员、驻美各国使节、旅美华侨向邓小平热情鼓掌欢迎，蒙代尔与邓小平紧紧握手，然后破例地以接待国家元首的规格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机场上铺着一公里长的红地毯，鸣礼炮21响，呈现出热情友好又祥和的气氛。

邓小平在白宫对面的布莱尔大厦稍事休息，就到布热津斯基家去赴别有风味的烤牛肉晚宴。西方记者认为，这是中国对布热津斯基采取反对苏联霸权主义、推进中美建交的重大奖赏。

邓小平与卡特进行了三次友好会谈，卡特特意创造中美友好气氛说：“副总理先生，你在旧历新年访美，可喜可贺。在这新年之际，你们向慈善的神灵打开了所有门窗，这是忘记家庭争吵的时刻，这是人们走亲访友的时刻，

也是团聚与和解的时刻。”

卡特友好地告诉邓小平，勃列日涅夫 12 月 27 日来信，要求卡特对美国的西方盟国施加影响，不向中国出售任何防御性武器，卡特微笑着告诉中国客人：

“我已给勃列日涅夫回信，表明美国的政策是既不向中国也不向苏联出售武器，但是美国也不会试图影响别的主权国家在向中国人出售武器问题上的政策。”

邓小平满意地笑着鼓励说：“对，我知道这是你们的立场，这很好！”

在短短的 8 天时间中，邓小平精力充沛地与卡特总统等进行卓有成效的会谈，争分夺秒地会见数以百计的美国议员、州长、市长及企业界、文化界知名人士，访问了华盛顿、亚特兰大、休斯敦和西雅图，与卡特发表了联合新闻公报，签订了中美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在美国掀起了一股“邓小平热”，美国三大全国性电视网的黄金时间全部变成了“邓小平时间”，这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这正是：

泱泱长者访华府，大洋彼岸迎贵宾。

叱咤风云增国威，五洲四海颂纷坛。

美国盛情接待邓小平访美引起苏联的极大不满，美苏关系陷入停顿状态。为安抚勃列日涅夫，卡特同意与他举行美苏维也纳首脑会谈。

这时候，勃列日涅夫已到日薄西山的黄昏时刻，害怕卡特对他再搞突然袭击，指示多勃雷宁提出在这次首脑会谈中只谈“限制战略武器问题”的请求，乞求卡特手下留情：

“问题是卡特对美苏首脑会谈的所有问题的了解，都远远超过勃列日涅夫。如果卡特全面进逼，就会使勃列日涅夫感到被动，而且很窘，因而请求把美苏首脑会谈的议题集中在一两个主要问题上吧，不要让老头儿为难。”

勃列日涅夫和卡特在战略核武器问题上进行激烈争斗，又对中国进行猛烈攻击，但不久勃列日涅夫就显得疲惫不堪，难以应付了，讲话只能照稿子念，却又往往不知道从哪里读起，还得让葛罗米柯告诉他该读哪一段，读到哪里为止，因而不得不使此次美苏维也纳首脑会谈无结果而结束。

其后，勃列日涅夫一天不如一天，最后于 1982 年 11 月 10 日去世。其后任安德罗波夫、契尔年柯也相继而亡，苏联迎来了戈尔巴乔夫时期。这正是：

时势变化信无穷，克宫主人走马灯。

三个领袖相继亡，苏联日暮途已穷。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皆大欢喜 布什访华发展中美友好
备得莫所 戈氏来京改善中苏关系

话说 1985 年 3 月，一个要葬送苏联的不祥之星在克里姆林宫冉冉升起，戈尔巴乔夫就任苏共中央总书记。

此人一人主克里姆林宫，就在经济、政治和外交领域推行“新思维”，其外交“新思维”影响更大。他首先着手改善苏美关系。

戈尔巴乔夫认为美国总统里根的战略防御计划对他的改革计划带来巨大威胁，就向里根开展和平攻势，先于 1985 年 8 月 6 日宣布，为纪念原子弹轰炸广岛 40 周年，苏联单方面停止地下核试验 5 个月。对此，里根置之不理。

戈尔巴乔夫 8 月 28 日又对美国《时代》周刊记者发表谈话，向里根频送秋波再发呼吁，强调美苏“只能一道生存下去”，应为推进和平共处而进行美苏首脑会谈。这虽对美国造成不小的冲击波，但老谋深算的里根待价而沽、待时而动，仍不予理睬。

戈尔巴乔夫毫不气馁，同年 10 月、11 月更明确地向里根发出呼吁：“世界事态的发展已经达到一个界限，在这个时候需要做出特别负责的决定，无所作为或行动迟缓就是犯罪！”

老里根见戈尔巴乔夫这样三番五次向他提议进行首脑会谈，使他在美苏关系上已占了上风；从客观上看，美苏关系处于僵持状态已有 6 年，他人主白宫 5 年来尚未会见苏联领导人，就同意举行美苏日内瓦最高级会晤。

当记者问里根为什么等了那么久才举行美苏首脑会谈时，他施展好莱坞演员的演技幽默他说：“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柯，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去世，我有什么办法！”

1985 年 11 月 19 日上午，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在日内瓦的“水之花”别墅开始首轮会谈。两人首次见面，都很注意打量对方：

里根见戈尔巴乔夫身穿时髦的轻便大衣，头上戴着贵重的帽子，脸上挂满笑容，体态魁梧，风度潇洒，精力充沛。

戈尔巴乔夫看里根虽已 75 岁高龄，却不戴帽子，只穿一件套装，看上去更有好莱坞二流名星的风度，微笑中显示出在国力上占尽优势和以抖擞的精神压倒对手的气概。

美苏首脑首轮会谈原定进行 15 分钟，却因双方都要夺取有利地位而巧玩花样，实际上搞了一个小时，最后让摄影记者进来拍照时，里根为仿效美国战时总统罗斯福搞得极为成功的“炉边新政”，特意拉戈尔巴乔夫离开长方形桌子两边的座位，并排站到壁炉旁，做出笑容可掬的样子让记者照像。

里根指示美国记者广为刊发这张照片，挖空心思将美苏这次日内瓦首脑会晤称为“炉边最高会议”，宣传它以这样一幅图画为象征：世界上最强有力的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坐在一间小屋内的熊熊的炉火边，瞪大眼睛盯着对方，生动地反映出美苏紧张对峙的现况……

第二天的正式会谈一开始，里根就依仗优势地位发动进攻，指责苏联国内人权状况很糟糕，必须彻底改变。戈尔巴乔夫恼火地反唇相讥说：“总统无权谈论苏联的人权问题，因为美国人民的生活状况要比苏联人民糟糕得多，美国妇女备受蹂躏，美国政府对待黑人的态度就像对待奴隶一样。”

两人在人权问题顶了牛，又在裁军问题上激烈争吵，里根要戈尔巴乔夫承认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使美国取得核优势，戈尔巴乔夫厉声反驳说：

“这没有说服力。这是感情用事，是梦想！谁能控制它？谁能监视它？它发动了一场太空军备竞赛。我们已经讲明不会用核武器对付你们，你们为什么不能相信我们呢？”

里根认为苏联是世界一切动乱的根源，对苏联必须“以实力求和平”，就以讽刺口吻调侃道：“假如你不相信我，我就无法对美国人民说我相信你的话。”

美苏原想发表一个关于核裁军的首脑联合声明，以显示这次最高级会晤的巨大成果，谁知里根和戈尔巴乔夫越吵越凶，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和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急忙出来劝架，要两位首脑到隔壁休息，由双方外交当局继续寻找打开僵局之路。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只好顺坡下台阶，到隔壁房间边喝咖啡、吃糕点，边天南海北聊天。里根颇有城府，在闲聊中想出了以实力地位为后盾降服戈尔巴乔夫的计策，就若无其事说：“总书记先生，我有一个笑话，不知您愿不愿听？”

戈尔巴乔夫不知是计：“我很感兴趣。”

里根心里骂声笨蛋，就像老爷爷给后辈人讲故事一般，神乎其神地大讲特讲：

“一位俄国老大娘来到克里姆林宫，要求见戈尔巴乔夫。门卫把她带进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她就对戈尔巴乔夫说：‘你知道吗？总书记先生，在美国，任何人都可以闯进白宫，走到里根的办公室，对里根说，总统先生，我不喜欢你治理国家的方式’。‘戈尔巴乔夫回答说：‘我的好大娘，哪有什么！你在苏联也可以这样做呀！你可以随时走进克里姆林宫，来到我的办公室，对我说，总书记先生，我不喜欢里根治理国家的方式’。‘那个老太太说，你怎么说的跟里根一模一样，干脆让里根一块领导苏联和美国好了，岂不更省事？’”

里根得意洋洋地转身问苏联领导人：“总书记先生，俄国老大娘见解高明，你意下如何？”

戈尔巴乔夫听得出里根的弦外之意，充满了抬高自己、玩弄对方从而使美国出尽风头的阴谋诡计，但因里根是以讲故事、开玩笑方式讲的，戈尔巴乔夫有苦难言，只得以哈哈大笑掩饰自己的不利处境；里根占了便宜，得意地放声大笑。

这时，舒尔茨和谢瓦尔德纳泽争吵半天毫无结果，只得前来向他们的老板汇报。舒尔茨一向以对苏联态度温和著称，与苏联关系较好，这时却气急败坏地抢先向戈尔巴乔夫告状说：“报告总书记，谢瓦尔德纳泽大固执，这样下去非谈崩不可！真不好办！”

这是因为舒尔茨对戈尔巴乔夫的性格特点做了深入研究，知道此人刚愎自用，好大喜功，爱在人前显示他的果断和权威，就有意在他面前播弄是非，没想到戈尔巴乔夫果然爱耍威风，他一听舒尔茨这样说就急了，唯恐把多年陪着万分小心搞成的美苏日内瓦首脑会谈弄砸了，就顺手抓过一份尚有争议的美苏首脑会谈声明草稿，粗看一眼，也没看出个究竟，就端着苏联最高首脑的架子，当着里根和舒尔茨的面大耍威风，高声吩咐他的外交部长：“怎么搞的？一定要搞成！”

谢瓦尔德纳泽心里极为反感，暗想：“你不知道美国人提的条件多么苛刻，实在是不能接受——你给我耍哪国的威风，摆什么臭架子！”

舒尔茨看谢瓦尔德纳泽露出既恼怒又无可奈何的神情，掩饰不住内心的

喜悦，神秘而得意地连笑几声，拉着苏联外交部长谈判去了。

两位外交官刚走，西方记者跟了进来，问里根谈判情况，里根根据双方事前协议，极有分寸地应付说：

“是的，我比较满意，不过我们有协议，美苏首脑会晤期间不透露任何情况，因而我不想做任何评论。”

西方记者两手一摊，很感失望，又满怀希望地询问苏方对首脑会晤是否满意。戈尔巴乔夫见里根刚才的呆板、拘谨发言令记者不满，为讨取记者欢心并借机出风头，就大讲特讲说：

“我们不但举行了会谈，而且很认真地讨论了苏联人民和美国人民共同关心的所有问题。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我们的态度是严肃的、负责的，我们很坦率地讨论了所有问题。你们可以相信，会谈是坦率的。”

西方记者对戈尔巴乔夫非常满意，就又给里根出了一道难题原来，里根出发前，美国白宫办公厅主任里甘与《华盛顿邮报》记者谈话时，鬼使神差议论起妇女问题来，竟说大多数妇女根本不关心美苏日内瓦最高级会谈，只对两位第一夫人的活动感兴趣，里甘越说越离谱儿：

“她们懂得什么叫导弹的投掷力吗？知道阿富汗的战况吗？知道为什么要谈人权吗？也有少数人知道点儿皮毛，多数妇女恐怕只关心那些婆婆妈妈的事！”

里甘一下惹下大祸，美国妇女对里甘群起而攻之，甚至把帐算到了总统里根头上：“里根总统居然把一个秃头和尚带到日内瓦进行首脑会谈，实在大失水准！”

现在西方记者重提此事，首先问里根有何高见。里根知道这是他来日内瓦之前出的一个大乱子，“后院着火”已使他极为恼火，此时认为西方记者故意与他为难，就将面孔一板大光其火：“对不起，无可奉告！”

西方记者在里根那里碰了一鼻子灰，暗骂老家伙太不识相，悻悻走到戈尔巴乔夫面前，寄予无限希望，问苏联首脑如何评价里甘关于妇女问题的言论。

这可把苏联外交部长吓了一跳，他还没有跟总书记汇报过里甘烧起的美国后院之火轶闻，害怕他不了解情况而出洋相，但见戈尔巴乔夫滔滔不绝大发宏论：

“我的看法是，在我们两国，乃至全世界，无论男人还是妇女，大家都渴望和平，渴望持久的和平。为此，他们都希望裁减武器，而且希望尽快裁减，这正是我和里根总统在这里会谈的中心议题。”

里根没想到戈尔巴乔夫在事前不清楚里甘到底说了些什么话的情况下，居然即兴讲出这么一番极为得体的话，觉得此人的确年富力强，知识丰富，看来对付他还要多下功夫。

两天的美苏日内瓦首脑会谈即将结束，双方仍无法达成协议，望望黄昏时刻霓虹灯下纷纷扬扬的漫天大雪，舒尔茨无心欣赏日内瓦桑苏尔公馆的奇妙雪景，一心寻找圆满结束日内瓦首脑会晤的方法，却苦元良策，不禁摇头叹息。

突然，舒尔茨看到戈尔巴乔夫那潇洒的风度，想到他爱出风头的毛病，便又想重使令戈尔巴乔夫耍弄权威的故技，就又拉着苏联副外长科尔涅柯，来到戈尔巴乔夫面前，指着这位苏联副外长的鼻子告状道：

“总书记先生，就是此人从中作梗，阻碍我们达成协议。”

苏联人都被舒尔茨这一手吓得惊慌失措，科尔涅恩柯更被弄得目瞪口呆，活像小孩子失手打碎了父母亲最心爱的瓷器一般，不知要受到严厉父母的什么惩罚而不寒而栗，站在那里呆若木鸡。

戈尔巴乔夫也被舒尔茨这一手怔住了，喃喃自语：“那好吧，我来跟他们谈一谈！”

戈尔巴乔夫扭脸对苏联官员们大发雷霆：“你们怎么搞的，这么不会办外交，真是一群大笨蛋！”

显然由于戈尔巴乔夫的严格命令，苏联的调子显著降低，才使拖在烂泥深坑中的美苏日内瓦高级会谈的破车终于启动，双方又都竭力做出亲密的姿态，争着在闭幕会上以空洞的美妙言辞掩饰不可挽回的失败：

里根寻词择句说，美苏关系终于打破僵局，有了一个新开端。

戈尔巴乔夫绞尽脑汁说，苏联将尽一切努力同美国合作，寻找发展美苏关系的新形式，争取解决压缩军备竞赛等问题。

尽管里根所得无几，尽管戈尔巴乔夫两手空空，但美苏都大张旗鼓宣传，美苏日内瓦首脑会谈使中断已久的战略核武器谈判得以重开，宣传这次会晤不是因其取得的成就，而是因美苏首脑的和解气氛而受人注目。这正是：

剃头挑子两不同，一头热来一头冷。

戈氏总想出风头，里根依势硬抗衡。

戈尔巴乔夫看里根不买他的帐，只得再做低姿态，1986年1月15日向里根又送秋波，提出15年内分三个阶段实现销毁核武器的建议，宣布苏联将单方面把暂停核试验的期限延长三个月；又在2月下旬的苏共二十七大会上，呼吁里根“彻底认清当前的严酷现实，核武器孕育着一场能使人类从地球表面消失的龙卷风”；同年10月再次向里根伸出橄榄枝，拍着胸脯保证要采取具体步骤从阿富汗撤退苏联军队，削减在蒙古的苏军，甚至故作姿态声称同意把珍宝岛划归中国所有。

里根见戈尔巴乔夫苦苦相求，便同意1986年10月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举行美苏首脑会谈，但要戈尔巴乔夫拿出表示诚意的实际东西来。

面对里根的沉重压力，戈尔巴乔夫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把“一揽子大刀阔斧的方案”交给里根，表示苏联愿在战略武器和中程导弹领域做出让步，以换取美国限制太空武器的承诺，在10年内把战略防御计划限制在实验室研究的范围内。

戈尔巴乔夫觉得为讨好里根吃了很大的亏，里根总该体谅我一番苦心给个面子吧，眼巴巴望着里根的老脸，祈求上帝能网开一面，但里根却面如冷霜，一口拒绝，坚持美国既有权在试验室内、又有权在其外实施星球大战计划。

戈尔巴乔夫几乎哭出声来，暗怨里根不体谅他的一番苦心，不给他一点儿面子，只得宣告中断会谈。

里根见双方要不欢而散，看戈尔巴乔夫那副可怜巴巴的样子，就拍着戈尔巴乔夫的肩头说：“总书记，我们没有白来雷克雅未克，你我毕竟建立了友好的个人关系。”

戈尔巴乔夫回到莫斯科，打肿脸充胖子，吹嘘他在冰岛做了巨大努力，指责“里根空着手往美国篮子里装果子”，声称“里根的如意算盘是使苏联最终承受不了军备竞赛的沉重经济负担，不得不向西方屈服，但这只是幻想”！

美国总统里根见戈尔巴乔夫竟敢公开与他对抗，就从实力地位出发，决定给戈尔巴乔夫点儿颜色看，马上宣布驱逐 55 名苏联外交官。

戈尔巴乔夫遭到当头一棒恼羞成怒，攻击里根曲解美苏首脑雷克雅未克会晤的含义，又采取大规模驱逐苏联外交官的行动，简直是疯狂之极！

戈尔巴乔夫决定以牙还牙，撤走受雇于美国驻苏联大使馆的 100 名服务人员，使美国驻苏联大使馆一度陷入瘫痪状态。里根对此并不慌张，从美国运来大批生活用品，使美国大使馆机器照样运转。

这使戈尔巴乔夫有点儿下不来台了，大有被美国人戏弄之感，攻击里根恶意利用苏联的军备控制政策做“猫捉老鼠的游戏”。

戈尔巴乔夫有口无心，无意中道出了他在美苏角逐游戏中被戏弄、成了老鼠的那种极为懊丧的心情。

戈尔巴乔夫此语一出，立刻引起西方舆论界的一片嘲笑之声，使堂堂苏联最高首领狼狈不堪，恨不得地上有缝钻将进去。

戈尔巴乔夫咽不下这口恶气，绞尽脑汁苦思报复之策，便于 1987 年 2 月一下邀请 80 多个国家的 1000 名知名人士，到莫斯科

召开“建立无核武器世界、确保人类生存”的讨论会。他充分发挥善于演说的特长，发表了特别吸引人的演讲，打动了不少人的心弦，戈尔巴乔夫滔滔不绝说：

“核战争之后，什么问题都不复存在了，就不会有人坐下来谈判，不用说坐到谈判桌前，就是坐到树桩旁或石头旁都是不可能的了，第二艘诺亚方舟也不会从核洪水中获生！”

这一下使戈尔巴乔夫的外交新思维迅速传遍全球，改变了他在全世界的形象，提高了在国内外的声望，掀起了世界性的“戈尔巴乔夫热”，致使西欧的民意测验显示他比里根更要受欢迎和尊重。里根从情报系统中了解到，苏联国防部长索科洛夫、国防部副部长兼防空司令科尔图诺夫等高级实权将领对戈尔巴乔夫的裁减军备政策极为不满，公开指责他：“你的新思维用于国际宣传是好的，但千万不要来污染我们的军队！”戈尔巴乔夫对他们惧怕万分，里根便命人给苏联将领煽风点火，搞得戈尔巴乔夫狼狈不堪，暗中寻找收拾索科洛夫的机会。不久就有了这样的机会。

1987 年 5 月 28 日，西德青年鲁斯特驾驶一架飞机突然降落到莫斯科红场，出了苏联人的大洋相。

戈尔巴乔夫初则大为惊慌，继则转忧为喜，哈哈大笑：“真是天赐良机，这可给了我收拾他们的借口！”

他急忙召开苏共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当即宣布解除索科洛夫、科尔图诺夫正副国防部长和几十名高级将领的职务，任命他的亲信亚佐夫担任国防部长。戈尔巴乔夫的觉这才睡得安稳了一些。

里根懊恼不已，苦笑着说：“应该授予鲁斯特一枚列宁勋章，是他帮助戈尔巴乔夫掌握了对苏联军队的控制权。”

戈尔巴乔夫又发动和平攻势，使里根处于被动状态。里根为争取主动地位，使其多事的总统任期发出光彩，他邀请戈尔巴乔夫访美；戈尔巴乔夫为向美国人兜售他的外交新思维，以美苏关系的较大进展改善统治地位，也欣然答应赴美，因而便有两人第三次会谈的戏剧性场面。

1987 年 12 月 7 日下午，戈尔巴乔夫乘坐蓝白色的伊柳辛—62 飞机降落在安德鲁斯机场，一下飞机就向欢迎他的国务卿舒尔茨道出他这次美国之行

的迫切愿望：“让我们充满希望，上帝会保佑我们！”

里根决定先给戈尔巴乔夫一点儿甜头。戈尔巴乔夫虽不是国家元首，但里根却给他以全部国家元首的礼遇招待：传令官吹号，21响礼炮，穿着殖民时代制服和现代军装的正式军事仪仗队，一应俱全。

为表示亲热，里根亲热地称戈尔巴乔夫的名字“米哈伊尔”或昵称“米克”，千方百计使客人高兴，殊不知戈尔巴乔夫却急于讨好美国新闻界，当美国记者问客人是否带来出人意料的军备控制的建议时，戈尔巴乔夫一理灰色细条子西服，格外热情地回答说：

“我并不认为政策是‘出人意料’地做出的，特别是涉及到美苏这样的大国的重大政策的制定，必须经过深思熟虑，在此基础上做出双方共同承担义务的决定。”

里根冷笑一声，联系12月7日华盛顿20万人示威抗议苏联歧视犹太人一事，在人权问题上发动进攻说：

“你们不允许苏联人民自由地移居外国，你认为作为移民国家的美国会如何看待这一事实呢？”

戈尔巴乔夫厉声驳斥说：“我不是来受审判的，你也不是法官，你无权提及苏联的国内问题。一个国家的首都，无家可归的人流落街头，人权何在？你们最近为什么在与墨西哥的边境建造围墙，架起机枪制止墨西哥人入境，却要苏联无限制地允许移民出境，造成苏联人材严重外流呢？”

里根一时语塞，抓着秃脑瓜尴尬地反驳说：“这个围墙是用来对付那些想入境的非法移民的，因为美国民主而且繁荣——这根本不能同柏林墙同日而语。柏林墙把人民关在一种社会制度圈内，而他们根本不想留在里面。”

戈尔巴乔夫振振有辞地批驳里根的谬论说：“美国人拥有的权利比苏联人多不了多少，并不比苏联好得多。请问，怎么解释你们国家那些露宿街头和失业的人？他们的权利何在？”

里根强辞夺理道：“不错，但是你要知道，我们有叫作失业救济金的东西，就是说一个人失业后在特定期限内有生活费。”

戈尔巴乔夫穷追不舍：“那么期限到了，他们如果仍没找到工作呢？”

里根早预备好了应答之词：“那时我们还有社会福利。如果他们仍找不到工作，就将接受社会福利救济。”

两人争吵得面红耳赤，仍无结果。里根看戈尔巴乔夫气鼓鼓的，就送客人一颗纯金袖扣，同自己的完全一样，袖扣上绘有预言家把剑折断铸犁的形象。

在当天下午的会谈中，两位首脑一扫沉闷僵持作风，而表现出热情奔放的风格，两人频频举杯，兴高采烈，还不时像经过充分排练的演员那样说诙谐话，开开玩笑。里根说：“好，我们相互信任，但仍需证实。”

戈尔巴乔夫将手一挥：“每次会晤，你都要说这句话。”

里根会心地笑笑，对苏联客人微微鞠躬，狡猎地为自己解脱：“我喜欢这句话。”

会场上立刻爆发出一阵各有所图的笑声，以掩盖双方产生的尖锐分歧。

接着，两人先后签署中程核武器条约，将美苏首脑会议推向高潮。

戈尔巴乔夫将此视如珍宝，立即发动全面的闪电式宣传攻势，热情地接见美国公众代表，宣传他的外交新思维，大声宣读一个美国少年呼吁建立全人类大家庭的来信，恳请美国听众促动美苏领导人为改善两国关系而努力。

然后参加丰盛的白宫国宴，戈尔巴乔夫津津有味地大吃一通之后，大肆赞扬美国游泳健将林恩·考克斯，热情地拥抱美国钢琴家范·克莱本，又与夫人赖莎和着钢琴唱起苏联抒情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苏联人、美国人都受到感染，情不自禁地同声唱了起来，场面十分动人。

表面的热闹掩盖不了巨大的分歧，西方记者说它是“雷声大、雨点小”，但戈尔巴乔夫却将此视为他一生中的重大里程碑，宣称他牵着里根鼻子走，外交新思维取得重大胜利，说他将带着外交上的成功而凯旋。

里根认为这是他同苏联举行的最成功的一次首脑会谈，“为一切善良的人们点燃了希望之火”，“作为外交业绩将永垂史册”。

对于戈尔巴乔夫“牵着里根鼻子走”的话，里根从鼻孔里冷笑连声，以嘲笑口吻念起了莫斯科广泛流传的这样一则顺口溜：

香肠价格翻了番，伏特加缺心中烦。

闲坐家中无事干，净听戈尔比闲扯淡。

美国官员知道这里的“戈尔比”就是戈尔巴乔夫，一个个乐得捧腹大笑，纷纷祝贺里根在与戈尔巴乔夫的持久角斗中占了上风。

这时，美苏都感到仅凭自己的力量不能战胜对方，就更重视借重中国的力量，着力调整与中国的关系。

里根出于美国自身的对苏战略和经济利益，先后与中国达成“八·一七公报”，放宽对华技术转让，实现里根与赵紫阳、李鹏总理互访，中美经济、贸易和科技合作取得较大发展，又宣布给

中国以最惠国待遇，特别是布什访华使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

乔治·布什 1974 至 1975 年曾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1989 年 2 月 25 日作为美国总统访华。一踏上中华大地，就格外兴奋地对李鹏总理说：“不客气，我们又回来了！当年我当驻华联络处主任时，我也没想到以后能当总统！”

在宾主友好的笑声中，李鹏总理让工作人员推来两辆 20 英寸飞鸽牌自行车，男女车各一辆，后车座上各装有一个富有民族特色的背包，笑容满面说：“总统阁下，这是送给您和夫人的礼物！”

布什夫人芭芭拉仔细端详一番，赞叹说：“啊，这车子真漂亮！”

布什总统满面春风道：“这是很好的礼品，我喜欢它！”

布什也拿出他和夫人的礼品，众人一看鼓掌叫绝，原来这双黑色牛仔鞋与众不同，左靴筒上有一面美国星条旗，右靴筒上印着五星红旗，李鹏总理赞不绝口：“下次我到美国去，或许会穿上这双靴子！”

李鹏总理对布什就任总统不久就来中国访问表示赞赏，表明他对中美关系非常重视，然后坦率地指出问题所在：

“我们特别重视台湾问题，对美方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表示赞赏。也要看到，美方有少数人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上企图影响中国的政策、干涉中国的内政。如果这种作法来自官方人士，将势必给两国之间业已存在的良好关系投下阴影。”

作为国际著名政治家，布什对此已早作准备，信誓旦旦保证说：

“美国重视对华关系，重视这次对中国的访问，希望看到中美关系得到加强。美国坚决执行一个中国的政策，继续恪守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美国公开宣布这一政策，以表示反对岛内分裂主义分子。”

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愉快地会见了老朋友布什，对中美苏大三角关系进

行了精辟分析，认为中国虽是较弱的一角，但能在大三角关系中起“四两拨千斤”的特殊平衡作用，因而中国又是大三角关系中比较厉害的一角。邓小平抽口香烟，从战略角度发表权威性讲话称：

“中国有一个稳定的环境是十分重要的，中国是从自己的根本利益出发来制定国内外政策，做出战略决策的。我们不打什么牌，也不搞权宜之计。十年来，中美关系的发展是平稳的，尽管也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希望在布什总统任期内，中美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布什对邓小平格外敬仰，从当驻华联络处主任时期就已与邓小平建立了信任关系，此时也欢欣鼓舞他说：

“我在世界发生重大变化、面临许多机遇和挑战的时刻访华，是非常有意义的，我完全赞成阁下对两国关系的看法。美中关系的发展有巨大潜力。在美国，对发展美中关系的支持，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大。”

布什强调邓小平赢得了美国人民的心，说他此次访华将使中美关系达到一个新的起点。

戈尔巴乔夫见布什访华取得巨大成功。更迫切要求访华改善中苏关系。

这时，戈尔巴乔夫对邓小平刮目相看了。起初，他对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很不以为然，但事实教育了他，特别是苏联1988年灾难性农业歉收使他头痛不已，而中国自1979年推行联产承包制以来，农业生产稳步上升，粮食自给有余，生活消费品充足，市场繁荣，人民生活多样化，与苏联形成强烈反差，因而他特别想了解邓小平改革成功的奥妙所在，就着手加速调整改善中苏关系的进程。

通过1988年的中苏外长互访，双方就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取得初步谅解，双方又商定举行中苏高级会晤。

1989年2月，戈尔巴乔夫派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来华

访问，递交戈尔巴乔夫致邓小平的正式信件。邓小平愉快地接见谢瓦尔德纳泽，对中苏关系做出新的决断说：

“上次钱其琛外长访问莫斯科，现在你来北京，中苏开始了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但是，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正式开始还是中苏高级会晤，也就是我同戈尔巴乔夫的会晤。”

苏方问及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还需要解决什么障碍，邓小平身向前倾严肃指出：

“中苏关系正常化要消除三大障碍，三年前我就提出，中苏关系正常化首先要解决柬埔寨问题，越南要真正地从柬埔寨全部撤军。在这个问题上，苏联是大有作为的。”

谢瓦尔德纳泽挺直高大身躯，为转移话题而以攻为守：“请问阁下，中国想在世界上扮演什么角色？”

陪同谢瓦尔德纳泽访华的罗高寿曾任驻华大使，他担心这么尖锐的问题会使邓小平为难，却见邓小平爽朗地笑了笑侃侃而谈：

“中国希望在上世界上扮演一个为和平做出贡献的角色。中国致力于创造一个较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以便能够发展起来，摆脱落后。”

苏联外长访华前曾与戈尔巴乔夫深入讨论邓小平关于建设国际新秩序的重要言论，此时小心翼翼做出评价说：

“今天的世界已不同于10年前的世界，老的规则已不适用了。邓主席十分有道理地提出了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问题，这个新秩序的基础正在形

成。现在有充分的理由实现苏中关系的正常化。邓主席同戈尔巴乔夫总书记的会见将是一个重大事件。苏中关系将建立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

为给中苏高级会晤创造良好气氛，苏联宣布从1989年5月开始从蒙古撤走部分苏军和大量武器装备。

在做充分准备后，戈尔巴乔夫5月15日抵达北京。这是苏联最高领导人1959年以来首次访华，标志着中苏关系史上一个新时期的开端。

戈尔巴乔夫受到隆重的欢迎，21响迎宾礼炮伴随着中苏两国国歌回响在百花盛开的北京上空，使人们情不自禁地回想起中苏两大国30年间的风云变幻，愈觉中苏关系正常化来之不易。

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同戈尔巴乔夫进行了历史性会见，邓小平感慨无量说：“我希望同你见面已经有三年了！”

戈尔巴乔夫深受鼓舞，刚见面时的紧张情绪刹那间无影无踪，兴高采烈说：“能够同你见面，感到非常高兴！”

中苏最高领导人面对100多位记者热烈握手，郑重宣布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全场立刻响起一片祝贺掌声。

邓小平满怀深情追忆往事说：“三年前，我请齐奥塞斯库同志给你带去口信，希望中苏之间能够消除三大障碍，早日实现我们之间的见面和对话。”

戈尔巴乔夫怀着对邓小平的崇敬之情回答：“这对我们的思考是一个促进，而且看起来，一切都做得很及时！”

邓小平抽口香烟，道出这次中苏高级会晤的指导思想说：“我们这次会晤，可以概括为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戈尔巴乔夫点头表示赞同，邓小平目光炯炯纵论天下大事说：

“长期以来，我们面临的国际形势是非常严峻的，冷战和对抗局面一直没有得到缓和。坦率他说，世界的中心问题之一是美苏关系问题。长期以来，总的局势是军备竞赛，水涨船高。戈尔巴乔夫同志在海参崴的讲话全世界人民都看到了，有新内容。”

戈尔巴乔夫为邓小平高度评价他的海参崴讲话而情绪高涨，只听邓小平又以非凡的才智评论中美苏三国关系说：

“当时我们看到，美苏军备竞赛可能有一个转折，有一个解决的途径，美苏关系可能由对抗转向对话，这是全人类的希望，这就在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一个问题，中苏关系可不可以得到改善。出于这样的动机，才给你写信。时间过了三年，我们才见了面。”

邓小平的话引起苏联客人的强烈共鸣，戈尔巴乔夫极有风度地边笑边巧妙地凑趣说：“你提出了三个障碍，所以需要三年时间，每一个障碍需要一年的时间。”

邓小平被戈尔巴乔夫乖巧而有趣的谈吐逗乐了，继而堂堂正正宣布中国的原则立场说：

“我们谈历史是为了在更坚实的基础上向前进。中国不会侵略别国，对任何国家都不构成威胁。中国比较穷，但坚持独立自主。”

戈尔巴乔夫认为此时中苏高级会晤已进入高潮，涉及到了最敏感问题，就寻词择句想讲清中苏关系恶化的责任：

“对以前双方关系恶化的历史，苏方认为，自己方面也有过错。至于一些历史问题，情况复杂，尽管邓主席的看法不是没有根据的，但苏方还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邓小平颇有中华民族的泱泱大国领导人风度，不想去纠缠陈年历史老帐，果断地将手一摆，豁达他讲出关键性的话：

“过去的事过去了，重点在于应该向前看，在发展两国关系上，多做实事。”

这是戈尔巴乔夫早就想说的话，被邓小平用如此简捷明快的语言巧妙地表达出来，马上表示赞成。在关键性问题上取得进展后，中苏两党领导人也宣布两党恢复关系，双方还达成了领导人互访、发展经济贸易等方面的共识。

1989年5月18日，举世瞩目的中苏首脑会晤发表联合公报，向全世界宣布中苏关系正常化，使中苏关系有了很大发展。这正是：

沧桑巨变妙无穷，折冲樽俎鬼神惊。

布什访华谱新章，戈氏来京欲建功。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海湾惊梦 伊拉克军攻占科威特 八面威风 多国部队打败萨达姆

话说在 90 年代初的海湾战争中,中美苏三国关系出现了美苏合作而中国又不反对的奇观,可谓战后中美苏三角关系中绝无仅有的现象,其中奥妙无穷,令人惊叹。

海湾在世界上赫赫有名,亦称阿拉伯湾、波斯湾,位于阿拉伯半岛和伊朗之间,往东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阿曼湾相连,出阿曼湾南口,可通过阿拉伯海进入印度洋,地扼欧亚交通咽喉要道,自古以来为兵家所看重。特别是海湾地区有“石油宝库”之称,石油产量约占世界总产量的 1/3,石油出口量约占世界石油总出口量的 60%,美国石油需求的一半、日本的 98%、西欧的 40%以上均依赖于中东地区。

为控制海湾的“黑色血液”,美国不惜一切代价与苏联明争暗斗。布什与戈尔巴乔夫几经较量之后,戈尔巴乔夫明显失去当年的雄风,渐渐臣服在布什脚下,这使布什心满意足,八面威风,暗暗庆幸他使美国在美苏关系中占了上风,在中东问题上发言权增大了。

令布什深感不安的是区区小国伊拉克总统萨达姆近年来咄咄逼人,凭借手中的大量石油美元,发展为海湾第一军事强国,常

常以阿拉伯世界的代言人自居,公然抗命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屡屡顶撞布什,不时口出狂言:

要么矗立于高山之巅,要么陷于深谷之底,但是从不会一马平川。

布什很快发现,萨达姆在海湾地区的势力越来越大,竟代替苏联成了美国称霸海湾地区的最大障碍。这样,美国的大霸权主义同伊拉克的地区霸权主义尖锐对立。布什早就想一巴掌把他根本瞧不起的萨达姆打下马去,只是苦于找不到时机,没有适当的借口。

布什暗中寻找教训萨达姆的借口,这个借口很快来到了。

原来,萨达姆指挥伊拉克军队跟伊朗打了八年两伊战争,累计损失数千亿美元,外债超过 600 亿美元,医治两伊战争的创伤又需耗费巨资,就想从邻国科威特捞点油水作为补偿。

科威特虽是中东最小的国家之一,人口不足 200 万,面积不到两万平方公里,土地贫瘠,严重缺水,炎热难耐,但却有丰富的石油资源,1980 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 22840 美元,远远超过号称金元帝国的美国。

萨达姆看着科威特的大把石油美元眼馋,就狮子大开口,不仅欠科威特等国 300 亿美元的债务要一笔勾销,而且要科威特另外补偿 100 亿美元。

这简直有点欺人太甚,科威特虽有 1000 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不愿白白被敲诈 100 亿美元,萨达姆就向科伊边境调兵遣将,施加军事威胁。

埃及、约旦两国首脑主动出面调解科伊矛盾,萨达姆趁机提高敲诈价码,一下由 100 亿增加到 300 亿美元,还要求科威特割让领土,科威特实难从命,萨达姆勃然大怒,下令对科威特进行突然袭击。

1990 年 8 月 2 日凌晨 2 时许,科威特明月当空,万籁俱寂,高达摄氏 40 度的酷暑高温刚消退,190 万科威特人已酣然入睡。

突然,萨达姆一声令下,十万现代化武器装备的伊拉克军队大举发动进攻。刹那间,炮声隆隆,火光冲天,炮弹呼啸,杀声阵阵,战斗机、直升机轰鸣着腾空而起,装甲车、供水车、燃料补给车纷纷出动,大口径大炮发出

惊天动地的怒吼，掩护荷枪实弹的伊拉克士兵闪电般冲过伊拉克与科威特边界，惊醒了科威特人的美梦，打响了 90 年代第一场大规模恶战。

面对天外飞来的横祸，科威特士兵顽强抵抗，但区区两万弱兵怎抵挡得住十万伊拉克大军的猖狂进攻？法赫德亲王等 8 名王室成员在反击伊拉克侵略中为国捐躯。

萨达姆指挥伊拉克军队一天之内即占领科威特全国，然后迫不及待地宣布“科威特革命者推翻了腐败的专制君主政府”，紧接着成立“科威特共和国”，不到一天又宣布与伊拉克“彻底地和不可扭转”地合并，伊拉克电台欢呼科威特又“回到祖国的怀抱”，萨达姆还命驻科威特的外国大使馆迁往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办公。

突然爆发的海湾战争举世震惊，人们陷入一片忙乱之中，各国纷纷做出强烈反应。

中国政府一向支持被侵略被压迫国家反对扩张侵略、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这时旗帜鲜明地发表声明，反对伊拉克对科威特的侵略和兼并，表明中国反对任何大国的军事干预，认为海湾和阿拉伯事务最好由海湾和阿拉伯国家自己或经联合国处理。

为促进科威特被侵略事件的顺利解决，维护海湾和平，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钱其琛马不停蹄到海湾地区进行穿梭访问。在短短的一周时间里，先后访问了埃及、沙特、约旦、伊拉克四国。钱其琛说他的中东之行不是进行调解，也不带任何方案，而是就海湾危机与中东有关国家领导人交换意见，推动海湾问题的和平解决，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

科威特政府虽被推翻，但在国外拥有大量财产，科威特在国际金融界拥有的资金收入，早已超过国内石油的收入。科威特利用手中的雄厚美元，展开大规模揭露伊拉克侵略的宣传攻势，很快使伊拉克的侵略面目暴露在各国人民面前，世界舆论纷纷谴责伊拉克明目张胆的侵略行径。

科威特强烈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伊拉克侵略科威特问题。

这样，位于美国纽约最繁华地段曼哈顿的联合国城，顿时打破平日夜晚的宁静，格外热闹起来：联合国总部大楼灯光闪烁，照耀如同白昼，工作人员进进出出，显得分外忙碌……

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李道豫 8 月 1 日（当地时间）接到科威特控诉伊拉克侵略的报告，知道这晚是与温软舒适的床铺无缘了，就和安理会 15 个成员国的代表们聚集一起，为尽快解决新出现的海湾危机出谋划策。他们对伊拉克公然攻占一个小国而感到气愤，对科威特人沦为亡国奴的悲惨命运寄予深切的同情，彼此间很快已形成共识。

在深夜举行的安理会紧急会议上，李道豫恳切地呼吁伊拉克、科威特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两国的分歧。在中国和世界舆论的大力推动下，安理会紧急会议通过决议，要求伊拉克立即从科威特撤军。

对伊拉克侵略科威特，苏联的表现颇使人费了一番心思，令人感到意外。

原来，苏联一直与伊拉克保持着密切关系，从 1972 年苏联与伊拉克签订“友好合作条约”以来，伊拉克便成为苏联在中东地区的重要盟友，在长达 8 年的两伊战争中，苏联成为伊拉克的武器主要供应国，赚足了石油美元。

海湾战争爆发后，人们很有兴趣地关注苏联和戈尔巴乔夫对其重要盟友伊拉克赤裸裸的侵略行动抱何态度。出人意料，苏联发表声明说：

“苏联谴责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行动，根本违背了阿拉伯国家的利益，与国际生活正常化的积极趋势背道而驰，苏联要求伊拉克尽快无条件地从科威特撤军，恢复科威特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为此，苏联决定暂停对伊拉克的武器供应。”

对海湾战争爆发，态度最复杂的是美国总统乔治·布什。萨达姆机关算尽，认为美苏江河日下，没有人会为一个区区小国而与伊位克的百万大军为敌，但萨达姆就是没有算准布什，没想到这次竟然栽在他的手上。

布什对萨达姆侵略科威特最窝火，使他在几件事情上几乎出洋相。

却说在萨达姆发动突袭的前一天，虽有几人向他报告伊拉克可能入侵科威特，但布什都不相信。不一会儿，代理国务卿吉米特又向他报告，美国国务院收到了尚未得到证实的消息：伊拉克已经向科威特进军了。

布什虽不相信，但他处事谨慎，指示吉米特与正在苏联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访问的国务卿贝克交换意见。为防止窃听，吉米特讲得比较含糊。

贝克理解为伊拉克即将入侵科威特，因而在与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进行的美苏第二轮外长会谈中说，美国已经得到情报，伊拉克即将入侵科威特。

谢瓦尔德纳泽大摇其头：“不，俄国人太了解萨达姆了，我们不相信萨达姆有进攻科威特的计划。”

贝克也哈哈大笑说：“外交部长阁下，我也不相信这头海湾雄狮会发疯！”

会谈结束后，贝克和谢瓦尔德纳泽一起出席记者招待会，一唱一合宣称萨达姆此时不会冒险动手，但此时伊拉克十万大军已占领科威特的事实，使两位外交部长大出洋相，贝克回来就对布什好一顿埋怨。

再一个丑闻是美国空军参谋长迈克尔·杜根上将视察驻在沙特的美国空军部队时，对美国记者发表谈话说：

“如果美国与伊拉克发生战争，美国军方打算发动一场大规模空战，袭击伊拉克国家元首萨达姆、他的妻子和他的住宅。”

迈克尔·杜根越说越把不住调门，失口泄露了美国袭击伊拉克军事和民用设施目标的计划，透露了美军在海湾的军事部署方案。这使布什和国防部长切尼十分恼火，尽管迈克尔·杜根有30年的军事生涯，荣获过银星、军功、紫心、飞行殊勋、十字军等一系列奖章，而且目前正是在教训萨达姆的海湾战争中用得着这个将军的时候，俗话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但布什和切尼顾不得这些，还是把他革除了军职。

却说布什在8月2日午夜酣睡之际被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史蒂曼中将军的电话叫醒，得知伊拉克确已攻进科威特，不禁怒骂萨达姆一声，立刻起床召集国家安全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对策。

布什是个对石油有特殊感情的人，1948年耶鲁大学毕业后就在一家石油公司当油漆工。他相信石油业的巨大潜力，认为石油能给他和美国带来一切。他依靠石油特别是中东石油连连升迁，在1989年1月的就职总统演说中曾这样讲他与石油的关系：

“你们得到了一位来自石油和天然气工业的总统，他了解这个行业，而且了解得很多。”

布什感到萨达姆进攻科威特把他推上了一个重要关头：若怯于萨达姆就会使他威信扫地，再无竞选总统获胜的可能，也会使美国面临丧失中东石油的危险，因而他决心冒险同萨达姆斗法，他相信能斗垮萨达姆。

于是，布什抖擞精神，就海湾危机发表第一个公开声明称：

“我是来告诉你们，美国坚决谴责伊拉克的入侵，并呼吁伊拉克无条件撤军。在当今的世界上，不能容忍存在这种粗暴的侵略行为。”

接着，布什召开秘密会议研究美国采取军事行动问题。布什决心出兵中东，但能马上派出的只有第82空降师的2500人，调遣大部队必须在四个月之后。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忧心忡忡说：“美国出兵海湾风险极大。如果伊拉克发动攻击，我们的部队极易受损。假如总统最终决定动用部队的话，那就必须采取尽可能的大规模行动，给伊拉克决定性打击。选准靶子，确定目标，然后设法压垮它。没有政治目标，就不能合法地使用军事力量！”

尽管困难重重，但布什决心出兵海湾，一连几天不合眼，终于制订出代号为“沙漠盾牌”的行动计划：其公开使命是防止伊拉克入侵沙特，采取一切手段迫使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其秘密目标是推翻萨达姆。

作战计划虽已制订，但仅凭美国一家兵力断难实行，这就要动员西方盟国能出兵的出兵，有钱的掏腰包拿战费；要取得苏联、中国的同意。哪一样都不容易，真使布什犯了难。

可能是布什太头痛、太疲倦了，因而不断因口误洋相百出，被传为笑谈。

在8月7日的白宫新闻发布会上，记者抓住布什不放，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才使其做出采取行动的决定，布什精神恍惚回答说：“那可能是沙特谎称撤军而实际向南推进。”

记者被美国总统的回答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就笑着打圆场说：“总统先生，你的意思大概是指8月3日伊拉克宣布，它将自8月5日从科威特撤军的事情吧？”

在记者进一步追问之下，布什才知道说走了嘴，忙抖擞一下精神，微笑着带歉意回答说：“非常抱歉，我已有一夜没有合眼了。”

记者同情地表示理解，又询问美国向海湾调动军队问题，布什打声呵欠说：“我们部署这些部队有一个重要目标，那就是保卫苏联。”

记者又纳闷地问：“美国军队要保卫苏联？”

布什摇摇头，以拳头轻轻击额道歉说：“怎么搞的，我心里想的是‘沙特’，而话到嘴边又说成了‘苏联’——我请记者先生们谅解，不要把这些话原样登出去。”

布什见戈尔巴乔夫在海湾战争爆发的第一天，就谴责伊拉克的行动，认为取得苏联的支持极为重要，就指示贝克8月3日中断对蒙古的访问赶往莫斯科，与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会见，不到一小时就发表了“美苏联合声明”，呼吁国际社会谴责伊拉克的侵略行动。此事引起西方外交界的广泛注意，认为这是二次大战后美苏两个势不两立的大国第一次发表协同解决地区冲突的联合声明，标志着美苏战后首次成为“盟国”。

接着，苏联在联合国采取与美国协调一致的立场，对安理会通过的有关海湾危机的决议都投了赞成票。

戈尔巴乔夫担心世界舆论批评苏联采取追随美国的立场，就指示谢瓦尔德纳泽，在具体作法上与美国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但一时又难找出与美国的不同点，这使他们左右为难，最后决定对美国在沙特部署部队持保留态度，大肆宣传苏联“反对用一种侵略去纠正另一种侵略”，还在安理会上表示反对美国单方面决定对伊拉克实行海上封锁。安理会通过第665号决议时，谢

瓦尔德纳泽特意发表声明：苏联虽投了赞成票，但不打算在海湾使用武力。

为扩大苏联的影响，戈尔巴乔夫 8 月 20 日邀请伊拉克副总理萨杜梅·哈马迪访苏，竭力调和美伊矛盾，然后让谢瓦尔德纳泽打越洋电话向贝克报功说：

“请您等 48 小时，然后再请联合国就决议进行表决。伊拉克副总理说他可以说服萨达姆·侯赛因。”

贝克有意拉拢说：“如果萨杜梅·哈马迪失败了，两天后您站在我们一边吗？”

谢瓦尔德纳泽不敢擅自作主，便这样回答说：“我将很快把我们的意见告诉您。”

谢瓦尔德纳泽与戈尔巴乔夫反复研究，决定拖几天再说，就在第二天傍晚打电话告诉贝克：“吉姆，我们需要延迟几天，等到 8 月 27 日可以吗？”

贝克犹豫半天才说：“拖的时间太长了，我要同总统商量一下。”

贝克把苏联的意见报告了布什，美国总统对苏联人的拖拉作风感到不满，希望苏联人加快速度，贝克便打长途电话告诉苏联外交部长：

“很难答应你的要求。我们受到很大的压力，特别是五角大楼负责人不满意，他们要求使用武力，以使禁运得到遵守，而不必等待联合国的同意。”

谢瓦尔德纳泽唉声叹气说：“我知道，我们跟我们的军人之间也有同样的问题，他们认为我们支持美国是犯了错误。他们认为美国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在中东建立起永久的军事存在。”

苏联外交部长谦恭地请教美国国务卿说：“再回到联合国问题上，您有什么建议？”

贝克不客气地提出要求：“我们建议 24 日付诸表决。”

谢瓦尔德纳泽欣然表示同意，贝克兴高采烈说：“那么，我们仍将得到你们的支持，是不是？”

为讨好美国人，戈尔巴乔夫把他写给萨达姆的信转交给布什，然后又把苏联向萨达姆施加压力的结果告诉美方：“伊拉克人的答复完全不能让我们满意，美方可以把你们的决议提到联合国去，我们紧跟你们！”

9 月 9 日，戈尔巴乔夫赶到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与布什进行美苏首脑会谈，两人像投机商那样讨价还价，戈尔巴乔夫以苏联不在军事上支持伊拉克和同意美国继续进行海湾战争的沉重代价，换取了布什对允许苏联与伊拉克保持接触和联系开绿灯的可怜条件，并同意按照布什的调子发表美苏首脑联合声明说：

“如果正在进行的所有外交活动都失败的话，美苏首脑准备根据联合国宪章来考虑采取其他行动。”

西方舆论尖锐指出，戈尔巴乔夫已经变成布什的应声虫，“从 1945 年以来，美国和苏联在一个地区争端中的立场从来没有这样接近过。”

戈尔巴乔夫不以为耻，又按照布什的意图，派苏联特使埃夫格尼·普里马诺夫 10 月间跑到巴格达，抛开外交语言，赤裸裸威胁萨达姆说：

“总统先生，如果你仍坚持你的立场，美国人就要向伊拉克开战，苏联也就不再为阻止战争而努力了！”

萨达姆见苏联特使使用跟美国人一样的腔调对他施加威胁，暗骂戈尔巴乔夫对他“背信弃义”，成了布什的帮凶，冷笑一声回答：“我知道！”

苏联特使凶相毕露：“你肯定将战败！”

萨达姆胡子一翘不动声色回答：“也许吧！”

戈尔巴乔夫对伊拉克的反应既吃惊又恼火，认为萨达姆又臭又硬，认为海湾战争是美苏新关系的“第一次严峻考验”，就处处顺着美国总统布什的性子来，这使布什大为欢喜。

在苏联的支持下，布什展开频繁的外交活动，动员日本、德国、沙特、科威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欧洲共同体分担战费，很快筹集到 200 多亿美元。

布什还软硬兼施，说服英国、德国、法国、加拿大、意大利、比利时、荷兰、西班牙、希腊、瑞典、挪威、丹麦、葡萄牙、澳大利亚、新西兰、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埃及、叙利亚、土耳其、摩洛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孟加拉国、巴基斯坦、阿富汗、尼泊尔、塞内加尔、尼日尔、阿根廷、洪都拉斯等 30 多个国家出兵；日本、波兰、保加利亚、捷克和斯洛伐克派医疗队和防化分队参战。

这样，以美国为主的几十万多国部队云集海湾，摆开了向伊拉克开战的架势，但真要动武，必须获得安理会的授权，苏联和中国都反对动武，这又使布什感到为难。

布什首先做苏联的工作。他派国务卿贝克再次访苏，向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提交一份含有“使用武力”短语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草案，迫不及待地问：“贵国能同意吗？”

谢瓦尔德纳泽在这个至关紧要的问题上不肯轻易吐口，为提高要价，不紧不慢地说：

“经过阿富汗战争之后，苏联人民不会接受它，必须寻找其他的表达方法，最好采取某种间接的说法，使用委婉的措词。苏联人可以支持使用武力的想法，但决议本身必须含糊其词。”

贝克认为这很难办，装模作样换了五种不同的提法，谢瓦尔德纳泽认为都换汤不换药，突然手拍前额说：

“有了，你看这样行不行：我看采取某种既允许使用武力而又包括采取其他一切可能的措施——比如外交、制裁和任何能起作用的办法，含义越广越好。”

贝克摇摇头，在房间里来回踱步，眼睛突然一亮道：“用‘一切必要的手段’如何？”

谢瓦尔德纳泽哈哈大笑说：“好，就这样，这是我们所能找到的含义最广的短语了！”

贝克见苏联人对此表示同意，就借口恐怕布什反对又反悔起来，想争取对美国更有利的结果：“它太含糊，容易发生误解。”

谢瓦尔德纳泽一眼看穿了贝克的阴谋诡计，也不肯再做让步，振振有辞反驳说：

“美国人都能明白‘一切必要手段’是什么意思，不要再为难我们了，不要再逼我们了，不要做得太过分了。对苏联人来说，那不是道义问题，而是一个实际问题。苏联不能让别人看到它投票赞成战争。在苏联，一提起战争，就想到阿富汗战争。”

美国此时确有求于苏联，贝克带有半恳求似的语调说：“美国要避免模棱两可的话，因为海湾政策在美国国内过于反复无常，布什总统不希望国内就联合国决议的含意进行争论，再为此激化矛盾。”

这时，戈尔巴乔夫为捞取政治资本突发奇想，要把 1991 年 1 月 15 日最后期前的 6 个星期作为“善意的暂停期”，他将此视为得意之作，想在此 45 天期间完成说服萨达姆的“伟业”。

戈尔巴乔夫将此作为同意让美国放手动武的先决条件，否则，苏联就不同意安理会的授权决议。布什将计就计，点头应允，就向苏联保证，美国将会认真地执行安理会决议。

布什又千方百计做中国的工作。

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海湾战争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在 1990 年 8 月 25 日通过允许用军事行动对伊拉克实施贸易禁运的第 665 号决议时，中国坚持删去原案中“最低限度使用武力”的内容，为各方所接受，受到各国的普遍赞扬。

11 月 29 日安理会讨论授权声明时，中国代表见这第 678 号决议的核心内容是如果 1991 年 1 月 15 日前伊拉克不撤出科威特，联合国成员国可以对伊拉克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恢复世界和平。中国认为这实际上等于批准对伊拉克使用武力，它事关重大，需要认真对待，因而由外交部长钱其琛专门发表谈话指出：

“中国再次呼吁国际社会为和平解决海湾危机做一切努力，而采取军事行动有悖于中国政府力主和平解决这场危机的一贯立场，中国难以投赞成票。”

世界舆论对中国弃权评价甚高，西方外交官不无嫉妒地说：

“北京想要显示显示它奉行独立的对外政策，仍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朋友。第三世界国家感到不安的是大国势力也许会长期留在海湾地区，而中国则是光明磊落、毫无政治野心的。”这正是：

山雨欲来风满楼，无法发兵布什愁。

曲意争斗施诡计，中国无私最风流。

得到安理会授权决议，美国总统布什放手准备教训萨达姆和伊拉克的战争。

1991 年 1 月 17 日凌晨，伊拉克刚刚飘过几阵小雨，巴格达的晴空显得格外幽深，古老的清真寺、现代化的商业大楼、军政大厦被笼罩在黑雾之中，在宁静中显出几分神秘和不安……

突然，一道长长的寒光撕破了黎明前的夜幕，巴格达市区西部腾起一片冲天红光，紧接着从天而降的炸弹，立刻把巴格达炸得天翻地覆，一片火海……

美国白宫发言人得意洋洋发表声明，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于格林威治时间 17 日零点整，开始袭击伊拉克和被占领的科威特的目标，宣称解放科威特的战斗开始了，其代号为“沙漠风暴行动”。

美国总统布什把“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节目接受机放在椭圆形办公室里的办公桌上，兴高采烈地收看前方传来的战地实况报道，听美国战地记者用急促而激昂的声音喊道：“你们听到了没有？美国的高射炮开火了！”

布什高声呼应：“听到了，听到了！”

布什满面春风发表电视演说称：“我们决心摧毁萨达姆·侯赛因生产核武器的潜力，击毁他的化学武器设施。”

伊位克总统萨达姆严厉谴责美国向伊拉克发动袭击，慷慨激昂地呼吁伊

拉克人民抵抗美国的进攻，宣称“我们决不投降！”

海湾战争正式爆发，一时成为全世界舆论注意的中心。

1月17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发表谈话说：

“1月17日凌晨，美国出动空军袭击伊拉克、科威特的一些地区。国际社会曾努力加以制止、世界人民所不愿看到的战争终于在海湾地区爆发。中国政府对此深表焦虑和不安。

“自海湾危机爆发以来，中国政府明确宣布反对伊拉克以武力侵占科威特，要求伊拉克立即无条件地从科威特撤军，恢复和尊重科威特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政府。同时我们主张力争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和平解决海湾危机，并为此同国际社会一道尽了最大努力。

“在此严峻时刻，中国政府强烈呼吁：交战双方采取最大限度的克制，防止战火蔓延和扩大，以便国际社会采取紧急行动继续寻求和平解决冲突的途径和办法。”

1月19日，中国总理李鹏在北京中南海紫光阁会见日本自民党青年国会议员代表团时，应客人的要求阐述了中国政府关于海湾战争的原则立场。

李鹏在会见中强调，从海湾危机爆发的第一日起，中国政府就明确反对伊拉克以武力侵占科威特，要求伊拉克无条件地从科威特撤军，恢复科威特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政府。同时，“我们主张力争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和平解决海湾危机”。他指出，中国政府的上述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他还说，“我们将一如既往、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寻求海湾危机的和平解决作出不懈的努力。”

萨达姆由于雷厉风行地领导过伊拉克西方石油公司国有化运动，使贫穷的伊拉克繁荣富有起来，因而得到人民热爱。他用大笔美元建立起中东最庞大的军队，修筑有坚固的地下工事，又大张旗鼓地展开政治战、宣传战、神经战、迷惑战、地道战、地雷战、石油战、导弹战、游击战、外交战，虽损失严重，但能长期与多国部队抵抗，所以布什迟迟不敢发动地面作战。

美国和多国部队对伊拉克的狂轰滥炸，使伊拉克成千上万平民惨遭杀害，引起世界各国人民的忧虑和不安，阿拉伯诗人哈卜杜德愤怒地作诗质问：

美国佬，美国佬，
你的狂轰烂炸何时了？
你轰炸军事目标还有情可原，
你轰炸和平居民算什么英豪？

……

我要质问：

萨达姆有错有罪，
伊拉克人民犯了什么律条？

戈尔巴乔夫2月9日发表声明指出海湾地区的事态正在发生越来越可怕的变化，伤亡人数在增加，呼吁动用政治解决的全部杠杆。

萨达姆见伊拉克损失严重，2月15日提出有条件撤军的建议，中国、苏联等20多个国家做出含有积极意义的评价。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伊拉克首次表示愿意从科威特撤军，这是朝着政治解决海湾冲突迈出的积极的一步，中国希望伊拉克关于撤军的表示能有具体措施并付诸行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海湾战争正处于关键时刻，升

级和扩大的危险迫在眉睫。中国政府强烈呼吁有关各方表现出最大限度的克制态度，采取措施使海湾战争降温，表示出和平解决的愿望，以便为国际社会谋求和平解决的努力创造条件。

当时布什头脑发热，中国的话听不进去。

戈尔巴乔夫把伊拉克外长阿齐兹请到莫斯科，搞了个八点协议，但布什决意“吃掉”萨达姆，便于2月24日开始代号为“沙漠军刀”的地面作战，从地面、海上、空中展开立体进攻，经100小时激战，终于打败伊拉克，萨达姆2月28日被迫宣布停火，无条件接受联合国安理会的12项决议，海湾战争才告结束。这正是：

海湾战争电子战，立体大战出奇观。

沙漠雄狮妄自夸，多国部队捷报传。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华屋丘墟 戈尔巴乔夫葬送苏联

邪魔外道 和平演变戏梦成真

话说戈尔巴乔夫并没有利用中苏关系正常化后的有利形势推进内外政策，却刚愎自用，一意孤行，导致一系列措施失当，一步步走上使苏联解体之路。

原来，戈尔巴乔夫1985年入主克里姆林宫之后，提出“民主化”、“公开化”和“新思维”等口号，强调“人类价值高于一切”和多元化，引起各种思潮泛滥，形形色色的言论纷纷出笼，东欧国家开始发生动乱，苏联也发生了波罗的海三国的“离婚”风波。

1987年8月23日是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48周年，压抑了近50年的“强迫婚姻”矛盾，借戈尔巴乔夫推行“民族自治”货色之机，一下子爆发，生起了事端。

波罗的海三国即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原是两个独立国家，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1939年8月23日、9月28日，德苏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和德苏边界和平友好协定，在瓜分战利品的秘密协定中规定将此三国划归苏联。1940年8月，三国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名义加入苏联，这当初就是一桩“强迫婚姻”。

在东欧巨变的背景下，这三国借助戈尔巴乔夫承认民族自治之机，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48年之际，纷纷举行游行集会和示威，谴责苏德条约，反对三国加入苏联的决定。等到1989年苏德条约签订50周年时，又爆发了更大规模的抗议活动，200多万人参加“波罗的海之路行动”，手拉手形成罕见的人链，从南到北长达600多公里，把这三国的主要城市连接起来。三国的教堂钟声齐鸣，一些极端分子狂呼“打倒苏联共产党”、“脱离苏联”的口号。

这场规模空前的抗议示威引起全世界的注目，引发了世界范围的关于苏德条约的争论。美国领导人幸灾乐祸，伙同西方国家以异乎寻常的热情到处插手，怂恿波罗的海三国脱离苏联而独立。

戈尔巴乔夫勃然大怒，8月28日以苏共中央的名义发表措词强硬的声明，不许三国独立；9月13日又召见波罗的海三个共和国党的领导人约法三章：第一，所有问题必须在联邦范围内共同解决；第二，坚持党的统一领导；

第三，各民族公民权平等。

无奈立陶宛人独立的决心已定，该党中央 12 月中旬召开第 20 次代表大会，通过了脱离苏共、宣布独立的决定。

戈尔巴乔夫大吃一惊，立即召开苏共中央非例行会议，宣布立陶宛共产党脱离苏共的行动是非法的，又把立陶宛共产党的 19 名政治局委员召到莫斯科，劝说他们改变立场，却又表示不会用武力解决。

戈尔巴乔夫相信自己有一副“铁嘴钢牙”，能说服任何人，1990 年 1 月 11 日赶到立陶宛首府，企图用三寸不烂之舌扭转乾坤，但他一到维尔纽斯，立陶宛人就给他来了个下马威，出动两万人在天主教堂外将他团团包围。

戈尔巴乔夫态度出奇的温和，和颜悦色地问道：

“即使你们明天就宣布独立，难道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吗？”

立陶宛人哪里肯听戈尔巴乔夫那一套，狂呼俄罗斯人必须“把偷去的东西还给我们”，并且于 1990 年 3 月 11 日宣布立陶宛脱离苏联，成为独立的国家。

这时，戈尔巴乔夫的威信显著下降，乌克兰、格鲁吉亚又跟在波罗的海三国之后起劲地闹独立，真使戈尔巴乔夫伤透了脑筋。

为取得稳固的统治地位，戈尔巴乔夫更想当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总统了，就召开苏联第三次非常人民代表会议进行讨论，没想到激进派人物尤里·阿法纳西耶夫提出总统不能兼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问题，刺激了多数代表的精神兴奋点，会议气氛更趋紧张；又有人提出总统不得兼任其他付报酬的职务。戈尔巴乔夫想当总统心切，急不择言跳出来就工资问题发表了一通议论：

“这件事要说清楚，我现在兼任着两个职务，但我只领一份工资，即政治局委员那一份，每月 1200 卢布。最高苏维埃主席那一份我从未领过，将来也不打算领。”

这番“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话立刻引爆出一阵喧哗，代表们觉得受了嘲弄大为不满，戈尔巴乔夫威信扫地。他不择手段地施加压力，才以微弱多数当选苏联总统。

戈尔巴乔夫自以为掌握了苏联军政大权，甚至已超过斯大林，就得意忘形地行使总统大权，3 月 15 日向立陶宛发出最后通牒，限立陶宛三天内收回独立宣言，结果遭到立陶宛的拒绝。

1990 年 3 月 22 日，戈尔巴乔夫悍然下达采取军事措施的总统令，派苏联陆军总司令瓦连尼科夫大将亲自到维尔纽斯坐镇指挥，把 3 月 19 日开始的军事演习变为直接的军事行动。

戈尔巴乔夫一声令下，苏联伞兵部队紧急在立陶宛首府维尔纽斯降落，抢占制高点和军事要地，坦克、装甲车隆隆冲进市中心大街，大批军队开进来，占领了立陶宛的重要部门。接着，又要求在立陶宛境内的外国外交官立即离开，要求外国记者暂停到立陶宛采访。3 月末，戈尔巴乔夫再次发出严重警告，立陶宛如果不收回独立宣言，就可能导致“十分严重的后果”。

立陶宛领导人兰茨贝吉斯急忙向美国总统布什发出强烈呼

吁，请他以更强硬的态度支持立陶宛，呼吁他促使美国国会承认立陶宛的独立，求布什运用美国总统的巨大影响，说服西方国家领导人大力支持立陶宛“与苏联离婚另过”。

美国总统布什极有城府，他知道戈尔巴乔夫仍掌握着苏联庞大的国家机

器，只要他一下决心，就能使立陶宛硬留在苏联联邦之内，当时立陶宛与苏联“离婚”成功的可能性极小。

更重要的是当时正处于东欧巨变的关键时刻，美国为把东欧国家从苏联势力范围内挖出来，搞了几十年和平演变都未能成功，现在借助戈尔巴乔夫的“外交新思维”，争夺东欧的梦想眼看就要实现，因而布什当时最关心的是把东欧从苏联的羽翼之下尽快“解放”出来，醉心于同戈尔巴乔夫搞东西方缓和，他当然不愿为立陶宛尚无成功把握的独立，为立陶宛区区弹丸之地面同戈尔巴乔夫闹翻，因而对立陶宛的求助要求虚与委蛇，也不积极做西方国家的工作。

立陶宛领导人兰茨贝吉斯顿时有黑云压城之感，眼看顶不住戈尔巴乔夫的沉重压力，急忙指示立陶宛驻华盛顿代表求见布什，说明立陶宛的命运取决于布什对戈尔巴乔夫施加压力的程度，立陶宛把独立的希望完全寄托于白宫，希望布什大发慈悲伸出援助之手。布什权衡利弊，仍然对立陶宛持敷衍态度。

戈尔巴乔夫见布什并不真正支持立陶宛脱离苏联独立，暗说布什还真够朋友，不由想起他与布什 1989 年 12 月初进行马耳他会谈时的情景。日本《新闻周刊》的一篇报道使戈尔巴乔夫终生难忘：

“风在怒吼，浪涛汹涌，甲板摇晃，但在马克西姆·高尔基号舰上，乔治·布什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为冷战后时代展示出雄心勃勃的规划：加快军备控制的进程，扩大苏联同西方的贸易机会，决定 1990 年 6 月在华盛顿举行首脑会谈。”

在美苏马耳他首脑会谈中，戈尔巴乔夫保证苏联不对东欧国家的变动进行武力干涉，这使布什喜出望外。此后，美对苏调门全面转向，改变与戈尔巴乔夫的对抗态度，谋求与苏联建立以美国为主导地位的美苏合作关系。

戈尔巴乔夫见布什对他摇摇欲坠的地位予以支持，才惊魂稍定，专心考虑对付立陶宛、拉脱维亚等 10 个闹独立的共和国的对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在 1990 年 4 月 3 日由苏联最高苏维埃两院通过了关于加盟共和国脱离苏联的法律。

为对付这 10 个要求独立的共和国，戈尔巴乔夫费尽心机。迫于形势，不得不在表面上承认各加盟共和国有退出苏联的权利，但以法律形式规定必须得到公民投票 2/3 的多数支持，并必须经过 5 年的过渡期，而且脱离前要同莫斯科清算财务帐目：5 年的过渡期结束前尚需再次举行公民投票，各加盟共和国的中央和地方的投票要分开举行，愿意留在联邦的地方任何人不许阻拦；若要求独立的加盟共和国没有获得 2/3 的支持票，10 年内不能再举行公民投票。

戈尔巴乔夫还主持最高苏维埃会议通过了紧急状态法，授权总统可在出现聚众闹事和遇有重大灾害的情况下，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实施宵禁、停止政党和组织活动、解散武装特遣队。

布什见戈尔巴乔夫对立陶宛态度转趋强硬，就派国务卿贝克访苏，向苏联施加压力；戈尔巴乔夫让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向美国保证，将和平解决立陶宛要求独立问题，不使立陶宛局势升级。

在美国暗中支持下，立陶宛采取以柔克刚的策略与苏联军队周旋，以和平方式同苏军坦克对峙。

戈尔巴乔夫被弄得焦头烂额，1990 年 4 月 18 日开始对立陶宛进行经

济封锁，切断了对立陶宛的石油供应，仅供应 15% 的天然气，以供居民取暖、做饭，又封闭其海岸线和同波兰的边界，阻止美国和西方国家对立陶宛供应武器和生活日用品。

立陶宛人受到极大压力，赶紧向美国求援，美国总统布什便从背后向戈尔巴乔夫猛插一刀，攻击戈尔巴乔夫自食前言，警告戈尔巴乔夫要遵守谢瓦尔德纳泽向美国国务卿贝克许下的“和平解决”的诺言，向戈尔巴乔夫施加压力说：“苏联如对立陶宛动武，就会影响美苏贸易关系，并将给整个美苏关系带来严重后果！”

戈尔巴乔夫对布什的压力极为恼火，但不敢公开顶撞布什，就指示塔斯社造一些舆论，批评美国人手伸得太长，表示苏联不会屈从于美国的压力，不允许别人干涉苏联内政。

布什对戈尔巴乔夫色厉内荏的表演看得入木三分，扬言要对苏联实行经济报复，暗中支持欧共体召开 12 国外长会议，呼吁苏联立即取消对立陶宛的政治、经济封锁，也暗示立陶宛领导人兰茨贝吉斯不要操之过急，而应动员国际舆论向苏联施加压力。

兰茨贝吉斯对布什和西方要人的意图心领神会，就派立陶宛总理普伦斯克尼外出寻求支持。

普伦斯克尼首先出访美国，受到布什的亲切接见。普伦斯克尼请求美国提供物质援助和贷款，声称如果美国不压苏联取消对立陶宛的经济制裁，立陶宛不几天就会陷入停顿状态。布什对此表示理解，宣称他决不会置之不理，美国保证对立陶宛给予积极而有效的支持。

在美国总统布什的大力支持下，拉脱维亚、爱沙尼亚 1990 年 5 月也宣布独立，更改国名，三国领导人签署了《一致与独立宣言》，共同致信戈尔巴乔夫和布什，请他们承认三国的独立决定。

5 月中旬，布什派国务卿贝克访问莫斯科，就美苏首脑会谈举行最后一轮预备性会谈。贝克感到戈尔巴乔夫已被波罗的海三国独立和两德统一问题，搞得焦头烂额，地位十分不稳，就遵照布什指示发动一系列进攻。戈尔巴乔夫为取得布什的支持节节溃退，做出较大让步，因而双方就削减空基和海基巡航导弹问题达成协议；在立陶宛等三国独立问题上心照不宣，达成了默契，才为戈尔巴乔夫访美铺平了道路。

1990 年 5 月 31 日，戈尔巴乔夫怀着复杂的心情再次踏上美国国土，布什马上发现自己的谈判对手因国内问题难缠而弄得地位虚弱，底气不足，不由心中暗喜。

在这次美苏首脑会谈中，戈尔巴乔夫虽然竭力摆出昔日超级大国不可一世的雄风，不停地大唱高调，但明眼人谁都看得出门道，当戈尔巴乔夫神气地检阅美国仪仗队时，当戈尔巴乔夫满面笑容地与布什热烈碰杯祝酒时，当他无话找话与布什谈笑风生时，昔日美苏首脑平分秋色的实力地位已不复存在，谁都会感到苏联的超级大国地位在显著下降。

为使戈尔巴乔夫多做让步，布什有意给苏联客人多留面子，着意制造美苏华盛顿会谈的亲热气氛：让妻子巴巴拉与赖莎手挽手漫步白宫，他故意与苏联总统表示亲热，宣传美苏总统已建立了融洽的私人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质量上全新的关系”。

戈尔巴乔夫更明白自己已今不如昔，为博取布什的欢心，忍痛做出不少让步：在统一后的德国的归属问题上，同意美国的意见，由德国人自己决定

自己的前途和归宿；在双边关系上，签署了苏美贸易协定等 13 个经济科技文件；在军备控制问题上，发表了《关于削减战略核武器的联合声明》，规定双方各种导弹的运载工具各限为 16000 枚，弹头总数为 6000 枚，7 年内分三个阶段将各自的远程战略武器削减 1/3。

戈尔巴乔夫下狠心做出多种让步，想换取美国向苏联提供最惠国待遇，但却被布什一口回绝。

西方舆论尖锐地指出，布什、戈尔巴乔夫的华盛顿高峰会谈是两个超级大国企图统治世界的最后一次会谈，但两人仅有形式上的平等地位，实际上苏联早已失去强势而被迫做出种种让步，这正是：

美苏会谈又一程，不堪回首难相同。

戈氏虚弱骨头软，难与布什比输赢。

在美国和西方国家怂恿下，1990 年 3 月至 10 月，又有俄罗斯、乌兹别克、摩尔多瓦、乌克兰、白俄罗斯、亚美尼亚、土库曼、哈萨克等 8 国通过主权宣言，外国记者说此时的苏联好有一比，犹如中国春秋时代的八百诸侯闹东周；又好像罢了宴的餐桌，杯盘狼藉，支离破碎，令人心碎。

戈尔巴乔夫无可奈何另谋出路，匆忙在 1990 年年终岁尾召开苏联第四次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新联盟条约，没想到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叶利钦给戈尔巴乔夫当头一棒，在会上发表令人震惊的演说称：

“俄罗斯不同意恢复克里姆林宫的专制统治，专制中央发号施令的时代已经过去，各共和国已经不怕任何严厉的命令，强化中央专制只会刺激做出否定的反应！”

接着又发生戏剧性场面，一个机器制造厂的女生产队长乌马拉妥娃蹦蹦跳跳着登上讲台，对戈尔巴乔夫提出有力的不信任案，要求弹劾总统，她振振有辞说：

“戈尔巴乔夫在道义上已没有权利继续领导国家，他已做了他能做到的一切：使国家瘫痪，民族不和，让一个伟大的国家去向全世界乞讨……他给国家带来了苦难、崩溃、寒冷、饥饿、鲜血、眼泪以及无辜人的死亡！”这正是：

会上忽发弹劾声，义正辞严列罪行。

葬送苏联人共愤，万古千秋落骂名。

这女生产队长的发言说得事实确凿，道理分明，声情并举，痛快淋漓，真正道出了苏联人民对戈尔巴乔夫的满腔愤恨，可谓一篇声讨戈尔巴乔夫的战斗檄文，道出了苏联广大人民的心声，因而获得全场雷鸣般的掌声，有 1/5 代表赞成对戈尔巴乔夫的弹劾提案。

戈尔巴乔夫大惊，跳上台千方百计为自己辩解，但却响起一片斥责之声，使他狼狈不堪，但自信有美国总统布什和西方国家在背后支持，就使出浑身解数否决了女生产队长的弹劾总统案，又对苏联宪法进行 37 处修改，撤销总统委员会，将联邦委员会由协商机构变为决策机构，在苏联实行总统治理体制。

戈尔巴乔夫用尽种种手段终于如愿以偿，却弄得众叛亲离，威信扫地，一向跟他最紧的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也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突然公开举起叛旗，在戈尔巴乔夫心窝上捅了致命的一刀。

只见苏联外交部长愤然登上讲台，宣称要做他“一生中最沉痛的发言”，出人预料地提出辞职，人们一下惊呆了，只听谢瓦尔德纳泽以铿锵有力的声

调，宣布他的辞职是对“专政制度发出的抗议”：

“这是我作为一个人，一个公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我不能容忍国内正在发生的事件和人民将会受到的考验。民主派的同志们，你们快逃吧，改革派已经溜掉了，独裁统治正在来临！”

美国记者如获至宝，把一向被视为戈尔巴乔夫的“战友”和“志同道合”者的谢瓦尔德纳泽辞职的消息报向华盛顿，说苏联外交部长突然辞职像一枚重型炸弹一般在会场上炸响，会议开不下去了，只好放弃讨论联盟草案，转而解决谢氏辞职带来的混乱影响问题。

戈尔巴乔夫气急败坏地即席发言，谴责谢氏对他在最关键时刻搞突然袭击，要代表们不要惊慌失措，尤其不要陷入歇斯底里状态，而应支持他应付极为严重的局势。

常言说祸不单行，代表大会又传出苏联总理雷日科夫突然患病、俄罗斯领导人叶利钦突然逃会不辞而别的消息，使戈尔巴乔夫犹如雪上加霜，苦不堪言，他虽然玩弄手段获得了最大的权力，但却已丧失人心，弱不禁风了。

戈尔巴乔夫自以为军政大权在握，决定趁美国和西方国家忙于海湾战争无力他顾的机会，对跟苏联“闹离婚”者进行一次反击，迫使搞独立的国家就范。

1991年1月8日，戈尔巴乔夫命苏联国防部发表声明，为了执行苏联总统关于征兵的命令，把大批苏军派往立陶宛、亚美尼亚、乌克兰等8个加盟共和国。

戈尔巴乔夫采取擒虎先擒王之计，决定选择波罗的海三国闹独立的“带头羊”立陶宛作为突破口，杀鸡给猴看。

戈尔巴乔夫命令苏联精锐部队气势汹汹开进立陶宛首府维尔纽斯，一支空降部队以震天的吼声降落在“反叛之国”的土地上，使立陶宛的政治局势顿时紧张起来。

1月10日，戈尔巴乔夫乘大军压境之势，向立陶宛议会发出最后通牒式呼吁，要求迅速全面地恢复苏联宪法在立陶宛的效力，被立陶宛拒绝。戈尔巴乔夫头脑发热草率用兵，双方激烈交火，造成14人死亡、230人受伤的严重流血事件，这就是轰动全球的“一·一三流血事件”。

美国和西方国家立即对此做出强烈反应。

1月13日是美国总统布什最痛苦的日子，其痛苦程度也丝毫不比在地球另一边的戈尔巴乔夫差。

布什真是进退两难：对海湾战争和立陶宛流血事件，他都要做出至关紧要的决定，而且这二者之间又有割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

那时，离联合国规定的伊拉克军队撤出科威特的时间只有三天了，美国、英国、沙特等国联军正严阵以待准备进攻萨达姆的百万伊拉克大军，这就需要取得戈尔巴乔夫的同意以联合国的名义发兵惩罚萨达姆，如果戈尔巴乔夫运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发难，美军介入海湾战争就师出无名，遇到难以想象的困难。

布什认为立陶宛流血事件也非同小可，这是否说明戈尔巴乔夫刚愎自用，要大动干戈？他若果真再来一个“匈牙利事件”怎么办？因而布什总统对立陶宛事件的态度犹豫不决，踌躇不前。

布什召集文武官员和情报部门头子专门研究戈尔巴乔夫的下一步行动，一致认为戈尔巴乔夫内外交困，一时还不敢采取更大的镇压行动，也不敢跟

美国闹翻，但美国对苏联也要留有余地，不令戈尔巴乔夫太难堪。

于是，布什决定在立陶宛流血事件问题上采取有限的强硬态度，他以不太激烈的言辞指责戈尔巴乔夫在立陶宛草率用兵，让美国国会做出重新审议美苏贸易关系的决定，西欧国家对戈尔巴乔夫的抗议要比美国强硬得多。

戈尔巴乔夫还想推行强硬政策，派苏军控制也在闹独立的拉脱维亚局势，于是再次发生流血冲突，造成5人死亡、10人受伤，美国和西方国家再次做出强烈反应，戈尔巴乔夫慑于布什和西方国家的压力，草率用兵后浅尝辄止，1月下旬改弦易辙，鸣金收兵，命令将派往立陶宛的苏联空降兵和2/3内务部队撤出，宣布采取政治途径解决。

这时，戈尔巴乔夫和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的矛盾日益尖锐，美国出面撮合两人互相妥协，4月24日召开9个加盟共和国和叶利钦参加的9+1会议，矛盾有所缓和，但不可能从政治上得到解决，戈尔巴乔夫一再向叶利钦让步，事实上把帕夫洛夫总理架空了起来，帕夫洛夫便开始策划政变。

1991年8月17日下午4时，苏联克格勃主席克里科夫在莫斯科郊外一个秘密地点请客，与总理帕夫洛夫、苏共中央书记舍宁、国防部长亚佐夫等人密商，决定乘戈尔巴乔夫在克里米亚休养之机，发动推翻戈尔巴乔夫的政变。

美国驻苏联外交和情报机关人员当天就得到可能发生政变的消息，白宫发言人当日就在总统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消息说，苏联的保守派力量正积极筹划反对即将签署的新联盟条约，戈尔巴乔夫的亲密总统顾问雅科大列大16日也曾发出警告：“一股有影响的斯大林分子集团正在策划一场政变”，布什的新闻发布官由此推导出结论说：

“苏联保守派利用武力来恢复秩序的危险增大，这些阴谋分子希望戈尔巴乔夫成为他们中的成员，但这次他可能反对他们而站在民主派一边。”

实际上，美国国务卿贝克两个月前就向苏联外交部长别斯梅尔特内赫透露：帕夫洛夫、亚佐夫、克留奇科夫等人将参加罢免戈尔巴乔夫的行动，贝克还通过美驻苏大使向戈尔巴乔夫通报了这一信息，但戈尔巴乔夫却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而到黑海之滨克里米业的福罗斯豪华别墅渡假。

就在戈尔巴乔夫准备返回莫斯科的前一天——8月18日下午16时30分，福罗斯别墅前突然响起一声尖厉的警笛声，打破了这个避暑胜地清幽而宁静的气氛。

刹那间，一队装甲车风驰电掣般呼啸而来，冲进福罗斯别墅的大门，还没等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卫兵、助手们明白是怎么回事，就已被政变当局控制了局势。

紧接着，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巴克拉诺夫、苏共中央书记舍宁等人闯进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戈尔巴乔夫想往外打电话，但电话线早已被切断，就怒气冲冲问道：“是谁派你们来的？”

巴克拉诺夫不客气地回答：“是委员会！”

“什么委员会？”

“哦，是为处理国家紧急状态而建立的委员会。”

“是谁胆大包天搞的？岂有此理！”

舍宁一改在戈尔巴乔夫面前唯唯诺诺之态，堂堂正正告诉被推翻者：

“国内局势混乱不堪，国家正在滑向灾难，必须采取果断措施，需要实施紧急状态，其他措施已无济于事，人们再也不能欺骗自己了！请你签署实

行紧急状态的命令，可以保留你的总统职位戈尔巴乔夫看还不会马上把他处死，胆子顿时壮了起来，拿出总统派头训斥说：

“我对苏联国内形势的了解并不比你们差，应当采取改善人民生活的措施，但是我反对用这种办法来解决问题。无论出于政治考虑，还是出于道德考虑，都不能采取这种冒险的办法，因为这会造成成百、成千甚至成百万人的死亡。我们永远都不能这样做！否则，已经开创的一切就会被出卖、被埋葬，我们又会陷入新的血淋淋的循环。如果你们有不同看法，可以在最高苏维埃提出来，交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寻求解决办法！”

舍宁等人被戈尔巴乔夫驳得哑口无言，一个个面面相觑，大眼瞪小眼，不知如何是好，戈尔巴乔夫见状，更气势汹汹反击说：

“你们，还有派你们来的人都是冒险分子，你们会害了自己，不过这是你们的事，你们可以自便，但是你们会毁了国家，毁了我们已经做的一切！请把这些话转告派你们来的那个委员会……只有自我毁灭，才会在现在提出实行紧急状态，我决不同意这样做！”

舍宁等人被“铁嘴钢牙”的戈尔巴乔夫驳得哑口无言，还是国防部副部长瓦连尼科夫手中有兵胆子大一些，但也似乎底气不足，他说：“你辞职吧！”

戈尔巴乔夫以进为退驳斥说：“你们从我这儿什么也得不到，请把这个问题转告给派你们到这儿来的所有的人！”

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巴克拉诺夫见戈尔巴乔夫态度强硬，为给自己留条后路，低声下气请求说：“你就先在此休息吧。趁你不在莫斯科时，我们去干那肮脏的活儿，然后你再回莫斯科。”

戈尔巴乔夫明白这是要他坐观成败，静收“稳赢”之利，他大发雷霆拒绝做这笔肮脏生意说：

“就到此为止，再也没有什么可谈的了！请你们去报告，我坚决反对你们的阴谋，你们注定要失败！”

来唱逼宫戏的五位使者被吓得不敢再发一言，戈尔巴乔夫更大声高叫：“你们给我滚开！”

逼宫戏失败，舍宁等五人赶回莫斯科参加政变前的最后一次会议，克格勃头子克留奇科夫采取愚弄和恐吓手段，宣布所有与会者都上了要被处死的黑名单，戈尔巴乔夫心脏病发作，必须采取断然措施。

于是便由一群乌合之众仓促上阵，于8月19日凌晨6时零5分（莫斯科时间），由塔斯社播发了一条紧急重大新闻，宣布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的最紧急命令：

“鉴于戈尔巴乔夫因健康状况不能履行总统职责，根据苏联宪法第127条第7款，副总统亚纳耶夫从1991年8月19日起，履行苏联总统职责。”

接着，塔斯社播发了由副总统亚纳耶夫、总理帕夫洛夫和苏联国防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诺夫签署的苏联领导人声明，宣布从19日凌晨4时起在苏联某些地方，实行为期6个月的紧急状态，组成8人紧急状态委员会。为此又发表了《告苏联人民书》。

8月18日晚上11时45分（华盛顿时间），美国总统布什刚刚上床合眼，就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情知发生了重大事件，拿过话筒一听，原来是他的首席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斯考克罗夫特紧急报告说苏联发生了政变，戈尔巴乔夫下落不明，布什情不自禁地失声叫道：“啊，天哪！我的老朋友就这样完了吗？”

布什忙把美国军政大员请到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分析苏联此次政变的背景和成功的可能性，研究美国对苏联政变当局的态度。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是个很有战略头脑的黑人出身的风云人物，因在海湾战争中的出色表现而闻名全球，此时清醒地提出，应首先搞清楚苏军是否搞了突然袭击，藏有把苏联的核导弹射向美国的指令密码箱在亚纳耶夫还是在国防部长亚佐夫手中。鲍威尔急忙打电话询问有关苏联导弹、轰炸机和潜艇位置的最新变化情况：“苏联军队有没有进入戒备状态？有元明显的大部队调动迹象？”

五角大楼回答说没有发现异常情况，鲍威尔大吃一惊，因为按照通常的政变程序，一般在政变前都要先完成对政变目标的军事部署，无不进行大规模军队调动，公安部门也应事前将关键人物先行逮捕，用军事力量牢牢控制住首都局势，才能稳操胜券。

奇怪的是苏联政变者都没有采取这些起码的应变措施。鲍威尔一向向布什报告这些情况，布什就连连摇头，便急命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弗里茨·埃马斯尽快去查证。

埃马斯火速赶到美国中央情报局总部查询，值班人员立即启动电脑查看几天来苏军和克格勃部队的调动部署情况，令埃马斯吃惊的是苏军竟无明显变化，又到五角大楼查证，结果都是一样的。

埃马斯风风火火向布什报告：“真是活见鬼！苏军至今没有明显变化：没发现军队和坦克的大规模调遣，没有对美国 and 西方电台进行干扰，也没对改革派领导人搜查逮捕。”

埃马斯一下子就看出了“八·一九政变”的破绽，以异样的声调向布什报告：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苏联发动政变者没有做充分的准备，简直不可思议！”

布什由此大发感慨：“嘿，这些家伙真是莫名其妙，他们于不成什么大事情——请提供详细的书面评估报告。”

埃马斯很快向布什提出情况报告，毫不犹豫地指出这是一伙乌合之众搞的不协调的、仓促上阵的、临时性的行动，认为政变处于无限期僵持状态和早期失败的可能性各占45%。

布什若有所思说：“亚纳耶夫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国务卿贝克回忆起他随布什访问苏联时，在一次宴会上正巧坐在亚纳耶夫身旁，两人做过短暂的交谈，贝克觉得此人不像是个使人信服的领导人。

副总统奎尔高声道出他的看法：“亚纳耶夫不是蠢材，但恐怕不能胜任苏联这个世界大国的领导重任。”

布什点头同意副总统奎尔的看法，又抬头推测道：“也许在开始时困难重重，对他来讲事情还算顺利。”

在讨论到美国对苏联政变当局的态度时，国家安全首席顾问斯考克罗夫特向布什建议说：“目前，美国不能承认莫斯科的新领导，不过，历史的经验表明，由如此强有力人物支持的政变很有可能成功，我们也不要拆毁和他们联系的桥梁。”

布什对此颇有同感，又问及向公众发表讲话时应该使用什么样的字眼，斯考克罗夫特胸有成竹建议，不宜用“非法”、“不合法”、“违反宪法”之类太刺激的词，布什也深表赞同，决定使用中性化的字眼，把亚纳耶夫等

发动的政变称为“超出了苏联宪法范围的行动”。

布什和他的助手严密监视莫斯科政变事态发展，不久就有了进一步的看法。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一边收看公开来源的 CNN 电视新闻，一边阅读美国秘密情报和军事机关的分析研究报告，再将这些资料对照起来深入研究，他得意地笑了。发现苏联发动政变者出动的坦克和军队都没有进入战备状态的迹象，便兴致勃勃给美国国防部长切尼打电话讲出他的看法：

“部长阁下，我认为这基本上是一次不完全的政变，莫斯科发生了一些事情，但是没有按照规范的要求去做，阁下以为如何？”

切尼完全同意他的见解，鲍威尔又询问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意见，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弗里茨·埃马斯也发表权威性看法：“这件事是一群失败者干的，它正在走向失败。”

鲍威尔心里有了底，向布什总统汇报了他们的结论性意见，布什讲话底气足了，在白宫的新闻发布会上，他以肯定的语气把亚纳耶夫发动的政变，称为非法的、反对宪法的行动，美国不能承认。

这时，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发现亚纳耶夫并没有对他采取控制措施，他眼睛一亮突发奇想：“我必须走出白宫，同民众站在一起！”

于是，叶利钦走出政变者层层包围的莫斯科白宫，不但不匆忙逃走，反而爬上著名的苏军塔曼师的 110 号坦克，挺直高大魁伟的身躯，宣读俄罗斯总统的《告人民书》，各国电视记者立即将摄像镜头对准他，刹时间把叶利钦反对政变的形象传遍全世界，这便成为叶利钦一生最辉煌的时刻，他那登高振臂一呼的形象放出最耀眼的光彩，此人竟鬼使神差成为莫斯科反政变中的一面旗帜，一位英雄。

这是亚纳耶夫等人犯的又一个致命错误，不但没逮捕他，反而使他捞足了政治资本。

叶利钦见布什改变了对亚纳耶夫政变当局的暧昧态度，就命令俄罗斯外交部长向美国驻莫斯科外交官递交了一封致布什总统的信件，要求在危机期间建立有效的接触。

这使布什很为难，他认为现在戈尔巴乔夫仍是苏联总统，而叶利钦只是一个加盟共和国的总统，当时应该首先同戈尔巴乔夫取得联系，才不致招来外交纠纷。

于是，布什决定先不理叶利钦，他命白宫接线员接通了通往克里姆林宫的电话，告诉对方：“布什总统要同戈尔巴乔夫讲话”，但几次都毫无结果，才在 8 月 20 日接通了俄罗斯总统的电话，布什热情地问候说：“喂，鲍利斯，我的朋友，你那里情况怎么样？”

对叶利钦来说，这简直喜从天降，简直不知道说什么好，因而带着明显的巴结口气说：“听到你的声音，我特别高兴。我们正

等待着攻击，但我并不害怕，附近街道上支持我的人已增加到 10 万人，特别是你的来电对我们是莫大的帮助！”

布什想放长线钓大鱼，他说：“我们很想为你们干点什么，你有什么建议吗？”

叶利钦简直是在绝路上遇到了大救星，急忙提出要求：“重要的是道义上的支持，我们希望听到支持我们的声明，以吸引全世界关心我们的处境。”

布什马上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采取明确态度支持叶利钦。会后，布什发

表示了反对亚纳耶夫政变和声援叶利钦的讲演，又接连不断地给英国首相梅杰、德国总理科尔等 13 国领导人打电话，动员他们支持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

然后，布什与叶利钦一天内第二次通电话，声称美国和西方国家都称赞叶利钦的勇敢行为，信誓旦旦保证：“只要政变的策划者掌权，美国就不会同莫斯科保持正常关系，我还荣幸地奉告阁下，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欧共体决定冻结、暂停、取消或减少对苏援助，以此向你表示支持！”

这时，美国国家保密局破译了克留奇科夫和亚佐夫的加密电话，获得了政变当局的核心情报。布什不顾情报机关的反对，瞒着国会，把这个绝密情报通过美驻苏使馆交给了叶利钦，还派通讯专家帮叶利钦恢复秘密通讯，使叶利钦把苏联军方拉了过去，迫使政变当局把戈尔巴乔夫接回莫斯科，布什立刻通话表示支持，戈尔巴乔夫感激涕零说：“多亏你的帮助，我又掌权了！”

布什有意拉拢说：“感谢上帝，听到你的声音，我如释重负，我希望赖莎也挺过来了。”

戈尔巴乔夫千恩万谢说：“感谢总统阁下采取的反对政变的原则立场，感谢你对我个人的极大信任。如果政变成功，将把我过去几年来做的一切毁于一旦。我有许多事情要做，我将做出一些重大的决定”。

3月24日，戈尔巴乔夫开始反攻倒算，他以苏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没有坚决反对政变为由，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要求苏共中央委员会自行解散，各共和国的共产党和地方党组织自己决定自己的前途。这个口子一开，苏共便宣告死亡。

戈尔巴乔夫葬送了苏联共产党，又筹组新联盟条约。布什对此却大拆其台，首先鼓动乌克兰独立。布什放风说：“如果乌克兰公民投票赞成独立，美国将从外交上予以承认。”

戈尔巴乔夫几乎哭出声来，急忙打电话，求布什不要匆忙表态。布什碍于戈尔巴乔夫的面子没有急忙表态，却在暗中支持乌克兰进行独立的公民投票，支持叶利钦搞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三国独立联合体，又迫使戈尔巴乔夫同意搞独联体，戈尔巴乔夫哀叹说：“我此生的主要任务已经完成了。”

在美国的大力推动下，独联体 1991 年 12 月 21 日正式成立，苏联将停止存在。

1991 年 12 月 25 日，莫斯科时间 19 时 38 分，飘扬在莫斯科上空、为几代苏联人熟悉的镰刀锤子旗徐徐降落，一面蓝、白、红三色的俄罗斯联邦国旗冉冉升起，以此向全世界宣告：

列宁、斯大林建立起来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经历了 70 年的风雨历程后宣告解体，长时间给世界历史产生巨大影响的苏联在地图上从此消失。

中国一直密切关注苏联的巨变，早在 8 月 20 日，中国外交部就对苏联局势发表谈话，表示“苏联发生的变化是苏联内部事务”，“相信苏联人民能够克服困难，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12 月 25 日，就在苏联解体的那一天，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钱其琛向人大常委会报告工作时，发表了引起全球注意的讲话：

“1991 年国际形势剧烈动荡，海湾战争、苏联解体和南斯拉夫内战三件大事使整个世界受到震撼，其中苏联解体影响尤为深远，标志着二次大战后

近半个世纪的美苏对抗、东西方冷战和两极体制的最终结束，世界多极化进程在加快。”

同一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郑重发表谈话说：“鉴于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已宣布成为独立国家，中国政府本着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尊重各国人民自己的选择，中国政府愿意继续履行与原苏联签署的各项条约、协定和有关文件所规定的义务，希望有关各共和国也继续履行原苏联与中国签署的各项条约、协定和有关文件所规定的义务。”这正是：

战后三国竞纷争，纵横捭阖妙无穷。

外交大师喜登场，辉煌业绩人称颂。

一部《中美苏三国演义》至此结束，敬请读者批评指正。后 记

拙著《中国外交演义》“民国时期”、“新中国时期”出版之后，受到读者较好反应。

《北京晚报》等报刊评论文章指出，“该书用演义形式写成，不同于正史，但基本上以史实为依据。该书能使读者了解许多外交知识，了解自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国在外交上蒙受多少耻辱，了解爱国志士仁人为了维护国家民族利益和领土主权完整，同敌人进行斗争，甚至献出了宝贵生命，从而激发我们的爱国热情。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外交上节节胜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使我们感到做一个中国人是多么自豪，使我们更加热爱祖国。”

我的一个朋友独具慧眼，他突发奇想，建议我在“民国外交演义”、“新中国外交演义”的基础上，独辟蹊径，另开天地，撰写一部《中美苏三国演义》，并提供了部分资料。我对此设想欣然赞同，便挥笔写出这部书。现在此书得以出版，首先要感谢这个朋友的独特设想，他的策划之劳功不可没。

的确，从 1949 年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东方崛起，自一代巨人毛泽东在雄伟的天安门城楼上以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宣布新中国成立，就事实上形成了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从冷战骤起到 1991 年 12 月 25 日苏联镰刀锤子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徐徐降落、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宣告解体，这 42 年的历史可谓天翻地覆、风云变幻。中美苏三国关系错综复杂，奥妙无穷，三国间复杂的外交斗争，可谓世界外交史上的最光辉篇章，值得大书特书。本书选择 42 年年中举世闻名的重大事件，但仍感篇幅有限，许多国际大事未能囊括其中。

本书起名《中美苏三国演义》自觉汗颜。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是我国古典小说中的辉煌巨著，自然不敢与其相比，本书主要从三个方面学习它的思想和创作手法：

首先，学习罗贯中塑造典型人物的成功经验，着意塑造当代外交大师的典型形象。我敢断言，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从来没有像这短短的 42 年，产生过如此众多的群星灿烂的外交大师。毛泽东、周恩来、斯大林、莫洛托夫、尼克松、基辛格等可谓世界一流的外交家，以惊人的智慧创造出世界外交史上的辉煌业绩，在世界外交史上留下杰出的篇章；陈毅、乔冠华、葛罗米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杜鲁门、杜勒斯、布什、布热津斯基等等也是世界外交舞台上独具特色的人物，他们在外交史上都起过不同的作用，作者认为也应该给予他们一定地位，并以适当的笔墨记述他们的动人丰彩和音容笑貌。为此，我常恨自己智浅笔拙，难于使他们的形象活灵活现，栩栩如生。

其次，学习《三国演义》善于描写计谋的成功经验。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隔岸观火、师出有名、坐山观虎斗；诸葛亮的联姻结盟、联吴抗曹、将计就计、草船借箭等等，千百年来令人惊叹不绝。我认为，当代外交大师毛泽东、周恩来、基辛格等在这方面毫不逊色，因而本书力求一回写一两个成功计谋，如敲山震虎，杜鲁门发动侵朝战争；瞒天过海，毛泽东派出大军东征……再如假痴不癫初战取胜，纵横捭阖中美斗法等等，以妙趣横生的计谋提挈全回，撰写曲折动人的故事，收取画龙点睛等诸多功效。

再次，学习《三国演义》描写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纵观天下大势的经验，站在战略高度，把握战后50年间纷坛多变的国际形势，抓准50年代至90年代绝不相同的国际形势特点，使读者在喜闻乐见的形式中掌握战后国际形势发展脉络，得到丰富的国际知识，做到一册在手，战后国际大事尽在其中；更注意描绘东西方文化对不同外交家的迥然不同的影响，如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东方外交家气势磅礴、雍容大度的外交风度，与欧美文化造成的基辛格等的才华横溢、活泼风趣、不拘形式的外交风度，恰成鲜明的对比。就是在同一个国度里，不同文化给外交家的影响也大异其趣，例如湘楚文化哺育的毛泽东在某种意义上颇有屈原之风，刚强阳刚，宁折不弯；而从吴越文化土壤上成长起来的周恩来则雍容华贵，机智灵活，仪态万方。

最后，学习《三国演义》的另一特点，构思曲折动人的故事，编写有头有尾的情节，深入下去挖掘重大国际事件中的趣事轶闻，力争将战后有重大影响的问题写深写透，使读者能了解该事件的全貌，津津有味地读下去，使其不出国门而掌握天下大事，更便于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增进中国与世界人民的友谊。

本书虽以演义形式写出，但重大国际事件、重要外交大师的描写，都是以历史事实为根据的，在这方面不敢随意杜撰，就其真实性来说，尽可以当作历史书去读；但本书既属文学作品家族，就具有文学作品的属性，就是说，本书中的重大事件、外交家都是根据典型化这一原则，经过艺术加工塑造而成的，它势必比历史上的人物更典型，因个别事件和人物为塑造主要人物服务而进行了艺术加工。

本书写作过程中参阅了国内外大量资料，引用了有关文字，著名专家王朝柱、俞纪民、颜世贵等不吝赐教，也得到各方面人士的大力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作者

1996年6月10日

北京玉泉山下

